赤脚汉达里耶

〔罗马尼亚〕扎·斯坦库 著



赤脚汉达里耶

〔罗马尼亚〕扎·斯坦库 著

尹宝治　姜晓华 译

外国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一年·北京

ZAHARIA STANCU

DESCULȚ

据EDITURA DE STAT PENTRU LITERATURĂ ŞI ARTĂ, BUCUREŞTI, 1952年版译出。

赤脚汉达里耶
Chijiaohan Daliye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字数392,000　开本787×1092毫米$\frac{1}{32}$　印张20$\frac{1}{2}$　插页2

1991年1月北京第1版　1991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1,180

ISBN 7-5016-0091-0/I·91　定价 6.45 元

目　次

第一章 亲　戚

“图多尔……开门！……”

爸爸叫图多尔，他很少在家。

一听到有人叫，我赶忙去开大门。只见一辆马车停在门外，马鼻子喷出一缕缕白烟；光溜溜的马屁股冒着热气。长长的马脖子上拴着几个小铃铛，马鬃捋得整整齐齐，用红黄蓝三色带子扎成小辫。瑟卡拉村的姑母乌楚珀尔坐在车的前面，一手拿着鞭子，一手拉着缰绳，门开之后，她把马车赶进院子。姑母神气活现，头上蒙着块大蝴蝶花头巾，只有鼻子尖露在外面。车的后部，是乌楚珀尔姑母的闺女——我的表姐迪察，她半身埋在干草里。

有亲戚来，妈妈自然高兴，因为可以有人跟她叙叙家常了。

妈妈是外乡人，在村里无亲无故。她是改嫁到爸爸这儿来的。她的前夫是从外祖父的门廊把她领走的——那时她还不满十五岁——并把她带到克尔默楚伊南边，再过去三个村子就是斯特尼库茨村，那里住的是塞尔维亚人。每当忆及她的第一个男人时，妈妈总是双眉紧皱，伤心万分。

要是爸爸不在家，妈妈就唱歌，歌声里充满了忧伤，我们这些孩子们也就都由着她。妈妈的前夫拉杜·奥基安是一个高个子男人，身强体壮，但好吃懒做，整天懒洋洋的，好身子骨儿也白搭。妈妈跟他生了两个孩子：姐姐埃万吉莉娜和哥哥伊昂。一天，奥基安闹胃痉挛，突然死去。妈妈仅十七岁就带着两个孩子守了寡。塞尔维亚人帮助她埋了男人，料理了丧事。妈妈锁好房门便抱着两个孩子回到我外祖母家。

“你守寡了，玛丽亚。’

“我守寡了，妈妈。”

“你说来就带着孩子来了。”

“您叫我到哪儿去呢？”

“在你家等着。”

“我的家！我哪儿还有家。他死前把家产卖掉都喝光了。只剩下几头牛犊子，我已经把它们拉到托奈哥哥那儿去了，让他卖掉，给我换几个钱。”

外祖母有三个儿子和一个闺女，闺女也就是我妈妈。妈妈的两个哥哥，托奈和利桑德鲁，从小背井离乡，到外边给人家干活去了。他们挣了点钱，又回到了奥米达。这是个穷村庄，但挺大，有车站、邮局和希腊人开的粮店。他们在公路旁买了块地，盖了房子，开起了杂货铺。他俩都娶了城里的姑娘为妻，现在两人都是拖家带口的。

外祖母很早就给妈妈找了婆家，因为家里人太多，她有点受不了，她只要老儿子留在身边，除了老儿子她谁也

不喜欢。外祖母疼爱杜米特拉凯舅舅，因为他弱不禁风，又非常听话。在外祖母眼里，他差不多是个木头人，是个缺心眼的半大小子。他整天跟着外祖母转，唯唯诺诺，百依百顺。

“杜米特拉凯，把屋里地扫一扫。”

杜米特拉凯抄起笤帚，比姑娘扫得还干净。

“杜米特拉凯，去掰点荨麻叶子，把它切碎了煮一煮，掺点儿麸子，把鸭子喂喂。”

杜米特拉凯沿着水沟走到地头，掰了一筛子荨麻叶，照外祖母的吩咐弄好，去喂鸭子。

“杜米特拉凯，今儿晚上别出去。”

“我不出去，妈妈。”

“杜米特拉凯，今天你去跳霍拉舞吧。”

“我去，妈妈。”

“要跳就得跳到底，杜米特拉凯。”

“我一直跳到底，妈妈。”

“好好跳，杜米特拉凯，你也露一手，给他们瞧瞧。”

“我一定好好跳，妈妈。”

“跳完舞，你就跟姑娘到树林里去散步。”

“就怕谁也不愿意跟我去。”

“为什么不愿意？”

“妈妈，姑娘们不怎么喜欢我。”

“杜米特拉凯，你要让她们喜欢你，跟她们在一起胆子要大一点。”

“我试试看，妈妈。”

“你试试吧，为什么不试试！托上帝的福，你既不聋也不瞎，不缺胳膊少腿，又不是罗锅。”

“这倒是。”

杜米特拉凯舅舅性情温和，心地善良，长相和性格同外祖父一模一样。另外两个舅舅都像外祖母，厉害、机伶，性情粗鲁。

外祖母有一张满是皱纹的干瘪脸，说起话来声音生硬，好像总是在向别人发号施令。

外祖母的祖先是一个为了爱情抛弃祖规家法的土耳其人。她的眼睛是三角形，有点斜眼；耳垂边上有豁口，好像有人用剪刀剪过一样！

“妈妈，外祖母的耳朵是谁给剪的？”

“谁也没剪。是带耳坠儿夹的。”

起初，一听到这个字时，我还以为耳坠儿是一群怪人，他们带着剪刀走来走去，揪着女人的辫子，把她们按倒在地，剪她们的耳垂。

星期天，外祖母穿上节日服装去跳霍拉舞，或是参加婚礼和洗礼时，总是戴上挂着金币的头环。外祖母的头环是金的，当快步跳起霍拉舞时，金头环丁当作响。

外祖母的每个耳朵上戴着七个耳坠儿，它们用丝线穿着，垂到肩上。耳坠儿都是用纯金做的，沉甸甸的。耳朵眼是用在火中烧过三次的大针扎出来的，越坠越大，以致裂开。耳朵眼坠裂后，在上边又扎了一个，它们还是越坠

越大，最后坠裂。就这样，后来外祖母出嫁了，开始生儿育女。出嫁后，外祖母又戴了一段时间的挂金币的头环，然后就把它收了起来。耳坠儿也不戴了。她把耳坠儿拿到镇上首饰店一个一个地换了。把头环上的金币也摘下来换成银的，最后又换成了铜的。剩下的两个金耳坠儿给妈妈做了嫁妆。妈妈把它们包在头巾里，藏在箱子里的木盒中。妈妈想给女儿戴，但是怎么分法！……两个耳坠儿，五个姑娘，十个耳朵，如果你能分的话，那就公平地分一分吧！……妈妈给我的姐妹们扎了耳朵眼，但是耳朵眼并没有坠大，也没有坠裂，更没像外祖母那样变成豁口。我的姐妹们不戴闪闪发光、丁当作响的金耳坠儿，她们戴的是花里胡哨的玻璃珠子。

妈妈的耳环小而圆，像一些硬币。

“妈妈，你的耳环是金的吗？”

“是铜的。”

是呀，玻璃珠子和那么轻的黄铜耳环怎么能把耳朵坠裂呢！

达乌德的故事发生在扎韦拉暴动和图多尔起义之前，即发生在俄国人支持的希腊人反抗土耳其人的暴动和图多尔·弗拉迪米列斯库在奥尔特河那边领导的起义之前。图多尔·弗拉迪米列斯库把乡村的年轻小伙子聚集在一起，拿起武器，领着他们推翻地主老财的统治，打击同地主老财一起称王称霸、为非作歹、榨取民脂民膏的地痞流氓。听

老人们讲，那时各村都沸腾了。罗马尼亚人骑上马，唱着古老的战歌，参加了暴动。那些有钱人无不惊恐万状。那些有深宅大院、有奴隶、有庄园、抓民夫雇长工的人，更是胆战心惊，吓得像筛糠似的。我们这一带许多人参加了暴动。有些人还用了扎韦拉这个姓——他们的子孙后代也都姓这个姓——伊利耶·扎韦拉，斯托伊卡·扎韦拉，科斯塔凯·扎韦拉，等等，等等。地主们叫来了多瑙河对面的土耳其军队。队伍一来，到处烧杀抢劫，把弗拉迪米家的图多尔砍死了——把他剁成了肉块。潘杜尔们[1]又回到了他们的土屋茅舍。图多尔牺牲了。地主对老百姓的压迫比以前更厉害了。土耳其人还是土耳其人，地主还是地主。他们互相勾结，狼狈为奸。但是这次起义永远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家喻户晓，代代相传，人们还经常哼着那时留下来的歌曲。

乌楚珀尔姑母开始轻轻地哼起那时的歌来，声音很小，好像是害怕窗子外边的大街上会有人听到她唱的歌词：

所有的犁都在耕地，
上帝只让我的犁停下。
总有一天，
　　　　上帝也要让它耕地。
我要耕出一条长沟，
直抵坏蛋的家门口；

[1] 指参加图多尔·弗拉迪米列斯库起义的农民。

我要犁出一条深沟，
犁进地主的胸脯。
地主，你听着！
我要卖掉身上的衣服，
买一把锋利的剑。
我要用我的犁铧，
铸成一门大炮。
只有这样，
才能打倒地主老财，
免除剥削，
自由耕田，
日子越过越好。

乌楚珀尔姑母的声音颤抖着，我不明白为什么当她回忆起很久很久以前的事的时候声音却那么颤抖。不知她唱完了，还是因为她想不起整个歌词而停了下来。她沉默了片刻，然后叹了一口气说：

“我们也要过得好一些！我们总想过上好日子，可总也过不上。地主老财过得倒好！老百姓默默地忍受着压迫。但是他们想，总有一天会出现另一个图多尔——也许叫别的什么名字——一个人或者许多人，领着因剥削压迫而一触即发的村民起来，用刀枪、斧头砸烂贪得无厌的地主阶级的统治，把它烧成灰烬，否则，我们不会有好日子过。地主有福享不完，可就是不肯让你享点儿福。他们死咬着荣

华富贵不放，平民百姓必须拔掉他们的牙齿。”

“只拔掉牙？”

“话是这么说。还必须打断他们的脊梁骨。”

“要是全国都起来的话。”

“会有这一天的。”

“会有的。”

乌楚珀尔姑母和妈妈的眼睛闪闪发光，似乎把屋子都照亮了。

“瞧，我这一唠叨起来就没个完，看来我是老了。”

“你不喜欢老吗？”妈妈问。

“难道有人喜欢老吗？可你有什么办法。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人总是要老的。老了以后……”

“到老还有一阵子呢！……”

话头打断了一会儿，又接上了。

“土耳其人从他们统治的图尔努城堡骑着马跑出来，成群结队地烧杀抢掠。特别是星期天的上午更是出没频繁，因为基督教徒都到教堂去了！……如果他们事先不知道土耳其人闯来的消息的话，他们便成了瓮中之鳖。土耳其人对他们乱砍乱剁，把姑娘、媳妇捆在马背上，带过多瑙河给他们当奴隶。达乌德就是这些土耳其军队的首领。

“有一次，他们在复活节那天闯来了。当时人们正在井旁草地上跳着热闹的霍拉舞，腿脚快的小伙子和孩子们，见他们来便一下子都跑开了，钻进密林中躲藏起来。因为姑娘们穿裙子跑不快，于是都投井了。有一个胆大的姑娘，站

在井台旁，毫无惧色。土耳其兵骑着马，戴着帽子，包着头，留着大胡子，一下子把她围了起来。他们个个手持刀剑，在早春的太阳下刀剑寒光闪闪。扎琳卡看着这一帮穷凶极恶的土耳其兵，泰然自若。她折了一根发了芽的柳树枝，叼在嘴里。这时，一个满脸黑胡须的中年土耳其兵从他们当中走了出来。

"'那些姑娘为什么都跳井啦？'

"'因为怕你们，怕你们这些土耳其兵！怕给你们当奴隶，不愿让你们糟踏！……'

"那时，土耳其人把姑娘、媳妇抢走给他们当奴隶，糟踏之后，再把她们弄到红海，象卖牲口似的卖给有钱的人。

"'你为什么不跳井？'

"'我不怕你们。'

"土耳其人感到吃惊，操着他们难听的语言，嘟囔起来。那个黑胡须的土耳其兵又说：

"'你知道我是达乌德吗？'

"'土匪达乌德？我以前不知道，现在认识了。'

"扎琳卡晃着身子，手里摆弄着柳枝。

"'你现在还不害怕吗？'

"'瞧，我就是不害怕！'

"扎琳卡高高的个儿，身材苗条，有一双青草般的绿眼睛。达乌德把她抱上马，然后土耳其人骑马悄悄地朝着多瑙河那边的城堡溜走了。

"投井的姑娘们淹死了，全村人无不伤心落泪。村里人

把井堵上，并且为死者竖起了十字架。虽经多年的风吹雨打，用橡木做的十字架仍然屹立在那里。

“这个女人是怎么把达乌德迷住的，永远不会有人说清楚。有一年的秋天，下雪前，三辆大车停在了瑟卡拉村，每辆车由六头牛拉着。车上都装满了财物。达乌德离经叛道，脱下了灯笼裤和小帽，穿上了当地罗马尼亚人的服装。他买了地，造起了宅院——活像个地主。他的钱有满满的几斗。起初，罗马尼亚人都躲着他，后来就和他混熟了，并且把他当成了自己人。

“后来，扎琳卡生儿育女。现在，四五个村庄里都有他们的后代。不管你走到哪儿，都会碰到姓达乌德斯库一类姓的人，其中有庄稼汉、牧羊人、跑买卖的、神父、手艺人、乡文书，甚至还有一个主教。

“为了避免重名重姓，有些人改了自己的姓。”

乌楚珀尔姑母讲着，我们都听得入了迷。妈妈下灶为客人准备饭去了。

这时，斯特尼库茨村的一个叫万库·韦内的赶着车从这儿路过，喊着：

“买鱼，买鲜鱼啦！……”

妈妈买来了鱼，刮掉鳞，放进锅里，拿到火上煮，还往锅里放了辣椒。鱼鳞像一些银币。猫在鱼内脏堆里嗅个不停。

妈妈在外面粮仓的后边逮了一只公鸡，我哥哥伊昂把它宰了。一会儿我们就吃上烤鸡了。

你能和乌楚珀尔姑母在一个桌上吃下饭去吗？……只要你愿意就行。这时，我见其他人毫不在乎地在吃饭。乌楚珀尔姑母长着一口又黄又黑的像马牙一样的大长牙，牙根还是绿的。她大口大口地喝着汤……用手撕着鱼，肉不嚼就往下吞，把骨头和刺吐在桌子上。迪察的牙像老鼠牙一样小，下嘴唇有个豁口——是兔唇。迪察的兔唇是乌楚珀尔姑母生下她时就有的。

埃万吉莉娜姐姐，同迪察年岁差不多，她告诉了我一个秘密：

“乌楚珀尔姑母生下迪察时，迪察不仅是兔唇，而且还戴着瓜皮帽。”

“瓜皮帽？瓜皮帽是什么？”

“有些孩子生下来时头上裹着的那层厚胎膜。接生婆把胎膜撕下来，扔进炭火里。胎膜吱吱直叫，像个活人一样不停地挣扎。它上下扑腾，像小孩似的哭泣着。火炭把它吞没，烧死，最后化为灰烬。戴着胎膜生下来的人，死后变鬼。迪察死后要变成女鬼的。夜间她会来吸我们——她的这些亲戚——的血。”

“姐姐，可别让迪察死。”

“谁说让她死！……但是，迪察早晚是要死的。人总是要死的。”

“我们死后她再死。”

“也可能她先死。她死后，我们往她心上插一根大针，她就变不成女鬼了。”

“如果用这个办法能行的话，我们现在就给她心上插上一根针。”埃万吉莉娜姐姐笑了。

“不，现在不行，要等她死了以后才能这样做。”

我不喜欢乌楚珀尔姑母吃饭的那个样子，吐在桌子上的那些骨头和鱼刺使我感到噁心，我到外屋灶旁吃去了；我也不喜欢迪察，她喝汤时，汤从嘴里流出来，流得满下巴都是。

吃过饭，我们和迪察玩背狗。迪察的屁股很大，腿上下一般粗，乳房像两个鼓鼓囊囊的褡裢。她叫着把我背起来，我搂着她的脖子，用脚跟踢她的屁股，用手揪她的奶头，她叫了起来，并且转过她那带兔唇的大宽脸。这时，我挣脱开她，用手捂住眼睛，不想再看见她，我藏到了门后。

“背狗玩呀！……”

屋子里尘土飞扬，妈妈来赶我们了。

“你们这些淘气鬼，到外边去玩，把我们的耳朵都吵聋了！……”

淘气鬼们出去了。我想出去，可是没有鞋穿。我只好独自在床上的箱子旁边玩。

乌楚珀尔姑母和妈妈嘀咕着。乌楚珀尔姑母同一个叫默里纳凯·皮耶勒的邻居相好，迪察就是姑母同他生的。罪孽终于暴露了——迪察的兔唇就是标记。皮耶勒深更半夜隔着篱笆给她成袋成袋地送玉米面、白面，给她买头巾、围巾和鞋，从城里买回礼物送给她。姑母把迪察许给了奥洛吉村的一个男孩子，是杜里耶的亲戚。这个男孩子是个哑

巴，其余同众人无异。皮耶勒准备把一群羊送给迪察做嫁妆。以后迪察或者下地干活，或者料理家务。也许命运会让他们生儿育女，他们的孩子可能是哑巴，也可能是兔唇，也可能没有什么生理缺陷。世界上的人形形色色，不是所有的人长得都漂亮。你看，有的树高大挺拔，枝繁叶茂，年轮丰满；也有一些树弯弯曲曲，萎萎缩缩，疙疙瘩瘩。但是天地永存，万物不灭。太阳升起照耀着人们，照耀着飞禽走兽，照耀着田野，照耀着河流。太阳落山后，第二天再升起，如此循环往复，无穷无尽，直至终结——要是有终结的话……终结总会有的。那是以后的事，到那时还早着呢。

乌楚珀尔姑母双手抱膝坐在床上，背靠着砖壁炉，壁炉是热的。街坊的男孩子们在草秸旁和迪察打打闹闹。我哥哥伊昂也和她打闹。我哥哥的朋友阿文德雷亚和迪尼克也和她闹个不停。

每当乌楚珀尔姑母到我们这儿来时，男孩子们都成群结夥地跑来看迪察。还听见他们嚷着："乌楚珀尔家的来了。"他们挤眉弄眼，还吧唧着嘴。莫非他们吃蜜了？……我们没有蜜……他们家里也没有蜜。只是地主老财有蜜，还有阿加纳、乌尔马兹、纳伊丁一类富农家有蜜。他们不仅有蜜，什么都有。需要的有，不需要的也有。

妈妈同前夫生的两个孩子伊昂和埃万吉莉娜闹肚子。埃万吉莉娜长牙，日夜哭个不停。伊昂也跟着一起凑热闹，哭哭啼啼。妈妈把他们放在腿上摇来摇去，让他们迷迷糊

糊，安然入睡，睡个大觉。但他们不睡。妈妈便把他们抱了起来——对于尚未成年的妈妈来说，抱着两个孩子，是太沉了——在外祖母的屋子里来回走着。杜米特拉凯舅舅整天呆在牲口棚里，外祖父不是去村公所，下酒馆，就是去教堂。

雨雪交加，北风呼啸着吹过园子里的果树和水沟边上的垂柳。地里的那一排高大的白杨树在晃动着。结冰的小水沟把园子分成了两半。

"别哭了，宝宝，别哭了，宝宝，别哭了，宝宝！……"

埃万吉莉娜还是哭，伊昂也哭个不停。妈妈还要给他们不断地洗晒尿布。妈妈有一双动人的眼睛，梳着金色的辫子，身材苗条。她十七岁就守寡了。

"别哭了，宝宝，别哭了，宝宝，别哭了，宝宝。"

外祖母总是哭丧着脸，好像谁欠她两百块钱似的。每当下雨或下雪时，她的脸拉得更长了。她的上膛像恶狗的上膛一样是黑的。

"达里耶，你还说她？你的上膛也是黑的。"

"黑的又怎么样？"

母狗格里瓦生下了九只小狗。我们让小狗吃一个星期的奶，到睁开眼为止。你们不知道吧？小狗生下一个星期之后才睁开眼。那时，我们就把小狗放进一个筐里，拿到屋外台阶上，把它们的嘴弄开，一个一个地看，上膛是黑的就留下。因为这种狗长大了会叫，会咬人，会看家。其

余的就把它们装进口袋，带到铁道那边的沟里，用棍子把它们打死，因为要它们也没用。格里瓦老是跟着我们。我们用石子、土块赶它，用脚踢它的瘪肚子。我们走后，格里瓦又偷偷地把死狗崽子叼了回来，把它们一个一个地放回窝里。还得费一次事。我们必须把它们埋得深一些。格里瓦到处寻找，用爪子刨地，惨叫着，月亮和星星出来就对着月亮和星星叫，天上有云彩就对着云彩叫。后来，格里瓦慢慢地平息下来了。

“别哭了，宝宝，别哭了，宝宝！……”

外祖父看得不忍心了。

“孩子，给我，我来哄哄他们吧，你太累了。”

“我不累，爸爸。”

外祖母说：

“别管她！她不累，孩子是她生的，她就得把他们养大。谁叫她男人死的？……”

“妈妈，不是我害死他的！……”

“我知道不是你害死的！……你再去找一个。干吗呆在这儿给我们添麻烦。……”

“姐姐，你再找一个男人吧。”没教养的杜米特拉凯舅舅插了话。

杜米特拉凯舅舅嘴上留着发红的小胡子，长着一个鹰钩鼻子，一双黄色的蛇眼。

“妈妈，那样全村人都会笑话我。男人刚死……”

“他们笑话又怎么样？碍你什么事？人多嘴杂。让他们说去，人的嘴只有入土后才能罢休。”

“只有入土后才能罢休……”妈妈重复着。

“姐姐，你再找个主儿吧。我要成家，可是家里没地方。”

“是呀，我要给儿子娶媳妇，家里没有地方给你住，也没有地方给奥基安的孩子住。……”

“孩子是我的，妈妈。”

“不，是奥基安的。如果他知道他要死的话，他就不该让你生孩子。”

“他不知道他会死，妈妈。谁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死。好像您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死？”

“我知道。我们这些人身子骨儿结实。我要活到差不多一百岁才死，也可能超过一百岁。……”

“别哭了，宝宝，别哭了，宝宝，别哭了，宝宝！……”

外祖母整天骂骂咧咧，于是妈妈用旧衣服把孩子裹好，抱着走了。她沿着坟地顺着一条小路爬上山坡。坟地里的小木头十字架，有些是新放的，那些旧的柱子烂了，倒在杂草丛生的坟墓上。她走呀，走呀……有时也停下来歇一歇。就像拉着超载车上山的牛那样，艰难地走着，她真想在地上跪一下，或者坐一会儿，喘喘气。她的腿都麻木了。怎么能坐得下！……雨打在薄雪上，又结了冰。妈妈穿着沉重的皮靴，一步一滑。湿透了的裙子被风吹得贴在身上，

头巾湿了，长袍儿也湿了。

“别哭了，宝宝，别哭了，宝宝，别哭了，宝宝！……”

她心想，要是死掉就好了。死了就什么也不知道了，也就感觉不到哪儿不舒服了。孩子啼哭着。

“别哭了，宝宝，别哭了，宝宝！……”

她那金色的辫子一直垂到臀部，明亮的眼睛陷进去了。她爬过山岗，穿过田野。烟雨茫茫，渺无人烟，连乌鸦叫的声音都听不到。乌鸦栖息在山谷的槐树上了。死去的人安息在山坡上的十字架下面的杂草中。丈夫的死并不使她难过。她未曾爱过他。从来也没有喜欢过他，他们的婚事是外祖母包办的。

妈妈顺着小路往下走去。前面村里，有她的两个哥哥，他们都是做买卖的，日子过得还算富裕。现在她就是到他们那儿去！……两个哥哥不大和睦。两家的女人总在背后搬弄是非。大哥利桑德鲁患肺病。他的老婆是城里人，也是个病秧子。他们生了个孩子叫扬库，身体瘦弱，又贪吃又挑食，吃了像是没吃一样，不长肉。全家都有咳嗽的毛病。利桑德鲁心眼儿不好，他老婆也坏。但是他比起托奈来似乎还强点儿。托奈有三个孩子，三个全是闺女，一到春天，他老婆菲尼卡肚子就大了，要生孩子。托奈的家简直是个地狱。他老婆整天吵着要回城里去，不愿呆在乡下，过不惯农村生活。托奈到城里能干什么！……他还没攒够在镇上开铺子用的钱。

“利桑德鲁大哥，你好！”

“好！”

“我在妈妈那儿呆不下去了。我到你这儿来住几天，住不长，我会想办法的。”

“你快想办法吧！你为什么不去找托奈？”

“你比他好，利桑德鲁大哥。”

“谁告诉你的？”

“我知道。”

“你不了解。”

“那我就走！”

“现在你既然来了，就留下吧。”

妈妈在利桑德鲁家住下了。利桑德鲁的城里老婆一见，脸就拉了下来。

她无可奈何地对妈妈说：

“姑娘，那你就帮我们料理家务，打扫房间，挑水做饭……”

妈妈成了利桑德鲁家的仆人。一天，一个星期，一个月，两个月过去了……有一天，托奈舅舅捎话儿来说，他想见见妈妈。于是，妈妈就到托奈那儿去了。

“我看不惯哥哥这个坏家伙那样对待你。我们哥儿三个，就你这一个妹妹，可你却成了人家的佣人！……我给你找了个主儿，你嫁给他吧。你有两个孩子，他也有两个孩子。加在一起你们就有四个孩子。他是个鳏夫。去年秋天，你死了男人的时候，他死了妻子。”

“托奈哥哥，我想见见他。”

“见见吧，干吗不去见。”

“他就在隔壁的酒馆里。我把他叫到家里来。”

“叫他来吧！……”

菲尼卡留下看柜台，托奈把一个年轻男子汉带进屋里，这个人黑脸膛儿，一双淡褐色的眼睛，短胡子……他忧心忡忡，黑色的衬衣沾满了泥土。春天已经来临，他开始下地干活了。

“晚上好，玛丽亚。”

“你好。”

托奈又回到柜台和菲尼卡一起去应酬顾客。顾客买了李子酒，买了面包圈，就嘎巴嘎巴地吃起来，然后又喝起了葡萄酒。没有钱的就赊着喝。托奈都一一地给他们记上帐。他们要等到夏秋卖了粮食再付钱——如果能够打下粮食的话。如果打不了粮食也不要紧，来年再付，反正店主吃不了亏。托奈在帐本上记上两次、三次，多记几次就是了。菲尼卡脸色阴沉地看着喝酒的人们。

“托奈，你又赊给他们了。”

“又赊给他们了。”

“托奈，你也要为我女儿们想想。”

“我正是为她们着想。”

托奈倒满了三杯李子酒，端着进了屋。

“哎，妹妹，你嫁给图多尔吗？”

“哥哥，我嫁给他。”

“祝你们白头到老！”

他们碰了杯并且一饮而尽，妈妈只用嘴抿了抿。

“亲爱的，你不喜欢喝酒。”

“我不喜欢，亲爱的。”

“我也不喜欢。”

“这样好。”

“图多尔，你什么时候让她过门到你家去？”

“今天晚上，托奈大哥。”

“就今天晚上吧，哥哥。”

“祝你们万事如意。”

爸爸抱着埃万吉莉娜，妈妈抱着伊昂，他们走出了托奈舅舅的家门，上了大道。他们并排着朝前街走去。

天晚了，夜幕已经降临。风轻轻地吹着，把苏醒了的田野的芳香送进了村庄。

孩子们趴在大人的肩上睡着了。

灶里燃着粪饼和干草。一个脸上有雀斑、塌鼻梁的男孩子偎在炉灶旁的草秸上打瞌睡。墙上挂着一盏油灯。微弱昏黄的灯苗儿偶尔跳动一下。夫妻俩一起走进院子，穿过门廊进了屋。男的摸摸床，然后把两个睡着的小家伙挨着放在床上，用棉毯子给他们盖好。他把这个女人拉到身旁，拥抱她，亲她的脸。他的嘴唇让风吹得干裂了，但是，由于风吹日晒，女人的脸更是粗糙。这个女人用手把男人轻轻地推开。

“哎，你好像说过你有两个孩子。我怎么只看见了一

个？”

“我把女孩子给人了。她太小，我养不了。”

“给谁了？”

“一个街坊把她要走了。”

“哪个街坊？”

“吉戈伊的老婆。”

“你去把她领回来。”

“好，明天去。”

屋子里冷冰冰的。风把屋顶的薄木瓦掀了起来，一缕缕炊烟被风吹散。这个女人在灶旁坐下。这时，满脸雀斑、塌鼻梁的男孩子醒了。他死死地盯着这个女人，然后噌地一下站起来，像一只受惊的小兔，躲在爸爸身边。

“这个女人是谁？”

“是你妈妈。”

“活见鬼！她不是我妈妈。我妈妈已经死了，早就埋了。

男孩子说完朝这个女人伸出了发紫的厚舌头。

这座房子坐落在一块空地的中间。房后是牲口棚和粮仓，粮仓里的麦子，即使年景好时，也少得可怜；还有玉米仓，只有收下玉米时才有玉米。还有一辆旧车，牛拴在车辕上，在一旁嚼着干草。空地的后面，是一片槐树林，林子的中间有一棵白杨树昂然挺立，杨树的叶子总是沙沙作响，好像被空中的流水不停地拍打着。房子的前面，有两棵桑树，几棵李子树和一棵核桃树，核桃树一半已经枯死

了。栅栏旁，有一棵垂柳，树枝遮住了半边路。柳树底下有一口井，井口上方用一个木制顶棚遮着。井很深，井底的水面刚刚可见。房子的右面和对面是街坊，再过去就是街里。房子的左面是铁路，铁路旁有一条小道通向山岗。翻过山岗，便是一望无际的大平原。平原上有些零零落落、起伏的土丘，偶尔见到长在土丘上的几棵老树，这是过去无法穿过的一片密林的遗迹——一片长满榆树、杨树、白蜡树、橡树，荆刺丛生，野兽出没的代里奥尔曼原始森林。

从前，土耳其人统治的多瑙河沿岸的图尔努这一带人烟稀少。靠近韦代的卢什地方是土耳其人的城堡。土耳其人烧杀抢掠成性，这些匪徒经常出来打家劫舍。那时，此地农户不多，这儿三户，那儿两户，住得很分散。土耳其人的仆从也经常来收取苛捐杂税。他们用烟熏人，打人，横征暴敛，巧取豪夺，然后溜之大吉。他们走后，人们叫苦不迭，一片惨状。你向谁去诉苦？能逃的，都跑进森林躲起来，过着流浪生活。……为了谋生，一些人拿起大棒拦路抢劫。当时这里到处是一片片的密林。小米糊、牛奶、奶酪是主食。养的牲口很多，耕地很少。格布内亚老汉讲起了他当时在去德勒格内什蒂镇的路上发生的故事。他是一个人去的。过了乌杜普地方之后，他发现有一个人也骑着马，腰里别着一支手枪，盯上了他。老汉停下来让马吃草，那个家伙也停了下来。他一走，那个强盗也跟着走。老汉暗想，得想法把这个家伙干掉。天黑前必须把他干掉。太阳

到了正中午，然后慢慢西斜。这时，老汉闪进树丛里。他把马拴好，准备睡的地方。他把大皮袄铺在地上，然后在皮袄下面塞了一堆草，还把帽子扣在皮袄领子上。夜幕降临，看上去像是一个疲惫不堪的行人睡在树丛里。老汉躲在附近。那个强盗偷偷地走了过来，朝着大皮袄开了枪。然后他弯下腰，想去搜身上的东西。这时，格布内亚老汉朝着强盗的天灵盖猛击过去。老汉把强盗打死在地上，随后吹着口哨继续赶路。这件事发生在秋天。来年春天，老汉又到德勒格内什蒂镇赶集，途中他绕到上次出事的地方看了看。他看见强盗的尸体已被野兽吃掉，只剩下骨头和腰带。当时，老汉把腰带当成树皮或木棍捡了起来，一看，是条腰带。腰带里边丁当响，塞满了金币。

"嘿，好家伙，他有钱，还真不少……谁叫他盯着我想害死我呢？我把腰带和金币都拿了回来。是一条镶着铜钱的红褐色的宽腰带。"

代里奥尔曼这片原始森林呀，它早就一去不复返了。在阿登卡塔附近，当时一些老年人在那里养蜂。秋天，他们去熏蜂箱驱蜂取蜜，然后把蜂蜜带回家放在橡木桶中。孩子们喜欢吃蜂蜜，如果吃多了，蜜会从肚脐眼儿往外流。

"乌楚珀尔姑姑，那他们怎么没死？"

"死不了。"

"但是，我不相信蜂蜜会从肚脐眼儿流出来。"

"你相信什么？……你什么也不信。你就是天不怕，地

不怕，什么都想亲眼见--见。孩子，你要知道，谁也不可能什么都看到，你也得相信别人说的。夏天，你到小河里洗过澡吗？”

“我去洗过，乌楚珀尔姑姑。”

“有时你也过水闸到保加利亚人那边的地里去吗？”

“去过。我和男孩子们过去偷园子里的西瓜。……”

“那你发现了没有，现在的拦水坝是把原来的泥土和石子水坝加宽到波沙尔利耶山岗后形成的？”

“我看见了，我又不是瞎子。”

“从前的水坝比现在的要高要宽，能拦住水。在两个山岗之间有一个大水塘，里面长满了芦苇、蒲草，岸边有垂柳。十个村的居民修起了这个土坝。当时，不少男女老少在筑坝中死在皮鞭之下。一个土耳其人在大坝的一端开口处安了一台水磨，留下一个管事的看磨坊，收取当地罗马尼亚人的用磨费。磨坊主每月从土耳其营地来这里收一次帐。磨坊使他发了财。因为附近只有他这一家磨坊。这个土耳其磨坊主经常坐着小船在水上游逛，两个罗马尼亚人给他划桨。他懒洋洋地躺在松软的天鹅绒枕头上，抽着水烟。小船在水中荡漾，使他飘飘入睡。有一天，听说从东方来了俄国人要和他干仗，为的是使基督教徒免除赋税。于是土耳其磨坊主把各村的罗马尼亚人集合起来，让他们用铁锹和镐头把大坝扒开。水冲了出来，口子越冲越大。这个土耳其人亲手放火烧了磨坊，亲眼看着烧成灰烬后，才骑上马，带着长工走了。这些长工都是基督教徒。他们爬

上山岗之后，长工们相互使了使眼色，就扑到这个土耳其人身上，把他按倒在地，杀死了他，拿走了他腰带里的金币，把尸首丢下喂鸟。他们牵着土耳其磨坊主的马回了村。第二天，来了俄国人，多得不计其数。他们在地里搭起了帐篷，一直住到深秋。他们在村外和罗马尼亚人跳舞联欢。他们腰带里有很多卢布，并开始学说我们的话。他们当中有一个哈萨克人(谁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罗马尼亚人叫他杰安特。他和小伙子们打赌，说他能只身入图尔努城，去给村里他所喜欢的女人买回一捆披肩，并且不让土耳其人伤害一根毫毛而安然无恙地返回。他骑上马走了。全村人聚集在村边望着他离去。那时，谁也不相信还能再见到他，不相信他能从土耳其人那儿活着回来。有些女人冲着他哭叫着。这是发生在早晨的事。到了傍晚，哈萨克人回来了，只见他的马累得口吐白沫。他对人们讲述了在土耳其城堡里的经过。他在进入土耳其兵把守的城堡之前，换上了一件土耳其式大衣，戴上了一顶土耳其小帽。进城后，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他在城里的一条大街上下了马，买了叶子烟，还买了面包和披肩。然后上马，把大衣和帽子扔掉。他拔出剑，朝一群晃晃悠悠的土耳其兵冲了过去。他挥舞着剑，砍掉了三四个人头。他用俄国话喊叫着，吓坏了土耳其人。店铺都关了门。人们四散奔逃。大家都以为整个城堡突然被哈萨克人包围了。等到土耳其人搞清楚城里只有一个哈萨克人时，杰安特早已飞马闯过了关卡，钻进了树林，直奔默古勒代帕泽去了，因此，土耳其人落得

个被人耻笑的下场。……这个哈萨克人把沾满血迹的剑拿给大家看。他还给大家看头巾、披肩。第二天，村里许多妇女头上都戴上了各式各样的新头巾。严冬来临时，俄国人开向多瑙河，包围了土耳其城堡，把那些异教徒彻底赶过了多瑙河。这件事发生在扎韦拉起义后不久，那时我的外祖母还年轻。她也戴过赶走土耳其人之后俄国人从城堡买回来的头巾。……”

乌楚珀尔姑母笑着，一个劲地眨眼，好像是为了不让眼泪流下来。

天已发白，太阳尚未升起。昨晚的风还在刮着，槐树、桑树和杨树在风中摆动。天空中一片片浮云向西飘去。几只母鸡在院子里啄食。

全村人醒来了。牛哞哞叫着。汲水吊杆在井口上下动个不停。

这个女人朝四周看了又看。她将同这个和她度过第一夜的男人，在这块巴掌大的地方，在这些槐树下，在这个小院子里，在这些天不亮就穿着拖鞋打水并在冻硬了的地上走得嘎嘎响的女人们中间过日子……在这儿过日子！过多久？谁也不知道自己能活多久。这是自然规律，谁也用不着知道地上同腿连在一起的影子会跟随自己多久。

“达里耶，要是你喜欢听……”

“我怎么不喜欢……”

乌楚珀尔姑母坐在壁炉旁一直没动，喋喋不休。我看

见她的一颗快掉的牙在嘴唇上一起一落。父亲到屋里来了好几次，她们都没理他。父亲进来又出去，干他的事儿去了。现在，也没人再理我了。

乌楚珀尔姑母终于感到疲倦了。瞧，妈妈清楚地、慢条斯理地讲了起来。她讲述的事发生在很久以前她年轻的时候。现在她的眼角上已有了皱纹，前额上也有了几条细细的皱纹。妈妈只有在笑的时候才显得俊俏，但很少见她笑。周围所有的人也很少笑。我看见他们总是皱着眉头，脸色阴沉。不论是秋天下雨时，还是春天化雪以及雪化之后，青草破土而出、在原来的黑油油的土地上长出绿叶之时，他们的脸色总是阴沉的。当夏天樱桃熟了的时候，人们照旧皱着眉头，脸色阴沉。哪怕是小麦成熟，或在秋收季节那无边无际的带有绿色条纹的金黄色的海洋从早到晚沐浴在阳光下的时候，他们也还是皱着眉头，不见一点喜色。

“达里耶，你说的都是真事吗？你还记得清楚吗？时光的流逝会不会使你对过去的记忆模糊不清？会不会是你多愁善感？你好好想一想。……”

“那时的事我记得一清二楚。我什么也没忘记。我记得采来编戒指用的每一根草。我记得玩耍时被我用树枝抽掉花的每一棵蒲公英。我记得那时我捉到的每一只蝴蝶，以及戏闹着从它的翅膀上擦掉的鲜艳美丽的颜色。我记得我从田野里的那些牛蹄印中喝过雨水。我记得熟睡中做的每一个梦，也记得睁着眼清醒时的一切幻想。我记得吃下去

的每一口东西，也记得忍饥挨饿的日子。我记得听到过的每一种声音，也记得引起我共鸣并使我感到悲伤的每一支歌曲。我记得前前后后打在我脖子和肋骨上的每一拳和抽在脸上的每一个嘴巴。那些所发生的一切，在我的记忆里一点儿也没有消失。虽然许多后来看到的、听到的和经历过的早已烟消云散。但是，我怎能忘记妈妈和爸爸？怎能忘记我的兄弟姐妹？怎能忘记我们的亲戚、街坊和家乡？怎能忘记那些杨树、桑树、槐树和李子树？怎能忘记乡亲们的面庞和生活？不会忘记，我什么也没有忘记。……”

“格奥尔基使我很伤心。现在，他离开家唸书去了，将来要做神父。他学习很好。我像疼爱我的所有其他孩子一样疼爱他。但是，他从来没叫过我一声妈妈，也从来没有从我的手里接受过东西！他看见我就像看见仇人一样。只要我们两个人碰在一起时，他就朝我撇嘴、骂街。但是，我从未向我的男人诉过苦。要是那样的话，说不定他就会揍他，而我又不愿意看着他挨打。列亚娜更使我苦恼。我让我男人去把她领回来，他去了。可是吉戈伊的老婆不愿意给他。我来这儿的第一天，没有出家门。我看见邻居的女人们在偷看我。她们像樫鸟一样趴在栅栏上，两只眼睛盯着我，看我在做什么，竖着耳朵听我在说什么。她们要看什么？要听什么？我在地上洒了水，扫了院子，烧掉垃圾，喂了鸡，给孩子们洗干净，还给我男人准备了饭。她们总是盼着我们家出点什么事。我到底也不知道她们究竟盼着我

们家这一天出什么事。她们交头接耳，不断地窥测。我朝她们转过脸时，她们又低头不语了。傍晚，我嫂子来了，她是我男人的大哥沃伊库的老婆，就挨着我们家住，那时，也像现在一样，两家只隔一道木栅栏。”

“你是图多尔新娶来的老婆吗？”

“是。”

“你有两个孩子！”

“有两个。”

“图多尔也有两个孩子。”

“我知道。”

“你以为你和他能过好日子吗？”

“是的。”

“我不信你能在这个家里呆得下去。”

“为什么？”

“图多尔心眼儿不好。”

“为什么心眼儿不好？”

“以后你自己会明白的。”

“到时候再说，暂时还没发现。”

“我现在告诉你。”

她非要我信她的话，好吓唬住我。这很使我恼火。我让她坐下，她不愿意坐下。

“我对你说，你在这儿扎不下根儿，我们不愿意让你呆在这儿。”

“你们是谁？”

“我们，我们是图多尔的本家。”

“你们要对我家干什么？”

我嫂子恼了。

“你家？这不是你的家。是图多尔和他前妻的孩子们的家。你是改嫁来的。在这儿，你是外人。我们要让你在这儿呆不下去。”

说到这儿，她就走了。过了一会儿，她又回来了，完全是另外一副面孔，她微笑着。

“你别生气，玛丽亚。好像我听说你叫玛丽亚。”

“我是叫玛丽亚。”

“你别生气，我们家的玉米面吃完了，给我们一大碗玉米面吧。”

我站起来把两大碗玉米面倒在了她的衣襟里。

“你不生气吧？”

“我不生气。这是街坊邻居之间常有的事，何况我们又是一家子。……”

我原以为至少那一天不会再看见她了，可是又看见她了。

“我刚刚熬上了玉米糊。你不能给我个鸡蛋吗？给我儿子瓦西里吃，他很馋。……”

我从柜橱的罐子里拿出四个鸡蛋给了她。第二天，她又来向我要白面和老母鸡。第三天，她来了，二话不说自己就从口袋里扤了两碗玉米面，还拿了荤油。第四天，她从草地上把我的鹅捉去宰了。而我们吃的只是菜豆和玉米

糊。我一声儿也没吭。后来，有一天晚上，我看见她的孩子把我们家的一捆一捆的玉米秸隔着栅栏朝他家院里扔。我实在忍无可忍。等我男人回来之后，我把发生的这些事都跟他讲了。我问他：

“你的邻居和你的本家老早就这样揩你的油吗？”

“你说的是谁？”

“我的嫂子米特拉，那个‘嗡嗡叫’。”

我不知道为什么说了米特拉以后，“嗡嗡叫”这个名字也跟着脱口而出。在这之前，我从未听别人叫过她这个外号。我觉得只能这样叫她，所以就给她起了这个“嗡嗡叫”的外号。从此之后，全村就这样叫开了。我男人以及沃伊库大哥生气时，也叫她“嗡嗡叫”。我的嘴厉害，对她们这些人毫不客气。

“孩子他妈死以前，我什么东西都给他们点儿。因为他们是我的哥哥，我的嫂子。院里、屋里的东西让他们随便拿。”

“今后还让他们随便拿吗？”

“看来……不能再让他们拿了。”

当米特拉又来要东西的时候，我拽着她的胳膊把她拉了出去。她吃惊地看着我。

“你敢惹我？”

“我敢。”

“那你可要倒霉。在这儿你可就呆不下去了！”

“我能呆下去。我也不是好惹的，谁欺负我，我就跟谁

拼。”

我抄起了线桃子，她提起裙子，撒腿就跑。跑进她的院子之后，便扯着嗓子叫了起来。

“救命呀，救命呀，图多尔的老婆要杀我了！……”

我站在台阶上直笑。这样撒谎怎么能不让人好笑？街坊的女人们都围在了她的门前。

“你说给我们听听！……怎么啦，出了什么事？”

“你们听听……我是她的嫂子，我去看她，她就抄起线桃子把我轰了出来。要不是我跑得快，她就会把我的脑袋打碎了。我跑了。她简直是蝎子，不是女人，是蝎子！……”

“米特拉靠着栅栏破口大骂。骂得很难听，我从来没听到过。我听了一会儿，就进屋干事去了。……从那时到现在过去多少年了？让我想想！……十年了……不对，过去十四年了。我再也没跟她说过一句话。我们在井旁打水遇上了！……她恶狠狠地看着我，嘴里嘟嘟囔囔地不知在说些什么，啐着唾沫走了。她啐唾沫，我也啐唾沫，并且背过脸。她的儿子瓦西里也不到我们家来啦。他和罗霞结了婚，没有请我们去参加婚礼。瓦西里的第一个孩子生下来时，也没请我们去喝喜酒。也不需要请我们。……只有沃伊库大哥在天黑以后偶尔偷着到我们这儿来。这是我和‘嗡嗡叫’嫂子之间发生的事，同丽莫安塔又是另一种情况了。”

乌楚珀尔姑母打了个哈欠，这时，我看到了她嘴里发绿的门牙以及后面的虫牙和舌根。乌楚珀尔姑母的舌头黄的就像用红花汁染过的一样。

"她就叫这个名字,还是你给她起的外号?"

"哪里，她叫珀乌娜。也就是说这是她的真名。自从我给她起了这个外号之后，全村就这样叫起来了。你知道,我男人的前房年岁比他大。我听说她长得不漂亮,但她文静、贤惠。我男人娶亲时才十七岁，可是他的妻子已经满二十五岁了。他尚未成年，家里人就给他娶了亲。因为我公公当时已经是第七次当鳏夫，那时家里没有女人照料。"

"你公公娶了七次亲?我好像听说是八次。"

"不,娶了七次亲，七次成了鳏夫。他的每一个妻子生第一个孩子时都很正常，但是，一到生第二个孩子时就死了。女人死了，孩子却很健壮。因此,就需要再娶一个。这样，他就一连娶到不能娶为止。我男人是我公公的最后一个老婆生的。我男人一出世，他妈妈就死了，是他的几个姐姐把他拉扯大的。他最小的姐姐出嫁时，我的男人也成了亲。谁知道他愿意不愿意!谁也没问他,我也没问过他。年轻人免不了有些坏毛病。还在他老婆死之前，像别的男人一样，他也是看看这个女的，瞧瞧那个女的。特别是街坊邻居中的女人们也跟他凑近乎儿,只有扬库·班的罗锅老婆除外。"

"扬库·班的老婆伊弗妮卡是个罗锅!好像只有她是罗锅。她的男人扬库·班也有点驼背，但不是罗锅。拉杜·班老头儿——前几年死了，现在尸首都烂了，因为不管什么东西埋在地里都容易腐烂——有九个儿子，没有女儿。扬

库·班是他的老儿子。有一年,如同土耳其人从他们所占的城堡窜出来毁灭村庄一样，天花猖獗，全村染遍,拉杜·班的九个儿子中，一冬之内死了八个。拉杜·班扫了坟地里的雪，拉去了一马车的干草。他点着火，把冰地化开，以便挖坑。他挖了个大坑，埋了两个，三个……只有这个长得畸形、口齿不清而且结巴的扬库活下来了。按说，死去的人中，至少还应该活下来一两个。拉杜·班赶着车把小米和小麦拉到奥尔特去磨面。人们在奥尔特排队等着，一等就是几个月，等把面磨回来你早就饿得受不了了。所以,你只好把小米放在手摇磨里自己磨。为了吃上一顿玉米糊,你得整整一天弯着腰不停地用手摇磨。因为用手摇磨磨面,所以扬库·班的腰弯了,这样他就不容易再找到一个身材笔直的老婆。还有他们的女儿，瞧那个样儿,长得像个丑八怪,说话还是个齉鼻儿。……等我儿子伊昂长大后，我想让伊昂和她成亲。她有土地，而且又是独生女儿。要不是闹天花的话，拉杜·班的地就得分成九块。因此，扬库走了运，土地、房产和农具都归了他一个人,成了富人。有土地,又只有一个独生女儿，这样很好。你看古利埃的女儿门迪卡,整天趿拉着拖鞋晃来晃去，穿着平展的衬衣，戴着新头巾在树荫下乘凉。她那个希腊人丈夫不让她干活，而且还让她吃好的。”

“门迪卡姐姐高个子，灰眼睛,脸又黑又黄。她还不到二十岁!……她爸爸古利埃老头就把她嫁给了帕纳伊特·巴

尔卡斯，人们都称这个粮商为'小船'先生。这个希腊人已经上了年纪，络腮胡子……然而对老婆却很好，把老婆捧在手心里。"

"你看，我们家的孩子，他们鼻子周围都有雀斑。十岁、十二岁以前，不管用什么办法都弄不掉，以后就消失了。这是血统的关系。我来这儿之前，邻居家生的孩子都像格奥尔基，列亚娜和达里耶都有雀斑。所以，我很快就发觉邻居的女人们都嫉妒我。我在这个家里安下身，她们没有一个人心里感到舒服。但是她们当中，最恨我的是吉戈伊的老婆，就是我男人死了前妻之后，把列亚娜给了她的那个女人。后来我们向她要，她又不肯把女儿交给我丈夫。能养得起三个，我们也能养得起第四个。我不愿意让我男人觉得我对他的孩子和对我的孩子不是一视同仁。后来，我男人也相信了这一点。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实生活使我变得厉害起来了。……既然她不肯把女儿还给我男人，我就在一天的早晨等着她，见她提着水桶到水井打水，我也去打水。我跟她说起话来。

"'喂，珀乌娜，你把孩子还给我。'

"'孩子不是你的。'

"'既然孩子是我男人的，那也就是我的。把她还给我。

"'我不给你。'

"'珀乌娜，你成心跟我过不去。'

"'对，我就是要跟你过不去。'

“‘为什么？’

“‘我不想告诉你。如果你脑袋开窍的话，你自己就会明白。’

“‘你偷我男人。’

“‘对，我偷了，以后还要偷。我喜欢图多尔。’

“‘你不喜欢你自己的男人吗？’

“‘我也喜欢我的男人，但是，我也喜欢你的男人。’

“那时，她长得和现在一样，也是那么矮小，一张大宽脸，屁股又大，像个木桶。只是比现在更年轻，更轻佻。她把我惹火了。

“‘也就是说你不会老实下来？你这个丽莫安塔！……’

“‘我老实不下来，臭娘儿们，我就是老实不下来。你这个外来的骚货，看你能把我怎么样！’

“‘看着，我就把你这样！……’

“当时，我手里正抓着刚从井里打上来的满满一桶水。我把桶朝她头上撞了过去，桶撞在她的鬓角上，把她撞了个跟头，她倒在井旁的碎石子地上。她开始挣扎起来，张着嘴，翻着白眼，血从鬓角上流了下来。水桶在吊杆上晃悠着。我没有被吓住，又抓住水桶，把水泼到丽莫安塔身上，浇了她个落汤鸡。然后，我又从井里打了一桶水，倒进我的水桶里，提着回家了。她在那儿折腾了半天！……这事发生在大清早。我再去看她的时候，她已经不在了。她早就醒过来走了。从那以后，她一见到我就把脸背过去。只要看到我男人的身影，她就赶紧躲开。她连隔着栅栏也不

敢再朝我们这边看了。她教我们的女儿恨我们。女儿赶着羊从我们家旁边走过，我站在门口，本想拦住她，同她说几句话，想给她面包、葡萄、苹果和其他东西吃。但是，她跑了。从此，她连我们和我们家门都不接近了。她还调唆孩子去恨自己的爸爸，就凭这一点，她要下地狱挨火烧。”

真是怪事！……我总是听人讲下地狱后用火烧！……如果你走进村公所旁边的那个大教堂，回过头来就会看到大门的两旁，从下到上直至天花板画的全是地狱。……教堂的尽里面是祭坛，祭坛后面的墙上画着复活了的耶稣正飞向天空，还画着圣母玛丽亚，她怀里抱着蓝眼睛、胖脸蛋、满面笑容的小耶稣。我很高兴我妈妈像圣母一样也叫玛丽亚，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高兴。

每次进教堂，我都仔细地观看每一幅画，而且赞叹不已。但是看得最仔细的是画在门两旁墙壁上的，神父用来吓唬人的地狱。地狱里架着几口滚开的大油锅，冒出的白热气直冲天花板，透过热气可以看到魔鬼，它们撅着尾巴，弯着犄角，长着大耳朵，钩鼻子，猪脸。浑身是毛的鬼，手持四齿钢叉把在阳间犯过罪的人们的魂从一个油锅挑到另一个油锅。如果你到邻居的果园摘了一个苹果，那你就完了！死后，地狱里的火在等着你！……地狱里的火，滚开的油锅，把你挑进油锅的钢叉都在等着你。要是你到地里去放马，你累得睡着了，马钻进别人的玉米地或小麦、燕麦、油菜地里，那么等着你的仍旧是地狱里的火，同样

的鬼，同样的油锅。……某某管家骂你了！……没关系！……到地狱里后，他也要挨火烧！……要是你骂了他，你也就完了！……如果你骂了神父、财主和村长，那就更倒霉，你死后要挨火烧，但是，死之前你的背上要先挨他们几棍子，几枪托，至少肋下要挨几拳，脸上挨几个嘴巴，逮哪儿打哪儿。

神父就是整天用地狱里的火和油锅吓唬人们。

冬天到了，下着小雪，雪花静静地落下。村子披上了银装。只有在槐树间飞来飞去的乌鸦是黑的。只有乌鸦和神父——一手拿着十字架，一手拿着罗勒秆在浸礼节时挨家挨户串的骗子——是黑的。衣衫褴褛的堂守，手持铜罐跟在后面。堂守拿着的铜罐里面有圣水。神父进了屋，开始唸起经来。大人小孩凑在一起等着他。神父不时地用罗勒秆蘸着圣水往人们额头上洒。男女老幼祈祷并吻神父的手。……神父那疙疙瘩瘩的手上长满了毛，长长的指甲里塞满了泥垢。据说神父的手是圣手，你必须吻它，也就是说其他人必须吻他的手。要是布尔布克神父在圣诞节前或复活节前的浸礼节也乐意到我家来的话，我们也想吻他的手。但是，布尔布克神父总是绕过我们家，似乎这儿住着不信仰上帝的坏蛋。难道神父信仰上帝！难道我们信仰上帝！……但是大家都这样讲，都这样说，也就习以为常了。人们总是要显示自己信仰无形的上帝。……但是我们这些孩子对此并不感兴趣。我们宁肯往铜罐里啐唾沫也不愿意

像别人那样在洒完圣水后，摸出钱袋里的最后一个铜子扔给骗子。你要是只扔进五个或十个巴尼①，神父在祝福你之后，就会嘟嘟囔囔地骂你，小声地骂你。只有堂守才大声骂你。如果扔进五十个巴尼或一个银列伊，神父就高兴。财主一给就是一个银卡尔博瓦②！……在神父眼里，财主是最虔诚的基督教徒。财主不会下地狱被火烧，因为有神父关照。在所有的祝福中，神父在提到主教的名字之后，总是接着提伯内亚萨的财主格拉西耶·米利安·米利亚雷齐，你瞧他的名字多好听！米利亚雷齐说话结巴，两腿无力，如果有事去村公所，下了车还要有两个仆人把他搀扶进去。他的两条腿歪歪扭扭的，软弱无力．人们谈论到这个财主米利亚雷齐时，如果管家或劣绅听不见，就称财主为科拉雷兹③，因为这样叫起来顺口。

"达里耶，你同财主有什么过不去？"

"真的，我没有，……不过等我长大了以后，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就用棍子狠狠揍他。"

"这一天也许会到来。……"

我问妈妈：

"妈妈，神父为什么不到我们家来？"

神父不到我家来，只有妈妈一个人不高兴。外祖父留着长胡须，他的窗台上放着几本厚厚的早晚必读的祈祷书，

---

① 罗马尼亚货币的辅助单位，一巴尼等于一列伊的百分之一。

② 俄国旧币，相当于一个卢布。当时也在罗马尼亚流通。

③ 在罗马尼亚文中，"科拉雷兹"意为"稀粥"。

每到星期天，妈妈都去教堂听布道。在教堂里，神父不能不让妈妈吻十字架和圣像。在那儿，他不能胡作非为。但是，他还是忍不住要瞪妈妈几眼。

“神父生我们家的气了，他恨你爸爸。”

“神父为什么恨爸爸？”

“是因为你哥哥格奥尔基的缘故。”

“我哥哥怎么惹着神父了？”

“你哥哥上了神学校，这个学校的学生将来都当神父。”

“神父是不是不愿意让我哥哥格奥尔基穿上神父的长袍？”

“他不愿意。神父也有两个孩子在神学校学习，他们以后也要当神父。他打算让大儿子在咱们村当神父，小儿子在邻近的一个村当神父。”

“怎么，难道我哥哥就找不到一个别的村去当神父？”

“不是，能找到。但是，神父害怕你哥哥非要来咱们村当神父不可。”

“为什么非要在咱们村当神父不可？”

“因为咱们村大，有钱的人不少。”

“但是，我知道所有的有钱人都是吝啬鬼。既然吝啬，就一毛不拔。”

“达里耶，你说得对，有钱人吝啬是吝啬，但是他们对神父和教堂却非常慷慨，为的是让全村都知道，好赢得个好名声。”

听村里人议论，神父的两个儿子都是懒蛋。学年快结束了！……这可把布尔布克神父忙乎坏了。你要是给小孩洗礼或是埋葬死人，或是儿子结婚，你就得准备下满满的一袋钱，神父要的钱要比一般的祈祷多。他还要鹅和火鸡，如果你富裕一些而且又养蜂的话，除了钱以外，他还向你要几公斤的蜂蜜。有一天，神父带着塞满了银币的钱袋，肩上背着褡裢，手里提着满满一篮子好吃的东西进城了。他满头大汗心绪不宁地走东家跑西家，最后这个老东西总算松了一口气。布尔布克神父终于得到了他所期待的消息：他的两个儿子没有留级。他半喜半忧地回到了家。喜的是，他的两个孩子离取得神父职位的距离又近了一步。忧的是，这一步使他花费了大量的金钱财礼。一天，在酒馆里，一个不知什么原因对神父不满的胆大包天的人喝了几盅酒后问他：

"神父，你说图多尔家的那个小子升级了没有？"

"天晓得，我的孩子！真的，我一点儿也不知道！……"

神父急忙站起来走了，人们哄堂大笑。我父亲从未去过布加勒斯特。我哥哥格奥尔基是一个人离开家的。我不知道他长得怎么样。他离开家时，我还很小，现在回忆起他来已经模糊不清了。他现在没有时间回家过暑假，他到外地一个庄园给人家干活去了，好像他懂机械。

波佩斯库·布拉加迪鲁老师在村里到处散布有关我哥哥的消息。神父听到了这些消息。神父经常下酒馆，所有的酒馆他都去，挨个进行观察：一到酒馆，神父就把帽子和长袍挂在衣帽钩上，嘴里说着："布尔布克神父，你老老

实实地在衣帽钩上呆一会儿，可怜的托米察也想快乐快乐。……”

他的长袍一动不动地呆在衣帽钩上，帽子也老老实实地呆在那儿。托米察·布尔布克神父丢掉圣洁，回到人世间寻欢作乐了。……凡是传到村里的有关我哥哥格奥尔基的每一个消息都触到神父的痛处。让他痛去！……因为神父不能阻挠我哥哥格奥尔基唸书，所以他就想方设法地折磨我们。洗礼节时他不到我们家来，就这样惩罚我们！

当我不知道神父恨我们的时候，在街上碰到他，我同村里的其他孩子一样，对他说：“神父，你好！”对其他人他都答话，可是对我却是小声地咒骂。于是，我也骂他。难道我做得不对吗？

“达里耶，你做得不对。地狱里的火要把你吞噬的！……”

“到那个时候还早呢。再说，如果我呆在那儿，更确切地说，不是呆在那儿，而是在地狱里受折磨的话，到那时我要让布尔布克神父在旁边陪着我。我没放过马吗？我放过！神父的那个在神学校读书的小儿子米利克，他也和我们这些男孩子一起放过马。我们是在收割后的庄稼地里放马，而神父的儿子却整宿在别人的麦地里放马，可他长大了以后却要当神父。”

“喂，米利克，”我们对他说，“你可作孽了。你放马的地方不是你家的麦地。”

“当然啦，正因为如此，我才在这儿放马。”

“你不怕下地狱吗?”

“不怕,根本就没有地狱。只是在教堂里有画着的地狱,是用来吓唬你们这些傻瓜的。当妈妈因爸爸下酒馆而在家跟他吵架时,爸爸就是这样说的。”

“等你当了神父后,是不是也这样说?”

“我不这样说。”

“这么说你要撒谎。你对人家讲的连你自己也不相信。”

“我要撒谎。这就是我的职业。”

“让你的职业见鬼去吧。”

“你们才见鬼呢。”

他还骂了我们。

我们能饶他吗?不能。于是我们就用棍子揍他,一直揍到天亮。当时我们是三个人,他只有一个人,差点把他打死。因为害怕警察茹韦泰找我们的麻烦,于是我们离开家到外边躲了一个星期。当时,我们还不知道警察和神父吵过架。我们了解到这个情况后,就回来了,结果一点事儿也没有。

我的姐姐们和伊昂哥哥一窝蜂似的跑回家来。我的表姐迪察也跟着他们进了屋。她滚得浑身乱糟糟的。乌楚珀尔姑母打量着她,高兴得两眼闪闪发光。迪察的口水顺着兔唇流了一下巴,她就用袖子擦。乌楚珀尔姑母问我表姐:

“迪察,有几个男孩子搂你了?”

“有四五个。”

"就这么几个？"

"就这几个。"

"你没和他们胡来吧？"

"没有，妈妈。"

"当该这样，孩子。女孩子家要守规矩。"

"出嫁前我一定守规矩。"

迪察的裙子褶里粘满了草秸和刺草。男孩子们把迪察揉搓得够呛！

"青春啊，青春……你懂吗？"

爸爸也回来了。像中午一样，我们又围坐在饭桌旁。吃完饭，爸爸和伊昂哥哥到外屋灶旁睡觉去了。我们在床上给乌楚珀尔姑母腾出了睡觉的地方，也给迪察腾了个地儿。她睡在我和我姐姐丽察的中间。我蜷缩成一团，尽量离迪察远一些，我的脸紧贴在靠窗户的箱子上。油灯的火苗摇曳着，灯光微弱暗淡。屋子的墙壁看上去似乎蒙上了一层浓烟。妈妈还在小声地和乌楚珀尔姑母说话。黑夜把一块大的、柔软的天鹅绒黑色幕布挂在了窗子上。我知道从南到北，从上到下都是一片漆黑。我们大家盖着棉毯挤在一起。外面黑夜沉沉，万籁俱寂。

我觉得妈妈和乌楚珀尔姑母的说话声越来越微弱，几乎听不到了。好像有人在我的耳朵里塞上了棉花。我的呼吸越来越缓慢，也越来越平稳。我蒙眬入睡了。迪察翻过身来，把我搂在怀里，搂得很紧很紧。她的身躯是热的，几乎热得发烫，使我浑身感到酥麻，好像有成千上万的小蚂

蚁钻心。迪察抓住我的肩膀，把我的脸轻轻地搬过来对着她。我试图推开她。她让我摸她那热乎乎的乳房。我用手挠她的乳房。我已无法摆脱她。灯熄灭了。

我的睡意哪儿去了？我本来很困呀！

这次乌楚珀尔姑母来我们家把我的表姐迪察也带来了。以前，我的姑夫普勒库普·乌尔班·乌楚珀尔也同我姑母乌楚珀尔一起来。他很机敏，宽肩膀，瘦高个子，浓眉毛，一双深陷的黑色大眼睛炯炯有神。我姑夫的脸黑黝黝的。他把我抱在腿上，来回晃悠。他喜欢逗着我玩儿。他特别喜欢男孩子。他本来有两个男孩子，一个叫古察，去年得炭疽病死了，他比我哥哥伊昂高一些；另一个叫潘蒂利耶，他也是去年死的，死在图尔努部队里。乌楚珀尔姑夫用马车把装着尸体的棺材运回来，埋在古察旁边。我的表哥潘蒂利耶真是个快乐的小伙子！嘴上刚长出胡须，他总是笑，笑的时候露出两排雪白的牙齿。他的胳肢窝里夹着一根短棍，用来防狗咬和对付那些敢于随意谈论他的姑娘的小伙子们。

“潘蒂利耶，谁是你的姑娘？”妈妈问他。

“玛丽亚舅妈，所有那些鼻子上没有瘊子的都是！……”

他咯咯地笑着。我们也笑了。就我所知，没有一个姑娘鼻子上有瘊子。这么说，所有的姑娘都应该是我表哥潘蒂利耶的。他喜欢姑娘，热爱劳动，酷爱生活。他自己编歌唱。他把乐师叫来，教他们演奏自己编的歌。当他高兴

时，便让他们给他演奏，并且还让他们奏给别人听，以便得到流传。这些歌一直传到了镇上，传到了县政府。潘蒂利耶表哥唱着歌，伴奏的人也跟着哼哼：

肥头大耳的老财，
我要把你从饭桌上赶跑。
大鼻子的老财，
我要把你吊在树上，
让你喝够西北风，
用黄土把肚子填饱。
分你的土地的日子，
迟早会来到。

管家听到后，就在地主面前诬告，说我表哥煽动人们造反。地主叫我表哥潘蒂利耶到他的庄园去，于是我表哥胳肢窝里夹着一根棍子去了。

"就是说，你这个乌楚珀尔家的小子想让人们起来反对我？"

"老爷，说我吗？我怎么敢？！……"

"有人告诉我，说你在编歌曲。"

"老爷，这是可能的，我想唱歌时我就唱。"

"那你唱什么歌？"

"老爷，我想到什么就唱什么。"

"你能不能也给我唱一支歌听听？"

"如果您不见怪的话，现在我就唱：

我爱过的姑娘
和娘儿们呀，
足有一百一十五个，
如今都抛弃了我。……”

“不，不要你唱这些，唱别的。”

“老爷，唱那些不成体统的歌吗？我不能唱。周围有太太们可能会听见。再说，这种歌是在寻欢作乐时唱的，今天不是时候。……”

地主发现自己被嘲弄了，于是火冒三丈。宪兵把潘蒂利耶表哥带到城里。那些大小喽罗审问来审问去，一无所获，最后也就随他去了，只是把他当成疯子胡言乱语罢了，反正靠他唱的这些歌谣也翻不了天。

潘蒂利耶表哥从军的日子终于来到了。他到图尔努当了步兵。他给一个叫日雷斯库的大尉当通讯员。日雷斯库大尉是克尔默楚伊和奥尔特之间靠北的克伦杰尼地方的大地主日雷斯库的本家。这个大尉娶了个破鞋老婆，她对从前的通讯员们心狠手辣，甚至把他们打聋变成残废。可是她却从来没有碰过潘蒂利耶表哥。我表哥既没挨过大尉的耳光，也没挨过大尉老婆的揍。有一次，大尉的老婆要抽他的嘴巴，他竟然把她推倒了。结果，大尉的老婆反而喜欢上他，起了淫心。有一天，他们俩私通让大尉撞上了，于是大尉就把我表哥潘蒂利耶枪毙了。然后，他们在花名册里写上：士兵潘蒂利耶·乌楚珀尔摆弄上了子弹的枪支，不慎走火

身亡。但是，全城都知道事实的真相。后来把大尉调到了另一个团，这就是对他的惩罚。所以，我姑夫乌楚珀尔从此就没有男孩子了。

“达里耶，你愿意跟我过吗？”

“姑夫，不愿意。”

姑夫的眼圈湿润了。他在兜里摸了半天，掏出十个巴尼给了我。

“你去买角豆吃吧。”

我转身撒腿跑了。我到托马·奥克的酒店里买了角豆。这个酒店就是以前利桑德鲁舅舅开的那个铺子。托马·奥克的大女儿杰娜给我拿了角豆，我嘎巴嘎巴地吃起来。角豆是甜的，籽是咖啡色的，很硬。我一边吃一边吐着籽。我妹妹埃莉萨贝塔看见我吃角豆，说：

“哥哥，也给我点角豆吃。”

我给了她几个。她赶紧朝街上跑去，街里的孩子们成群地嬉戏，闹得尘土飞扬。

“哥哥给了我角豆，从奥克那儿买来的，是从奥克那儿买的。……”

孩子们一拥而上，从她手里抢走了角豆。她哭着回来了。

“哥哥，再给我几个角豆，他们把我的抢走了。”

酒店老板托马·奥克有三个女儿：一个叫杰娜，她每天下午站柜台，因为下午店老板在里屋同老婆睡觉，拉着

窗帘怕光线进去影响睡意；另外两个叫菲法和博博阿卡。博博阿卡是个矮胖子，长得很敦实，一头金发。她要是穷孩子的话，一定跳霍拉舞去了。但是，她像杰娜和菲法一样不去跳。她们趾高气扬，自命不凡。她们穿着拖鞋，不戴头巾，整天晃来晃去。她们像在邮局工作的表哥尼古拉·迪莫泽尔的老婆波莉娜太太一样，穿着箍在身上的紧身裙。除了三个姑娘之外，托马·奥克还有一个儿子叫米蒂克。米蒂克身穿制服，头戴无沿帽，脚穿小皮靴，他父母把他打扮得像个布娃娃。他扒在栅栏上看我们玩骑马。他很想下去开门，过来和我们一起玩耍。他看得红眼了，口水都流出来了。我们挑逗他：

"米蒂克，快来跟我们一起玩吧。我们让你当马。"

"我不去。我怕把衣服弄脏了。"

"快，米蒂克，快来！"

"我不去。我不跟你们玩儿。我……我是酒店老板的儿子。"

"你是酒店老板的儿子又怎么样？你也是你妈妈肚子里生出来的。"

米蒂克呜咽着说：

"爸——爸！他们骂我！……"

他爸爸用石子打我们。后来他拉着这个宝贝的手进了铺子。他爸爸把他抱在腿上，用面包圈哄他。

"米蒂克，你以后不要跟野孩子们混在一起。你以后要上学，要成大人物，要当县长。"

米蒂克又扒着栅栏，朝我们喊：

“我不跟你们一起玩儿。我以后要当……县长。”

他流出了鼻涕，然后用衣袖擦去。

一到星期天，人们就在酒店前跳起霍拉舞。托马·奥克的三个女儿——两个高个儿，一个胖敦——站在一边看。她们等着城里的小伙子来求婚。可是，没有一个城里的小伙子来。她们总是这么等着。我姐姐埃万吉莉娜说，她们这样等来等去最后要变成老姑娘。

全村人都知道托马·奥克的底细。托马·奥克以及他的老婆和女儿，以前穷得没鞋穿，给地主干活，累得疲惫不堪。奥克也给一些希腊人做过事。他算帐时捣鬼，在车站的仓库称货物时，大称进小称出。就这样他把钱攒了起来。我舅舅死的时候，奥克的腰包已攒满了钱。他从城里的银行又借了一些钱，把我舅舅的铺子和营业执照买了过去，于是他就开起了杂货店。他又开了酒馆。他还放债，利息不算大，一百列伊收月息二十列伊。他使许多人上了钩。如果借来一百列伊能当月还清的话，倒也好。但是，谁能当月还得起债呢！……有时，借的债一年或几年都还不清。如果你按时付给他利息，托马·奥克就心满意足，不会再逼你还债了。放一百列伊的债，一年之内，就可得利二百四十列伊。托马·奥克首先把自己打扮得像个城里人，随后给老婆和孩子也换上了城里人的装束。我们这条街的街口上，挨公路住的约尔达凯·迪曼的大儿子拉凯年轻时曾向杰娜求过婚。迪曼家——兄弟两个——有很多地，还有几头

摩尔多瓦种的大牛，房子带镶着玻璃的走廊，和地主家差不多。这兄弟俩还有奶牛，成群的绵羊以及蜂房。拉凯看上了奥克的家产。

“我不能把女儿嫁给你的儿子，”奥克对约尔达凯·迪曼说，“我要把女儿嫁给一个城里人，不让她下地干活、受风吹日晒。我是个酒店老板，和你们的身份不一样了。我的孩子一个也不会再同泥土打交道了，够了，奥克家发起来了，发起来了！……”

“有起就有落，”约尔达凯·迪曼顶了他一句。“托马，当心滑下来，一滑就会不由自主地滑到底。等你开始向下翻滚时，就够你受的，一滚下去就把你摔得粉身碎骨。得意忘形的那种人我们见得不少。”

“我怎么能下来？我有满满的一柜台的钱。”

“也许你有钱，可是你已经喝起酒来了，托马。而且，喝酒总喝不出好来。你一睁开眼，李子酒就不离嘴。”

托马·奥克是个急性子人，听了这话，火冒三丈，冲着迪曼喊了起来：

“我宁肯把女儿嫁给皮奇克也不嫁给你的独眼龙。”

“就怕连皮奇克也不要你的女儿！……”他们一下子吵翻了，从此终生结下了仇。

有时晚上人们听到尖叫声，那是托马·奥克在打他的老婆。他经常与别人饮酒作乐，每次都喝得醉醺醺的，回到家里就找老婆的碴儿。他一找碴儿，她老婆便朝外跑，像狗似的和狗睡在草棚的草堆里。她着了凉，得了痨病。那

两个大姑娘也开始捂着嘴咳嗽起来。只剩博博阿卡还没咳嗽。

“我敢肯定，她以后也得咳嗽。”我哥哥伊昂这样说。他以前曾想搂搂托马·奥克的这个任性的小女儿博博阿卡。

迪察睡得很香，睡梦中从牙缝里发出了蛇叫般的嗞嗞声。乌楚珀尔姑母像池塘里的青蛙那样发出了噗、噗、噗的声音。我们家的人都平躺着睡，只听见缓慢而轻微的出气声。

以前，有一天晚上，从山那边来了一个赶着车卖陶器的人。陶器要用粮食换。如果你想买两三个大碗，那么大碗挑好后，你就在碗里装满玉米，卖陶器的人把玉米收下倒进他的口袋，然后你拿走碗。如果你想要一个带嘴儿的或是鼓肚上带白釉花的厚边的罐子，盛夏好用来盛凉水，那就需要再讲讲价。卖陶器的人比我们还穷，穷得丁当响。他们面黄肌瘦，皮包着骨头，瘦得挂不住裤子。吃饭时，他们狼吞虎咽，碗里的玉米糊舔得一干二净，连一只蚂蚁吃的饭渣儿都剩不下。在我们家过夜的这个卖陶器的，名叫维琴茨·布尤。他把走山路累瘦了的马拴在车上，喂上草后，妈妈招待他吃饭。他还带着一个儿子。他说，家里除了老婆之外，还有五个儿女。这个卖陶器的人患甲状腺肿病，脖子上有两个大包，好像是两个风笛，说话时，跟火鸡的大红花的脖子一样，大包一鼓一瘪。他说话的声音像水流一样汩汩地响。和他一起来的这个儿子也是大脖子。这

个卖陶器的人说，他们那儿的人差不多都有大脖子病。“我老婆，”他夸耀地说，“她的大脖子好看，比我的大一倍！我的孩子们，谢天谢地，他们也都是大脖子。我们躺下睡觉，孩子们先睡着，大包在睡梦中唱着，实在着人喜欢，只有不是大脖子的小儿子，一声不响。我老婆吓了一跳，用手去摸他的胸口，看他的胸口还热不热，是不是还有气儿。我们害怕他睡死过去。现在，好像对他这种情况也习惯了，但是，对他在睡梦中可能会死去的担心仍未消除。他睡着时，像死人一样。谁让他不长大包！……你们这儿，”卖陶器的人说，“这儿简直是天堂。我们那边的山岗上，土是红的，只有石头、贫困和苛捐杂税。树林里的树叶一个也不让捡，拾根干树枝烧火，拔一把草喂牲口都不行。地主的狗腿子背着枪整天看着。……难呀，难呀！……幸运的是，生命转瞬即逝。”他不讲了。沉默后，大包还在嘟嘟地唱着，好像还有些话没说出来，憋在肚子里难受。卖陶器的和他儿子在桑树底下紧挨着睡下了。他们身上盖着一件破衣服。他们刚睡着，大包就唱了起来。我们听了一会儿，然后也闭眼进入了梦乡。

酒店老板托马说要把女儿嫁给谁？嫁给皮奇克？托马要是这样说，那一定是气话。财主约尔达凯·迪曼的儿子并不瞎，只不过是有点斜眼，眼神儿还好。听到托马·奥克这样说，全村人都笑了。连皮奇克也笑了。皮奇克手拄着根棍子，蹲在路旁，说：

“哼，他就是现在把杰娜嫁给我，我还不想要她呢。”

人们都感到吃惊，不好理解。格伊纳问皮奇克：

“皮奇克，你为什么说不想娶奥克的女儿？难道她的长相还配不上你？她还不够富有吗？”

“正是因为太漂亮、太富有，我才不要她。我不需要好吃懒做的漂亮老婆，不需要高贵的太太。……迪莫泽尔家的尼古拉娶了个城里太太，结果完全任她摆布。托马·奥克把孩子们惯坏了。他不让他们干活，使他们和村里人不合群。他把孩子们宠得傲气十足。到头来孩子们要受苦的。老让他们讲究穿戴，会穿穷的。当然，任何习气都可以改掉，这话不假。但是，改起来就难了。”

“难道我们不穷吗？我们穷得很！可我们照样活着。”

“我们穷惯了，我们和贫穷，就像破口袋上补补钉一样，难分难舍。”

皮奇克无亲无故。他生下来不久就被扔在水井旁，让村里的女人们把他抱了回来。因为他无名无姓，于是人们就给他起了这个名字。他今天在东家，明天在西家，就这样乡亲们把他养大成人了。长大以后，他在约尔达凯·迪曼家扛长活，地主管他吃穿。当时就是流行这种做法。要是你在世上生活没有出路的话，只好给财主家做活，他管你吃穿。吃的是人家的残羹剩饭，穿的是别人不要的又脏又破、补丁摞补丁的旧衣服，其他报酬就没有了。皮奇克整天累死累活地干活，还总是挨打受骂，因此，他离开了地主家。他在村边的水坑旁弄到了巴掌大的一块地。春季

一到，这块地就被大水泡起来，变成盐碱地。皮奇克在这儿还盖了一间半地窖式的草屋，因为还没有娶媳妇，所以就一人住在这儿。他当了看青的，看着不让鹅到地里吃麦子。皮奇克高个子，黄头发，蓝眼睛。此地再也找不出比他更穷的人了。

我到水沟边去放羊。皮奇克也沙沙地走来了。他的脚步很轻，几乎听不到。我们俩一会儿并排着走，一会儿又一前一后地走着。

"你在这儿放羊？"

"是啊。"

"瞧着别让羊吃庄稼。"

"不会的。"

"达里耶，你呀……"

皮奇克躺在草地上，眼望着天空的浮云，浮云犹如一只只巨大的风帆，向北方驶去。

"你说什么？"

"过来，我给你讲个故事。"

"皮奇克叔叔，别人都是晚上讲故事。

"我白天讲。"

"你给我讲什么故事？"

"给你讲那个不剪胡子的神父的故事。"

"昨天你给我讲过了。"

"那我就给你讲关于老头儿和老太太的山羊的故事。一天夜里，山羊从树林里回到家时，身上的皮有一半被人剥

去了。”

“你讲下去！……”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

空中的浮云被风吹得飞驰而过。从云彩的缝隙中，露出了湛蓝湛蓝的天。

冬天，在我们家或是在图塔努等人的家里合伙剥玉米粒的时候，我能听到很多故事。我们需要把玉米粒送到磨坊去磨成面。晚上，街坊的姑娘和小伙子们都来帮助我们剥玉米粒。妈妈把玉米粒放到锅里，拿到火上去煮。玉米粒很难煮熟，要加三次水才能把玉米粒煮开花。玉米粒没煮熟时，我们就吃玉米渣粥。粥里要放进一勺荤油。玉米渣粥又香又甜，越吃越想吃，把肚子都吃撑了。我们家没有那么多的勺子给大家用，姑娘、小伙子们就自带勺子。我们剥的玉米粒，越积越多，堆成了堆。要是斯特尼库茨村的索雷安表哥来，我们更是高兴得不得了。天一黑，表哥就开始讲故事，讲的都是一些笑话，到天亮还讲不完。每次讲故事时，他总是添枝加叶，把故事拉长。我们想打盹，可又舍不得不听故事。因此，我们都很精神。索雷安表哥是我姑夫沃伊内亚·米利塔鲁的孩子，姑母叫索拉娜。我有很多姑母，索拉娜姑母是其中之一。索雷安表哥的祖父沃伊内亚·西沃伊内亚老人才死不久。老头儿满头银发。我姑夫布尔杜列亚小时候，沃伊内亚·西沃伊内亚正是一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有一天，上面下了一道命令，要村里

出一名壮丁。当时被推选出来的代表商量来商量去，最后决定让沃伊内亚去当兵。他们叫来了宪兵，包围了沃伊内亚的家，喊着他的名字叫他出来。他听出是代表们的声音，但摸不清是什么事。他便出来了。宪兵扑过去绑他。他挣脱开，逃进了树林。他们骑马追上了沃伊内亚，把他套住，按倒捆上，然后押进了城。他们剪去他的头发，剃成了光头。警察局把他关了七年。从那以后，他就得了米利塔鲁①这个名字。

现在，索雷安表哥没有心思讲故事了。他家里发生了极为不幸的事。索雷安表哥的妹妹，乌莉卡姐姐——一个非常水灵的姑娘——得了精神病。她爱上了塞尔比亚村一个叫耶努察·博兹多克的小伙子。后来，这个小伙子抛弃了她，同一个相貌丑陋、但是有财产的姑娘结了婚。乌莉卡姐姐气得在地上打滚，揪头发，撕裙子，后来才平静下来。从此，她便疯疯癫癫，不吃不喝，有时在外面乱拣东西吃，最后她死了。

在我们院子前头和铁道之间有一片空地，空地上长满了槐树，在密集的歪歪扭扭的槐树中间有两棵苹果树，在槐树林中间还隐没着一个小玉米仓。玉米仓旁，有一所半地窑式的茅屋，很不显眼。小屋里住着三个人，都是男人，他们跟我们是邻居。

---

① 米利塔鲁，意为军人。

小茅屋里住的那三个人是：大佩特雷叔叔，小佩特雷叔叔和大桑杜叔叔。他们最小的弟弟老四小桑杜也住在我们这条街上，他的房子坐落在村头的铁道旁。

四个弟兄当中只有小桑杜娶了老婆，生了孩子。其余的几个弟兄都是光棍，住在我家旁边那间半地窑式的茅屋里。要说他们都是光棍，这也有点不真实。大佩特雷叔叔也结过婚，但时间很短，只有一个夏天。人们叫他"死心眼"。

"他要是结过婚，怎么现在打光棍？"

"是老婆不要他了。"

大佩特雷叔叔是伯兰家的老大，差不多有六十岁了。他长得瘦小，有点跛腿。他结婚完全是形式。贝利托里的一个人没有儿子，就把大佩特雷招去做了女婿。

有一天，他和老丈人去割草。老丈人割，女婿也割。大佩特雷叔叔割着割着，碰上了一棵蒺藜。于是他便停下来，盯着这棵蒺藜。他摸了摸头上的帽子，不知怎么办好，就问岳父：

"爸爸，我这儿有棵蒺藜，怎么办？"

"把它砍掉！拣起来扔在后头。"

佩特雷叔叔照他说的做了，继续割草。过了一会儿，又问：

"爸爸，我这儿有棵蒺藜，怎么办？"

"把它砍掉，叼在嘴里。走你的吧，我不想再看见你了！"

大佩特雷叔叔砍掉了蒺藜，叼在嘴里，回他的小屋去了。

“佩特雷哥哥，你怎么了？”小佩特雷问他。

“我回家来了。我和老丈人吵嘴了。”

他们从此就闹翻了。

小佩特雷叔叔一直没娶上媳妇。桑杜叔叔想娶媳妇，但是，大佩特雷叔叔和小佩特雷叔叔都不让他娶。桑杜叔叔本可以一走了之，但是他却整天和他的几个兄弟吵架。大佩特雷叔叔和小佩特雷叔叔看他还是不停地闹，便在一天夜里把他绑在一棵槐树上，狠狠地揍了他一顿。从此，他便精神失常了。那时，我父亲还是个孩子。从那时起，他再也没有恢复正常。他一点儿也不伤人。白天，他在房前的槐树林里串来串去，自言自语。他究竟对树说些什么，谁也不明白。他还经常发火，拿着棍子敲打槐树。他的房子周围有几百棵槐树，有小槐树，也有老槐树。棵棵槐树的树皮都被碰伤了。他拿棍子打树，越打越凶。槐树并不生气。槐树不会说话，也不会哭。叶子落了，又长出新叶。他从不用石子或棍子打苹果树。有时，这个疯子还走出槐树林到水井打水，他从水井里打出水，把水倒进自己的水罐里。然后，再从井旁捡些碎石子，怀里揣满了，就用衣襟包。他把水罐拎进小茅屋，又出来，嘴里嘟嘟囔囔。他像打枪一样，跪在地上瞄准槐树，然后用石子砍去。他总是百发百中。这个疯子很小心，万一瞄不准，也不让石子飞到篱笆外边打着人。他衣衫褴褛，几乎是赤身裸体。如果他半夜里发疯闹起来，大家也都听之任之。他爱唠叨，一直到唠叨够了才进屋。他像狗一样睡在屋地的麦秸上。他

的兄弟也带他去过医院。医生给他看了，但没有特效药，就连甘丘大夫也无能为力。甘丘自到这儿以来，给谁治好过病？……从来没有！……

这天夜里，疯子对着树说个不停。狂风怒吼，吹得树呜呜直响，飞砂走石。

我的表姐听见风声并不害怕。但是，疯子的这些胡言乱语却把她吓坏了。她从我身边爬起来，挤到睡梦中呻吟着的乌楚珀尔姑母那边去了。

“妈妈，把灯点着，我害怕！……”

乌楚珀尔姑姑醒来，摸到火柴，点上灯。她们也叫醒了爸爸。爸爸点着了手提灯，走出去劝疯子。疯子安静下来了。尽管桑杜叔叔发疯，可是我爸爸和另外少数几个人的话他还是听的。这是为什么呢？

一个星期之后，乌楚珀尔姑姑套上了马车。车里装满了麦秸。天很冷。我的表姐迪察的整个身子埋在麦秸里，只有头露在外面。

乌楚珀尔姑姑像男人一样，坐在车前，一手拉着缰绳，一手拿着鞭子。

几天休息过后，马晃动着长脖子，欢蹦乱跳。脖子上的铃铛发出清脆的响声。

“图多尔，把门打开！……”

乌楚珀尔姑姑走了。我的表姐迪察也和她一起走了。我们目送着她们离去，车轮吱吱作响。

来年之前，我可能不会再看到迪察的兔唇了。

第二章 严 冬

风不断地把屋顶上的木瓦片掀起。铁道那边的丘陵地上，前几年一直是果实累累的葡萄园。后来，从别的地方传来了虫灾，它们像一群饿急了的牲畜一样，使葡萄叶干枯，并且把叶子啃光。现在，你要喝酒吗？酒馆里可以喝到玉米酒或是从山里弄来的色酒——乏味的酸苹果酒。可是，你要是想吃一嘟噜多汁的葡萄却根本办不到，白桑葚、黑桑葚和桔红桑葚倒可以吃个够。果园里到处是桑树，桑葚差不多过去了。在收割后的庄稼地里，要是不放贪吃的马的话，倒还可以到那儿去找黑莓果和黑刺李果吃。在以往种过葡萄的地方，开进犁，一垄挨一垄地翻了地，重新种上小麦、黑麦和玉米。翻过了丘陵，便是一望无际的大平原，这块大平原是属于戴着咖啡色硬礼帽，穿着平展的高领衣服，拿着马鞭的那个大腹便便的家伙。这个大肚皮有时骑马，有时坐车逛来逛去。拉车的马拴着金铃铛，银铃铛。马车夫头上戴着有飘带的礼帽，手里拿着长鞭子。这个大肚皮叫戈古·克里斯托福尔，是贝利托里的大庄园主。这个大庄园是使我们吃苦受累的四大庄园之一。

泥腿子们呼喊着：土地，土地，土地！……

有地，但是地不属于那些辛辛苦苦的种田人。

"要是地属于我们的话，"我听爸爸说着，"我们的日子就会完全不同了。我们会过得好一些。但是，地是属于地主和二地主的。地主们生活得很好。二地主们生活得也很好。我们整天累死累活地干。很久以前，库扎[1]给人们分了点儿地。后来，地主们把他赶下了台。随后，来了一个瘦小的德国人，统治了这个国家。这个德国人同召他来的那些人互相勾结，狼狈为奸，把平民百姓忘得一干二净。正如民谣唱的那样：

来了个德国人当国王，
他把铁索套在了我们的脖子上。……"

"快别这样说了，图多尔大哥。要是让人听见，会到上头去告你，那可够你受的。……"

"让他告去吧！谁会去告我！可能是神父，可能是村长，可能是文书。所有的穷人都这么说。泥腿子们无不牢骚满腹，怨声载道。世道不好就是不好。火在灰里焖燃，总有一天要着起来，冒出熊熊烈火，到那时……"

爸爸用火棍捅着灶里的火。火燃起来，发出小火苗，冒着青烟。烟顺着烟囱跑了出去。火焰冒起来，由黄变红。火舌舔着了锅底。水要开了，开始冒泡了，这说明水已经热了，就要沸腾了。

---

① 一八五九——一八六六年期间，先后任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国和两公国统一后的大公。当政期间曾实行土地改革。

“孩子他妈，把玉米面倒进锅里。”

妈妈从木箱里抓了两把粗玉米面。玉米面没有筛过，连玉米皮子一起扔了进去。随后很快用棍儿搅了起来，还往锅里撒了一勺盐。锅开了。再过片刻就可以吃了。我舔舔嘴，咽了口唾沫。杜米特拉凯舅舅也舔了舔嘴，咽了口唾沫。他那像葱头一样大的喉头一上一下，一下一上地动着。

我们还算是好的！我们还有半口袋玉米面。别人家的面口袋里只剩下一两碗了，而且有那点儿也算不错了。

“我们要是有土地就好了！”

杜米特拉凯舅舅唉声叹气，这是从内心发出来的，或许是从饿得咕噜作响的空肚子里发出来的。如果肚子里没食儿，这个可恶的东西就会让你丑态百出：你会听到咕噜咕噜的叫声。为了不让它叫，你抓一点儿盐放在手心里，用舌头舔一舔，再喝上一大碗水。然而，你还是感到浑身发软，饿得发慌。不过，肠子暂时不叫了。

“地是地主们的，我真盼着他们早死！”妈妈诅咒着。

妈妈在斯特尼库茨村南面的山岗上还是有一块地，是她的前夫留给伊昂哥哥和埃万吉莉娜姐姐的。在春耕播种和秋收季节，爸爸有时也带着我到那儿去。真是一块次透了的地！尽是石头和砂子！你得用吃奶的劲按着犁耕地，把手都按出了茧子，磨出了血泡，血泡一破，疼得钻心，然后就留下了伤痕。老牛吃力地拉着犁，累得趴在垄沟里，再用鞭子把它抽起来，接着干。犁铧咯吱吱地响，铧刃磨钝

了，还是耕不深。下雨后，撒上种子，用耙把地耙平。小麦最多长到半尺来高，矮得都不能用镰刀割，我们只好像拔大麻一样连根拔。在地的当中，我们留一小片儿麦子不拔，好让瘪的麦粒掉在地里。

“为了来年有个好收成。”妈妈给我解释。

在不长庄稼的乱岗子上，人们也有一点儿地。但是，河两岸和广阔平原上的肥沃土地，都是属于地主的，一个庄园接着一个庄园，即使骑马穿过一个庄园，也需要一整天的时间。

泥腿子们渴望土地。他们饿得嚎叫。可是，谁也听不到他们的叫声，或者听到了，却把翻皮帽拉下来盖住耳朵装作没听见。

“姐姐，你做的玉米渣粥真好吃。”杜米特拉凯舅舅说。

我一声没吭，等我把锅巴刮下来再搭腔。

闹了虫灾。虫子把人们的葡萄园里的葡萄吃光了，也啃光了车站附近山坡上的那个米利亚雷齐地主的大片葡萄。我们就给这个地主当雇工。大伏天，地主把全村的人都叫去给他刨葡萄秧的根，清理土地。

土地又干又黑。地主弄来了蒸气发动犁，把地都深翻一遍。“现在，”当时人们议论着，“地主刨了葡萄，可能要种小麦，或是玉米、燕麦。”

可入秋以后，人们盛传在原来的葡萄园，米利亚雷齐要栽种从外国弄来嫁接的新葡萄秧。

火车运来的成捆的葡萄秧卸在了车站上。地主的佣人把一捆一捆的葡萄秧成垛地码在土岗子上。

葡萄秧运来后的一个早晨，一个戴着高度近视眼镜、高个子、红头发的德国人穿过田野，沿着小路，朝庄院走来。邮递员沃伊库·潘楚给他带路。人们很快就知道这个德国人叫弗兰茨·卡普卡。他是个葡萄种植专家。

大约在这个德国人来了一个星期之后的一天早晨，从火车上下来一个白皮肤、蓝眼睛、高个子的健壮女人，还带着四个小女孩，这就是那个德国人的老婆和孩子。地主用小马车把她们接到庄园，给德国人安排了住处。

德国人查看了岗子上那块耕过的地，并且做了记号，然后就等着栽秧了。

"瞧，秋天来了，收了玉米就该栽葡萄了。"

阴雨连绵，昼夜不停。整个大地似乎都要腐烂，但并没有腐烂。开始刮风了，雨停了，云散了。秋天不太灼热的阳光把土地晒干了。

三个村庄在同一天里响起了号角声。每当村长向全村通知什么事时，便吹起号角。号角声不停地响着，人们成群结夥地聚在村公所。当听到号角声通知去村公所开会时，人们并不感到高兴。因为号角声从未给人们带来过一个好消息！到村公所开会就意味着增加苛捐杂税，征兵，意味着有车和牲畜的人家要出车，没有的要出力。

村里的元老迪什，先是在村公所前吹号，后来到村南村北河沟那儿去吹，好让那边庄上的几户人家和村那一头

靠弗拉达湖布尔布克神父住的那条街上的人家也能听到。

人们密密麻麻地聚集在村公所前。布布列泰村长，斯特内斯库文书，宪兵头子茹韦泰都站在村公所的台阶上。台阶很高，要进村公所得上三个台阶。站在台阶上就像站在椅子上一样，比别人都高，真可谓居高临下。

布布列泰村长给地主格拉西耶·米利安·米利亚雷齐——人们叫他米拉列齐或者科拉雷兹——当过多年总管，他靠这个差使捞到了牲口和土地。现在，他阔气起来了。在地主的要求下，如今县长让原来的总管当上了村长。

现在，没有一个人敢得罪这个村长。因为他是地主的人啊！……布布列泰连县长也不怕。因为县长是地主的女婿，他怎么会怕呢！女婿和老丈人本来就是一家人嘛。

布布列泰村长曾在部队里当过排长。他能写会算。他粗声粗气地对全村人训话。他先是把双手放在系着带花的红皮带的大肚皮上，然后又插进裤兜里，把头仰起来。这时人们可以看到他满下巴的胡子和喉头。

"你们都到齐了，嗯？"

一个矮小黝黑、骨瘦如柴的人走出人群，他是茨格默耶家的佩特列。

"村长，你何必多问呢？你没看到我们全来了吗？怎么，你是夜盲？你什么时候得的夜盲？"

"当上村长之后得的，"蒂察·乌耶笑着说，"打那以后，他每天吃一只清炖鸡，每天吃清炖鸡的人就瞎眼，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

男女老少你看我，我看你，会意地笑了起来。

“你们这两个穷光蛋，我还有旧账没跟你们算呢。总有一天会找你们清算的！”

“村长，找一天夜里，你去桥那边相好的家里时再算也行。”

人们笑得更加开心了。一个女人离开人群，站到了一边。她叫西瓦·佩尔舒，是个寡妇，是村长的姘头。气壮如牛的村长，一下子泄了气，声调也低了。

站在茨格默耶旁边的尼古拉·特伦克拄着棍子，回过头来对大家说：

“今天来开会的要倒霉了。”

宪兵头子茹韦泰摸着他的枪托。他好像是在抚摸它。

“长官大人，你鼓捣枪干啥？你不会仅仅为了一句玩笑就把我们枪毙吧？”伊昂·乌杜杜伊说。

蒂察·乌耶接着说：

“他就是想枪毙我们，你以为他就能办到吗？我们人太多了。他没有那么多子弹。”

宪兵头子陡然变色。他把枪从肩上拿下来，上了子弹。

人们把这些恶棍围了起来。宪兵手握卡宾枪，扣着扳机，后退了一步。文书也往后退了一步。布布列泰村长后退了几步，进了村公所。

“我把你们叫来，”宪兵头子说，“不是为了开玩笑。我叫你们来是为了传达上头的命令。县里有指示，凡是租了格拉西耶·米利亚雷齐老爷地的人，全家男女老少明天一

大早都要出工给老爷栽葡萄。这个活儿要连着干下去，一直干到栽完为止。”

“我们也相信县长会给你们下这样的命令。”维奥里卡庄上的一个叫阿列古·奥韦代尼亚的大声地说，“县长是地主的女婿，葡萄园早晚是他的，或者是上帝恩赐给他，或者是等到魔鬼要了米利亚雷齐的命之后。”

“长官大人，我们怎么能去干这种活儿？”伊利耶·格斯卡努尔说，“租契里没有写这一条。我识字，画押前我看过契约。你瞧，既然契约里没写，反正我是不出工。看你们能把我怎么样？你们能活剥我的皮？”

宪兵头子把枪背在肩上，开始笑起来。

“乡亲们，你们干吗自寻苦恼？这是为什么？难道是契约问题吗？难道我们对契约里写上或没写上感兴趣吗？我们接到了命令，让你们出工，命令，你们当过兵的都知道，像军队里一样，接到命令，没说的，就得执行。你们为什么发疯！你们想流血？我告诉你们：我是不想让你们流血。我奉劝诸位不要违抗，还是服从命令去出工。蚜虫把地主的葡萄吃光了。地主需要葡萄。我们应该帮着这个可怜的人恢复葡萄园。他从法国弄来了好秧子，什么病虫害都不怕。你们都是傻瓜？难道你们不希望村子周围有葡萄园？不希望我们也能看到葡萄？”

“当然愿意，为什么不愿意。但是，我们想看到的是我们自己葡萄园里的葡萄而不是地主的葡萄，因为地主的葡萄连魔鬼都不敢沾边。”

一直是男人们吵吵嚷嚷。基里察·斯佩里亚图家的那个女人怎么回事，她怎么插起话来？宪兵头子大为吃惊。

“谁不让你们栽葡萄？”斯特内斯库文书跳出来说。“我和宪兵先生看法一样：我们先给地主栽上葡萄，然后再栽你们自己的，如果你们想吃葡萄的话。现在，先在地主的地里试栽，看看这种葡萄在我们这儿能不能生长。”

“要我们出力给他试栽？”

“怎么，你们想让谁栽？让地主去栽？可地主……”

“我们知道，知道，地主太胖了，他干不了活。”人群里有人说。

宪兵头子如梦方醒。布布列泰从村公所出来，对宪兵头子嘀咕了几句。

“就是说，”村长壮壮胆说，“你们不想去干活？”

“既然合同里没有这一条，我们就不去。”

“我说你们会去的。”

“我们说我们不会去。”人们说。

从车站那边传来了马蹄声。霎时间，六个骑马的宪兵来到了人群后面。

这儿离伯内亚萨不远，只有几百米的距离。在伯内亚萨有个宪兵队，十二个人，外加一个布尔勒队长。

宪兵们个个都带着武器，手里拿着长鞭。监视这个地区的布尔勒队长是个矮胖子，很结实，留着小胡子，带着猎犬。人们把脸转向他。

“你们怎么了，嗯？你们听到什么了？”

“队长先生，你们听到什么了？”乌杜杜伊问道。

“我听说明天你们不想去干活。”

“当然不去，因为合同里没写这一条。”

“我来让你们看看合同。”

他朝宪兵打了个手势，宪兵便把人群围了上来。鞭子呼啸着，抽在人们的脸上，脖子上，背上……

人们跑散了。有的跌倒在地，宪兵骑着马从他们身上踏过去。他们追到街里，边追边打。女人们尖叫着。

宪兵把乌杜杜伊、奥韦代尼亚和蒂察·乌耶逮住并把他们带进了村公所。

宪兵们下了马。有两个宪兵手持上了子弹的枪，在村公所门口站岗。被捕的人给打得鲜血淋漓。宪兵队长布尔勒在打他们。然后，这几个人被五花大绑捆起来，由骑马的宪兵押往伯内亚萨。

后来听说他们被连夜押解到图尔努，对他们将以谋反作乱罪进行审讯。

第二天清早，一个连的宪兵乘火车到了车站。宪兵们分成几组，挨家挨户进行搜查，全村的人都被弄到山岗子上去干活。

宪兵在村里呆了一个星期。

就在这一个星期内，在弗兰茨·卡普卡的鞭子下，地主的葡萄秧栽上了。随后，人们在地主的葡萄园的周围用大木条竖起了一道高栅栏。

圣诞节过后，惨遭毒打的人回到了村里。他们蹲了三

个月的班房。这算不了什么，小事一桩。

从那时到现在过去了多少年？没有几年。光阴荏苒，转瞬数年。你想想看，你吃了五个杏子，手里剩下了核。你舍不得把它们扔掉，用石子把四个核砸开，把又涩又甜的杏仁吃掉。不知什么原因，你把第五个核丢在一边。可能你想留着以后再吃。后来，你突然想起："我把它种上如何？"于是你到篱笆旁找了一块不碍事的地方，用棍子挖个小坑，把核放在坑里，用土埋上，后来你就把它忘得一干二净了。你想别的事去了，你有的是事可想！当春天来临，你无意在杂草丛中发现了一棵小杏树苗儿。到秋天，又长高了一点儿。到了冬天，叶子落了，光秃秃的。严寒并没有把它扼杀掉。当春天又来临时，一夜间你可以看到花开满树，宛如一位头戴白色面纱的新娘。开始结果了。从你摆弄杏核到现在只不过两三年的时间，可现在，你看它！……

时间过得飞快，快得难以形容。

地主的葡萄园坐落在南山坡上，整天都能晒到太阳，按时埋枝，按时掘枝。在那个德国人和雇工们的精心管理下，瘸腿子地主的葡萄长得很快，并开始结果。

春天，地主的管家好说歹说、连打带骂地把我们从家里赶出来，逼我们去掘葡萄枝。

我们都去掘枝了，有什么办法？我们只是为此才来到这个世界上，要给有钱有势的人做事！

后来，叫我们去给葡萄搭架，我们用菩提树枝绑葡萄架。

“菩提树枝结实吗？”

“结实。用它上吊都可以。”

“我干吗要上吊？我还有债要还呢。”

“蒂察·乌耶，你还在想欠的债？”

“图多尔老兄，我也想别的事。但是，债我忘不了，迟早总是要还的，要用血来还。”

葡萄园里到处是人。弗兰茨·卡普卡在我们当中转来转去。他已学会了几句我们的话：

“图多尔，别让孩子揪葡萄须儿。”

“弗兰茨先生，他不揪。”

我，达里耶是个孩子……我在帮爸爸的忙，帮埃万吉莉娜姐姐的忙。我把拧好了的菩提树枝递给他们。

那个德国人走远了。我饿，更因为生气，就揪了一个葡萄须儿，把它团了团，放进嘴里嚼了起来。我本来忘了葡萄须儿的味道。它有点儿酸甜，可以充饥。我又揪了一个，再揪一个……

“快咽下去，德国人又来了。”

我几乎没嚼就把葡萄须儿吞了下去。我没被发现。又过了一会儿，听到地主的佣人在嚷着：

“明天大家来喷药。”

“几个人？”

“每家两个。”

"每家来一个行不行？"

"不行。"

"为什么？"

"这是命令。"

"要是命令……"

我们用硫酸铜把地主的葡萄喷了两三遍。

大白天，男男女女背着白铁筒（远处看去像是一群罗锅），一手拿着胶皮管，另一只手握着喷头走来走去，把每棵葡萄从上到下喷个遍。我们这些孩子用小木桶，小水罐，水桶，有什么拿什么，从坡下的井里把水运来，倒进盛着硫酸酮的大桶里把它化开。我们的脸、手和脚都变成了绿颜色，衣服也被绿水弄脏了。

"你再也洗不掉了。"

"洗不掉我也能活着。"

又过了一会儿，地主的管家和佣人又来对大家发号施令。他根本不管我们连口气都还没喘过来，他们什么也不顾。

"明天你们都来给葡萄松土。自备铁锹，别忘了，把铁锹擦亮点儿。"

从春天到盛夏，整个葡萄园要松三次土。要不是有我们松土，就会杂草丛生！……

到了秋天，葡萄慢慢熟了。先是稀稀拉拉地熟了几粒，然后，向阳的整嘟噜的葡萄都熟了。弗兰茨·卡普卡在葡萄园里串来串去，挑选先熟的葡萄装进篮子里给地主送

去。

“老爷，先尝尝吧……”

等葡萄差不多全熟了的时候，给托米察·布尔布克神父(他曾为葡萄丰收向上帝祈祷过)和吉克·斯特内斯库文书(他总是乐意助地主一臂之力)送去成筐成筐的葡萄。几嘟噜有点儿酸的葡萄送到了宪兵队，给了茄韦泰先生。地主派管家专门给伯内亚萨的宪兵队长布尔勒送去了一整筐。

“托米察神父，像这样好心肠的地主我还没见到过。”

“你不是也把心都掏给他了……还有，在栽葡萄时你也并没打死一个穷鬼。”

“不管怎么说，反正从那以后，奥米达村的人总算老实点儿了。”

我们从栅栏缝里望着成串的葡萄。我们是穷苦人。看着葡萄又饿又馋，直看得两眼发呆，口水直流。

“会叫我们摘葡萄的。”

“那时我们也可以尝到葡萄了。”

“要是那个德国人不让呢？”

“不让又怎么样？难道那个德国人有一千只眼睛看着我们？”

“没有。”

“所以……”

我有了盼头。图尔图里克，特伦克利耶也都有了指望。根古却有些急不可待，说：

“到那时还早呢。我总梦见葡萄……每天夜里都梦见葡萄。”

“小马驹，你还是去梦绿草吧。”

“为什么我要梦见绿草？我不是小马驹，我是人。”

根古是人。他是孩子。虽然他穿得破破烂烂，鼻涕不断，说话结巴，但他毕竟是孩子，是人。我们大家都是孩子。我们做梦时都想吃葡萄。不同的是，根古由于无知，说出来罢了。

白天刮风，气候干燥，夜晚凉爽，秋天来临了。槐树，柳树，杨树，野蔷薇，野葡萄藤和桑树都开始变黄，叶子开始凋落了。田野变成深灰色。仙鹤飞到哪儿去了？比我们个子高一点儿的孩子都去上学。他们中有的念书，有的逃学，害怕老师打。伊昂哥哥喜欢上学就像鬼喜欢去教堂一样；他内心并不愿意去。他为了不让妈妈说，才硬着头皮去上学。唉！……

“地主什么时候摘葡萄？瞧，秋天来了！怎么还不开始摘？”

“等到下霜的时候才摘呢！不然做出的酒是酸的。”

对于我们来说，美中不足的是，我们仍然光着脚到处跑。尽管我们的脚掌磨得厚厚的，满是皴，还是冻了。脚冻了，人还照样活着。村公所的办事员，地主的管家又张罗起来：

“明天，大家都去摘葡萄。”

“我们去。”

明天很快就会到来，只有一夜的时间。像往常的傍晚一样，夜幕又降临了。

我很晚才睡着。我梦见葡萄，我梦见吃葡萄。我好像是在葡萄园里，躺在草地上，在我面前有满满一箱的葡萄。我连葡萄带梗一起吃。葡萄汁顺着嘴角流下来。头戴土耳其小红帽的那个阿尔巴尼亚人把枪放在一边，瞧着我笑。

“喂，葡萄好吃吗？”

“好吃，伊斯梅尔。”

“我再给你一箱。”

旁边，有一条大黑狗，呲着尖尖的白牙，冲着我汪汪叫。

我醒了，流了满嘴口水，肚子咕噜噜地叫着。天还没亮，但窗子开始微微发白，黎明即将来临。水井的吊杆吱吱作响，有人在打水。打水的可能是“嗡嗡叫”婶子，也可能是丽莫安塔，或者帕佩尔卡。伊昂哥哥和埃万吉莉娜姐姐也醒了。爸爸也醒了。妈妈起床后点上灯，屋里有了亮。我们穿上破衣服。

“孩子们，快点儿！”

“爸爸，我们穿好了。”

别人还在睡。在微弱的灯光下，大家的脸像蜡一样黄。

“孩子们没吃饭，你带他们到哪儿去？”

“摘葡萄去。他们多少吃点儿葡萄就会饱的，很快就到晌午。晌午把饭给我们送到葡萄园去。”

“要等到晌午！还是先吃口东西吧，空着肚子吃葡萄不好。”

“管它好不好呢！”

我们每人拿了一块头天晚上剩下的玉米糕，放了点盐，撒了点辣椒面，吃了下去，然后喝了一口水。一个人还有更多的需要吗？没有！的确，有的人早饭吃得好，午饭吃得好，晚饭也吃得好，除此之外，还有零食吃，但是，这样的人村里有几个？只有有地，有奶牛，有钱的那么几个，屈指可数。为什么要去数？难道还不清楚吗？

“先吃点儿玉米糕，再吃葡萄就更觉得甜了。”埃万吉莉娜姐姐说。

“更甜了。”我咽了口唾沫也这样说。

我们终于走了。天空的云彩已被风吹散，今天一定是个大晴天。我们光着脚踩在霜有一指厚的地上，咯吱吱地响。脚刚一踩，好像不是踩在霜上，倒像是踩在炭火上，火烧火燎的，但很快就习惯了。我们爬上山岗。人们真是这样愿意来干活吗？村公所的办事员，还有地主的管家显得很勤快。半个村子的人聚集在葡萄园的入口处。图塔努扯着他妈妈的衣角。特伦克利耶站在他爸爸身旁跺着脚。他爸爸长得矮小，脸色青黑，留着像倭瓜一样颜色的黄胡子。

“唉呀！今天冷得真邪乎，达里耶，真邪门儿！……”

“你跺脚能暖和过来？”

“我觉得暖和点儿了。”

根古是跟他哥哥图多拉凯来的，图尔图里克是自个儿来的。

“葡萄！我们就要吃到葡萄了！”

葡萄园的大门紧紧地关着，还没打开。大门的里边，是拥有世上最香最甜的东西的天堂。

瘸腿地主衣着讲究，穿得里三层外三层，仰坐在马车里，活像是装在盒子里怕磕怕碰的贵重瓷器。他头戴黑色翻皮帽，身披羊皮大衣，脖子上围着黑红格围巾，里边穿着一身柔软的深咖啡色西服，脚登一双擦得锃亮的尖皮鞋。一条松软的毛毯盖在膝盖上。地主的贴身仆人对他照料得很是周到，生怕他像我们一样，感冒、着凉、流鼻涕。

地主管家帕里斯·克鲁察，祖祖辈辈都是给地主家干事。现在，他把我们每个人的名字都写入了花名册。另一个长得像丑八怪的管家奥普雷亚·克楚伊·斯特勒姆布气势汹汹，简直要把人们宰了，一口吞下去。他先是让马到草地上吃草，然后从刚卸下来的一堆铁丝做的兜嘴儿里挑了一个，拿在手里掂了掂，像是看看有多重，然后呲着黄牙吼叫：

“快，哪个先过来让我给戴上首饰？”

“这不是首饰，是马兜嘴儿。”

“对你们这号人，这是够漂亮的首饰了。”

人们后退了一步。

“快，快！怎么，谁也不肯过来？”

马兜嘴儿还在管家的手里。

我们知道兜嘴儿是干什么用的。我们在地主的庄园里给玉米松土时，就给牛戴兜嘴儿，不然，牛就要吃玉米苗。夏天，收麦子时，牛拉割麦机也戴着兜嘴儿，好不让它吃地主的麦子。现在，地主也要给我们戴兜嘴儿，好不让我们吃他的葡萄。

你们知道兜嘴儿什么样吗？它像一个铁丝口罩戴在嘴上。戴上这种兜嘴儿并不妨碍呼吸，可以撩进点儿水润润嘴唇；你要是不想把痰咽下去的话，透过兜嘴儿也能吐出来。但是，痰会沾在兜嘴上，你必须用舌头尖儿往外顶一下，再用手背抹掉。反正只要你一戴上兜嘴儿，就甭想吃葡萄。

这时，在瘸腿地主身后，突然冒出了从伯内亚萨来的宪兵，打头的是个子矮小、满脸胡子、大腹便便的布尔勒队长。布尔勒队长喘着粗气说：

"我们也来摘葡萄了，米利亚雷齐老爷。让我们也来消遣消遣，美中不足的是您没把乐队请来。"

从前，地主的压迫还不是那么厉害的时候，农民自己也都种点儿葡萄。秋天收葡萄时，吉卜赛人乐师也来参加。他们在地头上吹吹打打，吃葡萄，喝葡萄汁，临走还装一兜子葡萄带回家去给孩子们吃。可现在，他们来图的是什么？这个瘸腿地主连葡萄梗都不会给他们吃。

气得鼓鼓的管家奥普雷亚·克楚伊·斯特勒姆布喊着：

"快点儿！别老让我伸着手！……"

他破口大骂。人们面面相觑，瞧瞧地主，瞧瞧管家，瞧瞧宪兵。

柔和的金色晨光撒在葡萄园上，撒在大地上，撒在我们所有人的身上。车站上，一列满载着大地的金子——小麦——的火车，一声长鸣，咕隆咕隆地慢慢开走了。我们的劳动果实就这样被运往多瑙河边，然后再由水路运到外国。

我们饥寒交迫，个个骨瘦如柴。

哨！哨！哨！

教堂里的钟声响了，钟声在秋高气爽的天空中回荡。我们不禁打了个冷战。

“谁死了？”

“伯塔死了！我们走出家门时，她就快断气了，妈妈留下守着她。”

一个小姑娘擦着泪，边说边低下头。

叮哨！叮哨！哨！哨！哨！……

火车爬上山坡朝图尔努开去，一上坡便消失了。车头冒出的浓烟像拖着一条粗尾巴的黑蛇在车厢上舞动。要是有风，就会把它吹散。但是，风停了，霜开始化了，地又湿又凉。

这时，斯特尼库茨村的一个驼背、干瘪、瘦弱、尖鼻子的老太婆从沉默的人群中站了出来。

“给我戴上兜嘴儿吧，给我戴上让你不得好死，让你下地狱永世不得翻身！”

“老太婆，到那时还早呢！”

万事开头难。现在，人们一个一个地过来让管家奥普雷亚·克楚伊·斯特勒姆布给戴兜嘴儿。宪兵头子茹韦泰扛着枪站在管家身旁；瘦骨嶙峋的文书吉克·斯特内斯库满脸堆笑，想跟我们来软的：

“你们瞧，乡亲们，每天要有四五百人进园子里摘葡萄。”

“不止这些，文书先生，人还要多！”管家打断了他的话。

“要是每个人都像鸟一样，这儿吃一粒，那儿吃一粒的话，你们想想看，地主的损失会多大，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

“逼着我们到地主米利亚雷齐的葡萄园干活已经多年了，”蒂察·乌耶说，“我们衣不遮体，整天挨饿受冻，还硬逼我们到葡萄园白给地主干活！……我们连奴隶都不如……因为奴隶虽然当牛做马，但是主人总会给他们点儿东西填填肚子。可是你，却用花言巧语迷惑我们！……”

“不仅如此，你们还给我们戴兜嘴儿，把我们当牲口对待！……”

“哼，你这个茨格默耶家的小子，还不老实？你跟蒂察·乌耶、奥韦代尼亚和斯特甘丘一个鼻孔出气。我对你只说一句话：放规矩点儿！”

“长官，怎么才算老实？怎么才算规矩？地主即使给我摘葡萄的报酬，每天最多几个铜板。我们的饭，都是家里

人送来的。我们给地主干活，给地主摘葡萄，到头来，我们得到了什么？现在，我们又受到你们的侮辱，给我们戴上兜嘴儿。我们是人还是牲口？”

“是人。”

“那么，如果我们是人，你们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们？”

“地主给你们戴兜嘴儿又能怎么样？把你们鼻子碰掉了？你们大家瞧瞧！……给他戴兜嘴儿他生气了，他这个二流子像是长着两个脑袋，这个饿鬼好像是什么皇亲国戚。但是，这一带凡是有葡萄园的地主，收葡萄时没有不给人戴兜嘴的，自古如此，都得戴上，从来没有一个人敢说个不字。”

文书气得脸通红。

“可能他们也说过，只是你没听见。”

“我们的文书，还有像他的那号人，只听他们愿意听的。”

“还只看他们愿意看的！……”

“别的村里的人都没有这样放肆，只有你们这些奥米达村里的家伙，竟敢当着地主和县长的面嘲弄我们当局。我们要给你们点儿颜色看看……到那时，你们就会低着头乖乖地站在村公所门前央求：‘文书先生，高抬贵手，少给我派点儿工吧；文书先生，高抬贵手，少派点儿巡逻任务吧，一个星期内就轮了我三次；文书先生，打扫街道时，你手下留点儿情，由于我没把垃圾运到地里，你就让清洁员罚了我三次款。’哼，你们什么时候逃出过我的手心儿？我想

捏就捏！……”

队长布尔勒和他带来的宪兵为了开开心，都装上了子弹，打起园子旁边槐树上乱叫的乌鸦来。枪一响，几只乌鸦应声而落。其余的乌鸦吓得朝村那边飞去了。

“别打了！别把子弹都浪费在乌鸦上。留着子弹或许有别的用途。”

“队长先生，我们有的是子弹。”

“那也要省着用。”

当！当！当！

教堂的钟声在为一个死者祈祷。

“基察大娘用不着戴兜嘴了。”

“我们也会有那一天的。”

“但是死之前……”

瘸腿地主像口大肥猪懒洋洋地仰坐在车里，听着。他一边听，一边看大家。他的嘴唇轻轻地颤动着，眼角露出了一丝微笑。文书干得不错。“可惜，”瘸腿地主心想，“可惜他没当上律师。”

地主点了支香烟吸着，嘴里吐出一串串的烟圈儿。这时，云消雾散，风也小了。一轮红日从铁路东面升起，爬上了山岗。山岗上的公路直通伯杜列亚萨。

我们知道文书有钱有势，我们老老小小都捏在他的手心儿里，捏在村长、宪兵和管家的手心儿里。

人们低下头，让他们给戴兜嘴儿。

我们从马车里的瘸腿地主那儿借了几袋玉米；也向贝

利托里村的大肚皮地主戈古·克里斯托福尔借了几袋玉米。是的，我们欠下的账太多了。在青黄不接时，我们借粮吃。我们吃了人家的粮食，现在，为了还债，就得拚死拚活地给他们干活。

“乡亲们，我们怎么办？”

“有什么法子呢？我们能不受人家摆布吗？”

宪兵们随时都可能对我们下毒手。栽葡萄时，我们吃过亏了。

“恐怕我们还要倒霉。”

“等到跟他们算总帐时就好了。”

“我受不了这股子气。你们听见没有？我受不了！”蒂察·乌耶愤怒地喊叫着。

蒂察转身下坡回村去了。他有点儿驼背，头戴一顶破帽子，身穿一件补丁摞补丁的黑色棉坎肩，一条粗布裤子，像我们所有的人一样，光着脚，脚上满是伤疤，又黑又脏。随后，矮小的兹弗卡姐姐拽着她又高又胖的男人也走了。走的还有皮奇克，我的表哥杜米特鲁·珀里克，利什库·斯腾加丘，佩特列·茨格默耶和庄上的一些大小子。

瘸腿地主命令宪兵队长：

“让他们走吧！剩下的人也足够了。别把这个收葡萄节的气氛破坏了。”

“听您的吩咐，老爷。”

我们大家排成队，奥普雷亚·克楚伊·斯特勒姆布给我们挨个儿戴上兜嘴儿。兜嘴儿套在脸上，两边的铁链子

从耳朵上挂过去，两个头在脖子后头锁住。地主的一个佣人给了我们每人一个小筐和一把小刀；其他佣人告诉我们怎样摘葡萄。我们小心翼翼地用小刀把葡萄割下，不让刀子伤着葡萄枝，然后把一嘟噜一嘟噜的葡萄轻轻地放进筐里，不让碰掉一个葡萄粒。筐装满了，就把它送到小道上，再拿一个空筐，弯下腰接着干。

瘸腿地主的葡萄园里有白葡萄、褐色葡萄、紫葡萄和红葡萄。现在，地主由佣人搀扶着坐进两轮小车里，便到上边去看看管葡萄园的头戴土耳其小帽的那个阿尔巴尼亚人的小屋去了。

还有红葡萄，像血一样红。

葡萄粒有的很大，有的很小，像玉米粒似的紧紧地挤在一起。

葡萄的芳香令人陶醉。

葡萄叶子又红又干，一碰就响。我们默默地干着活，一声不吭，像沉默的大地。但是，大地偶尔也会咆哮起来，摇撼根基，要造反。大地毕竟是大地。

如果我们愿意，我们也可以用手掌在兜嘴儿上挤破葡萄，吸葡萄汁。但是，我们没有一个人这样做，也不想这样做。要是我们这些孩子吸一点地主的葡萄汁，用舌头舔一舔做梦都想吃的这些葡萄的话，我们也就解馋了，也解恨了。

瘸腿地主像对牲口一样，给我们戴上了兜嘴儿，不让我们吃他的葡萄。

图塔努，你别吃葡萄！

特伦克利耶，你别吃！

图尔图里克，你别吃！

根古，你别吃！

达里耶，你别吃！

伊昂，你别吃！

我们就像事先约好的一样，都不吃葡萄。我们口干舌燥，两眼发黑。我们渴过了劲儿，饿过了劲儿，肚子饿瘪了。

哨！哨！哨！教堂的钟声响了。钟声传来，飘过耳旁，消失在远方。

死者用不着戴兜嘴儿了。

我们也不戴了！不戴了！

有的葡萄叶子红得像血，有的葡萄红得像血。我们摘着葡萄，摘满一筐又一筐，摘个不停。我们不应该忘记今天这个日子，我们不应该把它忘掉。因为今天，他们给我们戴上了兜嘴儿！兜嘴儿！兜嘴儿！

哨！哨！哨！

爸爸戴了兜嘴儿；我姐姐埃万吉莉娜戴了兜嘴儿；我哥哥伊昂戴了兜嘴儿；我也戴了兜嘴儿。图塔努、根古、图尔图里克、特伦克利耶也都戴了兜嘴儿。所有那些来了、并且留下来摘葡萄的人，都戴上了铁丝兜嘴儿。要是妈妈跟我们一起来摘葡萄的话，她也得戴上兜嘴儿。妈妈……戴兜嘴儿！

葡萄有白色的，也有褐色的、紫色的和红色的，红得像血。嗨！葡萄的芳香真令人陶醉。柔和的阳光撒在我们的身上。

从葡萄秧底下，忽然蹦出了一只又长又大的黄色蛐蛐儿，有十几条腿。要不是我眼快，就会咬着我的脚，脚就得肿得老粗。我一脚就把它踩死了。死了的蛐蛐沾在草上，不一会儿，蚂蚁便蜂拥而至。

我学会了踩死东西。现在，我踩死了蛐蛐……我也只能做到这一点，别的就……

地主坐在胶皮轮子的松软的小车里，车子停在坡上看葡萄的阿尔巴尼亚人的小屋旁边。地主看着我们戴着兜嘴儿摘葡萄，他看见我们并没有动他的财产。他那肥胖的脸上，露出了满意的表情。我们脸色发黄，皮肤干裂。

来摘葡萄的人越来越少了。整整摘了九天才把葡萄摘完。后来，下起了一场秋天少见的瓢泼大雨。雨，还在下。我呆在家里。窗户显得灰濛濛的。房前的桑树，栅栏旁的槐树，井旁边的柳树，它们的叶子都掉光了。雨点打在墙上，打在窗子上、树上，雨不停地下着。我看着我的两手，伸开又攥上，攥上又伸开，我的拳头小而无力。爸爸看见了，说：

“达里耶，你长大了以后，拳头就有劲了。生活中你会用得上拳头的。”

“对。”我回答爸爸说，“我会用得着拳头的。”

爸爸把手放在我的头上，轻轻地抚摸着。爸爸的手很粗糙，粗糙，但是有用。

“对，我会用得着拳头。”

雨下着，不停地下着。深夜，我不再做梦吃葡萄了。我梦见我的拳头长得很大，重得像铁锤，使劲地锤着，愤怒地锤着。

冬天到了，我现在比去年冬天又长高了一点儿。壁炉生起了火。外面，雪不停地下着，天空似乎裂开了。今年入冬以来，经常下雪。雪越积越厚，没过了脚面，没到膝盖，尔后，又没过膝盖，没到腰部。从屋门口出来，有一条小路通向井台；另一条小道通向草料棚和牛棚。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九个。小屋里，我们整整九个孩子挤在一起。就我所知，我们兄弟姐妹不止九个。有一个出外谋生去了。我们得到了他的消息，是好消息，他混得不错。

我们挤在一起，折腾个不停。屋里，地方很小。这儿是墙壁，这儿是床，这是门，这是窗子。我们推打着，闹得不亦乐乎。我们说笑话，猜谜语，讲故事。红牛的故事真引人入胜，使人百听不厌！而没胡子的神父米肯杜察和情妇的故事更是使人笑得合不上嘴。然后，我们又讲起了葡萄和兜嘴儿的故事。这是真事，也就没人再笑了。

看窗户！……窗户灰濛濛的，窗子外面冻了冰。我们与世隔绝，看不到灰色的天空。槐树上的花尾巴喜鹊、嘎

嘎叫的黑乌鸦被摇得晃来晃去；乌鸦的羽毛很长，长得像我在街上跟他打招呼他就啐我的那个神父的长袍。

麻雀拍打着玻璃窗，它的颜色像天空一样灰。瞧，有一只麻雀的嗉子五颜六色，嘴里叼着红米粒。

就在这个冬季的一天，外面吵吵嚷嚷，狗叫着。这时，一个人进了我们屋。他挥了挥帽子，帽子很大，是用一整张羊皮做成的。他道了晚安，然后说：

"见到你们很高兴。"

"欢迎你来，孩子。"

来的这个人是帕斯库堂哥，他把一个带黑宽条的红色大酒壶递给了爸爸和妈妈，请他们喝酒：

"今天晚上，请你们去参加街坊斯特尼克的婚礼，我和他是把兄弟。"

"我们去。"

爸爸去了，妈妈去了，埃万吉莉娜姐姐、伊昂哥哥去了，我也跟着去了。举行婚礼的那家离我们家很近，不过几十米远。

新郎斯特尼克是米哈拉凯的弟弟。米哈拉凯早就和米特拉结了婚。斯特尼克和米哈拉凯都是佩特拉婶婶的孩子。佩特拉婶婶是个寡妇，每当我们嗓子红肿的时候，她就让我们喝一小勺煤油。每年我们都要闹嗓子，每年都得喝几勺煤油。

佩特拉婶婶家的两个儿子都很勤快。和我们一样，他们也在贝利托里、萨耶列、瑟卡拉三个庄园里干活。米哈拉

凯娶了个奥尔特河附近勒伊瓦萨村的姑娘做老婆。他老婆很壮，村里有些人说，她壮得邪乎，能干活，结实。她一次能扛一百多斤的东西，不当回事。她的牙缝很宽，说起话来粗声粗气，像个哑嗓子的男人。到了晚上，胆子大的小伙子到佩特拉婶婶家周围转悠，勾引米特拉。后来，有人风言风语地说，那个牙齿稀疏的女人是破鞋。我大伯沃伊库的儿子瓦西里堂哥也去和她乱搞。

尽管我们同“嗡嗡叫”伯母不说话，但爸爸还是训了瓦西里一顿。

“米哈拉凯会揍死你！……你刚结了婚，就去勾搭他的老婆！……”

“揍我？”

瓦西里堂哥趾高气扬像只蠢公鸡，只是他没有鸡冠子，没有羽毛。他嘴上刚长出几根胡子，还不想把它刮掉。

“揍你！……”

“怎么，我就打不过他？”

瓦西里堂哥和其他乱搞的人幸运的是，米哈拉凯并不在乎。他没孩子，不知是他老婆不生育，还是他自己有毛病。老太婆们给他出主意说，如果让他老婆自由行动的话，兴许能给他带回个孩子来。反正在你的园子里长出来的东西就是你的，不是别人的。于是，米特拉打扮得花枝招展，像个新娘。她戴的项链上，有六个金币。后来，从六个增加到九个，以后金币还会多。她是个机伶的女人。比如，今年秋天，拉着玉米到地主家交地租时，大肚皮地主克里斯

托福尔拿着带绿缨的长鞭子向米特拉示意地挥了一下，说：

“到我家来一下。”

米特拉为什么不去呢？女人们躲在玉米垛旁边，小声地说着，笑着，好奇地等着米特拉出来。米特拉不大一会儿就出来了，她一边整理裙子，一边往外走。女人们看见她便问：

“喂，他跟你干什么了？”

“他能跟我干什么！……什么也没干，他是个脓包，光说得好听！……”

交完租子后，米哈拉凯拉回了满满的一车玉米。牛累得喘着气，好像拉的是石头。别的人只拉回了三百来斤，连车厢底都没装满。

农民根据雇工合同给地主干活。不把地主的地耕完种上，就休想种自己租来的那一小块地。如果你忘记了，宪兵会来提醒你，即使你不想去干，宪兵也要逼着你去给地主耕地、下种。你要把收来的玉米送到地主宅院粮仓旁，码成垛。等到地里的玉米全收光了，地主就带着管家来收租。地主收去四分之三，照理说，你应该得四分之一。但是，你得不了四分之一。到圣诞节你揭不开锅时，就得到地主家去借粮。在地主家门口至少要站上一两个小时，他才答应借给你。

“图多尔，你要借几袋玉米？”

“戈古老爷，借三袋。”

"你是付给我钱呢，还是到秋后交租子时从你的那一份玉米里扣除呢？"

"我没有钱付，戈古老爷。"

借三袋玉米，要还回九袋，有时要还回十二袋。圣诞节之前，玉米很贵。秋天，玉米就不值钱了。尽管如此，人们还是在秋后贱卖自己的粮食。但是，收税员并不因此而放过你。苛捐杂税是逃不过的，人们不得不交。谁要是不交税，就在光天化日之下抄走他的锅碗瓢盆和铺盖。

米哈拉凯红脸庞，胖乎乎的。斯特尼克长得矮小、敦实，好像谁给他的头上戴上了木头箍儿，硬不让他长高似的。他的鹰钩鼻子长得过了嘴唇，一双狡黠的眼睛却有点斜。他从那边庄上娶了个带嫁妆的老婆。瞧她那长相！脸色苍白，满脸雀斑，梳的长辫子又细又黄，黄得像干麦秸。她穿着一条带花的褶子裙，绣着蓝花的衬衫外面，穿一件毡坎肩，说明她的父亲不仅有地，也有羊，而且羊不少，有一大群。因此，她的嫁妆里就有六只怀着小羊羔的绵羊和一头小花牛。除此之外，还有一车衣服；一块河套地，地的那一边就是多瑙河彼岸保加利亚人管理的菜园子。

"他算走运，"小伙子们聚在地窖入口处七嘴八舌地说，"这么多的嫁妆少见！"

他们真像一堆淘气鬼，乐得前仰后合。

这座房子有两间屋，两个灶。在一间屋里举行婚礼，另一间是新房。床上有羊毛枕头，席子上铺的是毛毯。吹吹

打打好不热闹！婚礼算是开始了。明天，这一对年轻人首先去村公所登记，然后再去教堂举行宗教仪式。院子里，靠墙放着桌子和长凳，长凳是用木板临时搭起来的。灶上坐着个又大又粗的陶罐子。猪肉白菜卷和烤羊肉的香味扑鼻。参加婚礼的人用小黑陶缸儿喝热李子酒，把猪肉白菜卷放在盘子里，用手拿着吃。面包是热的，上面涂着一层鸡蛋糊。乐师吹起了风笛，单簧管伴奏。满脸麻子的吉卜赛人弹着抱在怀里的考布查①。聚在门外的小伙子们，这些按当地风俗习惯来参加婚礼的不速之客，站着狼吞虎咽地吃着面包头，喝着大碗的白菜汤。也请他们喝白酒。有的人站在门口，吹着口哨，等着约会。黑夜，伸手不见五指。姑娘们一个一个地从地窖里钻了出来。他们在草棚旁和玉米秸旁呆到深夜，姑娘们回来时，裙子揉皱了。脸也被啃了——让严寒冻裂了。

深夜，一列亮着灯的火车喷着火咕嘟咕嘟地向南开去，消失在山岗间。火星像一团团红色、蓝色的蜂群扑向村子。雪不停地下着，火星掉在松软的雪地上熄灭了。

夜深了。新郎拉着新娘的手开始入洞房。

"快，莫丽奇卡……"他痴情地望着她。

"如果你愿意……"她哆哆嗦嗦地说。

我两手拨拉着妇女们的裙子，从缝隙里看见了新娘的眼睛。她脸色苍白。像牛到了屠宰场一样。眼睛里流露出

---

① 罗马尼亚的一种弹拨乐器。

绝望可怕的神情。那个麻脸人弹考布查弹得更起劲了，从他的金牙缝里哼出了少女之歌：

我在娘家当姑娘时……

新娘的婆婆，老太太们，女人们和姑娘们守在门口。女方主婚人拿来一件薄得透亮、用舌头一舔就湿透的柔软衬衫，递给了新娘：

"莫丽奇卡，你拿着，你……别让我们丢脸。"

新郎新娘挤了进去，随后把门关上。人们听到插门栓的声音。

博博克家的娜斯塔西亚胖姐姐揪住我的一只耳朵。

"你这孩子，乱钻什么？"

"我就钻！……"

米特拉用铲子从灶膛里把热灰掏出来，装进一个新陶罐里，把灰压实，随后把罐子递给门口的小伙子们。

"肯定象放枪一样响……可能比放枪还要响。"

风笛一鼓一瘪不停地奏着。单簧管发出刺耳的声音。麻脸的吉卜赛人乐师像发了疯似的使劲弹拨着考布查。

"嘿！嘿！乌鸦叫了！……"

乌鸦拚命地叫着。

"砰……劈啪……劈啪……"

小伙子们在窗子底下摔碎灰罐，朝天上放骨头把的老式长筒土耳其手枪。山岗上回响着劈啪声，一直传向远方，声音越来越小。

突然，新郎气冲冲走出来，狠狠地摔了一下门。是房里着了火，还是地震了？不是，根本不是，是出了别的事。

“衬衫，把新娘的衬衫给我们。”婆婆大声说。

“让我们看看新娘的衬衫。”女方主婚人请求说。

“什么衬衫？我没有衬衫给你们看。她早就不是姑娘了，完全是个女人，这就是我的新娘子！……”

妇女们拥入洞房。

莫丽奇卡蜷缩在床上，双手按着腰，哼哼着：

“该死的，把我的骨头打断了。”

刚才，新郎拳打脚踢，朝死里揍她，把她打得鼻青脸肿。

人们哗然。新郎嚷着：“乐队别奏了，咱们还是按规矩办。用耙把她送回老丈人家去，送回娘家去。不然，我的麦子要遭雹灾，牛要病死。”

“你和谁乱搞过？”婆婆问，“那个混帐东西是谁？”

莫丽奇卡一声不吭。她就是讲出来又有什么用？！

大家提着灯笼来到外面。他们把牛牵出来，从玉米仓上取下耙，把牛套上。耙上还挂着不少带根儿的荆棘呢。

莫丽奇卡穿上坎肩，蒙上纱巾，把脸也盖住了。婆家的人、参加婚礼的人和乐队一起要用耙把她送回娘家去。这是她预料之中的。全村的人从睡梦中惊醒，不知出了什么事。唉，无论如何，事到如今已无法挽回了。

人们连拖带拉地把她从屋子里拽出来，把她推上耙，随后出发了。乐队又开始吹打起来，现在，大家是在取笑她。

风笛奏得像老牛叫；考布查弹得嘎吱嘎吱的不成个调儿；单簧管也怪声怪调。单簧管的嘴儿上，冻上了一层唾沫。

吱吅一声，人们把栅栏门推开，院里的狗像发了疯似的狂叫着。雪从九霄云外飘下，不停地落在地上，积了一层又一层。人们迈过结了冰的垄沟儿。

莫丽奇卡家一片漆黑，人们点着了灯。老丈人出来开了屋门，新娘的哥哥、弟弟出来了，新娘的妈妈穿得厚厚的，蒙着头巾也出来了。

“怎么回事？莫非鞑靼人来了？”

“老丈人，我把你的女儿送回来了，她不是姑娘。”

老丈人愣了一下，马上明白了。随后揪住他老婆的头发就往地上撞，多亏地上有雪不那么硬。

“你知道是怎么回事！你知道是怎么回事！……”

老头子狠狠地把老伴儿揍了一顿。参加婚礼的人都上来劝架。

“算了，弗图伊，再打下去会把她打死的。”

“打死就打死。她是我的老婆，你们别管。”

他不打了。莫丽奇卡吓得在耙上缩成了一团，心怦怦跳。

新郎、伴郎和参加婚礼的人进了屋。老头和老太太站在耙旁边嘀咕着。其实，就为了这么点儿事，新郎也不至于把她怎么样，因为别的姑娘也出过这种事。

“再给我一公顷地，六只羊，一头牛。”怒气冲冲的新郎提出了要求。

“我什么也不再给你了，你这个穷小子还想讹诈我，我什么也不再给你。你喜欢就娶，不喜欢就拉倒！……”

他们点着柴火，热了一壶酒，边喝边骂，差一点儿要动起手来。

“再给点什么东西。”斯特尼克乞求着。

“为了不让村里人说我抠门儿，我再给你三只长毛绵羊和半公顷地，别的不给，你这强盗！”

“你别把我当强盗。”

“我就把你当强盗。如果我愿意，为什么不行？你要是不干，我可以给女儿再找个更好的男人。”

“你刚才说再给我多少？”

“半公顷地和三只羊。”

“好，一言为定。本来给这点儿东西我是不干的，可是，我太喜欢你女儿了。不过，绵羊肚子里要怀着小羊羔。”

“怀着小羊羔。”

参加婚礼的人回去了。莫丽奇卡在耙上哭泣着。没有人去理她。乐队又尽情地吹奏起来。

天亮了，全村热闹起来。天色阴沉沉的，天空像个松软的大肚皮低垂在街道的上方。

“再没有比穷困更难受的了，它使人不知羞耻。”

“堂哥，不知羞耻的人是有，但并不多。”

莫丽奇卡的肋骨不再疼了。

但是，村里的其他姑娘的肋骨还在疼。当山坡上长满

青草时，小伙子们和姑娘们一跳完霍拉舞就到山坡上去了。他们事先都通了气。

“伊琳卡，咱们到山坡去吧？”

“我不去。”

“为什么？”

“不为什么，我不想去，我和格奥尔基察约好了。”

“那么，夜里我就往你们家大门上抹黑油泥。”

“你要想挨我爸爸揍，你就抹吧。”

“佩特鲁察，咱们到山坡上去吧？”

“好，我去。不过，你要规矩点儿。”

太阳落山时，跳完霍拉舞了。小伙子们打头，一个人在前头吹着单簧管，我的堂哥帕尔伍·格布内亚拉着手风琴。他的父亲在酒馆里夸奖着：

“我的帕尔伍聪明极了，会拉琴，真讨人喜欢。”

“算了，图多瑟，别这么吹了，人家的孩子也会拉手风琴。”

“拉，他们是会拉，我没说他们不会。但是，赶不上我的帕尔伍。你听他拉的，多棒！”

姑娘们跟在小伙子们后面，一群一群地沿着小路爬上山岗。我们也跟在姑娘们后面。有一个姑娘停住，转过身来对我们说：

“你们老跟着我们干吗？”

“怎么？我们跟着又怎么样？”

她想用土坷垃把我们赶跑。白搭！她打不着我们，我

们会躲，土坷垃从我们身边飞过，掉在地上摔碎了，她只好不理我们。到了槐树林，姑娘们各自挎着自己的小伙子散开了。小伙子们让姑娘们躺在草地上，同她们拥抱、接吻。他们谈着结婚的事。我们睁大眼睛看着他们。时而有个小伙子骂我们，我们毫不示弱，也骂他。

“今晚，我一吹口哨，你就到门口来。”

“要是妈妈早睡着，我就出来。她会睡着的。”

村里的人们盛传着：

“伊弗努什的女儿怀孕了。”

“你知道跟谁吗？”

“跟贝尔迪耶家的小子。”

“贝尔迪耶家的小子走运了，伊弗努什的女儿有地，这事是女方愿意的。不然，她爸爸不会让她找个穷光蛋。”

安格鲁什·贝尔迪耶是个英俊的小伙子，但是穷得叮当响，没人比他更穷了。不，有一个人比他更穷：这就是皮奇克。

“伊弗努什要把他招门纳婿，因为他只有一个独生女儿。他的女儿长得不难看，但是光漂亮也没用，她种不了地。”

“容颜易老，土地永存。有了地，就用不着发愁了。”

“但是，库克列亚家的阿波斯塔呢？”

“大肚子了。她不愿说出是跟谁搞出来的。”

库克列亚家的阿波斯塔偷偷地把孩子生了下来。

村里人见她突然变得苗条了，人们议论起来。

"她可能打胎了。"

"没有的事。她把孩子生下来，又把孩子弄死了。她被叫到村公所，茹韦泰又把她带到了宪兵队。"

"你说，你把小孩弄到哪儿去了？"

"哪个小孩？"

"你生的那个小孩。"

"我根本就没生孩子。"

他们把她关起来，于是她交代了。她把生下的孩子埋在粪坑里。他们让她去把孩子刨出来，孩子已成了一个肉蛋。看得出，脖子上有手掐的黑印。

"我不想活着把他埋了，我于心不忍。孩子长着一双像米鲁察一样的蓝眼睛。"

"你是跟米鲁察干的这种见不得人的事？"

"米鲁察放假回来时干的，他答应娶我。后来，他见我肚子大了，夜里就不再来找我了。他对我说，让我自己看着办。我不想让别人看见这孩子。怀里抱着孩子，没有一点儿地，又没有金项链，谁还要我？"

小孩蜷缩在场院旁边粪坑边上的一块破布里，库克列亚的女儿阿波斯塔看着小孩发呆。然后，她仿佛看见有人要偷走她的孩子似的，便猛扑过去，把孩子搂在怀里，放声大哭：

"我的宝贝，我的宝贝！……"

热泪一串一串地从她脸上滚下来。

阿波斯塔蹲监狱去了。

米鲁察是维奥尔卡庄上磨坊主伊索佩斯库的儿子。他在城里念书，每次回家度假时，他总是骑着自行车在村里兜风，按车喇叭吓唬小孩，吓得家禽乱飞。

第三章　琐　　事

弗洛雷亚·潘库已是年过半百的人了。他有几头好牛和一辆大车，不久前，大车又镶上了铁边。

他有一个姑娘，已经出嫁，家里还有三个姑娘和一个儿子。儿子到城里干活，走时好好的，回来时双目失明。他在一个建筑工地干活时，一只眼睛里迸进去了一个钉子，后来另一只眼睛也瞎了。

这个瞎儿子成了家里的包袱。

那三个没出嫁的姑娘也是包袱，但是，对弗洛雷亚·潘库来讲，最大的包袱还是他的老婆。

今年秋天，他的邻居死了，只剩下了死者的老婆。这个女人也就二十岁的样子，扁鼻子，白净脸，很活泼。潘库经常晚上给她送白面、玉米面、大油和老母鸡，总之，屋里院内有什么送什么，他不知道怎样才能讨得这个年轻寡妇的欢心，小寡妇和他打得火热。

“你去离婚再跟我结婚吧。”

起初，弗洛雷亚·潘库以为这个小寡妇在开玩笑。后

来，他感到根本不是开玩笑。于是他左思右想，经过反复考虑后，终于下了决心。

"我去离婚。"

潘库请了一个律师，帮他向法院提出离婚要求。接到传票，他便拿着传票在村里到处张扬，得意忘形地说：

"我要去离婚了，再娶个年轻老婆，我有办法养活她。"

全村人都笑话他。弗洛雷亚·潘库真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

按传票上规定的日期，他老婆坐上马车到镇上去了。他们俩来到法院门口，门开以后，便到候审室等待传讯。他老婆个子矮小，黑黑的，乳房干瘪，有点驼背，由于劳累和生育过多而显得苍老。

守门的喊他们进去。

弗洛雷亚·潘库拉着他老婆的胳膊，把她推了进去。他洋洋自得，目空一切，对法官和十字架上遇难的耶稣也毫不在乎，他以前就打过官司。

他老婆痴呆呆的，像丢了魂似的。

院长："你和你老婆结婚多少年了？"

弗洛雷亚·潘库："三十五年了，院长先生。"

院长："你们有几个孩子？"

弗洛雷亚·潘库："五个，院长先生。"

他老婆插了话："我们生的孩子还多，有三个孩子小时就死了，还有一个今年秋天死了。"

她泪如泉涌，像忍气吞声的牲口一样默默地哭泣。

院长："那么，你为什么要和她离婚？"

弗洛雷亚·潘库："院长先生，她长得难看。"

院长："三十五年后的今天，你才发现她难看了？"

弗洛雷亚·潘库："院长先生，一开始我就看出她长得丑，因为，现在我找到了一个更漂亮的。"

院长："也更年轻，对吗？"

弗洛雷亚·潘库："对，院长先生，是年轻。"

他眼睛里闪耀着幸福的光芒，还笑眯眯地摸着小胡子。

由于没同意他离婚，弗洛雷亚·潘库十分恼火，回到家里就把他老婆打得死去活来，遍体鳞伤。

两个星期之后，他便把老婆埋掉了。

金黄色的、褐色的、紫色的、红色的叶子都枯萎了，从树上飘落下来，被秋风一扫而光。田野变得光秃秃的；鹌鹑躲在野蔷薇底下，不再叫了；野蔷薇显得血红血红的。有时，狂风大作，摇动着房屋、树木，吼叫着。我们也吼叫着。我们叫着，抖着。我们的赤脚沾满了泥浆，一直到膝盖全是泥。我们玩跳马。我们这一群孩子里少了一个人，他刚死，他就是伊齐库的哥哥伊利耶。

几天前，伊利耶和伊齐库他们俩都是我的好朋友。但是，现在伊利耶死了，我怎么能和一个死人交朋友？死了就是死了。最迟到明天，我们就会把他埋葬。你听，钟声响了！别人死了，你听着为他敲的钟声多么好听，你能听见，死者听不见，要是人有魂的话，或许死人的魂能听见。

“妈妈，人真有魂吗？”

“真有。”

“人死后，魂还活着吗？”

“活着。”

“老伴儿，这个谁也不可能知道。我们只知道我们死后烂在坟墓里，变成黄土。”

伊利耶死后，家里人就给他烧了一大锅热水，锅台和烤面包的盖子都给烧热了。人们好不容易从死人的身上脱下他生前玩耍、睡觉、患病时一直穿的衣服。脱去衣服的伊利耶软得像面条，然后，把他抱进一个木盆里，他那瘦长的身躯，如今只剩下骨头架子了。用发黑的肥皂给他搓身，还用草木灰水给他冲洗。我们活着的人也都是皮包骨头，但是，他是病死的吗？如今落得个用这种像多瑙河的臭水般的脏水洗身，真可怜！哪怕他还剩一口气，他也会挣扎起来大叫，不让洗。可现在却……任人随意摆布，按说，不论大人还是孩子，凡是死了洗过身后，都要换上干净衣服。这是指那些有衣服的人家，但是，给伊利耶穿的仍是他穿过的旧衣服。

面盆里的面经过发酵，糅好之后摊在面板上，然后放进炉子里烤，面包圈很快就烤熟了。

“伊齐库，你把街上的孩子们叫来坐席。”

我们就在附近玩儿。伊齐库因为家里死了人能叫我们去他家坐席而得意洋洋。我们吃着热面包，边吃边喝着葡萄酒。我们撕下一块面包，先在酒碗里蘸一下再吃。我们

吃得津津有味，肚子填得满满的，像鼓一样，足可以用指甲在肚子上捻死跳蚤。我们到院子里玩去了。一阵风就会把我们吹倒！可是，并没有把我们刮倒。相反，我们倒爬上了栅栏，心满意足地望着街上。那里聚了一群穿得又脏又破的孩子，根古和图多拉凯站在前边。根古像我一样，高个子，头发蓬乱。他拉着他弟弟图多拉凯的手。图多拉凯还小，穿着一件连衣裙，是他姐姐的，长得拖地，满是补钉。根古睁圆了两眼，图多拉凯的眼睛也睁大了，眼巴巴地看着。所有的孩子都流下了口水。新烤出的面包香味扑鼻，葡萄酒的芳香沁人肺腑。

根古鼓起了勇气说：

“伊齐库，你也让我去你家吃面包喝酒吧，我们家的图多拉凯也会死的，到时候我也会让你到我家去吃面包喝酒。”

他用手指着图多拉凯对我们说：

“是的，我们家的图多拉凯也会死的。”

饥饿的图多拉凯站在根古一旁，用贪婪的眼光期待着。

伊齐库没答应，他不相信图多拉凯会很快死去。

马林·丹丘的房子坐落在村口公路旁买卖牲口和干草的地方。马林·丹丘曾和我父亲一起在骑兵部队里服过役。他的老婆伯拉莎大婶经常来我家找妈妈聊天。

丹丘有两个姑娘和两个小子。斯塔娜和我姐姐埃万吉莉娜同岁。琳卡和丽察姐姐同岁。他的大儿子米尼克比我

哥哥格奥尔基大。米尼克出家在外，我现在已记不起他的模样儿了；二儿子迪尼克和我哥哥伊昂整天在一起鬼混。

丹丘的两个姑娘都长得高，一头金发，皮肤白嫩细腻，像她们的妈妈。但这两个姑娘好逸恶劳。她们家的院子很大，院子里长满桑树。夏天，她们把毯子铺在树荫底下躺着乘凉。她们没有病，但却弱不禁风。她们身上哪儿都没毛病，但是，就是让她们下地走一趟，她们都受不了。

两个男孩子长得身强力壮，又高又大。米尼克前几年就长成了小伙子。他壮得像头牛，甚至比牛还壮：二百来斤的口袋，他用一只手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把它抡上肩扛走，有点儿像邻居米特拉嫂子。他走路脚很轻，当他夜间在街上行走时，连狗也不叫一声。他说话温柔和善，细声细气。他本想在本村找个对象，但没找到。差不多跑了四个村子，丹丘家的米尼克才找到了对象。他自己去求婚，并且把新娘带了回来。米尼克的老婆叫西达，比他矮一半。西达是个瘦弱的女人，长了一口大牙，她一笑，牙就露了出来。她那杂乱的浓眉下有一双黑眼睛。她喜欢动，一刻也不安静，就连吃饭时也坐不住。她刚吃几口东西，就站起来干这干那，然后又坐下吃饭。女人们给她起了个外号叫“闲不住”！我喜欢叫她“闲不住”大嫂。

这个瘦小女人坐在床边上和妈妈聊起来。天色阴沉，窗子灰蒙蒙的。

“玛丽亚大婶，你听说莫丽奇卡的事了吗？她出嫁时可丢了人！现在倒和她男人过得不错，她男人是鬼迷心窍儿。

莫丽奇卡真傻，她要是先问问我，我就会教她遮丑的办法。新婚之夜，新郎喝了酒，兴奋得又唱又跳，迷迷糊糊，只有傻瓜才瞒不过他。我出嫁前也干过那种事，是和二地主的儿子。一天晚上，他把我堵在了地里。新婚之夜，我必须把米尼克糊弄过去！……把鸽子血放在鲤鱼尿泡里……你听我说：当他向我求婚的时候，一看他块头那么大，我就不喜欢。我也不喜欢他说话的那个样子：半天也吭哧不出一句话。当时我心想，要这么个大块头有什么用。我觉得他傻乎乎的，腼腆得很。他问我：'西达，你愿意嫁给我吗？''让我想想。'我对他说，'一个星期以后你再来。'我当时想：他不会再来了，就是来，也见不到我。我打定主意，他来的那一天我走亲戚。在大门口和他分手时，他向我伸出了手，握手的方式很特殊，他用大拇指挠我的手心，这使我感到意外。他走了。我回到家里心中琢磨着：这个人并不傻，他什么都懂。我让爸爸把他追回来。爸爸去了，追到村口上，把他叫了回来。'米尼克，我拿定了主意嫁给你。'我收拾了一下东西，打了个包，就跟他走了。现在，我并不后悔。"

"闲不住"大嫂撩开大衣，解开衬衫，把奶头拽出来，给孩子喂奶。她的乳房有苹果那么大，奶头是黑的。

三年之中，"闲不住"大嫂生了三个孩子。她打算至少要生十二个，她这样夸耀着。她长得矮小，但臀部很大。女人们一见到她，就说她真能生孩子。

"你知道我的小姑子斯塔娜馋鬼吧，谁知她怎么想的，

她想嫁给奥尔恰格家的小子。

“嫁给特西克？”

“是特西克。奥尔恰格家的另一个小子娶媳妇了。”

“我忘了。”

奥尔恰格家，男的历来长得矮小，几乎是侏儒。奥尔恰格家的男的都想找个子高的老婆。他们每个人的老婆都是高个子。没用！生下的男孩个子还是矮小，个个像个小胡芦，小葱头。

特西克在法院里当文书，是上等人。他的穿着是德国人打扮，走起路来皮鞋咯噔咯噔地响。他早上离开家，步行去克尔里加齐上班，晚上回来还是步行。

他喜欢丹丘的女儿斯塔娜，因为她长得白净，个子又高。特西克·奥尔恰格的皮肤黑得像锅底。斯塔娜之所以要嫁给他，就是因为这个文书不会让她下地干活，他答应把斯塔娜打扮得像阔太太一样，也戴上小礼帽。

“闲不住”大嫂笑得前仰后合，说：

“我倒想看看她戴上小礼帽是什么样儿。”

“波莉娜不是也有顶小礼帽吗？”

“有，她戴上不难看。”

波莉娜从鲁希嫁到这村来已有一年了。她是我表哥——邮局局长——尼古拉·迪莫泽尔的妻子。

啊，我有多少个伯父、叔叔和姑姑！我有多少个堂兄、堂姐、表兄、表妹！如果我从克尔默楚伊村往北走，到处都有亲戚。往南走，更是亲戚接亲戚，没个完！……可是很

少有一个亲戚使我喜欢，然而，一旦对一家有了好感，我就喜欢上了！……你瞧，我喜欢我的一个伯父，他已经老了，头发白了。他的下巴上留着长胡子，胡子也是白的，上嘴唇上的两撇小胡子也是白的。他的家在小河那边的维奥尔卡庄上，他叫阿利桑德鲁·纳斯塔。我也喜欢他的老伴儿——我的伯母鲁鲁察。

他们家的院子很大，长着很多杏树、李子树、苹果树、核桃树；院子后面的一块地总是潮湿发粘，长着高高的芦苇。在爸爸的兄弟姐妹中，只有他一个人识字。他是小的时候跟教堂里的一位先生学的。

“怎么，村子里没有学校？”

“不可能有！只有城里才有学校，那里的学校是为商人、地主、二地主的孩子办的。”

我常到阿利桑德鲁·纳斯塔伯父家去玩儿。冬天，我去看他的那些带插图的书；夏天，我去上树摘果子吃。

“早上好，伯父！”

“早上好，达里耶！”

“伯父，你身体好吗？”

“好，达里耶。你想吃李子吗？”

“想吃。”

“那你上树去摘吧。你还想吃杏吗？这棵杏树的尖上有几个杏已经熟了，你上去摘了吧。”

这个小村庄坐落在河边的盐碱地上，挖下三四尺深就能出水，井水总是又浑又咸。各家各户都有一小块肥沃的

地，地里不仅能长洋槐树、柳树和杨树，而且也长果树。阿利桑德鲁伯父就在这样的一块地上盖起了房子。他搞了个果园，园子里有苹果树、核桃树、杏树、李子树、梨树和桃树。果树长不了多久，过一段时间就干枯。伯父把干枯的果树刨掉，再栽上新的。他的果园总是生机勃勃。春天，鲜花盛开；夏秋，果实累累，先后成熟。他有两三个蜂箱，没再多养。因为他养蜂只是为了家里有蜂蜜吃，做甜饼呀，抹面包呀，还有，谁病了也给谁一小勺吃。我上了树，杏树枝被压弯了。我好像是在打秋千，可我不觉得晕。熟透了的又香又甜的杏子的芳香使我陶醉。

伯父的孩子曾使他大伤脑筋。他老伴儿只生了两个孩子，他们都是品质恶劣，为非作歹，无法无天。伯父给两个儿子分了房基地，给他们盖了房，还分给了他们地，而自己只留下河边的一块地种菜。可是，就连这一块地两个儿子也非要分掉不可。为此，他们和伯父竟成了仇人。他俩商量好想把老头害死。一天，伯父的大儿子内亚古请伯父吃饭。内亚古脸黑黑的，贫嘴多舌。阿利桑德鲁伯父给他在路边盖了房。内亚古哥哥便开起杂货铺，他老婆在铺子后边也卖些小玩意儿，还开了个裁缝铺。她做的衣服和城里人做得一模一样。她还买了一台绣花机给女人们绣各种花围裙。这一天，内亚古两口子让老头子喝放了耗子药的李子酒。小孩子们发现了，等老头喝酒时，一个孩子跑过去把他的手推开。

“别喝，爷爷，爸爸在酒里放上了毒药！”

这件事成了村里的头号新闻。阿利桑德鲁伯父对此很是伤心。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登过他儿子们家的门槛。

“生孩子，让你受苦受累，你把他们养大成人，为的是给生活带来乐趣，老了好有个依靠，闭眼后不至让外人给你送葬。可是现在，为了财产，他们却一心要把你害死。他们要是穷，还可以理解。但是，他们并不穷，是财迷心窍。”

“大叔，你别生气！”

“别生气，别生气……你们大家都这么说。你的孩子都是好样的，我的孩子都是坏种，谁知道他们像哪辈子的人。他们好像不是我和鲁鲁察的亲骨肉。”

妈妈认定阿利桑德鲁·纳斯塔伯父年轻时做过错事。不然，就无法解释他为什么像神父那样留起了大胡子，并且总是读那些带有插图的有关圣人的书。不管冬天多么寒冷，阿利桑德鲁伯父照常读书。他总是反复读那三本书，好像百读不腻。他戴着眼镜，看书看累了的时候，就去干点儿别的事。他没有牲畜，只有两只山羊。这两只山羊由老太太喂，她还喂些鸡。

阿利桑德鲁伯父的墙架上除了那些关于圣人的书之外，还有六把大小不同的带有金属把的小刀，像刮胡子刀一样锋利。冬天我到他那儿去时，他就让我玩这些小刀。

“达里耶，别把刀子打开，当心拉了手。”

我的双手净是刀伤。像父亲的同父异母哥哥阿利桑德鲁伯父一样，我也有一把小刀。我还不识字。长大了我也

要念书。但是，我喜欢玩刀。只是我没有带骨头把和金属把的刀子。我的小刀不值钱，刀把是木头做的，很一般。伯父用核桃木雕刻了很多小十字架，并且在小十字架上镶上奇特的记号。在十字架的下端，刻着一些我不认识的字。

复活节的时候，伯父阿利桑德鲁把一筐子的十字架送到教堂，放在祭坛旁，一连摆放六个星期，供神父用。复活节的早上，阿利桑德鲁伯父站在教堂前，把小十字架分给大家。多少年来，他一直这样做。村子里没有一家的圣像画旁不挂这种小十字架的。女人们给死人做面包圈时，拿一个这样的十字架，洒上圣水，在面包圈的中央拓上一个十字架图形。面包圈要是大的话，四周也拓上十字架图形，这样面包圈上就显出了十字架的花纹。送到教堂去的十字架，都是按他的喜好涂上红、蓝、黄三种颜色。

很久以前，在我还没有出世时，阿利桑德鲁伯父有大车和牛，赶着车到集上买回来两个大十字架，上面画着很好看的圣像。他把十字架弄到坟地，在坟地边上选了个地方，然后，把两个十字架并排插上。他对布尔布克神父说：

"神父，以后我死了就葬在这儿；把老婆葬在我旁边。"

"你干啥要急着在坟地里给自已埋上十字架？"

"我看透了，我的儿子们不会给我竖十字架，所以，我就自已先插上。"

从很远的地方就可以看到这两个十字架，它们是坟地里最漂亮的十字架。几经风吹雨打，十字架腐烂了。上面写着"阿利桑德鲁·纳斯塔在此安息"字样的那个十字架先

倒了。后来 另一个写着“鲁鲁察·阿利桑德鲁·纳斯塔在此安息”字样的十字架也倒了。十字架慢慢腐烂了……腐烂了。

阿利桑德鲁伯父身体很结实，他的老伴儿也很硬朗。等到将来死后埋他们时，还得把十字架挪开，以便挖坑。那时，人们只能把十字架平放在他们的坟墓上。

“妈妈，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不能把十字架重新再竖起来？”

“达里耶，你不懂的事还多着呢，倒下的十字架不能再竖起来，它就那样躺在地上一直到化为泥土。”

“闲不住”大嫂说起表哥尼古拉·迪莫泽尔的老婆波莉娜太太的坏话来：

“你听说了没有，大婶。尼古拉从车站回来，胳肢窝里夹着甜面包，一到家正好碰上他妈妈来了。波莉娜太太坐在桌旁的大椅子上；他妈妈坐在门口的一把小椅子上。

“怎么了，妈妈？你到我们这儿来了？”

“我来了，孩子。”

“有何贵干？”

“你说什么呀，孩子？”

“有何贵干？”

“孩子，我不懂你的话。”

“你那么笨，怎么能懂我的话！”

“也许，孩子。”

“我在问你，你为什么到我们这儿来。”

“我来看看你们，孩子。”

“你是想我们了！”

“我想你们，孩子。”

“那……你还是别想的好。”

我的表哥从到邮局工作后，便像德国人那样打扮起来。他头上戴着一顶咖啡色呢料礼帽，身穿一件硬领衬衫。他从城里娶了个老婆。他老婆用脚尖走路，活像只仙鹤。波莉娜腰里结着腰带，像个妖精，谁也不喜欢她。她红眼圈，脸色白得像纸；塌鼻梁，只有鼻子尖儿翘得老高。她说起话来“斯”“什”不分。她整天梳妆打扮，染指甲……无所事事。她男人从山里雇来一个女孩子给她料理家务，当她的佣人！

尼古拉·迪莫泽尔的妈妈迪娜坐在门旁。佣人摆好饭，端上香味扑鼻的鸡汤，还有从城里买回来的甜面包更是令人馋涎欲滴。

我的表哥尼古拉和他老婆坐在饭桌旁吃着，盘子里冒着热气。老太太吸了吸鼻子。

鸡汤的香味不时地钻进鼻孔，鸡汤和面包的香味一起飘来。

尼古拉和他老婆相对而坐。他妈妈坐在门口的椅子上，她驼着背，露出一双冻裂了的黑脚。

喝完汤，佣人给他们端上来刚刚出炉的烤鸡。这位少爷和少奶奶大吃大喝，交杯换盏，频频祝酒。然后吃点心，吃完点心喝咖啡。

我的表哥尼古拉·迪莫泽尔点上一支烟，他老婆也点上了烟。烟气从鼻子里冒出来，蓝烟冉冉升向天花板。

佣人收拾了桌子。

“唉呀，妈妈，我忘了问问你：你吃过饭了吗？”

“我吃了，孩子。离开家时，我喝了一碗稀粥。”

“真恶心！”太太说。

“乡下人吆！……”我表哥尼古拉·迪莫泽尔说。

老人慈祥地看着儿子。只见他的皮鞋擦得锃亮；下身，黑底白条裤子；上身，夹克长及膝盖，内着硬领衬衫。她儿子的双手又白又好看，儿媳妇的双手也是又白又秀气。

老人美滋滋的，因为她的孩子早是个人物了，她的宝贝过上了优裕生活，她有了个城里来的儿媳妇。

“好吧，我走了，你们歇着吧，孩子。”

“永别了！……”

“闲不住”大嫂笑着，她是讥笑我的表哥尼古拉，也讥笑他的老婆。

“真是个好吃懒做的女人。”她说。

我的姑姑迪娜感到幸福。她回到家后，告诉她的老伴儿，他们的儿子和从城里娶来的儿媳妇生活得很好。

妈妈皱了皱眉头，说：

“我丈夫的儿子格奥尔基成了大神父以后，你看他会不会忘记我们？他也会像迪莫泽尔家的尼古拉吗？”

妈妈看了我一眼，说：

“还有你，达里耶，你也会这样做！”

“闲不住”大嫂走了。

我缠着妈妈问个不停：

“妈妈，这是怎么回事？阿利桑德鲁伯父为什么和父亲合不来？我们家的亲戚当中，有些是爸爸一方的亲戚，有些是妈妈一方的亲戚，有些是爷爷一方的亲戚，有些是奶奶一方的亲戚，这是为什么？……”

“天晓得。这事情很复杂。是你父亲的父亲，你的祖父那个老头子造成的。”

“你看见过他吗？”

“我还是姑娘的时候见过他一次。达里耶，你长得像他。你的眼睛和他的一样。也许你的命运和他不同。别人可别再过他那种生活了！他结了七次婚，死了七个老婆。”

“这是为什么？”

“就是这样！墓地的整整一个角上——朝着弗洛雷亚家坟地的方向——埋的全是你爷爷的妻子们，一个挨一个，一共七个，你爷爷在最边上，是第八个墓。我上坟烧香时，就哭他们。”

“妈妈，我们家有很多死人埋在那块坟地里吗？”

“几乎整个墓地都是咱们本家的。除了你爷爷娶的第一个老婆外，其他几个老婆都带着同前夫生的孩子来到你祖父家。因此，这个家有二十多个孩子，所以你父亲也就有了这么多的兄弟姐妹。我们有几百家亲戚，一些还活着，另一些已经死了。到头来，我们都会死。”

“妈妈，我们为什么会死？”

“达里耶，有生就有死。绿草只能生长一个夏天。春天，它钻出地面，秋天枯黄。冬天，它烂在雪底下。树木的寿命和人相仿，有些树的寿命比人还长。蝴蝶只能活几天。”

第四章 救生船

雪堆得有房子那么高。雪停了，却仍然见不到太阳。我们几个人挤在壁炉旁。在家里呆得实在腻人，我们便穿上破衣服到街上去玩。晚上，村公所的办事员偶尔也来用棍子敲大门，狗冲着他狂吠。

“你是谁呀？”

“我，图多尔大哥。我是杰安特。”

“你有什么事？”

“套上马送一个希腊人到巴尔塔瑟拉特去。”

“现在深更半夜就去？”

“对。这个希腊人有急事。”

“你告诉他，我这就来。”

爸爸很高兴。他又可以挣到一个列伊了，一个圆的银列伊。爸爸把马套在雪橇上，摸黑儿走了。他把家里所有的厚衣服都穿在身上。外面一片漆黑。我们听见了雪橇声，听见铃铛响。

巴尔塔瑟拉特离这儿很远，要把这个希腊人送到那儿

去。在靠近多瑙河的那个镇子上，有许多希腊人。这些希腊人在夏季和冬季便到各村走街串巷，收购富户的粮食。爸爸和他们都很熟，因为爸爸常用雪橇、马车送他们。他们只给爸爸很少一点跑腿钱。

天刚蒙蒙亮爸爸就回来了。他冻僵了，他在灶里点着麦秸取暖，边烤火边骂娘，过了一会儿才平息下来。他有钱买烟叶了，不仅能买烟叶，还够买儿簸箕的面粉。冬天，面粉很贵，而面粉，不管怎么说，都是家中不可少的东西。复活节快到了，那时任何人也不能不到教堂用面包祭奠死者。我们家里有一簸箕面粉。妈妈用它做面包圈，然后把面包圈送到教堂——一半留给神父，另一半给我们带回来。妈妈在带回来的面包圈上都插上了蜡烛头，还点上香熏。屋子里香气扑鼻。烧香使人想起死者，我不愿意家里死人。香冒出的烟是热的，但是，面包圈冻得冰凉。我们吃着面包圈，毫无味道。

神父用马车把面包圈拉回家。一个妇女——伊万·岑楚的老婆蒂蒂莉娜——来敲神父家的大门。

“神父，给我一个面包圈吧！从夏天到现在，我的孩子还没吃过一口面包。”

神父从门里回答：

“我家没有，我家没有面包圈。”

“你刚刚从教堂拉回一大车面包圈，神父，你行行好吧。”

“你没听见我的话吗？！我没有！面包圈我还有用。”

神父需要面包圈。神父的佣人把面包圈装进口袋，然后

把一口袋一口袋的面包圈放进地窖里。他拿着地窖的钥匙，每天早上，神父装满一筛子面包圈，端到牲口棚喂牛；神父有三匹马，他也给马吃面包圈，神父的马喜欢吃面包圈。

下了一场大雪，雪堆积得虽然没有房子那么高，但也差不多了。槐树嘎巴嘎巴地响，树皮冻裂了。有的树都冻死了，树干像用斧头砍过的一样。水井上吊竿的支架冻裂了，吊竿也冻裂了。我家院子尽头的那棵大杨树从树干到树梢都结上了冰，直挺挺的，犹如玉树琼枝。哪怕是一丝微风也会把树梢上的树枝吹断，掉落。乌鸦落在杨树梢上，树梢嘎巴嘎巴响，被压断掉在地上，乌鸦叫着飞走了。井很深，但是井水还是冻上了一层薄冰，像一面明镜。早晨，谁第一个先去打水，谁就要用水桶把冰砸开。爸爸拣了一些破烂衣服和破麻袋片到牲口棚去给牛和马裹在身上。狗冻得流下眼泪，我在屋门里边用麦秸给它们搭了个窝。我们把老母鸡、大山羊和小母鹿也弄到屋里。夏天，我们宰了刚刚长出两个小犄角——小得象两个小黑扣子——的小山羊，并从母山羊身上挤出一小罐奶。

妈妈在挤出的羊奶里掺上几缸子水，搅动之后，煮开放到碗里，再拌上玉米糊，给我们当早点吃。我们能吃下去，因为饥不择食。是的，只是为了充饥；要说饱，我们从来没吃过一顿饱饭。吃上一顿饱饭是什么滋味儿？我们不知道！

秋天，母山羊的奶枯竭了，挤不出奶，我们就把它赶

到有公羊的羊群里。比科伊养了一只公羊。这只公羊黑油油的，肚皮上带黄点，犄角又弯又长。如果你不躲着它，它就用犄角顶你的肚子，要是顶个窟窿，你就会一命呜呼。

“有一次，比科伊的公羊就冲我来了，差点顶着我，我撒腿就跑。”

“是呀，谁像你！……什么事都出在你身上。”

“我有什么办法！谁叫我赶上了！……好像我愿意似的。”

“你不愿意，其实是你自己找的。你的手怎么啦？”

“小刀把我的手拉了，我本想用一块柳木刻匹马。”

秋天，比科伊把全村的母山羊都赶到他家以便同公羊交配。早上，有些母山羊还可以挤出几滴奶，比科伊便用它做成奶酪，装到桶里，吃一冬天，有时还卖一点。下雪了，人们把各自的母山羊赶回家。人们都给比科伊点东西，作为对公山羊辛苦的报酬。

“从一八九六年以来还没遇到过这么冷的天气，”爸爸说，“那时我到铁路上去铲过雪。铁路刚刚建成通车。拐弯的地方，雪堵得老厚，把路口埋没了，地主们乘坐的火车也不通了。人们几乎穿着单衣就被士兵赶去铲火车周围的雪。有些人的脚冻得终生成了残废；另一些人手冻成了残废。我差一点双目失明。上年纪的人说，天要是大旱，冬天就特别冷，下大雪，会把石头冻裂。”

爸爸往壁炉里添着麦秸，又用火钩子推进去，我们背贴背紧靠在壁炉旁取暖。门关不严，寒风便从门缝里钻进来，我们的双脚冻得生疼，全身冻得发抖。夏天，太阳把

大地烤得灼热，没下过一滴雨，天气一直很干燥。蔚蓝的天空像一片无边无际的菊苣，没有一丝云彩。菊苣开花时，散发出难闻的气味。收大麦时，从田野里刮来的风散发着酸味，小麦成熟和玉米开始灌浆时，便散发出香味。田野里的阵阵微风吹进村来。当槐树像得到命令似的一夜间花开满树时，微风掠过村庄并且把槐树花的令人陶醉的芳香吹向远方，吹向遥远的地方。那时，我常常站在山坡上眺望。村庄像是一个满是泡沫的银色水池。我和我的朋友马林·耶普雷在村里放风筝。马林·耶普雷的个子比我矮，可是他身强力壮。我跟他学会做风筝，也学会怎样糊风筝嘴儿，让嘴儿能发出响声。风筝的尾巴很长，在空中摆动着。我们放开绳子，风筝一直升向高空。现在，风筝到了教堂上空，慢慢飘过村庄到了水坑的上空。因为天旱，水坑已经干了，可以走人。风筝使劲地往上飞，我们勉强能拽得住。我们饿得心慌，开始收风筝，慢慢把绳子绕在小棍上。

“达里耶，咱们快上槐树！……”

我们小心翼翼地把风筝平放在壕沟里，为的是不把纸划破，不把架子折断。我爬上一棵槐树；马林·耶普雷爬上另一棵树。我们摘槐树花吃，槐树花甜丝丝的。我们吃得肚子鼓鼓的，就不觉得饿了。

这件事发生在槐树开花时。后来，烈日炎炎，酷热难忍。槐树晒焦了，叶子变黑并飘落下来；河边上的柳树叶还有少许绿色；小麦长得只有一拃高，麦秆又细又黄，小小的麦穗上只有几颗干瘪的麦粒。因为长得太矮，无法下镰

割，只好连根儿拔；我们才收了一口袋麦子，而且多半是受了黑穗病的麦粒和稗子。妈妈把麦粒洗了洗，漂了漂，然后摊在院子里晒，并且看着不让鸡去吃。这点小麦只够上供用。地主的管家和宪兵没再派我们去收割小麦。地主干脆让小麦烂在地里肥田。

“要是下雨，”地主的管家说，“雨一下透，你们就带上犁去耕地。”

后来就这样做了。玉米只长到膝盖那么高就枯黄了，没有吐穗，也没结棒子。被烈日烘烤过的大地和村庄，入秋以后显得死气沉沉。我们只好挖野菜吃，后来野菜也吃光了，我们就用小铁锹挖野菜根儿，把根儿挖出来煮着吃，煮熟了的野菜根儿是苦的，但是，我们还是咽了下去。我们大家个个都面黄肌受。爸爸妈妈商量着卖点什么东西，好买些粮食度过饥荒。

“要是把牛卖了，”爸爸说，“我们就干不了活，那我们就会饿死。”

“孩子他爹，不卖牛，我们就得饿死，牲口也活不了，反正总得卖点什么。”

牛瘦得皮包骨，毫无气力，套在车上，拉空车都喘粗气。马走起路来，腿打哆嗦，脖子显得更长了。我们到河边去放牲口，河滩干了，牲口为了找点草根儿吃，嘴都拱破，牙床子也冒出血。

“还是卖地吧。”爸爸沮丧地说。

爸爸有十五亩大田地，还有三亩多河滩地。妈妈的地

是不能卖的，因为地是属于前夫生的孩子们的，他们还小。

“约尔达凯·迪曼想买我的地。”爸爸喃喃地说。“他还买了别人的地。十五亩地他给三口袋玉米、两口袋小麦。要是掺着菜吃，我们可以熬到来年春天。”

“春天以后呢？”

“以后再说以后的。”

约尔达凯·迪曼乘人之危捞了一把，买走了我们的地，他还买走了别人的地。我们把小麦和玉米一袋一袋地拉回家，牛累得不停地喘着气。做的玉米糕很少，我们每人只能吃一片。早饭、晚饭我们喝稀粥。每到星期天，妈妈才做一次面包。面粉不过罗，很粗，不仅不过罗，而且还掺上玉米面，为了出数。掺进玉米面后做出的面包又黄又黑，皮厚而里边发粘。哈！真好吃！每吃一口，我们都舔一舔嘴。

村里的富户更富了，穷人把地折成粮食卖给了富人。少数富人剥削掠夺多数穷人，他们有法律保护，横行霸道，为所欲为。

村文书斯特内斯库办理契约，然后由法官签字生效。任何人休想从地主那儿借到几十斤粮食。地主盼着再来一次旱灾，好以高价出售陈粮。村里的富户家家都是陈玉米棒满垛，陈粮满仓。

旱灾过后，又遇上严冬。外庄上的表哥杜米特鲁·帕里克踏着大雪来到我家。他把他妻子玛丽察表嫂也带来了。他们有五个孩子。我的表哥杜米特鲁·帕里克没有牲口。他

和他老婆给地主、富农打短工，谁家有活就给谁干。他以前有牲口，后来卖掉了。去年冬天，他借了托马·奥克的债。表哥识字，把签了字的帐单交给了酒店掌柜托马。后来，他未能按期还债，托马·奥克便逼他卖掉牲口还了债。

“托马大哥，你也会碰上天灾人祸的时候。”玛丽察表嫂咒骂着，“你让我们倾家荡产，难道你不能推迟一下还债日期吗？”

“为什么要推迟？你们困难时我借给了你们钱，我不怕挨骂，我什么都不怕！”

人一旦吃饱喝足，腰包塞满，便神气十足，不可一世，不顾别人的死活。这种人自以为能长生不老！唉，要是能长生不老的话……

来到我家的亲戚坐在灶膛旁，灶里烧着麦秸，冒着浓浓的黑烟，他们烤着冻裂了的粗大干瘪的手。

“图多尔舅舅，你帮帮我们忙吧！”玛丽察表嫂说，“我听说你们把地卖给了约尔达凯·迪曼，换回了粮食。借给我们点儿玉米面吧，哪怕几斤也行。我们的孩子要饿死了，这样下去很快就会饿死。”

玛丽察表嫂长得矮胖，她一边说一边叫苦连天，无神的两眼看着微弱的火苗。我的表哥杜米特鲁·帕里克沉默不语，爸爸也一声不吭。我家的玉米粒几乎是屈指可数，省着吃也只能吃到开春。

“我们已经有两天没吃一口东西了。我们大人饿就饿着，可怜的是孩子。”表嫂又说。

妈妈心情沉重，脸色蜡黄，她站起身拿出一个背包，给他们装了一背包玉米面。

“玛丽察，来，撑开你的前襟，我给你盛一碗白面，好给孩子们做个饼，上上供。”

爸爸看着妈妈，他想阻拦她，可又于心不忍。

“图多尔舅舅，我们忘不了你们的恩情。”

“唉，别说这些了。我在想你们夏收之前怎么度过，我们大家怎么度过。”

“或许以后我们拿起木棒，”杜米特鲁·帕里克表哥说，“干掉几个。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我们累死累活地干活，还是吃不饱穿不暖。”

“总有一天我们会这样做的。但是，如果我们考虑不周，那我们更要遭殃。只砍掉几个脑袋是不够的。”

“图多尔舅舅，至少要出口气，我忍不下去了，再也受不了。”

饥饿使村里的穷人痛苦难忍。人们大声喊叫着：“我们要出气，至少要出出气！……”

我们的两位亲戚站起来走了，爸爸把他们送到大门口。他们从躺在院子里的那条狗旁边走过时，狗仰了仰头，但并没朝他们叫，因为狗没劲儿叫了。

黑夜沉沉，漫长难忍的冬夜。挂在墙上的油灯发出微弱的光。爸爸妈妈还在说话。爸爸的哥哥——我的伯父沃伊库——给爸爸送来烟叶，他是“嗡嗡叫”伯母的男人，和我们是邻居。烟叶也有一点儿烟味，但更像干草。爸爸谈

起了杜米特鲁·帕里克表哥。

“要是帕里克还有地，他就卖地了。现在因为穷，有点地也只好贱卖，几乎是白白扔掉，以便度过饥荒，找条活路。肚子不饶人。你可以一顿不吃，两顿不吃，如果你总是饿着不吃，哪怕是应付一下的东西也不进，那么肚子就会让你爬不起来。以前也有过旱灾，但是，那时人们还有吃的，二地主不像现在这样霸占着所有土地。后来他们占的地越来越多，一垄地也不放过，变得越来越贪婪无耻。就说伯内亚萨的格拉西耶地主吧，他已老朽不堪，眼看就要进棺材入土，他的太太也老了，但是，他们还是贪得无厌，究竟为了谁呢？为了孩子们吗？他们只有一个女儿，他们把她嫁给了德勒库列亚县长的傻儿子。德勒库列亚的儿子就是挥金如土，他的财产一辈子也用不完。他们贪图安逸，不愿意多要孩子。可也是！孩子多了，发愁的事也就越多。今天这个死，明天那个病……但是给你带来乐趣的也是孩子。孩子生下来，你看着他们一点一点地长大，开始学爬，接着学站立，然后像大人一样学会走路。他们长到膝盖高，又超过了膝盖，然后开始学说话，懂话了。你并没感到时间的流逝，他们却长大成人了，人不生孩子，活着有什么意义？就像一棵不结果的果树，只好从根儿砍下，让它枯干。”

“不少人就是贪财，但是，像格拉西耶地主那样贪得无厌的人，世界上少有。”沃伊库伯父说。

“所有的地主都不是东西。今冬，财主们像老鹰见到死尸一样朝我们这些穷人猛扑过来。他们白白地霸占了我们

的地。富农也乘人之危，剥削我们。我们闹饥荒，他们为此大发横财；靠我们的劳动，使他们的财产越积越多。你去给财主打短工，连一顿饱饭都吃不上。相反，你从早到晚干个没完，直到榨干你的血汗。天黑了，他还让你干活。地主喊道：'快，加油干呀，还剩一小块没割，这太……丢人。'他背着手逛来逛去，而你得加紧干。"

屋子里烟雾弥漫，两只不停地吸着的烟斗冒着烟。兄弟姐妹们都睡了，我用手揉了揉眼睛。

"达里耶，你怎么了？"

"我眼睛难受，爸爸。"

"你睡去吧。"

"我不困。"

妈妈在缝补衬衫，衬衫破得不成样子，她简直不知道该怎样补。

"帕里克他们来的时候，我一看见他们就来气。我猜他们大雪天来就是为了要东西。东西很少，再拿出来给别人，不那么容易。今年我们为了给孩子们糊口，把地卖了。地卖不得，牲口卖了，你还可以再买，可是地就不行！……然而有谁要买牲口！最后，我想，反正有地没地一样穷。我想起了两年前的事，帕里克他老婆刚生下第五个孩子后的第三天，帕里克被迫到瑟卡拉皮耶纳鲁上校的庄园去割麦子。帕里克把他老婆也带去了，不然就交不了差。小孩躺在一块草地上，嘴边上爬满了苍蝇，只知道一个劲地哭。管家们腰里别着鞭子。皮西库的儿子菲利普管家头戴大草帽骑

马来到这里。”

“草里的那只大蛤蟆是谁家的？”菲利普管家问。

“菲利普先生，那不是蛤蟆，是我的女儿。”玛丽察答了话。

“为什么哇哇叫？”

“因为你的人不让我给喂奶。”

“就是不该让你喂奶，你们得加油干，时间不等人，要是麦子不能按时收下来，麦粒掉在地里，地主皮耶纳鲁上校先生就要受损失了。”

“那我的孩子死了呢？”帕里克顶了一句。

“有什么了不起，”皮西库·菲利普说，“大不了明年让你老婆再下一个，反正她的眼儿坏不了。”

杜米特鲁·帕里克再也忍受不了这种侮辱，他小声骂了这个管家几句，这可冒犯了皮西库。皮西库抽了他好几鞭子，帕里克身上的鞭痕一辈子也掉不了。

“皮西库·菲利普心狠手毒，上校好像是拿金子雇得他。在瑟卡拉干过活的人没有一个没挨过这个管家鞭子抽的。”

“让他下地狱挨火烧。”妈妈诅咒着。

“烧他，也烧他的主子。”沃伊库伯父接上去说，“地主的狗腿子都是一些无耻之徒，地主更坏，奴才的一肚子坏水都是从主子那儿学来的，他们按主子的意愿行事。我用牛车给他们运小麦，从萨耶列运到多瑙河的船上，整整运了一个星期，菲利普管家只给了我一天的脚钱。我去找了地主，地主说，我说的和管家说的他都清楚，但是他相信管

家的话，他相信管家却不相信我们这些根本不会搞歪门邪道占便宜的穷人。

"'老爷，就算是这样吧，'我对地主说，'不过我想我们是穷人，您是富人，瞧，我们干活并没把您搞穷。'

"'你是奥米达村的？'

"'老爷，我是奥米达村的，我叫沃伊库。'

"'我一猜就是。奥米达村的人都调皮捣蛋，我知道。我的庄园再也不要你们了。你们偷了我的东西，还总诉苦，快滚吧！'我走了，有什么办法！当时我真想用牛轭给他一下子。"

"这一天会到来的。我觉得这一天很快就会到了。"爸爸说，"已经把我们逼得走投无路了。"

"图多尔，你说得对。去年冬天圣诞节时，我杀了口猪。我把瘦肉剔下来，用一块干净布包好，送到伯内亚萨。地主的院子里挤满了人。好像是来朝圣似的，人们在庄院的大门口挤得水泄不通，人们挨着个地拿着瘦肉进了屋。地主的管家、格尔格的儿子阿克森泰接肉、过称、记帐，然后把肉扔进筐里。三筐已经装满了，还有几个空筐放在旁边。地主格拉西耶仰靠在小车里，腿下边垫着枕头，打量着送来的肉。

"'沃伊库，你的肉不怎么样！'

"'老爷，是不太好，因为是口小猪，刚喂了一年。'

"'为什么宰小猪？为什么你不养肥猪？'

"'本来要是再继续喂下去，这口小猪到明年就成肥猪

了。可是再喂下去的话，我们就没东西给孩子吃了。'

"'哼，你们都是一些懒虫，又懒又笨。你们不会过日子。'格拉西耶·米利安地主说。

"对他，你没什么可说的，说也没用。他在家里享福，我们累得腰酸背疼，到头来还说我们懒。复活节时，我给他送去鸡蛋，地主婆用一个铁环挨个套，凡是能套过去的鸡蛋，她都不收。

"'这个蛋太小。'地主婆说，'再换个大的。'

"'太太，鸡下的就是这么大的蛋。要是这个蛋是我下的，肯定会大一些。'

"'不要脸的东西，滚出去！'

"我出去了。你怎么能惹得起这个太太……今年，我连肉也没给地主送，因为没养猪。春天，也不会给地主送鸡蛋了，养的鸡都死光了。"

"你要是看一下地主家花天酒地的生活，就会让你大吃一惊。"妈妈说。

妈妈给爸爸的衬衫补上了两个大补丁，还要再补几个补丁。后背补上了一块大补丁，因为后背上太阳晒得最厉害，汗水也容易沤糟，破得最快。

"普拉克·代拉家的姑娘在贝利托里村戈古·克里斯托福尔大地主家干活，听她说，太太很少到庄园来，她大部分时间呆在布加勒斯特，那儿有一幢别墅，有十五个佣人。她脾气很坏，经常对地主大发雷霆，谁也不敢说她。地主卖粮食之后，把成打的钞票给她，让她到国外求医。地主

的儿子也是胡作非为，他曾当过军官，后来因为以打骂士兵为乐而被调离了部队。只有赌钱的时候，他才老实一会儿。全村人干一夏天的劳动成果，他一夜间就输个精光。这使地主很伤心，也促使他更加变本加厉地剥削，不然也许会好一些。他可能是希腊人，也可能是罗马尼亚人，谁知道呢？！……”

“地主六亲不认，无法无天。”爸爸说，“地主就是地主，如此而已，不管他是张三还是李四，反正都一样剥削我们。”

“唉！外面真冷。”沃伊库伯父轻声地说。他穿好大衣走了。

“全村沸腾起来了。”爸爸对妈妈说。“人们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狂风暴雨的春天即将来临！……”

“春天快来吧！”妈妈低声地说。“到了春天，就有野菜了。有野菜吃，不管怎么说就死不了人。过了春天，就听天由命吧。”

雪积得厚厚的，虽然春天临近了，然而，雪还是没有融化。我听妈妈说：

“伊柳策家的姑娘得了白喉。”

伊昂哥哥也说：

“兹弗卡大婶家的孩子也得了白喉。”

我姐姐埃万吉莉娜从邻居那儿串门回来，也说：

“图塔努家的孩子也都得了白喉。”

文书在村公所大声骂着；甘丘医生也骂个不停；特别是卫生员奇雷什骂得更凶。

“这回可苦了我。”奇雷什叫苦连天。

伊昂哥哥高兴得不得了，他说：

“妈妈，学校关门了。学校出事了。”

我哥哥不喜欢读书。爸爸嘱咐我们说：

“好孩子，村子里在闹传染病，你们可别出门了。”

“我们不出去。”

第二天，我们都扒在栅栏上，看见宪兵头子茹韦泰、医生甘丘、卫生员奇雷什和村公所的人挨家挨户地串。每到一户，他们都停在门口，只有奇雷什一个人进去问：

“有病人吗？”

“没有病人。”

他们便接着往前走。一旦发现有生病的孩子，他们就让家里的大人把孩子送到学校去。

教室里的桌椅板凳都搬出去堆在院子里。学校里还拉来了一车麦秸，生病的孩子一个挨一个地躺在麦秸上。家里的大人都来隔着窗户看他们的孩子。学校的窗户和街道之间有一道高高的木栅栏，学校的大门有人把守。卫生员奇雷什那一大帮人中，只有他一个人可以进到学校里边去。

“奇雷什，死了几个？”

“大夫先生，死了六个。”

“把他们弄走。”

他们把死孩子放进棺材里，运到墓地埋掉。死去的孩子们的妈妈慢慢地走着，跟在后边哭嚎着，大声地哭嚎着。

兹弗卡大婶家的三个孩子都死了；伊柳策家的孩子只

剩下一个；图塔努家的五个孩子只活下来两个。开春时，全村有四分之三的孩子丧了命。

“地主家的孩子没病吗？我真想看看他们也躺在学校的麦秸上挨冻，然后装进棺材送到墓地。”

“地主的孩子少，而且都住在布加勒斯特的别墅里。如果他们生病，大夫会用贵重药品给他们治好。”

瞧，最艰难的日子过去了。春天一到，云消雾散，就像被人用手抹掉似的。阳光普照大地，冰雪很快消融。雪水变成小溪越流越急，流进了小河里。村南边，小河里的水涨得很快。

村里的传染病总算过去了。只剩下几个孩子仍躺在学校里的麦秸上。这一学年，上课算吹了，等学校冲刷打扫完，也就到了夏天。格奥尔基·波佩斯库·布拉加迪鲁老师挨门挨户找孩子们谈话，对他们说：

“孩子们，不要把功课忘掉。你们还要读读书，写写字，做做算术题。”

有一天，街北头一个叫佩特雷·勒多伊的富农到我家来。他早就成了鳏夫，但是，村里没有一个人穿得像他那么干净讲究。他穿的鞋从来不打补丁，鞋带总是新的；系着白腰带，毛料裤上从来没有污点；穿着绣花坎肩，白衬衫总是像刚浆洗过的一样。他戴的毡帽也总是干干净净。如此讲究阔气的佩特雷·勒多伊只有女儿。他原来有七个女儿，现在还剩下四个。

他一再跟爸爸讨价还价，最后说定：他给我们六斗小麦作为代价，夏收时，要我们给他割一公顷半的麦子。

“佩特雷老兄，你要价太高了吧？”爸爸问。

“也许高了一些，但是，你需要，需要就得同意，不然你们全家就都完了。”

他们让我哥哥伊昂到酒馆打来了一瓶李子酒，喝了酒事就算定了，这就是合同，我们会遵守诺言的。

佩特雷·勒多伊自己并不劳动，都是别人替他干活。他究竟有多少地，连他自己也不十分清楚。他没有牲口，他的女儿们在家只管伺候他。

“村里的孩子死了！”

“太可惜了！”

“没有什么可惜的。别人家的孩子也该死几个。你看，我的孩子死了，可是没有一个人来安慰我。”

痨病在佩特雷·勒多伊家扎了根儿。春天复活节时，他的一个女儿还去跳霍拉舞，可是到了秋天下雨时，就死了。她是穿着新娘的白色礼服入葬的。没结婚就死的姑娘入葬时都要穿新娘的白色礼服。佩特雷家的姑娘还没来得及出嫁，三年内连着死了三个：莉娜、约尼察和默留卡。莉娜和约尼察死前保持了姑娘的贞洁，她们入葬时穿上新娘的白色礼服是理所当然的，可是默留卡……

默留卡入葬时也照样穿上了新娘的白色礼服。她早就知道自己快死了，于是在一个凉爽的夜晚，她便到铁道边上的那片茂密的槐树林里去唱歌，她那清脆的歌声在山岗

上回荡。默留卡那双无神的大眼睛里流露出绝望的神色，她脸色苍白，两颊绯红。

“埃万吉莉娜，我不想在不知道什么是生活之前就死去。”

“那你就结婚吧，默留卡。”埃万吉莉娜姐姐对她说。

“没人要我。正常人怎么会把一个患痨病的人娶到家去？”

“那……”

“我喜欢帕特里肖尔。”

“他呢？他喜欢你吗？”

“他说他喜欢我。”

于是她在光天化日之下就和帕特里肖尔干了那种事，然而，并没有人指责她。

“反正她快死了，快要离开人世了。”现在，她离开了人间，到坟墓去了。

“佩特雷大哥，春天，你的哪个姑娘该去跳霍拉舞？”

“约尔达娜。”

我们知道，约尔达娜秋后就会死。再过四年，家里就只剩佩特雷·勒多伊孤身一人了，他巴不得这四年快过去，到那时，他就可以重婚，再娶个年轻的老婆。一想到这儿，他就心花怒放，浑身是劲。当然，这些话是他酒后失言讲出来的。

山上的积雪消融，山洪奔流而下，河水猛涨，冲进了人们的院子。

我们站在河边观看，河水急流翻滚，冲走了栅栏、小桥和木头。我们用长钩子把冲过来的东西捞上来，这回我们可有东西烧火了。

“如果水再大的话，我们村也得挨淹。”

“不会的！这事儿从来没发生过，为什么这次就得发生？”

像是远处什么地方的大坝决了口子一样，河水越涨越高，漫过了堤岸。可是，去年夏天又是多么干旱呀！当时，田野渴望着下雨，树木渴望着下雨。人们焦急地望着天空，寻找着乌云。野草根儿也盼雨呀，盼雨。人们在求雨。

有时，从山南边过来一群一群绿眼睛、蓝眼睛的白皮肤的吉卜赛人，他们来卖勺子、碗和盆。披头散发的吉卜赛女人走家串户地叫卖：“买勺子呀，买碗呀，还有梳子！……”有时，也有一些黑得像锅底一样的吉卜赛人坐着车子来到这里。他们脏乱的头发披在肩上，浓密的大黑胡子从没修理过。他们是一群流浪的吉卜赛人——一群偷马的男贼和眨眼间就能偷走你的衬衫的女贼。这些吉卜赛女人一个劲儿地让你用放在耳边就能发出响声的贝壳占卜未来。定居的吉卜赛人也常常来到这里，他们在村外的河边上一呆就是一个星期。他们冬天呆在家里，春天坐上大车出外谋生，深秋返回家。他们多半是铁匠，他们的老婆、女儿卖刀子、锅架和链环。他们搭起帐篷，晚上围在篝火旁，吹起笛子，拉起小提琴，弹起考布查，光着屁股的大肚子小孩也凑在一起吵吵闹闹。

去年夏天，吉卜赛人来时正赶上久旱少雨，村里大街小巷净是求雨的吉卜赛女人，我们一帮孩子跟在她们后面看热闹。衣衫褴褛的吉卜赛女人和姑娘皮肤晒得黑红，她们头戴树枝编的花环，腰里围着树枝，在各户大门前开始跳舞求雨。这时，其中的一个吉卜赛老人领唱：

求雨人，快来呀，
让我把你浇湿吧！
大雨倾盆下呀，
玉米高得像篱笆，
麦穗大得像麻雀；
小麦装满仓，
玉米棒子垛成山，
大雨快快下吧！
求雨人，快来呀……

求雨的吉卜赛女人拍着巴掌同这个吉卜赛老人齐声高唱“求雨歌”。她们又扭屁股又跺脚，像着了魔似的飞快地跳着。求雨的人在谁家门口求雨，这家的主妇便端出一盆水，把皮肤黑红、衣衫褴褛的求雨的吉卜赛女人从头到脚浇个透，这时求雨算结束了，领唱的吉卜赛老人接受酬劳，把一碗玉米面倒进自己的口袋里。整个夏天，她们都在村里求雨。但是，雨还是没有下。文书吉克·斯特内斯库向村公所提出：

“每家都拿点东西，多凑一些，送给托米察·布尔布克

神父，让他给我们求求雨。”

乌杜杜伊嘲笑他说：

“如果让布尔布克神父求雨，反倒不会下雨。我听说他给斯特尼库茨村求了雨，要是斯特尼库茨村下雨，我们奥米达村也会下，因为这两个村相距只有一拃远。”

夏天，隔一段时间不下雨就旱，这时，布尔布克神父在教堂、酒馆对人们说：

“我们举行个仪式，求求雨，让老天爷发发慈悲，也许能下雨。”

“举行吧，神父。这个星期就举行。”

“那你们凑点钱吧。”

“神父，凑钱干啥？”

“做祈祷用。”

“或者买酒喝。神父，你也有庄稼，如果我们的庄稼旱死，你的庄稼也活不了。”

“这个对我无所谓，我的粮食堆满仓，我有足够的饲料喂牲口。没有供品的祈祷对上帝是无用的，祈祷也白搭。”

“好像不这样就……”

我的嗓子首先肿起来。第二天，丽察姐姐的嗓子肿了。第三天，伊昂哥哥的嗓子也肿了。妈妈拉着我们的手去找迪瓦伊卡老奶奶，她看了看我们的嗓子，然后用手按了按我们的脖子，让我第一个把头抬起来，说：

“把嘴张开！”

我张开了嘴。迪瓦伊卡奶奶把手指头伸进我的嘴里，用手指尖压压肿块，脓包被压破了，我把脓吐了出来。

"用煤油去漱漱口。"

"用煤油？"

我撒腿要跑，妈妈一把揪住了我的衣服，把我拽住。迪瓦伊卡奶奶将煤油倒进杯子，然后把我的嘴掰开，把煤油灌了进去。

"咽下去，小家伙。"

我喝了几口煤油。随后，伊昂哥哥和丽察姐姐也喝了。

"现在，"迪瓦伊卡说，"你把他们带回家，每天给他们喝三勺煤油，但不要像刚才喝的那么多；用羹匙给他们喝，早、中、晚各一羹匙煤油，还要用土豆糊在脖子上。"

爸爸买来了一口袋土豆。妈妈像是要做炸土豆似的，去掉皮，切成条。她没有炸土豆，而是像砌砖墙一样，把土豆丝一条一条地贴在我们的脖子上，然后用一长条布裹起来。

我呆在屋子里，头疼得厉害，一点也动不了。我的脖子像是套进了铁管子，只能挺着。咽唾沫时，迪瓦伊卡奶奶压破的脓包处还感到疼。

晚上，妈妈把我们脖子上的土豆条换下来，贴上新的。第二天早上又换一次。

午夜，教堂里突然敲起钟，哨哨哨的钟声把我们从睡梦中惊醒。这是那口大钟发出的低沉沙哑的声音，是出了事儿的信号。爸爸急忙登上鞋，穿好衣服，向村公所跑去，

看看出了什么事。伊昂哥哥也跟着爸爸去了。

“你快点回来，告诉我们出了什么事。”埃万吉莉娜姐姐对他说。

“我一会儿就回来。”

“反正夜里敲钟总不是好事。”妈妈喃喃地说，“也许是发大水，淹了河边的人家；我们的苦难没完没了，常言说得好：祸不单行，也许要打仗了。”

“妈妈，打仗是怎么回事？”埃莉萨贝塔妹妹问。

“打仗就是大灾大难，能是什么？国王和皇帝为了争夺财产和土地，让士兵去大动干戈，相互残杀；主子争斗，奴才遭殃，最后还是奴才丧命。”

伊昂哥哥回来了。

“伊昂，出了什么事？”

“守夜的说河水又涨了很多，河边的人家都淹了，淹了那边一个庄子，桥也冲断了。所以赶紧敲钟把人们叫醒，以免人们在睡梦中被水冲走，让房子砸死。我本想去看看，爸爸不让去，他给了我两巴掌，让我回家。”

哥哥打着哈欠，脱了衣服又钻进被窝儿睡了。

“我还以为我们村有谁家被淹了！原来谁也没被淹。”

天亮时爸爸回来了，我们正在吃炒豆。

“简直是灾难，大水到了公路边，克勒巴什家的羊群被水冲走了；有的人家牲口被水冲走了。维奥里卡那个地方的情况更严重，人们在黑暗中急得哭喊着，我们没办法过去帮助他们。现在天亮了，我们准备用木板做一个木筏，到那

个庄去。维奥里卡庄子里很多人带着老婆孩子上了房，站在阁楼的台上。”

我跑出家门，沿着铁路朝车站方向走去。大街上滚滚洪水，汇成一条洪流，简直赶上多瑙河了。河水从上游冲下来了树木、鸡舍、大车，甚至木屋顶，还有淹死的山羊、绵羊、鸡，凡是凶猛的洪水能冲得动的都冲下来了。

大水淹没了维奥里卡庄，一些房子倒塌了；另一些房子只有屋顶露出水面。庄里的人穿得很少，他们带着孩子爬到村那边的山岗上。一夜间，大水冲走了他们的房子、粮仓和牲畜，只有人得以逃生。

“爸爸，阿利桑德鲁伯父的情况怎么样？”

“我不知道。看来，大水也到了他那儿。今天就会知道的。”

甘丘医生、斯特内斯库文书、布尔布克神父和宪兵头子茹韦泰站在铁路上观赏水景。

“我们得采取点行动。”文书说。

“文书，我们已经采取行动了。”茹韦泰回答说，“我们向县里要了救生船。”

“要船干啥？有什么需要救的？”

“我们这儿是不是发水了？”

“是呀。”

“发大水就需要救生船。”

布布列泰村长也向医生、文书和宪兵头子凑了过来。他吸了一口烟，烟雾从鼻孔冒出，气乎乎地说：

“这算得上什么灾，先生，这算什么灾！……”

管家奥普雷亚·克楚伊·斯特勒姆布十分惋惜地说：

“格拉西耶老爷病了多可惜！他要是能坐车来观赏一下水景多好。如此壮观的水景，在我们这儿是百年不遇。”

“的确，太遗憾了。”文书说。

他们咧着嘴大笑起来。

“哈！斯特勒姆布，你可真会开心，真会开心，你真欠揍！”

“谁揍我，神父？谁敢挨我一下，谁敢碰一碰我？”

“有的，孩子，有的。”

“谁，神父，谁？他要敢来碰我，我就把他生吞活剥。”

“是运气碰你，孩子，你要走运了！”

“那还可以，神父，那还可以。”

从一半被淹没的维奥里卡庄传来了呼救声。

“救命啊！”

“救命啊！”

是男人、女人发出的可怕的喊叫声。片刻之后，又听到了呼喊声。

“救命啊！”

“救命啊！”

“救命啊！”

人们惊恐万状，挤在一起挣扎着。

“大水可能把房顶连人一起冲走。”

“他们十分危险。”

“房子随时会倒塌，人也得摔下去。”

“人掉进水里，只好求上帝怜悯了。”

“蒂察·乌耶，那我们怎么办？眼看着让他们淹死？”

“昨天夜里，我们已说好用木板做一两个木筏。”

“到哪儿去弄木板？”

“到车站旁边的仓库里去弄。”

“那个仓库是地主的。”

“我们不能动他的。”

“那我们去找村长和文书。”

“瞧，他们在铁道上呢。”

人们急忙爬上斜坡。

“村长先生，那个庄上的人们在喊救命。”

“你要听的是什么声音？是歌声？村子让大水困住了，他们喊叫、恸哭，他们遇上了高兴的事。”

“村长，那里有人快要淹死了。”

“淹死又怎么样？你们想让我游过去救他们？”

“我们没要求你这样做。不过，我们想用木板做个木筏，我们去救他们。”

“谁拦你们了？”

“您跟斯特勒姆布管家说一下，让我们到仓库去抱一捆木板，再拿一毡帽的钉子。等我们过去救了那些处在危险之中的人之后，就把木筏拆掉，再把木板送回原处。”

“地主的财产我管不着。我是这个村的村长，地主的财产与我毫不相干。”

文书沉不住气了。

“你们想做木筏？为什么？我们当局已做了安排，我们从图尔努港口要了救生船，一点钟的火车就运到。”

“船没到之前怎么办？”

“没到之前什么也不用做。庄上的那些人既然在昨天漆黑的夜里都没被淹死，现在大白天怎么能淹死？”

甘丘医生又矮又胖，红朴朴的脸上肌肉丰满，他似笑非笑，叉着双腿站在托米察·布尔布克神父旁边，搓着白嫩的手。奥普雷亚·克楚伊·斯特勒姆布一听说要用地主仓库的木材做木伐，便皱起了眉头。吉克·斯特内斯库文书像刚才一样，脸色发黄。

“弟兄们，我们还站在这儿向这群狗东西乞求什么？河那边庄上的人们在丧生，而他们这些官老爷们却还有心思说俏皮话。我们可以在村里自己解决木板，把床拆掉做木筏。”

“蒂察·乌耶说得对，他说得对！”

“文书，你真不害臊。”

“还有你，医生先生。”

“我要把你们这些乡巴佬作为哄抢犯论处。”茹韦泰暴跳如雷，吼叫着。

“随你的便！……”

人们跑回村去，我们这些孩子也跟在后边跑。我脖子上裹着的那条带子开了。

“达里耶，你的土豆掉了。”

"掉就掉！……"

好像有人拿着棍子赶我们似的，事实上，谁也没赶我们。

人们回到家里，拆了床，把木板条扛出来堆在路上。

"快拿一些钉子来，再拿一两把斧头。"

利什库·斯腾加丘拿来一毡帽的钉子。

"我本来是留着钉子钉鸡窝用的。"

有的拿来了锛子和斧头；皮奇克不知从哪儿搞来了几根木桩；佩特列·茨格默耶从场院拣来了一些竿子。不一会儿，就绑好了两个又长又宽的木筏。

"能禁得住我们。"

人们扛起木筏，抬到水边放下，然后把木筏推到水里。每个木筏上上去三个人。

"你们这些孩子不要在这儿捣乱。"

"我们不捣乱。我们只是看看。"

人们用竿子撑着木筏往前走，大水把木筏冲得一起一伏。木筏很快到了大水中央，然后继续前行，进到庄里便消失了。这时，不时地传来呼救声。

"救命！"

"救命！"

"救命！"

木筏上的人回答：

"我们来了，乡亲们，我们来了。你们大家都抓住。"

我们大家都屏住呼吸听着，看着汹涌的洪水撞击着公

路。洪水凶猛地冲击着河边的两棵老橡树的树干，流向远方，但大水并没有把它们冲倒。

甘丘医生那一夥人不见了，他们钻进车站旁边布库尔的酒馆去了。我仿佛看见他们嚼着面包圈，喝着加了糖的热李子酒，海阔天空地闲扯。

中午时分，木伐返回到公路上。

“我在屋顶上找到了我哥哥阿利桑德鲁。”爸爸说，“他和鲁鲁察嫂子老老实实地呆在房顶上等死。我把他们送到山岗上莫伊瑟·贝尔贝克那儿去了，他们老俩口很感激。”

“乌耶叔叔，你救的人多吗？”

“救了二十二个。小孩吓坏了，吓得直抖，有的吓晕了。”

火车终于把救生船运来了。一共运来了三条又窄又黑的小船，还跟来了三个船夫。车站上的人们从火车上把船卸下来，并且扛到了水边。

“喂，我们做什么？先到哪儿去？”

“险情过去了。”村长布布列泰说，“我们当局采取了措施。要是等着你们来，人们早就完蛋了……不过，既然你们辛辛苦苦地来了，用我们的话说，既然多瑙河的水也流到我们这儿了，那就让我们乘船消遣消遣吧，别让人家说你们白来一趟。”

文书吉克·斯特内斯库和甘丘医生上了一条船；布布列泰村长和宪兵头子茹韦泰上了另一条船；管家奥普雷亚·克楚伊·斯特勒姆布上了第三条船。

又窄又长的三条黑船开始在动荡的水面上划动。小船

从橡树旁划过，这两棵橡树在洪水的冲击下却岿然不动。小船摇晃着到了被淹的那个庄的村边，然后，慢慢消失在远方的伯内亚萨山脚下。那山岗上有跛腿地主的葡萄园，葡萄秧一棵一棵地埋在山坡上。

“我们可别再遇到这个年头了。去年夏天，旱得要命；冬天严寒，又闹饥荒；春天发了大水，挨了淹。谁知还会出什么事？”

“严峻的考验还在后边，图多尔大哥。”

蒂察·乌耶目光严峻地望着地下，他的脸和我们大家的脸一样憔悴，又黑又瘦。

除了蒂察·乌耶之外，还有利什库·斯腾加丘，皮奇克大哥，佩特列·茨格默耶，杜米特鲁·帕里克表哥，伊万·岑楚和乌黑大眼睛的伊昂哥哥，他们都光着脚踩在泥里，也在路上站住了。

第五章　又窄又深的犁沟

一个星期内暴涨起来的河水，一个月以后就退了下去。看这条河吧！现在，你又可以蹚着水过去了。要是你没看到河两岸的住家和院落破碎、房倒屋塌、断壁残垣的维奥里卡庄，要是没有看到洪水过后的一片凄凉景象的话，你就难以相信这里曾有过如此不幸。

人们搭帐篷、盖小屋，将就着住下。人们仅有的一点儿粮食已被大水冲走，失掉了牲畜和家禽；有的人家连被褥都没有了。灾民们无人帮助，无人救济。地主的粮仓里装满了小麦和玉米，但老百姓负债累累，没有钱去买。

灾民被人遗忘了。

“借给我一笸箩玉米面吧。”

“不行。”

“我拿工换。”

“我借给过你了。”

洪水过后，大地上留下一层又稠又厚的淤泥，我们光着脚踩下去，一直没过膝盖。田野里，雪已融化净尽。今年，春天提早来临。刚刚跨进三月，这个月才过去一个星期，但仙鹤尚未飞来，大雁和燕子也还没有飞来。

夜里依然很冷，土地变成黑色，野草还没有冒出新芽儿。我们光着脚跑来跑去，冻得直打哆嗦，这就是早春的天气。我们两眼望着被淹的那个庄里的无家可归的人们，幸好没人丧生！我们特别注意村边上挨着车站放着的那三条救生船——没有用过的三个庞然大物。船夫又把它们送回老家去了。

人们凑在酒馆里，更多的是来聊天而不是喝酒。各家酒馆的老板们，好像他们之间有默契，一下子把帐本收了起来，都不赊帐。

去年夏天，遭受旱灾；现在，村子又遭洪水袭击，冲走了栅栏、房屋、牲畜和家禽。

"托马老兄，赊给我一包叶子烟吧。"

"老兄，我不能赊给你，旧帐收不回来，一分钱也不赊。我的钱都用在地里了，我买了地。"

托马·奥克翘起扎手的白山羊胡，明确地告诉大家不要再给他添麻烦：

"就这样，你们要知道，我不再赊帐了，反正我是不赊帐了。你们到马雷什那儿试试看，也许他会发发善心，他又没孩子，或者去找布丘克。"

马雷什和他说得一样。布丘克也是这样说：

"老兄，我实在没办法，赊帐吆，目前没门儿。我们赶上这个倒霉的世道，坏消息不断，谁也不知道明天会出什么事。"

"要打仗了。"格奥尔基察·特勒什说。

特勒什家在河边上，大水把他的房子冲塌了。他带着老婆孩子住在山坡下临时挖的半地窖式的土房子里。他没有地，没有牲口，他像村里约四分之一的人一样，靠卖体力过活。

"什么打仗，根本谈不上。"乌杜杜伊开口说，"听说在摩尔多瓦，各村子都造地主的反了，烧了地主的房子，分了地主的地。我们现在却一动不动，我们也应该搞暴动……我们已经忍无可忍。"

我靠在爸爸身上听着，我的嗓子消了肿。柜台上面，悬

挂着两大串干面包圈。

“爸爸，给我买个面包圈吃。”

“好孩子，我没有钱。”

托马·奥克听见了，说：

“这些面包圈，小孩子吃了不好，会胀肚子的。”

如果吃得过量，胀肚子倒有可能，可是我就只吃一个。去年，村里的酒鬼贝什库因为吃了很多面包圈，他的肚子确实胀了一次。他和文书斯特内斯库打赌，贝什库多喝了两盅，文书也多喝了两盅，贝什库拄着棍儿开玩笑说：

“我一棍子就能把这一串上的一百个面包圈全打碎。”

“要是你能都打碎的话，”文书打赌说，“你吃，我付钱。但你都得打碎，一个整的也不能留。你还要都吃光，一个渣儿也不能剩。”

贝什库看准了一串上的一百个面包圈，猛击一棍子，面包圈被打得粉碎。他从地上拣起来，嚼着吃了。到了夜里，他几乎要撑死。他喝了一杯植物油，躺下了，脸色白得像石灰，但他还是活过来了。

格奥尔基·波佩斯库·布拉加迪鲁老师为此说了文书一顿。

“你怎么和贝什库认起真来？他喝醉了！他要是死了怎么办？”

“没什么了不起。”文书说。“多一个少一个穷小子无关紧要。”

打那以后，贝什库便戒了酒。他进酒馆，买了烟就走。

可是今天，贝什库没有走开。他听呀听呀，总想多知道一些。大家都想知道着火的地主庄院那里出了什么事。街上议论纷纷，传闻四起。

“我听说，”普拉克·代拉说，“起义的烈火快烧到我们这儿，摩尔多瓦以北都干起来了，说不定弗拉什卡那儿也起来了。”

普拉克·代拉正大声讲着，托米察·布尔布克神父进来了。

“你们好。”

“你好，神父。”

“给我来一杯白酒，托马。”

“一大杯吗，神父？”

“一大杯，孩子，一大杯，小杯还不够滋牙缝的。”

“因为你的牙多。”茨格默耶家的黑小子佩特列嘲笑地说。

“二十四颗牙，孩子，二十四颗牙，因为我们的祖辈是奥尔特河那边的奥尔泰尼亚人。”

大家笑起来。人瘦，不笑难看，可笑起来也不美。托米察·布尔布克神父的牙早就掉了，现在嘴里只剩下三颗，这三颗牙也都活动了。

“神父，你听说起义的事了吗？”奥韦代尼亚家的小子问。“说是摩尔多瓦那儿的人闹起革命了，好像起来造了地主的反。”

布尔布克神父端起酒杯，一饮而尽，眼睛一挤，酒顺

着嗓子滑了下去，肚子里热起来。

“再来一杯，孩子。”

托马·奥克又给他倒了一杯。神父把酒杯端在手里晃动着说：

“我听说了，孩子，但谁也说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反正拿着棍子反对当局可不好。”

“并没有人反对当局，神父。我们反对的是地主。”牧羊人桑特罗坎说。这个小伙子一顿饭可以吃掉一只烤全羊，要是有人请客的话。

“与其沉默不语，还不如铤而走险。”蒂察·乌耶对桑特罗坎说。“当局是谁的？是我们的还是地主的？就拿我们这儿来说吧，谁是县长？是伯内亚萨的瘸腿地主格拉西耶的女婿、富尔古列什蒂地方已死了的地主巴尔布·德勒库列亚的儿子迪努·德勒库列亚，所以地主和当局都是一丘之貉，这是一清二楚的。但是，同样一清二楚的是，地主总是少数，我们是多数。只要我们齐心协力，奋起抗争，就一定能把他们斗倒。”

托米察·布尔布克神父一仰脖，第二杯酒也落了肚。

“哎呀，这家伙真厉害！……”

“谁厉害，神父，是革命吗？”

“不是，孩子，不是革命，是酒。革命可不是闹着玩的，孩子。地主也是上帝安排的，有些人家财万贯，有些人一贫如洗，《圣经》上就是这样说的。但是，天堂，孩子，天堂是穷人的。天堂，孩子，天堂是属于穷人的。”

“布尔布克神父，能不能把我们的天堂分给地主点，地主也给我们点地？要是那样的话，我们可就好了。”

“我说乌耶，孩子，我可不喜欢你这样讲话。你讲的这些话都是罪过呀，会使你心灵痛苦的，到教堂去再听听耶稣的圣训吧，孩子。”

“我听过了，神父，而且听过不止一次。我觉得耶稣并不像你那样站在地主一边。”

“再给我来一杯，托马，我心里痒痒。我刚才说过了，孩子，你们不要同当局和地主作对。他们可厉害，孩子，地主可不是好惹的，上帝就是这样安排的。你们想一想，如果大家都成了地主，谁还去耕地、播种和收割庄稼！……你们是中了魔才造反的，孩子，你们中魔了！”

“因为我们渴望正义，神父，也是肚子逼出来的。是我们的肚子和我们孩子们的肚子逼出来的，不是中魔！……”

“好吧，孩子，好吧！好吧！以后你们可不要说我没劝过你们。”

神父起身走了，他的黑袍子被风吹得鼓了起来。酒店里烟雾弥漫，人们热烈地谈论着。

“对！我们把天堂分给地主点，也让他们过过天堂的生活；我们也要过过地上的生活；让我们的神父也到另一个世界、到地狱和魔鬼那里去享享福。像地主这样比魔鬼还坏的人，世上真少有！”

晚上，爸爸拉着我的手回到家里，他在酒店呆的时间

太长了。

“孩子们，你们快出来看！东边起大火了！”

大家一拥而出，站在房前向东边望去。只见那里的天空映得通红，好像是森林起了大火，但附近并没有森林。为了看得更清楚点，我们爬上铁路，但还是看不清楚。我们又登上山岗，一幅熊熊烈火的壮丽景象便一下子展现在眼前。现在，我弄清楚了，原来是瑟卡拉的地主庄园起火了。发生了什么事？可能有人放火，把麦秸垛点着了。丽察姐姐转身朝北望去，说：

“爸爸，贝利托里那边也起火了。”

北边，离我们挺远的鲁希地方，黑夜中又一处起了火。先是两股火苗晃动着，然后，两股突然合成一股，变粗，变成一根红色的烟柱，直冲云霄。

夜一片漆黑，天空无云，也没有月光。东边的瑟卡拉，北边的鲁希，熊熊火光驱走了黑暗，划破了夜空。

瞧，西边也起火了：一处在克尔里加齐；另一处在多瑙河那边奥尔特附近的萨耶列。这时又有一股火苗升向天空。我们知道，那里就是富尔古列什蒂，是县长德勒库列亚的庄园。

现在，烈火不断燃烧，田野一片通明。四面八方的火都在燃烧，只是由于离得较远，有些火苗才显得细小。

“我听到村里人在议论什么，”爸爸说，“好像是议论暴动的事，看来我们这儿也快了。”

烈火在熊熊燃烧。一道道火舌划破夜空，因为离我们

还远，所以不仅感不到热，而且还冻得发抖。

全村的人都爬上山岗观看。听到米哈拉凯大哥问爸爸：

"图多尔大叔，到哪儿去？"

"把孩子送回家，他们站冷了。"

"你先别睡，图多尔大叔。"

"我不会睡的。"

在这当儿，谁能睡得着觉！……只有小孩才去睡觉，要是小孩能睡着的话。

我们上床钻进被窝暖和暖和。但还是暖和不过来，一个劲地打哆嗦，我们小声地说着话。伊昂哥哥说：

"地主们的庄院都起火了。人们会把地主宰了。"

我哥哥腾地撩开被子，跳下床，蹬上鞋就想走。要是妈妈在家，就会拦住他。但是妈妈不在家，她同村里的男男女女还在岗子上。

"如果我们村也有个地主庄园的话，人们也会放火烧掉。"埃万吉莉娜姐姐说，"可惜我们村没有地主。"

"我们到临近村去烧，"伊昂哥哥说，"我们既然能去外村干活，也可以去外村搞暴动。伯内亚萨离这儿只有几步远，我们决不能让那个给我们戴兜嘴儿的瘸腿地主溜掉。"

人们看够了火，便三三两两地走下山岗。有几个人到我们家来了。我们把腿蜷起来腾出地方，让他们坐在床头上。还有几个人站在门旁，也有的靠墙站着。妈妈从外屋给他们拿来了几个三条腿的小凳。

"你们坐下吧。"

他们坐下，都低着头。煤油灯冒着黑烟。爸爸说：

“全国都闹起了革命。从前也有过多次起义，最后都被庄园主扼杀在血泊中。但是，每次百姓暴动之后，多少总是有点好的变化；地主们在一段时间里吓得胆战心惊，对老百姓也客气一些。现在，我们也不能袖手旁观。我们受够了。这次我们兴许能把地主彻底推翻。像我们这样想改变世道的人多得是，这没问题。但我们还少一样东西，就是起义军队没有首领。受尽压迫的人们自发地起来去放火，还可能去杀人。”

“我实在忍不下去了。”我表哥杜米特鲁·帕里克深深地叹了口气说，“我的孩子瘦得只剩骨头架子，饿得奄奄一息，快要断气了。我把麦秸磨碎，煮着吃……你们瞧我的双手，已经看不出肉皮了。为什么？得了浮肿病！我老婆的手也是这样……浮肿使人发疯，发了疯又会使人死亡。我们究竟犯了什么罪？我们整天累死累活地干活。我的背上鞭痕累累，我老婆的背上也是如此。人只有一次生和死。我们与其像牲口那样默默地死去，还不如在为争取美好生活权利的斗争中牺牲，这样也对得起我们的后代。”

“杜米特鲁大哥，”布奇克说，“我是单身一人，无牵无挂。对于我过去的这种生活，我已经过够了，这简直不是人过的日子，连狗都不如。依我说，明天一大早，把全村人集合起来去造反！……”

“如果群众自己起不来，我们就把全村人集合起来，这样做好。”我的伯父（“嗡嗡叫”伯母的丈夫）沃伊库赞赏地

说，"反，我是造定了。我还听有人说大学生的事。明天他们会不会也到我们这儿来？"

"什么学生不学生，也许是谣传。但是，烧了庄园是事实，是群众放的火。地主统治的这个国家，到处在燃烧。我们不能不起来了，不然，我们也活不成，我们就会绝种。"

拄着棍子站在门口的达维德·弗洛罗尤说完这一席话后，眼望着地下，像是看他穿的那双没有鞋带而用绳子捆在脚上的破鞋。他嘴上浓密的长胡子像一团乱麻，嘴角下边的两绺胡子白了。后来，他脑子里又闪出一个念头，并把它倾吐出来：

"我有七个儿子，我要带他们去造反。咱们一起去冲，大不了是一死。"

"走吧，图多尔大叔，我们现在就去找蒂察·乌耶商量。我们也叫上利什库·斯腾加丘和伊万·岑楚。"

"最好把茨格默耶、奥尔代尼亚和乌杜杜伊也叫上。人多主意也多。"

他们商量去了。爸爸也跟他们一起走了。

煤油灯冒着黑烟，我已经看不清屋内人们的模样。我睡着了，睡得很熟，我梦见人们在厮杀，房子起了火，连村里的树也烧着了。我在梦中呻吟，一边呻吟一边翻身。妈妈把我叫醒：

"达里耶，你怎么了？"

"我做了个噩梦。"

我时常在梦中翻滚，呻吟，说一些谁都听不懂的话，讲的好像是外语。有一次我梦见我漂浮在从未见过的无边无际的蓝色的汪洋大海之中，就在这时，突然起了风暴。我蜷缩在一个凹形的木墩上，卷入了旋涡。木墩摇晃着，我差点要翻下去。各种奇形怪状的鱼，有的比牛还大，张着嘴在我身边游来游去要吃我。我咬紧牙关，虽然咬得很紧，但是由于害怕而叫了起来。

"达里耶，你怎么了？"

"妈妈，我做了个噩梦。"

还有一次我梦见自己在树梢上。热风吹得我摇来摇去。热风吹得我惬意，树梢摇得我开心。脚下是一大片树林，宽大的锯齿形树叶沙沙作响，我的脚一滑，摔了下来。我用力喊叫着。

"达里耶，你怎么了？"

"妈妈，我做了个噩梦。"

有一次我梦见一大群黑熊在追我。我在石头缝里钻来钻去，然后爬进一个岩洞。岩洞里有一堆火，我把烧着了的木头弄到洞口。

一天夜里，我还梦见有一列火车脱了轨，向我冲过来。车轮子从我身上轧过去，把我轧成几段。然后火车司炉又把我的一段一段的肢体拣起来，按原部位粘好。于是我在梦中笑了，当时我知道是在做梦。

迪瓦伊卡老奶奶给我驱过邪，佩特里亚也给我驱过邪，但都没驱走，我还是不断地做噩梦。

煤油灯还在冒黑烟。屋里只剩家里人了。我哥哥蹲在壁炉旁抽着旱烟，鼻子里喷出缕缕青烟。他睡不着觉。

“达里耶，你躺下睡吧。”

“我的睏劲过去了，哥哥。”

“那你就老实呆着，别在被子里乱折腾，省得把别人弄醒。”

“哥哥，咱们这儿也会闹暴动吗？”

“会的。”

“今天吗？”

“可能就在今天。”

从挂着一层水气的窗玻璃上看出，天已蒙蒙亮。水井上的吊竿吱吱响。传来了牛想吃青草的哞哞叫声，但是，草还没长出来。

早上，我们大家成群结队地溜达着到村公所去集合。

斯特内斯库文书躲到哪儿去了？布布列泰村长躲到哪儿去了？村公所里空无一人，人们东找西找也没找到他们。我们的宪兵头子持枪在车站上站岗，因为我们的目标不是车站，所以就没去惊动他。

区公所的所在地伯内亚萨的宪兵们荷枪实弹，骑着马在村里巡逻，打头的是那个又矮又胖、满脸胡子的队长。另外一些宪兵守卫着瘸腿地主的两层小楼。

“在伯内亚萨，防守太严，大家无法行动。”

“格拉西耶·米利亚雷齐地主要溜了。”

“奥普雷亚·克楚伊·斯特勒姆布也要溜了。”

“这难说。”

“我们怎么办？”蒂察·乌耶问大家。“我们还不开始革命？瑟卡拉村已经闹起革命来了，我们放火烧了地主的庄园。听说全国各地的人们都起来闹革命了。我们要不要土地？”

“我们要！”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

“所以我们必须起来革命，只有那些闹革命参加暴动的人才能分地主的地。”

格奥尔基·克勒巴什长得又胖又壮，他有很多土地，还有羊群和牲畜。他的家在通向斯特尼库茨村的小河边上；河滩的一半都成了他的院子。村里人都说克勒巴什的财产即使赶不上一个大地主的，也比一个小地主的财产多得多。这时，他走出人群，说：

“什么革命，你们瞎闹什么？你们以为一烧地主的庄园，地主就会死？把地主逮住杀了就能分他的地？这是犯法！法律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富农勒多伊同他一唱一合。茨格默耶当即反驳说：

“我们对法律不感兴趣。法律不是我们定的。定法律的人并没问过我们赞成不赞成。”

佩特列·茨格默耶是个穷苦人，根据村里人给他报酬的多少，他有时看青护林，有时给人放猪。他总是拎着根木棒，从未见他空过手，木棒和他形影不离。他睡觉时，脑袋也枕着这个木棒，好像枕着条装满黄金的袋子，怕别人

偷走似的。这就是他的全部家当，当然还有点别的东西，那就是：老婆和五个孩子，一些破鞋烂袜，补了又补的破大衣和破裤子。

"克勒巴什，你巴不得人们不起来革命，因为你害怕。我们要和地主算账，无须你多管闲事，也不需要像你这样的其他人指手画脚。"

"这革命怎么个革法？"尼察·普洛卡问。"只有那些本村有地主的人们才革命，我们村子里没有地主，我们不革。"

牧羊人桑特罗坎插了话：

"我们村里是没有地主，但是我们给地主干活。"

"昨天夜里你们看见火光了吗？你们看见了！"莫林·拉鲁激动地接上去说，"如果今天夜里还看不到我们这儿起火的话，外村的人就会认为我们不同他们站在一起，他们就会来点火烧房，以此作为对我们的惩罚。现在，我们所有的穷哥们必须拧成一股绳。我们不能只让别人冲锋陷阵，斗地主打老财，而我们却袖手旁观，过后，有个风吹草动，我们好说：瞧，我们清白无辜。弟兄们，这样做是不公道的。"

"那我们怎么办才好呢？"一个女人问，"我们烧谁的房子？"

"烧克勒巴什的！他家大业大，一个星期也烧不完。"

"为什么要烧我的家？我算什么，是地主吗？还是烧马雷什的吧。"

约维察·马雷什在村里开酒馆。他不是本地人。他舅舅是这个村的，他舅舅死后，他从城里迁到本村，并且开了

个酒馆。他发了大财，很多人都欠他的债，所以大家都恨他，骂他。

“这也是个主意！”

“好像昨晚我们不是这样商量的。我们的决定是搞别的。”我的表哥帕里克说。

“对。我们不是那样说的。”皮奇克说。

“我们应该按我们事先商量好的干。我们不能乱来。”

他们的声音为人群的嘈杂声所淹没。大家急不可待，要求立即行动。

“这样搞不好。”伊万·岑楚说，“还是先搞地主，把地主先解决了。”

他大声疾呼着，但他的声音也被人海的喧嚷声淹没了。

因为马雷什的酒馆离村公所只有几步远，所以人群一下子就到了他的酒馆。这么多的人来他的酒馆，真使酒馆掌柜高兴。因为村里有好几个酒馆，有一个甚至就在路边上。

“请进！你们喝点什么？”

“哼，”吉瓦克说，“我们不是来喝酒的，是来革命的。”

“革吧，弟兄们，为什么我们不革呢？我也赞成革命。让所有的地主都见鬼去吧！……”

“是呀，我们就是到这儿来革命的。”一个愣头愣脑、缺点心眼的人说。

“什么意思？”

'你听着，我们是来揍你的，还要烧你的房子。"

'什么？你们发疯了？你们为什么要打我？为什么要烧我家的房子？"

"因为没有其他地主了！……"

"乡亲们，我不是地主，我是你们的人。和你们一样，我的脚上穿的也是农民式样的鞋。"

"如果你是我们的人，"贝什库说，"为什么你睡软床，并且和你太太吃葡萄干？"

"如果你是我们的人，"伊利耶·格斯卡努尔说，"为什么你穿的衣服和村文书的一样？"

"如果你是我们的人，为什么赊给我们东西时收那么高的利息？"矮小的兹弗卡大婶在人群中朝酒店主喊着。

马雷什明白了这些话的意思。

"乡亲们，瞧，我明白了你们的来意。不过，我同你们一无冤二无仇，我没对你们做过什么坏事。"

"你也没做过什么好事。"人群中有人嘟囔着。

"我是赚了你们的钱，但是，做生意只能如此，总要想办法别亏本而且还要赚点钱才行。你们现在想放一把火，好让人远远地就能看见。我们可以商量商量，琢磨琢磨看今天夜里该烧谁的房子。"

"我们就烧你家的房子！"

"好，好，烧我家的。我不怪你们，但是，为什么要烧我家的房子？你们的意思是让别的村看到我们村也烧起来了。那好吧，我院子里有一垛麦秸，今天夜里把它点着。你

们点火，我们大家提着水桶站在周围，以防火势蔓延。这样做好不好？”

“好。”克勒巴什松了口气说。

“这样做不行。”迪察·乌耶说。“最好你做点别的事。”

“做什么？”

“把我们欠债的账本交给我烧掉。”

“老兄，交给你，为什么不交给你！……”

那个二愣子态度也变软了，说：

“那我们喝点什么来庆贺庆贺？”

“你们想喝什么？”

“来一大桶葡萄酒。”

老板娘和伙计帮着马雷什急忙把一大桶酒搬到酒馆门前。

我父亲、帕里克、皮奇克、达维德·弗洛罗尤老爹和他的七个儿子，还有蒂察·乌耶、利什库·斯腾加丘、岑楚和乌杜杜伊，他们站得远远地瞧着这些人胡闹，他们希望这些人自己能清醒过来，但他们却越陷越深。

有几个人嘴里咽着唾沫走近酒桶，伸出手去拿吝啬鬼老板娘用木托盘端来的酒杯。这时，眼明手快的兹弗卡大嫂正站在这些见了酒就眼红的人群和酒桶当中。兹弗卡大嫂围着黑围裙，穿着黑衣服，蒙着黑头巾，她脸色蜡黄，连嘴唇也是黄的。她那双由于在严冬死去了孩子而哭得干瘪无神的眼睛突然明亮起来。好像她那矮小的身躯里一下子燃起了一团熊熊烈火，这团火使她热血沸腾，头脑清醒，全

身充满力量和勇气。她举起双手，急忙上前把人群从酒桶旁边推开，大声喊道：

“往后点，不争气的东西，走开。地主老财的走狗用这么一小桶酒就把你们迷惑住了。你们男子汉大丈夫来这儿就是为了喝上一杯酒？你们真不害臊！……去冬，我们的孩子饿死了，没有任何人帮助我们。现在，你们看，这个吝啬鬼，这条老狗白让你们喝酒，这不是酒，这是马尿，是毒药……而你们还乐意接受。瞧，我怎么来处置这个吝啬鬼的施舍。呸！呸！”

然后，她往打开盖子的红葡萄酒桶里连吐了两口唾沫。她觉得还不解气，于是，她弯下腰又在路上捺起一摊新拉的牛粪，扔进酒里，接着又把狗屎、土坷垃扔了进去。后来，她在酒桶里洗了洗手，用黑围裙擦了擦。

“如果你们还想喝的话，现在去喝吧！……”她转身朝着站在旁边吃惊地捂着嘴的女人们喊道：

“你们还傻站着干吗？快过来，帮我把这臭酒桶推倒。”女人一齐上来帮兹弗卡大嫂的忙。她们使劲地推了两下，把酒桶推倒，酒哗哗地流向人群，酒桶也散了架，酒渗进被春风吹干了的土地里。风飕飕地刮着，吹得槐树梢东摇西晃，吹得屋顶上的木瓦片吱吱响。

“这女人真厉害。”人群里有人小声说。

“酒店老板溜了，他老婆也溜了。”

“他们拉下了百叶窗，插上了门栓。”

“让他们自在去吧！”迪察·乌耶说，“现在不是跟酒店主

算账的时候，以后有时间跟他们算账。我们跟地主老财算账的时候到了。虽然我们村里没有地主，但是，我们在三四个地主庄园干活：在伯内亚萨，我们给瘸腿地主格拉西耶干活，我们被迫给他摘葡萄时，他给我们戴过兜嘴儿；在贝利托里，我们给戈古·克里斯托福尔干活；在克尔里加齐给斯塔泰干活；在瑟卡拉，我们给上校皮耶纳鲁干活，他的管家菲利普·皮西库让我们深耕地，并且用鞭子把我们抽得皮开肉绽。我们这儿有的人甚至还到奥尔特河附近的萨耶列庄园干活。我们要跟五个地主算账。走，我们拿起大棒去找他们算账，把他们的房子放火烧掉。”

“对，就得这样做。”这时，群情激昂，人们紧握大棒，异口同声地说。

“地主叫宪兵逼我们去干活。”

“他们强迫我们先干他们地里的活。”

“他们像对待贼一样，动不动就把我们揍得死去活来。”

“戈古·克里斯托福尔地主把我的女儿叫到他家，被他戏弄了。”

“皮耶纳鲁上校三月份把冻坏发霉的玉米借给我们。”

“他白白榨取我们的血汗。”

“摘葡萄时，瘸腿地主还给我们戴兜嘴儿。”

“收租子时他们还捣鬼，多收我们的粮食。”

“他们放高利贷，让我们借一还五。”

“地主吸干了我们的血。”

“他们把发霉的玉米卖给我们，却让我们交好玉米。”

“圣诞节时，他们吃的是我们的猪肉。

“地主要我们的鸡蛋，而且还一个一个地用圈量。”

“地主老财不是人！”

“他们是狗！”

“是疯狗！”

“把他们打死！”

“烧他们的房子！……”

“把他们斩草除根！……”

“豁出去干！……”

“要是我们大家齐心协力，准能打倒他们！……”

“统治者杀不绝我们，除非把全国人民都杀死。”

“地主老财是少数。”

“人少，但个个吃得又肥又胖。”

“因为他们吸的都是我们的血。”

人们义愤填膺，前扑后拥。

“去吧！我们现在就去！”

空气里散发着酸葡萄酒味、烟灰味。村公所里空无一人，文书躲起来了，布布列泰村长也躲起来了。以往敲着鼓挨家挨户收税的税务员约尔古·格代亚骑上马，绕开大道，从庄稼地逃往图尔努。

有钱的人吓得胆战心惊。我的表哥尼古拉·迪莫泽尔吓得摘下了礼帽，第一次看见他戴上普通毡帽去邮局上班。这顶毡帽是他从外号叫“扇风耳”的弟弟扬库那儿借来的。他老婆波莉娜拉上窗帘，躲在屋里，不敢出门。

“尼古拉，农民造反了。他们要杀我们！”

“为什么要杀我们？”

“我不知道为什么。反正要杀我们！……”

波莉娜头上裹了块湿毛巾，躺在床上装病。

这些情况是从我表哥尼古拉·迪莫泽尔的妈妈——迪娜姑姑——那儿听来的。迪娜姑姑天一亮就到我家来了。

人们围在蒂察·乌耶、利什库·斯腾加丘和杜米特鲁·帕里克周围，喊着：

“我们去吧！……但问题是先从谁那儿开始？”

“我说先到克尔里加齐庄园去，因为那儿离我们比较远。然后，我们再返回来到伯内亚萨找格拉西耶地主算账！”

“走，到克尔里加齐庄园去！……”

到克尔里加齐庄园需要经过两个村庄。因为村连着村，两村间的距离不过几百米，所以步行半小时就到。一条弯弯曲曲的公路穿过这几个村庄。如果人们有急事，可以直接翻过山岗，下了坡，穿过戈尔甘，然后再翻过一个岗子，就是克尔里加齐。

蒂察·乌耶走在前面，后面是帕里克、岑楚、桑特罗坎、茨格默耶和乌杜杜伊，他们后边还有其他人，全村男女老少都跟来了，男人在前，女人在后。

乌耶对他老婆弗洛雷亚说：

“女人家，你跟着我干啥？”

他想让她回家去。他妻子却皱着眉头说：

"我是跟你来的吗?我没跟着你，我也是去革命。我不是人吗?既然我们一起下地干活，现在也应该一起斗地主!……"

"说得对!"女人们大声嚷着。

"我们离你们远一点儿,但还是跟在你们后边。到地主家就用得着我们了，我们可以帮你们忙。"

我们这些孩子们走在大人当中。

瞧，伊昂哥哥和他的朋友阿文德雷亚、迪尼克和伊斯帕斯已经翻过山岗，跑到前边去了。我们这群孩子跑去追他们，很快到了山岗上。从岗上望去，闹暴动的村子就在我们眼前。我们昨天晚上就看到这里起了大火，但是，烧的只是麦秸。我们加快脚步，到了村里，随后大人们也赶到了。人们聚集在地主宅院的门前，吵吵嚷嚷。

地主的院子四周是高高的砖墙,高大的铁门紧闭着。地主的家人个个端着枪站在里面，克尔里加齐村的人对他们骂个不停。

我们奥米达村的人也混到克尔里加齐村的人中间，这样我们人更多了，力量更大了。

"喂,快开门，我们要进去找地主!"

"地主不在家。"

"你们把大门打开!"

"我们就是不开。"

"那我们要砸门了。"

"你们敢靠近门,我们就开枪。"一个沙哑的声音从门里

传出来。

“你们要是开枪伤了我们的人，我们就把你们宰了。”

人们从村公所的院子里找来一根大木柱子，把它放在大门前。十个人抬起柱子，倒退几步，然后用力向前猛撞大门，撞得大门的合页咯吱吱直响，但门还是打不开。

“再来，一，二，三！………”

门撞歪了。又过来几个人帮着撞，女人们也上来了，就连矮小的兹弗卡大嫂也不甘落后。

杜米特鲁·帕里克表哥的老婆玛丽察大嫂也上去帮着撞门。

“来，再用劲砸呀！……”

大家抬着木柱不断地用力撞着大门。门咔嚓咔嚓响着，门栓掉了，门撞开了。三四个家人拔腿就逃。人们追上去，揪住一个扣着猎枪的家伙，用木棒把他打翻在地。人们踩着他的身子过去，男女老少一齐往里拥。

地主的房子用石灰粉刷得很干净。我从未到这儿来过。窗子很大，比我们学校的窗子还大。一道石头台阶通向屋门口。我们向前冲去，推开屋门，进了房间，见什么砸什么。

有几个人冲向牲口棚。牲口棚很大，拴着好多牛和马。

人们把一束束点着的麦秸塞进屋顶。牲口棚的阁楼里装满了干草，人们又放火烧干草。干草、屋顶都烧起来。偌大的牲口棚一下子被大火吞没。刮着风，风从东边刮来。火花、火焰和烟雾直冲云霄。风越刮越大。大火被风吹倒，火

舌舔着地面。从牲口棚里传出了凄惨的牛吼和马嘶声。

这时，一些人恍然大悟，向牲口棚门口冲去。他们打开门，牲口棚里一片火海，不时地钻出一匹匹身上起火的马。马先是发疯似的在院子里打几个转，然后晃晃悠悠地朝人群走几步，便栽倒在地。皮烧得嗞嗞响，烧到肉了，烧得马嘴在颤抖，猛一蹬腿，不动了。我望着躺在我身旁的这匹马，看见它直翻白眼。它的皮肉烧焦了，肚子烧得鼓鼓的，像刚从烤箱里拿出来的一样焦黄。闻到一阵呛鼻子的糊味。地主的正房也烧着了。

"你们看看，"卡拉瓦内齐村的一个高个子、满嘴胡子的人凑过来喊着，"可别有人烧死在屋里。"

"里边没人。一闻到烟味就都跑出来了。"

一个男孩披上一件长过膝盖的灰上衣。他瞧瞧自己光着的两条腿和脚，再看看穿在身上的那件灰衣服上闪闪发光的扣子，然后不停地抚摸着衣服，傻里傻气地说：

"今天我也成了地主。我身上穿的是地主的衣服，是地主的……"

"当心别沾上地主的恶习！……"

这个男孩走近熊熊燃烧的地主的房子，脱下那件上衣把它扔进火里。

"你怎么了，为什么把衣服烧了？"

"与其穿地主的衣服，沾上地主的恶习，倒不如干脆光着身子。"

他的确衣不遮体。他的衬衫上补丁摞补丁，衬衫外面

套了一件褪了色的线衣，背上和胳膊肘上全是大圆窟窿。

斯塔泰·潘塔齐地主的牲口棚、牲口和房子在燃烧。

地主的家人不见了。各村还没动起来之前，地主就进了城。冬天，地主呆在城里的时间比呆在庄园的时间还长。

地主的管家不见了，保镖也不见了，地主的老婆也已无影无踪。他们都逃之夭夭，好像钻到地里去了，当然，他们真的入地倒也好。

蒂察·乌耶把人们召集在一起，说：

“我们已经革了命。乡亲们，我们现在回家去，再商量商量，看看下一步怎么办。……”

我们回家了，克尔里加齐村的人仍在继续革命。

电话线一段一段地被切断。我们爬上电线杆，用石头把瓷瓶砸碎。没有任何人让我们这样做，完全是自发行动，我们觉得应该这样做。起义之前，我们就经常打碎铁路沿线的电话电报线上的瓷瓶，当时我们甚至还比赛看谁在一天之内砸得最多。那时，我们是背着宪兵和养路工干的。现在，铁路上既见不到养路工，也看不到宪兵。

街上聚集了一大群人。我们帮他们烧了克尔里加齐村地主的房子，感到真痛快！但也有一件事使我们懊丧。我们得知，当我们烧克尔里加齐村斯塔泰·潘塔齐地主庄院时，在伯内亚萨，虽然有宪兵重重把守，人们还是放火烧了瘸腿地主的家，但令人扫兴的是，他们也没抓到地主。他们只逮住了管家奥普雷亚·克楚伊·斯特勒姆布，并且让他

见了阎王。如果可能，他会在阴间给大鬼小鬼也戴上兜嘴儿，但这是不可能的。太阳下山了，天空映得通红。远远近近的地主庄园都在燃烧。

一直到深夜，我们才平静下来。伊昂哥哥从克尔里加齐村的地主家带回来一个犁铧。虽然犁铧很重，但他还是翻山越岭把它抱回来，拿给爸爸看。

“爸爸，瞧我拿来的犁铧多棒！是纯钢的。如果把它安在咱们家的犁上，耕多少地也不怕。”

“你这傻小子，没看见这犁铧太大了？这是地主用的犁铧，安在咱家的犁上不合适。”

我哥哥还是硬要把犁铧往我们家的犁上安。还是爸爸说得对，犁铧太大，安不上去。哥哥白费了那么大的劲把它抱回来。

“爸爸，这犁铧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要不，你在院子里找个地方把它埋了，也许以后我们用得着。”

我哥哥拿了一把铁锹，在院子里挖了个坑，把犁铧扔进去埋上，还盖上了一层浮土和麦秸，好不让别人知道。

“孩子他爹，”我听到妈妈说，“你以为起义完了就没事了？地主会叫来军队，活活把我们杀死。”

“也许会这样。但是，我们不起义就没活路！为了土地，各村才起来造反。我们必须打倒地主和他们的狗腿子，不然我们就活不下去。你没看见我们家有多少张嘴要吃饭，而我们又没有东西给他们吃？”

我们家有十二口人，全家挤在一张小圆桌上吃饭。在桌子中间，摆着一块玉米软糕，妈妈用线绳划成片，我们每人吃对着自己的那一片。妈妈端来一大碗葱花汤，我们合不上每人一把勺，我就和埃万吉莉娜姐姐用一把小勺喝汤，我喝一口，然后把勺子递给她，她喝一口，再递给我，我们就这样轮流着拿勺喝汤。

我们村里有的人家一户八口人仅有一把勺，喝汤时，只好一个一个地往下传着喝。人们都称我们是小康人家，因为我们家有四五把小勺。

"但是，"妈妈说，"你们以为把地主杀死就万事大吉了吗？当然，可以把抓到的杀死，但是，那些跑掉的地主怎么办？他们会带着大兵卷土重来的。"

"我也想到了这一点。"

爸爸脸色阴沉，他今天参加了暴动，明天他还要去放火。

黑夜沉沉。

"我们先睡觉，走着瞧吧。"

人们都睡下了。守夜的人在街上来回巡逻，他们知道大家都睡不着，因为不停地听见吱吱的开门声，人们不时地出来细听有没有反常的动静，但是什么也没听到。只有一处处的火光闪闪发亮，这是地主的庄园在燃烧。

上面，寒冷洁净的天空中挂满了星斗。这些星斗像无数只明亮的眼睛注视着人们。

在多瑙河与奥尔特河沿岸，以及两河的汇合处，直到北边的斯勒维泰什带，到处都有我们家的亲戚。我们与多瑙河那边的亲戚来往不多，与奥尔特一带的亲戚经常见面。奥尔特河两岸有许多灌木丛和树林。

秋天，我们有时到奥尔特河一带去买树枝，然后拉回家来。其实，树枝不是我们花钱买的，我们从来没有钱。现在，爸爸坐上车，我也跳上车坐在爸爸旁边，我们一起到萨耶列去。松软的道路穿过收割后的庄稼地和玉米地。傍晚，我们便到了奥尔特河的树林边。爸爸对守林人说：

“让我装一车树枝子吧。”

“装吧！”

一派深秋景色。我们在车旁点起一堆火取暖，烧老玉米。吃过烧熟的老玉米，喝了水，然后就躺下睡觉。爸爸怕我着凉，让我到车上去睡，给我盖上毯子。爸爸抽了几支烟，然后把帽子往下一拉盖住耳朵，又裹上大衣，蜷缩在篝火旁睡了。拴在车上的牛跪着卧在地上，我听到牛在倒嚼。

我们在林中的一块空地上过了一夜。风在我们周围的树林里呼啸着，树上的小鸟唧唧喳喳地叫个不停。我们四周是一片七扭八歪的高大树木，下边长满了灌木丛，是绿蝎虎、四脚蛇、田鼠、野兽出没的地方。

夜间，森林里显得格外寂静。透过灰蒙蒙的夜空，我好像看到了幻想世界，其实看到的只不过是在头上慢慢移动的天空。

天刚破晓我就醒了。是森林中此起彼伏的尖叫声把我从梦中唤醒的。秋天，地上的草已经变黄，而且很湿。我光着脚在草地里蹚来蹚去，草上的露水把我的两只脚洗得一干二净。然后，我又用双手在草上来回蹭，手也干净了。灰色的天空开始呈现出桔黄色，然后渐渐变蓝，越来越蓝，在这湛蓝的天空中，一轮红日从东方冉冉升起，它那洁净的圆脸好像在升起前也在挂满露水的草地上洗过一样。

守林人骑着马挎着枪在巡逻，他认识我爸爸。他指着一片不成材的树说：

"图多尔，你瞧这些树，你帮帮我的忙，把这些树砍倒，砍下来的枝子你都拉回家去好了。"

"太感谢你了。"

"你给地主送的鹅带来了吗？"

"带来了。"

"交给我吧。"

守林人拿着鹅走了。

爸爸开始从树下砍。斧头深深地砍进树身，碎木片四处飞溅。听到轰的一声树倒下来时，我便赶紧躲开。然后我骑在倒下的树上，用爸爸给我带来的小斧头砍树枝，随后再把树枝抱到车旁码好。

白天我们就是这样度过的。

爸爸还对守林人说：

"基察，你到我表弟格布内亚那儿去一下，告诉他我在林子里，让他来和我们见见面。"

爸爸的表弟带着斧头来帮爸爸砍树。他们一见面就叙起家常。

特基察·格布内亚表叔向爸爸打听他多年没来往过的亲戚们的情况。爸爸对奥尔特河谷一带的亲戚有所了解，谁死了，谁和谁成了亲，他们各家生了几个孩子，他都知道。

"伊奥瓦也死了。"

爸爸和特基察表叔开始谈起我的另一个表叔伊奥瓦·格布内亚。

我去找鸟窝，上树去掏鸟，窝里是空的，因为已经深秋了！……小鸟已长了翅膀飞走了。它们飞进森林，飞向世界。

从去年以来我没再见过特基察·格布内亚表叔。爸爸也没和他见过面。好像奥尔特河就在我们旁边，要去就去！可是要去也只能一年一次。

我们家的狗叫着，邻居家的狗也叫了，狗都活过来了。牲畜死了，人们把它们扔到村边，闯过冬天的狗美餐了一顿。有人在敲门，爸爸出去开门，他把客人领进屋。

"孩子他妈，快把灯点着。"

特基察·格布内亚表叔把羊皮袄脱下放在床上，然后在床头上坐下。

已是深更半夜了，我们这些孩子从被子里伸出头来，没有一个人能睡得着。妈妈、爸爸也都睡不着，就连我那个在大白天站着就能睡着的睡虫伊昂哥哥也没有入睡。

"特基察，出什么事了？"

特基察·格布内亚表叔比爸爸年轻。

“不好了，图多尔大哥，我是来你们这儿避避风，奥尔特河一带闹翻了天。”

“怎么回事？”

“暴动了！你们这儿也干起来了？”

“在克尔里加齐也干起来了。明天，瑟卡拉村也要起来。前天晚上我们看见奥尔特河一带起火了。”

“是呀，我想从克拉约瓦都能看见，你们这儿怎么会看不见！……我好不容易才脱了险，奥尔特河谷那边闯了大祸。”

“说说，情况怎么样？”

妈妈从外屋拿来一大块玉米糕。

“你还没吃东西吧，特基察？”

“玛丽亚大嫂，我没吃，从前天起我就一点东西也没吃。”

妈妈在床头上铺了一块餐布。

“喂，你们把腿蜷起来！”

妈妈还给表叔拿来葱头和小盐罐。表叔用手掰开葱头，一片一片地蘸着盐，嘎吱嘎吱地吃起来。

葱头可真辣！辣得我睁不开眼睛。可特基察·格布内亚表叔的眼睛不怕，他吃了一口又一口，边吃边说：

“我们看见奥尔特河对岸起了火，我们便派一个人骑马去那儿打听消息。日加尼耶家的小子不慌不忙地去了。他看见列乌村的人暴动了，他们杀死地主，放火烧了地主的

宅院。我们听说奥尔特河对岸很多村子的人都暴动了，他们把地主杀死，不愿意再当奴隶了，而要成为土地的主人。日加尼耶家的小子骑马飞跑回来，他穿过村子扯着嗓子喊：

"'嘿！革命啦！革命啦！我们去杀地主！别的村子，像我们这样的人都把地主杀了。要是我们今天不起来杀掉我们村的地主，奥尔特河那边的人就会过来杀掉他，从而占领地主的庄园并把它分掉。'

"就该起来造反。常言说得好，滴水汇成河，人多力量大。我们早就想干了，但是不行。还要等待，等大家都起来。因为，即使一个村造了反，统治者用大炮就能把它夷平。如果全国一下子都起来暴动的话，那就不同了。图多尔大哥，你知道我们那儿的地主吧？"

"我好像听说过。"

"他势力很大，大部分时间住在布加勒斯特，我们管他叫扎戈里齐先生。只有算账时这个家伙才来庄园，他那个当军官的儿子倒常来庄园。哎，不扯他了。……我们聚集在村公所，挤得水泄不通，心急如火，我们再也不能等了。日加尼耶家的小子是傍晚把消息带回来的。地主的院墙是用石头砌的，一个橡树大门，家里养着几条狗，凶似豺狼。这些狗一见生人，就扑上去乱咬，像凶猛的野兽一样把你撕个粉碎。地主的院子里有一盏大罩子灯，把院子照得通明。我们商量好夜黑动手。等到傍晚，又等到天黑，黑夜总算来到了。漆黑的夜伸手不见五指。我们大约有两百人聚集在村公所。我想去地主家，可又不想进去。这时，扬

库·达金来了。他是达金家的小子，这个人你认识，人们叫他疯子。其实他不疯，就是愣，什么都不怕。跟他一块来的还有迪努·丁卡、伊昂·吉姆帕利亚……当时，聚集在村公所的还有我们的老婆和孩子。吉姆帕利亚这小子爬到村公所院子里的一个锯木材的架子上，大声喊着：

"'我们到地主家去放火！地主不在家。我们要是在这儿能逮住他，早就把他杀死了。我们去逮他的管家。我们去把斯特凡内斯库这条恶狗杀掉。我们必须暴动。有人不去吗？不去的站出来。'

"除了吉姆帕利亚的喊声外，还听到德尔茹的喊声。你可不知道德尔茹这个人！……村里人就数他高，真是膀大腰圆。"

"我怎么会不知道，我和他一块在骑兵部队服过役，他那个块头一骑上马背，就把马压出个屁来。"

"'哪几个不去，嗯？谁是胆小鬼？要是让我看见谁落在后边，我就砸烂他的脑袋。跟我们来！……快，跟我们来！'

"他们打头，我们跟在后面沿着弯弯曲曲的狭窄街道前进；总有一些人溜号。尽管如此，到了地主家还有一百五十人，而且不包括妇女和小孩。我们像打仗一样靠墙搭起人梯，有几个人踩着我们的背爬了上去。他们把达金举到上边，他翻墙跳了过去。随后，人们紧接着扔过去一根棍子，达金就势一把抓住它。他的首要任务是打碎罩子灯，可是不等你爬竿灭灯，狗就会把你咬死……

"他抡起棍子猛击狗嘴，狗被打得惨叫，但仍不后退。

达金抡着打狗的棍子朝灯那儿冲去，他打碎了灯罩，灯被打翻熄灭了，地主的院子里一片漆黑。我们又有几个人拿着大棒翻墙跳了过去。我们一边打狗，一边冲向大门口。我们把门打开，大家一拥而进。首先向屋里冲去，我们必须这样做。那些佣人惊慌失措，拔腿就跑，我们和佣人无冤无仇，让他们翻过篱笆躲进森林，滚他们的蛋吧！……我们四处寻找斯特凡内斯库。可是，活见鬼！他头天清早从电话里一听到风声，天一亮就进了城。我们在一间卧室里找到了他的残废妻子。她身穿薄衬衫躺在床上，三个孩子围着她——三个女孩：吉卡、西卡和米莉卡。太太哭天喊地，几个女孩吱哇乱叫。吉姆帕利亚家的小子抡起木棒要打，我拦住了他。

"'别，吉姆帕利亚，'我对他说，'难道我们来这儿是为了杀妇女和孩子的吗？冷静些，笨蛋！……我们干吗要乱杀人？如果地主在这儿落到我们手里，早就把他杀了，对斯特凡内斯库也是如此。可是对这个残废和她的孩子，没有必要去玷污我们的双手！……'

"'说得对。'德尔茹说。吉姆帕利亚朝这个太太啐了口唾沫，转身走了，人们也都跟着他出去了。

"我让我老婆把管家的女人送回村里。我老婆把这个女人弄进停在那儿的一辆车里，送到一个护林人那儿，让她躲起来。感谢上帝，我为人行了点善，救了四条人命。这算是做的头一件事。第二件事没有办成，倒惹了祸。我们烧了宅院和牲口棚。放火烧宅院之前，我们先打碎了玻璃，

我们找到了一些盘子、碟子，女人们便争先恐后地去砸。我们还烧了草料房和粮仓。高大的粮仓装得满满的看不见顶，而村里的人却受苦受累死于饥饿之中。大火直冲云霄，这你看见了！……

"地主的院子很快就化为灰烬。我们砸开地窖，你知道特纳索尤吧，就是那个矮胖子，走路蹒跚，像只鸭子。特纳索尤偷了三只鸭子。倒霉的特纳索尤就偷了三只鸭子，三只，图多尔大哥，你听见没有？我们干完了革命，便等待着，我们也不知道等待什么……也许是等着大学生来给我们分地主的地。可是，来的不是大学生。昨天早上，我们正三三两两地聚集在街上，忽然看见地主的儿子、骑兵队长阿法纳齐耶·扎戈里齐从山岗上下来，后面跟着背卡宾枪的骑兵队。他们手里还晃动着标枪，密密麻麻地朝村子飞驰而来。你知道，当骑兵队冲过来时，在路的右边，就是勒杜库家的小子伊利耶家。他进城打短工，秋天，他带着挣的钱回家来。他决定搬出原先住的地窖式土房，也在平地上盖一间像样的房子住。秋后，他打好了房架，也上了檩和屋顶，现在只等砌墙抹墙了。伊利耶·勒杜库根本就没参加起义。骑兵队冲下来时，他正骑在房架上钉木瓦条。阿法纳齐耶·扎戈里齐骑马跑过来。他停下马，便向伊利耶瞄准开枪。伊利耶像驴打滚一样从房顶上滚下来，栽到院子里，鲜血淋淋，缩成一团。听到枪声，她老婆便走出地窖。开始，她并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后来她才看见了血泊中奄奄一息的丈夫，又看见端着枪站在街上的阿法纳齐耶·扎戈

里齐。伊利耶·勒杜库的老婆和他的四个孩子一齐朝死人扑过去，孩子们哭喊着：‘爸爸！爸爸！’他们一边哭，一边摇晃着，每个人都沾了一身鲜血。他老婆疯了似的向阿法纳齐耶·扎戈里齐冲去：

“‘你打死了我丈夫！你打死了我丈夫！让雷劈死你！……’

“骑兵队长举起大刀向伊琳卡砍来，正砍在她的脸上，脸被砍了个大口子。女人倒下了，然后被拖进地窖，在伤口上放了点面粉，血止住了，但刀痕却永远去不掉了。骑兵队在街上横冲直撞，人们急忙钻进地窖，熄灭灶火，好不让骑兵队看到烟囱冒烟。骑兵队长去找村长。

“阿法纳齐耶先生找到了村长并把他带到村公所。还找来了神父，像村长一样，神父也是地主的人。

“‘把闹事的暴徒给我们列个名单！’

“村长列了单子。这个名单是他和神父一起列出来的。骑兵队和村公所的人都去抓人，他们把抓到的人赶到村公所的院子里。我躲起来，我老婆也躲起来。我设法逃出村子，连滚带爬地钻进森林。逃进森林后，听守林人说，他们把扬库·达金吊在村公所前的灯柱子上，骑兵队长让骑兵们打他。

“‘你们用木棍狠狠地给我揍他！’骑兵队长说。

“‘队长先生，我们不能打他，’骑兵们回答说。‘柱子上捆着的那个人是我的堂兄弟，我们都是普洛皮村的，我们两家紧挨着。我们怎么能打他呢？！……我们不能打他。如果

我们不是军人的话，我们也早闹革命了……我们决不比蒙德拉的人熊！……'

"'对，就是这样。'

"扎戈里齐队长是在这个村子里长大的，住的时间并不短，村里人他都认识。他经常到庄园来，从没碰上不愉快的事，村里人也从来不找他的麻烦。尽管村里人有时也有不满，但从来不敢像现在这样说话气粗，而且还竟然拿起大棒搞暴动。这个变化太大了，这是他从未想到的。人们一下子翻了脸，语言也变了，像是变成了另一种人。他已认不出他们了。暴动，他考虑过，别人也像他那样考虑过，必须用军队把暴动消灭，因为军队总是服从命令的。队长扎戈里齐已在军队里呆了十多年。在这十几年的时间里，他从来没碰到过有谁敢反对他，哪怕说个不字。可是现在……现在，在被军队包围的暴动者的面前，竟有两个当兵的，两个一字不识的穷小兵对他说：

"'我们不能打他。'他的命令说得很清楚，但是，士兵的回答同样也很清楚。

"'这么说你们是支持暴徒了？'队长掏出手枪向他们开了火。一个士兵先倒在地上，另一个接着也倒下了。

"队长又转向其他人：

"'你们和暴徒沾亲带故，这是你们的事。现在你们穿上了军装就得服从军令。'

"'队长先生，我们不能服从这个命令。我们和闹暴动的并不是亲戚。只有您打死的那两个士兵和他们是亲戚。他

们俩是本地人，是奥尔特人。我们大多数是阿尔杰什地方的人。不过我们想的是另一码事。我们都是乡下人，现在，这个地方所有的村庄都起来造地主的反，我们的父老兄弟也起来了。如果我们向这儿的暴动者开枪，就等于打死了我们阿尔杰什的父老兄弟。所以我们决定不朝这些人开枪，也不打他们。'

"'阿马列军士，你说的"我们"是指谁？'

"'就是我们部队，队长先生。'

"军士被打死，倒在地上。

"队长咆哮着：

"'谁的脑袋还想吃子弹？'当兵的个个在发抖，他们屈服了。对有些人来说，死比什么都可怕。队长从队伍里叫出两个士兵。他们用棍子在达金身上乱打一气，一直把他活活打死。

"队长看出这些士兵害怕迪努·丁卡、伊昂·吉姆帕利亚和德尔茹这三个人，怕对付不了他们三个。于是，他派骑兵弄来了木棍和绳索，把他们三个按倒，分别用两根木棍夹住双腿，上下两头捆好。接着又用两根木棍夹住他们的脖子，把他们紧紧捆住。你再也别想动了！然后让他们三个人一个挨一个地背朝上、嘴朝下趴在地上。接着，队长让士兵用木棒打他们，一直把他们活活打死。要是从脑袋上打，也许好受一些。可他们不是先打头。他们先用木棒打腰部，再从腰部朝上打到脖子，朝下打到脚，就这样一点一点地挨着打，简直要把他们打成肉饼。他们三个人也确

实被打成了肉饼。他们疼得拚命惨叫着，嘴都把地啃了个坑。其他的人紧紧地挤在一起，周围都是端着卡宾枪的骑兵。被打者的妻子们连哭都不敢哭。打了很长时间，被打死的人就那样捆着被扔到了村公所后院。扎戈里齐队长一共打死了三十多个人。他逮住一个就捆一个，打一个。他把断了的电话线接上，跟城里通了电话，向上校做了汇报。

"'我抓了三百个……'

"上校在电话里朝队长吼叫着：

"'我不想知道你抓了多少，告诉我你杀了多少。什么？队长，你心软了？"

"'不，上校先生，我一点儿也不心软，恰恰相反……'

"对百姓的镇压更加惨酷了。扎戈里齐队长感到严刑拷打和杀人并不足以吓倒人们，于是他带着大小军官和喽罗，由神父和宪兵领路去放火烧村。

"'你们烧了我的庄院，'扎戈里齐嚎叫着，'我要烧掉你们的房子！……'

"他烧毁了半个村子，使人们流离失所，无家可归。他把女人和孩子从家里赶出来，用大刀把他们砍死。听奥尔特河那边的亲戚说，骑兵队长还要把活下来的人弄到图尔努去。"

"现在，"爸爸嘱咐我们说，"你们不要往外去说。把听来的话说出去没有好处。还有你，特基察，你也不要再讲了。我们不能吓唬人。大家都豁出去了！我们必须把革命搞下去，不能半途而废。现在，就得豁出去干。"

天一亮，全村人都疯了似的来到村公所前的大道上。

蒂察·乌耶说："我们到瑟卡拉去，帮那儿的人搞暴动！"

格伊纳说："到瑟卡拉去干啥？我听说图尔努的大兵下到各村去镇压暴动了。我们干得还不够吗？"

蒂察·乌耶："是，还不够。我们这儿怎么会知道要来大兵？"

格伊纳："听说的。"

蒂察·乌耶："听来的多了，听来的不算数。走，到瑟卡拉去。"

全村人都听他的话。大家都认定蒂察·乌耶就是他们的带头人。

的确，传来的消息很多。消息传得飞快。好消息使人笑逐颜开。在庄园或家里没有被抓住的地主早已逃之夭夭。他们在城里躲了起来。有些胆小的乘小船过了多瑙河，逃到邻国保加利亚。他们不再回来了。托米察·布尔布克神父走出屋门来到院子，却不敢从院子往外迈出一步。

"都是胡言乱语，孩子，都是胡言乱语……地主会回来的。你们要土地？地主会满足你们要求的，孩子。等给了你们地，你们就老实了，孩子。好了，科斯蒂克，好孩子，行行好，给我到布丘克那儿去打点酒来。最好打一公升酒，孩子，一公升。"

科斯蒂克是岑楚的孩子，他瞧了瞧神父，说：

"怎么？神父，我成了阁下的仆人？"

“瞧，胡说什么！连小孩都着了邪！……”

布尔布克神父扒在栅栏上不动了。

岑楚的孩子望着满街的人群。

传到村来的不尽是好消息，也有别的传闻。有的说，军队放火烧村，当官的逮住谁就杀谁。还说，当兵的不但不愿意朝暴动者开枪，反而起来革命了。

“要是军队能拿起武器站到我们这边来，”爸爸说，“我们会取得胜利的。假如……”

人们一边听着，一边摸摸头上的毡帽，不知所措地抓抓头皮，一时又拿不定主意。

蒂察·乌耶、乌杜杜伊、皮奇克、达维德·弗洛罗尤老汉和奥韦代尼亚鼓动大家说：

“走，我们到瑟卡拉去，到瑟卡拉去！”

小个子兹弗卡大嫂也随声附和着。

我们出发去瑟卡拉村。日头刚有两竿子高时我们就到了。地主的一所院子里乱七八糟，有几个人正在整理。窗户碎了，牲口棚也烧了。

“你们这儿的人都到哪儿去了？”

“都到地主山上的庄园去了。”

地主住的庄园坐落在村子的北坡上。

庄园里闹翻了天。房子已烧了三天。粮仓也烧了。佣人的房子也烧了，人们围在四周。被抓着的菲利普·皮西库管家四脚朝天躺在庄园的正当中。

这个家伙坏透了，他经常骑着马在地里转来转去，冷

不防就用鞭梢抽人，还说：

“地要耕得深点儿，垄沟要密点儿，你这婊子养的！……”

深耕地当然好。只要耕得又深又密，地就能多打粮食。但是，只有把牛喂得膘肥体壮，犁铧又好用，那才能办到。要是犁铧的铁像车轴的铁一样，牛像只猫，那你就休想把地耕深，垄沟也密不了。能否耕深耕密，要看牛的体力如何。可是，管家菲利普·皮西库却不体谅你。不管你的牛行不行，只要你给地主耕地，就得把地耕得又深又密。这是地主的吩咐。管家必须监督人们执行。

皮耶纳鲁上校是瑟卡拉村的主人，他通常住在布加勒斯特。在这儿给他管事的有菲利普·皮西库管家和迪莫弗泰·什蒂尔布办事员。人们没有逮着迪莫弗泰，只逮住了管家，是在地主家的院子里逮住的。

菲利普管家是本村人。他老婆以前穷得叮当响，连鞋都穿不上。可现在，穿着讲究，神气十足。菲利普本人也不再穿农民鞋，而是换上了大皮靴。他的穿戴都是地主给的，而且全是半新的。他早已忘本变质，视乡亲为仇人。在地里，他见人就骂，遇人就打。他不只是在地里打人，而且在打谷机旁，在村子里也是碰上谁就打谁。

“喂，克尔斯泰亚，你今天为什么不下地？”

“菲利普先生，我的牛病了。”

管家不相信，扬起手里的皮鞭就朝克尔斯泰亚抽去。克尔斯泰亚嚎叫着，一直被打得叫不出声为止。

菲利普管家有两个兄弟和两个内弟，但他六亲不认，对他们骂得更凶。

“喂，你们知道，我的上帝是谁？我吃的面包是谁给的？是地主老爷皮耶纳鲁上校给的，你们听见了吗？”

“我们听见了！”

人们在地主宅院里把他团团围住，并且一齐向他猛扑过去。这时，他正在地主的场院里，骑着马，手里拿着鞭子，耀武扬威。

“怎么啦？你们要干什么？你们烧了地主的宅院。我看见了，我已经把你们的名字记下来。明天，住在布加勒斯特的上校就会带军队来。他会像打疯狗一样，开枪把你们打死。像打疯狗一样……你们都疯了！……”

“你还在嘲弄我们，”乌楚珀尔姑夫大声喊着，“揍他！……”

人们举起叉子、木棒和斧头。

这种情景是管家以前难以置信的。现在他信了。他拚命地用鞭子乱打乱抽，但谁也不再怕他的鞭子。人们揪住他的腰部，把他拽下马，人们本想用木棒打死他。

“不，不用木棒打，也不用拳头打。我们用别的办法处死他！”乌楚珀尔姑夫说，“我有办法……”

乌楚珀尔姑夫一说有办法，人们就都听他的，因为人们知道他的点子多。

“弟兄们，把他按住！……”

人们把他按倒在地，推到泥浆里。我姑夫到仓库那儿

拎来了一个锋利的犁铧。

地主的宅院里有一个铁匠铺，吉卜赛人在铁匠铺里修补犁铧、耙和收割机。每年春天化雪前，吉卜赛人就要在铁匠铺里给地主磨数百个铁犁铧。

姑夫拿来一个新的锋利无比的犁铧，这是一个中等铁铧。

“你以前总是要求我们：‘地要耕深耕密。’管家，你说过吧？”

管家吓得脸色蜡黄，被按在地下一句话也说不出。

“犁沟要又深又密！你瞧，现在就给你耕出你要求的又深又密的犁沟。”人们一下子明白了，不禁打了个冷战。在场的人当中，没有一个人没挨过管家菲利普的打和骂；村里没有一个妇女没被他调戏和污辱过，找不出任何一个小孩脸上没挨过管家的鞭子抽。

“使劲按住他的手和腿！”

我姑夫跪在地上，解开管家穿的那件只有地主才能穿的上衣。然后又一个扣一个扣地解开他的内衣，以防把内衣弄坏。当扣子解到肚脐眼前，我姑夫再也等不及了，一下子把内衣撕到小肚子，接着解开腰带，把裤子退到脚尖，差点成个光屁股。他撩开管家的内衣，露出了胸部。管家的胸口上净是毛。管家老了，他胸口上的毛白了一半，但他嘴上的小胡子却只白了几根。平时，大宽腰带一系，给大肚皮遮了三分丑。现在，腰带一解，露出他那又圆又白又肥的大肚皮。

“你的肚子上有三块痣。”人群里有人说，并朝管家的脸上啐唾沫。

“干吗为他费唾沫？你心里痒痒了？”

乌楚珀尔姑夫拿起犁铧往管家的喉头上用力插下去，鲜血立刻咕嘟咕嘟地往外冒。乌楚珀尔姑夫毫不手软。他的表情十分严峻，脸黑得像泥土，双手也像泥土一样黑。他又把犁铧往深处按了按。只听见管家惨叫了一声就不响了，只是微弱地喘着气，鲜血直往外冒。跪在管家身上的那个人现在骑在他的身上，并把管家的腿拉直。姑夫双手使劲地扶着犁，犁铧慢慢地朝肚脐划去，铧刃到了肚脐，并划了过去。

“去找块玉米糕来，”乌楚珀尔姑夫大声喊着，“拿块玉米糕来。”

女人们朝大火尚未烧到的仆人吃饭的厨房跑去，跑在前头的是玛尔吉瓦拉·乌楚珀尔姑母和她的兔唇的女儿，我的表姐迪察。

女人们回来了。迪察拿来一大块玉米糕，还热呢。半生不熟的玉米糕里掺着一多半糠，颜色发红，裂裂疤疤。另一个人拿来一大罐子菜豆，并把菜豆倒进管家的肚子里。有个小孩拿着把小勺从女人们的后面赶上来，他拨开两个妇女，钻到前面把小勺插在死人的肚子里。

“让管家菲利普·皮西库也尝尝这半生不熟的玉米糕！……”

人们异口同声地说：

"管家，叫你再说'地要耕深耕密！'"

"管家，叫你再说'地要耕深耕密！'"

我们大家看着，没有一个人掉眼泪，没有人高兴，也没有人笑。

人们走开了。乌楚珀尔姑夫弯下腰，抓了一把泥搓手。泥能去掉手上的血。然后，他又在裤子上擦去了手上的泥。

人们朝村子走去。

我们也想到村子里去。

蒂察·乌耶说了话：

"喂，我看我们不要下山进村了，我们回家吧。"

我们沿着山岗上的路往家走，外祖母从克尔洛曼村到我们家来就走这条路。我们正好经过克尔洛曼村外，经过这个村的公墓。我们爬上山头，看见远处干枯的葡萄园的地沟里有一群人，足有十几个，于是我们便来到他们身旁。

"你们在这儿干什么？"茨格默耶问。

"瞧，我们做了我们要做的事。"一个正在紧裤子的人答了话。其他人浑身上下都是泥，尤其是从腰部往下沾的泥更多。

"是呀，我们做了我们要做的事。"

在葡萄园的地沟里，一个女人瘫在地上，缩成一团。她的裙子已被撕破，头发蓬乱，还沾着稀泥。在这个女人的身旁有两个吓呆了的不太大的孩子。他们淌着鼻涕倒在泥泞里。两个孩子除了眼睛里没进去泥外，浑身上下，连眼

皮上也全是泥。

“这个女人是谁？”蒂察·乌耶问。

“是办事员什蒂尔布的老婆，”其中的一个人说，“她是韦塔太太。我们和她亲热了一下。”

他们个个两眼发红，酒味冲天。我们听说，当地主庄园被烧起来时，他们看见什蒂尔布的老婆带着孩子逃出村子，穿过田野向火车站跑去，于是他们便醉醺醺地去追她。他们追上她后，就把她按倒在地沟里，便……

“你们真不害臊！不知羞耻！”蒂察·乌耶数落着他们，“你们真不知羞耻！你们就想这样得到土地吗？”

科斯塔凯·图尔图克和特勒克利耶把什蒂尔布的老婆搀了起来。女人们去抱那两个孩子，他们吓得直打哆嗦，不让抱，并且哇哇地哭起来。

基鲁·拉凯的老婆莫尔莫丽塔同情地望着什蒂尔布的老婆说：

“算了！闹革命的当儿，这种事是难免的。因为人终究不是天使。这些人都是因为喝醉了酒才侮辱了她。当时他们也不知道自己干的是下流事。可是她丈夫迪莫弗泰·什蒂尔布，我现在不提他是二地主，他年轻时，有多少姑娘媳妇被他硬按倒在草地里给糟踏了，他并没有问人家愿意不愿意，他这个色鬼就是成心奸污她们的。姑娘们没有死，最多落个大肚子。媳妇们也没有死。现在她也死不了。常言说得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我们把迪莫弗泰·什蒂尔布太太和她的孩子送到车站。

她恢复了知觉，坐上火车到城里去躲避了。

对于第二天以及随后发生的事，泥腿子们是无法逃避，也无处逃避的。

晚上，骑兵队来了，他们分成小组由军官领头分散到各个村庄。各村的村长、神父和宪兵正在开暴动者的黑名单。

人们被带到村公所，然后被逼到路沟里，从头到脚惨遭毒打。有的人当场被打死，其余的人被打断肋骨后，每八个人或十个人被成串地捆在一根竿子上。

从北面道洛班楚村和克伦杰尼村那边过来了几百个被捕的人，他们一瘸一拐地走着，胡子拉茬，衣衫褴褛，饿着肚子，光着脚。

天气仍然很凉，很冷，许多人穿的是单衣单裤，赤足光头，五花大绑地捆在一根木竿上，每根木竿上捆着十来个，从村里走过。军官和他们的喽罗拿着鞭子像赶牲口似的赶他们走。军官要是看见谁跪下走不动，就举起大刀把他砍死。

我们躲在栅栏后从缝里看着大街上穿过的人流。

"这些人是克尔里加齐村的。"图尔图克小声对我说，"我们是在斯塔泰·潘塔齐庄园干活时认识的。"

我们数着数，共有八十六个男人，除了他们，还有没长胡子的小伙子，也有比我们稍大点的半大小子。男人的

后边是一群妇女，共二十一个。她们光着脚，艰难地走着，脚上净是泥。有个驼背的老太太绊倒在地，落下了五步远。她挣扎着爬起来，可是她已精疲力尽。这时，一个军官走过来，猛地朝她腰里踢了一脚，破口大骂：

"老东西，叫你暴动！叫你革命！你这个老糊涂！……"

老太太害怕地向四周看了看，眼前看到的是被无数只赤脚——像她那两只瘦骨嶙峋的脚一样——踩得尽是坑的泥泞不堪的黑地，还有腐朽的篱笆和篱笆里边又黑又凄凉的小茅屋。她抬起头朝上看，天空乌云密布，阴沉可怕，顷刻间一场瓢泼大雨即将来临。她站起身来，东倒西歪地向前走去，她走不了多远的路了。昨天路过这儿的人，凡是倒下的，都被扔到道沟里喂了狗。

"达里耶，你瞧，有两个男人跪下了。"莫里尼克·耶普雷迟疑地说。

我看着他们。那两个男人跪倒在烂泥中，再也走不动。他们被打得鼻青脸肿，骨头也被打断，在向士兵祈求。那两个男人都长着大胡子。

"你们就杀死我们吧，杀死我们吧！我们也有男孩子在军队里，像你们一样当兵。"

士兵用手遮住眼睛不看，急忙走去。这时，一个骑兵划着十字，说：

"上帝保佑！上帝保佑！……"

另一个骑兵朝马肚子上狠狠地抽了几鞭子，锋利的马刺深深地插进了马的大腿，这时马鲜血直流，尥起蹶子。雾

时，骑兵骑着马，开了小差，朝旁边的小胡同跑去，马蹄声很快消失了。

押送犯人的军官望着飞跑而去的逃兵。然后他走近一个还在祈祷的士兵，朝他的脸上抽了两鞭子。

“你算什么军人！你也发慈悲……心软，不是军人！……”

他骑着他那匹大黄马在跪倒的老人身上来回踏了几遍，把他们踩倒在地上，然后又朝还在动弹的躯体接连开了几枪。躯体蜷缩在马路上再也不动了。这时，已下起了牛毛细雨——这是又密又急的春雨。

从齐姆尼恰传来了炮声。

“还有地方在闹暴动吗？”我问妈妈。

“是阿列克桑德里亚那边的乌杜普和格乌里奇村在打炮。那儿的人组织得好，像军队一样。骑兵一到他们村，就遭到顽强阻击。骑兵撤退后便运来了大炮。他们把村子包围起来，对着房子开炮，所以听到了炮声。”

消息不断传来，听到的各种事一件比一件可怕。道路都有军队把守。可是到了黑夜，那些打赤脚或穿补钉鞋的人在松软的地里轻手轻脚地走，谁也听不见。他们抄自己熟悉的小路到各村去串连，进村后躲在亲戚家，神不知鬼不觉。

“在贝利托里那儿，”妈妈说，“火车运来了很多士兵。地主戈古·克里斯托福尔带着军队冲进村子。军官们开枪打

死了四十七个人。昨天他们把死人埋在阿登卡塔路边的土坡上。巴尔塔瑟拉特那儿的人，被军官们扔进湖里——巴尔塔瑟拉特的湖不宽，但水很深——淹死，为的是不浪费子弹。"

我们村里也来了骑兵。他们把爸爸带走了，还带走了伊昂哥哥。女人们也被绑起来带到村公所。他们给兹弗卡、蒂察·乌耶、乌杜杜伊、岑楚、皮奇克、弗洛罗尤老汉和他的七个儿子、利什库·斯腾加丘、奥韦代尼亚、杜米特鲁·帕里克表哥及其他很多人都带上了手铐和脚镣，在村公所的墙外边打他们，打得他们直叫。军队进村后，村里所有的酒馆又都开门了。刚从托马·奥克酒馆出来、喝得满脸通红的托米察·布尔布克神父从他们面前经过时，停下来对他们说：

"孩子，我早就对你们说过，你们不要和当局斗，他们是代表上帝的旨意，那时你们不听我的话。现在，你们可尝到苦头了，孩子，可尝到苦头了。……这样也好，可以减轻你们的罪孽，孩子，仁慈的上帝会饶恕你们的。"

"神父，住嘴，你不要幸灾乐祸！"嘴被打肿了的弗洛罗尤老汉说，"真后悔前天没把你也活埋了！……"

托米察·布尔布克神父拔腿就走，他喝醉了，腿一抬就晃起来。那些还没有挨过打的人被关在学校的教室里，其中就有我爸爸。一个军士长审视着我父亲，问：

"你从革命中捞到了什么好处？"

"我出了口气。"爸爸回答说，"我总算也出了口气。我们

再也无法忍受了！……

“你偷了什么东西？”另一个军士问我哥哥。

“克尔里加齐地主的一个犁铧。”

“犁铧现在在什么地方？”

“我把它埋了。”

他们把五花大绑的哥哥狠狠地揍了一顿。然后过来两个士兵，他们跟着我哥哥来到我们家场院顶头靠杨树的地方，我哥哥指着说：

“我把犁铧埋在这儿了。”

那两个士兵把犁铧刨出后，送到了村公所。在村公所，他们用犁铧打我哥哥的头，直到把他打昏了。然后往他身上浇凉水，醒过来又打。打我哥哥的是军士长和一个军士。

军官和士兵们扛着上了刺刀的枪看守着被绑着的人们。

皮耶纳鲁上校亲自带兵从布加勒斯特来到瑟卡拉。一天早上他们就枪杀了三十七个人，其中有几个十几岁的男孩子，还有我姑夫普雷库普·乌尔班·乌楚珀尔。

皮耶纳鲁上校诡计多端。他下令吹号，把男女老少喊到街里，说什么他原谅大家，只不过要全村的人到村公所集合一下，上校有话要说。人们一到街上，士兵便逼着他们到村公所，然后把他们用铁链子圈起来。上校骑在马上，四周是军官。在上校身旁站着的是他的亲信，坎塔库津大尉。

“参加暴动的人，”上校喊起来，“都站出来。”

人们紧紧地挤在一起，没有一个人向前迈一步。

“我让参加暴动的人都站出来。没听见吗？”

“不，听见了，上校先生。”乌楚珀尔姑夫答了话，“瞧，我们就在村里开始了暴动。……”他走出人群。他头上扣着顶戴了多年的旧毡帽，帽顶已破，帽檐也磨光了。

“我也参加了暴动。”乌楚珀尔姑姑说着站在她丈夫身边。

“我也到那儿去过。”我那个长着兔唇的表姐迪察也站了出来。

军人们一拥而上。乡亲们把乌楚珀尔一家挡住。

“上校先生，这几个人吹牛，搞暴动的不只是他们。暴动是我们全村人搞起来的，因为你把全村人的血汗都挤干了。”

“哪一个说话这么不客气？往前站一站，让我看看你的脸。”

“不仅让你看我的脸，老爷，也让你看看我的背。”

拉杜·图尔库边说边走近上校。他猛地脱下满是补丁的羊皮袄，露出长满毛的骨瘦如柴的光背。

“你看看我的背，老爷，到处都是伤疤。有的是我年轻时被你打的；有的是叫菲利普·皮西库这条狗打的；还有的是宪兵打的，因为在一次婚礼上我唱了乌楚珀尔死去的那个儿子所编的歌。”

拉杜·图尔库不做声了。这时人们都望着深深刻在他

背上的条条伤疤，他在死面前凛然不惧。

“皮耶纳鲁老爷，我们每个人背上都有许多伤疤。”人们怒目圆睁地喊着，“把我们都杀死吧，反正现在我们都攥在你手心里。”

“杀死我们吧，刽子手！”乌楚珀尔姑姑叫着，“算我们这次考虑不周，下次再暴动我们就会深思熟虑了。”

“上校先生，这些人都疯了。”坎塔库津大尉说。

“他们把上帝和神圣的教堂已忘得一干二净。”米蒂察·伦切斯库神父摸着用剪刀修过的胡子说。“他们着魔了。”

士兵都是摩尔多瓦地区的人，他们都低头不语，军官便上来推搡他们。

上校气得咬牙切齿，扬起皮鞭朝拉杜的驼背上狠狠抽去，霎时皮开肉绽，鲜血直流。他一声没哼地倒下去了。

上校掏出手帕，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珠。

“大尉，点闹事人的名。”坎塔库津开始念神父开的黑名单，名单写在从教堂里的祈祷书上撕下来的一页纸上。二十个人从人群里被叫了出来，其中就有我姑夫普雷库普·乌尔班·乌楚珀尔。

在瑟卡拉村，学校和村公所之间仅一路之隔。他们把这二十个人带到学校的墙根下，让他们靠着墙肩并肩地站着。他们浩气凛然地看着上校。

“大尉，你指挥行刑队执行吧！……”

“上校先生，我看还是我和军官亲自动手吧。我看士兵们都低头不语，这样省得出事。”

“好吧。’

坎塔库津招呼军官，这些老兵油子都从队伍里走出来，大尉也跳下马。于是他们瞄准了靠墙站着的那些人。

“放！……”上校下了令。

只剩下七个人没有倒下。

“放！”上校又下了令。

又倒下两个人。

“废物！你们不会打靶了？上去，到离他们一步远的地方再开枪！……”

最后，他们终于把所有的人都杀害了。

几个女人嚎啕大哭，令人心碎。士兵们包围的更加水泄不通，谁也别想冲出去。人们被迫目睹这场大屠杀的惨状。最后一个被杀害的是我姑夫乌楚珀尔。开始从远处开枪时，子弹从他身边飞过去没打中，他大声喊着：

“你们杀死我们，还可以杀死别人。但是，全国所有受你们这些地主奴役和压榨的百姓是杀不绝的！……你上校的眼珠子瞪出来也没用！你顶多要我一条命，既然以前那种非人的生活都没有把我吓倒，现在难道还怕死吗？……”

子弹嗖嗖地飞过去，打枪的人身子晃晃悠悠，手在颤抖。

乌楚珀尔姑夫喊得更响了：

“上校，血债要用血来还。你和你的地主家庭早晚要用血来偿还我们的血债。所有的地主都要偿还血债！……”

坎塔库津气得发疯，走上去一枪把乌楚珀尔姑夫打死

了。接着，他又朝刚倒在地上的还发热的尸体连打了几枪。

人群中一阵骚动。男女老少弯腰从地上拣起土块和石子，朝上校、大尉及刽子手们打去。

一块石子打在上校的脸上，他气得脸发紫，便命令军官们朝人群开枪。这时，士兵们自动松开手，人墙出现了空隙。

“快跑！”一个士兵喊着。人们急忙跑开，枪响了，有些人跑掉了，有些人没跑掉。剩下的十七个人——八个男的，三个女的，六个小孩——嘴啃泥在地上长眠了。士兵把所有的尸体都收集在一起，然后挖了个大深坑。看得出，士兵们挖坑时心情是沉重的。在学校墙根下被杀害的和被乱枪打死的都一起埋在了村边通往图尔努去的道沟里，目的是让过路人知道，谁敢造地主的反，等待他的就是死路一条。

后来我才知道(也是从格布内亚表叔那儿听说的)，在奥尔特，当特纳索尤被问到是否偷了扎戈里齐地主的东西时，他回答说：

“我偷了三只鸭子。”

“鸭子呢？烤着吃了？”

“没有，我埋了。”

“埋在哪儿了？”

“埋在加列的水池边。”

“带我们去！”

特纳索尤把士兵领到水坑边，他们把鸭子刨出来，鸭子已经烂了，臭气熏天。扎戈里齐大尉硬是逼着偷鸭子的人吃变臭的鸭子。

特纳索尤把鸭子全吃了。

他们把爸爸、伊昂哥哥、杜米特鲁表哥、帕里克、蒂察·乌耶以及其他许多人捆在一根竿子上，弄上驳船带往图尔努镇。驳船在多瑙河上停了好几个月。在驳船上，他们还把兹弗卡、乌楚珀尔姑母和迪察表姐一直关到审讯时。

家里就剩下妈妈和我们几个孩子。她没有哭泣，并且把一切都跟我们讲了。一天晚上，当我们上床睡觉时，她把听来的有关暴动及暴动以后发生的事都讲给我们听了。

“要记住，孩子，可别忘了，以后也讲给你们的孩子听。”

“妈妈，我们不会忘的。”埃万吉莉娜姐姐说。

“达里耶，你也别忘了。要都记住！”

“我不会忘的，妈妈。”

现在妈妈的脸像黑土一样黑，两个眼窝深陷，嘴唇干裂，是被风吹裂的。

我躺下睡了，妈妈给我盖好被子。她抚摸着我的头对我小声地说：

“别忘了，达里耶，千万不能忘！以后告诉你的孩子和孙子……达里耶，听见了吗？别忘了……达里耶，你千万不能忘记！”

第六章　草

多瑙河的风吹来了乌云，乌云送来了贵如油的春雨。

已经播种并用血泪浇灌的大地，一下子变绿了。

一夜间，村子换上了新装。

没有种上小麦、谷子、稞麦、大麦或油菜的地方，长出了嫩绿的青草。

一些曾被五花大绑地每十来个人捆在一根竿子上押到城里去的乡亲们回来了。

他们被放了回来，他们个个筋断骨折、遍体鳞伤地回到了自己的家。

他们像是踩着蒺藜一样在街上走着，但是街上并没有蒺藜，是他们的脚掌上布满了脓包，脚上的皮磨破了。他们被打得腰伤骨折，疼痛难忍，双手捂着肚子。

每个村子里都有蒙着黑纱巾的女人。

并不是所有成了寡妇的女人都能蒙上黑纱巾。她们哪儿来的钱，又从哪儿一下子能买这么多的黑纱巾！……

从多瑙河又刮来了阵阵暖风，风又吹来了乌云。乌云又送来了贵如油的春雨。及时雨使大地苏醒。

无边无际的原野复活了。

看那刚钻出的嫩草，新长出的嫩叶，还有两指高的小麦，到处充满了春天的气息。

在深深地埋着被枪杀的人们的土地上，长出了青草，嫩绿的草。

第七章　熊

“姐姐，你到哪儿去？”

“我到村边的达姆①去。”

“带我去吗？”

“不带你去。”

“那我跟在你的后面。”

“你要是跟我来的话，我就把你的耳朵揪下来。”

我姐姐要揪下我的耳朵！……不会的，最多揪一下，何况我也不是好惹的，我会朝她的肋骨给她一拳。在家里，谁不依我，我就打谁。只有爸爸、妈妈我不打，当然我也不能打他们！如果一个小孩动手打自己的爸爸妈妈，他的胳膊和手会烂掉的。

每次用拳头打人之后，总要收到回礼。这倒也不坏，有往有来。因此，我的脸上满是伤疤，这些都是我的朋友们

① 村边的小房，是年轻人跳舞的地方。

用棍子打的。他们的脸上也同样布满了伤疤。我们经常相互用棍子打闹。棍子打在背上，留不下痕迹，最多是肿起来，而且一周之后就消肿了。要是打在头上可就不好办了，很容易皮开肉绽，血流不止。发生这种情况时，我们就用土或玉米面堵住伤口，因为我们没有别的药。埃万吉莉娜姐姐越来越喜欢打扮了，她常把干香草枝插在耳后的头发上。

圣诞节过去了，耶稣洗礼节也过去了。但是，春天尚未来临。

你要是在路上行走的话，雪就会在脚底下咯吱咯吱作响；要是再用脚后跟使劲踩，脚下就会出水，双脚就会湿透。

一年前，我姐姐埃万吉莉娜还是又矮又小的孩子，今秋，她满十五岁，并且突然长高了，看起来又细又高，更加苗条了。她的两眼像妈妈一样炯炯有神，还有两条柳叶眉和细长的睫毛。

“带我去达姆吗？”

“我对你说过了，不带你去！……”两颊泛起红晕的姐姐像是求雨人涂了红脸蛋一样，对着一块破镜子片照来照去，谁知她在哪儿找到的这块破镜子片！

至今，我们家还没有过镜子。妈妈从不照镜子。为什么要照镜子呢？！要看自己的脸是怎样衰老吗？我们看到就行了。

“妈妈，姐姐不带我去达姆。”

"让她自己去吧！"

"不行。"

"你要是不让的话……"

埃万吉莉娜姐姐到达姆去了。她走走停停，抓起一把雪，捏成雪球打我。

"回家去，达里耶！"

"不回去！"

"回去！"

"不！"

她过来赶我。要是她追上我的话，准得把我按倒打一顿，但我是村里孩子中跑得最快的一个，她没有办法，只好哄我：

"回家去，达里耶。今天不要跟着我。你要去达姆的话，我就打你。"

"你要是打我的话，你就太没脸了。"

"现在你要是回家的话，我给你带面包圈回去。"

"我不信，你没钱买。"

她向达姆的方向走了。我紧紧地跟在她的后面。

达姆在村边珀乌内·瓦卡叔叔家的后面，是一间没人住的、缺门少窗的小破房。

我姐姐到了达姆，我也到了达姆。埃万吉莉娜姐姐进去后，我也跟着进去了。有些比我们动作快的人早就到了。

到达姆来的都是开春要去跳霍拉舞的半大小伙子和姑娘。他们到这儿来是学跳霍拉舞的，但没有乐队，只有一

人吹笛或吹单簧管伴奏。

我们这些小孩子都是跟着哥哥或姐姐们来看热闹的。我们坐在墙边，看着他们跳舞。有些人跳起来轻盈灵巧，有些人则笨手笨脚，好像脚上拴了木墩子似的。

那些学会了跳霍拉舞的小伙子和姑娘们是不到这里来的。他们都到酒馆前去跳舞，对这儿不感兴趣。全村共有七个酒馆。酒馆店主之间往往勾心斗角，互相拆台。每个酒馆店主都希望人们到他的酒店前去跳舞。为此，他们不惜拉拢收买乐师。他们这样做是有目的的，因为人们到酒馆前跳舞就得喝酒，喝酒就得付钱。

要是哪个酒馆被选中做跳舞的地点的话，那个酒馆的老板便送给做出这个决定的那些小伙子们的领头人一桶李子酒、一桶葡萄酒、一串面包圈和一筐由山区农民用车运来的苹果。

达姆里热闹极了。

要是吹笛子的小伙子吹累了的话，大家便停下来休息。舞一停，小伙子们便和姑娘们凑在角落里拉拉扯扯，拥抱亲吻。我们馋涎欲滴，便跟和我们一样大小的女孩子们搂搂抱抱起来。这时，有一个嘴上刚长胡子的小伙子声色俱厉地对我们嚷道：

“你们这些毛孩子不害臊吗？”

“你害臊不害臊？”

“我……我是大小伙子！……”

“我们也会成大小伙子的！……”

“那是将来的事，但现在你们还小。”

天黑下来，迷雾茫茫，好像在地下某个地方有一堆看不见的烈火在燃烧。迷雾是从地下冒出来的还是自天而降？谁也说不清楚。它像是来自四面八方并且能使这痛苦的日子缩短。

学跳舞的人散了。吹笛子的小伙子吹着笛子回家了。其他人跟在他的后面，我们跟在最后边。

在达姆的前面，一辆四匹马拉的车停在路上，车上有三个小伙子。瞧，那不是哥哥伊昂的朋友阿文德雷亚吗？那一个不是韦尔代吗？另一个不是阿尔维察吗？

阿尔维察嘴里叼着烟卷靠着马车站着。他喊着我姐姐的名字说：

“埃万吉莉娜，你过来一下，我想问你点事儿。”

我姐姐停下来看着他。

“我要贴着你耳朵告诉你一件秘密。”

我姐姐朝他走了过去。我就象小马跟着母马一样，紧跟在姐姐后面。

阿尔维察没等姐姐走过去，便飞步向前，一下子搂住姐姐的腰，把她抱了起来。接着就像扔一捆麦秸那样，把她扔到车里。阿文德雷亚抓住姐姐的胳膊，她只尖叫了一声，嘴便被阿文德雷亚用手捂住了。

“妈的，你喊什么！……”

这时，阿尔维察跳上车，韦尔代使劲地抽了马一鞭子，

马便飞奔起来，车咕隆隆地响着，疾驰而去。阿尔维察从口袋里掏出手枪 朝天开火。不一会儿，马车便消失在山岗后面。

“他们把她抢走了！”我听见周围有人说，“他们把她抢走了！快，到阿尔维察家去！今晚可有热闹看了！……”

我撒腿就往家跑。

“妈妈，姐姐叫人抢走了！……”

“给谁抢走了？”

“阿尔维察。”

妈妈急忙穿上鞋，披上披肩。她说：

“达里耶，快跟我一起去找你爸爸。”

我们在托马·奥克的酒店里找到了他。

爸爸已经喝得满脸通红。他只要喝一杯李子酒或葡萄酒脸和耳朵就红。妈妈向他做了个手势，爸爸有些不安地走出来。

“出什么事了？”

“埃万吉莉娜在达姆那儿叫人抢走了。”

“谁？”

“阿尔维察。”

爸爸的嘴唇动了动，没说出话来

埃万吉莉娜姐姐和伊昂哥哥是妈妈跟前夫生的。在斯特尼库茨和阿登卡塔之间的土岗子上，妈妈有一块前夫留给她的地。这块地土壤贫瘠，颗粒不收，但总算是一块地。要是有棒牲口和好犁，把地深耕一点，还是会长出好庄稼

的。事实上，地也不是妈妈的，因为等埃万吉莉娜姐姐和伊昂哥哥长大后，要把这块地分成两份，一份分给姐姐，另一份分给哥哥。

埃万吉莉娜姐姐巴不得长大快出嫁。而阿尔维察更是心急如火，急不可待，便把姐姐抢走了。抢亲这种事在村里屡见不鲜，早已成了一种古老的风俗。

爸爸和妈妈商量了一会儿，气也就慢慢地消了。

伊昂·苏丘，村里人都叫他阿尔维察，是个英俊机伶的小伙子。他和他妈妈一起住在村口上。他家与托米察·布尔布克神父隔路相对。他有房子，有地，将来还会有孩子。当然还要劳动。就凭埃万吉莉娜和阿尔维察现有的家当，他们的小日子会越过越红火。

爸爸好象很不高兴，但他倒不是因姐姐被人抢亲而生气，而是因为他事前一直蒙在鼓里，对此毫无察觉。妈妈竭力安慰他。

"现在，"她说，"女婿的要价就不会那么高了，不会再要嫁妆了。"

"你说什么？难道连穿的也不给姑娘制吗？嫁妆无论如何也要给她准备。"

他们两人在商量着买东西的事。爸爸妈妈商定，到杂货店谢尔布那儿给姐姐赊一块做裙子用的花布；新郎、证婚人和伴郎在婚礼上穿的衬衣由我的几个小姐姐去缝；再向地主借点钱，到夏天多给他割几块地的麦子，用以偿还借款；姐姐穿的鞋要到城里去买。这下子我家的日子到夏天

之前可就不好过了，因为有那么多的活要干，那么多的债要还。但是，既然需要，又有什么办法呢。

听到村口上响起枪声和奏乐声，我便跑去观看。这时，阿尔维察的院子里已挤满了人；住在路对面的布尔布克神父和他的老婆正扒着栅栏向外看。神父在窃笑，他对父亲此时的处境感到幸灾乐祸。可他哪里知道，父亲的气早消了。

我从人群中钻进屋里，问一个正在煺鸡毛的妇女：

“我姐姐在哪儿？”

蒂察·乌耶的老婆弗洛雷亚告诉我：

“同阿尔维察在屋里。”

我听见从里屋传出尖细的笑声，我姐姐笑这就好了。可是，我对阿尔维察还是有点反感。今后我不得不叫他姐夫了。我讨厌阿尔维察姐夫，因为他没有让我同姐姐一块上车，要不然我也可以坐车兜风了。

同放枪的小伙子一起坐在飞奔的马车上，那种开心劲儿你是无法想像和形容的。

三个星期后埃万吉莉娜姐姐就办完了婚事。因为，不然的话，婚事就得拖到复活节以后办，但到那时，人们忙得不可开交，就顾不上办喜事了。

村里的土地无边无际，而这么多的地都需要人们去耕种。

村里办喜事一般都是在圣诞节和圣特瓦代尔命名日期

间。圣特瓦代尔命名日这天是只吃奶酪的吃斋节。

吃斋节是多美的日子呀！……尤其是那天晚上！……

吃斋节那天晚上，全家团聚，围坐在桌旁吃奶酪。要是没奶酪的话，那只好有啥吃啥：大葱、葱头、卷心菜，随便填饱肚子就是了。李子酒可以一直喝到头晕脑胀。

到吃斋节时，家里可不要有没嫁出去的老姑娘，要不然你可倒霉了，因为到来冬前谁也不再办喜事，人们要干活，没有时间顾得上这些事。这时，你要是没把姑娘嫁出去，你就会听见小伙子们站在土岗子上对着你家喊一些难听的话。

我们都愿意听那些喊话，因为它真叫人开心。

小伙子们总是成群结伙，一些人上东边的土岗子，另一些人则上西边的土岗子。

我们听见拉杜·特纳瑟的粗嗓音：

"嗨！嗨！"

瘦子古伊内亚·罗达鲁则在另一边答话：

"你怎么啦？"

"托马·奥克有一个胖姑娘，想出嫁却找不着主！"

"为什么呀？为什么？"

"她爸爸不给她地！"

"我想喊更难听的话，想听吗？"

"你不害臊吗，达里耶？"

"是有一点。"

"那就别喊了。"

我们听着这些挖苦人的话感到十分开心。各家各户的大人小孩都来到门口，挤在一块，一边听一边笑。但是，笑声不长，因为每家都免不了受到嘲笑。一些人只好自我安慰，暗中咒骂，回到屋里，装聋作哑。另外一些好斗者，则抄起大棒，到岗子上去找小伙子们算帐，见人就往头上打；小伙子们有的逃之夭夭，有的则拼命抵挡。第二天清晨，在村子里，你会看见有些年轻人或年纪大一点的，头上裹着白布绷带，情况就是这样。

对我姐姐埃万吉莉娜，小伙子们没有理由去挖苦，因为她未到婚龄就出嫁了。

在吃斋节的前一天晚上，小青年们到处去找还没结婚的大小伙子，用吹上气的牛皮袋捶他们的背。这些小伙子们羞得无地自容，因为他们像匈牙利族小伙子们一样成了光棍！

“达里耶，牛皮口袋是怎样做的？”

“这很简单，把一块牛皮缝好，粘上缝，再打上气就行了，响起来就像打鼓的声音。”

在吃斋节前一天的晚上发生的事还有：你家要是有没嫁出去的姑娘，小伙子们不仅在岗子上寒碜你，而且还把你家的狗逮起来（他们先把狗招过去，然后逮住），在狗尾巴上拴一块白铁皮，拿着棍子在后边赶着打，把狗狠揍一顿。在圣特瓦代尔命名日那天，没挨过揍的狗，说不定哪天就变成疯狗。你想让你家的狗疯吗？当然谁也不愿意。那么，人家揍你家的狗，你就不要见怪了。

村里没有一条狗没挨过打。但是，到春天有的狗还是变成疯狗。春天是出疯狗的季节。

每年春天，村里总有几个男人和女人患糙皮病，因为他们吃了发霉的玉米面。于是警察便把他们捆起来送到城里的医院，然后通知说，他们死了，已经埋了。

少了这几个人，地球也照样转。

我们邻居家的弟兄二人也得了糙皮病，他家的老三就是疯子桑杜叔叔。托米察·布尔布克神父看到茹韦泰把他们捆着往城里押送，便问：

“他们怎么了，长官先生？”

“得了糙皮病，疯了，神父。”

“不对，孩子，不对。他们不是因为得糙皮病才疯的，而是因为他们没有挨揍，孩子，就是这样。”

“但是，人是不需要挨揍的，神父，他们不是狗！”村里的职员德勒亚勒说。

“这些家伙都是狗，孩子，都是狗，他们不去教堂，他们该挨一顿揍，该挨一顿狠揍！……”

在我姐姐被抢走一周之后，阿尔维察同姐姐一起来到我家。

我姐姐眼圈有些发黑，身材显得更苗条，脸更白净了。阿尔维察留着胡子，嘴里叼着烟卷，一支接一支地抽个不停，妈妈实在看不惯。

“晚上好，爸爸。”

“晚上好，妈妈。”

“晚上好，你抢走了我的女儿。”

“是呀！说什么也不能让别人先抢走她，我喜欢她！”

“好哇，阿尔维察。不过，你想过没有，她是不是太小了？”

“我愿意娶她，我不嫌她小。”

“那好吧，阿尔维察。”

“我想也只能如此了。”

埃万吉莉娜姐姐坐在他男人旁边，两眼一刻也不离开他。自从出嫁之后，姐姐把我们都忘了，爸爸、妈妈、弟弟、妹妹她都不放在心上，心里只有她的男人。

“爸爸，我们来跟你商量定一下婚期。”

“定吧，什么时候？”

“两周之后。”

“嫁妆还没准备好呀！”

“没关系，到时候会准备好的。”

“你打算找谁当证婚人？”

“找格伊纳。”

格伊纳同阿尔维察是邻居。

“你找了个好证婚人。”爸爸说，“是个能干的人！阿尔维察，你想要我给你多少地？”

“是呀，爸爸，我想，属于埃万吉莉娜的地一半给我们，一半留给你们。如果将来我们孩子多了，那一半以后再给

我们。"

阿尔维察的这番话使我们感到意外。

他们接着谈起送礼的事情。

"爸爸，"阿尔维察说，"我们想给您买一双长筒靴，给伊昂弟弟买一双皮鞋。大舅子格奥尔基我们也想到了，准备给他买一双皮靴，通过邮局给他寄去。妹妹们呢，每人给一双拖鞋，给小不点儿——他指着埃莉萨贝塔妹妹——一双拖鞋和一条裙子。"

阿尔维察捋了捋小山羊胡，嘴里露出了雪白的牙齿。他长得很英俊，有一双炯炯有神的黑眼睛。

"谢谢你啦，"爸爸说，"我们准备把女儿的地给她，还有新郎、新娘和证婚人的衬衫也都准备好。我们考虑给亲家母也买一件衬衫，因为她把你抚养成人。"

爸爸说的亲家母就是老太婆拉达。她是阿尔维察姐夫的妈妈，埃万吉莉娜姐姐的婆婆。她长得又矬又蠢，还有胡子，村里人都叫她"矬胖子"。我姐姐同我们谈到她时也这样称呼她。

"孩子，应该管她叫妈！"

"我怎么能管她叫妈呢？我是她养大的吗？她算老几！让她开口说句话可难了，活像个哑巴。她在尼基希亚村她女儿那儿住的时间比在家住的时间还长。"

举行婚礼的日子终于来到。星期五晚上，我家的亲戚就开始从四面八方来到我家。第一个光临的当然是瑟卡拉

村的乌楚珀尔姑母和我的表姐迪察了。

像往常一样，男孩子们听说表姐来了都闻风而至。表姐又长高了，但那一段监狱生活也使她变得消瘦了。

克尔洛曼村的外公、外婆、杜米特拉凯舅舅和安尼卡舅母也来了。杜米特拉凯舅舅两年前才结婚。舅母有一张圆圆的白净脸，蓝眼睛，已经生了一个男孩。安尼卡舅母坐在灶上，指着怀里的孩子对妈妈说：

“玛丽亚姐姐，我的约尼克像杜米特拉凯是不是？”

杜米特拉凯舅舅高高的个子，红头发。这孩子小鼻子，黑脸膛，脸上好像涂了一层灰。妈妈以前就见过这孩子，现在瞧着他说：

“对，对，真像我兄弟杜米特拉凯。”

妈妈说着，偷偷地溜了我们一眼。杜米特拉凯舅舅心里可高兴了。

“玛丽亚姐姐，我的约尼克真像我，爸爸的小宝贝！……”

他把小孩抱在怀里摇来摇去。小孩长得完全像克尔洛曼村外公家的一个邻居尼察·利察，他外号叫勒耶楚尔。别人都注意到了，只有杜米特拉凯舅舅还蒙在鼓里。

妈妈的表妹、克尔洛曼村的丘雷亚也来参加婚礼。西卡·丘雷亚姨妈有一只眼患了白内障。她生了八个孩子，长得都很结实，而且全成了亲。他们在紧挨老宅子旁边盖起了三座房，最后盖的一幢房坐落在河边。如果你从这座房子的窗户伸出手去，可以摸到水塘里的芦苇花。这个水塘

很大，里边长满了芦苇。丘雷亚姨妈家有一条小木船，她家的人到葡萄园去就坐这条小船。克尔洛曼村的人在水塘对岸的红土地里种了许多葡萄，结出的红葡萄粒小，但却像蜜一样甜。

丘雷亚姨妈去年曾在城里住过院。她坐在一个三条腿的小凳子上，一边在一个盆里用开水给鸡煺毛，一边讲述她的经历：

"你听我说玛丽亚：我脑袋里像开火车一样，总是突突地响，不停地尖叫着。我找先生看了，不知吃了多少药，但都无济于事。后来，我的大小子科丘带我到图尔努市的一个大夫那儿去看。这位大夫留着小胡子，他让我躺在一张桌子上，使我入睡。我也搞不清他在我鼻子里放了什么东西，当时只觉得有点恶心。在使我入睡之前，他让我放心，他说他将把我的脑袋切开，把里面的火车取出来。我也记不清我睡了多久，但我觉得好像是睡了个大觉。我醒来的时候，发现头是包着的，在我身边的枕头上，放着一辆钢板做的小火车。医生把小火车给取出来了。他指着火车对我说：

"'你瞧，老太太，这是从你脑袋里取出来的。我打开了你的脑袋，把火车取出后又缝上了。你疼吗？'

"'不疼，大夫。'

"'也不应该疼，老太太。脑袋里还突突地响吗？'

"'不响了，大夫。'

"在医院里住了几天之后，他们就让我出院了。我非常

健康地回到家里。大夫的医术真高明！……"

"丘雷亚姨妈，火车到哪儿去了？"我问她。"我想玩火车。"

"火车吗？留在大夫那儿了。他对我说：'要把火车送到博物馆去。'"

丘雷亚姨妈的两个儿子带着他们的老婆和大孩子也来参加婚礼。他们是坐四辆马车来的。他们来得好。

"这些人会把我们吃光的。"

"既然举行婚礼，请人来，就得好好地招待人家。"

奥尔特河谷那一带只有格布内亚姑夫和阿雷蒂亚姑姑来了。克尔默楚伊村的大姨、小姨和我的表姐妹们也来了。可让他们住在哪儿呢？只好请他们到街坊邻居家里去住。反正埃万吉莉娜姐姐一生只出嫁一次！……只给她举行一次婚礼！……

星期六晚上，亲戚们都留在我们家。他们大吃大喝，又唱又跳。

乐师们留在新郎家。我和丽察姐姐以及小妹妹埃莉萨贝塔也跑去了；丽察姐姐跑在最前头。

阿尔维察姐夫的近亲和他的表兄弟都已聚集在他家。只是证婚人还没有来。阿尔维察的伴郎韦尔代负责去请宾客，他拿着酒壶把村里新郎的亲朋好友都请来参加婚礼。

黑夜过去，乐师们在新郎家一直演奏到天亮。

只是在天傍亮时，我们大家才打了个盹。

星期天上午婚礼开始举行，下午和晚上将达到高潮。当我走近埃万吉莉娜姐姐时，我发现她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漂亮。她的好友都到我们家来为她送行。韦尔代从河边弄来一个樱桃枝，是从一棵樱桃树上折下来的。姑娘们把樱桃枝用香草和彩带缠起来，又系上银白色丝条。银白色丝条闪闪发光，像是用银子做的一样，可它并不是银子做的。

"现在给新娘扎柏树枝。"丽察姐姐说，"等我长大之后，我也出嫁。到时候也给我扎柏树枝。"

人们把扎好的柏树枝放在门廊上，然后拿到门口。全村人都在院子里扒着栅栏看热闹。

"新娘的柏树枝真漂亮！"

姐姐的女友们把埃万吉莉娜姐姐送进屋里。我像小猫一样从姑娘们中间钻了进去。她们推她，捅她，胳肢她，揪她，给她穿上从箱子里拿出来的衬衣。衬衣外面又穿上用细白布做的新娘礼裙。脚上穿上白袜子、白鞋。她们给她梳头、扎辫子，然后插上香草枝。她的头上蒙了一块从城里买来的透明的白纱巾。新娘像是一位仙女——真的，真像一位仙女！……

我姐姐穿着箍脚的鞋站着不动。村里所有的姑娘出嫁时，穿的鞋都箍脚。因为她们必须穿又瘦又小的高跟鞋，而她们的脚却都那么又肥又大。假如你整天不穿鞋，脚当然就会无拘无束的猛长，脚趾也会又粗又大。

埃万吉莉娜姐姐的白面纱一直拖到地上。她头上戴着

一个用红、黄、蓝、绿纸做的花环。

当了新娘的姐姐连椅子也不能坐。她像吞了一根棍子似的，穿着结婚礼服直挺挺地站着，一直站到晚上睡觉时为止。

新娘已梳妆打扮完毕。柏树枝也已扎好摆在房前。伴郎韦尔代前来迎接新娘，他挽着埃万吉莉娜姐姐的胳膊朝村公所前面的水井走去。从今以后，她将从这口井里打水做饭。

埃万吉莉娜姐姐出嫁之后每天都得从这口井往家里打水。现在，伴郎高高举着扎得五颜六色的柏树枝，领着新娘来到水井旁。在他们前面，四名乐师不停地奏乐，乐曲声传遍全村。我还没见过有哪家举行婚礼请过城里的乐队，但现在，在埃万吉莉娜姐姐的婚礼上就把他们请来了。

"阿尔维察这小子真能显摆，就连神父的儿子也不会举行这样的婚礼！"

"既然阿尔维察有本事，他为什么不能这样搞?!"

"他喜欢新娘子。"

"也许喜欢，也可能只是想显摆显摆。"

埃万吉莉娜姐姐用一根新扁担挑着两个水桶，这是送给她的嫁妆。水桶染成了红色，一看就知道是新的，是用纯铜做的。她会爱惜这两个桶，因为婚后她就要用这两个水桶挑水了。今天，全村的人都将知道新娘从娘家带来一副新铜桶。在前面那只桶里放着一把长柄的铜勺，铜勺的柄要露在外面，柄上有城里的工匠师傅用锤子凿出的精致

的花纹。

在人们的簇拥下，随着乐队的伴奏声，姑娘们和伴郎把姐姐领到水井旁，目的是让她认认路，知道这就是她今后往家里打水的井。

姐姐抓住吊竿，把桶送到井下，打满水后再提上来倒进水桶里。接着再打一桶，把另一个水桶也倒满水。

埃万吉莉娜姐姐提起水桶往后挪了几步，再放在地上。乐队随即开始奏乐。这时，新娘、伴郎、姑娘们和走过来的小伙子们便围成一个圈，跳起霍拉舞。人们围着水桶跳三圈之后，便散开。这时，姐姐抄起靠在井台上的扁担，挑起水桶，她的腰给压弯了。因为水桶是铜做的，很重，桶壁和桶底又很厚，而且水又装得满满的。这一切要说明，在今后的家庭生活中，她要挑重担。因此，从现在开始，她就要学会挑重担。埃万吉莉娜姐姐的腰被水桶压弯了，但她鼓起勇气，勇往直前，一口气走到门口。矬胖子婆婆拿着面包和盐站在门前迎接她。姐姐放下水桶，用手掰一块面包，蘸了点盐把它吃下去。然后像个傻姑娘似的哭了起来。这时，打着洋琴的乐师唱着：

新娘子，莫哭泣，
我将把你送回娘家去。
须到杨树结出核桃时，
或许不知何年何日……

乐师们奏着乐到邻居家把证婚人请到阿尔维察姐夫家

来。伴郎也随同前往。

他们吃过午饭后，把姐姐扶上车。我也跟着上了车，真是凑热闹。

“看来谁也摆脱不掉你。”

“我想看看。”

“好像你再也看不到了似的！”

马车咕隆咕隆地一直赶进我们家的院子里。妈妈把姐姐的嫁妆搬出来放到车上：一个从城里买来的涂了红颜色的箱子，里边放着姐姐所有的衣服。箱子上面放着枕头和被褥。伴郎坐在姐姐旁边。车上坐满了年轻小伙子，还有两位乐师不停地弹琴奏乐。马车在村里绕着转，一直转到下午。

太阳已经西斜。我家的亲戚能来的都来到新郎家的场院。乐师们已经累得满头大汗，疲惫不堪；跳霍拉舞的人越来越多。太阳就要落山了，新郎新娘的马车队还在村里转个不停。马车一辆接一辆，马铃铛声、鞭子声、手枪声响成一片。马车停在村公所门前。新郎新娘同证婚人一起走进村公所，村长给他们登了记。随后，他们前往教堂，在那里，神父为他们举行宗教结婚仪式。最后他们回到家里。

家里，霍拉舞跳得正欢。乐队奏起了努涅亚斯卡舞曲①。新郎在右，伴郎在左，新娘在中间；紧挨着他们的是证婚人。他们每人手中拿着一支点燃的大蜡烛。白蜡烛

---

① 一种在宗教婚礼仪式后跳的霍拉舞曲。

中间系着红布条。人们跳着霍拉舞，围着他们转三圈。

当霍拉舞快要结束时，围着看热闹的人群便让开一条路。这时，一帮用铁链拉着狗熊的吉卜赛人走了进来。霎时，小孩子们吓得大喊大叫，四处奔逃，让开的路越来越宽。跳霍拉舞的人断开一个缺口，牵着熊的吉卜赛人进到里边站在乐师旁边。我数了一下，共有十二只熊。驯熊人拉着熊围着乐师走来走去，边走边敲着挂着小铃铛的鼓。熊叫着，摆动着尾巴，吉卜赛人对熊耳语，说些莫名其妙的话。驯熊人催促着它们，用膝盖拱它们，用木棒在它们的脊背上滑动，像是抚摸似的。熊的胆子倍增，两只后腿直立，像人伸开两臂一样伸出两只前腿。乐队不停地奏乐，驯熊人唱着，人们继续跳呀、唱呀。人们把跳霍拉舞的人围得水泄不通。熊开始像人一样做动作。全神贯注的驯熊人敲着鼓，锁链声响个不停。

熊把跳舞的人围成的圆圈冲破，人冲了进来。老驯熊人格鲁亚·杜德乌，谁不认识他！其余的驯熊人都是他的儿子、女婿。这帮吉卜赛人共有十二只熊。杜德乌用铁链牵着母熊迪迪纳。我认识这只老母熊。它爪子上的趾甲很尖，是多年走路磨的，身上掉了毛的地方露出黄色的肉皮。厚厚的眼皮布满了裂纹。迪迪纳是老了，但仍很健壮。它是这群熊的头。其余十一只熊，又小，又年轻，又活泼。

“祝新郎新娘幸福！”格鲁亚·杜德乌说。

他把头上的帽子摘下来递给母熊。其他驯熊人也照他的样做。所有的熊用两只前腿举着帽子面对观众直立着。熊

叫着，人们往帽子里扔钱币。孩子们对熊的恐惧已经消失，他们都围在狗熊旁边，揪它们的毛。狗熊毛是治惊吓症的良药。你要是吓着了，用点燃的狗熊毛熏烤一下，病准会好。

"来，迪迪纳，到屋里去装新娘去！"

格鲁亚·杜德乌牵着母熊，走进阿尔维察姐夫的屋里，新娘新郎和证婚人跟在母熊的后面。有些人则凑到窗户那儿去看。母熊一跃跳到新娘的床上。杜德乌唱起新娘歌曲。母熊坐在床上，收起后脚，用前脚捂着脸，装出害羞的样子。格鲁亚对着熊唱着，边唱边敲着鼓，鼓上的铃铛响个不停。迪迪纳躺下，哼哼着。然后肚子朝上仰卧，露出长着红毛的肚皮和又黑又干的奶头，摇头摆尾，晃个不停。接着又用爪子捂上脸，低声叫着。尔后溜下床，用嘴嗅地。

"新娘子，你生的孩子一定又漂亮又健康。"驯熊人对埃万吉莉娜姐姐说。"母熊给你的屋子冲喜了。"

杜德乌带着迪迪纳到牲口棚、鸡窝去祛病驱邪；还带着它到粮仓，祝愿五谷丰登。

贝什库躺在院子里说：

"我浑身骨头有点疼，杜德乌，你让母熊在我的身上踩一踩。"

母熊上去踩他的身子。它轻轻地走到这个人的背上，用脚掌摸着他身上的骨头，从脖子一直摸到脚跟，并且用力往下压。趴在地上的贝什库的骨骼咯咯地直响。然后，他

站起身，活动了一下关节，说：

“真是手到病除。”

他把一个钱币扔进驯熊人的帽子里。

这时，矬胖子端出两箩筐麸糠。这十几只熊嗅了嗅筐里的麸糠便吃了起来。驯熊人用大陶杯喝着葡萄酒。

天黑下来。阿尔维察姐夫家里，亲朋满座，大摆酒席。还准备了礼品。酒菜满桌，人们开怀畅饮。当人们酒足饭饱之后，便带着乐队到院子里跳起舞来，一直到跳不动为止。

送礼的时刻到了。男证婚人、女证婚人都收到了一件衬衫。除此之外，每人还得到一条两头绣着大红花的丝织毛巾。男证婚人掏出一个银币放在垫着餐巾的盘子里。随后参加宴会的人也都从腰包里掏出银币、小钱作为礼品送给主人。婚礼的费用要靠礼品抵消。

黑夜消逝，天将破晓。天傍亮时，两男两女带着乐队前往新郎的岳父岳母家去报喜，告诉他们新娘没有破过身。这时，端来酒给报喜的人喝。接着，报喜的人捉住两只老母鸡，把鸡染成红色，抱着鸡又喊又叫地返回新郎家。报喜的人一到家，新郎、新娘、证婚人和伴郎便马上到我们家来。这时，妈妈已准备好饭菜，还有白酒。人们又吃又喝。夜是漫长的，大家不停地唱呀、跳呀，此刻，每个人确实都有点饿了。

当人们在我们家饮酒时，阿尔维察姐夫家的院子里，在

乐队的伴奏下，小伙子们正在房前火堆旁跳着特尔纳舞。阿文德雷亚喊着：

哎呀呀，哎呀呀，
新娘子着火啦！……

两家的酒席一直持续到中午。现在已是星期一晚上了。亲家们聚在一起，开始计算婚礼的开销。他们要结算一下，看看新婚夫妇有多少财产。亲戚们都走了。

婚礼并没有结束。

星期二早晨，埃万吉莉娜姐姐要准备三份礼物：一份给我们家，是请求原谅的；一份给证婚人，也是请求原谅的；第三份是给伴郎的，对他大力帮忙聊表谢意。

几天之后，埃万吉莉娜姐姐走进我们家中，她变得消瘦了，满脸愁容，右眼角上一块青。

“出什么事了，孩子？”

姐姐挨着妈妈坐在床边，两手捂着脸哭了起来，哭的声音很低，哭得真伤心。

“哎，你怎么了？”

“阿尔维察他……”

“你同他吵架了？”

“没有。昨天夜里，他喝得醉醺醺的回来，我问他到哪儿去了。他便往死里打我，要不是我躲得快的话，早被他打成瞎子了。”

复活节前的吃斋节到了，这是时间最长的斋节。

吃斋节期间，我们只吃玉米糕，喝葱花汤。

我们盼望着春天。

今年春天，人们不会像去年那样闹暴动了。

人们没有忘记暴动中死去的人。而许多死里逃生的人成了终生残废，在痛苦中艰难度日。

警察死死地盯着每个人。

我们盼望着春天。

春天一到，我们吃得会好一些。那时，我们可以吃玉米糕，喝荨麻汤、酸模汤。

在我家场院的水沟里，长满了酸模和荨麻。

春天，村那头的妇女都到我家场院的杨树下来挖酸模和荨麻，总是挖不尽。

第八章　水　　罐

我们和贝卡家、米西尔柳家还有乌耶家搭伙早早地就开始收麦子了。我们之所以同他们几家搭伙，因为，贝卡家的收割机又新又轻，只要两头牛拉着这台“阿尔比翁”收割机就能割麦。它割起麦子来刷刷地象刮胡刀一样快，割麦声从老远就能听见，人们一听到声音就说：“听，贝卡家的‘阿尔比翁’。”我们同米西尔柳家合伙，因为他家和我家

一样，也有十个劳动力。同乌耶家合伙，因为他家的人都能干，一个顶俩。

“喂，乌耶，你老婆的肚子可不小了！……”

“大又怎么样……我们早算好了，割完麦子生孩子。”

“那好，我们也让你入伙儿，这样打场时我们也能对付。”

“谢谢。”

我们赶着马车到伯杜列亚萨去割麦，那儿离我们村有十公里远。半夜三更我们就醒了，全村人都醒了。公鸡打鸣叫醒了我们——公鸡，或许我们怕起晚了地主找我们的麻烦。

“吁，驾！……”

白色的路很暄。车嘎吱吱哐啷啷地走着。我们睏得闭着双眼，盖着毯子打瞌睡。

“吁，驾！……”

爸爸打着火点了一支烟。上面，苍穹高悬，在一棵无形的夜空之树的枝条上，挂满了熟透的果实——星星。

月亮呢？没有出月亮。没有月亮，天空就显得灰濛濛。没有月亮，星星就显得更大。没有月亮，星星显得离地更近。你要是爬上一棵白杨树的树梢，伸手能摘下一颗星星吗？不能！那么，你为什么说星星离地近了？我只不过说说而已。有些星星呈白色，象是雪球，几乎要滚下来；另一些星星呈淡黄色，象是榅桲果。直到天壤相接处，布满了成千上万颗星斗，多得不计其数。

上面是星，
下面是星，
星星之间吹着风；
郎呀穿星走，
阿妹星间行。……

"达里耶，你在唠叨什么？"

"没说什么。妈妈，你瞧，那是银河，那是勺子星，还有北冕星座，大熊星座。再往那边，是小熊星座。姐姐，狮子星座在哪儿？我想看狮子星座。"

"别说了，鬼东西！"

我住了嘴。一颗星星掉下来。它的后面留下一条发亮的蓝尾巴，留下一条尾巴。星星坠下消失了。留下的那条蓝尾巴也消失了。有人死了。有一颗星星掉下来，又掉下一颗……星星不断坠下。银河里的星星有的也往下掉。

"哥哥，我看见狮子星座了！"

"揪住它的尾巴！"

"哎哟！"

我哥哥伊昂气呼呼地朝我的腰上打了一拳，因为我把他吵醒了。他睡不着了，便跳下车，跟在车后边走。这样也好，可以让他暖和暖和，清醒清醒。

"吁，驾！……"

我们穿过铁路，上了山岗。

"你们桶里灌上水了吗？"

"灌了。"

"罐子里呢？"

"也灌满了。"

车辆从四面八方的道路上爬上山岗，朝地里赶去。没有一个男孩歌唱，也听不到一个女孩的歌声。女人们也不出声。只有广阔的田野在歌唱，可能天空也在歌唱，但我们听不见。

"你是谁？"

"我是尼古拉。"

"有火吗？我的火石丢了。"

"有。"

唉，星星已经不再坠落了，它们暗淡无光，钻到上边，也许是到天幕里面去就寝。星星白天入睡，夜里精神抖擞。晚上，它们钻出被窝，向四下俯视，看着人们、河谷、丘陵、原野及森林如何沉睡。

"爸爸，是这样吗？"

"可能吧……谁能知道！只有上帝才知道……如果什么地方有上帝的话。"

东方的地平线开始发白，随后泛出黄色，又出现了红色。我们加鞭赶路。

"吁，驾！……"

牛甩着尾巴，迈起大步，尾巴尖儿打着屁股两侧，它们是在用尾巴抚摸自己的屁股。

一到地里，我们就卸车，赶紧拔了两把草，扔给牲口

吃。牛哪儿能吃麦子！……哪怕几个穗。我们怎么能给它吃！……不行，因为麦子不是我们自己的。你要是不小心让牛钻进麦地，那你可就要挨揍了。去年夏天，我就碰上一次倒霉事。一天中午，我在已割了麦子的地里放牛。当时，天空乱云飞渡，像是无数条公牛追逐冲撞，我睁大眼睛望着天空，看得出了神。这时，我的花牛吃了一口麦穗嚼起来。飕！……劈！……啪！……

“哎哟！……”根察用皮鞭狠劲地向我抽来，皮鞭像条火蛇缠在我的背上，火辣辣的，我的背上立刻皮开肉绽，鲜血直流。从前我不知道挨打的滋味，现在可尝到了。至今我的身上还有伤疤。也许你想看吧？我脱下外衣、内衣给你看。当时，皮鞭象闪电一样抽下来，从此我的背上从右背到左下肋骨，便留下一大条斜的伤痕。你不想看！不看更好。我挨打后，爸爸气得抄起牛轭大骂：

“狗日的！……你差点儿把我的孩子打死了！……”

根察骑在马上说：

“我没把他打死，我只是打了他一顿。”

他双脚扣镫，马飞奔而去。

根察要是不跑掉，准让他的脑袋开瓢。他跑掉了，算他走运。各人有各人的运气。根察知道爸爸的厉害。他是气急了才打我的，不是为了别的。不管是地主，管家还是这个丑八怪根察，对爸爸都不敢骂一句。两年前，宪兵头子茹韦泰有时骂我爸爸。他骂也没用，爸爸不计较这些，也不和他争吵，爸爸和他见面时还是不脱帽行礼。一天夜里，

爸爸手里拿着一根打狗用的柳木棍子，宪兵头子扛着枪。爸爸知道宪兵头子要去维奥里卡庄，便在桥上堵住他，把他打倒在地，把他的枪扔进小河里。接着拳打脚踢，把他狠揍了一通，然后把他拖到河边，两只脚泡在水里，把皮鞭放在他手里，做钓鱼的样子。爸爸没打算让他死，只是教训教训他。巡逻兵发现了不省人事的茹韦泰后，像背死狗似的把他背回宪兵队。茹韦泰最后清醒过来。

"谁打了你？"

"谁也没打我。我摸着黑走路在桥上踩空了，就栽了下去。混帐东西，你们为什么不在桥两侧安上栏杆？"

"桥上有栏杆……队长先生。"

"我说没有就是没有！"

"没有。"

茹韦泰躺在床上痛得咬着嘴唇呻吟。他养好身体后，便到宪兵所要求调动工作。他调走了。代替他的是宪兵尼古拉·米耶卢谢尔。我们和他也不对付。

"哟！……别人比我们先到了。"

贝卡在给收割机上油，熟练得像个机械工。米西尔柳带着老婆、女儿和儿子也来了。他老婆叫伊莉娜，是个荡妇，大家都叫她"七肚脐"。他家姑娘的行为也不检点，小伙子们都亲她们，搂她们，还撩她们的裙子。难道大家没见过吗？哪里……但谈到结婚，却没有一个人想要她们做妻子。米西尔柳只有一个独生子，村里人都管他叫"母狗"。他的姐妹们谈到他时，就说"我兄弟"；他妈说"我儿子"；他

爸爸称他“我那个苦命的”……要是有人找他有事，就简单地喊：“喂，你。”“母狗”什么都听得见，什么也懂，只是不能说话罢了。他嗓子里蹦出来的是断断续续的连不成字的声音，你简直听不出是湖里野生怪鸟的咯咯叫声还是狗的叫声。村里的孩子们觉得他说话像狗叫，所以就给米西尔柳的儿子起了个外号叫“母狗”。他的真名被人遗忘了。不，没有被毁灭的东西仍大量存在，瞧，世界照样在前进。日久天长，这个外号便叫出了名。我也管米西尔柳家的小子叫“母狗”，可他并不生我的气。

米西尔柳家的小子心眼很好，长得英俊，浓眉大眼。

“母狗”总是带着怨气干活，因此也出了名。

“乌耶来了吗？”

“乌耶没来，他会来的。”

昨天夜里突然降了一地露水。地上的草湿渌渌的，麦子也湿渌渌的。天空也象露水泡过似的。

“比特——巴拉克……”

麦地里有只鹌鹑在叫。上面，好像有一条看不见的线把一只云雀吊在空中，它不停地飞舞歌唱。罂粟已开花结籽，红色的片片花瓣包围着粒粒黑籽，活像个带红边的黑礼帽浮在麦穗上。开红花结黑籽并且叶子长得很宽——那就是罂粟。我揪下一朵罂粟花想插在礼帽上，可我没有礼帽。

“把牛套上，日头快毒起来了。”

大家量好地块。阳光像清澈的河水，一下子把我们淹

没掉。瓦西里·贝卡的收割机“阿尔比翁”不停地响着，还可以听到附近其它收割机的声音。收割机一过，小麦一把一把地倒在地上，三把就可以打成一捆。然后把成捆的麦子穗朝上戳起来再晒一晒，等到晚上码成垛。

要不是我家和别人合伙割麦，我们就得用手割。那我们就得连滚带爬地在地里紧忙合几个星期，而且头顶烈日，暴晒着背。现在就不那么紧张。你没割过麦，就不知道面包的珍贵，只觉得好吃而已。

蒂察·乌耶喘着气来了。他的老婆跟在后边，像饿过劲儿的母马累得直呼哧，她背着干粮袋——就算是干粮吧，其实里面只有一块玉米糕，一个鸡蛋，还有一把小葱。乌耶提来一个小水罐。这个小水罐有两个把，非常漂亮。

“我们的那块地在哪儿？”

“再过去一点就是。”

举目朝南面多瑙河的方向看去，是一望无际的麦田。黄澄澄的麦穗，粒粒饱满。北面到通向卢什的路上是大片的玉米地，玉米长得又高又绿。风吹得玉米叶子沙沙作响，玉米棒上的银须随风飘动。

“快点干！”

是根察管家的声音。管家的嘴唇少一块，所以常看见他的口水流一下巴。根察小的时候，嘴唇被鹅拧过。

“你们干活呀！”

“我们干了半天了。”

我们弯下腰，把割下的麦子抱在一起捆成捆。太阳晒着，地烤着，我们总是弯着背干活，背疼得难忍。手脚划出了血，我们便把发烫的土撒在破口上。血和土混在一起，血就凝住不再流了。如果只是划破一层皮，那么伤口就会愈合。不过，要是伤口很深直到骨头的话，你就得背过脸去，往伤口上撒脬尿，尿杀得伤口非常疼，疼得直咬牙。疼是疼，可一会儿就过去。

“加把劲，快点干！……”

我们加紧干着。根察站在远处冲着我们喊叫，因为他也害怕我爸爸的牛轭。爸爸对一切都记得一清二楚，从不含糊。爸爸还债，同时也付利息，而且利息和银行的一样高。不然的话，穿着靴子的宪兵和管家就会把你踩在脚下，就连那个脚上穿着咯咯响的皮鞋、脖子上戴着油光发亮的白十字架的城里人斯特内斯库文书也会把你踩在脚下。

衬衫湿透了，整个都贴在身上；手、脚和皮肤火辣辣地疼；头重脚轻，汗流浃背。你没有办法擦汗，也没有东西擦。汗水往下流，用嘴唇舔一舔，味道是咸的，略有酸味。不用管，让它流吧，让它流下去浇浇地，也许会使土地凉一点。怎么可能！地是不会变凉的。

太阳越升越高。伊莉娜朝玉米地走去，我哥哥伊昂跟在她后面。他们俩在玉米地里没呆多久，也就是抽支烟的功夫。然后，一个从玉米地这边出来，一个从那边出来。他们干啥这样躲躲闪闪的？

他们俩又回到自己的地方加紧干起活来，干得很欢。

从开始割麦以来，一直是贝卡家的牛拉收割机。现在该轮到我家的牛拉了。我们把他家的牛卸下来，套上我家的牛。晌午过后，该米西尔柳家的牛拉，要拉一下午，因为他家的牛是摩尔多瓦种的弗尔丘牛，很壮。

伊莉娜刚嫁到我们村来时，说话有口音，说起话来像吹笛子。现在，她的话音变过来了，和我们本地人说话一样，听不出是外乡人。不过，仔细听，还和本地人有点差别，尤其和本地的女人说话不完全一样。她总是说她的肚子痒痒，需要有人给她挠挠。米西尔柳也只好由她去——因为她的肚子总痒痒，女人们就编造说她有七个肚脐，于是大家都叫她"七肚脐"。

伊莉娜不管白天或是晚上，经常亮开肚子让男人们看，为的是戳穿女人们编造的这个谎言。

她确实只有一个肚脐，然而"七肚脐"的外号并未消失。更糟糕的是，她的三个女儿都像她。

"驾，喔，喔，吁……驾，狗日的……驾！……"

是我在赶着牛割麦。像我这么大的孩子赶牛干活，完全没问题。麦垄越割越窄，我总是注意不踩倒麦子，割出的麦茬地越来越宽。一捆一捆的麦子戳在地上像人一样，但比人要粗些、矮些。麦芒乱七八糟地冲着上面。我从伊莉娜旁边经过，她求我说：

"走，到玉米地去，达里耶，我让你看点东西。"

“看什么?看肚脐眼儿?伊莉娜大嫂，你有七个肚脐眼儿。”

乌耶听见了我们的对话，说：

“贱货，你不害臊?你是个老娘们了，还去缠孩子!……”

“你别管，他不小了，再说我也不老。走，达里耶!”

“你找别人去吧。”我说着继续赶牛割麦。贝卡家的“阿尔比翁”收割机又响了起来。

伊莉娜和贝卡的大儿子到玉米地去了。他叫戈戈伊，脸上坑坑洼洼的，像甲虫咬过似的。天黑以前，伊莉娜还要找几个男人和她去玉米地胡搞。

几块乌云聚在一起，像是要下雨。下吧，快下快停。让空气湿润湿润，解解暑，也让烫我脚掌的地凉一凉。我脚上已有两处伤，很疼。我在伤口上撒了土也不管用，过一会儿血又流出来。

来一场倾盆大雨该多好!如果我们车里有两条大毯子和两根竿子，搭个棚遮遮太阳该多好!那就万事大吉了!

乌云朝多瑙河方向驰去，过了多瑙河，便消失在巴尔干山上。晴空万里的时候，我爬上山丘，就能看到山峦起伏的光秃秃的巴尔干山脉在阳光下闪着耀眼的光芒。

我从未越过多瑙河到保加利亚去过。可我曾在多瑙河里游过泳。再过一个月就到秋天了，等打完麦子之后，我又可以去游泳了。

地主家的粮仓装满了，车站上的仓库也已装满，地主没有更大的地方贮存这么多的小麦。他把一部分小麦很快运到多瑙河，也就是说他下命令把小麦运到拖船上去。运小麦，当然是我们家、贝卡家、米西尔柳家和所有给地主干活的有车有牛的人家的事。蒂察·乌耶没有车也没有牛。因此，很遗憾，他既没见过拖船，也没见过多瑙河。拖船是黑颜色的，肚子大大的，把许多袋小麦都吞了进去。浑浊的多瑙河水缓缓地流着，水很深。逆风时，船的中部就翻起水花。

把小麦运到多瑙河，可以挣到几个钱。要是打个来回，再管卸车，就能挣到一个多列伊。如果你没鞋穿，用这些钱可以买一只农民穿的鞋。你要是再运上一次小麦，就可以买另一只。如果你想买背心或羊皮袄，那就得把五块地的小麦运到多瑙河才行。你哪有能力运这么多麦子！我们头上戴的是耷拉边的破礼帽，有时也光着头；身上穿的不是羊皮袄而是棉袄，当然，能有棉袄穿也算不错。钱，一是交给征税员，上交国家；剩下的就去下酒馆。如果你把钱全拿去喝酒，也不是坏事，起码一夜你可以消愁解闷。

我喜欢多瑙河。河里的水要多少有多少，你能在里面游个痛快。你可以像鱼一样，扎进水里游。不过，你就是会游泳也要当心别沉底。有些男孩子就沉了底。也有的人是因为劳累过度，从船和石头岸间的踏板上失足滑下去沉了底。这些人扛着口袋从船边滚下去。"你们快去找！"根察管家扯着嗓子大骂。你们别怕，根察骂人，要找的不是那

个最后捞上来灌满了一肚子水的人，根察骂人，是为了沉下水的一袋袋小麦。因为他要对小麦负责，管理员要把损失小麦的钱从他的工钱里扣掉。

“根察，对地主的麦子，你太不经心了！”

“我是很小心，管理员先生，但还是出事了。”

“不应该发生这样的事！”

“喂，快，快点干！……”

我们干得够快的，不能再快了。田野成了地狱。我们身上像着了火似的，觉得皮肉分离，骨头也散了架。脑袋发烫，像一壶滚烫的开水。牛身上冒着熏人的热气。我们热得直喘。牛也在喘，腿直打哆嗦。你怎么还忍心扬鞭子？！

“吁，驾！驾，该死的！……”

“快呀，加紧干！……”

没嘴唇的根察，你这个该死的家伙！

“嗐！……”

收割机不响了，所有的收割机都停了，它们像风磨一样平躺在地上。酷热难忍。

“喂，吃饭去！……”

我们在车旁边找了块阴凉地，车旁有阴凉。这儿野草丛生，是蝗虫、蝎虎和各种兽类乘凉的好地方。

我们打开大木桶，给牲口饮水。牛累倒了，只能把水倒进桶里拿来给牛喝，它一口就喝了个光。我们用草刷子

给牛挠背。我们大家用一个水罐传着喝水，水都晒馊了。我们吃饭前先喝水，为的是填满肚子，先弄个水饱。

我们把餐布一块连一块地铺在地上当饭桌。米西尔柳从干粮袋里掏出六口人的饭：三个煮鸡蛋，一块玉米糕和几根小葱，还有一根黄瓜，一瓶醋，饭也算得上丰盛了！米西尔柳是富裕户，他自己也有一块地。瓦西里·贝卡的饭也不错，他带来了玉米糕和葱头，还有半碗奶酪。我们在碗里用捣蒜锤把三头大蒜捣碎，然后撒上盐倒进小水罐里。蒜汁做好了，你就可以用玉米糕蘸着蒜汁吃，但你可要当心嘴唇别沾上蒜汁，因为嘴唇干裂了。你要是有时间的话，就可以细嚼慢咽。但我可没时间。我把玉米糕连蒜汁一齐吞下。吃玉米糕，再喝上点酸苹果酒，那就更美了——但只有那些有酒的人才会有这种享受。在地里吃饭的这些人，都是带什么来就吃什么。乌耶把鸡蛋敲碎，剥掉皮，他自己吃了一半，把另一半给了他的挺着大肚子几乎喘不上气来的老婆。

为了忘掉自己的烦恼，乌耶这时便找话说：

“贝卡老兄，你的收割机真棒。”

“这要感谢扬库·阿加纳，也要感谢我老婆。”

贝卡的老婆剥开葱头，咯吱咯吱地吃起来。她还拿小勺从碗里舀了酒抿着喝。“七肚脐”听得喜笑颜开。

“那个‘阿尔比翁’的来龙去脉是怎么回事，拉达？”

“让他讲，他喜欢讲。”拉达朝她男人扬了扬头说。

“这有什么可说的。去年冬天，我老婆告诉我说，扬库·

阿加纳对她有意思。我说：好！他开杂货铺，和我们只一街之隔，他还开个酒馆，还有个皮货店，有的是钱。让他夜里来找你，告诉他进门到羊圈去。狗认得他，不会冲他叫。我拿着棍子在那儿等着他。你就说，我睡得很死。我老婆听了我的话。阿加纳理了发，刮了胡子，还换了衣服——打扮得很像回事。他按约好的时间来了。狗没叫，但它摇头摆尾，因为他给狗扔了骨头。

"'拉达，你在哪儿？'

"'我在这儿，扬库大叔。'

"'别叫我大叔，这样称呼不合适。我还不老，我现在还浑身是劲呢。'

"这时我从角落里钻出来，打开门，雪地的亮光一下子照进来。

"'扬库大叔，晚上好。好呀，你和我老婆搞上了?!'

"扬库呆若木鸡。我把棍子举起来，守住门口。

"'别把我打死，兄弟。'

"'我不打死你。你把坎肩脱下来！'

"他脱下坎肩，放在地上。

"'把裤子脱下来！'

"他脱下了裤子。

"'把毡帽放在裤子上！'

"他把帽子也摘了下来，

"脱下皮靴！

"'饶了我吧，兄弟。'

"'我说了，脱下皮靴！我可中邪了，我要打人！……'

"他脱下皮靴。皮靴是新的，好不容易才脱下来。冻得他直打哆嗦。

"'兄弟，你还要对我怎么样？'

"'不对你怎么样。你快回家给我拿三百列伊来，我要买一个"阿尔比翁"牌的收割机。'

"'给你二百列伊吧，你想买……收割机的话，那就买一个"克拉伊通"牌的吧。'

"'我不要"克拉伊通"牌的，我就要"阿尔比翁"牌的。眼前，只有地主家才有"阿尔比翁"牌的收割机。如果你想要和我的"太太"相好，那我也想要一个"阿尔比翁"牌的……'

"'兄弟……'

"'少来这一套！……'

"他回家拿钱给我送来。他进出家门都是轻手轻脚的……我一个列伊一个列伊地数了一遍，都是纯银的。

"'你再回去一趟！'

"'你还要什么？'

"'再去拿四十列伊来！'

"'干什么用？'

"'进城买"阿尔比翁"时，我也要像阔佬那样到有乐队奏乐的酒店享受享受。'

"'兄弟……'

"'别兄弟长兄弟短的！……'

"我晃着棍子威逼他，他有什么办法？！只好乖乖地再回

去拿来四十列伊。

“‘你把我搞穷了，你讹人！……’

“‘我讹人？你才讹人呢，你铺子里的东西卖的都是高价！……’

“他穿着衬裤，披上坎肩，戴上帽子，一手提着皮靴，另一只手拎着裤子，脚上穿着袜子，踩着雪地走了。

“我进城买来‘阿尔比翁’牌收割机，又到酒馆饱餐了一顿，欣赏了音乐，这都是我老婆的功劳。……”

天气简直要把人热死。我们把餐布抖了抖，收了起来。掉下的玉米糕渣上一下子爬满了甲虫，苍蝇，蚂蚁……

贝卡家的“阿尔比翁”又响起来，在很远的地方都能听到收割机的声音。

乌耶摆着手，大声喊着：

“你们快过来！”

他老婆晕倒了。地烫得像炭火，空气热得像蒸笼。我们都围了上去，他老婆清醒后，站起来说：

“我看是快生了。”

女人们轻轻地给她解衣服。

“现在还生不了，到晚上你就轻松了。”“七肚脐”在这方面实在是内行。人们说，她已经教给她的女儿们生孩子时如何用劲儿。

“蒂察，送我回家吧。”

“好，我送你回去。”

蒂察·乌耶搀着他老婆走了。

“你们把车里的衣服给我拿来。”

他老婆东摇西晃，热得喘不过气来。她男人架着她，几乎是把她抱起来走。

“水！”他老婆呻吟着。

“达里耶，快去拿水罐来。你就提着水罐也送她回家吧。”

真是倒霉透了。路又远，地又烫脚，简直像踩着火炭走路。我提着的这个水罐里的水只剩下个底了。我们走一会便停下来歇一歇，让他老婆喝口水润润喉咙。

“弗洛雷亚，你难受吗？”

“难受，孩子他爹。”

我们离开收割机和大车已经很远了。现在，除了死盯在我们身后飞的一群苍蝇的嗡嗡声外，什么也听不见。我们一走，一大群苍蝇就跟上来。到村里还有一段路要走。他们俩在前面走，我像个小马驹似的在后面跟着。一路上我很小心，生怕绊倒把水罐摔碎。

“水！”乌耶的老婆又呻吟起来。

我们给她喝了水，然后继续走路。我们走到一棵大槐树底下，这棵大槐树是地主庄园的界标。乌耶的老婆尖叫了一声，趴倒在地上。我和蒂察·乌耶都听见了；地上的野草和草丛中有生命的活物也听见了；还有那被太阳烤焦了的黑色大地和无边无际的苍穹都听得见。要是夜晚的话，连天上的星星也能听见。可现在是白天，白天星星在睡觉，星星只有在夜晚才醒来。

“水！……”

从她的两腿之间发出了哇哇的哭声。蒂察·乌耶撩起她的裙子，从里面掏出一个活肉团。

“找根线把脐带扎起来，然后把它切断。”

蒂察·乌耶从腰里掏出小刀，割下脐带。他从又黑又脏净是汗水的衬衣上撕下衣襟，把出生的小孩裹起来。

“生了个什么？”

“丫头。”

这个刚出世的孩子微弱地呼吸着。太阳就要下山了。

“别让这个野丫头死了。”

“我们给她洗礼吧。”

“达里耶，小罐里还有水吗？”

“没了。”

“一滴也没有了？”

“没有了。”

“孩子她妈，你抱着她，我当神父。”

“好，你当神父吧。”

女人紧紧地把孩子搂在怀里，然后从衬衫开襟的缝里掏出土色的奶头，挤出了几滴奶汁，这是初乳。

“你把魔鬼赶跑了？”男人问。

“赶跑了。”

乌耶弯下腰，在地上抓了一把土撒在小孩头上。小孩的头又尖又长，光秃秃的。

“我给她起个名，叫杜米特拉，和我妈妈的名字一样。”

我们继续往前走，开始朝坡下走，这时太阳马上就要下山了。我们踹着尘土走，身后留下三个长长的身影。只有小孩的影子看不到，因为她的影子和抱着她的蒂察·乌耶的影子合在了一起。

“孩子她爹！……”

“怎么了？”

“我难受。”

我从乌耶手里接过孩子，抱在怀里摇着，小孩轻得像个小西瓜。

“可能肚子里还有一个没生出来。”

女人又蹲在地上，只听见又一声尖叫划破沉闷的长空。山下静悄悄，村里的小茅屋，槐树，河上水闸边的柳树，还有水磨都展现在眼前。现在，离村子很近了，只隔着一条道路、吊着大灯的车站、仓库、货场以及有辘轳的深井。

乌耶老婆的两条腿中间又发出了叫声。

“别看，达里耶！……”

“我没看。”

我扭过脸，朝山岗那边望去。山岗过去又是一块平坦的一直伸向奥尔特河的大平原。我抱着杜米特拉在一边站着。

女人小声问：

“又是个丫头？”

“又是个丫头。”

又听乌耶问：

“你把魔鬼赶走了？”

"赶走了。"

蒂察·乌耶又在第二个满是皱纹的又尖又秃的头上撒了土。

"我给她起个名，叫多布拉，和你妈的名字一样。"

现在蒂察·乌耶的身上没什么布可撕了。他干脆脱下衬衫把第二个孩子包起来。蒂察·乌耶上身脱光了，下身只剩下一条满是补丁的脏裤子。毛绒绒的前胸被太阳晒得通红。

他抱着两个女孩朝山下的村子走去。路上的土很松，走起来尘土飞扬，像是在冒白烟。他老婆摇摇晃晃地跟在后边，她已经精疲力尽，几乎要摔倒在地，但她还是顶住了。我们身后的影子越来越长。

我们进了村子。瞧，这就是乌耶的家：一间小茅屋，新围起来的槐树枝篱笆，裂开的桑树皮缝里密密麻麻地藏满了大红蚂蚁。

产妇背靠着树蹲在桑树底下。

蒂察·乌耶到邻居家找来了铁匠的老婆格拉迪娜来帮忙。

"来，我们给孩子洗洗，裹一裹，然后去请神父给她们洗礼。"

"神父在地里。我已经给她们用土做了洗礼。"

这时，高高的槐树梢上撒上落日的余辉，黄昏降临了。熟透了的新小麦的清香在空中飘荡。整个村庄像个小岛被淹没在小麦的汪洋大海之中。

蒂察·乌耶抱来一堆柴火，给小孩烧水洗澡。格拉迪

娜是个吉卜赛女人，她在屋子里翻腾了半天，找了几块干净点的破布。

产妇在桑树底下蹲着，她的膝盖、裙子、脚上到处是血。她眼神呆滞，脸色苍白。用蒂察·乌耶的破衬衫包着的那两个女孩晃着头找奶吃。

产妇哼哼着，可能是在哼歌，也可能是在祷告，或者是在痛苦地呻吟。

“妈妈的宝贝，好宝贝，妈妈用什么养活你们？妈妈的小宝贝……”

产妇伸开腿坐在地上休息。两只不像样的脚上长着黑趾甲，脚后跟上满是深深的裂口，裂口大得足能钻进蟋蟀。

产妇弗洛雷亚在休息。

一只瘦得不像样的母鸡挑着皱皱的鸡冠子在空旷干燥的场院里啄食吃。

“呵！……”产妇拉着长声叫着想把鸡赶走。然后她又咕哝着诉起苦来：

“妈妈的小宝贝，妈妈用什么养活你们，妈妈的小宝贝……”

第九章 救 命

救命呀！我害怕也没有用。我两手拨水，用力地游着。

我喊叫着游出了水面，浑身沾满了泥浆。哎呀，伊昂淹死了。

我拼命地喊了半天，克列谢家的伊昂还是歪着身子沉了底。他喝饱了水，肚子胀得鼓鼓的。

我以前也见过淹死的人。当死者被巨浪卷上岸边时，尸体浑身发紫，散发着臭气。你要是想瞧的话，只好用手捂住鼻子凑过去。

我从地上拣起湿渌渌的衬衣，急忙穿在身上。太阳从西边的山坡上投下一缕缕红光。阳光射向池塘，映得池水闪烁着时而发红，时而发黄，时而银灰色的浮光。

根古和他的弟弟图多拉凯站在我的旁边，直打哆嗦。要是根古不拉着他的手，图多拉凯一步也不往前走。他们俩像是一个人似的，去树林里玩也是手拉手，形影不离。

除了根古和图多拉凯外，站在我身旁的还有纳库、伊茨库、图塔努和图尔图里克，他们都是我的好朋友。

后背补了一大块蓝布补丁的伊昂的衬衣上沾满了黑泥，扔在河边上。这是淹死者的衬衣。你只要摸它一下，就会走运，要是穿上它，就更不用说了。克列谢的小儿子斯特凡会穿的，他不久前的名字叫格奥尔基。

家里人给他改名，一没去教堂给他做第二次洗礼，二没去村公所改动户口本，这两者都是不可能的。因为你出生后，虽然只知道哭叫和挣扎，什么也不懂，但神父却把你放进木盆里给你洒圣水，并且唱着“给上帝的仆人某男或

某女洗礼！"这只做一次。爸爸抱着你，到村公所给你报户口，由村文书把你的名字登记入册也是一次。其实去神父那儿不只是一次，瞧，我差点说错了。到该死的神父那儿一共要去三次：一次是你降生时；一次是你举行婚礼时；第三次是死的时候，不管你是好死还是歹死，或是像伊昂那样淹死都一样。

格奥尔基的父母听了郎中安格尔·纳伯达耶的劝告才给他改了名。

格奥尔基有羊痫风病。我们村还有其他人也有这种病。但我们家的人没有这种病。为什么要得这种病！

我们有时在街上玩，有时在场院玩，有时在河滩上玩，格奥尔基也和我们一起玩。格奥尔基一发起病来就跌跌撞撞地摔倒在地，手脚发抖，缩成一团，翻着白眼，口吐白沫，白沫咕嘟嘟地吐个不停。这时，某个胆大的男孩或女孩便跑上前掐他左手的小手指，以便把他掐醒，使他恢复知觉。的确，他好象有些感觉了！

大鬼小鬼在阴间里随意折磨他，用犄角顶他，用尾巴抽他的脸。大鬼小鬼把他戏耍够了，说让他醒，他就马上醒过来。魔鬼很快就玩腻了，因为他们要去的地方还很多，世界无边无际。

格奥尔基醒过来了，这小子如鸟出笼，恢复了常态。他睁开疲倦的大眼睛，茫然若失，四肢僵硬，浑身无力。他像是走了很远的路才从远方归来。但是，从何处？他用袖子擦了擦嘴，然后一跃而起，不好意思地蹒跚而去。我们

不理睬他，他走他的，我们玩我们的。

他的父母给他改名也无济于事。我们不再称呼他的旧名而换了一种新叫法。然而，病魔还是认出了他。病魔想找他就来找他。现在，那个大孩子淹死了，他的衬衣要留给小的穿，为的是让他洪福齐天。可这算什么福气。一件衬衣怎么会给他带来福气呢？何况这又是一件又脏又破的衬衣！要是一件新衬衣的话，倒还说得过去。

我们的呼喊声把人们召到了河边。

蒂察·乌耶和他的老婆弗洛雷亚抱着他们的两个小孩，我同他们从地里回到家里。一路上，杜米特拉和多布拉像小猫一样闭着眼睛。

我们从地里回来时，烈日当头，地上烫脚，热得难熬。

我急忙去找我的伙伴好凉快一下，也让大伙都凉快一下。我们要痛痛快快地玩一玩，尽快消除疲劳。我到街上随便一转就凑了一大帮。

“你们到水坑里去洗澡吗？”

“快来！……”

我们便成群结队地朝水坑走去。当我们走过大路时，一个庞然大物——脱粒机——挡住了我们的去路。后来，八头牛把它拉到河边，放在一艘汽艇旁。

很快就要给小麦脱粒了。但是，要先给大麦和黑麦脱粒。

那时克列谢正要套牛脱粒，他的儿子伊昂便从他身旁溜开，跟着我们这一帮人走了。伊昂是他妈妈的宝贝——

也就是说在刚刚淹死之前还是妈妈的宝贝——尽管他说话结巴，笨手笨脚，又缺心眼。克列谢宠爱他的女儿莫丽娜，她长得不算难看。好多小伙子都追她，这并不完全是为了土地。克列谢并没有多少地。再说，即使有地，他也不会给女婿。克列谢有点儿抠门儿，手很紧。但村里人都知道，克列谢家场院的那个粮仓下埋着金银财宝，满满一大缸银子和土耳其金币。

这些财宝有时还能显灵，在深更半夜里晃动。邻居们就看见过从粮仓的地底下冒出老高老高的蓝火苗。火苗从仓底下冒出来，一闪一闪的，时隐时现。但是，玉米仓并没烧着。当钱在夜里晃动时，你要是把手放在火苗上，并不觉得烫手，用它你也点不着烟。没有任何人去挖克列谢玉米仓下埋的那些金银财宝。因为这些金银财宝是被镇在地底下的，到时候，它们就会破土而出。这个时辰会到来的。

正是由于这些财宝的缘故，克列谢的孩子个个都有生理缺陷。因为克列谢的老婆怀这些孩子时，不注意从埋金银财宝的地方走过。后来，克列谢便在这块地上架了个玉米仓，为的是不让别人再踏上这块倒霉的地方。

伊昂同我们一起搭伴到水坑洗澡去了。

从村北山岗的那边流下来一条水很浅而又浑浊的小河。

靠着河的各村落都在河边筑起了一道土坝，并用木条、木棍加固起来。由于水流受阻，河床越冲越深，河面越来

越宽。但是，你要是有劲，仍可以把石子投到对岸。当然你要有臂力，否则只有用弹弓才能把石子弹到对岸。

在村北人迹罕至的地方，河水无拘无束地流着，河面上长满了一层浮萍。只有找食吃的鹅、鸭子和其它家禽在浮萍中游来游去。还有满身斑纹、张着大白嘴、瞪着大眼睛的青蛙也出没在浮萍中。在夜间，青蛙惊奇地睁开大眼睛，看着水里的奇景：红腿的螃蟹，黑的、紫的、花的长蛇，土黄色的鲤鱼，倏忽而过的泥鳅，腹部雪白的鲫鱼，大头细尾的黑蝌蚪，像线头那么小的五颜六色的微生物，它们成群结队地游来游去。青蛙在水上水下看到的真是千奇百怪，无奇不有。夜间，繁星映入水中，整个天空都映入水中。当有月亮时，月亮也映入水中。柳树睡得比人还熟，微风吹拂着树枝和树叶，使柳树睡意沉沉，进入梦乡。可是，河水从不入睡，总是不停地流呀，流呀。也许柳树也从不入睡。

我们常在水坝旁给牛洗澡，给马洗澡，给猪洗澡。我们也在那儿洗澡。水坝旁的水又深又清。但是，如果很多人都去那儿洗澡的话，水就会变浑。不过，只有星期天才遇到这种情况。今天是工作日，不是星期天。

我们原以为今天水坑只是我们的天下。可是到那儿一看，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一群姑娘、媳妇和老太婆早已捷足先登。当我们来到岸边时，便听到她们尖声怪叫、唧唧喳喳的嘈杂声。

“这些娘儿们在水坝那儿洗澡呢！”

“那我们再往上游走一走，到科图·瑟尔布去洗。”

走到半路，我们停住脚。对，我们想起来了，克列谢家旁边是邮局，邮局的那一边是鲁楚家。

鲁楚去年当了铁路扳道工。现在可阔了，他衣服上的扣子是铜的，而且闪闪发光。他头上戴的无沿帽还镶着一圈红边。他把全家都搬到车站去住。他把原来的房子租给了养路工迪马凯·米库。迪马凯那厚厚的嘴唇上留着小黑胡子，是个美男子。这个养路工是城里人。他负责填坑，堵洞，泥缝，保护路面。他常和甘丘医生、会唱歌的波佩斯库·布拉加迪鲁老师以及临时来村里的绅士一起下酒馆。他没有老婆。他有一个长筒望远镜。有时晚上我到养路工那儿去，就用他的望远镜看星星，看月亮，看银河，看我喜欢看的一切。鲁楚的场院通向小河边。每当日落黄昏时，女人们就去河边洗澡。这时养路工迪马凯·米库便夹着望远镜急忙跑到栅栏旁，蹲在草垛里对好望远镜，瞧女人们洗澡，瞧得直流口水。

女人们发现有人偷看她们洗澡。她们生气了吗？没有，她们比小牛犊跳得还欢，她们互相追逐，打水，叫喊。年纪大一些的胖女人跳得更高，毫无忌讳。

“喂，你们说养路工是不是在用望远镜看女人？”

我们走过去察看。我们先是朝草垛里扔了几块小石子，然后从栅栏上折断了几根木条，用木条搔动了几下毒芹草，毫无动静。这说明养路工没有用望远镜瞧女人。于是我们便成群结队地往前走去。

"快，我们到科图·瑟尔布去洗澡。"

"不。"克列谢家的小子坚持说。"我们到水坝那儿瞧女人去。"

我们有什么办法！只好跟着这个缺心眼儿的小子走。女人们正洗得痛快。我们脱下衬衫和衬裤，跳进浑浊不清的水中。女人们根本不把我们放在眼里。瞧，这真使我们有点儿伤心。我们混在她们当中，开始从水下拽她们的小腿，摸她们的腰，逮着就揪一下。她们笑着骂我们，用湿手打我们，还揪住我们的腿假装要把我们淹死。我们玩得很痛快。伊弗努什家的姑娘佩特里奇卡离开我们这些吵吵闹闹的人群，像男孩子那样朝对岸游去。克列谢家的小子伊昂紧追不放。忽然，他的腿不听使唤了，他好像是喊了一声，可是此刻大家都在大喊大叫，又有谁去听他的喊声。伊昂本来就不会游泳。他在水里急得乱扑腾时，也许头露出过水面，但我们没看到激起的水花。最后，他沉下去了，沉到水底。在我们还没有弄清楚他出了事之前，我们还在打水仗呢。等我们知道他出了事后，都吓坏了，赶紧上了岸。哎呀，克列谢家的小子淹死了！女人们也吓坏了。伊昂就此一命呜乎。大人们都拥过来，瞧，他们急忙脱下衣服，跳入水中去捞伊昂。

"喂，他大概在什么地方沉下去的？"

'西米翁大叔，在窟窿这儿。"

"佩特拉凯大叔，不是那儿，大窟窿在这儿呢。"

"不，不在那儿，也不在那儿。这儿才是伊昂沉下去的

大窟隆。"

水底到处是大窟隆。人们闭上眼睛扎向水里，头一直碰到烂泥。他们像瞎子一样用手摸，用脚蹬，直到精疲力尽，然后脚一蹬，游上水面，吸口气后再钻进水中，如此反复不断。如果你从远处看这个水坑，而且你也不知道这些男人在水里找什么，你会以为他们在玩一种新的古怪游戏。我们站在岸上的这些人提心吊胆，屏住呼吸并用焦急不安的目光看着他们。

克列谢手里拿着一根长竿子，象有死鬼在后面追他一样，飞快地从村里跑来。他的老婆亚娜手拽着围裙哭嚎着跟在他后边。他们已听说他们的小子淹死了。

"你们找到了吗？"

"还没有。"

克列谢急忙脱下衣服，拿起竿子跳进水中，胡乱戳打。

"快把钩子拿来。"

全村人都来到河边。一些人在旁边观看，另一些人跳下水去寻找。水坑里人声嘈杂。拿来了钩子、叉子。有的人还抱来一张大鱼网。这时，克列谢突然喊到：

"在这儿呢……在这儿，找到了。"

谙水性的人很快游了过来。他们抓住伊昂的腿，把他拖上岸。伊昂浑身沾满污泥，软作一团。他双眼圆睁，肚子鼓鼓的灌满了水。他们把他平放在岸上，盖上草。人们点着蜡烛，在灰罐里烧起香。

太阳在戈尔甘那边下山了。现在水坑泛起暗淡的波纹，

天空中聚起朵朵乌云。我们目睹了发生的一切。

"快，回家吧！……"

我家的场院里寂静无声，房门紧闭。母鸡都已进窝。从中午到现在，我滴水未进。洗澡、溺水的恐惧，回村不得不经过伯杜列亚萨庄园，这一切都使我疲惫不堪，心灰意懒。我真想到隔壁伯母家去要口吃的。但是，我伯母和我妈一向不和。妈妈一提起她，就管她叫"嗡嗡叫"。我只好躺在门廊前睡起觉来。街里传来了老牛拉破车的声音。

妈妈把我叫醒。

"达里耶，快起来吃饭。"

我起来了。妈妈她们何时回来的，何时做好的玉米糕，我一无所知。

"乌耶家出了什么事？"

"弗洛雷亚大婶在路上生下两个女孩子。"

"两个女孩。"

对这种事，大家并不感到惊奇，都已习已为常。在此地，女人们到处都生孩子：在家里，在地里，碰到哪算哪儿。只是不在教堂里生，因为她们不常去教堂。

我把克列谢的小子怎么淹死的告诉了她们。

"瞧，谁让你们乱跑。幸好你没淹死。"

今天真扫兴。

教堂里的钟疯狂地敲着，钟声划破夜空。大钟小钟响

个不停。

或许有人喝醉了酒，不由自主地在深更半夜里敲起了钟。但是，不是这样，并没有人喝醉。因为大家同时也听到了老兵迪什的号声和小职员杰安特的打鼓声。我们睡眼惺忪地从床上爬起来，直奔村公所想知道个究竟。女人们已在门口哭喊起来。钟、号、鼓在深夜里齐鸣。如果不是要打仗了，还会是什么事呢？

在多瑙河那边，仗已打了两个夏天。直到去年，河那边还是保加利亚人的菜园子。一到春天，他们就弄来满口袋的种子卖；过来修棚架，修理水车。我认识这些保加利亚人。我认得伊万，斯托扬，帕代里耶，他们大约有十五个人。他们之间说保加利亚话，同我们讲罗马尼亚语。他们这一帮人里，伊万最大，秋天，他搭起棚子把蔬菜批发售卖，他管钱管帐。斯托扬和帕代里耶赶着车到各村去卖菜，收现钱，也可以拿玉米面、玉米换，有麦子的用麦子换菜也行。其他的人白天干活，夜里拿着木棒看菜园子。活干不过来时，他们就到村里来吆喝：让小孩子们到保加利亚人那儿干活去。于是我们就去了。我们拔蒜地和葱头地里的草，跪在泥地里栽圆白菜、茄子、西红柿、萝卜、大葱。在保加利亚人那儿干一天活下来，个个脏得像泥猴。菜园地头的棚子前种有石竹和菊花。自己带饭干一天活，女孩子挣两个巴尼，男孩子可挣三个巴尼。要是大小伙子，掘一天地可挣到五个巴尼——一个小银币。

保加利亚人赶着菜车走街串巷叫卖：

“买菜啦！……”

女人们围在菜车旁。她们端来玉米，换回辣椒、茄子和葱头。因为，野菜里要是不放点辣子，吃起来就淡而无味。

去年夏天，那些保加利亚人没来。今年夏天也没来。于是，人们把地耕了，种上小麦、大麦和黑麦。河滩地很肥沃，小麦长得有马背那么高，有的比马背还高。

我们终于得到了我们所认识的那些保加利亚人的消息。

“伊万死了。”

“斯托扬死了。”

“韦尔丘死了。”

“安东死了。”

“我们认识的那些种菜的人都死了。他们都是在同土耳其人打仗时死的。”

“幸好我们这儿没打仗。”

男人、女人和孩子在地里干活，个个汗流浃背。

“幸好我们这儿没打仗。”

如果死神要降临在你的头上，你也躲不开。死神摄走你的魂，留下的只是你的躯体。

钟声、鼓声、号声响个不停。

狗叫着，像狼一样叫得瘆人。

吉克·斯特内斯库脸色严峻，他昨晚就知道了这个消

息，村长也是昨晚得到消息的。村公所的屋子里灯火通明，门前的灯笼也点着了。全村人都集合到村公所。伦卡打开咖啡馆的门，她连头巾都没戴，披头散发地来到街上。她脚上趿拉着软底拖鞋，身着白色透明的裙子，里边看得一清二楚。从她身边走过的小伙子们真想把她堵到教堂的栅栏旁，然后按倒……宪兵尼古拉·米耶卢谢尔打开一个黄色信封，抽出一张纸读道：动员会。

宪兵米耶卢谢尔十分得意地高声喊着：大家听着，明天都背着行李卷到车站去，然后到你们团部去报到。我们现在和保加利亚人交战了。谁要是不去，那可就倒霉了，就要像打死狗那样把他枪毙掉。

为了表明他不是在开玩笑，便举起手朝空中放枪。

人群里一阵哗然。

“和保加利亚人打仗？”

“我们和保加利亚人有什么过不去的？我们本来是朋友。幸好伊万、斯托扬他们死了，不然的话，我们要和他们交锋了，那多可耻。要是同他们厮杀，互相射击的话……上帝呀，那可太可怕了，上帝！！”

村里没有一个人睡觉，家家哭声震天。尽管如此，各家还是生起火，急急忙忙地赶做大大小小的硬玉米糕，给应征入伍的人带着路上吃。女人们翻箱倒柜地给他们找出破衣服，让他们穿上对付到部队。到部队后，就要给他们发枪，发子弹，发水壶，还发给他们穿上就脱不下的军装和

箍脚趾头磨脚腕子的靴子。

蒂察·乌耶的两个女孩，身上裹着破布，头挨着头睡在一个大木盆里，两张面黄肌瘦的脸露在外面。

“弗洛雷亚，你要好好照顾孩子。”

“蒂察，你要平安地回来呀！”

狗叫得像狼嗥一样瘆人。村里村外哭声连天。小伙子们在敲门同自己的心上人告别。

“伊瓦娜，我要走了。”

“莫丽瓦娜，一个钟头之后我就要走了。”

“伊琳卡……”

“斯塔娜……”

“格奥尔基娜……”

“卡特丽娜……”

老兵迪什把号放在腿上，背靠着村公所的墙坐在木墩儿上。那把铜号经过多年磕碰，已变了形。一八七七年当雄楚和瓦尔泰尔·莫勒奇内亚努在格里维察死在土耳其人枪弹下的时候，是迪什吹响了冲锋号。

“一八七七年，我们参加了战争，我们流了血。在保加利亚的土地上，我们战士的白骨堆积如山。那时，趁着同土耳其人打仗间歇的时间，我们曾聊天说，‘我们要是能活着回去的话，就会过上好日子。因为会分给我们地，而且不再向土耳其人交税纳贡了。’但是，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一切依然如故，情况甚至比以前更糟，地主比以前更加残忍。

现在国王同邻国打仗需要炮灰的时候，又想到我们了。”

“你这老家伙在啰嗦什么？”

“说我过去经过的事。”

“那时我们同异教徒土耳其人打仗，现在我们要同保加利亚人打仗。我们是基督教徒，他们也是基督教徒，真是作孽呀！”

克列谢也应征入伍了。他那个淹死的孩子只好由别人埋葬。留在村里的上年纪的人会埋葬他的。神父会在灵前给他唸经送葬，阿门！

天亮时，村里人少了一半。车站上人山人海，挤得水泄不通。有些女人跑来给她们的男人送干粮，哭得难舍难分。

一辆辆货车突突地从鲁什德维德不停地开过来。壮丁们上车后，火车一声长鸣，开走了。火车突突地开来，又突突地开走。火车空着来，走时满载，朝多瑙河方向开去。

多瑙河的对岸就是保加利亚，那里生活着保加利亚人。多瑙河对岸在打仗。

宪兵从克尔默楚伊村南村北把成群的赤脚壮丁赶向车站。

“老兄，你是哪村的？”

“伯格内什蒂村的。”

“你呢？”

“瑟卡拉村的。”

宪兵在车站旁的酒馆里喝酒。喝够酒后，他们站在棚子底下用枪打杨树上的乌鸦。既然在打仗，就得有枪响。

他们用火车运来了烤面包机，并依次卸在车站后面的仓库里。爸爸已经超过了服役年龄，所以被派来做面包。他整天和面，烤面包。烤炉是黑色钢板做的。面包出炉时，冒着烟，面包烤糊了，里边是软的，又生又苦 。现在，火车从北部把摩尔多瓦的壮丁运向多瑙河。在车站上，给壮丁们发酸面包和水壶。

“你们这儿没有苹果？”

“没有。”

“也没有李子？”

“没有。”

“槐树有没有？”

“槐树不结果呀！”

有些壮丁跟我们开玩笑，笑话我们这里没有果实累累的果树。因为我们这儿的地不适宜种果树，我们有什么办法。

米耶卢谢尔揪着我的耳朵问：

“喂，你到这儿来干什么？”

“来看热闹。”

“别瞧了，看久了要瞎眼的。”

然后，他恶狠狠地推了我一下。

我整天在车站守在爸爸旁边。我喜欢看开过的一辆辆运兵车。我看见火车上还载着牲口，也装着裸露在外的大

炮，一辆辆地向多瑙河方向开去。一大帮预备役军人在伙房工作。这些人中，只有够上军官级别的才穿军装。我爸爸是士兵。

"爸爸，你服现役的时候怎么没当上中士？"

"因为我不识字……军官必须识字。"

我们家除了我之外，谁也不识字。

大锅里熬着菜汤，熬的是青菜和几个带皮的土豆。午饭时，预备役士兵端着饭盒用木勺喝菜汤，吃的面包都是发霉的，一嚼就得往外吐。我也用爸爸的饭盒喝汤。我把士兵们扔掉的面包拣起来，晚上用衣服包着带回家喂猪。猪一闻到霉味儿，也不吃，宁可去吃青草。

军官们吃小灶，他们吃的面包是从城里运来的白面包。

"妈的，你们为什么把面包扔了？"

"大尉先生，面包是苦的。"

"是甜的，哼，是甜的！"

"也许是甜的，可我们吃着苦。"

"你们这是在糟蹋国家的财产，你们这群婊子养的！"

并排放着六个黑黑的烤炉，白天黑夜烤个不停。烤好的面包装进口袋，然后再装上火车运往保加利亚。火车过多瑙河靠轮渡。一袋袋装着面包的口袋就码在敞篷车厢里，有时一连几次挨雨淋。这也没关系，雨过天晴，夏天的烈日很快就把面包晒干，不过面包却发霉变绿了。

"爸爸，你渡过多瑙河吗？"

"一八七七年我过去过。那时我已是大小伙子了。你爷爷和车都被军人征用。我也上了车跟着你爷爷去看打仗。"

"你看到打仗了？"

"看到了。我看见俄国人，还看见被俘虏的戴小帽、身穿灯笼裤的土耳其人。那是冬天，那些异教徒穿得很单薄，不少人死在雪地里。要是夏天的话，这些尸体就会腐烂，发出冲天的臭气。你爷爷对那个地方很熟悉。年轻时，他交过一个土耳其朋友，你爷爷的这个朋友可是个土皇帝。

"那时，每年秋天，你爷爷都给这个土耳其人送盐、送蜂蜜和羊毛。这个土皇帝家财万贯。他有五个老婆，整天把她们关在家里。有一次，他得意洋洋地带你爷爷去看他那几个老婆，并且还命令她们揭掉面纱。

"'老朋友，你看看她们。'他催促着你爷爷，你爷爷瞟了她们一眼。

"'喂，告诉我，你喜欢哪一个？'

"'老爷，'当我们向土耳其人称臣纳贡时，我们的父母就这样称呼他们，'都很漂亮。'

"'这不假。但是，我问的是你喜欢哪个？'

"你爷爷随意指了一个眯着眼 黄皮肤的女人，那个年轻女子笑了。就因为这个，土耳其人便把她推到一边，从腰里掏出手枪，立刻把她撂倒在地。

"'既然你喜欢她，我就不能再喜欢她了。'

"你爷爷套上牛车走了。从此，你爷爷再也不给这个土耳其人送盐、羊毛和蜂蜜。这些都是过去的事了，人也变

了。当我再见到土耳其人的时候，他们已经没落了。他们的黄金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他们在持刀骑兵的追赶下，狼狈逃窜。"

麦收都是老人、妇女和儿童干的。在邻村的河滩地上，脱粒机响个不停。脱粒机的高烟囱里冒出黑烟。满身油垢的司炉不断地往炉里扔麦秸。现在是给地主的小麦脱粒。脱粒机扬起的呛人的尘土一直飘到村里，飘过教堂顶。管家拿着翻开的帐本在旁边坐着。雇工们都在脱粒。

"伊斯特拉代，圣诞节时，你从老爷那儿借了三斗小麦。你还记得吗？"

"管家，我记得是借了两斗呀。"

"这儿写着呢，你借了三斗。"

"既然是那样写的，就算三斗吧。"

"圣诞节时，小麦可贵啦。"

"是贵呀。"

"现在很便宜，因为麦子下来了。"

"是便宜。"

"你借的那三斗，现在要还九斗。"

"管家……"

"伊斯特拉代，圣诞节时，你还得来借小麦的。"

帐就这样还清了。对于管家的宽宏大量，你还得奉献给他一只母鸡，一只火鸡，一大碗鸡蛋和其它东西。到头来，你只背回家一口袋小麦，把它扔在门廊上，要是省着吃，可

以吃一个月，也就是说，必须掺着菜吃。打的小麦很多，然而，吃到嘴里的却很少。

从保加利亚传来了令人宽慰的消息。保加利亚人扔下武器撤退了。他们仗打腻了，不再想跟罗马尼亚人作战。我们的战士正向巴尔干挺进。和平会在无牺牲的情况下得以实现，村子里又听到了歌声。

"玛拉塔，你男人给你来信了吗？"

"佩尔舒家的孩子给我捎话来了，说他很健康，等掰玉米棒子的时候就回来。"家家都是这种说法。

一段时间里，这种消息确实很盛行。

但到了夏末秋初，传来了另一种消息。霍乱像瘟疫一样，一夜之间骤然侵入保加利亚境内，很多保加利亚人丧生。河水和井水都被病菌污染，机井里的水也有了毒，而水又毒死了人。烈日当头，沙石地晒得滚烫。瘟疫迅速蔓延开来。不少士兵在返回家园的沙土路上倒下死去。倒下的就倒下了，只有等死，无人过问。

"佩特拉，你男人有消息吗？"

"在科拉比亚隔离呢。"

"莫尔格丽塔，你男人呢？"

"我男人在齐姆尼恰隔离所。"

"米塔凯死了，他死了，死在图尔努。在他的身上撒上石灰后，就赤身裸体地把他埋了。"

女人们用叉子把麦秸挑成堆，然后码成尖垛以免雨水

渗入。现在已是秋天，可是夏天的酷热仍未消失，大地烫得像火炭，整个天空像是在燃烧。树木枯萎，大片的玉米干死了。热风吹拂着干透的玉米叶，发出沙沙的响声。玉米棒子的顶部已干裂，露出了黄的，红的，白的玉米粒。

昨晚，在通向图尔努方向的岗子上驻下一个摩尔多瓦人步兵团，于是村里人都一齐拥向营房。

"你们身体都没事吧？"

"都好。"

"你们后面还有部队吗？"

"有。"

"你们没把病带来吧？"

"没有。"

一夜之间，兵营里闹起瘟疫。营房四周都布了岗哨。

甘丘医生在村公所骂起街来；村公所文书斯特内斯库吓得脸色发白，也骂起来；宪兵尼古拉·米耶卢谢尔跺着脚骂得更厉害。

瘟疫骂不倒，你骂你的，它照样进了村，窜到各家各户。瘟疫破门而入，闯进嘴里，遍及全身，使人倒下。

当局急急忙忙从皮特什蒂运来一车厢石灰，把它卸在村公所门前，然后分给各家各户。

"你们都把房子刷一刷。"

人们刷了房，有的刷屋的里面，有的刷屋的外面，因为要是里外都刷的话，谁家的石灰也不够用。

“你们别跑出院子。”妈妈嘱咐我们说。

“你们只能喝开水。”爸爸告诉我们说。

“你们不要再吃李子了。”波佩斯库·希拉加迪鲁老师这样告诉我们。

说的这些都对。但是，你怎么能闷在家里不出去看一看拉死人的车呢？！死人个个都是赤身裸体，发黑的皮肤包着一身骨头，眼睛瞪着，张着黑嘴，吐着发紫的舌头。人们不断地朝死人身上撒石灰。你怎么能做到喝开水呢？要是喝开水，就得随身带着水壶，这样的话，壶会碰碎的！那多可惜！再说，在尘土飞扬的酷暑，只有喝下清凉的井水才解渴。对，还有桑椹呢！你怎能不吃呢！……你又怎能不吃李子！……

我们在饭桌上谈论着村里又有谁死了，又有几个大兵被车拉到墓地去，谁生了病又快好了。这时，爸爸给我们讲起以往的事：

“你们都知道米赫依察·博贝列亚克表叔……他去年死了。他年轻时，这里闹过一次霍乱，死了不少人。一天夜里，他从蜂房回来。那时，他在乌尔鲁依河谷的树林里养蜂。当他进村——那时还算不上村，只有几户人家的时候，有个穿黑裙子的老太婆迎上来央求他说：‘喂，米赫依察，我想到勒多伊家去，可我进不去，他家有条黑狗。你背着我，把我送到他的门口吧。’博贝列亚克叔叔没有办法，只好把她背起来，老太婆轻得很，他飞快地把她背到门口后，急忙朝家跑，浑身打着哆嗦。第二天清晨，勒多伊家的大人

都死了，只剩下一个吃奶的孩子在床上哭着乱爬。也许孩子清白无辜，所以霍乱饶了他的命。邻居们为了省劲，便砍断房子的大柱子，让房子倒塌，就此把死人压在底下了事。”

“迪什的女婿德勒亚勒也死了。”

“迪什的老婆也死了。”

“可是老兵迪什却壮得像头牛。”

人们用床板粗粗地钉成棺材，一个棺材装两个死人。人们先把德勒亚勒放进棺材，然后再把他的丈母娘放在他的上面，棺材盖盖不上了。这时，布祖里克便跳上棺材，用脚使劲踩，发出了吱吱的声音，尸体被压得变了形，脸也变形了。棺材盖终于盖紧。尔后，村里的铁匠万察钉上铁钉。万察是格拉迪娜的男人。

“你把棺材装上车。”

车上共装了五个棺材。

我们看着灵车从学校——现在又变成了医院——门前出发，开往墓地。神父和教堂执事弗洛克走在灵车的最前面，神父一边摇着香炉一边祈祷。教堂执事也摇着香炉，嘴里呛着“阿门”。

村里的吉卜赛人布祖里克和万察跟在灵车边，他们是被指派去埋死人的。瞧，他们现在跟着去埋人了。

墓地周围用两种不同的栅栏围着，一种是风吹雨打后变黑了的栅栏，一种是刚竖起的白色新栅栏。

这个墓地以前很大，现在又扩大了，比以前扩大了两

倍。

神父每天要摇着香炉送好几次葬，教堂执事每天也在村子和墓地之间往返几次。我们经常听到"阿门""阿门"的祈祷声。

第十章　小　辫

妈妈生了几个孩子？到现在为止，共生了十个。我，达里耶是第九个降临世间的。生下我一年以后，又生下了我的妹妹埃莉萨贝塔。每星期六晚上，我们都挤在外屋，脱下衣服，在木盆里洗澡。我们在身上擦肥皂，肥皂又黑又硬，硬得像石头，但还是起点白沫。身上洗干净之后，如果有衣服可换，还可以换上衣服。

"来，我给你们洗澡，别长上虱子。"

我们这几个男孩子洗澡比较简单，可姑娘们洗起澡来就麻烦多了。她们梳着长辫子，有的梳得好，有的梳得乱。要是妈妈给她们解开辫子，梳头发，再把辫子扎起来，那可是个头疼事。

妈妈把我们打发到靠墙的床上去睡觉。床上铺着席子，顶头放着用麦秸填起来的麻布枕头。我们盖好身子就睡觉了。

墙上的油灯暗淡无光。我头上的墙上挂着一幅圣像画，

圣人格奥尔基骑着白马奔驰在一条绿色的龙上。圣人的标枪刺穿了龙的三个头，三股鲜血喷出来。鲜血染红了白马的四蹄，圣人神采奕奕。

圣像画的一角，升起一轮红日。它有眼睛，有眉毛，有嘴，活像人的面孔。圣像画旁边挂着一瓶圣水和一束香草。

床上靠窗子的一边放着一个杂物箱，里面装着桌布，手巾，节日穿的衣服，我姐姐丽察的裙子，爸爸当年当骑兵时买的靴子，纳税单，还有一个干猪尿泡，里边放着妈妈为我们几个孩子保存的脐带。

到现在为止，妈妈共生了十个孩子。妈妈在箱底的干猪尿泡里细心地保存着十个脐带。每到斋戒时，妈妈总要把屋子清扫刷洗一遍。那时，屋里的东西全搬到院子里，放在桑树下。就连放炊具用的架子也要搬出去。妈妈趁此机会拿出猪尿泡，掏出里边的脐带——就是一些肠子头——拿给我们看。时间一长，脐带全变黑了。

"这个脐带是埃万吉莉娜的。这个是死了的阿列克塞的。瞧，这个是伊昂你的；这个是格奥尔基的，他走了，我好久没见他了；这个是图尔塞的，图尔塞也死了；利桑德拉也进了坟墓。丽察，这个用蓝线拴着的脐带是你的；达里耶，你的脐带用绳子扎着，你的脐带真大；嗯，列娜的脐带哪儿去了？"

妈妈最终找到了。妈妈还找出了埃莉萨贝塔的脐带。妈妈看着手里捧着的这些皱皱巴巴的脐带。

妈妈坐了十次月子，给了十个孩子的生命，其中三个

孩子刚生下不久就死了。每次妈妈把脐带放进尿泡里，上面还放了几根香草，然后把尿泡口扎上放进箱子里的一个小盒里。

丽察把被子拽了过去，我的身子露出来。

"嗯，别拉被，我冷。"

被子太小，要是大家都能盖住身子，只好挤得紧紧的，挤在一起也暖和。油灯的火苗晃动着，微弱的灯光照出的影子模糊不清。

每当妈妈喊我们洗头时，埃莉萨贝塔就非哭不可。于是，妈妈每次都讲故事给她听：从前有个傻姑娘不听话，不让妈妈给她洗头。后来身上、头上都长了虱子。有一天，虱子们商量好，拧成了一条绳子，把这个姑娘拖到小河边，然后把她推进河里淹死了。

"现在，你想不想进澡盆？"

我妹妹哭着，最后还是下到澡盆洗澡了。因为在澡盆里洗澡总比在河里淹死好。

妈妈进了屋，开始梳辫子。她的头发干得像麦秸，但很长，长过了臀部。妈妈年轻时，她把埃莉萨贝塔抱在怀里，把我背在背上。她的肩像牛脖子被轭勒的那样磨出了腿子。不管妈妈到哪去，总是抱着妹妹，背着我，其他几个都是拽衣拉袖地像小鸡跟母鸡一样跟在后面。

妈妈的个子依然是那么高，只是不那么苗条了。她的腰变粗了，又要生孩子了。妈妈睡在埃莉萨贝塔旁边，我

也挨着埃莉萨贝塔睡。我的另一边睡着其他兄妹。爸爸还是睡在地上，把床上的地儿让给我们。

“妈妈,不熄灯吗?”

“不熄灯。”

妈妈怕熄灯，尤其是今天晚上更怕熄灯。

妈妈躺下,但她翻来覆去地睡不消停。她像是被什么咬着似的，蜷缩着身子。可能有什么东西咬她。妈妈难受得哼哼起来，但声音很低，为的是不让我们害怕。

“伊昂，快去把斯塔娜婶婶叫来，还有佩特里亚,也把我的女儿叫来。”

伊昂急忙穿好衣服下床。爸爸不在家，他下午跟着几个买小麦的希腊商人到奥洛吉村去了,明天晚上才能回来。我们也都坐起来围在妈妈周围。我们知道是怎么回事——一个星期前,埃万吉莉娜姐姐生拉拉的时候就是这种情景。

埃万吉莉娜是我们的大姐，她是去年冬天出嫁的，很快就生了一个孩子。她出嫁时才十五岁，现在十六岁。妈妈这时在床上缩成一团，双手紧握。她的额头和鬓角都渗出了汗珠。我叔叔珀乌内·瓦卡的妻子斯塔娜婶婶也来了，他们住在铁道北边的村口上。

“唉呀，老嫂子，你就要生了。唉呀,你很快就卸包袱了。”

全村人都叫斯塔娜婶婶“唉呀”,她长得干瘦,是个不生育的女人，走起路来慢腾腾的。为了解闷，她在井边拾了一个小孩，他就是斯特凡哥哥。现在,已给他娶了媳妇。

斯塔娜婶婶到我家来，妈妈并不高兴，因为她爱说闲话。其实这不是主要原因。最令人讨厌的是，她一来就要一把刀子，然后就在炉灶里或烤面包的炉壁上抠焦土吃，抠一块吃一块，光用牙嚼，然后嚥下肚。

这个"唉呀"婶婶如果不吃焦土，就好象没吃饱，所以她每天都要吃焦土。不管到谁家串门，她都抠人家的炉灶和面包炉上的焦土吃。

"唉呀，大嫂子，你马上就卸包袱了，那就轻松了。"

妈妈毫不理睬。她鬓角上渗出大汗珠，脸上、额头上的汗珠最大。

圣像画上，格奥尔基骑着白马，白马踩在一条龙上，那是一条绿色的龙。圣人的标枪刺穿了龙的三个头。灯苗晃动着，暗淡的灯光使我们落在墙上的影子模糊不清。

佩特里亚的一只眼睛患了白内障，脸上有雀斑，她专给别人接生。村里要是死了女人和小孩，她也去给死者洗身。为此，人们每次给她一簸箕玉米面作为报酬。给人家接生时，她和迪瓦伊卡老太婆一样，只要一玻璃罐白酒和一个大面包。

"去烧一锅热水。"佩特里亚说。

我姐姐埃万吉莉娜怀里抱着熟睡的小女孩去烧水。这母女俩，真像是大胖娃娃抱着小胖娃娃。

我们这些孩子都被佩特里亚和"唉呀"婶婶赶到外屋去了。她们不让我们看妈妈挣扎的样子，也不让我们听妈妈的呻吟声。我们是看不见妈妈了，但还能听到妈妈的呻吟

声，而且妈妈叫的声音越来越大，吓得我们毛骨悚然，浑身打颤。这时，我们觉的寒气袭人。我们从草棚里装来一筐麦秸铺在地上，然后躺下睡觉。

"妈妈会生个什么？"

"会生个男孩儿。"

"你怎么知道的？"

"我知道。你看，到现在为止，妈妈是这样生的：一个男孩，一个女孩，一个男孩，一个女孩。丽察，生了你之后，妈妈就生了我，我之后，便生了埃莉萨贝塔。埃莉萨贝塔是个女孩，现在该生个男孩了。"

今年秋天，雨下过后，瘟疫止住了，村里也没再死人。一天，住在城里的妈妈的大哥，托奈舅舅来到我家，他是来向妈妈要钱的。他知道妈妈箱子里藏着两个陪嫁的金币，这两个金币是外婆从头环上摘下来的。为了借这两个金币，他还对妈妈动了手。他在城里开小饭铺，既然要借钱，说明他的生意不兴隆。

"我不能把钱给你。"妈妈对舅舅说，"我就有这么点值钱的东西了……你不能让我倾家荡产啊！"

托奈舅舅一气之下走了。在舅舅和妈妈吵架时，我正同舅舅的孩子、我的表弟米舒在院子里玩，后来便跟着他爸爸一起走了。

"你们兄弟几个？"

"五个。"米舒对我说。"妈妈说，以后仙鹤再给我们叼一

个来。”

我听后捧腹大笑，简直要笑死。我的表弟真傻，他怎么会相信仙鹤能叼来小孩呢！……每到春天，我都能看见仙鹤飞来，秋天，又看见它们飞走。仙鹤一来，我们就脱掉鞋，光脚走路。仙鹤飞来，说明春天到了。既然到了春天，那就不必穿鞋。仙鹤飞走，我们又穿上鞋，因为快下雪了。仙鹤飞来时，并未叼着孩子。仙鹤成群结队地飞来，然后飞回它们的窝里。有一对仙鹤在我家的玉米仓架上筑了窝。母仙鹤在窝里下了蛋，还孵出了小仙鹤。母鹤孵蛋时，公鹤便去池塘捕捉青蛙，然后叼回来给母鹤吃，直到吃饱为止。为此，我们还编了一首歌。那时，我把这首歌告诉了我了表弟米舒：

嘀，嘀，嘀，
母鹤下蛋孵小鹤，
公鹤还没架好窝。
飞到我家灶火旁呀，
叼走做饭用的柴禾。

小仙鹤像小鸡、小鸭、小鹅一样是从蛋里孵出来的。但是，母牛下小牛；母山羊下小山羊；母绵羊下小绵羊。小孩是妈妈生的。所以女人生孩子时疼痛难忍。我的表弟傻乎乎地看着我，他一点儿也不懂，这个城里的孩子呀！

我们睡了，睡着了，又醒了。

妈妈一连挣扎了三天三夜！爸爸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早饭、午饭、晚饭，我们三顿饭都吃玉米渣糊糊。女人们来来往往，外村的女人也来了。

第四天早晨。

"死神就要降临在妈妈头上！"

"妈妈不会死！"

我们有的在门廊，有的扒着窗户，有的站在门口听着。

妈妈生了个小弟弟，我们都拥进屋去看。小弟弟又胖又大，头也不小。斯塔娜婶婶抱着浑身湿淋淋的小弟弟，吻他的前额，嘴都被弄髒了。

"唉呀，这小孩儿，我们这就给他洗礼，让他叫我儿子的名字斯特凡吧。"

谁会反对呢？

现在没人再理妈妈了。妈妈脸色蜡黄，颧骨突起，瘦骨嶙峋，盖着破被躺在床上，像是在睡觉。爸爸走到她身边，吻她的脸。妈妈睁开两眼，微笑着说：

"真难受。"

"唉呀"婶婶在我家帮忙的这几天中，不停地用小刀刮我家灶膛上的焦土吃，甚至把烤面包的炉盖也吃掉了四分之一，因为她喜欢吃焦土。我们会把灶膛修好的，还要换烤面包用的炉盖，我们在玉米棒子底下还存着几个炉盖。

妈妈病倒了，浑身像散了骨头架似的，下不了床。她连端杯水的劲都没有。只要动一下，就得要我们扶她。

"妈妈，你哪儿疼？"

"我哪儿也不疼，就是心慌。"

妈妈用手指了指肚子，肚子瘪了个坑。于是在瘪下去的地方放了几块布填起来。妈妈眼窝深陷，目光无神，乳房也软得耷拉下来——奶水枯竭，露出了肋骨。

爸爸请来甘丘医生。

医生站在屋门口看了一眼，失望地走开。他走到大门口停下来，对爸爸说：

"准备后事吧，你老婆活不到圣诞节了。"

入冬已很久，圣诞节即将来临。过了圣诞节，紧接着过新年。过了新年，又是主显节。圣诞节时，我们出去要圣诞礼物。新年时，我到各家去拜年，然后拿着别人给的压岁钱到杂货店买糖块吃。主显节时，我在水井旁边做祈祷时冻僵了。我哥哥伊昂是骑着马来到水井旁的。净水仪式完毕，宪兵打完枪之后，他也和村里其他小伙子一起去参加赛马，马鬃和马尾巴上都拴着香草枝。

人们将一把一把的香草扔进井里。装圣水的瓶子里也漂着香草叶。

在主显节这一天，村里村外，田野树林，到处散发着香草的芳香。香草的芳香飘散在雪后新鲜的空气里，令人心旷神怡。

一路上，小伙子们骑着飞奔的马，放声歌唱，跑到车站时，马已经累得口吐白沫。

瞧，主显节过去了，积雪开始融化。复活节说话就到。

现在，村子里的柳树、白杨、槐树都钻出鲜嫩的绿芽；青草又复活了。妈妈并没有死，虽然她一直病得卧床不起。现在没人给我们洗澡了。爸爸的胡子也长了，脸变黑，两眼也陷了下去。

我们曾经去过的原野，到处丘陵起伏，每个丘陵都有自己的名字。在耕过的丘陵地上，播下了种子。秋天，下雪之前，当我们骑马去机井和葡萄园时，看到有的丘陵坡下有刨过的坑。传说，丘陵底下埋着金银财宝，所以好几个丘陵坡下到处是挖的坑。财宝没找到，却在丘陵底下挖出了标枪、马镫、头盔、人骨头和马骨头。人们不死心，还是不断地在那儿刨来刨去。也许有一天，一些走运的人会在那儿挖出藏在地下的宝贝。

朝图尔努的方向，有一块丘陵地。很久以前，在这个丘陵底下刨出了几袋金银财宝。这块丘陵叫“蚂蚁”丘陵。

当年起义过后，一位坐着带顶篷马车的先生来到村里。他的马车、马具是黑色的，马脖子上挂着铃铛。他跳下车，然后让别人敲鼓，通知村里人到村公所集合。因为是星期天，大家都不下地干活，所以鼓一响人们就很快集合到村公所。这位先生是个矮胖子，手里拄着文明棍。他对大家说，在图尔努成立了一个新银行——“蚂蚁”银行。谁要借钱的话，就填个单子，然后签个字就行。不管人们在“蚂蚁”丘陵底下怎么挖来挖去，是不会找到钱的，但“蚂蚁”银行

却有的是钱。这位先生上了车，冲马抽了几鞭子，马车便朝着克尔默楚伊村驰去，继续向别的村宣布这个好消息。

全村象开了锅似的。每家都需要钱，但是，遇到个问题，村里人会签字的人很少。拿着文明棍自称叫瑟韦斯库的先生明确地对大家说："只有会签字的人，才能从'蚂蚁'银行借到钱。"

人们忐忑不安的心情很快消除了。斯特内斯库文书答应教大家在纸上学写自己的名字，如果有人愿意学的话。

村公所里有一张大桌子，上面放着一叠纸、一瓶墨水和几支新蘸水笔。旁边还放了几把椅子，对着椅子的桌面上，摆好了一张张的纸。文书告诉大家："不需要把所有的字母都学会写，瑟韦斯库先生要求不高，只要会在纸上画几个记号，像签字那样就行了。"

人们拿起笔，蘸好墨水，就在纸上写。看吧，划破纸的，墨水滴在纸上的，什么样的都有。有的怕戴着帽子碍事写不好，就干脆摘下帽子放在地上。衣服扣着扣也写不好，于是就像打草时一样，把扣子解开敞着怀，而且还把袖子卷得很高。穿着坎肩，披着袍子也写不好，人们急得直冒汗，个个汗流浃背。他们脱下坎肩、袍子、毛背心，和帽子一起堆在地板上。有的人借一百列伊，有的借二百列伊，有的人甚至借五百列伊。人们从银行出来，带着装银币的钱袋下饭馆，在那儿大吃大喝，还唱起了歌。在镇子的大街上，小商贩拽着人们招揽生意。

"来一块花布，给你老婆做条裙子。"

“你怎么还穿农民鞋？来一双咯咯响的皮靴穿吧。”

“老弟，你的帽子破了，来一顶新的。”

“来，给你女儿买条纱巾。”

“你不想买双拖鞋？”

人们逛了一天铺子，直到晚上才像参加了婚礼一样游游荡荡地走回家，肩上背着装满东西的口袋。

“这个‘蚂蚁’银行可让我们走红运了。”

“愿上帝保佑瑟韦斯库先生健康。”

“钱在我们手里同在地主手里一样顶用。”

我家的老牛又瘦又小，拉犁很吃力。大车的车轮已经断裂，车后部也变了形。用这条老牛和这辆破车很难应付三个庄园的活。东西装的稍多一些，车就出毛病。活越多，车就越误在路上。

我爸爸也开始学着如何签字。那时，我还没上学。家里没有笔，没有墨水，没有纸。一天，斯特尼库茨村的索雷安·米里达鲁表哥带来了笔、墨水和纸。索雷安表哥识字。爸爸学写姓名并不吃力。一个星期之内，爸爸甚至闭着眼睛就可以写出自己的姓和名。他经常用手在雪上练写字。要是夏天的话，他肯定会拿着鞭子把在地上练字。

爸爸和索雷安表哥到镇上“蚂蚁”银行去借款。我们卖掉了老牛，再添上借来的钱，买回来一头大犄角、口轻的牛。我们把拆掉的破车放进棚子里。然后从城里买来一辆新车，村里的木匠万察给车包上铁皮。剩下的钱，爸爸买

了半口袋面粉。面粉是爸爸用现钱从地主的磨坊里买来的，这样，地主的管家在夏收时就不会扣我们的粮食了。

过了一段时间，村里只有富户人家没有收到银行邮来的通知单。邮差整天来村送发印着字的硬纸卡。欠了债的那些人现在被召到银行去付利息，还要偿还本钱。

在这青黄不接的时候，到哪儿去搞钱？有羊的人家，卖掉几只羊去付利息。要偿还本钱的话，至少得卖掉一头马驹。"蚂蚁"银行已停止借给任何人钱。人们四处奔波，拼命劳动，极力挣扎，凡是家里能卖的都变卖掉，但还是凑不够该付的利息和本钱。

现在，瑟韦斯库先生还是坐着那辆马车来到村里，然后敲起鼓把人们叫到村公所，听他训话。

"我要剥你们的皮。你们需要时，我借给了你们钱。现在，你们必须偿还！"

宪兵、神父、文书站在这个大肚皮身旁。

"你们既然借了钱，就必须偿还。"

瑟韦斯库先生带着他的随从开始在村里逼债。随从由宪兵队长尼古拉·米耶卢谢尔陪同，挨家挨户催讨债款。

万察铁匠铺的门前，车辆排成了行。这些车从今不再属于村民，而是归"蚂蚁"银行了。银行拿收来的这些车辆做抵押，然后再卖给那些能付现款的人。随从和宪兵把村里的牲畜集中在一起，随后银行便雇人把牲畜赶往城里。

我家新买的那辆呱呱叫的车停在万察铁匠的门前。我家的那头壮牛也混在牛群中等候赶往城里。

妈妈一直病得卧床不起。爸爸的胡子越来越长，两眼无神。我家的场院一片荒凉，风掠过空空的玉米仓架，嗖嗖作响。我家只剩下一匹马，爸爸骑着这匹马到处去求医。他哪儿没去过！他到了奥尔特河谷，去了伊兹比切尼那边的卢什德维德，还到了斯克里瓦什代，那儿有一个神父会唸圣书。有一次，爸爸从克尔默楚伊以南的皮亚特拉带回一瓶圣水，水里泡着一块烧焦的木炭。爸爸拿一根笤帚枝在圣水里搅来搅去，直到把木炭搅碎。

妈妈喝下黑水，还吃下各种甜的、苦的、涩的野草。

这药并没见效。

春天又来到了。我们把妈妈抬到院子里的桑树底下。妈妈病得弱不禁风。霎时，一大群苍蝇盯在妈妈的身上，她用一把羽毛扇驱赶苍蝇。我的弟弟斯特凡髒得不像样儿，躺在妈妈身旁的木盆里。我们大一点儿的孩子和村里其他小孩一起在场院、街上或河滩上玩耍。我们穿着破衣服，身上髒得像泥猴。去冬，埃万吉莉娜姐姐还给我们缝补衣服，现在，她跟着她的男人下地干活，无暇顾及我们。

克尔洛曼村的外婆到我家来过几次。但是，她没有给我们洗澡，也没给我们缝补衣服。外婆拿着拐杖，仍打扮得花枝招展。她坐在妈妈身旁的小凳上，问妈妈：

“玛丽亚，你怎么样？”

“你看呢，妈妈？”

外婆捂着鼻子，说：

“玛丽亚，你恐怕活不长了。”

“可能，妈妈。”

外婆拿起拐杖，翻过岗子回家了。

外婆家有一座房子，收拾得干干净净。外婆家的场院，简直像个世外桃园，果树成行，鲜花片片。场院的顶头是一片密密的小柳树，一排参天的白杨迎风摇曳。

山坡上有一个泉眼，泉水分三股流下，然后汇成一条小溪。这条小溪正好从外婆家的院子当中流过。

妈妈躺在铺在桑树底下的毯子上。弟弟躺在妈妈身旁的木盆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一群吉卜赛人在河滩地里露宿。吉卜赛女人则进村叫卖东西。

“买锅，买筛子，买勾针来呀！……锅，筛子，勾针！……”

“大嫂，要不要买把梳子？”

妈妈招招手，让她们走进院子里来。她们进来后，有的用扑克算命，有的用贝壳占卜未来，有的看手纹。她们看着妈妈的手纹说：

“大嫂，你死不了。”

“你给我的小孩吃吃奶吧。”

有奶的吉卜赛女人解开怀，掏出又黑又大，胀得鼓鼓的带有红奶头的奶子。

我弟弟像饿狼一样，叼住奶头吃起来。我看见他咕咚咕咚地吸着奶水，一直到吃饱才放开奶子，吉卜赛女人又

把弟弟放进木盆让他躺下。

“他可饿坏了。”

“你明天再来。过一会儿我送你一只母鸡。”

吉卜赛女人一连到我家来了两天。

我们家的母鸡不多了，又没有别的家禽。阁楼里只有几只养着玩儿的鸽子。这几只鸽子飞起来可以一直飞入云端，互相追逐。当它们高兴时，便收起翅膀缩成一团，朝地上跌落下来，你还以为是掉石子呢。可是，当快着地时，却又展翅凌空而起。就连吉卜赛女人也无法抓住这些鸽子。

“孩子他妈，这孩子怎么办？眼看着就要死在你身旁，我说还是给人吧。”

“给吧。”妈妈哽咽着哭起来。

我家想把弟弟斯特凡给人的消息一下子传开了。

很快，我家里来了许多女人。妈妈都同她们谈了。妈妈不忍心把斯特凡给任何一个女人。要是妈妈有气力的话，她肯定会起来抄起棍子把这些女人轰出村外。

“我的儿子，不给你们！不给你们！你们想要孩子，就自己去生！”

可是有一天，从山岗上的护林员的房子里走下来一个女人。她又矮又胖，长着一口大白牙。她能说会道，此人就是护林员莫林·福阿梅泰的老婆图多丽察。

“我结婚十年了，想儿子都快想疯了，把你的儿子给我吧，我会像对待自己的儿子一样来抚养他。我会常带他来

看你的。”

虚弱的妈妈睁开双眼，她终于下了决心。我的弟弟髒极了，让你看了都恶心。

妈妈把我们大家叫到身旁，爸爸也来了。我们大家看着图多丽察抱走了我的弟弟斯特凡。可是，后来她再也没把弟弟抱来给我们看。爸爸有时骑着马去看他，回到家，爸爸低声地对妈妈说：

“咱们的孩子很好，他会长大的。”

我家的场院空旷凄凉，田野一片秋色，阴雨连绵，一望无际的玉米沙沙作响。很快就要收玉米了，但我家无玉米可收。

父母打发伊昂哥哥到富农索瓦家去扛活了。他披星戴月地干，可是有一天，哥哥偷着跑回家来。

“让人家使唤真难受！”

劳动的报酬就是管饭。到了春天，他可以得到一顶帽子和一双便鞋。要是你干活勤快，索瓦还会多给你点东西。

有一天，图多丽察通知我们说：

“星期六晚上，你们全家同斯特凡的教父和其他亲戚们都到我家去。斯特凡满周岁了，我们要给他剪掉小辫，想庆祝一番！”

躺在床上的妈妈听了很是高兴。因为，这说明孩子很健康，她怎么会不高兴呢！

“你们都去吧！”妈妈对我们说。“当家的，你也去吧。”她

对爸爸说。

“我会去的。”

星期六晚上，我家门前停着三辆车。亲戚们都来了，教父也来了。谁不愿意去吃一顿！

坐在车上的有斯特凡大哥，珀乌内·瓦克叔叔，还有他的老婆“唉呀”。“唉呀”怀里揣着一包从灶壁上抠下的焦土。她不停地从怀里掏出土块啃着吃。

我们上了车。鞭子一甩，马车上路了。坐在车前面的是三个吉卜赛乐师。

秋雨绵绵，天空显得格外低。我们都把衣服翻过来穿。对这点雨，我们毫不在乎。

我们到了护林员的那座红瓦房。房子旁边是铁路栏杆和一口水井。他家的房子很大，有两间宽敞屋子，中间是大过厅。在过厅里的炉灶上，架着一个大鼓肚锅：锅里炖着羊肉和白菜。

天黑下来，雨点刷刷地打在玻璃窗上。一会儿雨停了，风吹散了乌云。这时，乐师吹起风笛和单簧管，还夹杂着小提琴优美的音调。

一个杯子里装着李子酒，另一个缸子里装着葡萄酒，人们传着酒杯轮着喝酒，个个兴高采烈。大托盘里放着羊肉和白菜，人们用手抓着吃。莫林·福阿梅泰宰了两只羊，让人们大吃大喝。我们这些孩子也吃了个痛快，每人吃了一块烤肉和一块面包。我们靠墙站着吃。饭桌上没有我们的位子，我们有什么办法。

我们一看，使我们大吃一惊。我弟弟斯特凡穿着一件红色的新连衣裙，头戴一顶插着羽毛的小毡帽，裹着垫子躺在过厅墙角处的玉米秸上。他还像以前图多丽察从我家抱走时那样，仍然那么髒，谁也不去理他。但是，我应该看看他，因为他是我的弟弟。他上牙床上长出了两颗小牙。我走过去，用手指把他的嘴弄开，摸着他的下牙床，下牙床上长出三颗牙。有这五颗牙，吃面包就不成问题了。但是，他拿着面包却不去吃。他要干吗？他把流出来的鼻涕沾了满脸。他还睁着眼睛看我，但他不认识我。他望着房间里发生的一切，还看着灶里冒出的火苗。火苗晃动着，灶火和挂在天花板上的灯笼的灯光交相辉映。

·

在屋外门廊的房檐上，挂着三个铜铃哨。只听见有人用锤子连敲了三声：哨，哨，哨。

莫林·福阿梅泰摘下天花板上的灯笼出去了。我也跟着他走出去。他放下路口的铁栏杆，这时，一列灯火通明的火车冲破黑暗，在我们身边飞驰而过。

秋夜清澈的天空中闪烁着点点繁星，微风拂摇着野草。当莫林·福阿梅泰要进屋时，发现草垛那儿有个人影晃了一下。他提着灯笼上前去问：

“喂，谁在那儿？”

这时，有一个男人像野兔一样钻出草垛朝玉米地跑去，草垛里剩下衬衫撩起、两腿岔开的图多丽察。

“原来是你！”

“莫林，是我。”

“喂，你提一下灯笼。”

我接过灯笼，乘机也看个究竟。莫林·福阿梅泰揪着图多丽察的辫子，叫着：

“回家去！”

“回家就回家！”

就像牵着马缰绳到井边饮马一样，这个护林员把他的老婆揪进了屋。

我提着灯笼在前面引路。

护林员的屋子里尘土飞扬，大伙正兴高采烈地跳着霍拉舞，好不热闹！

“停止奏乐！”莫林·福阿梅泰喊道，“别跳了，诸位听着：大家都靠墙坐下，不要管。这个家是我的，老婆也是我的。我知道她有坏毛病。今天晚上，我对她说了，图多丽察，起码今天晚上你要老实一些，今天是孩子满周岁，可别破坏了今晚聚会的气氛。我像求上帝一样，求她今晚老实一些。这个母熊答应了。可是，她刚才却又和人家乱搞，让我当场抓住，我非教训教训她不可。”

周围的客人全都愣住了。

“图多丽察，你说，该不该揍你？”

“莫林，你揍我吧，狠狠地揍，把吃奶的劲全使出来。”

莫林·福阿梅泰把她的头巾揪下来，扔给我姐姐埃万吉莉娜拿着。他脱下她的裙子，只剩下身上的衬衫。然后

又脱下她的鞋和袜子。要不是怕别人笑话，他也会脱下她的衬衫。他要狠狠地揍她，但又怕撕坏她的衣服。

他揪住她的辫子，提起来狠劲地往地上一摔，地板咚的一声巨响。这个女人蹲在地上，没吭一声。他丈夫扑过去，拳打脚踢，女人还是沉默不语。这时，他像抱块大石头一样，把她抱起来，然后用力朝地上一扔，接着又打。图多丽察的脸被打肿了，嘴唇裂开，鼻子淌血。他揪她，掐她，咬她。她还是一声不吭。

"你还是不说话？"

女人从破裂的嘴唇里吐出几个字：

"你这个疯子，要我说什么？"

他的确像个疯子，眼睛瞪得圆圆的，他逼她，揍她，打得更加凶狠。女人躺在地上。她站着时，显得瘦小，可一躺在地上，好像身子长了一些。她的衬衫已被撕破，血迹斑斑。她翻过身去趴在地上，用手拍着屁股说：

"该死的，打我这儿，这儿还没打过呢。"她男人踩在她身上，又朝没打过的地方打去。

"你这个脓包，也往这儿打，"她指着双肩说，"打这儿，也打这儿。"

女人指哪儿，她男人就打哪儿。

"臭娘儿们，你还是不哭？"

女人的牙齿上都是血，她有气无力地说：

"瞧，我不哭。我就是不给你面子。你有本事把我打死好了，我就是不哭。"

莫林·福阿梅泰又用脚踢她的肋骨。

她被打得瘫在地上，翻着白眼，莫林·福阿梅泰这才走出屋外去喘口气。女人们把图多丽察抬到另一间屋里。

我弟弟斯特凡在外屋躺着，手里还是拿着那块面包，惊奇地看着乱哄哄的人们。

乐队又奏起乐，舞跳得更欢，人们像是着了魔似的跳着。大家不停地传着酒杯喝酒。

满脸青肿的图多丽察蒙着黄色头巾，穿着新衣服，在人群里边跳边喊：

“我的孩子满周岁了，祝他长命百岁。我们要给他剪掉小辫。喊呀，快跟着我喊呀！”

爸爸拉着我的手说：

“走，达里耶！”

爸爸让我站在门口，他进屋把我弟弟斯特凡抱了出来。爸爸脱下大衣，把他裹好。

“跟我来！”

我跟在爸爸后面。他走到车旁，从车上解下一匹马，把我抱上马背。

“你揪住马鬃。”

我紧紧地揪住马鬃。

爸爸抱着斯特凡也上了马。他紧紧地抱着我弟弟。

“驾！”

我们三个人同骑一匹马，穿过玉米地走了。

星星照亮了田间小路，马踏着湿漉漉的路，驮着我们

向前奔跑。

斯特凡在爸爸的怀里睡着了。途中，他那顶插着鸡毛的小呢帽颠丢了。

我们没有停下来去找帽子。他的小辫尚在，明天早上我们再用剪刀给他剪掉。

第十一章　秋天的桑树

护林人的那所房子被远远地抛在后面。我回头望了望，只见透着亮光的窗户像是一眨一眨的黄眼睛。

窗户慢慢消失在远方，马奔下山岗。我们绕到村边，上了小桥。前不久，桥上有人被杀。大白马一惊，仰起了头，也许这儿还有血腥味，马闻到了，但是我们没闻到。

“抓紧马鬃，达里耶。”

“是，爸爸。”

爸爸紧握缰绳，秋雨过后，涨满了的河水缓缓地流着。深夜的繁星和岸边的柳树映在水中。

“我们可别掉进河去。”我不由自主地脱口而出。

“不会的。”爸爸说。

马老实下来，我们过了桥。伊万·内戈阿热家的那条棕色大狗朝我们叫起来。我弟弟一下子被惊醒，哭了。哭了一会儿，爸爸摇晃着他，他又睡着了。

内戈阿热一家人真有意思！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内戈阿热又矮又胖，不讲卫生，黑糊糊的脸，胡子拉碴，嘴唇红得像鲜肉。只有布祖里克·内戈阿热的嘴唇特别红，而且厚，足有一寸厚。内戈阿热和他老婆简直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就连鼻子上的肉赘都一样，就是一对双生也不会长得这么相似。他们这一家早已远近闻名。他们家有一所矮小的房子，只有一个房间，里外刷得雪白，进他家的屋，都要脱鞋才能进去。

有些人说，他家的祖先可能是土耳其人；但也有的人说不是。我们村的乌尔马兹家的祖先就是土耳其人。乌尔马兹的祖辈是鞋匠。还有瑟卡拉村的达乌德斯库的祖先也是土耳其人。这些人与阿拉伯人长得很像。

内戈阿热家的房子周围有一个大场院，他在场院里种满了菜。

"内戈阿热怎么种起菜来了？只有保加利亚人才会种菜。"

内戈阿热在场院里打了一口井，经常用井水浇灌白菜、茄子和辣椒。晚上，他便到路边摆摊卖菜。他没有牛，又没有车，全靠两只手干活。他从不给地主干活。

"我只在家里干活，"他说，"任何人也别想使唤我，谁也别想。"

每到星期天，内戈阿热一家都换上干干净净的雪白衣服走出家门，坐在街上的长凳上，他们从不跟别人接近，也不同别人说话。他们只有在买卖东西讨价还价时才同别

人说话。内戈阿热一家人之间也不大爱讲话，感情多半用眼神表达，很少说出来。村里人常议论他们，好话坏话都有。

我脑子里想着内戈阿热家的事，骑马回到家里。

爸爸抱着弟弟下了马，我也跳下马。狗跑来嗅我们的脚。爸爸拴上马，进了屋。三更已过，天空已经发白。风吹动着枯黄的树叶，摇动着开始变干的树枝。屋子里的灯还点着。

妈妈蜷缩在床里边，她受了一夜的折磨，毫无睡意。她腰里扎着宽宽的红腰带，腰带紧紧地勒在骨头上。像往常一样，妈妈的怀里揣着一个旧枕头。她的肚子瘪下去了，再也撑不起来，从此大伤元气。

爸爸把弟弟抱在怀里。

我进门后，用背一顶，把门关上。屋里凉飕飕的。

"达里耶，把灯拨亮一些！"

我轻轻地拧着灯蕊，灯光变亮了。妈妈睁开眼睛，说：

"我的孩子！"

她要哭，然而干枯的眼睛却流不出眼泪，喉头也哭不出声来。我听不懂她在嘟哝什么，她的脸变得消瘦，额头上布满皱纹，脸色蜡黄。

当我开始懂事时，周围的许多事情都使我感到惊奇。特别使我惊奇的是，人们能用语言表达相互间的感情，而老牛只是哞哞叫，鸟唧唧喳喳叫。也使我惊奇的是，树木是如此地沉默不语，野草又是那样默默无言，田野里的花卉又是那么鲜艳多姿。还有使我惊奇的是，村里竟有两种人：

一种人是衣衫褴褛，从开春到入冬结冰时，一直是光着脚走路；而另一种人却穿得十分讲究，即使在夏天也穿着锃亮的皮鞋。我们头上戴的是毡帽和单帽，有时也光着头。而村里的那些绅士们身上穿着钉有闪闪发光的扣子的衣服，头上戴的是硬沿的礼帽——绅士帽。

飞快的客车和缓慢行驶的货车每天从我家旁边开过许多次。火车过时，我总是要看一看坐在来往于多瑙河和卢什德维德之间的火车里的乘客。火车轰隆轰隆地奔驰而过，你即使用弹弓也打不上它。

一次，一个绅士把头从火车窗户里伸出来，他的礼帽被吹掉，落在地上直滚。我们跑过去，从草地上把帽子拣起来。这是一顶黑色的硬礼帽，活像个小锅。我们大家都争着往头上戴，戴在头上就像扣上一个又大又深的罐子。然后我们又摘下来把它扔在地上，用脚乱踩。当我们发现用脚踩不扁时，就用棍子打，发出砰砰的声音，结果还是打不扁，也打不破，而且越打越像打鼓的声音。

这时，邮差沃伊库走过来，把帽子拿起来。他用衣袖擦掉帽子上的土，然后戴在头上。直到现在他还戴着这顶帽子，只是帽沿褪了色，但是雨和雪并未使帽子变形。

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们拿到了这样的帽子，第一次亲手摸到了这样的帽子。从我们村里戴这种帽子的人来看，这是第五顶。戴这种帽子的有邮局局长、我的表兄尼古拉·迪莫泽尔；邻村的跛腿地主米利亚雷齐，他有时坐着

小马车到我们村来；戴这种帽子的还有那边庄上的磨房主古纳·伊索佩斯库；教我们识字的波佩斯库·布拉加迪鲁老师有时也戴这种帽子。

斯特内斯库文书和我的两个舅舅托奈和利桑德鲁戴的帽子是黑色的软礼帽，同村里的年轻人和富人戴的帽子一样。人们把戴礼帽的人称作绅士，这些人中有：文书，酒店老板，税务员，他们都穿着德国式的衣服。这些绅士们的首领是商人格拉西姆·舍尔布，他以前是蜡烛商，但是现在不只是卖蜡烛，还卖别的东西。

这个蜡烛商与同舅舅有仇的酒店老板马雷什一样，是赶着装满苹果的车从山那边的皮特什蒂来到村里的。他看到这个村子挺大，于是就在这里定居下来。他租了一所房子，并写信叫来帮手。一天，村里来了一群高个子、红头发披到肩膀的小伙子，当时，我们这儿只有老年人才留这种长头发。他们是赶着大车来的，车上装满了工具、锅和箱子。村里很快传出消息：这个乡巴佬要在这儿开蜡烛厂。

工厂很快就办起来，他们每天工作到深夜。我们都扒着窗户，看他们怎么搅拌蜡泥，又怎样制出蜡。更确切地说，是看他们怎样从手里做出又软又细又便宜的办丧事用的蜡烛和洗礼及婚礼用的又粗又大又白的蜡烛。

蜡烛商的生意很兴隆。他把租期为一冬的房子买下来，并换了新屋顶，新窗户。他把窗和门都漆成蓝色，还在院子里盖了仓库。

大家都管这个蜡烛商的老婆叫皮特什蒂人。她刚来时

光着脚，面黄肌瘦，穿着一件满是油污、鼓鼓囊囊的坎肩和一条满是褶子的围裙。但是，仅仅过了一年，她就穿上了新高跟皮鞋，大花裙子，并吹嘘说，不久以后她丈夫就给她买城里人戴的帽子。这是个高个子、干瘦、皮肤苍白的女人。她总是傲慢地看着本地女人。星期天，她只到从城里来的那些女人家中去串门，也就是去找文书的老婆和我表哥尼古拉·迪莫泽尔的老婆波莉娜。

谁家死了人，格拉西姆·舍尔布就卖葬礼用的蜡烛；谁家生了孩子，他就卖洗礼用的蜡烛；谁家要是举行婚礼，他就卖婚礼用的又白又大的蜡烛。除此之外，他还卖祭祀用的蜡烛。格拉西姆·舍尔布不只卖给本村人蜡烛，也卖给外村人。他很抠门儿，在很短一段时间内就聚积了一笔家产。他把制蜡烛的地方迁到里边的仓库里，把邻街的房子改成杂货铺。这个蜡烛商的马车从城里拉来成批的货物。这个杂货铺是在复活节时开的张。当时，格拉西姆·舍尔布在村里放出空气说："我低价出售。"于是人们像是去接受施舍一样到他的铺子里买东西。不管你多么穷，按照旧习惯，复活节总得给孩子做件新衣服。常言道，圣诞节吃饱，复活节穿好。

爸爸也把我们几个带到舍尔布的铺子里。爸爸给我的姐妹们买了裤子和头巾，给我们这些男孩子买了靴子，背心，每人还有一顶礼帽。我的帽子棒极了：帽子的右上方缝着一个铁皮做的蓝色小手枪。格拉西姆·舍尔布积下了大笔财产。有一天，他像已经迁往城市的舅舅一样，也把

财物运到城里去了。格拉西姆·舍尔布，特别是他老婆已经不再喜欢农村了。

全村人只有一个女人舍不得舍尔布和他老婆迁走，这就是从卢什德维德城郊来到村里落户的珀斯库楚的老婆。她是个身材矮小、皮肤白嫩的金发女人。珀斯库楚已上了年纪，但他的老婆帕佩尔卡却还年轻。这个老头不让他老婆下地干活，地里活都由他和他爸爸两人干。

“珀斯库楚，你干吗不让你老婆下地干活？’

“不让太阳晒着她。我不愿意让我老婆受到风吹日晒，不能把她的手弄坏了。不然，她的双手就不能干干净净地给我做饭了。”

的确，帕佩尔卡有一双又白又灵巧的小嫩手，指甲总是修理得很干净。

帕佩尔卡生了三个孩子：一个男孩长得像吉戈伊叔叔，另一个男孩像杜米特拉凯·弗图伊，女孩迪娜长得像我哥哥伊昂的朋友——偷马贼阿文德雷亚。

“帕佩尔卡，你都是跟谁生的孩子？”专门找她别扭的女人这样问她。

“哼，能跟谁生就跟谁生！”

珀斯库楚有两所房子，一所房子很小，在场院的顶头；另一所房子临街，很大，是新盖的。珀斯库楚和他的老婆孩子住在那所小房子里，他爸爸睡在外屋的一张席子上。前面临街的新房里，住着前来丈量土地的军官。牲口棚里早

就没有牲口了，那些大兵和勤务员就住在这里。

珀斯库楚家住着两名军官，这两名军官都很年轻，嘴上刚长出胡子。他们当中只有一个人有老婆。结了婚的这个军官还带着女佣人。这个女佣人是从山区来的，说话的语调像唱歌似的，她叫津卡。

一天中午，我们听到珀斯库楚家那边传来尖叫声，于是我们停止玩耍，都朝他家跑去。津卡躺在地上，军官的老婆齐齐两脚踩在她身上，没头没脑地乱踢一气。她先是打了津卡几个耳光，还揪掉了她头上的一撮乌黑的头发。她又是打又是骂。我表哥尼古拉·迪莫泽尔的妻子波莉娜扒在栅栏上问：

"太太，她怎么你了？"

"这个臭货把我的咖啡给洒了。"

我们都围上来看热闹。军官的老婆边看着津卡，边从路上拣起土坷垃朝我们头上扔过来。我们撒腿就跑，军官的老婆在后边追我们，于是津卡得救了。她从地上爬起来朝家门前的水井走去，抖掉身上的土，然后洗手，洗脸，洗脚。她满嘴都是血，进了我家的场院。我姐姐丽察给她抹上药膏。

"你为什么不离开这个婊子？"

"我到哪儿去？我没有一个亲人。到别人家去，也许会更倒霉。"

上好药之后，津卡又回到主人家。过了一会儿，我们

看见她拿着一个大白盘子走出来。

"太太让我给她摘点桑葚儿。"

"摘吧。"

津卡爬上我家的桑树，便摘了起来。她边摘桑葚儿边唱歌，等盘子里装满了，便慢慢下来，给太太送去。

晚上，军官和他们的勤务兵从地里回来。一个军官在珀斯库楚家的屋前拉起小提琴，他就是那个没结婚的军官。

我们从远处听着他拉琴，因为，如果我们走近的话，他就会停下来并且把我们赶走。他不愿意让我们靠近他。

晚上，勤务兵来到我家。我姐姐埃万吉莉娜拿出一条干净毯子铺在桑树底下，一个士兵爬上桑树用力摇，桑葚儿像遭了雹灾一样掉下来。士兵们把桑葚儿收在一个大碗里，然后坐在屋门前吃起来。勤务兵还和我爸爸拉家常；他们也和我们聊天。我们了解到，这两个军官都是布勒伊拉那儿的地主家的儿子。那个结了婚的是苏迪图大尉。那个拉小提琴的是安德雷斯库准尉，他还是个刚从军官学校毕业的毛孩子。他的勤务兵盖丘·马林是乌杜普人，牙齿几乎都掉光了。

"从我当上军官的勤务兵之后，"他说，"我谁都瞧不起了。军官很爱发火。他常用鞭子抽我。晚上，我替他脱靴子时，他总是用另一只脚踢我的嘴。他还骂我：'你这个蠢猪，慢点，把我的脚鸡眼碰疼了。'如果不用力脱，鞋就脱不下来，因为他的靴子很紧。这个军官傲气十足。"

大尉的勤务兵罗尤是摩尔多瓦人，黄头发，蓝眼睛，他总是笑声朗朗，对现在的景况是满意的。

"在这里，打我的只有大尉和他的太太。在布加勒斯特，大尉和他的丈母娘住在一起。大尉的丈母娘常拿她用来打地毯、垫子的棍子打我。大尉在布加勒斯特的齐什米久公园附近有所房子，这是他老婆的嫁妆。大尉的丈母娘是个凶狠的女人。她出租房屋，骂房客比军官在军营里骂我骂得还厉害。可怜的房客在屋子里都踮着脚尖走，房客呆一两个星期之后，只好搬走。这所房子的外表很吸引人，所以总是不断来人住，住几天受不了，再搬走。然后又来人住，反正这所房子总闲不着。……我每天都在花园里给军官的丈母娘遛狗……就像俗话所说，这纯粹是混日子……"说到这里，他的笑容消失了。脸色阴沉，双眉紧皱起来。

"唉，一九〇七年我们没把地主打倒……不然的话，我们的国家肯定不会是这样。"

"一九〇七年，咱们这里打过大仗。"爸爸说，"当时，他们把我们弄到多瑙河里的船上关了三个月。我们挨蚊子叮，虱子和臭虫咬，还差点让老鼠啃了我们的骨头，没有比这个更遭罪的了。有些体弱多病的被打了之后，肌肉腐烂生蛆。后来又把我们关到牢里。他们欺负我们，还让我们去受审！……最后，他们还说是他们宽恕了我们。米利亚雷齐的女婿、县长德勒库列亚总是恬不知耻地对我们这样讲。我们并没有什么过错，无须他们原谅，我们只不过是追求正义而已。'如果说有人做了亏心事，'我对德勒库列亚说，'那不

是我们，而是你们做了亏心事。你们地主有钱有势，靠国家的权力奴役我们。你们用鞭子抽我们，夺走了我们的劳动果实，让我们饿死。你们还有脸说什么宽恕。'德勒库列亚发火了，向我冲过来，吼叫着：'你在船上还没呆够？我现在就让你再回船上去坐禁闭！……'"

爸爸的头发变白了，胡子也白了。爸爸狠劲地吸着自己卷的烟，勤务兵也在吸烟。烟味熏走了苍蝇。爸爸在场院里的一块地上种了几棵烟草。烟草破土而出，慢慢长高。烟草的叶子毛茸茸的，又宽又大。爸爸每天揪下几片烟叶把它放在太阳光下晒干，然后用手搓碎，装进用猪尿泡做的烟袋里，挂在腰带上。

"一九〇七年，我已经长大了。"盖丘说，"在我们乌杜普那儿，军官们运来了大炮。暴动一下子就闹起来。我们放火烧了杜姆巴地主的庄院。他住在维也纳，同奥地利皇帝是好朋友。庄院还没烧完，军队就到了，人们早就料到了这一点。我们有的拿步枪，有的拿手枪，还有的拿棍棒聚在村口严阵以待。

"一个老人走到部队面前对军官们解释说，让他们高抬贵手，乡亲们分地与军队无关。人们起来放火烧地主的庄院，还要赶着犁耕地。军官一听，举起大刀把老人砍倒在地。这时，曾在部队里当过上士的古勒杜尔切指挥大家埋伏在栅栏后边，趴在沟里朝军官和士兵开了枪。一个军官倒下了，还有几个当头的也倒在地上，士兵们四处奔逃。那是一场真正的战争，还吹起号角。第二天，天一亮又有些

士兵运来大炮前来增援。他们一连三天对准房屋轰个不停，房屋倒塌，尸横遍野。槐树也被大炮连根轰倒。我们家只有我和爸爸得以逃生。……一九一三年，爸爸得了霍乱，死在多瑙河那边的异国的土地上。……”

这些勤务兵光着脚，在野地上走了一天，脚上都扎出了血，他们在伤口上撒上了黄土。

爸爸给我弟弟脱下衣服，把他放在妈妈身旁，让他睡下。弟弟醒了之后，含混不清地叫着：

“水，水，水……”

“爸爸，他在说什么？”

“给他端杯水来。”

我端来水。弟弟喝了几口，又睡着了。

妈妈抚摸着弟弟的头和脸，用那双瘦骨嶙峋的又细又长的手轻轻地抚摸着。

“妈妈的宝贝儿，宝贝儿……”

妈妈怕把弟弟吵醒，便钻进被窝睡了。

从珀斯库楚家那边传来了吵嚷声。这么晚了，津卡难道又摔坏了什么东西？

明年夏天，我要上树摇桑葚儿。那时，我弟弟就会站立，甚至能走几步了，他也会来拣桑葚儿吃。他肯定会拿着熟透的桑葚儿在脸上乱抹。

“桑葚儿甜吗？”

“甜。”

第十二章　猫

我的朋友们围在柳树底下的那口水井旁，排着队等着饮马。我们用桶把水打出来，然后倒进饮水槽。

饮过水的马，肚子胀得鼓鼓的。

如果我们之中有谁滑一脚，大家准会全掉进井里。我们刚刚能看见井底反光的井水。水井的吊竿很高，从吊竿的高度，就可知道水井的深度；盛夏时，还可知道井水清凉还是温暾。

我家门前那口井的水总是清凉的，很好喝。

其它街上的女人们中午和晚上也都提着水罐到这儿来打水。

男人们在田间、酒馆、村公所交谈，而女人们则站在栅栏前或水井旁聊天。

男孩子们到很远的收完庄稼的地里去放马。现在还没收玉米，再过一两个星期就能收了。收完庄稼的地尚未完全翻耕。

“达里耶，快去放马！”

“好，我去！”

我找了顶破帽子戴在头上，然后抓起我姐姐的一件破外套披在身上走了。

秋天的夜，寒气逼人。但我穿的衣服还是保暖的。我解开大白马的缰绳，把马拉到井旁去饮水。尔后，我骑上马。这时，其他人已经走了，我立即用柳条抽了一下马屁股，白马飞快地追了过去。我骑着马，双手紧握马鬃，脸紧紧地贴着马脖子，白马飞奔着。要是石子路，白马又钉了掌的话，马掌肯定会磨掉。但是，马掌没磨掉，因为白马没有钉掌，而且又是土路。

瞧，我赶上了他们，并加入到他们的行列中。这时，我的白马便慢慢地走起来。

"夜里我们到哪儿去放马？"

"到阿登卡塔小树林那儿去放马。"阿文德雷亚说。

如果我玩够了，又累得要死，但又不困，睡不着觉时，我就走出家门，沿着通向车站的大街到布尔杜列亚伯父家去串门。布尔杜列亚伯父是我本家中年纪最大的人，已近百岁。他的老伴儿已经去世。他有七个儿子，现在活着的只有莫里尼克和德尼克两人。五个女儿中，只有大姑娘还在世，但他的孙男孙女却是一大群。如果星期天大家都来看他的话，布尔杜列亚伯父的场院里准会挤得满满的。不过，他们实际上只是逢年过节才轮流来看他。

布尔杜列亚伯父总是忍不住讲述他以前是多么年轻，多么漂亮。

要说我伯父布尔杜列亚以前年轻，那谁也相信。我也知道，任何人都有过年轻的时候。但是，要说伯父以前漂

亮，这不得不令人打个问号。瞧，布尔杜列亚伯父也就是长着一副人脸，他和爸爸走在一起，只到爸爸的腰部。他弯腰又驼背，不长胡子，头上也没有头发，身上也不长毛，是个无毛发的人。怎么回事？有一天，早上醒来后，他的睫毛、眉毛全掉了，枕头上全是头发。

我之所以到布尔杜列亚伯父家去，正是因为其他人都不愿意去。他总是讲些古代的故事。

当然，我去伯父家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他会唱歌，而我又喜欢听别人唱歌。布尔杜列亚伯父总喜欢大声唱，不怕别人见笑。有时，大姑娘、小媳妇下地回来经过他家门口时，我伯父就站在大门口大声唱起来：

漆黑的夜，
我用手慢慢地摸，
摸着了大嫂子的那个……

女人们哄他，姑娘们也起哄，其中一个爱开玩笑的说：“你好，没毛的老太婆。”

布尔杜列亚伯父生气了。他说的话更难听了，还做一些难看的动作。

我从布尔杜列亚伯父那儿知道了许多事。

以前，原野里长满了树木。后来，因为人越来越多，于是把树都砍了，树根也刨掉了，便成了片片空地。空地变成可以种小麦、大麦、黑麦和玉米的良田。人们用斧头、镐头、铁锹把树木砍掉，毁坏了森林。所以，今天在奥尔特河

和多瑙河边，只剩下零零星星的小片树林。克伦杰尼那儿有一小片，卢什德维德那儿有一片，阿登卡塔那儿也有一片稀疏的树林。

"种的地多了。"没胡子的布尔杜列亚伯父说，"大片树林不见了，人们靠劳动发财致富。可是，地主当时窜到村里来胡说什么这些地是他们的。于是人们都成了地主的奴隶，至今未能翻身。各村的乡民们也曾经不断起来反抗，但每次都遭到地主的血腥镇压。"

现在，没胡子的布尔杜列亚伯父不再唱儿女情长的歌了。他现在唱的是另一种歌，更确切地说是哼小调。他那干瘪的嘴经常哼着过去造地主反的绿林好汉的歌曲，还唸着以往那些可恨地主的名字。

在阿登卡塔，人们除了种小麦、玉米外，也种西瓜。现在虽然季节已过，但是，看瓜棚还没拆掉，瓜也没拉秧。没熟的小西瓜躺在湿地上。半枯干的叶子底下，小西瓜还不少呢。要是把这些生西瓜放进小麦口袋里，到圣诞节时就能捂熟——所谓熟，就是蔫不唧的有点甜味。

我哥哥伊昂的朋友阿文德雷亚是我们的头。我哥哥本来也会来放马，但他不在家。他也没在索瓦地主家，不然，他也会来给索瓦放马的。

克尔洛曼村的外公病了。我哥哥伊昂去侍候他，已经去了两天。外公快死了。

但是，外公没死，他像妈妈一样并没死。他现在依然

卧病在床。外婆很讨厌病人，妈妈的病使外婆气急败坏。外婆还是那么神气，走起路来腰挺得直直的，像个大姑娘。她就是讨厌别人生病。上星期天我去看外公，看见外婆冲着外公大喊大叫：

"别叫唤了，你怎么像女人一样叫唤起来没个完！"

外婆狠狠地捶了外公的头几下，外公躺在床上，手摸着胡子，哼哼着说：

"我叫唤是因为我难受，我浑身骨头疼，肉也痛，我真想死了算了。"

外婆巴不得听到外公说他要死。杜米特拉凯舅舅杀了一只鸡，外婆把鸡扔进锅里，用开水烫了一下，然后捞出来煺了毛。外婆身旁放着一把菜刀，是准备开膛、剁鸡用的。鸡剁成块就可以下锅做汤。这个死老婆子一下子抄起了菜刀。她拿刀干什么？莫非要杀死外公不可？

"你说你想死？给你这把刀，往心口那儿扎，一直插到心脏。这样你就可以死了，也省得受罪了，也就用不着再叫唤了。死神就在你身边，请它把你带走吧！"

外婆的两眼射出凶狠的目光，她并非戏言。难道她真的要让外公用刀捅自己的心窝吗？我害怕的不是那把刀，而是外婆那张凶狠的脸。外公的眼神里、嘴角上流露出一丝微笑：

"该死的老太婆！你真像你的那个土耳其父亲。达里耶，你别害怕。我根本不把她的话当回事。人本来就不应该寻死，即使死神在向你招手。人在肚子里刚刚成形时，死

神就钻进了骨髓。达里耶，你看，在生活中，你可以呼唤运气，但运气可以来，也可以不来。如果你想不开，你可以去召唤死神，但不管你召唤与否，到时候它就会来把你带走。”

外婆手里仍握着菜刀。

“你别唠叨了。别吓唬孩子。你不是想死吗？给你刀。你要是不想死，就老实呆着，别再叫唤了。”

她转身走向炉灶去做鸡汤。

外婆怒气冲冲地开了鸡膛，她是冲着外公出气，可谓杀鸡给猴看。

外婆把鸡肠子掏出来，扔给耷拉着紫红色舌头、站在门口发呆的狗吃了。然后把还热乎的鸡心和鸡肝拿到火上烤，不一会儿就烤熟了。外婆在烤好的鸡心和鸡肝上撒了点盐，然后放在一个木盘子里，端进屋来。外婆很不高兴地对我们说：

“吃吧，挺好吃的。”

新烤好的鸡心、鸡肝香气扑鼻。外公揪了一块鸡肝放到嘴里吃起来。剩下的我都吃了，吃完后，我还舔了舔嘴。真香！

今天晚上，要是外婆再杀鸡的话，鸡心和鸡肝肯定是我哥哥伊昂的了，真美了他！

但是，今天晚上我也不会过得太差。阿文德雷亚样样都行，他会让我们这些小一点的孩子去拣干马粪和干草来点火用。他还会派我们去掰嫩玉米棒子，然后让我们点火

烤玉米。因为他善于发号施令，所以我们每个人不管愿意不愿意，都要把烤好的玉米分给他一半。这样做，我们并不生气，因为我们整夜在烤玉米。要是渴了，我们就到山沟里的水井那儿去喝水。

根古结结巴巴地抢着对阿文德雷亚说：

"阿文德雷亚哥哥，今天晚上我们能吃上西瓜吗？"

"可能吧。"

阿文德雷亚有偷东西的毛病。由于他的原因，我哥哥伊昂经常挨爸爸揍。

冬天，小伙子们经常搭伙一块剥玉米粒。他们一剥就是一整夜，边剥玉米，边讲故事，还挑逗着来帮忙的街坊邻居的姑娘。

阿文德雷亚的衣服里常常塞着母鸡、鹅或火鸡——凡是能在村里偷到的，他都拿。他这个毛病，大家都知道。我爸爸害怕阿文德雷亚把我哥哥教坏。要是有人和他合伙干，阿文德雷亚也会偷马。我家的那匹小马就是让他偷走的。一天夜里，他溜进我家的牲口棚，解开马缰绳，把马牵到院子里，然后骑上马逃跑了。他到镇上把马卖给了吉卜赛工匠。当我们追到镇上时，马已无影无踪。从那以后，阿文德雷亚有一个月没再登我家的门。后来，他像没那回事一样，又厚着脸皮来找我哥哥。

"玛丽亚大婶，你好！"

"你好，阿文德雷亚。你把我家的小马驹偷走了！"

"我？！"

“不是你，是谁！

“玛丽亚大婶，上有天，下有地，谁偷了你家的马，让他不得好死！”

妈妈噗嗤一声笑了，阿文德雷亚也笑了。

“反正以后你可别再偷我家的牲口了。”

“我不再偷你家的了，村里有的是。”

从那以后，阿文德雷亚没再偷我家的东西。

因为日子过不下去，又没有钱买过冬吃的玉米面，爸爸只好把牲口牵到镇上卖了。爸爸不忍心让我们饿死。最后，我家只剩下那匹白马。

我记得，离现在我们放马的地方不远的那片小树丛，在我还是孩提时，是一大片树林。现在通向卢什德维德的这条道路，那时从树林中穿过。当时，每到秋天，我就上车坐在爸爸身旁顺着这条路去赶集。在进树林之前，我们都让马歇个够，因为一旦进了树林中的路，你就不知道会出什么事。从路旁的林子里会突然跳出拿着手枪、举着木棒的强盗，对你喊：“站住！”这时，就看你的胆量了。你要是立刻扬起鞭子，奔驰向前，那么听到的只是背后的枪声和咒骂声。在这种情况下，你或许被打死，也许会死里逃生，这就看你的运气了。你也许更倒霉，落得个粉身碎骨，那不取决于运气而是看强盗的本领如何。强盗还在路上横拉起一条绳子，设下陷阱。你不是想跑掉吗，可是绳子会把马绊倒，让你摔个嘴啃泥。正因为你要逃，所以强盗更

加恨你，便把你的衣服剥光，用棍子打你，然后把你扔到路边上，强盗钻进林子不见了。等到天亮，其他过路人再把你扶起，给你治疗伤痛。强盗们总是隐没在密林之中，不少人都吃过他们的亏，但我们还没碰上过。

树木被砍光了。古老的树木倒在地上，人们把树枝砍去，然后把木材一根一根地装上车，运往城里。从树根上又长出小树丛，往日的森林残地，以后还会长成茂密的大树林。

森林一毁掉，强盗也随着消失了。因为强盗在玉米地和小麦地里是难以藏身匿迹的。

我们把一小块地踩硬，然后把抱来的野草堆成堆，坐在草堆上。今晚，阿文德雷亚是我们的头，他给我们下命令：

"你们到伯内亚萨村的地里去，那儿的玉米种的晚，玉米还嫩，每人去掰一大抱回来。"

我们朝伯内亚萨村的玉米地走去。我们钻进玉米地，碰得玉米叶子沙沙直响。我们一动，叶子就响。风一吹，叶子也响。我们一摸到玉米棒子，就剥开点皮，再用手指掐一掐玉米粒，要是嫩就掰下来放进怀里。若玉米粒老，就丢下它，再找嫩的掰。

下雨了，正好我们掰的玉米棒子也够了。

我执行了阿文德雷亚的命令。我们把战利品倒在阿文德雷亚面前。

月亮从贝利托里庄园那边露出了头。今晚，月亮上的斑斑点点显得格外清楚，好像有人用手指在它的脸上抹了沥青，留下了手指和手掌难看的痕迹。月色阴沉，暗淡。秋天的夜空异常明净，乳白色的银河横贯空中。

繁星布满天空。

“现在，你们去找干马粪。”阿文德雷亚又向我们发出了命令。

我们分头到前两天放过马的地里去找马粪。看到干马粪，我们就拣起来放进衣襟里抱着。

在玉米棒子旁边，我们又堆起一堆马粪。阿文德雷亚拿起一把干草，团成一团，上面盖上一层干马粪。然后，他从怀里取出一个破布包，里边包着火镰，火石和干蘑菇。他拿出火镰和火石，打出火星燃着了干蘑菇。他把燃着的干蘑菇放在干草下。马粪先是冒烟，很快便升起火苗。火苗越蹿越高，我们围坐在周围。在贝利托里那边，也发现了三四处火堆。卡拉瓦内齐那边也有火堆，那里也有一些像我们这样的放马小伙子。

我把树枝砍下来，弄成一根棍，把玉米棒子插在头上，拿到火上烤。我们一边烤，一边在火上加干马粪。

我们这一伙共八个人。我们烤了四十穗玉米。我们把烤好的玉米堆在一起准备吃，阿文德雷亚给我们分了份。他自己留下十五穗。烤好的玉米很热，简直有点烫手，但很好吃，嫩嫩的玉米粒又香又甜。我们的肚子鼓起来，觉得有点渴，于是越过收完的庄稼地去找水井。水井在山坡下，

水井旁边有一棵白杨树。白杨树上，不知谁在很久以前挂上一幅圣像画。以前这幅圣像画光彩夺目，现在由于风吹雨打而变得暗淡无光。奥米达的人把圣像的脸画成了鬼怪。软弱的耶稣被死死地钉在十字架上。

我们喝足了水之后，图塔努凑到阿文德雷亚跟前，根古也凑了过去：

"阿文德雷亚哥哥，今天晚上我们吃不吃西瓜？"

"你们想吃的话就吃！"

于是我们停下脚步，商量如何去偷西瓜。附近有几块瓜地，地里有瓜棚，有人看着。我们必须骑马去偷瓜，以便遇到情况时好跑掉。

阿文德雷亚有一根大棒，而我们每人只有一根打马用的小树枝。

我们既然要去偷瓜，那也需要大棒。于是，我们便拿着阿文德雷亚的刀子到树丛中去砍了一些小树当木棍。现在我们武装完毕，向瓜地出发。不一会儿，我们到了瓜地。我和伊齐库留在地头上看马，我牵四匹马，伊齐库牵四匹马。马都很老实，只是喘着粗气，并不嘶叫。马鼻子喷出的热气扑在我的脸上。其他人猫着腰进了瓜地，只看见他们在瓜地里摸来摸去。我们并不害怕，因为我们既没听到狗叫，又没听到人喊。瓜地里似乎没人看守。这回我们可得吃个够，现在我们的肚子又饿了。

深夜，夜色朦胧。带着黑斑的月亮升到头顶。蟋蟀和

秋虫叫个不停。夜空中，一群大雁发出呱呱的哀鸣，像人叫得那么悲哀。

“叭！叭！”

两声枪响，同时看到两道闪光划破夜空。偷瓜贼撒腿就朝我们这儿跑来，跑过来五个黑影。

“喂，你们跑什么？”

“为什么不跑？你想让我们吃枪子？”

突然，我们听到砰的一声，是猛击一下的声音。但是，没听到贼叫声。这时，我们之中去偷瓜的第六个人不慌不忙地走过来，他就是阿文德雷亚。他来到我们身旁，衣襟里抱满了西瓜。

“你们偷的西瓜呢？”

“我们扔了。”

“我让你们啃西瓜皮吃。”

我们骑上马，回到原来的地方。火堆还在冒烟，我们把火拨旺，火苗照亮了周围的夜空。

阿文德雷亚偷来的西瓜又生又苦。他切开瓜，咬了两口就扔掉了。这些小瓜蛋有拳头那么大，都不熟，没法吃。

马拴在离我们几十米外的地上吃草，我们把帽子拉到耳朵下，躺在草堆上睡觉。阿文德雷亚很快就睡着了。

我们村里没有法院，只有车站和邮局。再过去两个村，在克尔默楚伊那儿的克尔里加齐有个法院。法官每星期乘马车到我们村来一次。法官来后，文书从柜里取出档案，给

他摆在桌上。法官只审理一些小案子，如偷鸡，偷羊，打架斗殴，有时也有一些土地纠纷案。大的案子都转到图尔努法院去审理。

法官很年轻，长得很漂亮。他的老婆叫阿格里皮娜，村里人都叫她皮皮娜。当然，这是他们的事。人们都说法官带来好几箱子书，还说，他除了在法院外，其它时间都是像疯子一样扎到书堆里。他对被告与其说是审讯不如说是批评。

法官讲起话来温和而甜蜜。

“谁是原告？”法官问。

“戈古·林格。”文书说。

“被告呢？”

“斯托耶内斯库。”

阿文德雷亚的真名真姓是尼古·斯托耶内斯库。

“干了什么坏事？”

“偷了鸡。”

林格和阿文德雷亚走到前面。村公所里挤满了人。

“喂，你干吗偷人家的鸡？”

“法官先生，是这样……”

阿文德雷亚从来都不交代事实，原告也从来找不到证据。审讯只是靠怀疑进行。没有证据，对谁也不能判刑。结果，阿文德雷亚没有被判刑，只好对宪兵米耶卢谢尔提供的材料继续进行调查。

丘科沙走进来，和她一起进来的还有她的妈妈温图里

卡。丘科沙弯着腰，她有七十岁了。她的好几个男孩和女孩都死于痨病，只活下来一个。她的男人也是很早得痨病死的，她几乎都记不得她的男人了。

丘科沙的家和村公所只隔一条路。她的家业很大，有不少地，有葡萄园，有牲口，还雇着佣人。场院的尽头有一个小棚子，她那个像我伯父布尔杜列亚一样近百岁的妈妈就住在这个小棚里。

丘科沙为了土地和她妈妈打官司。除了丘科沙外，温图里卡再没有别的继承人了。她告诉丘科沙，等她死后，所有的地都归她。但丘科沙并不满意，她想现在就在法院立下个证据把土地先搞到手。这个官司是律师叫她打的。法院的附近有个律师，叫维格·乔治斯库。他走东串西，专门撺掇着人们打官司、告状。有些人不上他的当，嘴一撇冷笑着对他说：

"你让我们穷折腾，你好从中渔利。"

但是，总有一些人听了他的话去打官司。被告必须到镇上去请律师。在法庭上，维格·乔治斯库的对手总是同一个人，即卢什德维德的奥维迪乌·乌尔苏律师。

在法官面前，这两个律师相互讽刺、挖苦，大喊大叫，相互威胁，只差骂娘了。你要是看到这样的场面，准会以为他们要动手掐脖子。但是，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休庭以后，他们俩就像两个好朋友一样一起到布库尔酒馆，要上两三只烤鸡，一只烤鸭，大吃大喝。

据说，他们俩平分收入。让他们去分吧，你哪能管得

了阔佬们的所做所为！

维格·乔治斯库和奥维迪乌·乌尔苏都是神父的儿子。事实上，几乎所有的律师都出身于神父家庭。

“律师生活得倒不错！”

“怎么？难道神父生活不好？”

“神父的生活也不赖，只不过律师的收入更加丰厚。他们要嘴皮子，搬弄是非，在光天化日之下对人们敲诈勒索。法律是他们制定的，为他们服务，你能对他们怎么样？”

维格·乔治斯库是巴尔塔瑟拉特那个地方的一个神父的儿子，他同克尔里加齐那儿的法庭挂上了钩。

“老弟，你有什么官司要打？”

“我和我兄弟吵架，他把我的头打破了，所以我要去告他。”

“我替你辩护。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会把他弄到盐矿，让他服苦役，一直服到瞎眼。”

“我不想让他成瞎子，那太过分了。他有孩子。”

“嗨，瞎子！怎么能成瞎子？只是说说而已……不过我会好好整他一下，让他知道我的厉害。”

“为什么？你为什么要这样整他？他怎么惹你了？我们兄弟间吵架，吵过就完。我只要让他给我赔偿。”

“赔偿？”

“怎么，他没把我脑袋打破？打破了。我找医生治疗，还开了证明。除了收印花钱和证明的纸张钱外，医生还收了我一百个大钱。”

最后，这个律师还是让当事人请他当了辩护律师。审讯推迟了，一推再推。

由于惧怕坐上几个月或几年的牢房，另一个当事人也请了自己的辩护律师。

巴尔塔瑟拉特村的德勒伯兄弟俩打官司使维格·乔治斯库和奥维迪乌·乌尔苏都发了财。

打官司的人越来越多。律师乔治斯库先是买了一所房子，为的是向找他做辩护律师的人证明他在村里实力雄厚。然后他又买了两匹马和一辆车。大的案子都转到克尔里加齐去审理，而法官平时则到其它十几个村去处理案子——如果是小案子，当场就断出来。

乔治斯库律师不管有案子还是没案子，总是乘着马车跟在法官屁股后边跑，为的是让人家知道需要请律师时到哪儿去找他。

"律师就应该是这样。"人们在背后议论他。

现在，连小孩都认识他。他总是见人就脱帽打招呼。他对上了年纪的女人们说：

"吻你的手，妈妈。"

我的接生婆迪瓦伊卡大婶望着他，质问说：

"大老爷，你吻我的手吗？你哪能吻我的手！……你既然不吻我的手，为什么还要那么说？我的手不是给别人吻的……我的手什么都摸过，还是说吻肚子吧！"

这个律师攒了一罐子钱，罐子里盛不下了，于是他在乡下放风说，他是个地产爱好者，只要有人卖地，不管好

坏，远或近，乔治斯库律师都想把它买下来。他买的这些地都是由请他当辩护律师的人无偿地给他耕种。

“老大爷，你是哪儿的人？”

“就是伯格内什蒂这儿的人。”

“你想不想让我替你辩护？”

“替我辩护吧。”

“我给你辩护，你得给我两个金币。”

“我给你，那你可要让我把官司打赢。”

“放心好了。但是，你做了什么事？”

“我什么事也没干，我已经够受罪的了，不行了，老了。”

“那为什么？”

“为我那个女儿。”

老人身旁站着个标致的大姑娘。姑娘这时打开干粮袋，取出吃的，又把口袋扎上，便吃起来。

“你的姑娘出了什么事？”

“唉，先生，她不是姑娘了，她已经出嫁了。”

“闹离婚？”

“不，不是离婚的事。是这么回事，她结婚了，但没办手续，我还没来得及到村公所登记，她就从男人家跑回来了。”

“那好办。”

“可不那么容易，她不喜欢她男人才跑出来，她说，她男人‘不男不女的，是两性人’，她不愿意和两性人过下去，所以她把衣服都拿回来了。”

"是她的衣服？"

"当然是她的衣服。但是，女婿呢，因为女人使他丢了丑，他便说他丢了东西，说什么我女儿拿走的东西里也有他的。是这样说的吧？"

"是的，爸爸。"

维格·乔治斯库律师沉思片刻，说：

"比原来想的要难办。"

"那你就不替我辩护了？"

"替你辩护，也就是说给你姑娘辩护。"

"别叫姑娘了，先生，她是女人。尽管由于她男人是两性人，她还保留着姑娘的贞洁，但是她出嫁了。"

"好，就算是女人吧。我要为这个女人辩护，你再给我添上点。"

"要钱？"

"对，要钱！"

"我不能再多给了。"

"你有牛吗？"

"有。"

老人说着后退了一步。

"你为什么问我有没有牛？是不是你想要我的牛？牛可是我的命根子。没有牛，就等于人没了手，就没法干活，就成了缺胳膊少腿的残废。算了，还是让我女儿回去跟着两性人过吧。"

"爸爸，我不回去，宁可让你打死我，我也不回去。"

“老头子，你别害怕。我不会为这点小事就弄走你的牛。难道我连条狗都不如？嗯？我那么没良心？老头子，我要是那么狠心的话，我就住在城里了，就不会把光阴消磨在使我减寿的这个倒霉的村子里。我在这里定居，为的是让你们这些农民一旦打官司时少吃点亏，不让法官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就把你们送进监狱。你刚才说是哪儿的人？”

“是伯格内什蒂的人。”

“有犁吗？”

“现在你又打犁的主意？”

“在伯格内什蒂那儿，我有一小块地，是从斯特奥加姆巴什那儿买来的。”

“我好像听说过，斯特奥加姆巴什的那块地在一个山坡下。那是一大块地，不小。”

“你说大就大吧，不过是一块长条的地。”

“你好好种那块地吧，先生，山坡下的那块地是块宝地，肥得流油。我家的地里尽是石子。种上小麦，长出来的都是草，种上玉米，长出来的还是草。这块地是我岳母留下来的，就欠让火烧死她。”

“爸爸，戈拉弗拉外婆早就死了，怎么还说让火烧……”

“我说的是地狱里的火。”

“那倒是。”

“我刚才说过，”律师又接上了话头，“在伯格内什蒂那儿我有一小块地。我帮你的姑娘把官司打赢……”

“不是姑娘，是女人，因为……”

“我知道，因为她结过婚了。”

“和一个两性人结婚，先生，和一个两性人结婚，她真倒霉。”

“我管保让你把官司打赢，你给我两个金币吗？”

“我说了，给你。”

“我们还要开诚相见，相互交心。这两个金币是付的印花钱。我为你打官司出力，你也应该为我那块地出点力，帮我耕种——我给你种子——帮我收，然后把收下的粮食送到我家来……麦秸、玉米秸都归你。你再回送我两头小猪。”

“我一共才有两头猪。”

“现在你有两头，可是到夏天之前，还要下一次小猪呢。”

“下不了猪了。”

“劁了？”

“不是，我家不养母猪了。”

“母猪宰了？”

“埋了，闹猪瘟时，我给它唸了符咒，扎了耳朵，给它吃了草药，还是不管事，死了。”

“表示哀悼！”

“什么？”

“你的猪死了，我感到可惜。”

“你这样说是让我对你产生好感。律师先生，那你为什么感到可惜？那头母猪即使不死，你也吃不上它的肉。莫丽

娜很小的时候，猪就死了。”

“莫丽娜是谁？”

“是我……我叫莫丽娜。”矮胖的姑娘说。

“那我们说定了。你给我两个金币和两头小猪，我帮着莫丽娜打赢官司。这是个大官司，是盗窃案。因为我费心为你打官司，所以你得替我种地，然后像我说过的那样，玉米秸、麦秸留给你。”

“那块地有三顷半。”

“老头子，打赢这个官司也不容易，这是个盗窃案。”

“爸爸，我们就替他种地吧。”

律师在周围的村子里都有他的地。他甚至在奥尔特河边也买了一块河滩地。他还向穷人放高利贷。和法院只隔一条马路的克尔里加齐村的酒馆生意兴隆，这个酒馆也是属于维格·乔治斯库的。尽管门上写着“公平”酒馆，店主是巴尔布·格乌什，然而来“公平”酒馆喝酒的也好，不来喝酒的也好，大家都知道，巴尔布·格乌什只不过是律师的化名而已。

“酒好喝吗？”

“不好喝。而且很贵。”

“如果牌子上不写‘巴尔布·格乌什’而写‘维格·乔治斯库’的话，酒会不会又便宜又好喝？”

“不会的。”

“那么……”

这个律师摸着姑娘的下巴，甜蜜地对她说：

“莫丽娜，过一个小时你到我这儿来一下，对我从头到尾地把经过说一遍，好让我替你辩护成功。明白了吧？！如果我知道真情的话，我就事先考虑对策，让法官陷入迷魂阵，宣布我们无罪。”

“就是我爸爸说的那样，我拿走的全是我自己的衣服，不是我的东西，我一件也没拿，连个布丝也没拿。”

“你拿了也好，没拿也好，到我这儿讲一讲。”

“和我爸爸一起去吗？”

“还是你一个人来吧。”

“爸爸去了站在门外。你知道……我……我害怕。”

疲倦不堪的老头呆在一边，蹲在栅栏旁，把破帽子摘下来放在膝盖上，抽起烟斗。他那长年累月不理的头发同胡须绕在一起。

“你为什么害怕？”

“我，你知道，我不想在结婚前破身。”

“唉，你结过婚了。”

“是的，但我和没结婚时一样。”

“你真傻。”

“是傻，我愿意当傻姑娘。”

“我说了，你就来吧！我们还要谈谈这个……”

“我和爸爸一起去，他在门口等着。”

老人把手伸进干粮袋，掏出一块玉米糕，撒上盐，咬了一口，嚼着咽了下去。

“莫丽娜，你肯定饿了。”

"不，爸爸，我不饿。"

法警在法院门里叫着人们的名字。

"我们，"老头说，"等我们给了律师钱之后才能出庭。"

在门旁，有个萎靡的瘦高个子男人，他脸色苍白，细长脖子，显得呆痴，像是刚从草堆里爬出来似的。莫丽娜像是见了陌生人一样，久久地望着他，瞧着他，仔细打量着。

"爸爸，我就是为了地，有个像样的家，吃口像样的饭，才和这个傻子结了婚。现在，我非要离开他不可，我宁可吃糠咽菜。"

"那你就受罪吧。"

莫丽娜站在她爸爸身旁，掰了一块玉米糕，蘸着摊在地上的干粮袋角上的盐面吃起来。

"这个傻小子会把我弄走，还会打我，但是，他会原谅我，还会把我当作他的妻子。爸爸，昨天晚上我在门口同他谈过了。"

"我们要是能躲过这个倒霉事就好了。"

这个傻大个靠近他们，一脸凶相。

"好呀，弗尔库，你让我们来吃官司！"

"谁让你偷了我的东西！"

"谁偷了你一根线头，就让谁烂手指头。你清楚，我什么也没偷你的。你的东西，我碰都没碰，你这样说纯粹是诬陷好人。弗尔库，烂你的舌头，烂掉你那说谎的舌头。"

"随你怎么诅咒，可是我还是去告你，还是要去法院……谁让你偷了我的衣服。"

"衣服！让你带着衣服去进棺材吧，你就知道你的衣服！"

"怎么？"

法警喊到他们的名字。他们三人一起走进去，又很快走了出来。乔治斯库律师跟在他们的后面，说：

"我说过，这个官司要延期。我知道我的话管用，瞧！我让它延期了。"律师同他的当事人一起进了"公平"酒馆。

"来，我们喝杯酒休息一下，我今天累得够呛。"

"累什么！你只是动了动嘴皮子！收割时，才能看出你的本事。"

律师喜欢说笑话，于是笑着说：

"我嘴里出来的东西都是金子，是纯金……巴尔布，给我们来三杯白酒，他付钱。"

酒馆里人声嘈杂。打赢官司的人因为高兴来这儿喝喜酒；打输了官司的人因为苦恼也来这儿喝闷酒。

"表兄，我们要是早点和好多好，反正最后总是要讲和的。瞧，罚了你五个列伊。"

"因为我们那时以仇人相待。"

"这真是鬼使神差。"维格·乔治斯库律师又在摸莫丽娜的下巴。

"你来吗？"

"我说了，和爸爸一起去。"

"律师先生，你为什么不结婚？你有房子，有地，挣钱又多，又年轻。"老头子好奇地问。

"什么？我疯了？老头子，娶老婆总要花钱。一结婚就生孩子，又要花钱。"

"你爸爸要是像你那样算这个帐的话，那你就不会出世了。"

"老头子，如今世道变了。现在的世道可难哪！"

夏天，麦收之后，法院附近各村的农民都把满车的麦子拉来，卸到律师家的仓库里。秋天，农民又用车给他拉来玉米。春天，青黄不接时，律师便拿出粮食来高价出售。

丘科沙听了维格·乔治斯库的话，就和她妈妈打官司。老太太的辩护律师是奥维迪乌·乌尔苏。

年轻的法官让打开本案的卷宗，破旧的卷宗里放着厚厚的材料。他看着材料，喊着当事人的名字。温图里卡面黄肌瘦，眼睛几乎睁不开。她和丘科沙一样，也拄着拐杖。她们俩互相搀扶着进了村公所。双方的律师把她们俩分开。两个老太婆手扶着村公所大厅中央的铁栏杆站着。

法官向她们俩提了一个同样的问题：

"你们都不想和好吗？"

"不想，"丘科沙回答说，并且恶狠狠地看着她妈妈。

如果可能的话，她真会把她妈妈活活吞下去。

"不想，"温图里卡有气无力地说，她也恶狠狠地瞪了她女儿一眼。她接着说："法官先生，她想要我的地，她要把我赶走，让我饿死，她不等我死就想把地要走。"

"现在地由谁种？"法官问。

"我在种。"丘科沙说。

"收的东西归谁？"

"打下的粮食归我。"丘科沙回答。

"那你给你妈妈什么东西？"法官问。

"我管她吃饭，法官先生。"

"这样你还不满意？"

"不满意，法官先生。"

"为什么？"

"因为我还没拿到地契！……妈妈不想死。我害怕她死之前会把地卖给别人。不少人在鼓捣着妈妈卖地。里什塔家是我家的远方亲戚。里什塔的儿子给我妈妈送去了一包葡萄干，就是想让妈妈把地给他们，因为……"

这个官司延期审理，一延再延。律师们也显得有些恼火。

"法官先生，你们为什么要延期审理？"

"再一次给当事人时间，让她们和好。"法官一字一句地说。斯特内斯库文书在记录本上写道："再一次给当事人时间，让她们和好。"

丘科沙搀着她妈妈一起走出屋子，离开了村公所。她们穿过马路时，左看右看恐怕车轧着。她们回到自己的家，坐在门廊上。

"妈妈，我给你弄点儿什么吃的？"

"一碗牛奶，还有玉米糕，要做得软软的。"

阿文德雷亚的鼾声如雷。伊齐库醒来后，又往火堆上添了几块马粪。夜里很凉，其他人也被从梦中冻醒。

我们把阿文德雷亚叫醒，然后解开马缰绳，骑马回村。阿文德雷亚吹起口哨。

午饭时，村子里传说，在阿登卡塔那儿的西瓜地里发现一具死尸，太阳穴开了花，死者是珀普肖伊家的大小子，死时手里还握着一支手枪。

消息不胫而走。

“你听说了吗？昨天夜里强盗把克蒂克杀死了。”

“有人把珀普肖伊家的小子杀了。”

好像是在敲丧钟，实际上是女人们的唧喳声。

宪兵尼古拉·米耶卢谢尔、文书、村长和甘丘医生坐上马车赶往阿登卡塔。中午，他们把死尸拉回来放在村公所门前，然后盖起来派人看守。村里人大吃一惊，扒着栅栏像看耍猴似的看热闹。

他们给城里挂了电话。甘丘医生搓着手不知所措地走出村公所。

“让奇雷什来一下。”

办事员离去片刻，很快把奇雷什找来。

奇雷什是村里个子最高的人，比别人高出两头。他是村里的卫生员。

“把药箱拿来。”医生对他说。

奇雷什到医生家去了。过了一会儿，他用胳膊夹着个

皮药箱回来。人们把文书用的大办公桌——法官来审理案子时也用这张桌子——抬出来放在院子里的槐树底下。

米耶卢谢尔挎着枪，不让任何人进入院内。

只有医生、奇雷什、村长、文书和两名守卫能自由出入。

他们把死尸抬起来平放在桌子上，然后扒掉身上的衣服。死者身上很髒，他自从生下来洗礼后，再没洗过澡。

我登上村公所的栅栏，我也不知道从哪儿来的这股劲促使我去看。甘丘医生看见我，对我做了个手势：

“你到我这儿来。你想看我解剖尸体吗？”

“当然想看。”

“你站在我旁边，给我端着药箱。”

我端着药箱站在甘丘医生身旁。药箱是皮子做的，里边放着手术刀、剪刀、大针。药箱里还有一把小锯。奇雷什吓得像筛糠一样浑身打哆嗦。甘丘医生看着他，笑了。

“奇雷什，你怎么了？害怕了？”

“不害怕，医生先生。”

奇雷什脸色蜡黄，黄得像秋后的槐树叶。

甘丘医生拿起手术刀，像宰牲口一样切开尸体，然后又把它缝上，缝好后洗了洗手。

“把尸体抬走！”

珀普肖伊家里的人正在路边等着。他们把解剖过的尸体抬上车，拉到河那边的村子里，那儿是他们的家。

我把药箱送到医生家里，然后又把我的小伙伴找来一

起玩打棍儿游戏。

宪兵尼古拉·米耶卢谢尔开始对这一凶杀案进行调查。

“谁同珀普肖伊家的小子为了姑娘争风吃醋了?”

村长回答说:

“谁也没和他争风吃醋。克蒂克吆,姑娘们都不喜欢他,因为他是个穷光蛋。珀普肖伊家里很穷。要是克蒂克还活着的话,他就得到别的村去讨老婆。”

“昨天晚上谁去放马了?”

“谁没去?……村里的小伙子们都去了。”

“把昨晚去地里放马的人都给我找来!”

守卫把我们大家都找了来。我们大大小小的来了一大群,大家聚在村公所,其中也有阿文德雷亚和他的堂兄罗舒。古察·罗舒紫脸膛,留着黄色的山羊胡。还有特雷亚什克家的小子。

“喂,你们谁把珀普肖伊家的小子打死了?”

我们大家吃惊地耸了耸肩。

“不是我们打死的。”

“那是谁打死的?”

“可能是斯特尼库茨村的小伙子们打死的。”特雷亚什克家的小子嘟哝着说。

“也许是卡拉瓦内齐村的小伙子干的。”阿文德雷亚补充说。

“谁知道呢?”古察·罗舒说。

米耶卢谢尔大发雷霆。他走到我们中间，举起鞭子吓唬我们说：

“把你们知道的都说出来，不然你们是要吃苦头的。”

“我们什么也不知道。”

“你们什么也不知道？”

“不知道。”我们异口同声地说。

他扬起鞭子朝我们身上乱抽，大家急忙用手遮住脸，我们浑身鲜血直流。

大人们冲进了村公所的院子。

“村长先生，我们的孩子快让米耶卢谢尔打死了。”

米耶卢谢尔听到吵嚷声，便端着枪走出来。

“你们想阻挠调查！这是一起报复案。你们都走开！不然我要开枪了！”

谁不知道他心毒手狠！他会开枪的！人们无可奈何地走出村公所，怒不可遏地站在栅栏外。

米耶卢谢尔又来到我们跟前。鞭子呼啸着，抽得我们皮开肉绽。

米耶卢谢尔的嗓子喊哑了，累得汗流浃背。

他打了一阵，就在我们身上泼水，然后又接着打。

一夜过去了。曙光透过玻璃窗映在我们的脸上。

米耶卢谢尔敲了敲咖啡店的百叶窗，他把莲卡叫醒，让她给他准备早点。

他吃饱喝足后，又回到我们跟前。

“你们还是不交代？”

"我们没什么可交代的！"

他派了一个守卫去找文书。这时，因为天还没亮，所以刚从床上爬起来的文书睡眼惺忪，面带愠色。

斯特内斯库的家和村公所只隔一道栅栏。一只肥大的带胡须的棕色猫白天经常从文书家翻过栅栏跳进村公所的院子，在屋里屋外窜来窜去。文书办公时，便让猫趴在膝盖上，不断地用手抚摸它。要是猫毛掉在他的身上，他就抓住猫的脖子往地上摔，而猫总是脚先着地。

"文书，你的猫呢？"

"我怎么知道！准是在厨房里。"

"你去找找，把猫弄到这儿来。"

文书回家时，总把猫抱在怀里。

米耶卢谢尔又派了一个守卫去找文书的老婆，向她借缝毯子用的大针和粗线。

"我老婆会骂你的。"文书说。

"骂就骂吧，反正是为了调查。"

文书的老婆放下百叶窗，睡到很晚才起床。文书醒得很早，他去村公所之前，怕把他老婆吵醒，在屋里总是踮着脚尖走路。

看守拿来大针和粗线。

宪兵头子尼古拉·米耶卢谢尔抓住猫的脖子，把猫塞到古察·罗舒的怀里，然后把线穿在针上，把古察·罗舒的衬衫开襟处缝上，再把两个袖子扎紧，把衬衫的下摆塞进裤子里，把腰带勒紧。米耶卢谢尔开始用鞭子抽猫。猫

挣扎着往外钻，但是钻不出来。猫的爪子挠破了古察·罗舒的肉，他吼叫着，衬衫被鲜血染红。米耶卢谢尔还是不停地用鞭子抽猫。

“你不说？”

“我说，宪兵先生。”

“谁把珀普肖伊打死了？”

“是我。”

“和谁一起干的？”

“就我一个。”

“你撒谎。”

米耶卢谢尔还是不停地用鞭子抽猫。猫发疯似地乱挠。古察·罗舒晕了过去。米耶卢谢尔又把猫掏出来塞进特雷亚什克的怀里。

特雷亚什克也交待说，是他杀死了珀普肖伊家的小子。

“你和谁一起干的？”

“和罗舒。”

“还有谁？”

“就我们俩。”

“你撒谎！”

特雷亚什克也晕了过去。

阿文德雷亚晕死过去三次，米耶卢谢尔又三次让他活过来，但他仍然守口如瓶。

我们又冷又怕，浑身发抖，直打哆嗦。米耶卢谢尔把古察·罗舒和特雷亚什克五花大绑，按凶杀犯押送城里。

尼古拉·米耶卢谢尔怜悯地看着我们说：

“我白打了你们。”

“白打了，先生。”阿文德雷亚回答说，“白打了。”

猫卧在宪兵头子的脚底下，嘴和爪子站满了血。尼古拉·米耶卢谢尔恶心地咧了咧嘴，抬起腿，狠狠地朝猫肚子踢了一脚。猫腾空而起，随后双脚着地落在门旁，钻出门跑了。我们走出村公所，看见猫趴在栅栏上。猫把腿蜷起来，用嘴舔着脚掌。

第十三章　没有眼睛的圣人

在铁路的北边，从我们家开始数，第三家就是巫婆迪瓦伊卡家。我的兄弟姐妹出生时，都是迪瓦伊卡接的生，只有我除外。但是，我也像其他兄弟姐妹一样，生下后也是迪瓦伊卡给做的洗礼。当我生病时，同样是迪瓦伊卡给我治病。我满三周岁之前，每到圣瓦西里节时便到迪瓦伊卡家，让她把我抛起来，以此祝愿我快快长大。因此，我也把迪瓦伊卡看成是我的接生婆。

迪瓦伊卡个子矮小，背驼得厉害，背上好像扣着一口锅。其实什么也没有，有的只是流逝的岁月，像沉重的石头一样重重地压在她的背上。迪瓦伊卡长着一双像獾眼一样的亮晶晶的小圆眼，这是她身上最有生气的部分。如果

你只看她的眼睛，不看她嘴上面的鹰勾鼻子、下陷的脸、掉光了牙的干瘪嘴，那么你就会以为她不过二十岁。她的灵魂在眼睛深处放射出火热的光芒。人们都说，她从年轻时起就成仙得道了。

迪瓦伊卡不光是给妈妈接生，村里的女人差不多有四分之一的人都是她接的生。她是个寡妇，只有一个独生子，叫托贝伊。她家的场院空空旷旷，房子破旧矮小，凹凸不平的泥草墙上有一扇歪歪斜斜的窗户，房门从来关不严。屋顶是麦秸做的。你简直难以相信，大风竟没把房子刮走。瞧，房子没被吹走。她的房子坐落在山岗的斜坡上。为了防止夏天下暴雨时流下的洪水冲倒房子，于是在房子周围挖了一道深沟。整个场院里，仅有两棵快要枯死的弯弯曲曲满是疙瘩的老槐树。就连迪瓦伊卡家场院长草的土地也是贫瘠多石。要是用棍子杵一下地，便露出满是石灰的黄沙土，草根都被烧死了。

托贝伊在铁路上工作。早上，他背上工具袋，手里拿着一把长柄榔头离开车站，顺着铁轨向前走。每到铁轨接头处，他就用榔头敲一敲。如果铁轨的响声正常，他就向前走几步，再敲。如果从响声里听出来是螺丝松了，便去查原因。这时，他跪在铁轨上，掏出扳手就把螺丝拧紧。他继续向前走，铁轨不断地响着，他不停地敲着，又不断地跪下来拧螺丝，这样，他每天要重复做几千次。冬天，寒风刺骨，几乎把他的手冻僵；夏天，风吹雨淋，烈日当头晒得人发晕。

托贝伊离开车站，沿着左边的铁轨往前走。中午时分，到了卢什德维德那边的第一个养路站。他在那儿的槐树底下坐下来休息，一边和养路工的妻子聊天，一边匆匆忙忙地吃午饭。他带的干粮很丰盛：一块玉米糕，一个葱头。他打开盐包，拿起玉米糕蘸着盐就着葱头吃起来。他不带葱头就带大蒜，不带大蒜就带大葱，这是开春时吃的东西。那时，鲜菜还没长出来，所以就刨出埋在地窖里的大葱吃。

托贝伊沿着另一条铁轨返回车站。他喜欢在铁路上工作。每到月底，他可以拿到一大笔钱，比给地主当长工或进城打短工挣的钱多两倍。星期日他也不休息。星期日，地里没有一个人，所以托贝伊匆匆忙忙地在太阳落山前就把活干完，把扳手交给养路工，便到布库尔的酒馆去喝几杯李子酒。喝完酒，他就哼着小调沿着公路回家。有时，他路过村公所也停下来和村长搭讪两句。

“村长，你是不是跟我过不去？你就是叫宪兵来也不能强迫我去给地主干活。我是国家的人，你听见了吗？”

当他喝多了时，也免不了把村长臭骂一顿。

的确，村长对他也毫无办法，因为他不属于村长管。

当托贝伊和他妈妈一起生活腻了的时候，他就娶了媳妇。

托贝伊长得跟她妈妈一样，个子很矮，又很瘦弱，青筋暴突，看上去浑身只有骨头和青筋。他手脚灵敏，瘦长的脸上长着一双蓝眼睛，有点仰脖。

有哪个姑娘愿意嫁给他！跑出五个村子之外，他找到了

老婆！他的老婆叫伯卡，和他一样矮小。她在家里做饭，托贝伊整天盼着老婆给他生孩子。她会给他生儿育女的。

“托贝伊，你想让你老婆生几个孩子？”

“她想要几个就生几个。”

“你怎么养活？”

“靠手，靠两只手。”

托贝伊的手掌长满了老茧，这是因为他整天拿着榔头敲铁轨的缘故。他手掌上的手纹都难以分辨，手肿得老高，常脱皮，脱皮后又肿，肿了又脱皮。

村子里，人越穷生的孩子也就越多。能养活两个，也就能养活三个。如果你生了三个，生第四个也就不难了。因为小的可以穿大孩子穿过的衣服，夏天小孩还可以光屁股，有口饭就能活。冬天，他们可以呆在家里，守在熏黑了的热呼呼的壁炉旁取暖。

“生四个，还可以过得去。九个怎么行？”

“什么？你觉得九个孩子就算了？图多尔有十个孩子，贝什库有十一个，莫丘克有十三个，还死了四个。”

“难怪你整天叫穷！”约尔达凯·迪曼说。

“我只要我老婆生两个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

“两个要是都死了呢？”

“怎么会呢？我的孩子身体壮着呢。”

我们得了眼病，躺在门廊上；我们头疼，脸发烧，两颊发红，有人赶紧跑去叫迪瓦伊卡。迪瓦伊卡急忙赶来。她

把我们的头放在她的怀里，又揪太阳穴又揪脖子，然后又揉手腕子又揉手指头，嘴里还不停地念着咒语：

我小路走，大路逛，
遇见一位大姑娘。
姑娘背着个大口袋，
里面土豆满满装。
姑娘，你到哪儿去？
我去太阳升起的地方。
把孩子的病扔到荒山野岭，
扔到那没有人烟的地方。
让孩子像
明亮的星星，
晶莹的露水，
像圣母的衣服那样洁净无瑕。

迪瓦伊卡每次看完病临走时，妈妈总要给她一些东西做为报酬。然后我们躺上几个小时，有时几天，甚至一个星期，总之躺到病好为止。

我们得了疟疾。每年夏天，我们兄弟姐妹及全村的孩子总要传染上疟疾。这种病是村里的水坑闹的，你无法防止。甘丘医生说，疟疾用奎宁很容易治好。但是他的诊所里没有这种药，只有装奎宁的几个空瓶子。这几个空瓶子以前装过药膏，瓶口上已布满了蜘蛛网，蜘蛛网上落了厚厚的一层尘土，已经变黑了。城里的奎宁有的是，但是很

贵，人们买不起。每年盛夏时，诊所里还是想办法买来几包奎宁。卫生员奇雷什从铺子里买来粉笔，把它碾碎同奎宁掺在一起，为的是出数。然后把掺了假的奎宁发给有病孩的人家。哪家的孩子没得疟疾？只有布尔布克神父和酒店老板家的孩子没得疟疾。凡是拿奎宁的人家都必须给卫生员奇雷什和甘丘鲜鸡蛋。掺假的奎宁溶在水里后发苦，一喝就吐，吐得一干二净，不起任何作用。

最好还是喝柳树皮汤。

姐姐用刀子削下柳树皮。我家的场院里，房前水井旁有一棵大柳树，树上长满了很多浑身带白点的绿色大毛毛虫。姐姐把树皮切成碎块，放进罐子里煮，煮三开后，然后端下来放凉。

“达里耶，快喝！”

“姐姐，喝几勺？”

“喝够为止。”

姐姐到地里去采地头上的金丝桃叶。金丝桃是一种毒草，连牲口都不吃。姐姐把两片宽草叶敷在手和手腕上，然后紧紧地用布缠起来。开始好像没有什么感觉，但过了一小时之后，包着的地方便觉得火烧火燎，叶子开始刺激皮肤，烧得人钻心。

“有什么感觉吗？”

“姐姐，觉得火烧火燎的。”

“要是觉得烧，就快好了，别解开。”

“我受不了。”

“受不了也得受。”

手上包的布开了，金丝桃的叶子从手上掉下来。皮肤红肿破裂，叶子敷过的地方露出了鲜肉，简直是地地道道的伤口。然后就这样呆一个星期或一个多星期，注意别让苍蝇落上。

“我手上的伤口结了痂。”

“小鬼，别把那层痂揭下去。”

“我不揭。”

痂自己脱落后，露出了白嫩的皮肤。这是新长的白皮，一辈子变不了色。你的疟疾好了吗？好了！

我们的病好了之后，嘴里又长了口疮。我们的上下牙床都肿了，如果单是肿，倒也容易好。但是，在肿了的牙床上又出了火柴头大小的带白尖的小脓包。脓包破了，又长新的。整个嘴都烂了，烂了一层又一层，疼痛难忍。不光是肉疼，牙床也疼。迪瓦伊卡又来给我们祛病，彼特雷亚也来给我们跳神。我们从早到晚一直用碱水漱口，直到累得睡着为止。我们醒来，在床上翻来覆去，好不容易再睡着，就这样反复折腾！后来，我们的口疮也好了。

风卷走了我们的口疮，把它吹到远方。

你要是有个丑姑娘嫁不出去，就去把迪瓦伊卡找来，并把你的心事告诉她。迪瓦伊卡听后便装神弄鬼，这样姑娘的妈妈满意，迪瓦伊卡和姑娘也满意了。迪瓦伊卡告诉她们，今晚就有说媒的来。当然，有时碰巧果然来个说媒的，

有时也不来。但是，有该出嫁而还没嫁出去的大姑娘的妈妈总是对巫婆抱着希望，相信她的魔力。

迪瓦伊卡在许多村里都出了名。

一个年轻貌美的姑娘出嫁时，除了陪送穿的用的外，还要带去地和牲畜。你会感到惊奇，但是人就是这样。刚结婚的小伙子很快就把家里那漂亮的老婆忘掉去另寻新欢。这时，你就去找迪瓦伊卡，让她替你破除你的情敌布下的魔网。

从这些事中，迪瓦伊卡也得到了好处。

莫丘克一家十七八口人住在一间房子里：莫丘克老俩口、三个结了婚的儿子和他们的老婆孩子，大大小小的一大群。他家的房子不少，但是其它的房间冬天都让羊占了，为的是让母羊下出肥肥的小羊羔。他们住的那间屋子里没有床，而是在地上铺着干羊皮，枕头放在墙边，窗子已经钉死，从来不打开，以防冷风进来。他们为了省穿的，个个像生下来时一样光着身子睡在没有剪过羊毛的羊皮上。他们的衬衫不多，每人只有一件，每件衬衫都有羊奶味和膻味。

你要是爱上了莫丘克家的姑娘，尽管你年轻力壮，可她却不理睬你。这时，你就要去求迪瓦伊卡。

“迪瓦伊卡大妈，我怎么办？莫丘克家的姑娘不理我。”

“他家的哪个姑娘？”

“帕拉斯肯瓦。”

“让大妈助你一臂之力。不过，你为什么偏要找莫丘克

家的姑娘？别的姑娘你一个也没看上？”

“是呀，迪瓦伊卡大妈，我就是没看上。”

妈妈要死了！她在病床上躺了那么长时间，我们大家都以为她现在不行了。她连话也不能讲，几天来都不张口。她的嘴唇干裂红肿，只有在她要喝水时，她的嘴唇才动一动。她的胸一起一伏地喘着气。我们点着蜡烛守着妈妈。我的几个姐姐都盼着妈妈死，因为她们早就伺候够了。

爸爸到一个商人那儿，让他尽快准备好一些做棺材和十字架用的木料。

妈妈要死了！现在大家都把妈妈的死看作是松一口气。家里长年累月地躺着一个身子开始腐烂而只有一口气的病人，谁都腻得慌。

但是，瞧，妈妈没有死。她睁开了眼睛，手也能动，并且开始说话了。

“给我点吃的。”

我们给妈妈吃了东西。过了一两个小时，妈妈又要吃东西。

妈妈开始有劲了。她可以扶着墙在屋里走动。她慢慢地出了屋门，然后靠着柱子，又能站着了，真是天大的奇迹！

妈妈能在场院里走动了。她能够坐在灶旁帮着做饭了。

妈妈的脸上露出笑容，她在病床上时难得笑一次。

生命之神差一点抛弃了她，但是突然间又回到她的

身上。

甘丘医生十分惊奇，迪瓦伊卡也很纳闷，所有的人都感到意外，人们像前来看望一个从另一个世界长途旅行归来的人那样来看望妈妈。

妈妈对大家提的问题无法回答。她知道她生过病，知道她好几天不省人事，还知道她从来没想过她会死。

“我们有孩子，我的病必须好，我还要抚养孩子，不然把他们托给谁呢？谁给他们洗涮？谁给他们缝补衣服？我生病期间想了很多，但是从来没想到过死。瞧，死神也没想我，它从我床边走过，但是没停下来。我认为，一个人，如果不是年纪大的话，只有他怕死并且总是想到死，他才会一病致死。我为什么要想死？我想的是活着，想的是我的生活，我的孩子们的生活，生活是美好的。”

妈妈的脸色黄里透黑，瘦得皮包骨。

人们看到妈妈的样子耸耸肩，吃惊地走了。让他们走吧！

妈妈的病好了。可是对我来说一点儿也没有用。一个时期以来，我总是得病，有时头疼，有时脚疼。虽然我什么也不干，却总觉得疲惫不堪，不想吃东西。肚子常常发胀，胀得难以走动。

爸爸抱着我去找甘丘医生。

“怎么了？你病了？那可就完了，你要死了！……”

他让我躺在沙发椅上，然后撩起我的衣服，用手指敲着我那像鼓一样的肚子。我的肚子胀得的确像个鼓。

甘丘医生从柜子里拿出一点儿药面给爸爸。

“让他用水喝下去。”

爸爸又把我抱回家。到了家，爸爸把药面倒进一个小碗里，用水化开，搅拌均匀，冲好的药水白得简直像石灰水。

“达里耶，喝下去！”

我喝下这碗像牛奶一样的水。水是苦的，一喝就恶心，我全吐了出来。

我一直吃着甘丘医生给开的药，但我的身体却越来越糟。他们把我的接生婆迪瓦伊卡叫来，她用手指敲我的肚子，敲我的背，然后摸我的肚子，一直摸到腋下，还是不知道我到底得了什么病。他们把我弄到外屋，让我躺在灶膛旁的麦秸堆上。迪瓦伊卡让人拿来一块铁皮，做了一个小铁锅，用一根头上劈开的棍子夹住。然后，她又让我爸爸到铺子里买来几个铅块。

迪瓦伊卡把爸爸买来的铅块放进小锅里，然后放在火上熔化。

我眼前摆着一个盛满了水的大碗。迪瓦伊卡叫把熔化的铅水倒进碗里，从铅遇水冷却后凝固的形状可以知道我该吃什么药。

迪瓦伊卡把熔化的铅倒在碗里，水劈啪作响，一大滴烫烫的铅水溅在我脸上，紧紧地贴住。这就是治我病的药。我的脸被烫得疼痛难忍。

我的病像妈妈的病一样自生自灭。这个该死的迪瓦伊

卡老巫婆！我不相信她的巫术，妈妈也不相信。但人们病得难以忍受时，则往往是有病乱求医。

教堂司事弗洛雷亚·弗洛亚克看上了邻村的一个姑娘。他身体瘦弱，满脸皱纹。他的痨病在蚕食着他的机体。他是教堂唱诗班的，而且唱得很好。他还能说会道，在村里数他字写得好。他完全可以当文书，但他有两件心事：一是姑娘们都认为他已过了结婚的年龄，都知道他有不治之症，所以都不愿意嫁给他。他顶多不过是个司事，有收入，但不多。如果他不是司事而当了文书的话，尽管他有病，并且嫁给他会年轻守寡，但总会有人愿意嫁给他。可是，他真倒霉！文书这个位子已经有人占了。的确，文书吉克·斯特内斯库也是个病秧子，但他能应付工作。司事弗洛雷亚也许能给他送葬，这是一种估计。但也可能完全相反——即斯特内斯库文书把弗洛雷亚司事从花名册上勾掉。

村里人都在想这些事，而且开始议论。他可以通过魔法让文书早死的想法深埋在弗洛雷亚心里。

晚上，他总是去找迪瓦伊卡密谋。

“难办呀。”迪瓦伊卡说。“迄今我还没有用魔法害过人。用魔法害人可是罪过，但是，你要肯出钱的话，我也可以干。”

司事进城到银行借来了钱，并把迪瓦伊卡要的钱如数给了她。

于是，迪瓦伊卡便替他施魔法。

只有迪瓦伊卡和司事知道其中的奥妙。但是，人们又是怎样知道的呢？可能是司事说话走了嘴，因为迪瓦伊卡守口如瓶，她从来不多说半句话。关于她所搞的巫术，就是打死她，她也不会说。

闹霍乱之后，车站那边，山坡下的那个公墓又扩大了。靠铁道五六步远有一个木结构的古老教堂。传说这个教堂是在很久以前土耳其统治时代，由一个普列文附近的工匠在多瑙河那边用木头建造的。

冬天，人们用雪橇从封冻的多瑙河把造好的教堂运回来。那个工匠又来架好了大梁，并上好了屋顶。后来，又从多瑙河那边来了另一个工匠，他在木板上画了一些圣像画，挂在四周的墙上。

这是个完整的教堂，里面可容纳二十个人。造教堂的时候，全村也不过就那么多人。

由于教堂的地基陷了下去，所以教堂的木墙斜向当中而下沉，从而变小。猫头鹰在教堂的钟楼里做了巢，夜里猫头鹰总是站在铁道旁的电线杆上哀鸣。

只有人死了才被送进教堂，神父就给死人念经祈祷。一个小孩爬上钟楼敲钟。受惊的猫头鹰见亮乱撞。多年的圣像画已被虫子蛀了。村里一有人死，就由神父伴随着送往公墓里的教堂。

两个星期前，一个男孩紧紧咬着牙死去了。人们把他

送到教堂，并为他祈祷。点上蜡烛后，人们突然发现：圣人的眼睛没了，是被人用刀子挖走的。

“谁能干这种事？”神父自言自语地说。

圣人的眼睛没有了。人们一下子想到迪瓦伊卡。

“迪瓦伊卡挖了圣人的眼睛。”

宪兵尼古拉·米耶卢谢尔把迪瓦伊卡叫到宪兵所，对她拳打脚踢，并且威胁她说，要把她捆起来押送城里。

迪瓦伊卡说：

“我没有挖圣人的眼睛。没挖就是没挖，你杀死我好了！你作孽吧！杀死我吧！就像该隐背亚伯那样，你也把我背到另一个世界去吧！”①

尼古拉·米耶卢谢尔把她拖出宪兵所扔到门外。

迪瓦伊卡踉踉跄跄地回了家。经过治疗，她恢复了健康。

因为是圣人，所以他们的蓝眼睛挖了也就挖了！

“还有呢！”杜米特列斯库说，“他们既然是圣人，所以没有眼睛也能观察一切。只有人才需要眼睛。”

起义之后，被枪杀的那些人的尸体在没有十字架的坟墓里已经腐烂，坟上的丛丛野草也已枯萎，野花已经凋谢；被打成残废的人已经返回家园，那些起义后被判徒刑的人也回到了自己的家里。一天夜里，在车站，有一个身材高大、

① 见《圣经·旧约全书》，该隐是亚当和夏娃的长子，亚伯的哥哥。因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及其供物，为此该隐嫉妒他，而将弟弟杀死。

红脸膛、大胡子的男子汉手里提着箱子下了火车。灯火通明的火车继续朝多瑙河方向开去。一盏火苗闪动的气灯照亮了站台。四周一片漆黑。扳道工鲁楚问：

“你到哪儿去？”

“明天我要到这个村办事。现在我想找个地方睡一夜。”

“很难找，这个村里没有客店，只有酒馆。过路的人不大在我们这儿留宿，只是过路而已。”

“既然这样，不能随便在哪儿给我找张床歇歇脚吗？我会付房钱的，也付给招待费。”

“我们找找看吧。我去找站长请个假，陪你到村里问一问，也许碰巧能找到住的地方。”

他们俩下了坡，过了桥，然后进了村。扳道工说：

“有一个老姑娘，独自一人住在这儿。她有两间屋子，你可以借她一间住一宿。”

他敲了潘代列·丘什卡家的这个没结婚的老姑娘的房门。这个老姑娘答应让客人借住一夜，于是他留下来。后来人们知道他叫杜米特列斯库。开始，他总是呆在屋里，后来便出了屋来到场院，慢慢又到了街上，和人们开始攀谈。

“斯特凡娜没白等，她还真等着了。”

“这回她可交了好运！她要嫁给这个做买卖的人了。”

“我敢肯定，他不会让她下地干活。”

开始时，杜米特鲁·杜米特列斯库东奔西颠找事干，找工作做。人们对他说：

“杜米特鲁先生，你最好当个税务员。看得出你是个通

情达理的人。遇到坏年景，我们晚一点交税你也不会硬逼我们。”

“谢谢你们的信任，但是，我不给国家干事。”

“为什么？事情并不多，而且拿薪水，干不干月底照样拿全薪。”

“花这种钱可不是滋味。”

“宪兵花的就是这种钱。”

“还有地主的总管。”

“还有村长。”

“神父挣的钱也不光彩。”

“只有老师挣的钱干净，他为了教会我们的孩子识字而费尽心血。”

“是费尽了心血。”

“起义时，一些宪兵站到了百姓一边。”

“站过来的太少了，大多数宪兵向百姓开了枪。”

“没有枯枝的花园是不存在的。”

“但是，我们的花园里枯枝太多了。”

“就是地主……”

“我们没能斗过他们。”

“当时确实很难，他们有枪有炮，我们只有大棒。”

“至少我们出了口气，心里舒坦一点儿。”

“但他们也解了恨。”

“起义时，全国到底死了多少地主？”

“只死了几个，屈指可数。”杜米特鲁·杜米特列斯库

先生说。看来他很了解内情。

“管家们死了多少？”

“死的很少，微乎其微。”

“但是，有多少穷庄稼汉起义后被地主杀死了？”

“有人说杀死了一万一千人，还有人说是一万五千人，也有的说打死杀死的农民有一万七千人，男女老少都有。他们杀人不留痕迹，怕的是将来找他们算账。”杜米特鲁·杜米特列斯库先生说。

“这些坏蛋在全国进行大屠杀。百姓一造反，他们就进行大屠杀。”

“这就看我们了。”

“此话怎讲？”

“如果全国还像几年前那样，人与人、村与村不通气，无组织无领导地反抗，那就必将重蹈覆辙。地主还会勾结军队、宪兵血腥屠杀百姓。”

“谁来领导我们？”

“到时候就会有能胜任的人出来。”杜米特鲁·杜米特列斯库接着说。

“现在他们在哪儿？”

“可能隐居在什么地方。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将来也会出现。”

“上帝啊，快把他们派来吧！快给我们派来吧。”斯特扬·贡丘祈祷说。他跟老号手迪什一样是参加过一八七七年战争的老兵。

“贡丘老爹，你是赶不上了。”

“但是，现在这些在街上扬土玩儿的毛孩子们会赶上的。”

那时，我正在街上玩土，同伊齐库、图塔努、图尔图里克和根古玩骑马。伊齐库当我的马，图尔图里克的马是图塔努。根古既不当马，也不是骑士，他装小马驹在我们当中乱跑。伊齐库既然是我的马，我就骑在他的背上，并且像骑真马一样用柳条抽他。伊齐库学着马叫，跑着。过了一会儿，伊齐库便跑得精疲力尽，于是便由我来当马，伊齐库当骑士。现在该轮到我学马叫，让伊齐库骑在我的背上跑。我是一匹烈马。我学马那样嘶叫着，把伊齐库吓得摔在地上。他哭了。

“你真坏，我不跟你玩了。”

“不玩就不玩。”

人们对潘代列·丘什卡家的女婿杜米特鲁·杜米特列斯库议论纷纷。

“他可能是地主派来监视我们的奸细。”

“也许是警察局派来隐藏在这儿的坏蛋。”

“也许是一个隐姓埋名的起义首领。”

“谁知道！常言说得好：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杜米特鲁·杜米特列斯库终于找到了事干：为希腊商人当经纪人——从有粮食卖的罗马尼亚人那儿为希腊商人收购粮食。有粮食卖的罗马尼亚人虽不多，但还是可以找到——他们都是地多的人家。

丘什卡的女儿斯特凡娜自结婚后变得年轻了，走起路来很神气，院子里、果树下都能听到她的歌声。

偶尔她也面露忧伤。

"姑娘，你怎么了？"

"我在想我的男人。他真怪！我真怕他离开我。现在我再也无法过孤独生活了。他是在一天夜里来的。他从不对我谈及他的父母、兄弟和姐妹，连以前在哪儿呆过都不说。他什么也不告诉我。"

"既然他不告诉你，你也就别问，总有一天他会对你讲的。人都一样，总有自己的考虑。"

转眼到了秋天，人们已收完玉米。瘟疫过后种的葡萄现在又埋起来，以便不让大雪冻坏秧子。

学校又开学了。树上的黄叶落了一地，秋风阵阵，细雨绵绵。

教堂司事弗洛雷亚·弗洛亚克吐血了，不能到唱诗班唱歌了，连屋子也不能出来。他请了布尔布克神父来做忏悔。

"布尔布克神父，是我让迪瓦伊卡挖了圣人的眼睛。她用魔法要把吉克·斯特内斯库文书害死，我想取而代之。我也想当文书。现在，布尔布克神父，我行将入土了。"

这个禽兽向神父吐露了隐私。

神父在酒馆里喝下几杯酒后，便向酒馆老板泄露了秘

密，消息很快传遍全村。

司事死了。一个小孩为他敲了丧钟。我们一群孩子都跑去看热闹。

司事躺在棺材里，脸色蜡黄，没有一丝血色。

挂在教堂四周木头墙上的圣人看着他，圣人那被挖掉眼珠的眼眶里，不知何时又染成了蓝色。

吉克·斯特内斯库文书也用两只活眼睛看着他。

第十四章 一口面包

学校开学了，我升入了最高一个年级。使我们高兴的是，格奥尔基·波佩斯库·布拉加迪鲁老师又回来教我们了。

一年级时，是波佩斯库老师教的。等我们上二年级时，我们这位有一双美丽的眼睛，浓密的胡须，声音洪亮而清脆的老师被调走了。他调到城里的一所中学去当老师，代音乐课。新学年开始，调来了珀凯·伊利耶斯库老师来替他。新老师是个中年人，沾满油污的衣服磨得发亮，头上戴着一顶草帽。

我们不喜欢他的长相。他面黄肌瘦，脸色憔悴，一副哭丧相。他对我们说了声"早上好"之后，便拘谨地坐在讲台上，开始点名。他讲话像托贝伊家的伯卡一样鼻音很重。

我们必须竖着耳朵才能听清他的话。这时，我们大家便挤眉弄眼，你捅我，我捅你，交头接耳地大声讲起话来。原来他又是个聋子。我们开始上课了。这个新老师水平并不高，一看就知道。

“今天学什么？”他问我们。

我们告诉他课文的题目。

“把这篇课文抄到本子上。”

我们按他的要求把课文抄在本子上。

下课后，我们到院子里去玩，然后又回到教室上课，老师却一连几个小时不停地看报纸。谁想学就学，不想学也没人管。不管你会还是不会，记分册上总是给你打五分。

一个学年结束后，我们当中不管是会写的，还是学了写、算又忘了的，大家统统升了级。

很快我们便发现，伊利耶斯库老师曾经上过一年中学。每当我们从讲台旁经过时，从他身上和衣服上总是嗅到一股汗臭味。于是男生们说：

“嘿，这家伙自生下来神父给他洗礼后，再也没洗过澡。瞧，他身上有一股死马味。”

“神父没给他洗礼，因为他又哭又闹不让洗。神父只好站在远处把圣水洒在他身上。”

“韦韦，好像你经常洗澡似的。每次你妈妈喊你洗澡，你都往街上跑。真是乌鸦笑话猪黑。”

“我为什么要洗澡？怎么？我是老师？我要是老师，我就洗澡。可我是吗？我洗了澡，一会儿就又脏了。所以，最

好还是不洗澡，也别洗脸。”

“看得出来。”

“我也没说看不出来。”

我对爸爸说：

“我们学校来了一位新老师。”

“我在村边上看见他了。”

“他什么也没教我们。我觉得他不会讲课。干吗把他派到我们这儿来？”

“他可能有支柱，有靠山，孩子。”

我知道，只有快倒塌的墙用支柱支撑。还有风一吹就倒的栅栏需要支柱。因为天长日久，栅栏陈旧而腐烂，你又无力修新的，所以只好用支柱把破栅栏撑住。这些我是知道的。但是人们怎么还要有支柱，有靠山！我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支柱是什么？”

“孩子，支柱就是朝里有人。”

“爸爸，你再说清楚一点儿。”

“就是有亲戚，达里耶，上边有亲戚。要是你上边也有亲戚的话，你既不需要头脑，也不需要文化。你只要说一句话，就会给你找个拿薪水的差使。”

“这么说伊利耶斯库也有支柱？他朝里有人吗？”

“有。不然像他这样的草包，早就饿死了。他的亲戚也让他沾了光。要是你没有后台，不管你多么有学问，谁也不会理睬你。你会无声无息地死去，就是死不了，也没

好日子过。”

上学念书，开头并不容易。当时村公所里来了一个人敲我家的门，说：

“让达里耶上学去！”

“他愿意去就去。”爸爸回答说，然后又回过头来对我说：“你愿不愿意上学？”爸爸是在试探我。

爸爸并没说让我去上学，也没说不让去。

开学了，我也和大家一起去上学。

在我们家里，我哥哥格奥尔基以前也念过书，他学习非常刻苦。那时，在我们村里教书的是一位上了年纪的女老师。她是山那边的莫齐地方的人，叫贝尔塔。她的男孩和我哥哥格奥尔基同岁。她的孩子在布加勒斯特上学，住在一个亲戚家。我哥哥格奥尔基禀性聪敏，很讨女教师的喜爱。她经常把我哥哥叫到她那儿，给他书看。春天，我哥哥经常一连几个星期缺课，去帮爸爸耕地。因为他是爸爸的长子，只有他能帮爸爸干活。秋天，爸爸又让他去给地主收玉米，砍玉米秸。只有下雪后我哥哥才又夹着书包像往常一样去上学。

我哥哥小学毕业了。秋天时，这位女教师把我哥哥带到她在布加勒斯特的亲戚家，然后带他去考中学。他考上中学后，便留在城里读书。他吃住都在学校。但是，在应考之前，我哥哥格奥尔基捅了一个漏子，一个大漏子。贝

尔塔的亲戚有一个可恶的男孩子，他家把他视若掌上明珠。这小子和我哥哥差不多同岁。有一天，几个男孩子在院子里玩，玩着玩着便打起来。这个城里的孩子骂我哥哥是穷光蛋，这下子可触到了我哥哥的痛处。等到阔老爷发现打架走出院子救他的小宝贝时，我哥哥早把他打趴下了。

“贝尔塔，你可给我们找到事干了！你把一个野孩子弄到我家来，他要打死我的孩子。”

“格奥尔基是个好孩子。的确，他爱发火，可能是桑杜惹着他了。把他们俩叫来，问问是怎么回事。”

他们把两个孩子都叫了来。

“格奥尔基，你为什么打桑杜？”

“他骂了我妈妈，而我妈妈早就死了，他为什么还骂？！

“桑杜，你为什么骂他？”

“我愿意骂他。他急了，就上来打我。”

桑杜又哭又闹。

“他是乡下来的，不懂事，不知道什么叫开玩笑。我们这儿，骂人就是开玩笑。”

“也许吧！”我哥哥轻蔑地说，“你们要知道，他要是再骂我，我就狠狠地揍他。”

过了几天，他们总算甩掉了这个包袱。我哥哥住在学校了。等他毕业后——还有一段时间——他就要留起胡子当神父了。那时，“上帝保佑，上帝保佑……上帝的奴仆结合吧……”等词语就该不离口了。

我的二哥——我的同母兄弟——伊昂也得到贝尔塔太太的同样关照，但却无济于事。尽管他上了四年学，却连二年级也没升上去。一天早上，贝尔塔老师把他从床上叫起来带去上学。他一再留级，只要教室的窗子开着，他就跳窗子逃学。

后来贝尔塔从村里调走了。来接替她的是一位长着红胡子、上了年纪的老师，他叫拉伊蒙特·库库。他采取罚款的办法，强迫人们让孩子去上学。爸爸一再被罚款，直到罚得最后无钱可交。因此，每天早上，爸爸都逼着哥哥去上学。

一天中午回家吃午饭时，我哥哥被打得两手通红，鼻青脸肿，肋骨被打断。他躺在床上，简直要完蛋了。哥哥的头发被"红胡子"揪掉了一半。

惩罚没有起任何作用，打骂也不奏效。拉伊蒙特只好无可奈何地认输，他揪住我哥哥的裤腰，把他推出门外。

"从今以后，不许你再踏上这儿的门槛！"

"太谢谢你了！"我哥哥站在街上对他说。然后，他又拣了一块石头朝学校的玻璃窗上投去。一块玻璃被打碎。爸爸赔了玻璃钱。

"红胡子"从此也就不再罚爸爸款了。

"这没什么了不起，村里有一半孩子都不识字。不识字天也塌不下来。村里的姑娘们，一百个里头也找不出一个能写会算的。"

我第一天放学回家后，便和妈妈坐在灶膛旁聊起来。我

向妈妈详细地讲述了这一天在学校里的所见所闻。

妈妈一边听一边看着我。我看到妈妈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你像格奥尔基，不像伊昂。你会有出息的。”

“你高兴吗？”

“当然高兴。伊昂使我伤心透了。你可要好好学习呀。”

“妈妈，我会好好学的。不过我需要一个列伊和十个巴尼，明天要交给学校。这是老师让我们交的写字板、课本和笔的钱。”

“等你爸爸回来让他给你。”

晚上，爸爸下地回来，吃饭时，我对他讲了交钱的事。

“我到哪儿去搞那么多钱！我没办法，以后再说。”

在家里，每次一谈到钱就吵得不可开交。妈妈气得忍无可忍地说：

“我过够了穷日子。这个穷日子要熬到何年何月！要钱没钱，要吃的没吃的。”

“我是拼着命地干活。”爸爸说，“大家都在干活，可是到头来还是缺吃少穿。不管我们怎么干，总是受穷。可我又不能去偷。”

第二天、第三天我又去上学。

老师进城了。他回来时，我们到车站去接他。同学们把一捆捆的书和写字板背回学校。我也背了一捆书。全班没有课本的只有两个人：我和那边村上的偷鸡贼科什家的那个脖子上长满粉瘤的孩子。

奥诺弗雷伊·科什家的孩子对此满不在乎。

“有课本也好，没课本也好，”他大声地说，“都一样。”

奥诺弗雷伊·科什以偷鸡为生。夜里，他翻墙跳进院子，用食物把狗引开，然后便爬进鸡窝去偷鸡。

“奥诺弗雷伊，你为什么偷鸡？”

“为了养活孩子，不偷就没吃的。”

“你做工去呀。”

“没地方去。”

“到地主家去干活，地主不是很多吗？

“是很多！可他们都想让别人白给他们干活。”

阿文德雷亚对偷盗讳莫如深，而奥诺弗雷伊·科什却公开承认。他被押进城里的监狱，又被放出来；然后又去偷，再被关进监狱。

“我在监狱里虽然也吃不饱，但总还有东西吃。难的是我老婆和孩子，他们在家挨饿。我要教会儿子偷东西，让他成为大盗而不是小偷，让他去偷牛、偷马，远近闻名。”

“教他偷吧！”

“等他再长大一点儿的时候。”

偷鸡贼奥诺弗雷伊·科什的儿子和我是同桌，他脖子上的粉瘤总是破。

“科什·哈拉拉姆比耶，你什么时候交钱？”

“先生，我什么时候也不交。”

“为什么？”

“我不需要课本。我不想学习，有没有课本反正一样。”

“达里耶，你什么时候能拿钱来买课本？”

“先生，我不知道。”

老师让我坐在教室的最后一张课桌上，我坐在老师指定的位子上。

开始上课了。先学写字，竖笔、横笔、圆圈、句号、逗号。

然后，同学们打开课本，开始读：奥，伊，奥伊……

我看着别人的课本读。我想写，但没有笔，也没有写字板。放学以后我到车站旁边布库尔酒店老板家找他的孩子玩。他有四个孩子，有的比我大，有的比我小。他们同情我，给了我一块摔碎了的写字板，没给我笔，我也没向他们要。

用钉子尖也可以在写字板上写字。

我家的屋顶是木瓦做的。我爬上屋顶起出一个钉子，然后把写字板放在床上，便跪着像别人那样练习写字母。我很快就学会了写字，也学会了算术。

我的课本和写字板是圣诞节过后才买的，用的是我给别人拜年时得到的压岁钱。我上小学时，课本一直都是新年之后才买。

教室可真大！四面的墙壁很高，左边门旁，有一块三条腿的方形黑板，右边是木制讲台。讲台上有一张老师用的讲桌和一把椅子。讲桌上放着花名册、墨水瓶和笔。

教室有三个窗子。这三个窗子比普通人家的窗子要大

得多。墙上挂着世界地图，上面标着所有的国家、河流和海洋的名字。

讲桌上还有一件东西：地球仪。上面涂着天蓝色的地方代表海洋，绿色代表平原，黑黄色表示山脉。

村里的一位四年级同学巴博伊·埃列弗泰列给我讲解了所有这些对我来说都是非常新鲜美好的事情。他瘦高个儿，脸色蜡黄，爱咳嗽，一咳嗽就往手帕里吐痰。同学们都笑他说：

"你们瞧埃列弗泰列，他为了不弄脏地，往手帕里吐痰！你就吐在地上吧，你就是不吐在地上，地也干净不了。"

"地本来不脏，只是有些人把它弄脏了。"埃列弗泰列回答说。

"唉呀！瞧他那德行！好像他这个痨病鬼有多大学问似的。"

"你不要念书了，找你死了的爸爸去吧。"

"别管他，让他念吧。也许他死不了。有些得痨病的人能活到老，他们看上去要死，可是死不了。让他念书吧！埃列弗泰列不像我们这样健壮，以后他可能当上村公所的文书或者是电话员。"

"图塔努，你根本就不配活在世上。"

"说我？我？"

图塔努气得两眼通红，逼近巴博伊·埃列弗泰列。

"埃列弗泰列，你听着，我是可怜你，怕一巴掌把你打死，吃你的供品。可是不知道罗齐卡大婶有没有做供品

的白面。"

"没有！"

"我们背着口袋到村里去讨供品，反正你死了不会让你没有供品。"

巴博伊·埃列弗泰列的爸爸早已去世。当时他精神失常，大家把他送进城里的医院，后来就死在那里。他除了种自己的地之外，还给地主皮耶纳鲁干活。他的老婆是城里人，她经常给村里的女人做各种裙子和衣服。巴博伊·埃列弗泰列的父亲有很多书。他经常看书，尤其是冬天外边冰天雪地干不了活时，他读得更多。他疯了后，托米察·布尔布克神父在村里放风说：

"巴博伊读书读疯了。读书多的人准疯。书不是好东西，会使人中邪。我只有在教堂里才读书。"

"算了，神父，你在那儿读书不会读死的！"乌杜杜伊对他说。

"你说得对。我经常跳着页读，因为做弥撒的时间太长了，教堂的弥撒真是费时间。"

埃列弗泰列是读着他爸爸留下来的书长大的。

"达里耶，我要是有钱，就把钱全拿去买书。我读书永远读不腻。"

有时，我一个人先进教室，到讲台上摆弄地球仪。我轻轻地转动着它，浏览所有的陆地和江河、湖海。我觉得，在我眼前手指下转动的不是硬纸做的小小的地球仪，而是我自己在周游世界，我在上面用大字写着"中国"的这个伟大

的国家开始了自己的旅行。我乘着马车旅行，马车由两匹粗腿壮蹄的矮马拉着，飞奔在路上。

巴博伊给我讲述过关于这个国家的故事。那里的人头戴古怪的帽盔儿，身穿长袍，长着一双小眼睛。我在这个国家旅行，通过村庄，穿过城镇。我看到他们的劳动和生活，听到他们的说话声，并开始听懂他们说的话。

在北极圈下边的这一部分，涂的是白色。我知道，那是一片荒凉的冰天雪地。但是在这个荒凉的地方，也有人生活。他们个子矮小，穿皮衣，住帐篷，以食鱼为主。在他们的国家里，我坐着雪橇旅行。雪橇由细腿、多角的梅花鹿拉着，鹿的犄角好象是托着整个天空。我沿着曲折的小路爬上山，坐着小船过海，乘汽艇渡过大洋，使我遗憾的是，海并不是无边无际的。

"达里耶，你在这儿干什么?"

"先生，我在看地球仪。"

"你喜欢吗?"

"喜欢。"

"下午到我这儿来一下。"

老师住在十字路口上商人沃伊库·布丘克家的一间房子里。老师的房间里有几个书架，上面摆满了书。

"你想读一些课外书吗?"

想。"

老师借给我两本书。我拿回去后，如饥似渴地一直读到晚上。读完后，我还给了老师。

“你读过了吗？

“读过了。”

“给我讲一讲内容。”

我给老师详详细细地讲述了内容。

我又借了一本又大又厚的精装书，书里有许多插图，关于世界各国的情况应有尽有。

“这是一本中学地理教科书。”巴博伊对我解释说。

“我们也许能上中学。”

“你有可能，我可不行，我活不了多久，我要死了，痨病残酷无情。”

我的求知欲越来越大。

当我升入二年级时，我已经掌握了许多知识，同时，我还计划到小学毕业时把老师所有的书都读一遍。

后来，老师锁上屋门到城里去了。

伊利耶斯库老师只读杂志。

我升入了三年级。

伊利耶斯库老师也调走了，又给我们派来一个新老师。这个老师还有别的癖好：他晚上经常到村里去搞姑娘和女人。因此，小伙子们揍他，男人们也揍他。

一天早上，富苏兰挨了一顿狠揍之后来到学校。他先点名，然后让我们听写，听写之后，让我们自习。他指定一个五年级的学生当值日生，让他来看着我们。谁要是调皮捣蛋，他就记在本上，被记下来的人就挨杜杜·富苏兰的揍。

我们这位老师不务正业。他经常到学校对面的伦卡大婶的咖啡馆里去玩牌，和他一起去打牌的有我姐夫阿尔维察、收税员、文书和神父。他有时赢，这时他就把赢的钱喝个精光；但他输的时候更多，他一输，便怒气冲冲地回到教室。

“有谁说话了吗？”

“先生，就是这些人。”值日生一边回答，一边把名单交给他。

老师拿起柳条鞭，把学生叫到讲台，然后把他们痛打一顿。尔后，让我们放学回家，而他却又进了咖啡馆。

我们什么也没学到。我渴望读书，但是全村里只有埃列弗泰列有书，而他的书我又都读过了。我在他那儿找到一本皮上写着《亚洲》的小书，这本书描写的是那个很陌生的洲的风土人情！

“埃列弗泰列，你把这本书借给我看看吧。”

“拿去吧！”

我拿走后，便开始读起来。这是一本动人的爱情故事，是伊万·屠格涅夫写的。

“达里耶，你为什么哭？”

“我也不知道，妈妈。”

“是不是读书读哭了？”

“是的。”

“你要找一些逗笑的书看，要是哭，这个世道上有你哭的！只有脆弱和懦弱的人才会哭。你以前并不胆怯。”

“我不害怕任何人。”

“你要是不怕人，那就再也没什么可怕的了。”

“我以前怕下雨天打雷。现在我知道为什么打雷了。去年，布拉加迪鲁老师上课时给我们讲过。”

“你知道打雷是怎么回事？当天空乌云密布而又未降雨时，伊利耶圣人便坐着他的马车在云彩里兜风。圣人的马车有两个火轮，马也是个火驹——火的幽灵。火轮和马蹄踏动云彩，从而把雨抖了下来。魔鬼到处躲藏，而圣人伊利耶两眼紧盯着它不放，然后看准它，朝它射出带火的箭，这就是雷。带火的箭射中魔鬼，烧焦了它的皮肤。所以每次打雷后，都嗅到一股糊味儿。你要是在星期天补衬衫或在墙上钉钉子，那可是魔鬼隐藏的好地方。圣人早就盯上它了，所以你要是穿着星期天补过的衬衫的话，就容易被雷劈。被雷击的房子要起火，树木也要着火。”

“但是，下雨的时候你为什么在门槛上撒盐？”

“只有天河决口下瓢泼大雨时我才在门槛上撒盐，撒盐可以使大雨变小。”

“妈妈，你相信这些吗？”

“大家都信。外婆和祖母也都相信这些。也许老年人知道得多一些。你要是知道不是这么回事的话，那你也讲给我听听。现在你不怕打雷了吧？”

“不怕了。”

“下着雨打雷又打闪时，你不要在树底下避雨，有时大树也容易被雷击。”

"是不是因为魔鬼在树根儿下避雨？"

"嘿！你总是刨根问底没个完。"

教室里也有书，是一些神父做弥撒时念的祈祷书。对这些书我一点也不感兴趣，根本不想读。

隆冬时，我们的老师无影无踪了。一些人说，可能是当他夜里过河去搞女人时，河里的冰裂开，他掉进河里淹死了；也有人说，他远走高飞了。

又给我们派来了新老师，他年纪很大，可能年过七十。他步履艰难，留着长胡子，戴着一副眼镜，鼻子又细又长，鼻尖儿几乎顶住上嘴唇。他耳朵很灵，就是眼力差点儿。他穿着一身褪了色的旧衣服，脚上穿着一双后跟快磨平的靴子，头上戴着一顶破毡帽。瞧，这就是伊诺琴丘·科库兹老师的全部家当。

"孩子们，你们要好好念书，人要是没文化就是睁眼瞎呀。"

"是，先生。"

这时，克勒巴什家的孩子站起来说：

"我不喜欢学习。我喜欢放羊。我家有牛奶、奶酪，还有皮坎肩。我会数羊，干吗还要学习？巴博伊的爸爸读书都读疯了，被送进了疯人院。"

伊诺琴丘·科库兹笑得合不上嘴。我们有几个人也笑了，

"克勒巴什，你爸爸是大财主 "

“先生，可是他很勤劳。”

“克勒巴什，你家有多少雇工？”

“先生，有许多，大约有十五个。地里活多的时候，我们还雇穷人打短工。因为他们没吃的，所以来给我们干活，为的是混口饭吃。”

“先生，到我家干活的人也是混饭吃的！”约尔达凯家的孩子流着口水抢着说。他的脸上长满了粉刺。

“克勒巴什，好，如果你不愿意，可以不学。不是非让你学不可，你也不是念书的材料。可是，他们这些人应该念书，等到你继承你父亲的家业时，他们就不会再给你干活混饭吃了。”

老师看着我们。他看着我，我知道他看不清楚。

“达里耶，你喜欢学习吗？”

“我喜欢，先生。”

图尔图里克也喜欢念书；想进城学手艺的耶普雷·马林也喜欢念书；还有梳着辫子、浓眉大眼的拉扎尔·菲洛弗泰亚姑娘也喜欢学习，她的字写得最漂亮，口算最快。

“我，”菲洛泰亚说，“我想当医生给人们治病。我想……可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必须进城学习。可我又去不了，我爸爸没钱供我上学。”

她家住在铁路经过的河边上。她家的屋顶是尖的，与其说是住房，不如说是鸡窝。兄弟姐妹全算上她全家共九口人。她妈妈还年轻，她家的人口还会增加。

“我想学习架桥。”心算很快的达维德·博丘吹嘘说。

耶普雷·马林同情地望着他们。

“你们都是在胡言乱语。你们难道不知道上学要花钱吗？进城上学，要交房费，要穿衣，要买书，谁给你们那么多钱？我去学手艺，将来当个机械工。我要做各种零件，同机器打交道。世界上所有机器上的螺丝钉我都要弄得一清二楚。我在车站上同一个维修工谈过了。”

耶普雷的外衣补丁摞补丁。他的鼻子冻僵了，流着鼻涕，不断地用衣袖擦。我们都用衣袖擦鼻涕。

“安静！”老师大声喊着。“今天我们要讲暴君伊昂大公，人们也叫他伊昂·阿尔梅亚努。”

伊诺琴丘·科库兹的老婆多克西太太很年轻，也就是三十来岁，肤色白嫩，肌肉丰满，长相漂亮。她的两肩和臀部很宽大。她几乎比伊诺琴丘·科库兹高一半。这两口子有三个男孩。

“孩子大了吗？”

“不大，还小。”

“多克西太太同谁生的这些孩子？”

“同科库兹生的，能同谁！”

“算了吧！”

伊诺琴丘·科库兹拉着雪橇上街，雪橇里坐着他的三个孩子——老大刚满五岁，老二只有三岁，最小的才一岁。这三个孩子长得都像伊诺琴丘·科库兹。

“先生，你的这几个孩子叫什么名字？”

“老大叫大伊诺琴丘·科库兹，老二叫二伊诺琴丘·科

库兹，老三叫三伊诺琴丘·科库兹。”

“这些不是基督教的名字，是异教徒的名字。”

“乡亲们，就算是这样吧。这有什么关系！异教徒难道就不是人？”

“谁说不是。”

伊诺琴丘·科库兹老师在我们村呆的时间也不长。

自从伊诺琴丘老师给我们讲了暴君伊昂大公的那堂课之后，他便受到了排挤。他讲这一课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全村，然后又传到城里。于是，一天早上，伊诺琴丘·科库兹正在看着花名册点名时，一个脸色发黑，留着两撇小胡子的先生闯进了我们的教室。因为教室里来了陌生人，所以我们大家都站起来。

“我叫伊·帕拉斯肯夫，是督学。”他装腔作势地说。

“好哇，随你怎么说。你可以说你是罗马教皇，还可以说是教皇的哥哥，说什么都行。”

伊·帕拉斯肯夫气得像患了癫痫病一样浑身发抖，但他克制住了。

“我是来调查有关暴君伊昂大公事件的。”

“还调查库札大公事件对不对？我也讲了库札大公的故事。”

“别打岔，我说的是伊昂大公的事，我知道你搞的什么名堂。”

“我的名堂多了。”伊诺琴丘·科库兹开玩笑地说，“我讲了关于伊昂·阿尔梅亚努大公、库札大公和图多尔大公以

及所有那些唤起民众的大公们。"

我们全班的同学仍然站立。我们听着，睁大两眼看着他们争吵。

"同学们，坐下吧！"科库兹老师让我们坐下。伊·帕拉斯肯夫把公文包摔在讲桌上，撞翻了墨水瓶，深蓝色的墨水撒了一地。他吼叫着：

"这太不成体统了。"

"不是我不成体统。"科库兹老师说，"你是来调查的，督学先生，那就请您调查吧。调查对我来说是家常便饭。"

督学拿出一沓纸，飞快地写起来。

"你真的给孩子们讲了暴君伊昂大公的事？"

"是真的。我应该讲，这是教学大纲里规定的。"

"你真的讲过伊昂·阿尔梅亚努杀死地主，并在复活节时杀死摩尔多瓦大主教？"

"是的，因为书里是这样写的。"

"你真的坚持认为伊昂·阿尔梅亚努热爱农民仇恨地主？"

"是的，书里是这样写的。"

"我知道书里写着。"

"既然是这样……"

"你真的为讲好这一课下了功夫？"

"是的，一点儿也不假。"

"你为什么这样做？"

"这是我的爱好！你知道！我的爱好！我愿意这样做！"

“先生！”

“是的，督学先生。实话告诉你，有些课文内容我很喜欢。我是满腔热情，带着感情教这些课的。”

“学生们都哭了。”

“不是所有的学生都哭了。但是有些学生心情激动，确实被感动得哭了。我不喜欢的课，我就讲得枯燥无味。比如，勇敢的米哈依大公，他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加重了地主对农民的奴役。我也不喜欢康斯坦丁·布伦科万努大公，他刮尽民脂民膏，养肥了自己。”

“你在课堂上也把这些给学生们讲了？”

“讲了。”

“但是，课本里不是这样写的。”

“那是假的，是伪造的。课本里有很多地方都是伪造历史。我从一些文献里了解了历史的真相。”

“这样的文献，还有像你这样的老师，对我们没有任何用处。你退休了吧？”

“我是退休了，但我还继续工作。”

“我中止你的工作。你离开学校吧。”

“我会离开的。”

“现在就走！”

伊诺琴丘·科库兹老师转过身来面向我们。他面部苍老，鹰钩鼻子上架着一副眼镜，透过眼镜，可以看到一双湿润的眼睛。

“同学们，再见！望你们注意身体，别忘了温习我教过

的功课。”

“你们回家吧！”伊·帕拉斯肯夫督学对我们大声说。“我们会给你们再派一个新老师来，可能派布拉加迪鲁来。”

我们走出教室，伊诺琴丘·科库兹老师走过我们身旁时，我们向他脱帽致意。他又看了我们一眼，也脱帽向我们致意。他低声说：

“真理，你们要在书本里寻找真理。有些书谎言连篇，这种书很多。你们要学会善于明辨是非。”

布拉加迪鲁老师调回来的消息使我们万分高兴。我们欢呼着迎接他。以前教过我们的这位老师对我们很有感情。

他挨个地打量着我们每个人。他也看了看我。我差不多是坐在教室的最后边。

“达里耶，我走后，你又读过什么书吗？”

“先生，我没有什么书可读。”

“回头你到我这儿来一下。”

从此我每天都到老师那儿去。他每天借给我一本书。读完后，我就还给他，他再借给我另一本。

老师把我叫到讲台上，让我做算术。我开始做加、减、乘、除运算，得出结果。

这时，坐在前排的一个学生突然哈哈大笑起来，他是米蒂克——米蒂克是托马·奥克的儿子。

“米蒂克，你笑什么？”老师问。

“先生，我笑达里耶的大马靴。”

“达里耶，回到你的位子上去。”

我回到坐位上，其他的同学受了托马·奥克的儿子的影响后，也笑了起来。

老师把米蒂克叫到讲台上。

“你刚才说为什么笑？”

“笑达里耶的大马靴。他穿着他爸爸的靴子来上学。”

的确，入冬以来，我就穿着爸爸过去当骑兵时穿过的马靴去上学。靴子比我的脚大得多。脚穿进去，晃晃荡荡，靴筒一直到膝盖，磨着我的小腿，刚能拖着走路，脚都磨破了。我上学，总是在穿戴上将就着。外衣袖的胳膊肘磨破了，也没人给补。我从阁楼上找了一顶旧帽子，帽子大得几乎捂住眼睛。

米蒂克竟然笑话我的靴子！这使老师大为恼火。我从来没有见过老师生这么大的气。老师听着酒店老板的儿子回答问题，可是他一个问题也答不上来。

米蒂克长得漂亮，干干净净，指甲修理得整整齐齐，脚上穿着一双很合脚的小靴子，身上穿着时髦的衣服。

老师用教鞭打他的手掌，但米蒂克还是笑个不停，一直笑到疼得哭鼻子。柳条教鞭被打断了。布拉加迪鲁老师不轻意打人，除非把他气坏了时才打。可是，你要记住，他一打人可就是厉害的！他不会轻意饶过你。但是，我们也并不是怕得不得了，因为我们在家挨父母、哥哥、姐姐的打挨惯了。当然还是怪我们不好，这是毫无疑问的。老师进教室前，我们在教室里打打闹闹，衣服上蹭满了墙上的白

灰。我们还动手打嘴打鼻子，打得直淌血。所以，布拉加迪鲁今天打这个学生，明天打那个学生不是没有原因。但是，富苏兰老师不打人，只是在心血来潮时胡说八道。

“米塔凯，告诉你姐姐，让她今天晚上出来。”

“伊柳什，你妈妈好吗？她还在守寡？我想去当你一夜的爸爸。”

杜杜·富苏兰是当局派来做我们的启蒙老师的，所以不好同他吵架。

穿着象米蒂克一样讲究的还有车站旁酒店老板布库尔的儿子。富苏兰老师有时同甘丘医生和村里其他有钱的人一起吃吃喝喝。布库尔的儿子反应迟钝，老师让我同他坐在一起。老师提问米古·布库尔问题时，我总是小声告诉他，帮他回答问题，作为报酬，他每个星期都给我一个面包圈。一个星期之内就能得到一个面包圈，这可是一件了不起的事。

下课铃响了。此时正值隆冬，我们都到院子里去玩。我早上不吃饭就去上学。课间休息时，同学们都拿出自己带来的东西吃，有的同学带的是烤玉米糕，有的带煮熟的玉米粒。我们班里有八十多个学生，现在教室显不出宽敞了，十几个孩子挤坐在一条长凳上。八十多个学生中，只有两个学生带面包，其中一个是克勒巴什家族的。姓克勒巴什的人都是富户：他们有地，有羊，有耕牛和奶牛。尼古拉·克勒巴什是男孩子中唯一带面包的一个。他每天上学都带

来面包！

还有一个同学带面包上学，这就是住在河边的机械师尼楚的女儿。尼楚的老婆是外乡人，他家有台脱粒机。他的女儿叫奥尔祖·玛尔加列塔，是村里的孩子中唯一的一个总是穿着鞋走路的人。是的，她不仅有鞋穿，而且还有时髦的裙子。她头发梳得很整齐，头上戴着蓝头巾，背着皮书包。奥尔祖·玛尔加列塔有一双蓝眼睛，薄嘴唇。她的妈妈是德国人。她吃的面包，雪白雪白的。

我们围在她身旁看着她往嘴里塞面包，我们看着她的面包直流口水。

入秋以来，我们家就不再发面烤面包了。

这时，丘丘米什家的小儿子格林说：

“喂，克勒巴什，给我一口面包吃。”

“为什么给你吃？”

看青人的女儿皮耶特里奇卡也说：

“玛尔加列塔，你给我一口面包吃。”

“你爸爸妈妈不给你面包？我为什么要给你？”

一口面包，一口面包。

爸爸去买烟叶还没回来。我们没有等他，我们先吃了饭，然后上床睡觉。

油灯亮着，发出微弱的光。我听见爸爸的脚步声。爸爸进屋后，妈妈便下床去给他拿吃的东西。

爸爸对妈妈说：

"老师要我们送达里耶到城里去上学，他想办法给解决路费。我们让达里耶以后当军官。"

我从被窝里探出头来问：

"干吗非当军官？"

"因为老师送你去上学的那个学校是免费的，只是考试一下，如果你能被录取，国家供你费用，毕业后就是军官。到那时，你就拿工资了。我不能送你上别的学校，我没有钱供你。"

到目前为止，我们村还没有一个男孩子当军官。河滩那边村上的克尔里克家的一个男孩子入了伍。他当了下士、中士，后来又升为上士。他会在部队里一直干到老。他有时也回家来探亲，克尔里克一家为此感到骄傲。他身挎带鞘的佩刀，刀把上还带着穗子。他穿着一身笔挺的制服，好像和波莉娜表嫂一样勒着腹带。他的皮靴擦得锃亮。他走起路来，皮靴咯吱响，佩刀响叮当。他走在街上，人们都瞧他，女人们看得眼馋。兹弗卡姐姐见此情况骂道：

"你们看他干什么？他的脸肥得流油，胖得没脖子了，是条癞皮狗，懒虫。呸！"

兹弗卡姐姐朝他背后啐了口唾沫。

"靠给士兵放一两天假笼络人心。"

我当了军官之后，兹弗卡姐姐可能也会这样骂我。

我又蒙上头睡觉。这么说，我就要到城里去上学了。至于当不当军官，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使我高兴的是，我能够到一个遥远的城市去上学了。

从此之后，我心里只有一个想法：秋天，我要去城里上学，去城里上学。

第二天早晨，我碰见巴博伊·埃列弗泰列。

我们俩都提前到了学校。我本想不告诉他进城上学的事，但又憋不住。我是来学校上学，而埃列弗泰列是来送他弟弟上学的。

“埃列弗泰列，我要进城上军校去了，是我爸爸告诉我的。”

“太好了。我已过了年龄，我已经耽误了时光，我妈妈那会儿要是让我上这种学校的话，现在该上四年级了。”

巴博伊·埃列弗泰列细高个儿，弱不禁风，不停地咳嗽，往手帕里吐血。

“你还在咳嗽。”

“有什么办法！我的病总好不了，疾病折磨我，摧残我。也许开春或秋后，我就永远安息了。”他强做笑脸，笑得很不自然。

“你为什么这样讲？”

“我能说什么？！病把我折磨得简直要疯了，你知道吗？我的病是不治之症！死了算了！不如让我成为一具僵尸，埋在地里，与世隔绝为好。世界在前进，万物在生长，白天太阳高照，夜晚星月当空，而我，在九泉之下却麻木不仁，一无所知。”

“反正人总有一死。”我低声地说。

“人是要死，我也没有说人不死。但是，总要生活一番

之后再死。我还没有真正体验生活，仅仅开始了解生活。你知道吗？我要死了！……可是还有那么多的书没读过！古往今来，那么多的事我还不了解。我真想大声吼叫！可又不能那样做！我不该失去理智。我必须坚强起来，坚持到生命最后一刻。”

同巴博伊·埃列弗泰列一起的还有他的弟弟马代伊。

“马代伊，你也咳嗽吗？”

“是的，我也咳嗽。”

“我们全家住在一间屋子里，没法隔离，所以就传染上了。”埃列弗泰列解释说，“达里耶，你知道，我在伊索佩斯库的儿子那里找了几本好书。有一天，他把我叫去，把书递给我，说：‘喂，巴博伊，你把这些书拿去，我家没地方放。我也不需要。’于是我就拿走了。你到我家来一下，我把这些书借给你。”

“等地干了，路好走时我去拿。”我对他说。“现在，到你们村的路上都是泥浆，泥浆有马腿那么深，你是怎么送马代伊来学校的？”

“我背着他，一直把他背上了布丘克公路。”

巴博伊走了之后，布库尔家的格里茹柳推着我进了教室，说：

“你别借埃列弗泰列的书。那些书他读过了，每页他都摸过。你如果再去读，也会染上痨病。别看那些书！宁可当个健康的蠢驴，也不当有痨病的学者。”

教室的窗子灰蒙蒙的，掉了白灰的墙壁露出了黄色，铁壁炉冒着烟。放进炉子里的劈柴没燃着之前，先是冒烟，然后嘎巴嘎巴地响，很快就熊熊地燃烧起来。

窗外很远的地方有几棵光秃秃的树木；深蓝色的天空上白云朵朵。

第十五章　药

先是大门口的柳树吐出嫩芽，接着，桑树、槐树也放出鲜嫩的光彩。香李树张开了笑脸，田野里野花争艳，到处充满生机。白鹳和燕子又回来了。天气虽然还冷，但是白鹳一旦飞来，我们就不再穿鞋了。我们把靴子、皮鞋、便鞋都脱掉，光着脚板走路。起初，我们觉得寒冷刺骨，后来就习惯了，也就不在乎了。

“妈妈，我不想穿鞋了。今天我光着脚去上学。”

“你愿意光脚，那就光脚去吧。”

我本应该把脚洗一洗。可是下了雨，街上泥泞不堪。我一出家门，泥浆就没过脚面，我还洗脚干吗！我刚迈出门槛就摔了一跤，左脚的脚趾头流了血。为什么要绊倒？应该走慢一些。

到了学校，便坐在位子上写作业。

然后是课间休息，休息时间很长。这时，我听见有人

说：

“来，我们玩老鹰捉小鸡。”

于是，我们跑了起来，我又绊了一跤。左脚的脚趾头又碰破了，这次碰得更厉害。

我躲在一边，看着脚趾头流血，实在疼痛难忍。我自己也觉得莫名其妙。我想：今天走路应该格外小心才对，也许是累了吧。去冬，我的身体一直不好，但也没什么大病。那时我总对妈妈说：“妈妈，我头疼！”她回答说：“别处还疼吗？看看还有哪儿不舒服。”

“没有。”

“你去玩吧。出去透透气。”

后来，我的头有时还疼，但我没对任何人讲。父母无暇顾及我们，如果我们病了，就躺在床里边的角上，一直躺到病好为止。爸爸妈妈不管我们，只有当我们调皮捣蛋时，才用柳条抽我们，这是家常便饭。

特别是我哥哥伊昂和我姐姐丽察经常挨揍。阿文德雷亚总是勾引我哥哥伊昂去偷东西——偷鸡、偷羊、偷马 然后把偷到的东西拿到酒馆换酒喝。

“伊昂，你是天亮才回来的。索瓦告了你。”

“我和阿文德雷亚玩去了。”

“到哪儿玩去了？”

“找姑娘去了。”

“索瓦说你喝酒了。”

“他瞎说，爸爸。”

我哥哥伊昂撒谎毫不脸红。

“你迟早得让人家逮着。”

“那你可得去救我，爸爸。”

“我不去救你。我会去村公所，但不是为了去救你，而是当众揍你，让你没脸见人。”

我哥哥答应改邪归正。

“可是，这个丫头我们怎么办？她整天闹着出嫁。她连十四岁都不到，就开始追小伙子。我真担心她会做出见不得人的事来。我觉得她和克勒丘家的布勒蒂勒搞上了。孩子他妈，你说呢？”

“妈妈，你怎么想的？”丽察的脸红了，一直红到脖子，嘴抽搐着要哭出来。

“这个小伙子倒也不坏。但是，丽察，你别着急，等你长大了再说这事。”

“可是，妈妈，你不也是只有十四岁就出嫁了吗？你不也是那么小吗？你还是出嫁了，瞧，你也没有因为出嫁而死去。没有姑娘会因为出嫁死的。”

如果晚上我姐姐和克勒丘家的孩子在大门口让爸爸妈妈看见，那么，我姐姐的脖梗子上肯定会挨几巴掌。

放学回家的路上，我的脚又磕了一下，真不知是怎么搞的。

下午，我坐在院子里，边晒太阳边看书。泥泞的地面晒干了。

我现在到井台上去洗脚，一直洗到膝盖。

泥路已经晒干，我的脚也洗干净了。我哥哥伊昂从外边回到家里，坐在我旁边的毯子上。他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支烟，点着后抽了起来。他瞧着我的脚问：

“你的脚趾头怎么了？”

“磕了。”

我哥哥伊昂看了看，然后凑过来摸着我的左脚说：

“你动一动脚掌。”

我使劲地去动脚掌，可是，我笑了。

“哥哥，我的左脚掌不会动。”

“你的脚掌怎么不能动？”

“看，是动不了。我想让它动，可就是动不了！”

这真是怪事！

我哥哥对着妈妈高声说：

“妈妈，他的腿跛了，脚不能动了。”

我笑着让妈妈看我的脚。妈妈真有点儿不敢相信。

“达里耶，你不是在装吧？”

“我干吗要装？”

爸爸也知道了。

“你活该，”爸爸说，“成了残废才好呢。我们家还没出过残废人。这回我们家可有了福气，也有人成残废了。”

我又瘦又高，脸色发黄，一头棕发，脸上满是雀斑。如果我和别的孩子们摔跤的话，他们几乎都能把我摔倒，但我的拳头还是挺厉害的。我要是和别人打架，别人也打不

着我。只要我先出手，一拳头打过去是很重的。要是别人绊我，把我绊倒了，我也要把他掀倒在地。我骑在他身上，抓他，咬他。我的牙很大，比和我同岁的孩子们的牙都大，因此，他们都叫我"大牙"。

"你活该，"爸爸重复说，"你成残废才好呢。"

这时妈妈垂头丧气地说：

"现在，"妈妈停了一下说，"现在你可再也当不上军官了。"

我的老师早已同甘丘医生和克尔里加齐那儿的年轻法官都讲好，让他们给我凑火车费，送我到迪亚尔修道院去上中学。当时说好是秋天去上学，现在一切都完了。我成了个跛腿，而军官学校又只收身体健康的人。

爸爸妈妈商量着，妈妈说：

"他中邪了，应该给孩子找个偏方治一治。"

爸爸不相信偏方，但也不好反对，于是满腹疑虑地说：

"也许偏方会管点事。"

爸爸妈妈领着我找安格尔·纳伯达耶巫师去看病。

巫师安格尔的脸就像从阿尔杰什那边过来贩卖勺子、线锤和木盆的吉卜赛人一样，黑里透红。人们都说巫师能治百病，据说巫师给瞎子一念咒，瞎子就会重见光明。还说，布蒂内伊那儿有个哑巴小孩，经他治疗后，便能清楚地说话了。还说什么，有一天午夜，神父肠痉挛差点要死，而这个巫师又用咒语使他起死回生。

这个巫师住在村边水坑旁的一个棚子里。他上无老，下

无小，也没妻子，孤身一人。从开春一直到深秋，他都是在水坑里下网捕鱼，并以此为生。他吃的玉米面和面粉，都是来找他看病要药的那些人给的。

安格尔·纳伯达耶让我躺在木凳上，他用手揉我的脚。他找到了病症并肯定地说：

“这孩子中邪了，好治。你到村里去募捐，用募来的钱到城里去找个工匠给他铸个银脚。然后把铸好的银脚拿到教堂去，挂在圣母马利亚像前。这样，孩子的脚就会恢复知觉，就能动了。”

爸爸愁眉不展地到村里去募捐。有的给他大麦，有的给玉米面。爸爸把这些都倒进口袋，口袋一满就拿去卖给希腊商人。

爸爸带着两个列伊的硬币回来了，这些钱够铸一个银脚用的。爸爸骑马进城了。两天之后，爸爸拿着一只小银脚回到家中。他从口袋里掏出银脚给妈妈看，也让我看了看。

“爸爸，这是我的脚吗？”

“是你的，孩子。”

因为我们和布尔布克神父翻过脸，所以就把这个银脚送到斯特尼库茨村的教堂，把它挂在祭坛上的圣母像前，并且把它留在那儿。

银脚挂在了圣母像前，可我的左脚仍不见好。尽管我走路比以前慢得多，但还是经常绊脚，走不了几步就绊一下，一不小心就会摔倒在地。现在，不光是左脚的脚趾头皮破骨折，就连膝盖和胳膊肘的皮也磕破了，弄得我遍体

斜伤。

孩子们忘掉了我以前的外号“大牙”，现在又给我改了个外号，叫我“跛腿”。

他们在玩球，我只好站在一边观看。他们又玩棒球，我也很想玩，可我又只能站在一边看。

“达里耶，你想不想和我们一起玩？”图塔努问我。

“想，当然想。”

“得了，我们不让你玩，你是个跛腿。”

“达里耶，你想和我们一起玩棒球吗？”

“想，当然想。”

“得了，我们不让你玩，你是个跛腿。”

“达里耶，你想和我们玩骑马吗？”巴贝尔卡的儿子韦韦问我。

“不，我不想和你们玩。”

“你想玩还玩不了呢！你成了跛子，我就这样嘲笑你。”

巴贝尔卡的儿子韦韦追着球跑，一边跑一边装着腿跛了。他拿到球，又扔出去，然后又跛着腿跑。图塔努笑得前仰后合。根古、图多拉凯和伊齐库也都笑着学起跛子来，一个比一个装得跛。

“达里耶，你看，你就是这样跛着腿走路。瞧，这样！”他们边说边坐在地上向前蹭，然后又趴在地上往前蹭。

有时从克尔默楚伊的北部山区或从南边多瑙河过来瞎骡子拉的小破车。骡子的背磨破了，露出鲜肉，上边叮满

了苍蝇。有时，一次连着过两三辆车，车上坐着的净是一些残废人。有的是瞎子，眼皮上长满了脓疮；有的前胸鼓，有的后背驼；还有的人不是缺胳膊就是少腿，手脚又黑又干，无一丝血色。这些残废人使劲地唱着，一到街口就停下来，乞求着：

“乡亲们，行行好吧，行行好吧！”

乡亲们随便给他们点东西。小破车继续朝前走，出了村，还能听到他们的乞讨声。只有怀孕的女人才转过脸去回避他们。

要是怀孕的女人不回避的话，那么以后生出的孩子就是残废。

这种情况是有的，不过很少。

秋天，有些女人同她们的男人到图尔努去赶集，集上也有来自各地的缺胳膊少腿或四肢瘫痪的残废人。他们瘫在地上，喊叫着。为了让人们可怜他们，他们还露出残腿断臂和化了脓的伤口。那些在集上看见这些残废人的女人，后来有的就流了产，有的生出的孩子长着青蛙头，有的小孩没有手而是像鱼一样长着短翅膀，有的两腿连在一起。

“伊丽卡，你怀孕了，快回家，拉着残废人的车过来了。”

“我这就回去。”

“达里耶，你会变成要饭的，”根古说，“你会变成要饭的。”

现在我成了根古这个结巴的笑料。从现在开始，谁都

可以随便戏弄我："你成了要饭的……要饭的……要饭的！"我的头像被雷击了一样。要饭的！我姐姐丽察对我说：

"现在你成了跛子，你不要再跟着我去跳霍拉舞了，太丢人了。你别一跛一跛地老跟着我，要不我揍你。"

"达里耶，你要成个要饭的，要饭的！……"根古不停地说。

我走到井台，拣了几块石头揣在怀里，然后回来朝男孩子们砍去。我使劲地向他们砍去，恨不得把他们的脑袋打开花。伙伴们停止玩棒球，说：

"瞧，这个跛子还逞能呢！"

图塔努说：

"抓住他，抓住他！"

我发了疯似的用石头砍他们，正好打中了图塔努，他晃了几步摔倒在地上。我想跑掉，可又绊倒了。三个人扑到我身上，没头没脑地乱打一气，要不是我翻过身来，他们会把我打死的。我憋足了劲，把身子一蹬，抬起身，双手揪住韦韦的脖梗子，把他扯过来，咬他的肩膀，因为我的牙又大又尖，能咬开核桃。我觉得嘴里有咸味——这是血的味。韦韦尖叫着，松开手，我把他摔在地上。他在地上翻腾着，其他两个孩子后退几步跑开了。他们飞快地跑着。图塔努和韦韦也都从地上爬起来跑了。他们跑远了便站在一起嘟哝起来，其中一个说：

"这个跛子疯了，得送他去疯人院。"

我鼻青脸肿，满嘴是血，双手也划破了。我回家时，妈

妈问我：

“孩子，你同谁打架了？”

“没同谁打架。”

我总是很孤单，心里很难受。这种孤独生活将一直持续下去，直到生命结束。夜里，我梦见残废人的车，还梦见我也成了残废坐在车上，哭喊着：

“行行好吧，好心的人们，行行好吧！”我在梦中呻吟哭泣，妈妈叫醒我：

“达里耶，你怎么了？快醒一醒！”

我醒了，出了一身冷汗。

“我做了个噩梦，妈妈。”

“又做噩梦……你不是不做噩梦了吗？”

“是呀，可现在又做起噩梦来了。”

“你躺下，别胡思乱想。”

我的睏劲过去了。我披上一件破衣服走到场院。树叶沙沙作响，杨树叶的响声更是动人。铁道和我家只有一步之隔。铁道那边便是山岗和原野，一条小路通向那边的山岗。田野里微风瑟瑟，送来一股醉人的清香。春末的夜空显得格外明净。一只冰凉的壁虎从我脚上爬过，我感到它的尾巴还甩了我一下。壁虎像蛇一样冰凉。以前，我白天到地里放马时在葡萄园的水沟里捉过蛇。我把一块破布扔给蛇让它咬，蛇紧紧地咬住破布不放。然后我用力把破布一扽，蛇的牙齿便同破布一起从嘴里扽了出来。我为了不让蛇咬着，就掐住它的脖子。但是，蛇的牙齿一旦被弄

掉，你就可以随意摆弄它，玩够了就把它弄死。

有一次，我敲蛇的头，灰肚皮的长花蛇直到太阳下山时还在挣扎，天全黑下来时才不动了。我玩蛇时，常常是把蛇盘在身上，像是系上一条冰冷的腰带。

“达里耶，蛇是冷血动物。”

“哥哥，那么壁虎呢？”

“壁虎也是，还有青蛙也是冷血动物。”

我用手摸了摸右脚，脚是热的。再用手摸摸左边的病脚，脚是凉的，像蛇一样冰凉。

我忽然听到附近有匹马嘶叫了一声，随后便看见它又瘦又高的黑影。马仰起头像是要把沉闷的夜空一口吞掉，它颤抖着一声长鸣。

“喂，你是谁？”

“是我，特勒什叔叔。”

特勒什叔叔躺在马旁边的草地上打盹。

“喂，深更半夜的你到地里来干啥？”

“我头疼，出来走走。”

特勒什叔叔随手放开缰绳，点着一支香烟。一个红点在黑夜中忽明忽暗。

“孩子，你还是尽量多活动活动吧。”

我又走回来，坐在铁路旁。疯子桑杜大叔已经睡醒，正在场院里溜达，嘴里嘟哝着使人听不懂的话，听起来像是在同魔鬼吵架。

我怎么还能活下去？我干吗还活着？一个正常的人很

难在这种环境下生存，更何况一个残废人！远处，一列火车呼啸着奔驰过来。这是夜里十二点开往多瑙河方向去的客车。这时，一辆灯火通明的火车轰隆隆地就要驰到我眼前。我想，要是我躺在铁轨上，火车准会把我轧成碎块。天亮之前，谁也不会发现，一下子就全完了。

昨天，约尔达凯·迪曼家那个满脸粉刺的小女儿碰见我，她使劲地盯着我问：

“你怎么还跛？你还没好吗？”

“没好。”我回答说。

“你也好不了了。我爸爸说让你到我家来放羊，我家管你饭吃，也许，爸爸会发善心把我弟弟的旧衣服拿几件给你穿。”

然而，如果我去卧轨，几秒钟之内就会一命呜呼。我看见过一个女人被火车轧死的情景。这个女人是斯特尼库茨村的，她还年轻，但是长得瘦小，脸色憔悴。因为她丈夫另有新欢，不再喜欢她，就经常打她、骂她，最后把她赶出家门。她走到河边，在小柳树丛旁边的河水里洗了澡，换上干净的衣服，然后来到铁路旁的小道上做起针线活。当火车开过来时，她就扑到铁轨上。长长的列车从她身上轧过去之后，长鸣了一声才停下来。大家把她装进了柳条筐。

“达里耶，你到哪儿去了？”

“妈妈，就在这儿。”

“你快去睡吧。”

"妈妈，我就去。"

夜里十二点的这趟列车从我身旁奔驰而去。

"你怎么发抖了？"

"妈妈，我冻僵了。"

"谁让你夜里穿那么少在外边站着。"

以前女孩子们跟我们一起玩，现在她们还是同我们这么大的男孩子玩，而我只能站在一旁看。即使有的人对我沉默不语，但从他们的表情上还是能看出他们是在讥笑我。这也不奇怪。在乡下，一个人要是成了残废，便毫无价值，我很快就体会到这一点。

我变得越来越孤僻。眼看着小伙伴们成群结队地到树林里采秋水仙，而我又不能跟他们一起去，只好扒着栅栏眼巴巴地看着他们远去，实在令人难受。如果你看到自己的兄弟姐妹都以同情而往往又是讨厌的目光望着你，你的心里是很难受的。

以前他们叫我"大牙"，倒使我颇为得意。现在他们叫我"跛子"，这是事实，也没有什么可生气的。但我还是感到恼火、难受，甚至感到伤心，不愿意见人。

图尔图里克发现我情绪不高，便问我：

"达里耶，你的脚疼吗？"

"不疼，一点儿也不疼。"

"我看你总是垂头丧气的。"

"这是你的错觉。"

“你别再骗我了。”他对我说，“我知道你怎么了，你觉得成了跛子就是一大不幸。当然这不是好事，脚要没毛病更好。但是，会有办法的，还是能治的，上帝会保佑你，你要相信这一点。不过，就是残废了又有什么关系？世界上难道没有残废人？有，而且活得很好。”

“靠乞讨度日。”我回答他。

“别胡扯，根本谈不到乞讨问题。我在伯杜列亚萨看见一个罗锅，他是村公所的文书。罗锅有什么关系，能写会算，还拿工资，他生活得很好。就是只剩下一条腿也照样能生存。”

“你认为我也该当文书吗？”

“不只是当文书。”

我到老师那儿去借书借的更勤了。我常躲在场院的槐树林中看书，一看就放不下。从书里我开始找到了欢乐，往日的悲伤与烦恼一下子消失了，我不再把别人的闲言碎语、冷嘲热讽放在心上。现在我发现，我懂得的东西远比他们多得多；我面前所展现的道路比他们要广阔得多，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军官学校我是去不成了，因为一个跛子是不能当军官的。这个问题，老师对我讲过。我问他：

“老师，那么神学校我能去吗？”

“达里耶，神学校也不会收你。”

“上师范学校呢？我想像你一样，当个教师。”

“那儿也不会收你。国家职员不允许有生理缺陷。按说

你可以上中学，但这需要很多钱，谁也拿不出你需要的那么多钱。”

“我去自己挣。”

“那太难了。”

“老师，困难吓不倒我。”

老师把我叫到他身边，两手抚摸着我的头说：

“真可惜！真可惜呀，达里耶！如今的世道不好，将来总会改变的。你还小，也许你会赶上的！”

我推开老师的手，转身跑开了。

我小学毕业了，拿到了文凭。我把文凭放在盒子里收藏起来。我的朋友图尔图里克小学也毕了业。我们俩都顺利地通过了考试。我们的老师和邻村来监考的老师都表扬了我们，还给我们送了花环。我们戴上花环到河里去洗澡，然后把花环扔进河里，让它顺流而下，流向多瑙河。

老师还把花环送给浓眉大眼的女同学菲洛弗泰亚，并且给她戴在头上。在野花、野草编成的普通花环下，她那条又长又黑的粗辫子一直拖到臀部。她高兴得两颊泛起红晕。老师含着泪水，满怀深情地看着我们。他为了不让我们看出他那激动的心情，便从衣袋里掏出手帕，用力擤了一下鼻涕，擦去额头上的汗水，同时也擦了擦眼睛。

“孩子们，我们分手的时刻到了。希望你们今后好好学习，别丢掉我教给你们的那点知识。”

我们走了。我们一走，学校的大门就关上了。布库尔

家的孩子米古开始吹牛说：

“秋天，我要到城里去上中学。”

“我也到城里去上学。”米蒂克·奥克接着说。

然后，米蒂克走过来对我说：

“你到我家酒店来打杂好不好？擦擦柜台，扫扫地。要不然你就去异想天开，可你又穿得像叫花子，却总自以为了不起。”

他冷笑着，我真想一拳把他打个嘴啃泥。

耶普雷·马林救了他。

“达里耶，别理这条癞皮狗，别跟他打架。”

我没同他打起来。

我们毕业的那一天，正值盛夏。田里的麦子熟了，但这不是属于我们的。

老师也给了图尔图里克一个花环。碰巧，就在这一天，他的父亲死了。他把老师送的花环放进棺材，放在他死去的父亲的手里。现在只剩下他妈妈和七个孩子。图尔图里克一下子成了一家之长。体弱多病的母亲整天痴呆发傻。

图尔图里克没有哭，他来找我。

“达里耶，来，你和我一块去给我爸爸敲钟。”

我们上了钟楼，为他父亲敲了整整一天的钟。第二天，我们又到公墓里的那个木制教堂去敲小钟，也就是挂着被挖掉眼睛的圣像的那个教堂里的小钟。图尔图里克的表情严肃而倔强。

“你想怎么办，图尔图里克？”

“我想找工作，好替妈妈分点忧。”

“找得到吗？”

“看看再说吧。”

图尔图里克身材矮小，结实，四方脸，有一双粗壮的手。

“达里耶，你看，”他对我说，“我们俩在学校都学得不错。我们课外书读的也不少，可是我们俩谁都上不了中学。酒店老板的儿子是个笨蛋，他刚刚及格，却上了中学。只有神父的两个儿子上了神学校，他们俩也笨得要命。当然，你哥哥格奥尔基也上了神学校。这公道吗？”

“我觉得不公道。”

“我们不能就此罢休。我们俩必须继续学下去，你懂吗？”

“上学需要钱。要学习就得有钱。”

“我们俩不能灰心。我们应该挣钱，攒钱。”图尔图里克接着又给他爸爸敲起钟来，他伤心极了。

我拽住绳子，然后腿一蹬便来回悠起来。我在钟楼里悠来悠去，像在摇篮里一样。钟响了，钟声响遍整个山岗。图尔图里克的爸爸一生曾踏遍这个山岗。

以前要是有人死了，尤其是本家里死了人，那么总是有人来对我说：

“达里耶，你的堂哥万齐克死了。”“达里耶，你的婶肯瓦死了。”“你的叔叔帕尔万死了，快去敲钟！”

教堂离我家很近，只有咫尺之隔。钟楼就在教堂的门

口。我来到教堂，爬上钟楼敲钟。大钟的声音洪亮，深沉的回声在山岗间回荡；小钟的声音清脆悦耳。当！——当！——当！为死人敲钟的节奏很缓慢。我心里唱起悲哀的歌，并力图让钟声表达出来。死者的身世不同，钟的敲法也就有差异。我的伯父阿利桑德鲁·纳斯塔死时，我们为他敲出的钟声像他说话一样温柔。我为他敲钟时，仿佛看到他身披白袍，脚踩云梯上了天。他善良安详，从容地迈着脚步，好像他知道自己要通过多少个天门关，要走多么漫长的道路。迪努齐死时，我敲的是小钟，敲钟的节奏像他走路的脚步一样，急促轻快，变换无常。

我的伯母"嗡嗡叫"也死了。自从妈妈来到爸爸家的第一天起，她就和妈妈结了仇。她总是找妈妈的碴儿。她找碴儿，说妈妈的坏话，仇视妈妈，恨妈妈。但她临死前，还是同妈妈和好了。她病了很久，最后只剩下皮包骨。她想早早死去，就是死不了。等着替她洁身换寿衣的巫婆迪瓦伊卡开导她说：

"你的魂还没有离开你的躯体，因为你还没有同你的仇人和好，所以你还得受一阵子的罪。"

当时正值隆冬，夜很长，而我伯母却一整夜一整夜地睡不了觉。同奄奄一息的伯母住在同一间房子里的堂兄瓦西里、堂嫂和他们的孩子以及我伯父沃伊库想睡也睡不着。

我伯母把同她打过架的街坊四邻的女人们都叫来，解开了仇。最后，她发了狠心，又让人去把妈妈叫来。妈妈来了。

“大妹子，原谅我吧。”

“我原谅你。”

于是她们俩握手言和。

“我们这些人真傻，”妈妈回家后说，“我们干啥要吵架、结仇。实在是自寻烦恼。当我们后悔时，已为时太晚。”

我的伯母还是没死。这时，她想起了我。她不止一次地骂过我，把我赶到街上，并用柳条抽我。

“把达里耶叫来，请他原谅我。只有他还没有原谅我。”

“现在就去叫他来。”

他们把我叫醒，我穿上衣服，来到沃伊库伯父家。我们俩家虽只有一道栅栏隔着，但至今我还没进过他家的门。“嗡嗡叫”伯母脸色蜡黄，两眼无神，身着旧衣躺在床上。我堂兄瓦西里的几个孩子睡在地上，横七竖八地挤在一起。床下放着病人用的便盆，散发着臭味。

“达里耶，原谅我吧。我骂过你，恨过你，追着打过你。原谅我吧，我的好侄子达里耶！”

我吻了她的手。我哭了。

我趴在她的身上哭，她喘着气。她用冰凉干枯的手抚摸着我的头，脖子和脸。

天亮时，她安息了。她永远地安息了。

“达里耶，你伯母死了，快去给她敲钟！”

阳光驱走了我的伤感。我为伯母敲了钟，钟声急促刺耳，就像“嗡嗡叫”伯母在世时隔着栅栏骂我的声调一样：“达里耶，让你烂脚，瞎眼！”不过，现在我的眼睛没瞎，可

是，我的脚！我的一只脚完了，失去了知觉。瞧这只脚，它一动不动，像死脚一样挂在腿上。当！当！当！钟声在白雪覆盖的山岗间回荡。

从我成了瘸子之后，村里一死人，就听到有人在门口叫我：

“喂，达里耶，在家吗？”

“在家。”我答道。

“维奥里卡村的贝利图家死了个小孩，你去给他敲钟去！”

好呀，又死了个人！我去给他敲钟。反正我无事可干！每敲一次钟，我可以得到十个巴尼的圆硬币。死十个人，就可以攒到一个列伊和五十个巴尼，因为给死者送葬还可以得到一块白手帕，而且手帕的一角上还拴着五个巴尼。四条白手帕就可以做一条衬裤。衬裤穿着很舒服，不仅可以保护皮肤，而且也保暖。

“有人死了时，为什么都来找我去敲钟？”

“他们可怜你，想帮助你这个废物，让你也挣几个钱。要是干地里的活，那是不会来找你去的。”

我姐姐丽察解释说。

尚未被风吹散的乌云积结在村子的上空。

“达里耶，你再去给我父亲敲敲钟吧！”

我敲的是大钟，图尔图里克敲的是小钟。

钟楼上空的乌云裂开了一道缝，一缕灿烂的阳光直射在村子上。

"如果明天不变天的话,"图尔图里克说,"我们就在阳光下安葬父亲，让他再看一眼太阳，因为从此之后他便在黑暗中安息了。"

住在瑟卡拉村的我的表姐迪察终于要出嫁了。我姑母乌楚珀尔给我们捎信来让我们一定去参加婚礼。

"达里耶,你骑上马到瑟卡拉去一趟，告诉你姑夫、姑母，我们有难处，不能去参加迪察的婚礼,请他们别生气。祝新郎新娘幸福，婚礼愉快。"

到三个村之外的亲戚家去参加婚礼，起码衣服要穿得像样一些。可是，我们家谁也没有一件整齐的衣服。平时，妈妈给我们洗破衣服时，我们都是光着身子呆在屋里。要是有外人来，爸爸妈妈便把他们拦在门廊上说话。我们被关在屋子里，躲在壁炉旁。我哥哥伊昂本来可以去参加婚礼。可是，打闹饥荒时，他就给地主索瓦当了长工，被地主榨尽了血汗，细高个瘦得皮包骨。他脸上的颧骨突起，脖子也细了，喉头外突。

"索瓦虐待我,"我哥哥每隔两三个星期就匆匆忙忙地回家看一看，一来就这样说,"我真有点受不了，总有一天我要捅他一刀。"

"刀子先放一放,孩子，不要莽撞从事。用刀子的那一天总会到来的。到那时，你捅的不只他一个，而是很多。"

本来我姐姐丽察也可以去参加表姐的婚礼，但她没有出门穿的衣服，她的鞋也破了。妈妈呢，也去不了。爸爸

就更不用说了。

“告诉你姑姑，请她原谅我们。”

我骑上马慢悠悠地走着。没钉铁掌的马蹄无力地踩在松软的地上，发出噗哧噗哧的声音。布尔杜列亚老汉对我说过：

“孩子，从开天辟地起就有人在这儿居住了。你抓起一把土瞧瞧，这就是以往在此生活过的那些人的土地。可是，人人都是匆匆的过客，只有土地才是永存的，只有土地长生不死。”

马慢腾腾地走着，发出噗噗的声音，好像把地踩透了气似的。马不时地停下来，捋一口路边的野草吃。

“驾！”

乌楚珀尔姑姑在一九〇七年也曾被关在驳船上。她坐过牢，也吃过官司。她受折磨时，脸上挨过刀。但她忍下来了，至今她的脸上还有刀痕，对这一切她记得一清二楚。我姑姑把迪察带到医院，请医生给她缝上了豁唇。现在迪察的嘴不豁了，只留下一条缝过的白印。

迪察和本村的一个小伙子结了婚。姑姑把女婿招到家来住。

“我们家也应该有个男子汉，”姑姑解释说，“我是没有男孩子的命。我一想到潘蒂利耶，心就碎了。”

“算了，妈妈，不要再想这些了。”迪察安慰她说。

“我能不想就好了！有时也能忘掉你哥哥，可过一阵子就又想起他了。一想起他就……”

“乌楚珀尔姑姑，爸爸让我来告诉您，我们家不能来参加婚礼。”

“也估计到了。我知道你们家今年连着出事。可是，你怎么了？怎么老气横秋的不像个活泼孩子的样……”

“妈妈，达里耶的腿瘸了。他一下马我就发现了。”

我让姑姑看我的脚。她抚摸着我的脚，半天说不出话来。

“这可没法治，”乌楚珀尔姑姑最后以肯定的口吻说，“将来，对你说来可是个麻烦事，你应该学一门手艺。”

“我是要学的，姑姑。”

在回家的路上，我又到克尔洛曼村去看了看我的外婆。留着大长胡子的外公躺在地上，窗台上放着他的祈祷书。没有人去动他的这些书，因为杜米特拉凯舅舅没有念过书。

我牵着马进了院子。外婆拄着光滑的拐杖站在门槛上。她头上蒙着蓝色头巾，身穿绣花的白衬衫，脚上穿着拖鞋，显得很精神。

“把这匹又瘦又脏的马牵出去！我不让它吃我的草！”

我把马牵出院子，想拴在临街的栅栏上。

“别拴在哪儿！”外公又喊了起来，“不然会把我的栅栏弄坏，你爸爸又不来给我修。把马拴到槐树林去。”

我把马牵到远处的河滩地里，拴在一棵槐树上。外婆的园子真能让你大饱口福。树上果实累累，把树枝都压弯了。李子熟了，密密麻麻的李子几乎把树枝压断。一条小溪横穿宽敞的场院，发出潺潺的流水声。

"你这个瘸子，你是来吃果子的！你馋果子吃了！你骑在瘦马上，心里盘算着：我到外婆家去美餐一顿！你想得倒美！我不让你吃，尝都不让你尝！告诉你爸爸，让他也种果树！"

"我会告诉爸爸的，外婆。"

通往车站的小路从伯内亚萨瘸腿地主的大葡萄园旁边经过。葡萄园用高高的栅栏围着，只有鸟才能飞过去。下边，只有草里的昆虫才能爬进去。尽管如此，葡萄园还是由一个手持双管猎枪的阿尔巴尼亚人日夜看守着。这个阿尔巴尼亚人叫伊斯梅尔·迈丁。他头戴小红帽，帽子的一侧有一撮小缨子。村里人都管他叫土耳其人。他和爸爸是好朋友，两人一见面就聊个没完。这个土耳其人每隔两年到多瑙河对岸的山区去探一次亲。他有四个女孩，他冬天回家，春天回来，把挣的钱留在家里给她们用。

"你好，伊斯梅尔。"

"你好，你是图多尔家的孩子吧？"

"是的，我是他家的孩子。"

"你就是那个有病的小儿子吧？"

"是的。"

"你等一下。我给你点东西。"

他从只有他才知道的小门钻进葡萄园，然后捧着一大把葡萄出来。

"这些葡萄熟了，很甜，你拿去吃吧。"

伊斯梅尔有四个女孩，她们吃不上葡萄。伊斯梅尔说：

“我们那儿很穷，寸草不长。”

“伊斯梅尔，谢谢。”

“你有病，唉！告诉你爸爸，祝他身体健康。你以后再到我这儿来吧。”

他把小红帽朝脑后推了推，站在路边目送我离去。

图尔图里克给布尔布克神父当了长工。他经常骑着神父的马，手持柳条鞭，赶着神父的牛群经过我家门口。现在，图尔图里克就以放牛为生。

神父管图尔图里克饭吃，除此之外，每年给他三个波里①。他的妈妈总是提前把这三个波里领走，拿去给他的弟弟妹妹买玉米面吃。

“达里耶，你打算干什么？”

“眼下还说不上来。”

我给在山区当神父的大哥写了封信。他很快就给我回了信，信中写道：

> 亲爱的弟弟，你的嫂子已经生下两个孩子，第三个又快出世了。我的日子也很艰难，我一点也帮不了你的忙，你自己想办法吧！我劝你到鞋铺或裁缝铺去当学徒，学门手艺。这个年头，你念书也没用。我念了这么多年的书，才刚刚能糊口。我这个教区的人穷得一贫如洗。

---

① 罗马尼亚的一种旧币。一个波里等于二十个列伊。

我读了他的信后，句句记在心中。我去问爸爸：

“您对我有什么打算？您把我送到一个地方去做工吧。”

于是，爸爸便把我带到铁匠尼楚那儿，请他收我做徒弟，让我学打铁好挣碗饭吃。

“他脚不好，走动不方便，”爸爸说，“但他没别的病，能干活，尼楚先生。”

师傅嘴里散发着酒味，皱着眉头说：

“你这个人，你以为我会把这个瘸子教成铁匠？打铁这个活可不是闹着玩的，需要身强力壮的人。这简直是赶着鸭子上架！”

他的女儿奥尔祖·玛尔加列塔辫子上扎着花，穿着鞋站在他身旁。我面黄肌瘦，衣裳褴褛，光着脚，脚和手都很脏，长长的指甲里藏满了泥垢，那只瘸腿上的脚趾头仍带着未愈的伤疤。

我们也到村里的鞋匠那儿去过，他是个有文化的人，家里有几本书。宪兵头子尼古拉·米耶卢谢尔早就盯上了他。他经常把鞋匠叫去训斥：

“你这个臭鞋匠，你可别让我看见你煽动人们造反，不然我要打断你的脊梁骨。”

有时，宪兵头子气急了，也用鞭子抽鞋匠的脸。

这个鞋匠是从城里来的。到我们村之后，他给乡亲们做活从不耍滑。

“我倒是愿意把你的孩子留下，”鞋匠对爸爸说，“让他学会做鞋。可是我心有余而力不足，因为我的手艺并不高

明。以前还可以，现在几乎把手艺全扔了，只能修修补补。你的孩子要是跟我学，大不了成个修鞋匠，但这不算什么手艺。图多尔大哥，你还是把他送到城里去吧。”

爸爸赶着车送我进城。进城的路是我熟悉的。这条路我走过多少次呀！通往城里的路经过山岗，穿过阿登卡塔的树林。林子里的老树已被砍光，现在又滋出了小树芽。这条路还经过卢什城堡，城堡的东侧是岗楼。我们每次进城时都要在这儿停一下。那时，我便跳进岗楼下面的沟里，再爬上古城墙的旧址，来到城堡的墙角下，用棍子在地上扒拉着找一些古代的武器残片和纽扣等物。以前，这里打过仗，卢什地区的人耕地时曾耕出过士兵的骨头。

那天夜里，爸爸妈妈坐在车里打盹。马车慢慢地走着。在车上，我穿着破衣服，盖着干草，冻得直打哆嗦。月亮发着清光。我们前前后后都是赶集的人，人声嘈杂，吵吵嚷嚷。夜里，人们的说话声传得远，听得清，特别在空旷的田野里，更是如此。月亮在天空中徐徐上升，繁星眨着眼睛。月亮很圆，天空无一丝云彩。突然间，月亮的一边出现了黑影，阴影越来越大，月光渐渐变暗。

“爸爸，谁吃了月亮？”

爸爸回过头，把车停住，说：

“哎呀，坏啦！狼人吃月亮了！”

妈妈也抬头朝天空望去，爸爸妈妈吓得连忙划起十字。车轮的隆隆声一下子消失了，田野里突然变得一片寂

静，什么也听不见了，空气好像凝固了似的。

爸爸跳下车，把马车拉到路旁停下来。

“达里耶，你过来一下。”

我也下了车。爸爸从车上抱下一抱干草，团成一堆，用火石打着火把草引着。火越烧越旺，草堆在路边熊熊燃烧。突然，在我们的前面和后面的路上点起了无数个火堆。真可惜，我们的马脖子上没挂铃铛，不过没关系，别人家的马脖子上有铃铛。

这时，马脖子上的铃铛齐鸣，人们把马卸下来，围在火堆旁吵吵嚷嚷。

田野里一阵喧嚣，吵闹声直冲云霄，火焰越烧越旺。但是，狼人并不惧怕，它吞下的月亮越来越多，瞧，现在月亮只剩下一半了……只剩下四分之一了……剩下不到四分之一了。最后，天空中只剩下一个暗淡灰黄像镰刀似的小月牙。这就是月亮。人们都在发抖，这倒不是因为冻得发抖，他们点火堆也不是为了取暖。这时，月亮已暗淡无光，人们吓得不知所措。我感到奇怪的是，我一点也不发抖，因为我从读过的书里已经了解了一些宇宙的奥妙，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我设法给妈妈解释：

“妈妈，根本就没有狼人，你看！”

“达里耶，也许吧。”

“也许吧，”爸爸也这样说，“那么，是谁把月亮吃了？”

我发现，他们疑惑不安的心情直至看见月牙慢慢变大时才消除。

“狼人害怕了，”爸爸说，“它不敢再吃月亮，月亮又复原了。天快亮了，狼人就要消遁了。”

爸爸套上车，扬鞭上路。他在车上给妈妈讲起我们家族里很久前死去的他的狼人叔叔的故事。

“那时我还小，”爸爸说，“村子附近有一大片茂密的树林，林中空地上长满了有一人高的山萝卜，里边可以藏住人。那时山岗上都是荒地，我给一个叫博道伊·格布内亚的堂叔放羊。他已经上了年纪。当时在萨耶列一起放羊的还有其他人。我们都知道堂叔是狼人，他自己也清楚。一天晚上，皓月当空，如同白昼。时机一到，他就起来拿着棍子走了。他藏在树林里，进入梦乡。这时狼人便离开他的躯体去吃月亮。一两个小时过后，狼人又附在他的躯体上。他精疲力尽，好象走了好长的路似的。他醒来之后，便回到山里的羊圈。那时我问他：

“‘叔叔，你知道狼人吃月亮了吗？’

“‘也许吃了吧。’

“他想改变话题，因为刚才发生的事他一点也不记得了。他只是说他感到很累，梦中好像腾云驾雾似的做了一次长途旅行。

“‘天上很冷，冻得我够呛。梦中的事我就记得这些。’

“然后他躺在火堆旁，暖和他那一身老骨头。”

马车越走越快。山坡下，灯光闪烁的城市正从睡梦中醒来。

第十六章　艾　蒿

进城后，我们便到开肉铺的托奈舅舅家去。天没亮我舅舅就去肉铺干事了，我的舅母菲尼卡出来迎接了我们。她是个身材矮小，眼睛细长，肤色微黑的女人。她给舅舅生下九个孩子。车一到，我的表兄妹们便蜂拥而上，他们有的蹬车轱辘，有的扒车尾，有的跳上车。

“图多尔姑夫，你从乡下给我们带什么来了？”

爸爸给他们带来了他们喜欢吃的东西：一大筐烤着吃煮着吃都行的新鲜老玉米。他们把玉米抬进屋里，剥掉皮，然后放进锅里，添上水开始煮。我的最小的表妹瓦斯代亚小心地把玉米须拣起来放在一起。

“瓦斯代亚，你拣玉米须干啥？”

“我有用。我的娃娃秃头了，它们不听话，所以头发都掉光了。我用玉米须给它们粘在头上当头发。”

舅舅家有两座房子，一座大房子邻街，另一座小房子在院子的里头。两座房子的中间有一口抽水井、一棵歪七扭八的苹果树和一个散发着臭味的便所。托奈舅舅家的周围都是高房，他家的院子每天只有中午才能见到一个小时的阳光。

一年之后，当我的舅母菲尼卡要生第十个孩子时，她

简直烦透了，这么多的孩子都由她洗衣，喂奶。她病了也还要守着照顾孩子，不能睡觉，整天累得她喘不过气来。于是她便到郊区找了一个接生婆给她做流产。

女人不想生孩子时就去找接生婆，让她用力按肚子或者在肚子上拔火罐使胎儿流产。这种流产的做法很早就从城里传到农村。

有时，你在街上会看到一个怀孕的女人，肚子大得像塞着个大西瓜。她走起路来慢腾腾，小心谨慎，避免登高跨篱笆。她坐下时，也很小心，深怕震坏了肚子。

“大姐，我怀孕三个月了。”

到九个月时，肚子就更大更鼓了，但还得干活。既然没人帮她忙，她只好自己干。

特别是那些家里地多，又有一定家底的人都不愿意多生孩子。生一两个就行了，要那么多张吃饭的嘴有什么用！所以，丰衣足食人家的女人在怀第三或第四个孩子的时候，一般都做流产。佩特里亚和迪瓦伊卡都是做流产的好手。她们烧一锅开水，然后让要做流产的女人像下河洗澡那样脱光衣服躺在床上。接着，她们洗干净手，再给做流产的女人把肚子洗干净，还搓上肥皂。洗净后，就用力地揉起女人的肚子。

“马上就把小孩揉出来了。”

女人疼痛难忍，肚子疼得像刀割一样，真想喊叫。

迪瓦伊卡把她的粗手指头放在孕妇的乳房下部，然后往下按，一直按到腹部，这样反复按，甚至要按上百次。孕

妇疼得又咬牙又咬嘴唇，但不叫一声。因为房子离街很近，不能让别人听见叫声，不然就会走漏消息。实际上，人们还是知道了。因为昨天你还是个大肚子女人，今天却突然变得苗条起来，脸色蜡黄消瘦，走起路来几乎要摔倒。

把陶罐口朝下埋在灶膛的热灰里，烧热后拿出来扣在肚子上，罐子一下子紧紧地吸住肚皮，火罐上再放块湿布。罐子把肚皮吸了进去，片刻之后，迪瓦伊卡便用粗手指慢慢地把火罐取下来。

“瞧这个大圆印！又紫又肿！”然后她又接着揉起女人的肚子来。

怀孕的女人像挨了一顿揍似的回家了。一两天之后，胎儿便掉下来。

女人为做流产而送了命的事也是常有的。我的菲尼卡舅母就是这样死的。

打掉死胎儿之后，她也送了命。她的棺材上蒙着黑纱，三个身穿发亮的又黑又长的圣袍的神父为她念了经：“我们本是尘土，终将归于尘。”我的开肉铺的舅舅给了神父很多钱，所以这些道貌岸然的神父念经很卖劲，甚至还动了感情，流了泪。这些神父是从圣星期五教堂请来的。几年前，我得病时，爸爸妈妈带我去教堂祈祷，希望把我的病治好，正是这三个神父给我脖子上挂了圣带并做了涂油礼。那时，爸爸因为拿不出两个列伊来给堂守，我只好有气无力地躺在教堂地上的一张草席上，妈妈守在我身旁哭泣，生怕我死去。这时，开心的神父在一旁骂我爸爸，嘲笑他手

无分文还来给我治病。他们把我扣在教堂里，直到爸爸出去把借来的两个列伊的银币交给堂守之后，才让我回家。可是现在，在给我舅母入葬时，神父们在众目睽睽之下——全城的人都看着他们——却装出一副仁慈善良的面孔。九个孩子扒着棺材，男孩子痛不欲生，女孩子则嚎啕大哭。外婆也从克尔洛曼村赶来吊丧。办完丧事之后，托奈舅舅说：

"妈妈，你留下帮我照顾孩子吧，至少要呆到他们长大一点再走。"

"托奈，说什么我也不留下。我讨厌城里的生活，你的家我也受不了。你看，水井紧挨着个茅坑，我们家那才是真正的天堂，这儿，连空气都是臭的。"

"妈妈，哪怕就呆一个星期，等我找到人之后你再走。"

托奈舅舅急急忙忙去肉店之后，外婆便拿起拐杖步行回家了。这个九十岁的老太太要走六十来里的路。外婆背着褡裢，腰板挺得像个大姑娘。走那么远的路，可她中途却不歇一歇。"好狠心的老太婆，"爸爸说，"缺德的老祖宗。"

现在外婆独自回克尔洛曼村走的这条路，我很小的时候曾跟着妈妈走过一次。那时，我虽小，但还能步行跟着妈妈、大娘大婶们去赶集。

当时，妈妈刚生下我妹妹埃莉萨贝塔几个星期，她又年轻又漂亮。虽然妈妈从早忙到晚，但当她手里攒了点钱时，就抽出时间去城里，买几尺花布回来给我姐姐埃万吉

莉娜做条裙子。

那时，我整天围着妈妈转。一天，我听到妈妈同一个住在河边、另一个住在村口的妇女们说："明天天一亮，我们就去卢什赶集。"

"妈妈，带我去吗？"

"不，不带你去。我走着去，那么远的路，你又那么沉，我抱不动你。"

"妈妈，我自己走。"

"你走不动，路很远，有几十里地呢！"

天黑了，入夜后我们就睡了。家里人都睡着了，只有我合不上眼。黑夜中，我陷入了遐想。我一心惦记着进城，生怕天亮时睡过头。我怎么也睡不着觉。窗子开始发白，天就快亮了。为了不把别人吵醒，我躺着不动。这时，我听见有人敲门。爸爸第一个醒了，然后他叫醒了妈妈。

"孩子他妈，快起来。她们来找你进城去。"

这时我也从床上爬起来。

"妈妈，我也去。"

"你这么早就醒了？"

"我一夜就没合眼。"

"为什么？"

"我怕睡着了你不带我去。"

"该死的！"

妈妈只好带我进城。开始时我自己走，后来妈妈抱着我走了一段路。接着我又下来自己走。走了一会，大娘大

婶们又轮流抱着我走。

从村子到城里的路上有一片小树丛，这里以前曾是大森林。天早就亮了，太阳已升起两竿子高。这条往日穿过森林的路上车水马龙。妈妈、大娘大婶们在路上停下来还休息了一会儿。她们不是在路边，而是钻进树丛，在一块长满红牡丹的草地上坐下休息。她们只歇了一小会，便去采牡丹花。她们边走边采，不知不觉地向前走着，这样也就不觉得路远了。

一看到牡丹花，我立刻就想起初夏时那种晴空万里的天气。在我面前，好像出现了一条尘土飞扬的大道。大道上走着三个去赶集的妇女，夹在她们中间的还有一个满脸雀斑、头发蓬乱、小鼻子的男孩子。这个男孩连跑带颠地跟在后面。

舅舅家的表兄妹们的脸都比我黄。大一点的孩子都是在奥米达村生的。后来，舅母菲尼卡不愿意在乡下住了，于是她就让舅舅迁进城来住。在奥米达时，他们吃喝都不愁，应有尽有。可现在，到了城里，缺吃少穿，寸步难行。常言说：城里是花钱的地方！

我表哥米舒对我说：

"走，我带你到街上去看看。"

我表哥带我逛大街去了。街上有许多店铺、酒馆，市中心有一些肉铺。

"这就是我们家的肉铺。"米舒得意地说。

这是个用木板钉的小亭子，亭子上沾满了血。横杠上挂着钩子，钩子上吊着牛肉和羊肉。

托奈舅舅用刀子割下肉，然后放在秤上称，称好后用一块纸包上，然后交给顾客。他把收的钱放进柜台。舅舅的腰里围着褪了色的长皮围裙，手和胳膊上沾满了血和油。

托奈舅舅的长相和外公一样，而说话的声音和秉性像外婆。他像条恶狗那样盯着我，突然张牙舞爪地朝我喊：

“怎么，又来要东西了？”

“舅舅，你别怕，我是来找事干的。”

“这个年头，城里谁还需要人！……你以后别再来我这儿了，不然我就砸烂你的腿！”

“舅舅，以后我再也不来了。”

“快滚吧！”

在我和好心肠的舅舅说话的当儿，我表哥米舒趁机溜进了肉铺，从一条猪腿上揪下一块烤过的肉皮。托奈舅舅发现后朝他脖子上狠狠地打了一巴掌，米舒转身就跑，我跟在他后面。等我们跑远后，米舒就把肉皮分给了我一块。

爸爸和妈妈同舅母菲尼卡商量着送我到哪儿去，学什么手艺好。他们谈妥之后，舅母便换上了出门的衣服。

煤气炉上煮着菜豆，今天是星期五，是吃素的日子，正好又是集日。

舅母和爸爸带我到了公园和牲口市。

“这儿真臭，比市里哪儿都臭。”

“这里净是皮革店。”舅母解释着。

不知不觉地我就被推进一家又窄、又长、光线昏暗的皮革作坊，屋里放满了加工过的干皮子。我进屋之后，舅母和爸爸也跟着进来。老板坐在一把椅子上，柜台上放着一叠账本，屋里挤满了乡下人。老板在和顾客争论不休，讨价还价。

作坊的后院同样也是吵吵嚷嚷，一些比我大的小伙子们进进出出。老板把要加工的皮革交给他们，让他们送到地下室，再把一大堆加工好的皮革抱上来。农民付了加工费之后将皮子取走，再拿到皮货店去做皮坎肩。

老板见了舅母说：

“布勒泰斯库太太，您需要点什么？”

舅母走过去指着我说：

“莫察图老板，我想请你帮个忙。”

“帮啥忙？”

“把我外甥收下当徒弟。”

爸爸头上戴着毡帽站在旁边，耸了耸鼻子。他对老板没有好感，也不喜欢他的作坊。他真想拉我走，到别的地方去找事，但又有什么地方可去呢？！

老板仔细打量了我一番，说：

“够瘦的！”

“我想还是请你把他收下吧。”舅母恳求着，“好让他也学一门手艺。”

“要是太太要求的话，那我就把他收下。我这儿倒是需

要人手。”

“但是，请你不要见怪，我忘了告诉你，这孩子腿有毛病。”舅母补充说。

“瘸子？来，在屋里走走看！”

老板看着我在屋子里走了几步。

“菲尼卡太太，这无关紧要。反正不让他去跑，只是干活。不过，开始干活不能怕有味儿，干我们这一行可不同于香料店。”

“这我和托奈可以担保。这是孩子的爸爸。”

“他还有爸爸？”

“是呀。”

我舅母走了，爸爸也跟着她回去了。

“你叫什么名字？”

“达里耶。”

“你这个名字很少见，过来点。”

我刚走过去，莫察图老板便狠狠地打了我两个耳光。哎哟！我的耳朵嗡嗡直叫。

然后，他把我交给了一个小胡子。

“把这个小瘸子带走，他想学熟皮子。你们好好收拾他一下，你们知道怎样收拾他，但不要把他弄死。”

小胡子扳着我的头，把我带到皮革作坊的后院。他把其他工友都叫来，再加上老板的儿子，共十一个人。

从公园那边传来了歌声，有人在弹钢琴。歌声从一座白色的两层楼房传来，楼房的窗户开着。歌声像甘泉的潺

潺流水，沁人肺腑，令人陶醉。

“老板让我们收拾收拾他。”小胡子说。

爸爸垂头丧气地离开了皮革作坊。他临走时，用他那粗笨的手轻轻地抚摸着我的头，低声地对我说：

“孩子，听话！”

那天，妈妈没敢来看我在这儿当学徒的情景。要是她也陪我来的话，我敢说，她不会让我留在这儿。当我离开托奈舅舅的院子时，妈妈久久地目送着我，然后猛地转过身去，不让我看到她那伤心的眼泪。我虽然没看见妈妈的眼泪，但我知道，她伤心的泪如河。

莫察图老板让徒工们收拾我，又不让他们把我弄死。于是，小胡子在后门口使劲地把我推倒在地，我头朝下摔下台阶，滚到了后院。没等我站起来，十一个小伙子就把我紧紧地围在中间，你休想脱身。因为，即使你能冲出去，也无处可逃。院子三面都是高墙，剩下的一面是铁栅栏与小胡同相隔。我后来得知，小胡同直通一家小姐住的楼房。铁栅栏上有铁蒺藜，以防夜间小偷来作坊偷东西。我看着他们的表情，心想他们是在跟我开玩笑吧？这时，我发现他们的两眼瞪得比恶狗还凶，我吓得用双手捂住了脸。这时我心里想：可别打坏我的脸。我听到小胡子问：

“谁先开始？”

“还是我先来。”莫察图老板的儿子米纳凯说。

“揍他！”

先是一阵巴掌，劈里啪啦地打在我的脸上。接着又是一阵拳头打在我的肋骨上。我那没穿鞋的脚也挨了一阵靴子踢。

“好了，”小胡子说，“你给他开了荤，现在看我们的了。”

“戈古，再让我揍他一阵。”

这个小胡子叫戈古。

我在地上挣扎着，头和全身疼得火烧火燎。现在我脑子里闪出了一个念头——我成了乡下挨打的狗，一条眼瞎、耳聋、鼻子不灵又叫不出声的无用的狗，我挣扎着。他们要打死我吗？不！他们只不过是要狠狠地揍我一顿而已。我咬紧牙关，不喊叫一声，连哼也不哼。他们几次把我拽起来，架着我狠劲地打我嘴巴。然后他们又松开手，我又瘫在地上。

“戈古，他晕过去了。算了，别管他了。可别让他死了，他要一死，我们可就倒霉了，听说他城里有亲戚。”

后来，他们把我抬进他们的宿舍。从此之后，我也将在这里度过漫长的黑夜。房间里有两张空着的木板铺，上面铺着破蒲席。他们把我扔在一块木板上，关上门走了。这间屋子的窗户冲着院子，玻璃经年未擦，上面沾满了灰尘。墙角里上上下下布满了蜘蛛网。一只吐着丝的大肚子黑蜘蛛突然从天花板上掉下来，悬在我的头上，离我的头只有一指高。我急促地喘着气，气吹得蜘蛛晃了几下，它吓得顺着丝向上爬去。瞧！上去了！

当我在乡下时——一直到昨天晚上我才离开我的农村老家——有时一个人到地里去玩，在草地里发现过蜘蛛洞。那时，我便找根小棍，从衣服里拽出点棉花缠在小棍的头上，再用手捻一捻，吐上唾沫把棉花弄湿，然后拿着小棍往洞里捅。洞里的蜘蛛一下子就抱住了湿棉花，我把小棍从洞里抽出来。怕光的蜘蛛从小棍上掉下来，四处乱爬，我急忙去追。我拿起蜘蛛，数着它有几条腿，并看着它们那脆弱的躯体和脑袋。有的蜘蛛黑得像锅底；有的蜘蛛则是白的、紫的和红的。有一次我找到一只像大麻子花一样大的蓝蜘蛛。人们都说，弄死一只蜘蛛就等于减少一次罪孽。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为使自己有罪可减，就得犯很多罪才行。

"你看，达里耶，"我的小学老师布拉加迪鲁以前对我这样说，"乡下人由于没有文化而迷信。他们相信巫婆和巫师的符咒，信神信鬼，相信人死后灵魂升天。事实上不存在任何能决定人的命运的鬼神，只有人们自己才能决定自己的命运。人一死，便化为乌有。念书能使你摆脱愚昧无知的处境。现在人们就像在黑暗中生活一样。你读了一些书，以后还要坚持读下去，开阔自己的眼界。"

那个黑蜘蛛爬到了它的网上。它缩起腿，变成一个不动的黑点。

他们为什么要打我？这个疑点不时地浮现在我的脑海

里，一直找不到答案。工友们打我却不打伤我的筋骨，他们只是按照莫察图老板的吩咐把我收拾一顿。我摸了摸身上的肉，疼得火烧火燎，头嗡嗡地响。

天黑了。有人开门进来，点上油灯。原来是打我的那十个工友中的一个。他走过来坐在我的床头上。他瘦高个儿，肩骨耸起，脸色发黄。

“你身上疼吗？”

他为什么这样问我？他也打过我！或许他猜透了我的心思。不，人们的心思是看不到的，如果能看到别人心里想什么的话，那么人们就很难生活在世上。人们只能听到讲话的声音。父母在年轻时可能相爱过，可现在就是另外一回事了！现在他们还是生活在同一间屋子里，但是，增加了我们这一群孩子。一天，妈妈狠狠地瞪着爸爸说：

“随你的便吧！”妈妈本是个性情温和的人，然而穷困使她的脾气变得急躁起来，也使爸爸变得冷酷无情。妈妈想，如果爸爸是个机灵的人——其实妈妈也不认为爸爸笨，知道他很机智，有头脑，但是，火一上来，有时也使她失去理智——他本可以混得更好一些，使妈妈少受点苦，让我们大家少受点罪。一想到爸爸不争气，妈妈就埋怨起来：

“你看人家迪曼·约尔达凯，要什么有什么。”

“他的地是祖上留下来的。”

再看看我们兄弟姐妹之间处得如何？我们挤在一间屋子里住，又在同一张桌子上吃饭。然而，我们个个却三心二意，毫无感情。自从我姐姐埃万吉莉娜出嫁后，她心里

只有骂她、打她的男人。姐姐疏远了我们，也许她从来就没有和我们一条心过。我成了瘸子之后，我的兄弟姐妹却以此做为笑料，讥笑我；他们庆幸的是，家里虽然降临了灾祸，但他们却安然无恙得以幸免，只有我在劫难逃。

不，人的思想是不能被人看见的。这样也好。我喜欢克尔洛曼村的外婆，因为她不隐瞒自己的思想。她想什么就说什么，而且是开门见山。我要是对她说我孝敬她，她不但不会相信我的话，反而会揍我。她会这样说：

"你怎么想起对我说这个了？你要是向我要东西，你就直说，别拐弯抹角地来这一套！"

"外婆，我什么也不要！"

"你撒谎！"

其实，我要是喜欢谁的话，我也不会让他察觉。

"达里耶，"妈妈对我说，"你是个孤僻的人。你对自己的思想真是守口如瓶，谁也猜不透你的心思。"

那个脸色发黄的傻大个继续对我说：

"你知道，我打你是假的，完全是做个样子给他们看。如果我袖手旁观的话，我也要倒霉，他们会把我撩倒，对我拳打脚踢。两年前我刚来当学徒时，他们也打了我，打得比你还重。因为你是你爸爸送来的，听说你在城里还有亲戚，而我是孤身一人来的，在这儿举目无亲。"

他说话声音柔和，但表情却很悲伤。

"我的家在科斯代什蒂那边的巴拉奇村。我叫东布里卡·图苏。你有几个兄弟姐妹？"

“十个。”我回答说。

“我有十二个。我是老大。我离开家出外谋生时，连到哪儿去都没告诉爸爸，他是后来才知道的。他进城来看过我一次，向我要钱解决家里的困难，我把挣到的钱都给了爸爸。”

这时，我脱口说出心里的那个疑点：

“他们为什么打我？”

“这是店规。不管是谁，新来乍到的都要挨一顿臭揍，把他打得死去活来，这样以后要是再挨打的话，他就不会觉得了不起，就不当回事了。”

“不打不行吗？”

“也许可能。但是，这已经成了习惯。一旦形成习惯，人们就很难把它改掉。许多人没事可干，于是便把打人当成乐趣。你要是能在这儿呆下去的话，就会看到以后还会有不少人挨打。”

“我会呆下去的，”我回答说，“我不怕打架。”

我想摸透大家的底细，谁要是敢再碰我一下，我就动刀子。

熟过的皮子要用刀子刮干净，刮皮子用的刀又宽又大，像刮胡刀那么锋利。

东布里卡·图苏搓着手，他的手被鞣酸水腐蚀得又红又肿，指甲也被烧掉了。他沉思不语。

我躺在床上，咬紧牙关忍着疼痛。我就要学熟皮子了

出师后就不会有人再打我了。到那时，大不了是得罪了老板，挨他的揍。从地窖里，从挂满皮子的院子里不断飘来一股一股的酸臭味。这时，我要是在家的话，站在院子里闻到的则是从田野里飘来的干艾蒿的阵阵清香。而此时此刻，我、图尔图里克、菲洛弗泰亚和马林·耶普雷我们四个老同学中，只有图尔图里克还能闻到干艾蒿的香味。因为矮胖、肥头大耳的图尔图里克留在乡下给布尔布克神父当了雇工。

至于菲洛弗泰亚，她小学一毕业家里人就把她送到图尔努城给人家当女仆去了。

一天晚上，天不怕地不怕的马林·耶普雷不打票就扒上了火车，猫在车厢顶上到了布加勒斯特。他是想进城学一门手艺，当铁匠或学开车。至今毫无音信。当然，消息也不会传来的那么快。等到他在城里落下脚，能混下去挣到钱时，他会回家探望他的双亲的。

"我以后回家时再也不会光脚，也不会穿得破破烂烂的了。"马林·耶普雷对我说，"这些地主老财们有地，而我却一无所有。我要让他们看看，我比他们更阔气，让他们也知道，我不是脓包。"

天黑后，东布里卡·图苏给我端来了一碗粥，拿来一把木头小勺和一块玉米糕。

"你吃吧。"

我从床上爬起来，把东西吃了。这时，工友们陆陆续续

地回来睡觉。

“喂，再躺过去一点。”

我往旁边挪了挪。第二天，我身子上青一块紫一块的，就这样去上了班。老板莫察图见到我，语气温和地问我：

“小家伙，在我这儿不错吧？”

“老板，不错，就像在亚伯拉罕① 的怀里一样。”

“你说什么？”

“像在亚伯拉罕的怀里一样。”

“哪个亚伯拉罕？”

“《圣经》里的亚伯拉罕。”

“妈的，我会让你在他的怀里呆个够的。”

“随你的便吧。”

“你这小家伙，回答我的话不要跟我闪烁其词。”

“我明白了，老板。”

老板走了，进了铺子。东布里卡·图苏劝我：

“少理他，你可不要跟他顶嘴，不然他就又让我们揍你了。他心眼并不坏，就是不喜欢别人顶撞他。”

“他不坏？谁说他是坏人？他温柔得像只绵羊，只是没犄角罢了。他可是个大好人！”

东布里卡·图苏同情地对我摇了摇头，他对这儿的情况了如指掌。

“以后你可别说我没劝过你。”

① 希伯来人，即今犹太人的始祖。闪的后代，他拉的儿子。原名亚伯兰，后来耶和华给他改名为亚伯拉罕，立他为万国之父。

地窖里并排放着许多熟皮子用的大桶，光线暗极了，要动一下必须摸着黑走。我每次从桶里捞出两张到四张的皮子，然后搭在背上送到上面去。湿淋淋的皮子腐蚀了衬衫，烧得皮肤生疼。老板的儿子米纳凯站在地窖口的台阶上，动不动就用一条湿皮子抽我们这些徒工的脑袋，抽得倒不算太疼。最难受的是脸上沾满了皮子上那粘粘的酸液，沾在脸上洗不下来，一直渗进皮肤里。

"快干，畜生！"

家里情况会怎么样呢？我很少有时间想这个问题。这个小城市离我们村虽然很近，但却一直没人来看我。城里的亲戚也没来看我，就连那个上了木工学校的表哥米舒也没来过。木工学校就在公园的那边。在那个学校学习的小伙子们根本看不起我们。他们除了向师傅学手艺之外，也学些科学知识。每星期天的傍晚，我们可以出去散一两个小时的步。小巷子的路很难走，尖尖的石子往往能把脚扎破。而且，又没有衣服换，满身散发着熟皮子的臭味。我盼着能找到一个知心朋友。在这个皮革作坊里，我没有一个知心的人。东布里卡·图苏的心眼倒不错，但他一心想的是早点出师，多挣钱，穿得好一些，以后当老板。

"我要一个子一个子地把钱攒起来，以后到农村去买房子买地。你知道在巴拉奇那儿一个皮革作坊能赚多少钱吗？到那时，我打算只雇徒工。在乡下雇几个孩子来花不了多

少钱，让他们也给我种地，用赚来的钱再买更多的地。”

“到那时，你也会经常打他们。”

“瞧你这个人，人家跟你说正经的，你却出口伤人。”

秋雨连绵。这个坐落在山岗下、被贫民窟包围的孤单单的小镇子死气沉沉。天变短了，天气阴沉而潮湿。

天虽然变短了，但没给我们带来任何好处，我们照样点着灯干活，而且，老板又抠门儿，把灯蕊捻得很小，灯光微弱，眼睛累得生疼。

“东布里卡，把灯捻大点。”

“捻那么亮干什么？要看书？”

“不，我眼睛疼！”

“慢慢就不疼了！瞧，我们已经习惯了，我们的眼睛就不疼。”

“这家伙的家里准是有电灯。”

车站附近有个公园，这个公园比我们乡下家里的场院还要小一些。公园里有三棵栗子树，树快要枯死了。几年前在公园旁修了一座房子，听说里边要安发电机。

“等安了发电机，城里就有电灯了。”

“没有电灯之前怎么办？”

“用油灯，还有月亮。”

灯很少，而且光又弱。天上的月亮倒是经常出现，但是，在城里，你没有时间去看它。因为你整天呆在屋子里用刀子刮羊皮，要么就是累得倒在床上睡觉。即使晚上有

时间去散步，要看的不是天上，而是地下，因为总要当心别踩到坑里。

市中心有一条街道和一个广场。走出市中心便是另一个世界，那里与其说是城市，不如说是一个大村落。每家都有宽敞的院子，院子里也有树，树底下是矮小的房屋，家门口都有一条长凳。

“你喜欢城里吗？”

“图苏，我喜欢。”

“我不喜欢！我巴不得回巴拉奇去开个皮革作坊。”

“你没办法让时间过得更快。”

这时，在屋子的一个角落里，同戈古·索里克一起干活的老板的儿子斥责我们：

“你们在那儿叨咕什么？”

“让我们也说会儿话吧。”

“说话！牲口什么时候会说话？”

工友们笑起来。东布里卡·图苏也笑了。老板的儿子为自己开了一个挖苦人的玩笑而洋洋自得。

我把皮子从地窖背上阁楼去晾干。为此，又得多爬一层楼梯。有时我绊倒在地，从楼梯上滚下来，然后爬起来再接着干。小胡子戈古有时还骂我：

“喂，瘸子，妈的，又摔倒了！”

每到星期天晚上，戈古·索里克便招呼大家：

“走，咱们找姑娘去玩玩！”

工友们成群结伙地跟他走了。回来后，他们便津津乐

道地讲述他们干过的事，一直扯到深夜。

“米米真棒极了！”

“别瞎吹，吉加比谁都强，她当过军官太太，她可有一手，这可不是吹的。”

“萨弗塔呢？她哪儿不好？”

“就是那个大屁股？”

“她呀……她在布加勒斯特的一个阔气人家呆过。”

皮革作坊的院子里，一面是一排住房，住房的外面是一条胡同。胡同里的路像乡下的路一样，是土路，没有人行道。道路两旁的房子都很矮小，院落狭窄，没有树木，连一棵夏天遮凉、秋天避雨的洋槐树都没有。这是一条皮匠胡同。

这条胡同两旁的房子矮得只能弯着腰才能进去。每家都有木板床，皮匠们就在床上干活。老板坐在中间，把脚伸到床底下，周围都是伙计。屋子的地不是地板，而是黄土地。地上铺着破席子，徒工们就在席子上干活。

夏天的日子好过一些，因为地是凉的，坐在地上不觉得特别热。冬天可就不行了，房子的墙壁是木条钉的，冷风从板缝里吹进来，手、脚和腰冻得发凉，几乎冻僵——就是冻僵了，还得不停地干活。

皮革店的徒工比起我们这些熟皮子的人来要干净一些，因为他们拿到的皮子是干的。他们只是用玉米面把皮子正反面都搓一搓，去掉酸臭味。用玉米面搓过的皮子变

得又软又白，而且保暖。皮革店的徒工也像我们一样，脸色苍白。到了秋天，窗子便用钉子钉死，来年春天再打开。即使打开窗子，因为房前房后都是房子，新鲜空气也进不来。这些房子矮得只能弯着腰才能进去。人们挤在里面，跪着缝皮衣、皮坎肩和皮帽子。满街都是酸臭味，在片片的小泥坑里，蚊子滋生。像托奈舅舅家一样，每家的院子里，离窗子一步远的地方便是茅坑，茅坑旁边就是抽水井。

说不上是人们身上的酸臭味还是喝的水臭！城市的这个角落臭气冲天，对这种臭味我已习以为常。它已渗透了我的衣服，渗进皮肤，钻到肺里，遍及全身。星期天我们去散步时，其它商店的店员都躲着我们，还说：

"这些人都是熟皮子的。"他们碰上皮革店的徒工都嗤之以鼻，说：

"一身的膻臭味，离他们远点！"

每逢星期五集日时，街上便挤满了乡下人。他们从我们这儿的皮革作坊买走皮子，然后到皮革店去定做皮衣。他们为了一个小钱会磨上半天，比他们到马贩子那儿买卖牲口时还能磨。他们定做的皮上衣很简单，只有袖口镶着黑边，开襟处有一条金属丝边。他们也定做皮大衣，皮大衣一直拖到地上。他们定做的皮大衣样子也很多，有妇女们穿的红的、绿的或蓝的带花大衣，紧腰而且下摆很大。做这种绣着花的大衣，手工费就要五个列伊，只有那些有地又有家产的人家才做得起。

东布里卡·图苏发家致富的欲望越来越强烈。

“等我学会熟皮子的手艺之后，我还要到皮革店去当学徒，我也想学会做皮活。你懂吗？以后，我在巴拉奇不光是开皮革作坊，还要开一个皮革店，再从城里找一两个皮匠。我会赚大钱，不是说着玩。”

“你赚钱吧！然后呢？”

“然后就结婚。我要娶个有地的老婆。”

“以后呢？”

“什么以后？”

他睁大眼睛，不理解怎么还有个“以后”。

在夜深人静或是大白天时，我有时便想起菲洛弗泰亚。她的父母把她送到图尔努城的一个法官家当了佣人。菲洛弗泰亚本来不想去，拖了几天还是去了。现在菲洛弗泰亚当了佣人。我不知道她在那里做什么，不知道她遇到的主人是好还是坏。就我所知，主人似乎没有好坏之分，主人就是主人，仅此而已。你干活累得死去活来，结果还是挨打受骂，而你却从不敢问个为什么。你要是问的话，又得挨打。

我不知道菲洛弗泰亚的处境如何。不过从我来作坊干活之后，我看到了莫察图老板和这儿的其他老板是怎样对待女仆的。

莫察图老板的女仆叫玛丽察。她是本地人，有四十多岁。她给主人和我们洗洗涮涮，我们一有脏衣服，她就洗，破了还给缝补。天一亮，她就跟着莫察图老板上街买东西

老板买，她提篮。老板每次只买几个葱头，几个辣椒，一碗豆角，一勺黄油或一点植物油。他从不多买，舍不得多花一分钱。玛丽察还给我们大家做饭。如果饭不够吃，伙计们只好饿肚子了。“玛丽察不会做饭！”“她偷着多吃了！”总之是玛丽察的罪过。她打扫院子，还要扫地。因为人们的鞋底经常把外边的泥土带进来。

玛丽察就睡在我们隔壁。我们的楼上是莫察图老板的卧室，登上木梯就能进去。米纳凯住在作坊的里屋。老板的妻子已经死去，他没有再续弦。现在，老板一心想的是作坊的生意，想着多赚钱。他想女人时，就把玛丽察叫去。玛丽察在他那儿呆一会之后，再从木梯上下来回到自己的屋里睡觉。早上，她比我们起得早，一起床就唱歌，哼的都是小调：

> 米舒呀，米舒，你在干啥？
> 你要老实点，
> 别这样乱摸乱抓！……

“玛丽察大姐，你在唱歌吗？”

“怎么？你想让我哭不成？让我受坏人摆布？还是唱唱歌好，人活着就要唱。”

当玛丽察特别忧愁的时候，或是当莫察图老板训斥她的时候，当她感到十分孤独的时候，她便哼起乡下的小调。她在墙皮剥落的外屋用大木盆洗伙计们的脏衣服，一边洗一边哼小调：

娘姑呀，

没出嫁就死掉该有多好；

小伙子呀，

孩提时就死去该有多妙。……

人在小的时候就死去，这算是走运，算他有福气！我的弟弟阿列克塞生下不久就死了。到底是在世上活了几周，还是活了几个月就死了，我并不清楚。只有妈妈知道他是何时生的，何时死的。妈妈生他时，浑身疼得很。当看到他全身僵直，停止呼吸，头旁边点上了小蜡烛时，妈妈心如刀割。妈妈从来不抚摸我们，即使我们生了病也不抚摸一下。她总是愁眉不展，脸色阴沉，她所以这样，也许有其它的原因。不过，一旦妈妈知道有人欺负我们，她便怒气冲天，决不会善罢干休，甚至要行凶杀人。

如果爸爸妈妈知道老板、戈古·索里克或其他什么人拳打脚踢地揍了我的话，爸爸准会抄起叉子，妈妈准会拿起棍子找他们算账，非把他们狠揍一顿不可。但是，爸爸妈妈永远不会从我的嘴里知道我挨过打。我的弟弟阿列克塞生下来得到了什么？他还没享受到阳光的温暖，还没来得及学说话，就一命呜呼了。

“玛丽察大姐，人在小时候就死去并不算有福气。”

“谁说有福气！歌是那么唱的，这个歌是倒霉鬼编出来的。痛苦和烦恼有时使你厌恶生活，让你寻短见。可你千万别去寻短见，地上总比地下好。人总有死的时候，到那

时再去地下吧。”

莫察图老板突然病得卧床不起，他的胸、关节疼得厉害。他躺在自己小屋的床上，疼得翻来覆去。我们听到他在呻吟、咒骂。使他伤心的倒不是自己生了病，而是他不能亲自守着作坊。他疑心重重，不相信任何人，就连他的儿子米纳凯他也信不过，总担心别人偷他的东西。

前来取货的农民们，到楼上的小屋去找老板。老板头上裹着布，身上披着厚厚的大皮袄，背靠着墙坐在床上接待他们。老板同他们争吵着，一边呻吟一边收钱。然后，他吩咐索里克说：

“把皮子给他！”

从他病得卧床不起之后，我们便自由自在起来，少干活，多休息。因为晚上老板不能下来监视我们，于是，伙计们便到城里去消遣。东布里卡·图苏也鼓捣着我和他一块出去。

“今天，我捣了个鬼！”

“捣了个什么鬼？”

“不告诉你。”

“可你已经说出来了。”

“我只是说捣了个鬼，但没告诉你怎么捣的鬼。”

“说下去！”

“我搞到了四个列伊。”

“你自己留着吧。”

“嘿，我就是不想留下这钱。明天，后天，老板的病也许会好。到那时，要是有人在老板面前告我，说我有钱，老板就不会饶我。他会问我：‘你哪来的钱？’他还会逼我交待。要是我说实话，他会狠狠地揍我，所以我想，还是咱俩上街，趁早把钱花掉。”

我想，这钱不是东布里卡·图苏在街上拣的，就是从农民的腰包里偷来的。要是自己挣来的，他肯定不会这样轻意花掉。

“这钱，我们怎么个花法？我不会喝酒。”

“我也不太会喝，喝一杯李子酒还可以。我有四个列伊，懂吗？我想还是我们一起去把它花掉。”

“现在深更半夜的就出去？”

“对，现在！”

“我们能买什么呢？”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跟我来！”

“到哪儿去？”

“跟我来，我告诉你。”

我洗了洗脸。我跟他去也不好，不去也不好。好几个星期了，我一点儿书也没读。我的心烦得要死。当你仅仅是为了挣口饭吃而整天整天地做一种你不喜欢的单调劳动时，心烦意乱是难免的。于是，我下了决心，我不想在这儿干一辈子，顶多干到明年开春。我在老板这学了四年徒，他不给工钱，只管饭吃。我很快学会了手艺。现在我不仅会熟羊皮，还会熟厚厚的牛皮。学会这种手艺用处也

不大。我得离开这儿，到别的地方去。我不想再和臭皮子打交道了，找点别的活干干。秋天，我想进学校去学习。自从我来到这儿之后，我感到自己知识贫乏，整天糊里糊涂地混日子，这样下去不行，不能再这样混了。

我本想换一下衣服，但又没衣服可换。我看看自己，觉得十分寒酸。这时东布里卡·图苏却鼓励我说：

“你看什么？怎么？难道是相亲去？别人穿得更破。”

我们俩踮着脚尖轻轻地拉开门，走出去之后，又轻轻地把门关上。

“你跟我来。”东布里卡·图苏对我说。他朝街北边走去。

已经下雪了，但并不冷。地上的雪差不多融化了，脚踩下去软绵绵的。街的尽头挂着一盏灯，灯光昏暗。

已经是晚上七点多钟了，因为正值圣诞节前夕，市中心来来往往的人不算少，但城边上却冷冷清清，街上几乎无人。

看来，东布里卡·图苏对路很熟，他毫无顾忌地推开大门，然后砰的一声把门关上。他径直朝院内走去。此时，我恍然大悟，心里直扑腾，两手微微颤抖，然而我还是跟着东布里卡·图苏进去了。

院子里有一所小矮房，像皮匠街上的房屋一样矮小。屋子里很热闹。屋子里没有人唱歌，但说话声很高，还能听到笑声。东布里卡·图苏推开屋门，我一步跟上去，和他并排跨进了门槛。

这间屋子的外表怎么显得那么矮小？瞧，屋子里多宽

敞！我们俩站在门旁边。

这是一间宽敞的带地板的屋子。屋子的一个角落里放着一架钢琴，另一个角落里放着两张桌子，靠墙的地方放着几把椅子。一个与我年岁相当的男孩子坐在墙角的桌子旁，他眼前摆着一本书，他边读书边做笔记。他的嘴唇一动一动地低声读着，好像在耳语。他可能是在复习功课，准备考试。

一个只穿着一条紫色短裤、肚脐露在外边的姑娘在弹钢琴。她那头金发和那双蓝色的眼睛都和妈妈的一样。她的手指在键盘上滑动着，她身旁那个没有靠背的圆凳上坐着一个男人。那男人歪戴着一顶灰帽，长着又长又密的胡子。他不时地摸她的大腿。

在其它的椅子上坐着几个姑娘，她们身上穿的是又薄又短的裙子。屋子里还有四个男子，有的年轻一些，有的老一些。

“你好，萨洛米亚。”

“你好，图苏。他是谁？”

“我的朋友。”

“是个新客？”

“第一次来。”

“请坐吧！”

萨洛米亚像接待阔佬一样接待了我们。我们在椅子上坐下，这时，我感到低人一头。我缩在椅子里，一动也不敢动，不然我的旧衣服就会蹭上白灰。屋子是刚刚粉刷过

的。因为圣诞节就到了，所以家家户户都粉刷了房子，当然这所房子也不例外。

萨洛米亚高高的个儿，长得丰满、漂亮。她穿着一条长得拖地的厚裙子。

"你跟我来吗？"图苏趁那个戴灰帽的男人离开时问正在弹钢琴的姑娘，"快，米米，真的，快跟我来。"

"不行，亲爱的，我……"

"怎么？莫非……走吧！"

"小疯子，不行。你等着吉加吧，和她一起去。"

"吉加还没来，萨洛米亚大姐，你先招待我们一下。"图苏说。

"我去给你们煮咖啡。"

在角落里放着的那张桌子上点着一个酒精炉，萨洛米亚就在那个炉子上给我们煮咖啡。这时，我心里想，到目前为止我还没喝过咖啡呢，这回可得尝尝是什么滋味了。

男人们每人领着一个姑娘穿过屋子，走出门口。现在屋子里还剩下五个姑娘，加上萨洛米亚，共六个。图苏在等着吉加，吉加好半天才来。

"她被科泰里奇那个当小贩的儿子叫走了。只要科泰里奇的儿子一来，吉加就很难脱身。可怜的吉加，她好不容易才摆脱了。"

门开了。一个神父走下台阶，进了屋。这个老不死的满脸是干草一样的胡子。以前，神父的胡子也是黑的。后来，胡子变白了，现在变得像枯干的草。他身穿长袍，袍

子的下摆拖着地，并且溅满了泥浆。他一手拿着十字架，一手拿着香草秆，两手都在颤抖。圣诞节前，他走家串户给人们洒圣水。堂守跟在神父的身后，他手里提着圣水罐。神父开始低声哼起祷文，钢琴停止了演奏。这时，几乎是赤身裸体的姑娘们都来到神父面前。神父用香草秆蘸着圣水往她们身上洒，还让她们吻他的手，吻他的十字架。神父也在屋子的四个角落洒上了圣水。神父不断地给刚进来的客人洒圣水，也给在角落里看书的那个少爷洒了圣水。不管我愿意不愿意，神父也给我洒了圣水。他拿着十字架在我眼前晃了晃，随他的便吧！反正东布里卡·图苏不是为了这个才带我到这儿来的。

萨洛米亚撩起裙子，露出了大腿。她穿的是长筒袜。她从袜筒里掏出一个钱包，然后打开钱包，把钱倒在手心上。她数了数，共有十个列伊，都是硬币。随后，她把十个硬币全投进了堂守的小罐里。神父的眼神不好，所以他弯下腰朝小罐里看了看。堂守把小罐举起来，一直举到神父的眼皮底下。

神父有气无力地、含混不清地问萨洛米亚：

“萨洛米亚，你往罐里投了几个列伊？”

“十个列伊，神父，我只有这么多。”

“萨洛米亚，就这么多？我以为你至少能给二十个列伊。”

“请原谅，奇齐亚克神父。太太不在家，她到城里买东西去了，瞧，到现在还没回来。从天黑到现在姑娘们就挣

了这么儿个钱。”

“妈妈的！……我这么大年纪了，深更半夜地来给你们洒圣水，你们像是打发讨饭的一样才给我十个列伊，你真不害臊……你们全都不知羞耻。你这个贱货，在袜子里再找一找，给我凑够二十列伊。不然，你要倒霉的，你们大家都要倒霉的，你们听见了吗？”

“奇齐亚克神父，没有了！真的没有了，我要是有……我跟你说过了，从天黑到现在姑娘们就挣了这些钱，神父，您要是再晚来一会儿就好了；现在还有几位客人正和姑娘们在屋里……您请坐，等他们出来。”

“好呀，孩子。那我就等吧……再等一会儿。”

神父坐在椅子上，堂守也坐下来。萨洛米亚原来为我和东布里卡准备好的那两杯咖啡，她端给神父和堂守喝了。我们俩馋得直咽唾沫。萨洛米亚在耳边小声对我们说：

“你们再等一会儿。等这只老山羊走后，我再给你们煮两杯。”

神父慢慢地喝着咖啡，堂守也不慌不忙地喝着。过了一会儿，神父的头垂了下来，他开始打盹了。他在打盹，并没睡着。这时，一个房间的门开了，从屋子里走出来一个竖着大衣领子，帽子遮住眼睛的小伙子，后边紧跟着一个头发蓬乱的姑娘。这个姑娘拿着两个列伊交给了萨洛米亚。萨洛米亚把钱放在桌上，摆在神父面前。

不等到五个客人出来，不等到凑够十个列伊，奇齐亚克神父是不会走的。他并不着急，继续等下去。一直等到

萨洛米亚哨啷哨啷地朝罐子里扔进十个列伊之后，神父方才离开。神父一边向大家祝福，一边走出门去。

“这家伙是哪个教堂的？”

“是圣·尼古拉那个鬼教堂的。”东布里卡·图苏说，“就在我们住处旁边。你没听到过梆子声？”

“我没听到过。”

“东布里卡，快，到屋子里去。科泰里奇的儿子走了。”

姑娘们个个忧心忡忡，有时强作笑脸。她们把泪水往肚里咽，有苦难言，整天愁眉不展。萨洛米亚更是悲伤。坐在角落里埋头读书的那个男孩子只顾自言自语，对周围的一切视而不见，也着实令人可怜。

神父走后，又进来一些小伙子。我仍然坐在客厅里，我的衣服散发着一股难闻的臭味，但是，姑娘们对这种臭味已经习以为常。

我喝完了我的那杯咖啡之后，又把东布里卡·图苏的那杯喝了。

萨洛米亚见我独自一个很不自在地坐在那里，便走过来摸我的脸。

她的那双手又粗又短，满是皱，想必是她当了多年的佣人，由于整天洗盘子刷碗，拖地板的缘故。

“你这个新客儿，想要哪个姑娘？你看了一个小时了，看中哪个了？”

“一个也没看上。”我回答她，“一个也没看上，听见了吗？一个也没看上。”

长时间的委屈顿时涌上心头，我一下子哭了起来，哭得那样伤心。

我从来没想过到城里去看亲戚，去看托奈舅舅。我知道，如果我去的话，他们都不会给我好脸看。要是托奈舅舅看见我，他准会毫不手软地给我几巴掌，而且还会说：我不是对你说过吗，你不要到我家来。你来干啥？快滚开！

有时，我看见托奈舅舅的几个女儿和一些小伙子们在街上散步。这时，我就把脸扭过去看橱窗，假装没看到她们。对我的表兄米舒，我也躲着他走。有一次，我偶然碰上了他。我问他："米舒，你好吗？"可是他却像不认识我似的。

米舒穿得很讲究。他认为，他要是同一个无家可归的叫花子搭腔的话，会失他的身份。尽管我现在给老板干事，有个睡觉的地方——常言道，有了个落脚地——早晚也能混口饭吃，但是，我的外表仍像个无着无落的沿街乞讨的叫花子。我的衣服更加破烂不堪，晚上经常要缝补。现在，我学会了针线活。开始时，我觉得很难，针总扎进肉里去，后来，我慢慢地学会了缝衣服。但是，这还不行，还得有一件替换衣服才行，哪怕是再破再烂也没关系。我对自己衣服上的臭味已经习惯了，但别人不习惯。每当我站在别人身旁时，人家总是退后一步，躲开我。我怎么能这样生活下去？当然，这样也能活下去，好歹都能活下去。有一次，我在乡下听到有人说："让上帝保佑受苦受难的人！嘿！

我受的苦算不了什么，别人更苦，受的罪更大。"

城里到处是叫花子、流浪汉，还有衣不遮体、食不果腹、无家可归的孤儿。他们当中，有些人年轻力壮，另一些人面黄肌瘦。他们想工作，但无处可去。即使他们有工作，收入也是十分微薄，无法度日。挣到的那点钱买不到什么顶用的东西时，便去下酒馆，在酒馆里呆上一两个小时，借酒消愁，喝个痛快。那时，你就会觉得你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把一切忘得一干二净。

一到星期五，我总躲着进城赶集的亲戚和乡亲，不愿意让他们看见我。因为我知道他们会讥笑我，他们会说："瞧这个瘸子，成什么样了！"事情并不是总像你想像的那样。我在家时，常听到他们谈起托奈和利桑德鲁两个舅舅。现在，我总算了解托奈舅舅了，我不想再见到他！至于利桑德鲁舅舅，我从来没见过他的面。有一年秋天，十月的一个早晨，天还没亮他就死去了。他是在离我们村很远的戈古·克里斯托福尔地主的贝利托里庄园上收玉米时死在了地里。当时，我妈妈恰好蜷缩在马车旁的玉米秸上生下了我。爸爸用镰刀割断了脐带，然后用绳子把我的肚脐扎上。所以，现在我的肚脐比别人的都大，一到河边洗澡，别人就笑我：

"瞧那个大牙！……他有两个那个……一个长在肚子上。喂，你得娶两个媳妇！"

下水洗澡时，我总是用手捂着肚脐，这已经成了习惯。

利桑德鲁舅母也早已死去。我只知道，他们留下了一

个男孩，叫扬库。他已被一个无儿无女的人家收养了。后来，我又得知，我的表哥扬库在一所职业学校学手艺。听说他像姑娘一样腼腆，长得英俊，又聪明。对我的表哥扬库，我很少想他。要是对每个亲戚都惦记在心上的话，我就无暇考虑别的事了。

我走下地窖，把生皮子放进桶里，当我正要准备往桶里倒鞣酸时，瘦猴儿戈古·索里克慌慌张张地从上面走下来，这使我感到意外。他对我说：

"喂，癞子，有人找你。快上去，瞧你身上多脏，快把身上的土抖一抖，不然给老板丢人。"

抖什么，只是为了不让别人看到你的本来面目！

我原以为乡下老家出事了，可能是家里来人给我送信儿，或者是要把我带走，到另外一个老板家去干活。

"戈古，是不是乡下来了人？"

"不是，是个城里人找你，一个小年轻。"

我来到上边的店铺里，店铺里冷冷清清。病刚好的老板脸色蜡黄，身体虚弱，坐在椅子上打盹。时值傍晚，光线昏暗的店铺里除了老板之外，还有一个衣冠楚楚的瘦高个儿先生。我穿着一身又瘦又破的衣服朝他走去，他向我伸出手，我也把那烧得红肿、指甲脱落的手伸了过去。他看到我的手又红又肿，于是轻轻地握了一下。他把我拉到门口有亮的地方，仔细打量着我，然后对老板说：

"请你准他一个小时的假，我要和我的表弟聊聊。"

我和他是表兄弟？我和他是什么样的表兄弟？我想呀

想呀，却万万没想到，他就是我已经死去的利桑德鲁舅舅的儿子扬库表哥。

我们俩一起走出了店铺。

“走，我们去散散步。你不认识我吧？”

“是的，我不认识你。”

我瞧着他，至今我还没见过像他那样漂亮的脸膛，也许这只是我的感觉而已。他的脸白里透红，浓眉大眼，我还没见过那么大、那么黑、那么有神的眼睛。

“我是你表哥，我叫扬库，扬库·布勒泰斯库。”

他走得很慢，而我却刚刚能跟上他。

“你的腿怎么了？你怎么这样走路？”

“我的腿瘸了。”

“走起路来困难吗？”

“不太方便。不过，只要不跑，就摔不倒。”

虽然正值隆冬，但有时也正像经常发生的那样，每当风向一变，便从南面吹来阵阵暖风，这时，地上的雪开始融化，雾气腾腾。卸下绿装的城市，现在又脱下白雪给它披上的素裹，难为情地露出它的整个丑容。到处是破烂的栅栏和墙壁剥落陈旧不堪的房屋。街上，尽是半化不化的雪块和泥浆，树上的落叶夹杂在泥雪里，更使地面肮脏透了。大街小巷无人打扫，即使在竖立着曼图将军的雕像，有人日夜守卫着的十字路口也无人清扫。光秃秃的树木仿佛一些双手伸向天空、赤身裸体、满身疙瘩、浑身黑毛、冻得僵直的人。

天黑了。夜幕一下子把仅有的这一点美的景物——摆

着一盆山竺葵花的窗户，漂亮的阳台和一束在严寒中依然碧绿的大葱——和丑的东西都遮盖起来。

我勉强能看清扬库表哥的脸。

“我们还是到一个酒馆去坐坐吧。”

“好吧。”

城里到处是酒馆。我们走进首先碰到的一家酒馆，找了座位坐下。

“来两大杯啤酒。”表哥对堂倌说。

堂倌给我们端来了两杯啤酒。

我的表哥扬库·布勒泰斯库一口气喝完了一大杯啤酒，而我仅仅用嘴唇抿了一下。

“你不喜欢喝啤酒吗？”

“不喜欢，太苦了。”

“苦？！喝点，啤酒对身体有好处。”

我端起酒杯，这时我发现他的眼睛盯着我的手。我喝了一口，然后把手放到桌子下面的膝盖上，好不让他再看见。

“你的脸色不太好，表弟，你的脸发黄。”

我笑了：

“我早就是这样。”

“谁把你送到皮革作坊的？”

“是爸爸和菲尼卡舅母送我来的。”

“他们给你找的这个事可不怎么样。”

“我别无选择。”

"你本可以去学点别的手艺。"

"当时我也不懂。"

"你想学熟皮子？"

"我这样想过。"

"现在你不想再学了？"

"我已经学会了，我不喜欢这一行。我想干别的。我想读书，学习。在这儿我什么也读不了。我觉得我的思想变得越来越空虚了。"

"其他学徒怎么样？"

"跟我一样，都是乡下来的。大伙都想快点出师，然后回老家去当老板。"

"店伙计呢？"

"他们的精神也很空虚，简直到了麻木不仁的地步。他们整天干活，吃吃喝喝，一到星期六和星期天的晚上就去逛窑子。"

"他们也带你去了？"

"只去过一次。是一个叫东布里卡·图苏的带我去的。"

"你要是再去的话，当心把你的身子搞垮。"

"我不会再去了。"

"诱惑力是很大的，你要设法克制自己。城里是吃人的地方，要当心别被吃掉，达里耶！"

"我不会被吃掉的，扬库表哥。我会想法不让自己被吃掉。"

"你刚才说的徒工和店伙计们的情况一点也不使我感

到奇怪。以前，就是几年前，这儿象全国其它地方一样也曾有过工人组织的活动。那时，店员、学徒和铁路工人都有自己的俱乐部，他们经常聚在一起，读书和讨论问题，准备斗争，以争取自己美好的未来。后来，一些工人运动的头头叛变，投靠了统治者，但工人运动并没被消灭。战争开始后，当局采取了一系列镇压工人的严厉措施。有些城市的工人运动遭到彻底破坏，但工人运动的火种到处皆是。这儿也应该有。你要是不愿意让城市吃掉你，你就应该去寻找这些火种。也许你走运，有一天会找到它。要不是我马上就要离开这儿的话，我一定帮你去寻找。我是昨天才从布加勒斯特来探望托奈叔叔、菲尼卡婶婶和其他人的，我已经见到他们。听他们说，我有一个表弟在这儿工作。我问他们最近见过你没有，他们对我说，你总是躲着他们。为什么？如果星期天你经常到他们那儿走走，对你会有好处，至少你可以喝上一碗热汤。"

我又笑了起来：

"扬库表哥，看来你不了解托奈舅舅。"

"坦率告诉你，我不太了解他，因为我一生中只同他说过两三次话。"

一生中！他只不过二十一二岁，却说起一生之中来了！扬库·布勒泰斯库表哥的经历太短了，短极了！

"我在布加勒斯特学了手艺，现在成了机械工，用我们乡下人的话来说就是铁匠。我一听说你在这儿，便急忙来看你，同你见面。你知道，我的父母都是害痨病死的。我

上技工学校也不容易，但熬过来了。因为我对生活，对美好的生活充满信心，所以我战胜了疾病，没有被病魔吓倒。可现在，医生劝我不要留在城市，让我搬到乡下去换换空气，我需要呼吸新鲜空气。明天我就去奥米达村，也许能在那儿的山坡上租到一栋房子，我要在那儿开个铁匠铺。”

“你一个人过？”

“开始是这样，以后再结婚。我打算在农村找一个身强力壮的姑娘，同她结婚，让她给我生大胖小子。我想生活在农民之间，我爸爸原来就是农民。我要为他们干事，把我学到的、看到的、知道的和从书本上读到的都讲给他们听。”

我表哥的眼睛里闪着光芒。

这时，两个衣衫褴褛、冻得浑身打哆嗦的乐师走进酒馆，一个抱着一把小提琴，另一个抱着一把吉他。他们俩搓了搓手，便开始弹奏起来。

扬库表哥对他们摆了摆手。

“不用给我们演奏了。”

他掏出十个巴尼递给了那两个乐师。

“给你们！”

“多谢老爷。您真好。”

两个乐师拿着钱走到店主身旁，他们每人要了一杯白酒，一饮而尽。

“严冬来得快，去的慢。”其中一个乐师说，“寒气袭人，冻得我骨头节疼。”

“我们走一走好不好，扬库哥哥？”

“我们活动活动吧。”

我们顺着小胡同朝前走去。

“在布加勒斯特我学会了很多东西。除了铁匠活外，我还学了别的手艺，晚上我上夜校。现在我学会了描图和画画。如果以后有空的话，我就画农村的风景、街道和我还记得的那条小河以及树木。我也要画人物。”

我默默地在他身旁走着，听着他的叙述，玩味着他话中的含意。他问我：

“你读过什么书没有？”

“我以前读过。可现在，我连喘气的时间都没有。从到这个镇上来之后，连一本书都没读过。”

“这不好。读书能使你头脑开窍。要想办法挤时间读点书。”

“是呀，谈何容易。”

“世上无难事，就靠你自已想办法了。你是不是想继续留在皮革作坊？”

“我不想在这儿干了，想换个地方。可能本星期内就换。我想攒些钱，等到秋天去图尔努上学。”

“如果秋天仗打不起来的话……”

“打仗？”

“是呀，打仗。人们象野兽一样互相火拼和厮杀已经两年了。没有参战的国家已寥寥无几，我国就是其中之一。但是，袖手旁观的日子不长了。有些人想让我们和同盟国开

战，另外一些人则想让我们同德国人打仗。”

“难道只是因为别人要求我们，我们就应该去参战吗？”

“咱们俩人当然不会了。”

扬库表哥笑起来。

“但是这个城市的人，所有城市里的人和乡下人，他们都愿意去打仗吗？”

“不愿意。大多数人都不愿意去打仗。正是那些不上前线的人，那些统治国家的人和支持他们的人才想打仗，因为战争可以使这些人发大财。”

“要是打起仗来，你也得上战场！”

“我想我不会去。去年我已经到征兵处登记了，但没让我入伍，因为我的身体不合格。不管今年还是明年，我的身体都不会比去年好。”

“你有病？”

“没有，我没有病。但是要让我扛枪打仗，整夜整夜地睡在泥地里，我的身体受不了。”

当他把我送到皮革作坊门口时，已是夜深人静了。

“明天我就去奥米达村，我们还会见面的。”

他轻轻地握了一下我那红肿的手，便走了。他很快就消失在夜幕之中。我站在门口，听着他离去的脚步声，直到完全听不到时我才回到皮革作坊。我踮着脚尖摸进屋里，伙计和学徒们都已睡熟，鼾声如雷，我钻进被窝睡了。

正如扬库表哥第一次见我时说过的那样，他果真到奥

米达村住了下来。他在通向斯特尼库茨村方向的村口上租了一所空房。这所房子坐落在长满树丛的河边上，场院又宽又长，一直斜向河滩。场院里都是红砂土地。晚上，如果你站在门廊上，你会感到微风不仅吹来了成团的蚊子，也带来了水草味和柳树叶的苦味。房前，青蛙扬着头、张着大绿嘴，从天黑一直叫到天亮。

表哥修好房子，把房子粉刷干净，在门口和窗户下栽上花草，装饰了一番。在冲街的一面还修好了栅栏，在一间破棚子里开起了铁匠铺。

晚上，他到街上和乡亲们攀谈。他说话和气，人们听了这个年轻铁匠的讲解后，个个脑袋都开了窍，心里亮堂起来。蒂察·乌耶和我表哥扬库·布勒泰斯库成了至交，好得像亲兄弟。其他人和我表哥的关系也很密切。妈妈也很喜欢他。乡亲们只要有犁铧要打，有农具要修，便马上来找表哥。他找了伊万·岑楚大叔家七岁的小儿子做帮手。伊万·岑楚大叔自从一九〇七年在道沟里挨了那次毒打之后，身子骨就垮了下来，得了一身的病。他的小儿子小岑楚只管拉风箱，因为不拉风箱，煤就烧不着。

我表哥那一双秀气细嫩的手，即使在节日里也不离铁锤。

我表哥过单身生活的时间并不长，他在附近的斯特尼库茨村找到了一个姑娘。

扬库表哥的妻子是个身强力壮的女人——壮得象头牛，干起活来一个顶俩。她叫西察，我像称呼姐妹一样，称

呼她西察大姐。

她因能同扬库铁匠表哥结婚感到格外高兴。"扬库，"每逢晚上她在街上闲聊时便对女人们说，"不让我去干活。他爱我，心痛我。我没有别的事，就是给他洗衣服，做饭。以后很快就会有事可干了：给他生孩子。他要我给他生一大堆孩子。他想得倒美！难道我那么傻？我就给他生一个孩子，然后……"她露出大白牙。她的牙很尖，像野兽的牙一样尖。

"我要生活下去，不能没完没了地生孩子，不能为了生孩子丧了我的命。"

结婚前，扬库表哥从城里买来马粪纸、颜料、毛笔、炭笔和彩笔，一有空就画画。他绘出了他的房屋以及邻居们的住所；他也画了铁匠铺；还把伊万·岑楚的这个小孩拉风箱的神态描绘下来——炉火通红，铁砧上火花四溅。他也曾想给西察大姐画像，但她冲着他大叫起来：

"什么，你疯了？你没事干了？我要是知道你不务正业，我就不会嫁给你。我当初哪晓得！人家干完活就吃饭，睡觉，或到街上同邻居们说说话。可你却关在屋子里看书，你看书会看疯的。你读这些书干啥？我真不明白！你看书看得都驼了背！我看你还有别的坏毛病——涂涂抹抹地浪费纸张。这些有什么用？你想看你的房子吗？那你就到院子里对着它看个够吧！你想看水坑和河边的柳树吗？那你就站在那里去看好了！还有岑楚家的那个浑身是虱子的小杂种，他在铺子里拉风箱，你整天同他呆在一起还呆不够？你把

他也画在了马粪纸上！你画他干什么？”女邻居们看着扬库表哥画的画，尤其是看到脸上沾满炉灰拉着风箱的小岑楚的形象时，便赞不绝口地说：

“画得真像！看那火！手放上去还燎人呢。”

女人们这时也开始责备起西察：

“西察，你别不知足。像你男人这样的人打着灯笼都难找，他是天生的有本事。”

“他有这个本事管个屁用？涂涂抹抹地能挣钱吗？要是把画卖了，再给我买回几顶帽子回来，那还差不离儿！”

表哥开玩笑地说：

“你没帽子戴才好呢！正是因为你不是城里姑娘，不戴帽子，我才娶了你。”

“我愿意像城里人那样也戴帽子，当太太。”

“等着吧。”

“什么时候？你总是说：‘等着吧，你会当太太的。’”

每星期我们吃五天玉米糕、菜豆或扁豆汤，星期四和星期天吃面包和肉菜卷或者炖肉。

“你们在我这儿过的简直是神仙般的生活。”莫察图老板夸耀说，“你们不能埋怨我不关心你们，你们饭是饭，菜是菜，睡的地方也不错，冬天也冻不着。”

在屋里我脚上裹着破布走动，出门就穿上从家里带来的那双便鞋。

每到星期天下午我就进城去逛。有一天我同一个高个

黑脸的男孩子攀谈起来。

“你从乡下来?”

“不,我从巴黎来。”

他噗哧一下笑了，我也笑了。

过了一会儿，他说:

“你在哪儿干活?”

“在莫察图老板家。”

“你就没找到一个比他强的老板?”

“是舅妈把我送到他那儿去的。”

我们边说边来到公墓旁。

他千方百计地打听我的身世，我只好把我能告诉他的都对他讲了。

在市中心,在两条带有人行道的宽广大街的交叉处,竖立着一个不是战死在沙场的将军的纪念碑，这就是曼图将军的纪念碑。

我们村里也有一个纪念碑。这座纪念碑既不在街口,又不在村公所或学校、教堂的门前。我们村的这座纪念碑竖在伊斯帕斯·卡普勒家的院子里。卡普勒已老迈年高，他的老婆也还活着。当卡普勒还年轻时,他的孩子们就死了。他的家底并不薄，但自从他的孩子们死去之后，他便无心思过日子。他不多干活，只求饿不死就行。图尔努城的远房亲戚为了一些地曾同他打官司。结果，这些地既没判给卡普勒，也没判给打官司的亲戚，却落入了因为亲戚们贪婪

而吃官司的被告人的辩护律师维格·格奥杰斯库手中。

一条宽广的大街通向图尔努的街心公园。市民们很早就在这个公园里竖起了一座纪念碑，纪念那些在一八七七年渡过多瑙河与俄国士兵一起同土耳其人在普列文作战中牺牲的士兵。

“这是什么？”伊斯帕斯·卡普勒问道。

“纪念碑。”一个扫大街的人回答说。

“为什么要立纪念碑？”

“让人们怀念那些在一八七七年同土耳其人作战中牺牲的士兵。”

伊斯帕斯·卡普勒把这个扫垃圾人说的话牢牢地记在心里：人们立纪念碑就是为了纪念那些以前曾经活着而现在已经腐烂的人们。

“伊斯帕斯，你在想什么？”他妻子追问他。

“我在想心事。”

伊斯帕斯卖掉粮食，又卖了一块地。他没有同任何人打招呼，便坐上火车进了图尔努城。他进城是找为公墓里的死者做十字架和纪念碑的石匠去了。

“石匠，你能给我刻个纪念碑吗？”

“你家死人了？”

“没有。我家里谁也没死。是给我自己立纪念碑。”

“立在墓地里？”

“不，立在我家的房前。”

“立在房前？”石匠惊奇地问。

"对，纪念碑就立在我的房前，面向大街。"

"你为什么要让我给你刻纪念碑？"

"为的是让人们以后知道我，伊斯帕斯·卡普勒曾经在这所房子里居住过。"

他同石匠磨了好久，最后总算谈妥。他把钱付给石匠，然后回家等着石匠把纪念碑给他送来。

到了商定好的交货期，石匠带着两个工匠来到伊斯帕斯·卡普勒的家中。

"纪念碑呢？"伊斯帕斯问。

"用火车运来了！快想办法到车站去拉！"

卡普勒老头租了两辆马车去车站。纪念碑装在钉着铁钉的大木箱里，比水磨盘还重。这些能工巧匠按照他的要求把纪念碑立在了屋前，面向大街。这是一座很高的圆柱形纪念碑，一只虎视眈眈、展翅欲飞的青铜制作的雄鹰站在纪念碑的顶端。石匠在纪念碑上刻下了金色的大字：为了让人们永远怀念我，我，伊斯帕斯·卡普勒，特立石碑于此。

他的老伴儿为此同他大吵大闹，可是最后还是依了他。现在，伊斯帕斯·卡普勒已年迈体衰，穷极潦倒，疾病缠身，卧床不起。冬天，老伴儿喂他菜豆粥，夏天也只有菜汤来糊口。

老头病得气息奄奄，他想喝口牛奶。

"老伴儿，你去给我买瓶牛奶来！"

"有钱的时候你不去买奶牛，却在屋前立碑。现在你想

喝奶啦，你爬起来到碑顶上去挤鹰奶喝吧！”

伊斯帕斯·卡普勒叹着气说：

“老婆子，你什么也不懂。我快死了，但我死后，人们至少不会忘记我。快给我买点牛奶来！”

“找铜鹰去吧！快爬起来去挤鹰奶喝吧！”

在市中心的十字路口处，竖立着曼图将军的铜像，他从未参加过战斗。以前，他在乡下有森林，有大庄园。现在，这些都传给了他的后代。他当过参议员。他的亲族为他立了碑，目的是不让人们把他遗忘。过往的行人从铜像前经过时，偶尔也有人抬起头望一望他那两撇胡须；飞行中的乌鸦有时也在他的头上落脚。他那顶光亮的头顶上拉满了白色鸟屎。塑像前有两个紧挨着的小店。一个是“金八哥”书店，平时卖一些铅笔、粉笔、包装纸之类的东西，秋季开学时也卖一些课本。营业员是一个高个子黑脸膛的后生，他叫乌尔穆兹·尼古列斯库。另一个铺子则专销售我的新主人米耶卢什·古舍的商品，城里人都把我的这个新主人叫做波姆尼亚德。铺子的门上、窗子上都挂着写有“天使”的店牌。

城市上空又飞起了雪花，雪花漫天飞舞。

“看来，冬季很快就要过去了，再冷上一两周也就差不多了。”

“也许还要冷上一个月，因为二月份还没过去。”

马车夫把马套在雪橇上。马耳朵上扎着彩结，马脖子

上挂着铃铛。马拉着雪橇停在纪念碑旁等客。马不停地摇得铃铛响，马车夫冻得在地上直跺脚。街上行人稀少，没有人来坐雪橇，“金八哥”书店、“天使”铺子也都没有顾客光临，商人们无可奈何地吧嗒着嘴。

“这些乡巴佬，宁肯憋死在家里也不愿进城！连个人影也看不见！”

米耶卢什·古舍老板也没开张。

“许是有人死了，这个鬼天气不死人才怪呢！”

总算来了个顾客，他花了十个巴尼买了支小蜡烛。他的孩子在生病，也许已经死了，人死时不能不点蜡烛。

“火车误在北边森林中的大雪里。”

从韦代附近的森林中窜出一群狼，狼群一直跑到城郊。所有的道路都被大雪阻塞，交通中断。

“你去告诉他，让他给我端杯咖啡来！”

在“天使”店铺的对面，是米尔蒂亚代先生开的咖啡馆。我横穿街道走过去。

“给古舍老板煮杯咖啡。”

“好，这就得！”一个店员答应说。接着他对着屏风后喊道：

“给波姆尼亚德先生来杯咖啡！”

这时，米尔蒂亚代先生好像是初次同我见面似的有些诧异，其实，我们昨天已经见过面了。

“小兄弟，稍等一下。你是‘天使’店铺的？”

“对，我是‘天使’店铺的。”

“你在波姆尼亚德那当店员？”

“是的。”

“你是何时干上这个美差的？”

“昨天早上。”

“啊，怪不得！”

“请您把咖啡给老板送去。”

“没问题。”

“马上就到晌午了，”老板说，“我觉得肚子里空了。你赶紧到我家去，把午饭给我用饭盒提来。小心路上别把饭洒了，不然我剥了你的皮！”

老板的家就在斯克里瓦什泰方向的城郊，要走很长的路才能到。脚踩在地上的冰雪上咯吱咯吱直响。刺骨的寒风吹得我东倒西歪，我只好扶着街旁的栅栏向前走。到了十字路口，我滑了一跤。

“您好，太太。老爷派我来取午饭。”

“但是，他今天早晨没给我买菜的钱呀！天亮他才从赌场回到家。他难道不知道快没木柴烧了吗？这个蠢货什么也不管，他也不想管，就知道派人来取饭，饿死他活该！跟着他算是倒霉透了！”

太太的两眼哭得发红，她怀里抱着两个面黄肌瘦、鼻涕眼泪满脸的小女孩。

“来！你抱着她们哄哄，可能想睡觉了，让她们睡死算了，简直把我累死了。”

这时，孩子不再哭叫，好像听懂了话似的，伸开双手

让我抱，我好不容易才把两个女孩抱在怀里。

“该死的丫头，撒了你一身尿！你出去用雪擦一擦。你可别见怪，这说明你要走运了。要是我妈一生下我来，就让接生婆在给我洗澡时淹死我就好了，那我就不会嫁给古舍，也就不受这份罪了，唉！”

到了吃午饭时，古舍老板打开饭盒，把碗放在柜台上，进了午餐。

晚上，我提着空饭盒独自离开“天使”店铺，回到老板家。

老板经常很晚才回家，有时要到半夜三更，有时要到天亮。我和女仆泽娜睡在一个屋里。她身强力壮，有一双发红的粗手。她家务事干得不多，大部分时间是喂养奶牛。老板家养了四条奶牛——三条油黑的奶牛和一条雪白的奶牛。太太就靠这几条奶牛过日子。她把挤下来的奶卖给左邻右舍。有时在半夜里，古舍老板便轻轻地敲门。泽娜睡觉很轻，听到敲门声，她马上跳下床去开门。我假装睡着了，一动不动。

“他睡着了？”

“睡着了。他睡觉很死，就是在他耳朵边上放大炮也震不醒他。”

老板在屋子里呆了一会儿，便颠起脚尖走了。门吱扭一声开了。这时，太太扯着嗓子大吵大骂：

“混帐东西，你又找泽娜去了！自从我生下孩子有一年了，你每天夜里都去找她，真是天地不容！”

院子很大，房子就坐落在院子正中。与大雪覆盖的原野紧紧相连的街道十分凄凉冷清。

“你听见了吗？”黑暗中泽娜问我。

“听见了。”

“这儿哪像是个家，简直是疯人院。”

“你在波姆尼亚德这儿干了几年了？”

“两年了。”

“你不觉得腻烦吗？”

“腻烦有什么用？别的地方也一样，说不定比这儿更糟糕。”

“太太打你吗？”

“不打。”

“她要是打你，你怎么办？”

“我就挖她的眼睛。”

“你干吗让老板来缠你？你喜欢他吗？”

“不喜欢。我让他来就是为了气气太太。我恨她，所有的太太我都恨。”

泽娜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她把被子一直盖到下巴上。

“睡吧，”她说，“天就要亮了。”

“睡吧！”我们是想睡，可就是睡不着。睡意像狡猾的狐狸一样，在黑暗的屋子里和我们兜圈子。床很大，两头都靠墙。我睡在一头，泽娜睡在另一头。

“你睡着了吗？”

"没有。"

"我也睡不着。"

我起身拉开窗帘，屋里已微微发亮。

"达里耶。"

"唉。"

"你想不想到我这儿来？"

"想。"

我的嘴唇颤抖着，随手又盖了盖被子，把被子紧紧地裹在身上。我浑身颤抖着。屋外上了霜冻，屋内像个冰窖。

"你别来了。"

"我不去。"

我们住的房子离街很远，但偶尔也能听到街上行人的脚步声。放开的狗在栅栏旁翻来跳去地狂吠着。

"达里耶，我有病。"

街上满是白雪。下雪天大街上一片洁白，格外美丽；房子、栅栏都披上了银装，玉树压弯了枝条。雪停了，街上行人来来往往，雪在行人的脚下失去了它的洁白和光彩。

"小弟弟，我不愿意坑害你。"

天亮了，我穿好衣服来到牲口棚。以前，我闻到的净是皮革作坊里那鞣烂皮子的酸臭味；现在，我整天闻到的是牲口棚的臭味和店里烧的香味。在这个"天使"铺里，我们卖的所有货物，除了熏香外，都没有味。棺材没有味，棉织物也没有味。我打扫牲口棚，给牛刷背、添草，还得给地上铺上干净的麦秸。泽娜挤牛奶。

尤其在市郊，小偷成群。几乎每天夜里都有小偷溜门撬锁，见东西就拿，把你偷个精光！

"达里耶，你千万别和小偷勾搭上。"泽娜叮嘱我说，"不然，你会坐牢的。"

"我进城的目的不是这个。"我对她说，"我是来干活的，我想挣一些钱。"

"挣钱！到米耶卢什·古舍这儿来挣钱？！"

"他不付给我工钱吗？"

泽娜笑着耸了耸肩。这时，我的心一下子凉了半截。

"我可不想白给他干。"我对她说。

在"天使"铺子里，办丧事用的东西应有尽有。蜡烛和烧的香，糟得一摸就破的呢料衣服，底上长了黑霉、边上磨破了的拖鞋和皮靴，以及各种规格的棺材——小的像皮鞋盒，涂白色的略大一点的棺材，有高个子用的棺材，也有矮个用的棺材。这些棺材按顺序摆在铺子里面靠墙的地方。货架上摆满了整捆的黑纱和白纱。未出嫁就死去的姑娘，她的棺材上披的是白纱。

"家里死了人都很伤心，哪里还有心思去讨价还价，要多少钱就给多少钱，买好后急忙回家料理丧事。这就是波姆尼亚德的经营之道。不管他同你多么亲，只要一死，你就得赶紧把他埋了，因为死尸不能停放时间太长，尤其在夏天，人死后不到一小时就要变味。"

"乌尔穆兹大叔，你为什么让我到古舍那儿去干事？"

"首先，你不要叫我乌尔穆兹大叔，你要像全城的人称

呼我那样，应该叫我帕帕加尔，叫我帕帕加尔大叔。”

“好，不过，帕帕加尔是……铺子的商号。”

“我和我经营的店铺是一码事。大家都叫我帕帕加尔，你也叫我帕帕加尔好了。”

“帕帕加尔大叔，你为什么劝我到古舍的铺子来干事？”

“因为这儿比皮革作坊好。”

“现在我还得管喂牛，泽娜倒成了少奶奶。”

“你好好喂牛吧。因为到来年开春之前，不会有人来这儿买棺材的。这当儿，阎王爷不着急捉拿人。波姆尼亚德要是在亚历山德拉开个铺子的话，那他的生意就会好多了。”

“为什么？就是因为亚历山德拉是个大城市？”

“不是这个原因。因为亚历山德拉那儿的人都有痨病不少人往往在春秋两季丧生。当然，别的季节里也有人死，差不多每天都有人死掉。”

“这儿得痨病的人也不少。”

“是的。但比起别的地方来还是少。这儿家家户户的房子周围都有个菜园，吃的也好一些。这儿的人不读书，一本书也不看，生怕让字母燎了眼睛。”

帕帕加尔沉思片刻后说：

“唉！这哪像城市！根本不算是城市！简直是地狱，不是城市！去年，我一本书也没卖出去！这算是什么城市！根本不是城市！”

我本打算从他那儿借本书来读，可我哪有时间读书！米

耶卢什·古舍老板要是发现我看书的话，准会把我的脖子拧断。

在“天使”铺子里，我也并不是一无所得。当我去和老板结帐时，他拉开柜台的抽屉说：

“你瞧！我连五个列伊都没有。没有人死，我有什么办法！”

离开皮革作坊时，我好不容易才从老板那儿挤出两个波里的硬币。

我在伯尼格·乌尔泰让老板那儿挣了五个波里。伯尼格老板的杂货店就在莫察图老板的皮革作坊旁边。伯尼格先生是个黑脸膛、满脸胡子的高个男子汉。他唯一的缺陷就是斜眼；不，他还有别的缺陷，就是说话口齿不清。他总是叉着腿——像踩高跷似的——站在杂货店门前，腰里围着块绿围裙。他把盐、绳子、蜡烛卖给乡下人，有时也卖给他们一些重油。在铺子门口，有一口大缸，里面的重油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以前，伯尼格老板没有男店员，因此便把我雇了来。比起在皮革作坊时的沉重劳动和在“天使”铺子时每天从店铺到城郊来回跑的远路来，现在我在伯尼格店里干的这点活简直算不了什么。现在用不着把生皮子扛到地窖去鞣，也用不着扛着湿皮子去晒，用不着整天同皮子打交道，再也闻不到那种令人窒息的臭味；也用不着抱那两个哭哭啼啼闹个不停、满身是疥疮的小丫头了，用不着打扫牲口棚，

也用不着给牛刷背，再也听不到半夜里的吵架声——你想想，现在每天只不过是站在杂货店门前消磨时光。站在门前，呼吸着新鲜空气，除了想法招徕顾客外，再就无事可干了。

“大叔，到我们店里来买东西吧！我们的东西比隔壁的便宜！”

隔壁铺子的人也是这样说着招揽顾客，毫不在意。

这根本算不上是干活，我闹着玩似的就可以应付过去。我就是这样边玩儿边应酬。

要说有重活，那就是每天早上要把大盐块一块一块地搬到店铺前，靠墙码起来；晚上再把盐块一块一块地搬进来，堆到货架下面。

还有，就是重油桶。每天早上得把大油桶抬出去，晚上再抬进来。我和老板一起抬，累得我腰酸背疼，但又无可奈何，只好硬着头皮干。

老板有个儿子，也叫伯尼格，长得和老板一模一样：瘦高个，黑脸膛，斜眼，讲话口齿不清。他每天要骂我好几次。老板倒是个快活的人。他的儿子要是傍晚来店里，我就得背着他穿过大街，走大半个城市一直把他背回家。我真想把他背到坟墓里去。

公墓在城西的土岗子上。我见过的所有公墓几乎都坐落在山岗上。如果人死后眼睛还能看东西，其目光能透过蒙头布、棺材盖和压在棺材上的厚土以及长在坟墓上的茂

密的野草，那么，这些死去的人就能继续观望整个城市和街道，观望房屋和村落，洞察人们的活动。

“人一死，眼睛也就不能再看东西了，趁你在世时，要多开开眼界。”

“我正在努力这样做。”

我和帕帕加尔大叔一起在墓地里转了一下午。这个卖铅笔盒、铅笔、黑板、板擦的人真怪，在这个无人读书、净是商人和屠户的小城里，他竟然还想当书商。

“你看，”他对我说，“富人们死了之后，还要向我们炫耀他们的财富！他们在墓地里用砖瓦、石头、甚至大理石建起地道的宫殿。死者在地下宫殿里，一个挨一个地在金属的宝座上安眠和腐烂。他们的名字用金字刻在十字架上。墓室前悬挂着永不凋谢和永不生锈的铅制花环。早已死去的人的遗像还向人们微笑。我不喜欢墓地。”

“帕帕加尔大叔，我们真不如到韦代城堡那边的树林里去散步。”

“下次我们去。”

我们在一座很大的陵墓前停下来。陵墓真像是一座宫殿，里面可以住几户人家。白色大理石砌成的陵墓正面的窗户上镶着彩色玻璃。墓前，大理石墁地，一个哭泣着的石刻天使竖在一个高高的底座上，真像是自天而降。天使是用大理石雕刻的，它的目光直射在小石座上的头像上。头像是铜的，脸部突起，还留着两撇小胡子。

“你看，这就是阿梅代乌·卡拉克的头像。他在我的家

乡梅里戈拉村有一座庄园，一条小河从庄园旁流过。一九〇七年，他亲手杀死了很多人。你还记得一九〇七年的农民起义吧？”

“记得，那时我已经懂事了。”

“全国闹起暴动后，消息也传到我们村里。但是梅里戈拉村的农民怕地主，怕狗腿子，也怕宪兵，所以没敢贸然行动，他们想再观望一下，等合计好了再动手。因此，虽然邻近各村的地主庄园都被烧了，但梅里戈拉村的地主庄院却平安无事。在农民们尚未行动时，就是在这立着铜像的这个地主却抢先下了手。他调来军队，因为县里有人给他撑腰，他有个侄子在部队里当军官。他的侄子命令士兵站岗巡逻，昼夜守卫庄园。地主和他的军官侄子在村里耀武扬威，横行霸道。一次，地主的三百头小猪仔短了一头，可能是放猪时跑丢了，或许是让士兵捉去烤着吃了，因为地主只让士兵们镇压农民，却不管他们吃的。可是，地主却一口咬定是村里人偷了。他还说什么，乡亲们要造反，他的财产遭受了损失。他以丢了一头小猪仔为借口，便命令士兵到地里去把老乡们的猪全赶到他的家里，以此作为抵偿。后来，他又诬蔑乡亲们捣毁了他的一个粮仓，抢走了他的粮食。你知道，起义前的那个夏天闹旱灾，有的人卖了地，有的人卖了牲口，然后买粮吃。地主带着士兵挨家挨户地搜查，把他们的粮食和玉米棒子，甚至成口袋的玉米面抢走。荷枪实弹的士兵在村里日夜巡逻，使你寸步难行。不久，又开始了对邻村起义农民的大屠杀。阿梅代乌·

卡拉克能袖手旁观吗？别看他现在躺在坟墓里，那时他可神气了。他和他的侄子一起骑着马在村里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他们整整作恶了一个星期，等到他杀腻了，觉得已经把农民都吓住了，可以由他随意摆布了，这才停止屠杀。但是，他还是继续毒打农民，还把他们捆起来押往图尔努城。”

公墓占地很大，在山岗的上面，有一座蓝色的玻璃房子，整个房舍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从城里就可以看到这所隐没在树丛中的玻璃房。

“这条老狗用枪打死了我妈妈，”帕帕卡尔大叔说，“我经常在这儿路过，每次我都往他的墓上吐唾沫。可是有时看到他的坟墓实在令人作呕，于是就扭过脸去把唾沫吐在青草上。”

我们爬上山坡，朝着蓝房子走去。房子四周有矮栅栏，从栅栏门到房门之间有一条石子路相通。秋天，凋谢的落花铺满了小路；而现在，正是春意盎然，鲜花盛开，花红似火。我们透过玻璃墙看到了陵墓。在里面的墙上，挂着一个镶在镜框里的有真人那么大的照片，这就是死者的照片。他眉清目秀，是个英俊的小伙子，看样子还不到二十岁！遗像上方挂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

格林·格特林·博泽克

一颗流星

出现！

发光！　消逝！
精神消灭了物质。

“他就是‘新娘’店铺旁边那个卖药的博泽克的儿子。”帕帕加尔大叔说，“他是两年前从阳台上跳楼摔死的。”

在“金八哥”书店旁边，与“天使”铺子隔路相对的是两座小楼——这是镇上少见的楼房。一座小楼是“格特林·博泽克药店”，另一座小楼是米耶卢什老板的弟弟阿达纳谢·古舍老板开的“新娘”百货铺。这个百货铺从天亮一直开到夜晚。古舍兄弟之间从不抢生意，因为“天使”店里卖的是棺材、香、蜡烛和寿衣；而“新娘”店里卖的只是新娘子的专用物品：白色的面纱、披纱、金丝手套、白皮鞋和连衣裙。连衣裙是成衣，顾客只需穿在身上试一试就可买走。铺子后面的小屋里有两个姑娘专门承做连衣裙。

秋天是“新娘”百货店顾客盈门的好季节，因为秋收之后，农村里举行婚礼的最多。那时，“新娘”百货店的年轻小店员像是参加婚礼一样，胸前扎着金丝蝴蝶结站在门口或走到街上招揽顾客，让他们光临店铺，买阿达纳谢·古舍的商品。如果店员想开心的话，他们就缠住那些青春已过，却望着橱窗里的新娘子模特儿发呆的老太婆，纠缠不休。橱窗里的新娘子模特儿是石膏做的，由于天长日久，她的脸上尽是裂纹，涂了口红的嘴唇也被阳光晒裂了。

“小姐，请进。我们这儿有白皮鞋，还有百里香花环。”

“见你的鬼去！”老太婆说着走开了。

“我哥哥米耶卢什的生意不错。”“新娘”百货店的老板叫苦说，“我卖婚礼用品，他卖葬礼用品。葬礼比婚礼多。”

在城里，经常有葬礼。四个教堂的神父勉强能应付得了葬礼、祭墓和安灵弥撒。尤其是小孩，死的更多。在南城(有大半个城坐落在河谷里)，每到春天，河水涨出，流到街上，流进荒凉的院落，在矮小房子的周围积成了片片死水洼，水变臭了，一直臭到冬季被雪埋住。由于受不了饥寒交迫的侵袭，小孩子们送了命。这时，“天使”店便拿出中号和小号的棺材来卖。

等到格特林·博泽克卖药丸、甜饼干和油膏时，他已经老了。如果你涂上他卖的药膏，那么藏在衬衣缝里，裤腰里和裤腿缝里的虱子就会死掉。他还卖疥疮膏。一到星期五的集日时，许多乡下人便来到博泽克的药铺。他们来到店前，胆怯地走进石头地的药铺。柜台上放着两个闪闪发光的黄色小天平，两个小天平竟使乡下人如此害怕。他们看到货架上成排放着的大瓶子，心里却在打鼓。

“老头子，你买什么？”

“买甜饼干。我的小孙子肚子发胀，他肚子里可能有蛔虫。”

“你要什么，列列亚？”

列列亚走过去，贴着博泽克的耳朵小声地说：

“要疥疮膏。”

在地里看守庄园的地主的佣人，还有放羊的，喂猪的，

养牛的都来买治虱子的药膏。乡下来的人进了药铺多半是买疥疮膏，博泽克把成盒的疥疮膏卖给他们。药膏盒是圆的，是用灰色马粪纸做成的。

“你们也要洗洗澡。”这个卖药的好心地劝着大家。

“洗倒是洗，因为我们也是人。但是，我们没有换洗的衣服。因为没衣服换，洗完澡又穿上发臭的脏衣服，所以洗澡也白搭。先生，棉布很贵，可你卖的药也不便宜，只有我们的劳动值不了几个钱。”

在药铺里，人们都恭顺地脱下帽子以示尊敬。在其它的铺子里，他们则把帽子推向脖颈，并且还扯着嗓子讨价还价。而在这儿，卖药的要多少钱，他们就得给多少钱。在药铺里，根本就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博泽克身材矮小，长得瘦弱，简直像个小孩。他的整个身子上唯独脑袋长得老大，而且秃了顶，戴着一副高度近视眼镜。他有过妻子，但是，在他的儿子死去一年后，她也患心脏病去世了。

“是呀，”帕帕加尔大叔继续讲述着，“他的儿子是从阳台上打着伞跳楼摔死的。”

“为什么打着伞？”

“他想看看在空中能不能飘起来。”

“他疯了？”

“他的头脑一点毛病也没有。”

“我不明白为什么有些人要寻短见，反正人早晚都有死的那一天。”

“由于软弱和气馁的缘故。”帕帕加尔大叔说，“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勇于同困难作斗争。”

“可是，博泽克的儿子会有什么困难呢？”

“博泽克的儿子上中学时总是名列前茅，成了他家的骄傲。那时，博泽克总是说：‘我的儿子准会成个有学问的大人物。’大家也都这样看。他的儿子确实聪明过人。后来，他父亲便送他到法国学习，想把他培养成一个全国独一无二的工程师。他在巴黎爱上了一个姑娘，但是，由于当时爆发了战争，他被迫返回家乡。于是，他失恋了。由于这个原因，他从此变呆了，整天愁眉苦脸，昏昏沉沉。一天，他从楼上跳下来，折断了骨头。他呻吟了几天就死了。”

格林·格特林·博泽克的照片显得很漂亮，他的两眼炯炯有神，这双眼睛是最吸引人的地方。

“公墓，管它呢！帕帕加尔大叔，咱们回城吧。”

我们朝山岗下走去。暮春将至，槐树已经开了花。公墓四周的栅栏被白色的槐树花遮在下面，槐树花散发着令人心醉的芳香。

夕阳西下，我慢慢地走着。现在我是光着脚走路，总得留神别绊倒。我总算脱掉了破衣服。

一天，瑟卡拉村的迪察表姐进城来，她偶然在伯尼格·乌尔泰让的铺子前见到了我。她走过来，从头到脚打量着我，上下打量了我好几次。她的两只眼睛深陷在两条浓眉下，现在她的两条眉毛比以前更浓更长。

“喂，达里耶，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她的那片兔唇不见了，嘴唇上只留下一条发白的、轻微的条痕，这说明她的嘴已做了缝合手术。她是个健壮的女人，臀部很大，粗手大脚，是个能干活的好女人。

“我在卖重油。”我对她说，“卖重油、卖盐，还卖绳子。你需要什么？”

我强作笑脸相迎。迪察走过来，摸着我的脸。以前，在一个狂风呼啸的夜晚，她也曾用手这样摸过我的脸。

“喂，表弟，你在这干活挣钱吗？”

“不，就是管吃饭。”我边说边低下了头。我浑身上下穿的净是该扔进垃圾箱的破衣服。

“下星期五我还来，”迪察说，“你等着我！”

我的表姐迪察走过去，从马车上拿来一个大面包。

“你许是饿了，给你这个面包，拿去吃吧。”

她走了。一个星期之后，她又一次出现在杂货铺的门前，她递给我一包东西。

“我给你带来几件衣服，还给你拿来一件毛衣，是潘蒂利耶穿过的，是我从箱子里翻出来的。扔掉身上的破衣服吧！”

我有几个月没理发了，头发长得盖过耳朵，垂到脖颈。我一直光着头，把又脏又乱的头发露在外面。我的头发被风吹得更乱了，大风在城市的大街小巷扬起尘土。没经老板许可，我拿了一块肥皂，把它藏在怀里。

“老板，请准我一个小时的假。”

店铺里无顾客登门，所以老板准了我的假。

“我去看望亲戚。”

“去吧。”

我拿着迪察表姐送给我的包裹出了城，然后来到车站。我继续朝前走，穿过铁路，来到桥边。过了桥就是公路。这条公路穿过森林朝北延伸，通向一个吉卜赛人的村庄。我躲在桥下，脱掉衣服，跳进河里。我用那块肥皂足足搓洗了一个多小时。然后，我游到河水宽的地方，那儿的水有好几米深。我侧着身子，只用一条腿打水，游了个痛快，直到在水里泡够了为止。河水很凉，但是游起来就热了。我游上岸后，把破衣服扔进河里，换上迪察送来的衣服。衬衣穿在身上很长，几乎拖到地上；裤子又肥又大，表哥潘蒂利耶·乌楚珀尔穿过的那件毛衣也很长。然而，我觉得这些干净的衣服很漂亮，盖世无双。在回城的路上，我停下来，进了一家理发店。一个土耳其族人理发师用推子给我理了发，理下的头发足有一篓子。

“掌柜的，我身上没钱，等明天跟老板要到钱，我就给你送来。”

这个土耳其人认识我。

“好吧，明天给我把钱送来。”

第二天，我便给他送去十个巴尼的一个小硬币。这是一个圆形硬币，中间有一个孔，上面铸了铜像。

公墓和城郊消失在我们身后。城里，夜幕已经降临。

这是一个温暖而宁静的夜晚。

"走，我们跳舞去。"帕帕加尔大叔说，"我们也去开开心。"

"去就去。哪儿有舞会？"

"还得往下走，在杜德斯库的房子旁边。"

冬季，在我们奥米达村，在圣诞节和复活节两个节日之间，总是在学校举行一次舞会。一般星期六晚上举行舞会，为的是让那些夜间跳舞的人在第二天好好休息。那时，我们这些小孩子负责把教室的凳子搬出来，放在院子的墙角。然后，我们便用水冲洗地板，把地板刷得锃亮。教室的天花板上挂满用五颜六色的纸做的彩带，墙上的裂缝也用彩纸塞住。我们把角落里的铁炉子刷上一层亮晶晶的沥青。我们还用水冲洗教室的石头台阶。十来个村子的文书，以及他们的妻子和女儿，还有税务员、神父等所有那些穿高领子的德国式衣服、头戴硬礼帽的人都赶来参加舞会。这是那些土豪劣绅们相逢晤谈的好机会。乐师是从城里请来的，人们用马车把抱着小提琴的乐师从火车站接到学校。村公所的灯和邮局的油灯都集中到教室里，把教室照得如同白昼。天一黑，舞会便开始，舞会一直要进行到天亮。我们爬上栅栏，从窗口朝里望。乐师奏着乐，一对对的舞伴翩翩起舞，他们跳呀，跳呀，一直到跳晕为止。

"他们真会玩儿！"

"他们能有什么发愁的事？不愁吃，不愁穿，醉生梦死，无所事事，衣袋里又有的是钱。"

我们并不是一无所获，也学到了一点东西。天亮时，舞会散了。这时，村子里的酒馆里又热闹起来。可我们只好去睡觉，做梦。然而，并不是总能做好梦。

“帕帕加尔大叔，你刚才说什么地方有舞会？”

“在杜德斯库家旁边。”

杜德斯库家的四周根本就没有礼堂。舞会是在一所房子的前面举行的，这是一个很大的院子，主人在地上洒了水，并打扫得很干净。我和帕帕加尔大叔站在很远的地方观看。乐师们奏着《蓝色的多瑙河》乐曲，后来他们又唱起歌来。城里的小伙子和年轻的姑娘们从四面八方赶来跳舞。东布里卡·图苏也来了，还有伯尼格老板的三个姑娘。博博阿卡走过来问我：

“你在这儿干什么？”

“看跳舞。”

“快，回家去，这儿没你的事！”

“是呀，这儿没我的事。”

明亮的月光撒在宽广的街道上。

伯尼格老板住在车站那边的城郊。他家的那座房子很矮，但很漂亮。这所房子包括三间小屋，最后面的那间屋子，我以前曾经进去过。屋子里有一张大床，上面铺着蓝色的床单，这是老板和他老婆的卧室。在窗子和镜子之间的角落里，放着一个铁制梳妆台，它的上方是一盏白色的

大圆罩子灯。

老板的五个女儿睡在另一间屋子里，像我们乡下人一样，五个姑娘挤在一张床上睡。所不同的是，她们的床上铺的不是席子，而是垫子。几个姑娘光着身子睡觉，最大的睡一边，最小的睡另一边，几个人睡在一起并不显得挤。

五个姑娘，没有一个出嫁。尽管是做买卖，可老板还是显得很寒酸，他和他的太太都穿带补钉的衣服。小一点的姑娘也穿带补钉的衬衣和裙子。只有该出嫁的几个大姑娘穿得像个样儿，她们为此洋洋得意，每到星期六晚上，她们便结伙去散步，逛大街，不是在咖啡馆门前晃悠，就是围着那个把庄园和附近那片森林留给孙子做遗产的图图将军的雕像转。这间屋子里，还有一张和文书家一样的铁床，他家最小的男孩小伯尼格就睡在这张铁床上。

每天晚上，我总是背着小伯尼格回家。这个斜眼嫌我走得不够快，老用两脚踢我的肋骨。

“我的马，快走！快走，小马驹！快走，蠢驴！”

他揪我的头发，又揪我的耳朵，还胳肢我。我在伯尼格·乌尔泰让老板家干活期间，脸上总是带着伤痕，像是让猫抓的一样。

饭桌摆在花园中靠窗子的地方。这是一张用木条钉起来的长桌子，上面蒙着一块灰布。桌子周围摆着几把很普通的木椅子。老板坐在桌子的一头，另一头坐的是他的太太。

最大的姑娘负责端饭上菜，吃的总是清汤、菜汤、丸

子，没有别的花样。要说有的话，那就是偶尔也吃菜豆。

我在一边呆着。他们吃完饭，便把他们盘子里的残羹剩饭倒进一个碗里给我吃。

这着实使我恶心，但是，饥不择食。我在老家时就听说过土耳其狗的故事，几天不喂它，给它酸苹果吃，它也吃得津津有味。

唉！在伯尼格·乌尔泰让家，就是能吃到酸苹果，我也就心满意足了！酸苹果会消除我的恶心。然而，镇上买不到酸苹果，就连没长熟的生苹果也没有。

在那幢白色的小楼里，每天下午都有人弹钢琴。她是马尔茨扬家的小姐。不久前我发现她边弹琴边叹息。地主埃拉克利耶·马尔茨扬有四处庄园。这是他的独生女儿，名叫塞米拉，有痨病。她每天都弹琴，有气无力地弹呀，弹呀，琴声低沉悠扬。她活不长了，镇上的人在等着给她送葬呢。我常听到有人说："马尔茨扬的女儿要是死了，我们会有热闹看的。"

地主马尔茨扬是一位退休的上校。他在俱乐部曾说过，举行葬礼时，他将叫一个骑兵团来列队奏着乐给她女儿送葬。城里没有驻军，所以姑娘们不会同步兵、骑兵交往。夏天，她们扫兴地和前来度假的大学生散步；冬天，则和小商贩一起闲逛。

琴声使我陶醉，又令人心酸。这琴声好似甜蜜的召唤，把我从大地上、盐块堆里、绳子团中、重油桶旁带到了很

远很远的陌生世界。这时，我忘记去招揽顾客，忘记拉那些穿长袍的乡下人进店买东西。

“怎么了，傻瓜！你睡着了？”

“没有，伯尼格先生。”

伯尼格家真正使我恶心的是另一件事，它促使我在一天晚上去把帐结清，然后离开了店铺。

伯尼格家的第三间屋子又窄又小，尽头靠墙处放着一张不大的小床，床上有一条破麻毯子，还有一个只有乡下人才枕的那种塞着麦秸的枕头，我就睡在这里。

我睡得很熟。但是，我睡觉的床下放着一个桶。

放桶怎么了？难道一个桶就能妨碍疲劳的男孩子入睡吗？也许不会。然而，这个桶不能使我入睡，它让我从此讨厌老板的家，让我厌恶生活。

城郊一片寂静，房屋里的灯已经熄灭。从远处的什么地方传来巡警的口哨声，声音很像车站上的火车开动时那种鸣笛声。我沉浸在黑暗的睡梦之中。

我刚睡着一会儿就醒了。原来是从隔壁姑娘们的屋子里传来的脚步声把我惊醒。我听见开门声，靠着撒在玻璃窗上那微弱的月光，我看到一个模糊的人影。

“这是玛尔加列塔，”我心里想。玛尔加列塔长着满嘴大牙，她是老板的大姑娘。她进屋后，从我的床下拉出那个桶，撒完尿，把桶推进去，走了。

我几乎叫起来，接着又是一阵脚步声，又看到一个又矮

又圆的粗短身影。

这是菲菲，她的头发是黑的，嘴上还长出黑胡子，长得和太太一模一样。

快，达里耶，快睡吧！我闭上眼睛，后来睡着了。你想：一夜间，五个姑娘都要来拉桶撒尿好几次。

如果只是撒尿声倒不至于把我吵醒，使我醒的原因是尿桶里散发出的那股刺鼻的酸臭味儿。正因如此，早上一起床，我的眼睛总是被尿味熏得又痛又红。

"老板，你给我结帐吧。"

"你在我们这儿呆腻了？"

"不是的，老板。不过，还是请你给我结帐吧。"

根据我的记忆，我同老板已经说好的是，他应该给我一百四十个列伊。然而，他没有给我那么多，少给我也得拿走。

我手里攥着钱走了。我早就盘算好了去向。我路过杜德斯库家门口时，还停下来休息了片刻，然后继续赶路。出城时，我在城边的最后一个铺子里买了一个热面包和一小纸袋的李子。我边吃边上了路。我一直沿着大路走，有时也抄小路，一直走到天黑。

瞧，我到家了。妈妈正在灶堂里做晚饭。

妈妈康复之后，又生了一个小孩——就是我妹妹斯泰拉。妈妈正把她搂在怀里给她吃奶。

"晚上好，妈妈。"

"你回来了？"

“是，我回来了。”

“走路来的？”

“是的。”

“你饿了吧？”

“饿了。”

“等会儿大家都回来后再一起吃饭。”

我等呀，等呀，终于把家人等齐了。家里人看到我回来并不以为然。他们对我突然地离家出走也从不感到奇怪。我去过什么地方，干了些什么，为什么又回来同他们争饭吃，这些他们连问都不问一声。

我摘下挂在墙上的破羊皮大衣，披在身上，走出屋门，到院子的角落里去睡觉。我困得要死，简直像从来没睡过觉一样。我一连睡了好几个小时才醒。

微风吹得树叶沙沙作响，场院里那棵伴随着我长大的白杨树不见了。我是亲眼看着那棵小白杨树苗长成参天大树的。此刻，我闭上两眼，渴望听到昔日白杨树叶的沙沙声。然而，我再也看不到它，也永远听不到它的树叶抖动的瑟瑟响声了。我眼前看到的只是天空中眨着眼睛的群星，而我的周围则是枝条长得弯弯曲曲、疙里疙瘩的洋槐树。外面潮湿的寒气袭人。这时，我把城里发生的一切早已忘得一干二净，我进入了梦乡。

八月中旬，麦子已经收割完毕，秋耕还没开始，玉米尚未长熟，村里正是农闲。

我现在有一百四十个列伊，我数好钱，用一块小手帕包上，揣进怀里，以防被人偷走。另外，也不能让家里人知道我有钱，不然他们都会跑来管我要。

再过一个月，城里的学校就开学了，我的理想就要实现了，用这一百四十个列伊，我可以足足生活七个月。我还要买书，做衣服，我自己会把一切都安排好的。

我要到图尔努去上学。在图尔努，没有人看见过我背伯尼格老板的小少爷的事。我手上的烫伤尽管依然存在，但新指甲已经长出来，原来的厚指甲被新指甲顶到了指甲尖儿上。我在皮革作坊那儿留下来的痕迹很快就要消失了。我那被烫伤的皮肤也会被新长出的皮肤所代替，从此再也看不到我身上的伤痕。

对，我现在想起了一件事，这件事发生在八月十五日的前一天。使我把这个日子记得牢的原因是：这一天，我家里吵翻了天，伊昂哥哥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第二天是圣马利亚节，也是妈妈的生日。可是，我哥哥心里想的不是妈妈，不是妈妈的生日。

圣马利亚节那一天，在图尔努城郊举行一年一度的盛大集市。小伙子和姑娘们一年到头盼的就是这一天，因为这是他们尽情狂欢的好机会，他们提前半年就打定主意要在集市上玩个痛快。半年之后，他们谈论的内容还是离不开集市上的那些所见所闻。

看来，我姐姐丽察也沉不住气了！她好像也要去赶集，她长大了。我的姐妹中，就数她长得又矮又胖。今年春天，

她开始跳霍拉舞。现在，一到星期天，她就和小伙子们一起上山玩。我哥哥比她早一年，他是去年开始跳霍拉舞的。不管是小伙子，还是大姑娘，只要一开始跳霍拉舞，就可以单独去图尔努赶集，如愿以偿。

我的最小的妹妹埃莉萨贝塔，到处求爷爷告奶奶地央求：

“哥哥，给我买个石头娃娃回来！姐姐，你也给我带个石头娃娃回来吧！”

我弟弟斯特凡不要娃娃，他自己会做玩具。他夹着一根树枝当马骑，在他看来，这根树枝就是一匹鼻子里喷着火的小马驹。树枝尖上还拴着一块从垃圾堆里拣来的破布，这是一面军队的旧团旗。夏天，战士们曾在附近进行过演习。斯特凡和他的小伙伴们玩打仗，他不需要玩具，他要的是别的东西。

“哥哥，给我买块乳酪回来。”

所谓乳酪，实际上就是一种面团。先把面粉煮成糊状，然后凉凉凝固，再撒上点糖便成。这种乳酪是甜的。以前，从城里来的保加利亚人和土耳其人沿街叫卖饮料时，他们也卖乳酪。战争期间，闹起了霍乱，这些保加利亚人和土耳其人小贩都死了。从此，乳酪便成了孩子们甜蜜的回忆。他们想吃乳酪，要乳酪。斯特凡也要乳酪，可他压根儿就没见过乳酪是什么样儿。

我哥哥伊昂和姐姐丽察想要钱去赶集。于是，他们俩便在我身边转来转去。

“达里耶，你这次从城里来没带回一个子？”

“一分钱也没有。”

我横下一条心，决不给他们半分钱。既然他们需要钱，那就让他们自己去搞。他们不再向我伸手要钱了，伊昂哥哥厌恶地看着我，说：

“吝啬鬼！像克尔洛曼村的老太婆①一样吝啬！”

丽察姐姐更是不怀好意，她久久地盯着我，特别是盯着我的两只脚。她打量着我的左脚，目不转睛地看着我那个残废了的发紫的脚指头，然后咬牙切齿地冲着我说出了两个字：“瘸子！”

要是我以前听到她这样说，那肯定会像刀割一样难受。可现在，我不在乎了，她说她的，我已习以为常。

“骂也没有用，反正你没捞到钱。”

“那么说，你有钱？”

“我没钱，不过，就是有钱也不给你。”

她丧气地走了。

不知他们怎么转变的，到了晚上，他们的气都消了。原来他们早就搞到了赶集的钱。后来我才知道，他们为了弄到两个列伊，曾给希尔布克神父收了两个星期的玉米！一张去图尔努的往返火车票需要九十个巴尼。这样他们每个人还剩下一个列伊零十个巴尼的零花钱。反正钱多钱少都得花光！

---

① 指达里耶的外祖母。

我没有借给他们钱，为此他们决不会饶恕我。他们庆幸自己有了钱，但不会饶恕我。他们盯着我，狠不得用柳条抽我，用棍子打我，他们就是这样敌视我。

我姐姐丽察和哥哥伊昂，还有大半个村子的人，更确切地说，全村的人都沸腾起来了。明天就去图尔努赶集，他们非去不可！当然，能够去成的只是一部分人。

只有我表哥尼古拉·迪莫泽尔的老婆波莉娜表嫂没有心思去赶集。前两年，每次她都和我表哥一起去赶集。现在，她去不成了，因为我表哥尼古拉浑身冰凉僵直，喉头肿胀，病得卧床不起。

妈妈对我说：

“你表哥尼古拉今天早上死了！”

“怎么死的？”

“中毒死的。”

我表哥尼古拉·迪莫泽尔娶的老婆是城里人，他让她穿好的，自己穿得也很讲究。表哥在临街盖了一所房子，并且把房子转到了表嫂的名下。一天，表嫂对表哥说：

“尼古拉，你得把房子转到我的名下。不然，万一你有个三长二短，留下我两手空空怎么办。你把我从城里娶到这儿来，在乡下安家落户，我跟你苦了一辈子，你总得给我留下点什么。”

尼古拉表哥能不满足她的要求吗？他要满足她的愿望。于是，表哥把花钱买下的这块地皮，还有花钱盖起的这所

房子一起转到了表嫂的名下。表嫂安慰表哥说：

“尼古拉，你放心，我们相处得很好，我不会把你从家里赶出去的！”

的确，他们相处得不错；表嫂一声令下，表哥绝对服从。这样相处能有不和吗？表嫂每天吃好的，穿的是连衣裙、皮鞋。

我表哥有个坏习惯，是因为嗓子的缘故才染上这个坏习惯的。其实，别人也有这个坏习惯，尤其是村里的官吏、豪绅差不多都有。我表哥长年累月在邮局工作，有时觉得嗓子发痒。嗓子一发痒，你还能趴在桌子上，埋在纸堆里写字吗？尤其当你觉得疲倦时，你能不想办法去润润嗓子吗？

只要表哥的嗓子一发痒——尼古拉·迪莫泽尔表哥的嗓子又特别容易痒——他便离开办公室，对邮差沃伊库说：

“要是总局来电话找我，你替我接一下。”

邮政总局设在图尔努。凡是当兵的小伙子们寄回来的家信，以及银行发来的催交款子的通知单，都是通过这个总局送下来。

一条公路横穿过村子，跨过公路，便是托马·奥克的酒馆。这个整日营业的酒馆恰好同表哥的房子隔路相望。

“托马，来杯酒！”

表哥接过酒，一饮而尽，接着又要了一杯，他顿时精神大振。

“托马，再来一杯。”

喝完酒，表哥歪戴着帽子回到办公室，继续算帐，抄写。不一会儿，他的嗓子又发痒了。于是，他又穿过马路钻进酒馆。起初，他进酒馆的次数并不多：上午去两三次，下午去两三次，晚上睡觉之前去一次。后来，下酒馆的次数越来越多了，每小时去一次，尔后，每半小时去一次；进而一刻钟就去一次。薪水就算是高吧，可每天都拿出一点去喝酒，钱照样不够花。坏习惯一经养成，就很难改掉！当然，你要是有决心的话，也能改掉。但是，看来我表哥尼古拉·迪莫泽尔是改不掉了。

一天，检查员来查表哥的帐。

“打开钱柜。”

尼古拉·迪莫泽尔表哥打开了钱柜。

“点钱！”

表哥点了钱。

“打开烟草库。”

表哥打开烟草库，把库里的烟草一包一包地数了一遍。

“打开邮票和汇票的柜子。”

检查员一下子发现了破绽，他一笔一笔地算着帐。表哥站在一旁，看到自己的事已败露，吓得浑身发抖。这个检查员本是他的老朋友。

“你瞧，老兄，我并不想整你，可是帐上少了两千零二十二个列伊。限你在两天之内，想法把钱如数地交回来。不然的话，我不得不打报告要求以贪污公款罪把你逮捕。”

尼古拉·迪莫泽尔表哥对检查员万分感谢。他来到他

妻子波莉娜的房间，向她说明了事情的经过。

"什么？你干吗要对我说这些？你要我怎么办？你把钱都喝了酒，你自己想法去还钱吧！"

"我无处可求。当初买地皮时，我借了钱。后来盖房，我又借了钱。欠下的债我都还了。的确，现在地皮、房子都立在你的名下，但是，这些都是靠我的劳动所得置下的。现在，这么一大宗款子，我到哪儿去搞？你想想：两千零二十二个列伊，谁能轻意地借给我这么多钱！眼前，我们只有一条出路，我到银行去借钱，而你，作为房产主，把房子抵押出去替我担保。"

"把我的房子抵押出去？！要我为了你而抵押出自己的房子？！怎么？我疯了？这事，我根本就用不着考虑。你自己去想办法吧！"

"波莉娜，你再考虑一下，明天再谈。"

波莉娜表嫂早想好了，但她的主意不是抵押自己的房子，而是另有打算。她换上紧身的连衣裙，穿上皮鞋，梳好头，戴上小圆帽，手里挎上提包，一副官太太的神气，朝车站扭搭着走去。她来到车站，买了票，乘火车到卢什那儿的亲戚家去了。

尼古拉·迪莫泽尔表哥捺住性子等着她回来。每隔一小时就来一趟火车，可他总是等个空。尼古拉表哥等不下去了，他来到酒馆。当时，并没有人知道他的心事。他像往常一样，要了一大杯酒，喝了一杯又一杯。直到喝够了之后，才回到邮局。这时，检查员早就走了，他正在车站

那儿的酒馆里大吃大喝呢。

尼古拉·迪莫泽尔表哥在厨房里找来找去，最后在柜子里的大碗里找到了一大块烧碱。他把烧碱放进杯子里，用水化开。接着，他便抽起烟来，抽了一支又一支，抽了一包又一包，就这样，表哥一直抽到天亮。

以前，任何人休想进他家的门。波莉娜太太整天拿着棍子守在门口，你要是不把鞋子上的土拍干净，休想进她的屋。如今，表哥抽了一夜的烟，地毯上扔满了烟头，足有几百个，有的抽了一半，有的只抽了几口。他把烟头扔在地上，用脚轻轻地一踩了事。未熄灭的烟头慢慢燃着了地毯。天亮时，表哥喝下了烧碱。看来，他并没有马上死去，他是难受得折腾了好久之后才死的。

邮差进来时，发现他身子蜷缩着死在床上，他紧握的两手捂在脸上。文书给波莉娜表嫂打了电话，把详情告诉了她。

"尼古拉昨天夜里服毒死了。"文书对着电话筒说。

"什么？他死了？"波莉娜太太在电话里问。

"很遗憾，但我不得不告诉你，他死了。"

"很好。"

波莉娜表嫂挂了电话。尼古拉·迪莫泽尔表哥的妈妈——我的姨妈迪娜闻讯赶来。她看见死去的儿子牙床肿胀，便号啕大哭，对着院子里的大树喊着：

"我用什么埋我的儿子？用什么埋我的儿子？"

"老婆子，别哭了！我来埋他。"刚从城里赶来的波莉

娜说。

“我是把波莉娜看透了，”妈妈说，“等明后天我们埋了你表哥之后，她准会来卖房子。”

我沿着铁路朝车站走去。黄昏时，有一趟去多瑙河方向的火车。我买了车票，火车进站后，我便上了车。村文书和本村的教师也上了车，他们也去赶集。圣马利亚节这一天，车上拥挤不堪，因为大家都想抢在赶着马车去的农民之前，好好观赏晚上的集市情景。他们上车后打开报纸，边读边交谈。

“我们又要打仗了。”

他们对此很高兴。孰不知三年前，人们曾应召跨过多瑙河奔赴战场，霍乱正是从那边带过来的。人们为什么对遭受过的不幸竟如此健忘！

满载旅客的火车飞奔着，现在已不像白天那么酷热。很久不下雨了，田野干旱缺雨。放眼望去是一片无边无际晒焦了的黄色庄稼地。近处的玉米地里玉米长得高过人；远处的棵棵槐树掠过眼帘。

一片树林展现在眼前，那是瑟卡拉村的一座地主庄园，它是地主在一九〇七年起义时烧毁的庄园的废墟上建造起来的一座新庄园。

火车飞奔着，太阳就要落山了。放眼朝多瑙河的方向望去，河那边贫瘠的土地上净是碎石。我们乘坐的火车从一片葡萄园旁飞驰而过。

我踩在车厢入口的阶梯上，手紧紧地抓着铁把手。只要我两脚滑下去，我肯定会脱手，那我就会摔下去，说不定要折断脖子。我时时刻刻在使劲地抓着把手。

第十七章　大集市

以前我也赶过集。那时我们家有牛，每逢圣马利亚节，爸爸常套上车，把我们几个孩子全拉上去赶集。

我觉得今年的集格外热闹引人。瞧，有马戏，演马戏的棚子周围还有几处玩杂耍、拉洋片的。演马戏的棚子前面有几条摇动的小船，旁边是转马。

我的钱从一只手里换到另一只手里，不敢轻易出手。

我要去看看拉洋片的。不过，我得先买点东西。我已学会了讨价还价，谁也甭想骗我。

进了店铺，我想买一顶合适的帽子。我连续看了三十三顶，最后选出一顶放在一旁。接着我挑了一件灰色的毛法兰绒上衣，又挑了一条黑色的厚呢裤，厚得一把抓不透。我还挑了一双皮靴。我拿起鞋，先用手指，后用石头敲了敲鞋底，生怕是马粪纸做的。

掌柜的惊奇地看着我，问：

“你老敲鞋底干啥？”

“我怕上你的当。”

“我不会骗你的。”

他在一边说个不停，几乎把我说服了。

我们开始讲价钱。这个顾客稀少的商店的老板看看我挑的那一堆我所渴望已久的破烂，说我得付给他四十六个列伊。这时，我盯住他的眼睛，狠狠地瞪着他，说：

“这一堆破烂顶多值十六个列伊。”

老板一听，便把东西抱起来，转身要放回货架上。

“如果你想多要钱，”我毫不在乎地说，“顶多给你加一个列伊。”

老板骂起娘来。他骂我，我也骂他。我还挽起袖子，只要他敢动手，我也决不饶他。我知道他不过是骂骂而已，不会动手打我。他抱着那一堆破烂，说：

“三十六个列伊，行不行？”

“我说过了，十六个列伊，这儿的铺子多得是！”

“二十六个列伊，要不要？”

“我说了，十六个列伊。”

现在，我成了买主。我跟莫察图老板多少学了点讨价还价的本事。他曾为了一个小钱，讨价还价了一个小时。

我也从“天使”商店学会了讨价还价的本领。这家商店专卖死人的装裹——马粪纸底的羊皮鞋、霉透了的破棉衣、纸礼帽，就连这些破烂他卖得也很贵。从斜眼伯尼格那儿我也学了几手。他卖的绳子都是湿的，湿绳子放在秤上称，当然压分量。再说，他的秤本来就不准，他还在卖重油用的小陶罐底上涂上胶泥，分量很重，可油很少。反正商人

总是绞尽脑汁糊弄你，把你的钱白白地骗走。但他们也不是用缺斤少两的办法骗所有的人，只是坑那些穷光蛋。我是个穷光蛋，所以我得提防着点儿。

“给二十个列伊，去你妈的吧。”

“给你十八个列伊，不卖拉倒。”

“那么，给十九个列伊。”

“不行。”

“那就算了。”

我转身走出商店去看马戏。马戏团的舞台上，走出来几个吹鼓手。其中一个是大花脸，身穿花里胡哨的衣服，边打鼓边做鬼脸；另一个使劲地吹着长号，几乎要把脖子胀破。这时，忽然从他身边钻出一个小丑，他穿着短裙子，脚上登着一双红皮靴，头上插着羽毛，还做了两个假乳房，他的脸也化了装。

这时，有人拽了一下我的胳膊，我转过身。

“掌柜的请你去一下。”

“哪个掌柜的？”

其实，我是明知故问。

“就是你刚才要买东西的那个店的。”

“他想干吗？”

“要你把东西买下来。”

“我明天再去买。”

他推着我朝前走，我就任他推。我表面装作对他那堆破烂不感兴趣，其实心里是乐意让他推我走。

老板看了看我，然后点了点头说：

"掏十八个列伊，拿走吧！"

"十八个列伊？我说过，十六个列伊。"

"你说的是十八个列伊，妈的！"

"先生，我说的是十六个列伊。再说，这当儿，我怎么知道你是否把我挑的那些东西换了？"

"给你，再检查一遍。"

我一件一件地查看着，他确实没更换。我掏出一个二十列伊的硬币递给他，说：

"再找给我四个列伊。"

"我就找给你三个列伊，妈的！"

我把买好的东西卷了卷，夹在胳肢窝底下走出了店门。我来到演马戏的棚子旁边的篱笆跟前，把身上的破衣服换下来。现在我完全变成另一个人。因为没穿袜子，皮鞋有点磨脚，真疼！没关系，脚上的红肿会消失的。我把脱下的臭衣服用一张旧报纸裹起来。

买火车票和买衣服，我一共花了十七个列伊九十个巴尼。因此，我还有两个列伊十个巴尼可以拿去玩玩。我骑了转马，然后又上了船，就像坐在一个大摇篮里一样，摇来摇去。我走进演马戏的棚子看马戏，看见有两个巨人正在摔跤，难道他们是真摔跤吗？他们简直不像是人，活像是野兽。他们的头剃得精光，脖子短粗，额头狭窄，大圆脸上有一双小眼睛。他们个个膀大腰圆，长着两条大粗腿，浑身上下涂满了油。他们都想揪住对方，可是自己手上也沾

了油，因此，手滑得谁也揪不住谁。这两个人很像是双胞胎，也许就是双胞胎，这只有天晓得。他们一个穿着红裤衩；另一个穿着蓝裤衩。他们一进一退，你来我往，空斗一场。就他们长得这身肥肉，即使是有意无意地被击中了，也不会感到疼痛。他们像两只公鸡相斗一样，斗来斗去，个个汗流浃背，最后拦腰扭在一起僵持不动。

春天，当大地复苏而尚未春耕时，或立秋之后，但秋雨未落时，小伙子们脱去外衣，便在村边上真的摔起跤来，弱者定被摺倒在地。一些男孩子们也学起摔跤，比个高低。

摔跤的巨人退场了，随后出场的是三个侏儒：一男一女和一个小孩。他们个个相貌丑陋，脑袋大得出奇。他们表演的节目是耍盘子，但毫不精彩。我虽然不是矮子，但也会玩这种杂耍。这是我几年前从部队里的一个男孩子那儿学会的。当时，一个步兵团在公墓北边的野地里安营扎寨；一队骑兵在邻村斯特尼库茨的河滩地上驻扎下来。这些士兵们整整操练了一个夏天。秋天，他们举行了演习。晚上，每当身着军服的军官们围坐在桌旁用餐时，团的军乐队便奏起军乐。但是，士兵们却只能蹲在草地上吃饭，而且没有勺子用，也没有人给他们奏乐。只有死了士兵时——士兵死亡是常有的事，或是病死或是战死——军队的神父才站在死者头前给他们唱挽歌。死去的士兵都是赤身裸体地被埋葬。

“为什么赤身裸体？”

“因为衣服是团里的。”

除了士兵外，军队里还有一批童子军。他们帮着烧火做饭，干些洗碗、扫地等杂活。大一点的便学演奏各种乐器。谁要是调皮捣蛋，就会挨鞭子抽，棍子揍。这份苦真够他们受的！军队里的这碗饭可也真不好吃！这帮孩子都是些无依无靠的孤儿。他们常和我们一起玩，教我们变戏法。其中有一个动作敏捷的小胖子，他会玩飞刀，而且刀法很准。他也会耍盘子，大小盘子都会耍。他还会魔术。他把球塞进嘴里，吞下去，然后从头上或耳朵里把球掏出来，而不是从肚子里掏出来。他叫阿利库·阿利普，他本来是杂技团里的演员。一天夜里，他因为饿得受不了，便从杂技团里逃出来，跑到军队里想混口饱饭吃。谁曾想过，逃出了狼群，又落入了虎口。我和他成了好朋友。我和他一起玩时，我也学会了魔术，尽管学得并不怎么好，可我的确学会了。

集市上该看的我都看了。虽然没看到什么了不起的东西，可我总是玩了个够。我还买了东西，吃了几个热炸糕，还喝了一杯黄色的柠檬汽水。

咳！柠檬汽水热呼呼的，真不如喝凉水！但是，在集市上，渴死你，也甭想找到凉水喝。

出于好奇心，我去看了德国马戏。这个马戏团里有一头大象，一头长颈鹿，两头斑马和一头耷拉着耳朵、掉了牙的老狮子。

小丑们翻着筋斗，口里还不停地嘀咕着德语，我一点儿也听不懂。观众中有的大笑；有的想笑却没笑出声；还

有的故作姿态，假捧场。

我呢，特别喜欢马技。有四匹雪白的小马拉着一辆小车走上台。马车夫挥舞着鞭子，小马没系缰绳，完全听口令停驶。

小马不系缰绳拉着小车，并根据口令完成一些动作，这种表演我在家乡也曾看过。在富尔古列什蒂村的伊波利特·德勒库列亚地主家也看见过。像他这样的人世上真少有，人们都说他聪明过人，但没有把心用在正道上。不知他从哪儿搞来六匹小花马，然后把它们套在一辆黄色车轮的小马车上。但是，马没有缰绳，马笼头闪闪发光。地主伊波利特经常坐着马车在庄园和克尔默楚伊河谷的村庄里飞驰而过，但马车从未离开过正道，也从未翻进道沟和山涧。这几匹小马就象驯服的奴隶一样，任凭地主伊波利特·德勒库列亚使唤。在路上，地主要是发现哪个妇女不向他鞠躬致意，或哪个男人不向他脱帽行礼时，他便大吼大叫起来，并停下马车，气冲冲地走过去给他几个嘴巴，狠揍一顿，被打的人倒在地上，半天也爬不起来。

“过来！”伊波利特·德勒库列亚地主喊着，“把这一个列伊拿走。你要是告我凭白无故地打了你，法官最多也不过罚我一个列伊。拿去吧，我自己罚自己。”

一些败类或是饿急了眼的家伙收下他的施舍。但是，那些天不怕地不怕的好汉却回答说：

“老地主，把列伊拿回去吧，我不需要。”

伊波利特·德勒库列亚愣了，他急忙跳上马车，扬鞭打马，马车便一溜烟地跑掉了。

地主家的院子里有许多大铁笼子，笼子里养着各种猴子；紫毛狼，有的是从树林里捕来的，有的是从山里捉来的；还有从深山里捕来的黄毛熊；以及从天南海北弄来的各种野兽和从未见过的长着五光十色羽毛的鸟类。

在玻璃橱窗里养着各种蛇，还有碗口粗、几丈长的大蟒。这些蛇由专人喂养。地主的家业都花在这些飞禽走兽的身上，到头来他同样是丧身于这些野兽之口——他被一种叫蝰蛇的毒蛇咬死了。

乐队奏个不停，奏的是华尔兹舞曲。几匹小马抬起两只前腿，像地主乡绅们那样凑在一起呲牙咧嘴地转着圈跳起华尔兹舞。

快到午夜的时候，集市上突然呈现一片阴沉可怕的气氛，乌云密布，附近的树林黑压压的；起风了，售货棚子上的小旗迎风招展，说不定要来一场暴风雨呢。

我觉得此刻使集市变得可怕的并非即将来临的风暴。

在各家酒店里，乐队疯狂地演奏着，而且还有从外地请来的特邀歌手。在一家酒馆里，我看见了阿尔维察姐夫他喝得半醉，一个歌女偎依在他的怀里。小提琴拉得走了调。歌女对着姐夫唱起来：

看呀，看呀，奶妈在亲他，

是他脱掉了我的上衣，

又撩起了我的裙子。……

我姐姐埃万吉莉娜真是不幸！从她出嫁那一天起，不顺心的事就接踵而至。其实，我姐姐并不愿意嫁给阿尔维察，只不过是因为看中了他的房子、土地和耕牛。另外，也看中了他的仪表人材。但是，后来阿尔维察当了兵，在军队里学坏了。复活节时，姐夫回了家。当时，他上身穿着镶红边的黑色军服，扣着曲线型的长扣子；下身穿着镶大黑条的裤子；脚登锃亮的带黄铜扣子的大皮靴，走起路来咔咔响。他嘴上留着稀稀拉拉的黑山羊胡，一双炯炯有神的黑眼睛。女人们开始向他卖弄风骚，他便到库库列亚萨鬼混起来。在军队里，他给军官当勤务兵，很快就学会了玩牌，还染上酗酒的恶习。回家后，他卖了牛，把卖牛的钱拿去给他的情妇买衣服穿，剩下的拿去同文书和神父赌博。我姐姐呢，一个孩子还不会走，可又怀上了一个。她脸色苍白，经常被打得鼻青脸肿。姐夫当兵后，把地也给卖了。这次，他一到家就卖东西，把钱挥霍光了又走。后来，他吵着要卖姐姐的那块地，还动手打了姐姐。

如今，他跟希腊人搞起了倒卖小麦、玉米和油菜籽的生意来。埃万吉莉娜姐姐把几个孩子都扔给了我们。这几个孩子早上来，晚上才走，一天三顿饭都在我家吃。

歌女的鼻子是扁的，是以前被拳头打扁的。她那油头粉面闪闪发光。

我挤进情绪激昂的人群中，人们议论着午夜时刻就要

宣布动员令，我们参战了。从尼科波里要炮轰我们的城市。但有些人说，保加利亚人没有射程那么远的大炮。可人们还是纷纷逃离城镇。

家里人都已入睡，我只好躺在院子里的桑树底下，等待着午夜的来临。

瞧，午夜到了。

好象三年前的情景又在重演。

当当的钟声突然划破了夜间的寂静，教堂里的钟在疯狂地敲着。老号手迪什也在黑夜中吹起了号角。

全村都从睡梦中醒来，妇女们冲出屋门，哭喊声连天。

“唉呀，约安，你又要走了！”

爸爸到村公所去了一趟，然后回到家中。

“要打仗了。”爸爸对我们说。

我们家里有谁能去打仗？谁也去不了。爸爸年纪太大；我哥哥伊昂又太小。我们的姐夫和堂兄弟们以及其他亲戚家的人，这次又得被应征入伍了。

家家户户灯火通明，院落里哭声不绝。

黑夜过去，没有风暴，也没掉一滴雨点儿。蔚蓝的天空，万里无云。

车站上停满了空载的货车厢。

我的眼睛比三年前睁得更大，直直地望着经过长途跋涉疲惫不堪的人群。宪兵们扛着枪跟在后面。人们面色如土，两眼射出愤怒的目光。衣衫褴褛、彻夜未眠的矮胖妇女

背着干粮袋，拉着孩子，前来给自己的男人送行。这些女人顾不上自己的孩子，两眼直勾勾地盯着开赴前线的男人。

"柯定，你得回来呀！"

"斯特凡，你得回来呀！"

男人们一言不发，就像嘴上贴了封条一样。

有人说：

"往后的日子可难啦！"

衣不遮体的蒂察·乌耶也在应征之列。他光着脚，头戴一顶破帽子，向车站进发。正像报纸上宣传的那样，他要为保卫国土和扩大疆域而战。脸色蜡黄的吉克·斯特内斯库文书对那些去送死的人们说：

"小伙子们，你们奔赴战场，你们是幸福的，光荣的。战争一结束，国家就会变得更大和更富强！"

"那我们能得到什么好处？"

"什么好处？蒂察·乌耶，你这是提的什么问题？"

"我提的是一个普通问题，但你是不会回答的。"

"我们什么也得不到，得到的只有痛苦而已。"

"还有去送死。"奥韦代尼亚补充说。

"那么你说，文书，地主家里的管家们为什么不同我们一起去上战场？"茨格默耶问道。

"他们怎么能去？他们要是走了，谁还给地主管庄园、料理葡萄园和家务？"

"那么，商人和有钱人家的儿子们为什么也留了下来？"

"我说，帕里克，他们嘛，他们都是些能写会算的人，所

以，他们都就地入编。因为县里、团部也有抄抄写写的差事，这些事也得有人干。”

“还是年轻的铁匠说得对，穷人打仗，富人发财。”

“胡说！铁匠满脑袋里净是坏水。从现在起，他别再想打铁了。让他也打仗去！”

弗洛雷亚大婶拉着她的两个女孩多布拉和杜米特拉跟在蒂察·乌耶的后面。这两个丫头长大了，她们俩都长着一双蓝眼睛(她们俩是在一个晴朗的夏天在地里出生的)，梳着两条黄得像麦秸一样的小辫。蒂察·乌耶家的院子里还有三个小丫头，而弗洛雷亚大婶的肚子里又怀上了。她面如土色，肚子鼓得很大。

“亲爱的蒂察，你可给我写信呀！”

“我会给你写信的，弗洛雷亚。”

“我亲爱的蒂察，你要活着回来！为了孩子，为了这几个丫头，你得活着回来！”

“弗洛雷亚，我会回来的。为了孩子，也为了你，我会回来的。也许，还为了别的什么。”

一批又一批应征入伍的人朝车站进发，然后乘火车开赴前线。

我表哥杜米特鲁·帕里克和奥韦代尼亚、皮奇克、利什库·斯腾加丘、乌杜杜伊等人走在一起，他们的老婆和孩子们紧紧跟在后面。

“弟兄们，我们都编在一个团里了，我们要互相照顾，家里有很多活等着我们干呢！”

“我们要是回不来怎么办？”

“我们当中总会有人能回来的！”

此刻，大家都有一个想法：现在可不好过啦。

天晴气朗，但是燥热异常。

空火车开来，又满载着人开走。

一天，两天，三天过去了。车站上还是人挤人。

真是运不尽的人！人一集中到这儿，马上就运走；人刚走，马上就又挤满了，人好像是从地里冒出来似的。

在开赴战场的男人中，我也看到了我表哥扬库。他完全是个成年人了，风吹日晒使他的脸变得黝黑，但他的身体还是那么瘦弱。

“扬库哥哥，你也上前线？”

“我也去！”

“你好像说过，你是免服兵役的。”

“是的。我原是免役的，但后来当官的又变了卦，是村里的那帮家伙鼓捣的。我是当局的眼中钉、肉中刺。达里耶，仗要打很久，越打越艰难，许多人要死在战场上。幸好你还不够年龄，不然……”

不然，我也要和别人一起跳上火车奔赴前线。

许多人要在这场战争中牺牲。我表哥扬库说打仗要死人的时候，并没有想到自己会死。但是，过了一个星期，他刚到战场就牺牲了。

一天，车站上格外凄凉。村子里男人寥寥无几，多半

是妇女、老人和孩子。但是，酒馆老板布丘克的儿子和磨房主古纳·伊索佩斯库的儿子米鲁察——米鲁察·伊索佩斯库大学毕业，他因病免服兵役——却留在村里。

村长、文书和神父没有走，税务员也没有走，因为战时更需要向村民收税。

经常听人说：仗是用钱打的。但是，用谁的钱呢？当然是用百姓的钱。税要由留下的妇女交了。

战场离此地很远。然而，我们仍能听到从多瑙河那边不时传来的阵阵炮声。弹皮掉在城里，烧着了房屋，惊慌失措的市民们离开了城市拥向农村。

我们村里也来了不少市民。村里家家户户都住进了城里来的人。天一亮，他们就聚集在村公所门前，开始叫苦，抱怨买不到面包，晚上睡在席子上挨跳蚤咬。每个逃难的人都骂他们的农民房东，骂世上的农民不会盖舒适的住房。城里来的太太们让村里的妇女给她们洗脏衣服。说来也怪，尽管人们都说这些衣服是绸缎做的，但这些缺吃少穿的赤脚女人却不愿意动手给她们洗，这可惹火了那些避难的太太们。

"我跟你说，亲爱的，这些人真不要脸！我对房东老婆伊琳卡说：'给我洗洗衣服。'你猜她说什么？她说：'太太，你自己洗吧，你的手放进洗衣盆里也不会掉下一个指头。'"

"仗一打，人们的精神也反常了，不然的话……"

村民们开始收到从前线寄来的明信片。字写得很潦草看得出是用膝盖垫着写的。街坊邻居都把收到的明信片拿

来，让我给他们念。

我念着明信片，内容大体都一样："你们要把牛喂好，不能把牛丢了。我们继续挺进。"

开始，前方来的信都是这个内容。后来，信的内容就变了："我们在撤退。"

我军打败了敌军，把他们赶走。敌军被迫从山路撤往阿尔迪亚尔。后来，又从其它战场上调来了德国部队，他们有机枪、大炮和飞机，战局急转直下。在战场上光靠硬拼，再勇敢也要倒下。我们的战士一批一批地战死在沙场。某某某牺牲的消息不断传到村里。死了丈夫的女人戴上孝，房子的正面墙上还挂上一块黑纱；她们本想到墓上去痛哭一场，但坟墓又在遥远的陌生之地。神父把一口口没有尸体的棺材埋进公墓，棺材里只放着死者的旧衣服——大衣、帽子、靴子、衬衣，按人体的部位放好。坟墓上竖起了一个新做的小十字架。

"这回逢年过节时，我有地方去烧香，也有地方去哭了。"

每到星期日早晨，太阳未升起之前，寡妇们手里拿着破瓦罐，怀里抱着香去上坟。她们把香点着，跪在死者旁边，哭得死去活来。整个村庄都可闻到香的味道，阵阵微风把香味吹向四面八方，吹干了人们的泪水。

"德国人为什么要打我们？"

"我们没有武器。"

"各村都来了残废军人，他们中有瞎子，跛子，还有缺

胳膊少腿的人。"

"古察·罗舒失去了双手，他血流不止，疼痛难忍。他曾央求士兵把他一枪打死，省得活受罪。"

"扬昂·乌杜杜伊的肚子开了花，他用手捂着肚子猛跑，后来一下子摔在地上再也没爬起来。"

"达维德·弗洛罗尤的七个儿子，到现在为止已经死了四个。现在还难说上帝会不会开恩，至少让一个能活着回来。"

"达维德·弗洛罗尤在他的破毡帽上缝了四块黑布补丁，他没有嚎啕大哭，也没有喊叫。他毫无表情。他手里紧紧地握着一根大棒，好像在寻找一个要狠狠打击的罪魁祸手。

一个没有胳膊的残废军人进了村，人们立刻围上去。

"仗还要打很久。"他说，"直到把德国人打败为止。他们的武器很厉害，尤其是机枪和大炮。我们的人碰上机关枪，就像麦子碰上割麦机一样，纷纷倒下。我们没有武器，我们是赤手空拳开上战场的。我们有的只是破烂枪支，弹药和给养也不足，饥寒交迫。这哪像是去打仗，简直是把我们当成牲畜一样送往屠宰场。"

"战争将会改变世界的面貌，"杜米特鲁·杜米特列斯库说，"很多皇帝将要倒下，而人民大众将要站起来。"

县官也躲到我们村来避难。那个德国马戏团也遭了殃，脸上化了装的男女演员都被关进监狱。大象和长颈鹿交给了奥尔特河谷的一个农民照管。副县长阿利斯塔尔·门祖

把那几匹马牵走套在自己的车上。他怕这几匹马不听他使唤，便给它们系上缰绳。马要是在路上撒欢儿，他就用鞭子狠抽马背。

这个乳臭未干的副县长阿利斯塔尔·门祖逛遍了克尔默楚伊地区所有的村落，各村都成立了征用所。所有的马都集中到一个大马棚，准备送往城里，然后再从城里送往战场去拉大炮、弹药和驮其它用品。人在战场上丧命，牲口也死在战场。因为，枪子是不长眼睛的，大炮也一样。马不够用了，就用牛来补充。

“战士们想吃什么呢？他们想吃肉！”

“战士们连牲畜肉也吃不上，因为牲畜肉都让军官食堂给扣下了！”

谁家要是有三件衬衣，就得拿出两件来给士兵。有两件的，拿出一件。要是只有一件衬衣，那就拿不出来了，可村里大多数人就只有一件衬衣。

“你们都是穷光蛋！就是因为你们好吃懒做才这么穷！”

阿利斯塔尔·门祖看到人们如此贫困，他感到奇怪，而且还骂人。

“但是，地主为前线捐献了什么东西？”

“格拉西耶捐了什么东西？”

“戈古·克里斯托福尔捐了什么东西？”

“皮耶纳鲁上校捐了什么？”

“斯塔泰·潘塔齐捐了什么？”

人们大胆地追问他。

副县长阿利斯塔尔·门祖回答说：

“他们也得交东西，你们别担心，我不会放过他们。”

“什么时候？”

“以后，到更困难的时候再向他们要。现在先收你们的。往后，我也要牵走他们的牛，让他们交衣服和粮食，这你们不用担心。”

“先生，到头来战争的负担还是落到我们头上。”

“难道你们不代表国家？”

“让我们知道这点就好。”

现在，人们的脸色更加阴沉。有消息说，防线已被冲垮，战场上尸横遍野，敌军离我们越来越近。也有人说，德国人无法渡过奥尔特河。

奥尔特河！我多么熟悉的河呀！住在那一带的人都是骑马过河。这点小小的障碍怎能挡住敌军前进？

敌军离我们越来越近，已经到了我们县的北部。电话线已被切断，明天敌军就会到我们这儿来，明天！

一列满载伤兵的火车在车站上停了一夜，至今尚未开走。我们用小车把伤员拉进村里。我们把教室的桌椅搬出来，在屋地上铺上麦秸，让伤员们躺在上面。这些伤员浑身泥垢，胡子老长，浑身是伤，而且伤势很重。甘丘医生和卫生员奇雷什都上了前线。我们这些孩子们便担负起他们的责任。我们挨户要来一些干净衣服，然后撕成条，给他们洗净伤口，包扎起来。

伤员就由我们照顾了。很多伤员眼看就要死去，他们只想喝水，不停地要水喝。他们干裂的嘴唇肿得老厚，没有一丝血色。嘴唇已经化脓，他们有气无力地说着：水，水！

这就是战争！现在我才知道什么是战争。现在我们大家都明白了什么是战争！

每天早上我们都要抬走几个死人。我们把死人抬上车，拉到墓地埋掉。要是五个人一起死，我们就挖一个大坑，把他们埋在一起。要是死去十二个，我们就挖一个能埋下十二个人的大坑。

神父为死者做了祈祷。

我们埋这些人都没有用棺材。

堂守策尔科伏尼克摇着香炉，炉里的香火早就没有了，只是做个样子而已。

文书负责给死者领取烈士证，并把他们登记在村公所的登记簿上。

有的伤员躺着断了气；有的疼得打滚。死者中有的面容安详，好像死给他带来了生前梦寐以求的安宁；也有的眉头紧皱，呲牙咧嘴，像是同死魔战斗了很久似的。

“德国兵已经到了道洛班楚。他们也会开到我们这儿来。”

早晨空气湿润，雾气沉沉。今天是斋戒日。从夜里开始就是圣诞节了。

我在街上溜达了一会儿，然后回家吃饭。爸爸还没回来，我们得等他回来才能吃饭。我的肚子饿得直叫唤。因为过节，哥哥杀了一只老母鸡，妈妈把鸡炖熟，还做了玉米糕。鸡肉配玉米糕，真是好吃极了。我拿了一条鸡腿，津津有味地啃起来。

这时，爸爸回来了。他说：

"德国兵来了。他们就在山岗上。"

我们拥出门外，跑到铁道上。只见四个德国骑兵探头探脑地走过来，离我们不过几十米远。他们头戴钢盔，骑着高头大马，马尾一直拖到地上。

车站上还有我们的士兵，我们听到几声枪响。德军巡逻队调转马头，飞快驰去。其中一个德国兵的闪闪发亮的钢盔掉在地上，我们赶快跑过去从野地里拣起来。我们像是拣了宝贝似的用棍子挑着钢盔回了村。吉克·斯特内斯库文书急忙跑来，软硬兼施地劝我们不要得罪敌人，并从我们手里夺走了钢盔。

"德国兵今晚就进村，他们会找来要钢盔的，我们应该还给他们。"

文书擦了擦钢盔上的土，把它送到村公所去。

一小时之后，一个德国兵进了村子南口，然后一头扎进学校。这时街上人很多，一下子就把这个德国兵围起来。村里人惊奇地打量着他。他骑的是一匹大黄马，马嘴吐着白沫，鼻孔冒着白气，浑身打颤。这个德国骑兵肤色黝黑，长着一双绿眼睛，胡子拉碴，黄胡子像马鬃一样，显得老

气横秋。他右手握着一支上了膛的手枪，马不停地打战，大胡子德国骑兵也抖得像筛糠。

一个城里人从人群中走出来。他叫斯皮鲁·里加，在海关做事。他因为会讲德语，便同这个德国兵搭讪起来。

这个德国兵想知道村里到底还有没有罗马尼亚军队。

"没有了。"

这个德国兵见学校里住着伤员，便问这些伤员有没有武器。

"没有武器。"

托米察·布尔布克神父端来一杯牛奶递给这个德国兵。这个德国兵不敢喝，他怕牛奶里有毒药。布尔布克神父喝了一口，他的胡子上都沾上了牛奶。德国兵确信牛奶里没有毒后，便端起杯子喝了下去。喝完又要了一杯。喝了第二杯，又要了第三杯。喝完后，他调转马头，一溜烟地跑了。

没过多久，骑兵巡逻队便到了车站。一队德国兵随后占领了村庄。

我们爬上栅栏看德国兵。这些德国兵有年纪大的，但挺硬朗；也有年轻的，像我哥哥伊昂那么大，比我高一些。中年的德国兵都已战死了。敌兵显得疲惫不堪，胡子拉碴，脸色发黄，无精打采，死气沉沉。浑身溅满了泥浆的高大战马，经过长途跋涉后，显得腿软无力。军官命令士兵们下马，并把马拴在木桩上，然后去面包房烧火做饭。一群德国兵闯进农民的院子捉鸡、逮鸭。母鸡吓得咯咯乱叫，鸭

子也嘎嘎叫个不停。乡亲们像大地一样沉默不语；村长、神父和文书在德国兵进村时就告诉德军指挥官说，他们在这儿不会遇到麻烦。副县长阿利斯塔尔·门祖已朝摩尔多瓦方向逃跑了。听说我们那些饥寒交迫的士兵也连夜朝那个方向撤退了。

“在摩尔多瓦的门户地区将要打一场大仗。”

“俄国军队同我们的部队站在一起。”

“德国兵要吃败仗了。”

“这回我们可要收拾他们了。”

来到农村避难的那些会讲德语的城里人壮起了胆子。他们走上街头同德国军官和德国士兵攀谈起来。

德国兵捧着钢盔像饿狼一样呷着分给他们的热汤。他们喝一口汤，吃一口面包。喝完汤后，又到大锅里舀，每次都把钢盔盛得满满的。锅里煮的是刚宰的鸡、鸭、鹅和野鸡的大杂烩汤。凡是能从各家各户抢到的，都扔进锅里。敌兵还从河滩水磨房那儿牵来四条牛。他们把牛宰了，就在大道上剥了皮，然后把肉割下装上车。牛是斯特尼库茨村的两个赤脚穷苦人的。这两个穷苦人束手无策，站在一边掉眼泪。他们哭得比死了自己的孩子还伤心：

“我的牛！没有牛，我可怎么活呀！”

这天夜里，村里没有一个人睡觉。

德国兵把马牵进村民的院子。他们在地上铺上干草，在马旁边露宿。

巡逻队在街上巡逻，有哨兵站岗。

这天夜里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缭绕的白云低得几乎挨了地。初冬的浓雾淹没了田野，也吞噬了村庄。

天亮时下了霜，风吹散了浓雾。东方升起了太阳。残冬的太阳显得那么小，发出昏黄的冷光。

已是中午时分。

德国兵离开村庄向东开拔。他们路过车站时，砸开货车抢走了他们需要的东西。

他们一走，人们便拥向火车，有的拿走毯子，有的搬走桌椅，有的抄走窗帘或盘子。火车上装的净是奥尔特一带城里人的财物。这几列火车本应开往北部的摩尔多瓦，但由于科斯代什蒂车站站长的失职，却把车发到多瑙河方向来了。

我哥哥伊昂坐立不安。他知道车站上有几节车厢装的是酒。德国兵砸了火车，现在，一些妇女、孩子们正把整瓶的酒一筐一筐地往自己家里扛呢。

妈妈挡着门说：

"谁要出屋的话，就从我身上踩过去。"

哥哥本想跳窗子出去，但窗子上钉着铁条。

那些德国兵走后第二天，村里又来了一辆又一辆的马车。车上挤满了德国兵和奥地利兵——都是些残兵败将。一部分德国兵住进了宪兵所。宪兵队长尼古拉·米耶卢谢尔既怕敌兵又怕百姓，他昨天夜里已逃之夭夭。还有一部分德国兵挤到车站去过夜。

人们不再害怕了。因为，这些奥地利兵会讲罗马尼亚语。他们是阿尔迪亚尔一带的人，对村民们亲热随和。他们当中，有一些人缺胳膊少腿，成了残废，对战争甚为不满。他们说："皇帝让我们来打仗，这些王公贵族真不是东西！"

奥匈帝国部队的头子是甘兹。他原是阿拉德市的白铁匠。此时，他几乎忘记了自己是军人，便给村民们修起炉灶补起烟囱来。

和德国兵却不好打交道。德国兵的指挥官叫鲁道夫·巴格尔，是个身材高大的年轻小伙子。他嘴上留着小山羊胡，红头发，满脸涨得通红。他在村里跑来跑去。他是专管这些残兵的，因为他在战斗中有些神经失常。巴格尔也会讲罗马尼亚语。

后来，人们得知，战争爆发前，巴格尔曾在皮特什蒂的一家糖果点心铺当过学徒。

没过多久，巴格尔的士兵们便开始征用村民们的粮食、牲畜和衣物。

后来，他们又搜罗各家的铜制锅盆，还有教堂里的钟，然后送到兵工厂去制造弹壳。

战场离我们这儿越来越远了，现在已经转移到布加勒斯特那边。听说德国军队停在离这儿很远的摩尔多瓦地区，土耳其军队也来和德国军队一起打我们的军队。

"土耳其人又来干啥？"人们都这样问。

文书回答说：

“同德国人狼狈为奸，他们合伙打我们和俄国人。”

现在，村里看到的报纸和以前的不同了——报纸的一面是罗文，另一面是德文。文书拿着报纸在村公所门前大声地念着，好让大家都能听见。

报纸上写的净是关于德国军队在前线节节胜利的消息，也登了一些吹捧那些为德国效劳的地主的文章。对这些事，我似懂非懂，可我还是听着，并竭力去理解它。

学校里剩下来的伤病员被抬走送往城里，途中死了几个。学校里到处血迹斑斑。

村里传说：特纳瑟的儿子拉杜昨天夜里回来了；丘克的儿子回来了；伯多伊的儿子也回来了。每天夜里都有人从部队里开小差回来，他们回家后躲进地窖或玉米仓里。

这些情况很快传到鲁道夫·巴格尔的耳朵里。可能是文书斯特内斯库，或是图尔努镇上那个卖香肠的德国老婆米察告的密。这个逃到村里避难的女人从德国兵一来就给德军指挥官当了翻译。

于是，鲁道夫·巴格尔下了一道命令：“所有回来的逃兵，下午四点必须到村公所来报到，一个也不能少。我们不想把任何人送进集中营，我们只想知道到底有多少逃兵。我们只是统计一下，把他们当成俘虏看待，每天晚上都要查对一下，不让他们重返战场。不到者，其全家人都要坐牢。”

老号手迪什沿街吹着号，让人们到村公所去集合。文书传着德国人的命令。

有人大声喊着；共有八十六个逃兵，村里共有八十六个人厌战离队。

“你们为什么逃了回来？”

“我们打仗打腻了。当官的整天用棍子打我们，军官们硬逼着我们向前冲，不然就放冷枪打死我们。”

“这不可能是真的。”刚被鲁道夫·巴格尔指定的村长、本村大财主米列亚·萨乌说，“你们就是应该为国尽忠。”

“别说什么为国尽忠的大话啦。村长，你当过兵没有？”住在村口的没胳膊的残废军人质问村长。

“我没当过兵，因为我是独生子。我家有地，地也要有人种。”

“那你就住嘴。你倒应该去当兵打仗，保卫你的地。我为什么去打仗？为了养活这些寄生虫？”

“你这个没胳膊的傢伙，就你事多。闹暴动时，我就看透了你。”

“看透了就好。”

米列亚·萨乌是个矮胖子，长得很敦实。他良田百顷，牲畜成群。他请求德国人让他当村长并发誓要给德国人管好征用物资。天一黑，他把那些丈夫去打仗的年轻妇女叫到村公所，把她们都奸污了。

谁任他摆布，他就免去谁的征用物资。这家伙只让他老婆生了一个孩子——为的是防止他死后，把他的财产分成两份。

村里的比沃拉鲁老师原是退伍军官。现在，他撇家舍业地上了前线。

这位老师的妻子是奥尔特地区一个小业主的女儿，长得十分漂亮。她有文化，在布加勒斯特的一所寄宿学校读过书，她也会讲德语。起初，甘兹先生看上了她，后来又被鲁道夫·巴格尔霸占去。甘兹背上挨了几鞭子，于是他只好知难而退，把这个女人拱手让给了巴格尔。鲁道夫·巴格尔每天晚上到比沃拉鲁老师家去寻欢作乐，一混就是一夜。有时，人们夜里还看见这位老师的妻子身穿军服，挽着这个德国兵头目的胳膊在街上散步。村里的女人碰上他们时便扭过身去，骂她不要脸。

现在，大家得知比沃拉鲁老师当了俘虏，被关在德国。每星期都有他寄来的长信，但是，信封已被撕开。文书、邮递员都看他的信，连村公所的小办事员也看他的信，所以全村人都知道信的内容。

比沃拉鲁老师病了，已不抱返回家园的希望。信中，他提醒妻子好好照顾孩子。还说，过去他是如何深深地爱她，现在依然如故，要她在家安分守己。

酒店老板托马·奥克落得家破人亡。托马老板刚死不几天，她的老婆也随后归了西天。接着，他的几个大一些的女儿进城当了妓女。剩下的几个小女孩被外婆家领走。现在，酒店里里外外都由米蒂克当家。

“米蒂克，你还到城里去念书吗？”

“爸爸一死，我怎么还能去？！”

“那你准备怎么办？

“把家里的东西卖掉，买吃的。”

“以后呢？”

“以后再说。”

他卖掉了家里的玉米仓、面柜，还卖掉了院子里的木柴。但他没卖牲口，因为酒店老板压根儿就没买过牲口。他每天都吃一只烤鸡，他自己杀，自己煺毛，自己在火上烤。鸡吃光了，就卖酒店的百叶窗，后来又卖酒店的门。最后，家中已无物可卖，因为，柜台、酒瓶、酒杯、还有地窖里的大酒桶，他早已卖光。他把他爸爸妈妈的旧衣服拿去送给吉卜赛人，有谁买痨病鬼穿过的衣服呢？

“米蒂克，你还有吃的吗？”

“没吃的了。”

“你想不想去做工？”

“我不想去，我不做工。我爸爸是酒店老板，我是酒店老板的儿子。我怎么能去做工？”

“那你怎么办？”

“我忍饥挨饿。”

“到什么时候？”

“到死。”

我原以为他在开玩笑，想不到米蒂克说的是实话。秋去冬来，现在正值隆冬。在一间无门无窗的小屋里，米蒂克·奥克在地上铺了一筐麦秸，然后平躺在上面等死。他身边放着一个小水罐，他不时地端起小水罐送到嘴边，喝

口水又放回原处。然后又一动不动地躺着。消息传开了：奥克的儿子米蒂克躺在床上等死。

“米蒂克病了？”

“没有，他没有病，但他非要死不可。”

“他没病怎么会死？”

“唉，他不吃不喝，这样下去总有一天要断气的。酒店老板的儿子会饿死的。”

“这可不行，他是人呀！我们哪能让他饿死？！”

村里粮食匮乏，德国兵把能吃的都搜罗走了。他们到处翻箱倒柜，掘地刨坑，寻找百姓埋藏的粮食。这一点村民们早就预料到了，大家早把玉米藏在最保险的地方，德国兵连一颗玉米粒也没找到。乡亲们，特别是街坊邻居们想方设法搞了一点面包、奶酪和玉米糕。他们把这仅有的一点吃的送到酒店老板的家里，拿给躺在一间空旷小屋里的米蒂克吃。

“米蒂克，你瞧，我给你拿面包来了。”

米蒂克躺着一动不动，他有气无力地说：

“帕纳伊特大叔，我不吃，我不要别人的恩赐。”

“米蒂克，你这样下去要饿死的。”

“这正是我所要求的。”

“你不后悔吗？”

“不后悔。既然爸爸死了，我也要死。我不想让别人看见我做工。我是酒店老板的儿子，懂吗？我怎么能去做工？我怎么能去给别人干活？我能下地让风吹雨打吗？不能！我

要等死。”

又进来一个妇女看望米蒂克。

“米蒂克，瞧，我给你带来一瓶牛奶和三个鸡蛋，还有一块玉米糕，吃吧，孩子。”

来给米蒂克·奥克送饭吃的是岑楚的遗孀。岑楚是全村最穷的人，他早就死了。

“谢谢大婶，我不吃，我想死。”

“你死吧，米蒂克。”

米蒂克已说不出话，他两眼无神，两颊塌陷。大家挤在门外瞧着他，久久地望着，毫无办法。几乎村里所有的人都来看过米蒂克，都给他送过吃的。有的人把面包、玉米糕扔在米蒂克身边的麦秸上，心想，他饿急了也许会改变主意吃一口。

他没有改变主意。现在他说话已很费劲，声音微弱得几乎听不清。

“米蒂克，你还是什么东西也不吃吗？”

“不吃。”

“米蒂克，你这样下去会死的！”

“我就是要死。”

他闭上眼，不想再和任何人讲话。三个星期了，这个酒店老板的儿子只是靠水充饥。严冬降临，寒气袭人，刺骨的寒风直吹进缺门少窗的小屋里，北风呼啸不止。

一天早晨，米蒂克死了，他的愿望实现了，安息吧！

“文书先生，米蒂克怎么处理？”

“你是说我的侄子？

米蒂克是文书的侄子。

“怎么处理？把他埋了。”

乡亲们从酒店的阁楼上找到几根布满灰尘的破木条，然后钉成一口棺材把他埋了。要是米蒂克早知道还有木条的话，他也会拿去卖的。入葬时，没举行任何仪式。

时间流逝，尽管日子难熬，但日月还是飞快地过去了，转眼之间又迎来了飞雪，而且雪下得很大。

德国兵发现了萨耶列村一个地主的粮仓，里面装满了粮食。鲁道夫·巴格尔下了命令：“明天早上套三百辆大车把小麦拉到车站去。”

文书指派了出公差的车子。从前方回来的逃兵准免出车；村里的财主买通了德国兵，他们也不出车。

那些在摩尔多瓦同德国兵打仗的罗军家属都被派了公差。

三百名妇女，有老有少，她们赶着车站在村外的雪地里，冻得直发抖。

文书点完名，长长的车队出发了。

一辆牛车爬上山岗，朝萨耶列进发，车轮在雪地上直打滑。

女人们弯腰把车轮下的雪块扒开，她们滑倒在地又站起来，女人们哭喊着，骂得像男人一样难听。

天气真冷啊！手和嘴都冻裂了。刺骨的寒风像鞭子一样抽在脸上，刺透了用破布裹着的每个脚趾。快走！快走！

此刻，文书、村长以及乡里的参事都到布丘克酒馆饮酒作乐，酒钱由免去公差的人支付。途经这里的鲁道夫·巴格尔也进去喝了几杯。

春天到了，马上就是复活节。我哥哥伊昂带了个消息回来。

他先告诉妈妈。

我们家出什么事了？

我们家兄弟姐妹共十一个：两个是爸爸前妻生的；妈妈带来了伊昂哥哥和埃万吉莉娜姐姐；其余的我们几个都是妈妈嫁给爸爸后生的。尽管如此，每当谈起格奥尔基哥哥或列亚娜姐姐——格奥尔基哥哥从小离开家出外读书，列亚娜姐姐嫁给了我家对面的丽莫安塔家——时，妈妈总是说："你爸爸的孩子"；但谈到伊昂哥哥或埃万吉莉娜姐姐时，从来都是一字一板地说："我的孩子。"

我们问妈妈：

"妈妈，只有他们俩才是你的孩子吗？我们是谁的孩子？"

"你们也是爸爸的孩子。"

爸爸有时也像男子汉那样发起火来。这时，妈妈威胁他说："我的大儿子长大娶媳妇之后，我就跟他去过。你过你的，你们过你们的。"

在妈妈生的这些男孩子中，她好像只把伊昂哥哥看成是她的儿子。以后只要妈妈和爸爸一闹翻，妈妈准会卷起铺

盖卷一走了之。

每当妈妈遇到不顺心的事的时候，妈妈总是想到这些。瞧，哥哥成亲的日子终于来到了。

"你想和谁结婚？"

"是斯特尼库茨村的。"

妈妈一听很不高兴。多年来，妈妈一心想让伊昂哥哥同隔壁扬库·班家的姑娘结婚。她有地，但是个齉鼻儿。

做妈妈的总想给自己的孩子娶个有地的媳妇。但是，有地的姑娘很少，要娶媳妇的小伙子又很多，而且，那几个有地的姑娘偏偏又都长得很丑。

妈妈的话，我哥哥听都不想听。

"你想娶谁？娶班家的？"

"她的嘴大，我不喜欢。"

"你找的那个姑娘长得怎么样？"

"你一看就知道了。"

"谁家的？"

"是塞尔维亚族的斯特尼克·萨弗图家的。"

斯特尼库茨是个新建起的村子，在奥米达北面，离克尔默楚伊很近。这个村里一半人是罗马尼亚族，一半是塞尔维亚族。村里一有人家时，塞尔维亚人便渡过多瑙河来此定居了。

塞尔维亚人长得矮小，肤色黝黑，至今未改变他们的装束。开始，他们对罗马尼亚语一窍不通，后来他们学会了。现在，他们罗马尼亚语讲得和本地人一样好。如果只

听讲话，不看装束，你根本就分不清他们是塞尔维亚人还是罗马尼亚人，但是，塞尔维亚人之间还是讲塞尔维亚语。

塞尔维亚人开始很长一段时间不同罗马尼亚人通婚。随着时间的推移，塞尔维亚族姑娘开始和罗马尼亚小伙子结婚，罗马尼亚小伙子便在塞尔维亚族里寻找自己的新娘。

"她有多少地？"

"我知道？你应该亲自去了解一下。"

"长得漂亮吗？"

"反正我喜欢。"

我哥哥长得细高挑，水蛇腰，脸上没有光泽，长着两只深陷的黑眼睛；他还留着一撮山羊胡，稀稀拉拉的胡须紧贴在嘴唇上，而他总喜欢把胡子卷得蓬松自然一些。

我们听到这个消息后，又高兴又不高兴。因为我们家又多了一个吃饭的。再说，哥哥和嫂嫂将在哪儿睡呢？

爸爸回答了这个问题。

"我们把这间屋子用薄墙隔开，这样，一间就成两间了。"

"你说她是谁家的姑娘？"

"是斯特尼克·萨弗图家的。"

"这倒是个能干的人。"爸爸发表了意见。"我认识他，他家一大堆孩子，日子过得很紧！"

我姐姐丽察也插了话：

"伊昂，你的那个塞尔维亚姑娘叫什么名字？"

"叫奥莲卡。但是，我们以后叫她莉娜。我现在就这么

叫她。”

没有人表示反对这门亲事，但也没有人表示要去看一看这个姑娘。爸爸妈妈是通情达理的人，他们不干涉孩子们的婚事。

“那么，你想什么时候把她领过来？”

“明天晚上。”

“你可以领她来，但是，婚礼我们不能大办。”

“我就要老婆。”哥哥说，“婚礼吆，以后再说。”

雪化了，天气一天天暖和起来。

融化的雪水，大地已无法吸收。雪水汇成涓涓细流，流进小河沟。田野里雾气腾腾。嫩草眼看着破土而出。

我们家的日子更困难了。粮仓露出底，面包少见，就连玉米糕也很难吃上。明天是哥哥娶亲的日子，无论如何也得搞到几簸箕面粉。

刚过中午，妈妈便捉了几只鸡，让哥哥宰了，煺毛开膛，扔进锅里炖上。

面包炉的火点着了。鼓鼓的面包外面结了一层焦黄的硬壳。

屋子里散发着热面包的香味，也闻到炖鸡的香味。

天黑了。今天是星期六。

我们家门口挤满了青年男女，有些人还进了院子。阿文德雷亚腋下夹着单簧管，准备演奏。

伊昂哥哥手拉着新娘高高兴兴地从铁道那边走进院子，我们这些孩子和爸爸一下子把他俩围起来。

"欢迎你！"

妈妈站在门槛上迎接他们。妈妈一见到姑娘，愣住了。伊昂哥哥拉着的这个姑娘又矮又胖，活像个大圆筒。她脸上唯一闪光的是那双眯缝眼。她直愣愣地盯着我们傻笑，嘴里露出一口雪白的小牙。她一点也不害羞。

妈妈肯定不喜欢这个姑娘，但还是伸出手对她说：

"晚上好，姑娘。请进吧！"

姑娘进来了。

这时，阿文德雷亚在院子里吹起单簧管，参加婚礼的人开始跳起霍拉舞。

要是从前的话，哥哥的朋友们准会掏出手枪朝天放。可现在不行，德国人来之前，村里的人就把猎枪、手枪都埋了起来。

我家的马拴在铁道那边收完庄稼的地里。马正在地里寻草吃。爸爸拿起斧头朝马走去，他要把拴马的橛子换个地方。两条狼狗跟在爸爸后面。

我家养着两条狼狗：一条是白色的，另一条是黑色的。两条狗的屁股上都有几撮咖啡色的毛。

自从哥哥长大后，我们就在院子里养了狗。冬天，我们带着狼狗在雪地里追捕野兔。有时，我们碰上运气还能捕两只野兔回来；有时，则两手空空，白跑一趟。

秋天，黄毛兔在枯黄的乱草中窜来窜去，狼狗跟踪而上，追呀，赶呀，最后追上，扑过去叼住野兔的脖子。我

们骑马跟在狼狗的后面，看到狗捕住兔子时，我们便跳下马，把快被咬死的野兔从狗嘴中揪出来，装进口袋。然后，继续带着活泼敏捷的狼狗向前跑。冬天，我们带着狼狗在雪地里猎取野兔，那就更开心了。白茫茫的原野一望无际，湛蓝色的天空洁净透明，太阳射出寒气逼人的白光。这时，在地里活蹦乱跳的野兔，要是又肥又大的话，它一跑就会深陷在松软的白雪里跑不动，那时你上去逮它就易如反掌了。

正值隆冬。有一天，天气突然变暖了。下了一天的蒙蒙细雨，屋檐上滴水不断。随后，风向突变，乱起刺骨的寒风。滴水成凌，树木受冻，地上铺上一层薄冰。这时，我们照样骑上马，带上狼狗到邻村很远的地里去逮大鸨。肥胖的大鸨翅膀上冻了一层冰飞不起来，跑来跑去，但还是逃不出狼狗的追捕。要是捕住一只大鸨，足够我们连吃三天。现在，大鸨已很少见。没有窝的到处乱窜的野狼更是稀少，因为野地都已开成良田。只是在多瑙河和奥尔特河沿岸还保留着片片树丛，在阿登卡塔地方还有一小块树林。

秃鹫也消失了，剩下的只有苍鹰和雀鹰。在伯内亚萨的一个山洞里，还有几只狐狸。从这儿的山洞里，有三小股清澈冰凉的泉水缓缓流出。如果没有狗看家，狐狸夜间也会出来到各家的鸡窝里偷鸡吃。有一次，我哥哥和阿文德雷亚就在山洞里捉到过一只狐狸。那天，我们在地里放完马之后，便到泉水边去饮马。这时，天已经黑了。笔直的小河岸旁有许多清楚可见的小洞。我们亲眼看见一只尾

巴红似火的狐狸穿过乱草，钻进深深的洞里。

“你们在这儿盯着！”阿文德雷亚对我们说，“我回家去一趟，马上就来。”

不一会儿，他骑着马回来了，手里拿着一串辣椒。我们把枯草、干牛粪堆在洞口，点着火，然后把辣椒扔进火堆。浓浓的黑烟向深深的洞里滚去，辣椒的烟味钻进狐狸的鼻孔。狐狸憋来憋去，后来实在呛得憋不住了，便踉踉跄跄地窜出洞口。我们早就举着棒子等着它呢，于是一棒子便把它打死在地上。狐狸皮叫阿文德雷亚拿到城里集上卖了。说不定裁缝师傅会用这张狐皮做条大衣领或皮手笼呢。

那些由于战争爆发、图尔努城遭到多瑙河上的奥地利炮艇轰击而到农村来避难的城里人，现在都穿上了用羊羔皮或狐狸皮做领子的大衣；他们的太太怕冻了手，还戴狐皮手套。一张狐狸皮只能做一副皮手套和一个大衣领，可见狐狸稀少并不奇怪。这些从城里逃到乡下的人成群地站在街上，聚在村公所门前，或是在酒馆里闲聊。他们还在伦卡大婶的咖啡馆里赌钱。大雪纷纷，封住了道路。村里的穷苦人都被动员去清除铁路上的积雪。他们的眉毛上结满了冰花。因为铁路中断，火车停驶，上边传下命令，要村民们拿着铁锹到铁路上去铲雪，以便恢复铁路运输。

“村长，干吗不让那些城里人来铲雪？”

“怎么能让他们来？城里人到底是城里人，他们身体单薄，肩不能挑担，手又不会拿铁锹。”

"他们就会吃！"

村民们开始憎恨这些逃难的城里人，不停地咒骂他们。当初，这些城里人说德国兵永远不会踏进我们的国土；现在，他们又改变了态度，说德国兵从此再也不会离开我们的国土，因为，德国兵是无敌的。

我们对他们说的这些话都不以为然。我的布尔杜列亚爷爷已经老迈年高，但他耳不聋，眼不花，只是走路时要拄着拐棍。现在他还是那样爱和大姑娘小媳妇们开玩笑。他有三十几个孙子和重孙子上了前线。在村公所，爷爷实在憋不住了，便搭话说：

"这些德国兵总有一天夜里要走的。在那天晚上你还会看到他们在村里巡逻，但第二天早上，你就会发现德国兵溜走了。反正我们不会想念他们。"

原来的副县长阿利斯塔尔·门祖已经到摩尔多瓦，但谁也不知道他是死还是活。如今接替他的是米蒂策·博索安克。他个子矮小，满脸麻子，走起路来外八字。他曾是个军官，被德国兵俘虏关进集中营后，便叛变投敌了。他家住在图尔努城。他的父亲是个卖印花布的小商贩。他对人们说：

"乡亲们，德国人可厉害了，他们可是真厉害！他们将会征服全世界。最好我们还是同他们合作，成为盟友，亲密无间，同舟共济！"

"就像骑士与马那样亲密无间。"布尔杜列亚爷爷笑着说，"我们是马，德国人是骑马的。我们在下面，德国人骑

在上面。但是，这种状况长不了。总有一天马会尥起蹶子把骑士摔在沟里，折断他的脖子。谁能比土耳其人更厉害？可基督教徒们还是把他们赶出了巴尔干。哼！德国人长不了！”

“那会儿，俄国人有力量。”逃到村里来避难的城里教师兰贝·里戈波尔插话说，“现在，俄国兵造反，推翻了沙皇，士兵不想再打仗了。他们分了地主的地，他们闹革命了。”

“他们做得对。德国兵以后也会厌恶打仗，不愿意欺压别人的。”村里一个独臂人说。他的一个肩膀只挂着一只空衣袖。

副县长发火了。

“你活够了，是吧？我真想把你关起来。”

“副县长先生，你用这种办法是挡不住俄国的革命洪流的。”

人们得知，摩尔多瓦的边界那边，整个俄国都闹起了革命，皇帝被拉下宝座，地主逃跑了，革命在继续。人们全知道了，并密切地注视着事态的发展。

近来，我看到的德国兵一个个都精疲力尽，忧心忡忡。开往摩尔多瓦前线去的士兵都是老的老，小的小。同不久前从这里经过的士兵相比，老兵更老，小兵更小了。

“德国人的日子好过吗？”

“好过？俗话说，秋后的蚂蚱蹦不了几天了！”

今年冬天，我们没有带狼狗去捕取猎物，谁也没有这

样做，因为德国兵不允许这样做。

爸爸给马换了一个地方，让它继续在地里吃草。尔后，爸爸拿着斧头沿小路下坡回家。

一段时间以来，大家都害怕德军指挥所的士兵弗兰茨。他刚来我们这儿不久。他个子矮小，黄头发，满脸胡子，右腿有点跛。他总是使人害怕。他走在街上，像是醉鬼一样，碰上谁，就抡起皮鞭没头没脑地抽过去。

这个德军指挥所的士兵很苦恼：他弟兄五个都上了前线，至今已死了四个，就剩下他一个没死。可是他的右腿已经受了伤，成了残废。他盼着早日复员回老家。但是，在德国兵员日益减少的情况下，他仍被派到前线作战。

苦恼的弗兰茨常常朝别人撒气，他用德语骂人，骂个不停。到村里来避难的那些懂德国话的城里人说，他连他们的皇帝都骂。因为皇帝发动了战争，给大家带来灾难。你信吗？

弗兰茨沿街走过来，正好碰上了爸爸。他大喊大叫，扬起皮鞭就朝爸爸身上抽。他揪着爸爸的胳膊，把爸爸扭送到指挥所。

跳霍拉舞的人散了，小伙子和姑娘们像一群受了惊的麻雀一样跑开了。

我挤出人群，跟在弗兰茨的后面。

弗兰茨把爸爸带到指挥所。我站在门口，听见弗兰茨抽打爸爸的鞭子声。

这个德国兵弗兰茨原以为爸爸手里拿着斧头是要对他

行凶。

我走进指挥所，向那个卖过香肠的女翻译官说明了情况。

那个女翻译官向德国兵解释，但这个德国兵从不轻意认错。他很难相信自己会无故打人。

爸爸的脸上净是鲜血，他走近女翻译官，求她：

“米察太太，救救我吧。回头我送你一只鹅。”

“给我送两只。”

“好，送两只。”

女翻译官站在爸爸和德国人之间，哇啦哇啦地说着。

最后，德国人软下来，打了个手势让我们回家。

我们朝家走去。爸爸走在前面，我跟在后面。

婚礼散了，家里只剩下三四个邻居。

我哥哥伊昂很生气，他连着喝了几杯李子酒。他喝得脸通红，两眼冒着火花，气得在屋子里转来转去。

“我去宰了他。”

哥哥不停地骂着。

“你还是消消气吧。”爸爸对哥哥说，“你最多能打死他们一两个。最后，还得让德国兵掏枪打死你。那值得吗?!”

爸爸擦掉脸上的血迹，妈妈在爸爸脸上的那条很深的伤口上撒上面粉。

邻居们都走了，只剩下我们自家人。我们睡在里屋，哥哥和新娘睡在外屋。

“祝他们幸福!”

窗外一片漆黑。

漆黑的夜，伸手不见五指。

第二天早晨，弗兰茨来到我家。我家的两条狗在院子里的草堆上卧着，弗兰茨走过去开枪把狗打死。我们走出屋门看时，狗还在蹬腿。爸爸和伊昂哥哥气得浑身哆嗦，要冲过去揍弗兰茨，妈妈哭着拦住了他们。

弗兰茨整天在村子里转，他见狗就打。他下令把打死的狗送到学校。我们也把我家的两条死狗用钩子拖着，送到了学校。

弗兰茨把村里的两个吉卜赛人布祖里克和万察叫来，让他们给狗剥皮开膛。

铁匠万察的老婆格拉迪娜急忙跑去找副县长。

"别让我男人干那种缺德事。求求你，老爷，给我男人说说情吧！"

"德国指挥所的命令就是圣旨。"

布祖里克和万察开始剥狗皮。他们在剥下的狗皮上撒了些盐，然后吊在绳子上晒，最后把狗埋了。但是，对人们来说，麻烦并没有过去，更大的灾难还在后面。

河边磨房里的磨好久不转动了。

"这个村里有谁会做肥皂？"巴格尔问。

"女人们都会做。"村长说。

于是，德国人从城里运来大锅，把水磨房改成了肥皂厂。人们被迫把狗捆起来送到磨房，然后用棍子打死。

打死的狗太多了，剥皮的人又太少，只有布祖里克和万察两个人剥皮，实在应付不了。

"把狗送到磨坊去，自己打死，自己剥皮。"德国人又下了新的命令。

现在，河滩上晒满了撒过盐的狗皮。人们架起大锅，点起火。锅烧开了，锅里熬的是狗油、灰碴和烧碱。村里的妇女们带着孩子来做肥皂，她们是出公差，用狗油给德国人做肥皂。她们一边干活，一边骂街。

"既然德国人到了用狗油制肥皂的地步，那么，他们以后也会吃狗肉的，他们的末日快到了。"

德国人把一盒一盒的鸡蛋运回德国老家，鸡蛋间的缝隙里塞满了小麦——每盒鸡蛋填了一碗小麦。

"他们那里准是在闹饥荒。"

"德国人很快就要吃败仗了。"

"县长先生，你和他们一起走吗？"

"我走？我干吗走？德国人呆在我们这儿永远不走了！"

副县长还是变得灰溜溜的。他对德国人必胜的信念产生了动摇，他一声不吭。但是，人们看得出，他很不自在六神无主。

整个克尔默楚伊河谷到处都可闻到熬狗油的味儿。制好的肥皂装进箱子，然后抬上火车，运往德国。火车开走后，还留下一股难闻的臭气。

村里有些妇女似乎完全忘掉了她们在前方打仗的男人，

自从动员打仗那天起，已经过去好几个月了。

从前方再没寄回一封信，家信也寄不到前方。

我们不断得到消息说，战役一个接一个。从村公所的报纸上我们还知道，在摩尔多瓦，人们不仅死于枪林弹雨之中，还丧身于伤寒病的袭击。

好在我们没去摩尔多瓦！

“伊丽亚娜，你想你的男人吗？”

“我想，纳耶大哥，可是没办法！”

“今晚我到你家去，咱俩聊聊。”

“来吧！”

先是一个女人的名声坏了，接着又听到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

米哈拉凯·加久大哥的妻子米特拉大嫂总是愁眉苦脸。

“米特拉，今晚我去你那儿好吗？”

“你别来，西米翁内斯库大哥，你要是来的话，我就让狗咬你。”

我和图尔图里克从北街的米特拉家门口路过。米特拉大嫂扒着栅栏问：

“达里耶，你到哪儿去？”

“到莫诺尤家去。”

“好孩子，回来时到我家来一下。”

“我和图尔图里克在一起怎么办？”

“那你们俩一块到我家来。”

莫诺尤家住在村北口，他上了前线，他的大儿子也上

了前线，家里只剩下他那个瞎眼的老婆和三个丫头。

我们到莫渃尤家，为的是和他家的姑娘闲谈、胡闹。

好事都让大小伙子干了，我们只是看着眼馋。

我们敲米特拉大嫂家的门，还没敲两下，就听见她说：

“我在这儿，孩子，你们快进来。”

她打开大门，把我们拉进麦秸堆里。

米特拉大嫂一下子把我搂在怀里，我们俩犹如从高山的顶峰跌入深渊一般。

我昏昏沉沉地站起来。接着，图尔图里克又做起那种见不得人的事来。

“明晚你们再来。”

“好，我们还来。”

“明晚多带几个人来。”

我们羞得满脸通红地走了，真害臊！

我家外屋用泥草墙隔成了两间房。门窗是我叔叔普列达做的。他说假话不脸红，我们都讨厌他。他撒谎是撒谎，但做起活来没说的。几天之内，伊昂哥哥的房子就搞好了，床也做得了。

我们家出现了不和。复活节那天夜里，我们家吵架了。

我们没有听到复活节的钟声，因为教堂里的钟早就没有了。这天晚上，我们睡得很早，到十一点来钟就醒了。我们点着灯，洗完脸，挑了一件好一些的衣服穿上，每个人

的怀里都揣上红鸡蛋，准备到教堂里吃完圣餐后，再敲碎红鸡蛋吃。

全家都醒了，大家洗完脸，穿好了衣服。

只有伊昂哥哥和莉娜嫂嫂睡得像死猪一样。我们敲门，把他们叫醒。

“你们不去教堂吗？”妈妈问。

我哥哥伊昂睡眼惺忪地说：

“妈妈，我们不去。”

“为什么不去？那我们把圣餐给你们带回来吃吧。”

哥哥披着衣服跨出门槛。

“不，妈妈，别给我们带回家来。我和莉娜都不吃复活节的圣餐。”

妈妈愣住了。

“你们怎么不吃圣餐？”

“是的，不吃。”

“这是为什么？”

“我们信基督复临教了。”

妈妈摇着头。

我们朝教堂走去。爸爸开玩笑地说：

“想不到我们家也会出异教徒。”爸爸对此毫不在乎。

布尔布克神父仍然不和我们讲话。他恨我们，一直恨我们。可是，有一天，他向爸爸作了想同我家和好的表示。那是四年前的事了。

那时，格奥尔基哥哥刚从神学院毕业。布尔布克神父和

邮局局长、尼古拉·迪莫泽尔表哥串通好，让表哥给我哥哥拍去一份电报。电报上写着："父亲病危。速回。"署名是妈妈。哥哥刚考完最后一门课还不到一小时，便收到了这份电报。哥哥马上向朋友借了钱，买了火车票，连夜赶回家来。到家敲门时，已是夜半三更。

爸爸睡眼惺忪地走出去开门。格奥尔基哥哥一进门把箱子扔在地上，骂了起来。这时，我困得睁不开眼。

格奥尔基哥哥个子高高的，长得很漂亮。他穿着一身黑衣服，裤子上镶着白边。他摘下帽子，摔在地上。他扯着嗓子吼叫起来：

"你们为什么嘲弄我？"

我们一听都愣了。

"谁嘲弄你，你说？"

格奥尔基哥哥从衣袋里掏出电报念着："父亲病危。速回。"

爸爸一听，笑了起来。

"我们谁也没给你拍电报。你看，我身体不是好好的吗？电报是你表哥尼古拉拍的，是他和神父布尔布克捣的鬼，我见他们在托马·奥克的酒馆里嘀咕过。"

神父有个该出嫁的大姑娘，叫杜米特拉。他非要把女儿嫁给我哥哥不可。

我哥哥伊昂·格奥尔基慢慢地消了气。他和爸爸商谈起来。

"既然我回来了，明天您就和我一起去找神父，跟他谈

谈我和杜米特拉的亲事。"

我们又挤了挤，给格奥尔基哥哥腾了块地方，让他挨墙睡下。

第二天早晨，我看见伊昂·格奥尔基哥哥从一个圆管里把红红的稠东西挤在一个小牙刷上，刷起牙来。这使我感到意外。

这个神学院毕业的学生，穿好衣服，刷掉身上的灰尘，便和爸爸一起去找尼古拉·迪莫泽尔表哥。

爸爸、哥哥和尼古拉·迪莫泽尔表哥在神父家吃了午饭，天黑时才回来。格奥尔基哥哥高兴得要死，他笑着给我们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我很喜欢神父。他像对待老朋友那样热情地接待了我们。神父的妻子还给我们准备了酒菜，让我们吃饭。我喝了李子酒，喝了鸡汤。后来，又端来烤肉，上了葡萄酒。我们都吃了，也都喝了。杜米特拉还做了点心。她脸蛋儿绯红，还擦着粉，在屋里转来转去。她羞得不敢张口吃饭，我看着她，装作对她有意思的样子。正餐快吃完时，杜米特拉便去准备甜食和咖啡。

"'布尔布克神父，你想让我当你的女婿？'

"'是的，孩子。'

"'就是说，你要把杜米特拉嫁给我。'

"'是的，格奥尔基，我是这样想的。'

"'布尔布克神父，除了杜米特拉，你还给我什么？'

"'给你一公顷土地，格奥尔基。'

"'布尔布克神父，这太少了。

"'格奥尔基，你说说看，你的胃口有多大？'

"'不算太大，神父。'

"'孩子，说具体点儿，到底有多大？'

"'神父，你给我……七公顷半地。'

"'好家伙，我总共才有十公顷。'

"'这我知道，神父。'

"'别的呢？'

"'别的吗，神父，再给我们盖幢新房，给几条耕牛和奶牛，几匹马，还有……把你管的教区交给我。'

"'那我还干什么，孩子？'

"'你当我的助理神父，布尔布克神父。'

"'喂，格奥尔基，你是不是在开玩笑？'

"'神父，我没有开玩笑。怎么，我是开玩笑的人吗？'

"'我说，格奥尔基，你是不是喝多了？'

"'也许吧，神父。不过，在我没来你家之前，我早就盘算好了。'

"我一点儿也不松口。神父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杜米特拉在外屋门口站着，她全听见了。她泪如泉涌，骂着走出院子，钻进池塘那边的槐树林哭起来。"

"后来，布尔布克神父怎么样了？"

"神父气得脸色发白。他看我要价那么高，吓坏了。后来，他又给我们喝了几杯葡萄酒，我们便告辞了。"

我的这个神学院毕业的哥哥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给

我看：

"瞧，我要娶的是这个姑娘，是莫丽瓦拉。"

我们看了照片。这个姑娘长着一双有神的大眼睛，长长的辫子垂过肩。

天黑时，哥哥返回布加勒斯特。不久，他来信说，他结婚了。此后，我们再也没见过他。他就住在普拉霍瓦县。

从那天起，布尔布克神父一直对我们憋着一肚子气。他并不像以前那样恨我们，也不骂我们。主显节时，他还是绕过我家，不到我家来洒圣水。对此，我们也习以为常了。

近几年，邻近的几个村子里出现了基督复临教教徒。

基督复临教是怎么回事？我们现在明白了。

我们村神父的儿子勉强从神学院毕了业，现在在瑟卡拉村当神父。我表哥拉乌尔·达乌代斯库在萨耶列村当了神父。如今，他和布尔布克神父的女儿杜米特拉结了婚。在伯内亚萨村当神父的是个中年人。他原是个本分人，但是，从去年起，他变了。

这几个村的神父都欺压百姓：洗礼费收得过多；办婚事和丧事时，费用更是贵得出奇。你要是不把钱交到神父手里，你就甭想把死人抬出家门。

人们聚在一起找神父讲理，并到城里去上告。主教把村民们训了一顿，说：

"你们要这些神父靠什么过活？他们的薪水少得可怜，他们也有他们的难处。你们愿意的话，就这样办；不愿意的话，就别再去教堂举行婚礼；生下孩子也别洗礼；死了人

也别找神父，埋掉拉倒！”

主教又高又胖，是多瑙河谷地塞亚卡地方的人。他总是坐着马车到教区来。主教一上车，车就朝下沉一大截，几乎把车轮子压瘪。马拉着车，跑不了几步就累得口吐白沫。主教的肚子大得像口锅。

人们愁眉苦脸地回到家中。

瑟卡拉村约维佐尤家的几个兄弟去年秋天离开家，到了布加勒斯特。今年春天，他们又回到村里。他们带回来几袋子书，并且把大家叫在一起，给大家讲述书里的内容。

“神父们在教堂里布道时讲的不对。”约维佐尤兄弟们说，“《圣经》里不是那样说的。”

他们接着把《圣经》里写的讲述给大家听。

现在，有些人连教堂的门也不进了。谁家生了孩子，也不再做洗礼。办红白喜事也不再请神父了。约维佐尤家的一个兄弟翻开《圣经》，给大家念着祈祷词。

这可吓坏了神父。新的教义很快传开了。每个村里足有一半人改信新教。

神父们向县长发出呼吁。县长命令宪兵把那些改信新教的人逮捕起来，送往城里。被捕的人中有男的，有女的，还有他们的孩子。县长冲着他们吼叫，但他们对自己的新的信仰却毫不动摇。

县长把他们关进地窖，只给水喝。人们在黑洞洞的地窖里，齐声唱着他们的教歌。

全城的人像看关在笼子里的狗熊一样把他们围起来，

听他们唱歌。

县长被迫连夜让卫兵把他们押进监狱里。

在监狱里，所有的犯人——包括偷鸡、偷马的小偷——接连好几天都和这些基督复临教教徒一起唱歌，歌声一直传到城里。最后，连狱长奥伊克也和犯人一起唱起来。

后来，县长又把他们押进宪兵司令部，昼夜拷打他们，但这些都无济于事。人们没有屈服，还是不愿意再信旧教。

这些人被折磨得不成样子。最后，他们被释放了。

县里的镇压并没把任何人吓倒，信基督复临教的人不断增加。

"基督复临教教徒想要干什么？"

"他们不想干什么。他们认为，不必为了死后进天堂而向神父纳贡，也用不着到教堂里向墙上画的那些死圣人祈祷。"

我嫂子莉娜出嫁前就想当基督复临教教徒。结婚后，她没同任何人商量，连我哥哥也没告诉，独自一人去了瑟卡拉，从此成了基督复临教教徒。

后来，伊昂哥哥也入了这个教派，但他们秘而不宣。在复活节那天夜里，他们才把这件事挑明。

妈妈总是想念常在油灯下读《圣经》的黄胡子外公。

妈妈不相信神父。她经常告诫我们，要我们这些孩子学好；不要偷东西；不要撒谎骗人；对别人的东西不要眼红。妈妈认为，上帝无处不在：人们呼吸的空气里，地上长的

野草中，天上的星星和太阳中都有上帝。

妈妈去教堂完全出于她那根深蒂固的习惯势力：既然祖祖辈辈都信奉上帝，那肯定没错。所以，伊昂哥哥叛教使妈妈大为伤心。

我们来到教堂门口，里面人很多，我们好不容易才挤了进去。

教堂里乱糟糟的像一窝蜂。吊灯上点着蜡烛，烧化的蜡液滴了我们一身。祭坛上放着几个香炉，香炉里冒出浓烟，发出醉人的香味。但是，由于人多拥挤，所以香气难以驱散信徒们身上的汗臭味儿。

弥撒尚未结束。堂守在祭坛屏风后面把面包掰成小块，放进盛酒的大碗里——这就是复活节吃的圣餐。

众人唱起复活节歌曲。神父说："耶稣复活了！"

众人齐声回答："他真是复活了！"

我无意中踩了别人的脚，别人也踩了我的脚，还在我的脚上碾了一下。

开始吃圣餐了。要想到祭坛前去吃堂守碗里的圣餐，就得先从神父面前走过去。神父把圣油涂在你的额头上，再让你吻一吻他的手指，然后你才能离开，挤到堂守跟前。这时，你可伸手拿起木勺，往碗里舀一勺圣餐，放进嘴里吃下去。只有吃下圣餐，你才有权从怀里掏出鸡蛋，把它敲碎，剥掉皮吃掉。

复活节的大斋节到此结束。

神父用一排桌子在教堂里拼成一条长长的通道。不在神父面前走过，不让他用圣油涂你的额头，你就别想吃上圣餐。

在神父身旁的桌子上有一本翻开的登记册。各家户主来到神父面前，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列伊交给堂守，这时，堂守便把他的名字记在登记册上。尔后，神父把圣油涂在他的额头上，然后才让他去吃圣餐。家长走在前面，家庭其他成员跟在后面。吃完圣餐后，便从侧门走出教堂。如果愿意的话，还可以同别人聊几句。要是不说话，你就可以赶紧回家填肚子。

我们拚命地朝神父面前挤。可是，你瞧，巴维尔·伊柳策带着老伴、儿子和儿媳妇却挤在我们的前面。巴维尔·伊柳策只有一个独生子，叫拉伊丘。他是在复活节的前几个星期结婚的。

巴维尔·伊柳策掏出一个列伊递给堂守，然后领着老伴走向祭坛。当巴维尔的儿子走过时，神父拦住他，说：

"交一个列伊！"

"我爸爸已经交了。"

"你也得交一个列伊，因为你也是一家之主。"

"我还没到教堂举行结婚仪式，神父。明年再交。"

"那我就不让你过去吃圣餐。"

"神父，我没有钱，以后再给你。"

"得了，我了解你们，你们都是些强盗。你们现在不给钱，以后休想再进教堂的门。你说明年给，谁知道你明年

是死还是活。"

"神父，我没钱。"

"没钱，那就不让你吃圣餐。"

小伙子搓着手，不知如何是好。神父当众出了他的丑。人们等急了，直往前推他。

"神父，让他过去吧！天马上就亮了。算了吧，他以后会给你钱的。"

我们站在爸爸身后，他气极了，转身对我们说：

"要是神父这样对待我的话，我就把他打倒在地，并指着圣餐说：'去你妈的圣餐吧！'"

人们又朝神父大声喊起来：

"神父，让他吃圣餐吧！"

神父恼火了。

"他妈的！你们叫什么？！我就不放你们进去吃圣餐！我也不给你们涂圣油。"

他转身对一个唱诗班的说：

"拉泽尔，把圣餐端到祭坛后面去，把门关上。他们不给钱，我就不给他们做弥撒。"

人群中一阵骚乱，边骂边像潮水一样往前拥去。

神父很厉害，他只身堵住了通往祭坛的入口。他一只手举着十字架，另一只手举着圣油罐。

"你们要是再胡闹下去，我就诅咒你们，妈的，你们这些无赖！"

厌烦的人们安静下来，向后退了一步。他们掏遍了全

身，凑够了神父要的一个列伊。然后，他们把一大堆小硬币交给堂守。

神父让开路，继续用圣油给人们涂抹额头。我们也都涂了油。我们把圣餐吃了。爸爸唾了神父一口，嘟哝着：

“布尔布克神父，以后我死也不再来教堂了！”

神父没理睬爸爸。他忙着给人们涂圣油。

复活节的梆子声仍在村中回荡。

太阳升起时，我们还在合衣大睡，一点也不觉得饿。

几天来，我们大家和伊昂·格奥尔基哥哥谈了几次。哥哥变得更加自信。他的眼睛里闪耀着奇异的光芒。以前，他什么也不信；可现在，他有了信仰。

哥哥小时候虽然挨了不少打，可还是没好好念书，所以只认识几个字母。现在，他整天捧着书看，写字造句，书读得越来越好。

他买了一块小黑板，买了粉笔和一块海绵板擦。他经常练习写字，他和他的妻子一起埋头读书、练字。

妈妈对他们这种刻苦读书的劲儿深感意外。妈妈为此心里很不安，总是闷闷不乐。她把哥哥和嫂子看成是道德败坏的异教徒。

我们吃饭时不再给伊昂·格奥尔基哥哥和嫂子留位子了。他们和我们分了家。

哥哥和嫂子买了一个只够他们两个人喝水用的小水罐。

妈妈不愿再理他们。一天，妈妈对哥哥说：

“我不想再看见你！我死了你也别来送葬！”

爸爸则做到了仁至义尽。他请了工匠，在斯特尼库茨村的那块祖辈留下来的地上给哥哥盖了一所房子。

房子上了顶，但还没安门窗，哥哥和嫂子就等不及搬进去住了。

他们搬走后，妈妈在他们住过的屋子里一连烧了几天香。妈妈每天早晨用干香草枝往墙上洒水。

“妈妈，你干吗生哥哥那么大的气？”

“他叛教了。耶稣只有一个，他却认为耶稣有好几个。异教徒就是这个想法。”

“异教徒不也是人吗？”

“是人，但他们背离了自己天生的信仰 这不好。干一星期的活，星期天休息，这是我们祖祖辈辈的习惯。但伊昂却是星期日干活，星期六休息。”

“星期六不也是一天吗？”

“是一天，但不是假日。”

“假日是根据什么定的？”

“唉！你总是刨根儿问底儿。”

长时间来，沉闷压抑的气氛笼罩着我们家。这种气氛至今未消。一家子老小个个走路低着头，弯着腰，就好像苍天是铅做的，这一大块铅已被打碎，重重地落在我们这些骨瘦如柴的人的肩上一样，而永远也摆脱不掉。大家往

往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争吵不休。整天平白无故地大喊大叫，无名火起，像疯了一样，有时甚至还动手，拳打脚踢，打得不可开交。爸爸也从来没像现在这样恼火和伤心，他看谁都不顺眼。妈妈脸上也总是不见笑容。她沉默不语，一旦说话，又是那么惹人难听。

埃万吉莉娜姐姐孤单一人带着缺吃少穿的孩子，艰难度日。她像所有被遗弃的女人一样，脸色憔悴，未老先衰。曾经应征入伍，尔后从战火纷飞的前线撤回来的阿尔维察姐夫，如今也在摩尔多瓦。

埃万吉莉娜姐姐象往常一样，又来我家看我们，扯家常。她有心事难以开口。最后，她还是讲了出来：

"妈妈，你们还有没有一升玉米面？不是我要，是给我们邻居弗洛雷亚要的。我的几个孩子有时还到这儿，有时去那边庄上尼基希亚姑姑那儿，总能找口吃的。可是弗洛雷亚的几个丫头饿得两天说不出话来。她们躺在床上，两眼干瞪着天花板。最小的那个丫头有奶吃吗？没有，因为弗洛雷亚没吃的，所以她一点奶水也没有。我不忍心看着她们饿死。我不忍心，妈妈，听见了吗？"

埃万吉莉娜姐姐泪如泉涌。妈妈脸色如土，毫无表情。过了片刻，妈妈说：

"你要我怎么办？"

"给我点吃的。"

"没有。我没有吃的给你，孩子。"

又是死一般的沉默。现在，似乎天已塌了下来，重重

地压在我们的身上。我们那颗脆弱的心，像失灵的钟表那样，跳得又慢又无节奏。我们的两条腿沉得拖不动。我敢说，就是有老虎追我，我也跑不动。

“好吧，孩子，给你一碗小米面。这是你爸爸弄来的，不知他是从哪搞到的。这个年头，有小米面吃也算不错。你给乌耶家的弗洛雷亚拿去吧。”

“谢谢你，妈妈。”

我姐姐埃万吉莉娜生怕裙子溅上稀泥，便提起裙子下摆走了。她只有这一条裙子。以前，人们穿得还讲究。可是天长日久，总穿一件衣服不换，自然要破。要买新的，又没钱，再说也无处可买。

战争僵持不下，看来还要打下去。战争活像是一台大机器，不停地把人绞成碎块吞掉。

战争的烈火即将燃烧到我们家乡。这时，我们听说德军就要全线崩溃。可是不久，德国兵便猛扑过来，把村子洗劫一空。他们的铁蹄更加残酷无情。

在地主庄园里干活的男人寥寥无几，大多数是女人和小孩。有时，也有俘虏兵干活。

伯内亚萨的跛腿地主米利亚雷齐弄来了罗马尼亚俘虏兵给他干活。管家像对待牲口一样，让俘虏们没死没活地干。贝利托里庄园的戈古·克里斯托福尔和克尔里加齐庄园的斯塔泰·潘塔齐也是这样。罗马尼亚俘虏由德国兵看守，给罗马尼亚地主干活。

这些俘虏兵是摩尔多瓦一带的人。他们无法逃跑，也

无处可逃。所有的路口都有兵把守。连随便走动都不行。如果你离村稍远一点，就得出示通行证。黄色的通行证上面有德国司令部的签名和图章。其实，与其去要一个通行证倒不如没有更好，因为德国兵盘问起来没个完。

“你到哪儿去？干什么去？不去不行吗？”反正总是千方百计地刁难你。

衣衫褴褛的俘虏们胡子不刮，脸也不洗。他们晚上就睡在马棚里。他们绝望了，有时真想寻死了事。他们的两眼瞪得像饿狼一样可怕。

我们大家都怒视着饥饿和贫困。

深夜，万籁俱寂。如果听到街上沉重的脚步声，我们会心惊肉跳。那是德国兵的脚步声！他们要干什么？到谁家去？我们提心吊胆，害怕听到哨子声、枪声和哭喊声。夜里，全村人都不许出家门。

天亮了，太阳已经升起，虽然春天的阳光和煦，却又像黑夜。白昼和阳光并没给我们带来丝毫的快乐。

在家里，我总觉得自己是外人。尽管我们大家成年累月地生活在一起，但相互之间却没有一点感情。我也像别人一样，冷酷无情。我觉得别人已不容我呆在家里吃饭了。他们总是用眼睛盯着我，盯着我吃每一口饭。

“你们就知道吃，谁也不给家里一分钱。”

我争辩说：

“我在卢什德维德那儿挣的钱都拿回家来了。”

"不过是几十个列伊！也算帮了我们点忙。可你竟瞎胡闹。我把你送到莫察图这样一个好老板那儿干活，本想让你好好学点制革的手艺。不少人都学出来了，而且混得不错，有些人甚至因此发了财。可你倒好，半途而废，给我丢了脸。你像一条癞皮狗，一年之内就换了三个主人。你这小子，你要干什么？打算怎么办？你想念书，那是异想天开。听着，学问不属于你这号人，何况你腿脚还有毛病。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我告诉你：你哥哥格奥尔基是怎么上学念书的？那是因为他的运气好，是贝尔塔老师送他去上学的。谁送你去上学？什么时候？仗还要打很久。等打完仗，你也老了。"

爸爸疼爱我。要是他听到别人这样说我，他准会冲过去，揪住他的脖子揍他。但他不是生活中的强者，他为此很难过，见人就撒气。他不忍心看着我在家里一瘸一拐地走路，但也不愿意流露出对我的怜悯，他是在一气之下才狠狠地训斥了我。我忍耐着。但是，人的忍耐也是有限度的。

我家里没有一个人不知道我是个敏感的人。要是能有谁跟我说几句好听的话，我准会像马戏团的小丑那样得意忘形。但不管是谁骂我还是冷眼对待我，却都没能使我屈服。我固执，任性，即使气得病倒在床上，我也决不低头。可是，掉落一片叶子的洋槐，竟使我惆怅迷惘；日暮黄昏，使我倍感愁肠。再就是佩特雷·勒多伊。他的女儿们一个

接一个地都死了，他自己终于实现了多年的宿愿，和一个离这儿很远的贝尔切卢伊村的年轻女人结了婚。我恨佩特雷，因为他家每次死人时，他从不掉一滴眼泪。

我觉得自己象是一把小提琴。可是小提琴要是钉上钉子还能拉出声音吗？冲我来的每一句粗暴刺耳的言语都伤了我的心，刺疼了我的筋骨，就像有人在我这脆弱的身躯上钉了钉子一样。我忍耐，沉默，容忍着这一切。后来，明知道说也白搭，可我还是为自己辩解。

“一个月之前，我曾给过家里钱。”

爸爸心不在焉，没理会我的话。

去年冬天，在车站的旧水塔旁边又竖起一座新水塔。一列列满载士兵、军火的德国火车从这里开过驰向前线。那时，我被拉去当劳工，修建水塔。我在那儿一连干了两个星期才把水塔建好。我挣了二十个列伊，高高兴兴地把挣的钱交给了爸爸。

我本想到别的地方去找点事干，但没找到。我和同龄的其他小伙子一样，被拉去给德国兵当劳工。当劳工，不言而喻，就是出公差，不给报酬。当然，如果我像伊昂哥哥以前那样去给财主索瓦当雇工，我也会找到事干。但是，我讨厌在村里给人家当雇工，我拉不下这个面子。我感到，在我成了瘸子之后，我在别人的眼里成了一个废物。我伤心，苦恼，可又有谁来过问？如果你无力耕耘土地，不能顶着烈日收割庄稼，不能扛着口袋把粮食装上船，那你干吗还活在世上？你，一钱不值。对无能者，没有人怜悯，只有嘲笑

和厌恶。我就是个无能者。残酷的生活就是如此。说实话，尽管我想得很多，但我必须面对现实，我确实是一钱不值。

我从城里回家后拿定了主意，我一定要去上学读书。真是厚脸皮！我穿上冬衣，进城落实报考学校的计划。首先得找个地方住，然后买书，还要解决吃饭问题。

战争，外国军队的入侵，德军的占领，这一切使我的计划落了空。仗还在打，无休无止。我成了家里的累赘。我像个乞丐，成了在家吃闲饭的人。兄弟姐妹们都冷眼看我。妈妈也怒视着我，不说一句话。我觉得真不如像爸爸那样，训骂我一顿倒痛快。

饭到了喉咙却咽不下去，于是我喝了一口水，又觉得水发涩。周围的空气使我窒息，似乎天塌下压在我的身上。不行，不能再忍耐，不能继续容忍下去了。

我必须离家出走，应该走。可是我反问自己：朝哪儿走？不知怎地，我突然做出决定：从克尔默楚伊取道向南，朝多瑙河方向走。

第十八章　继续前进

由我们村向南，朝保加利亚方向看，便是克尔洛曼村——一个坐落在红红的断崖峭壁间的狭窄的小村落。从克尔默楚伊村流过来的那条又宽又深、两岸长满芦苇和灯

心草的河流分成几股小溪穿过这个村子——我的瞎了眼的舅妈丘雷亚和外祖母就住在这里。外祖母还是那么傲气十足，目空一切。像以前一样，她爱穿白衬衫，而且浆得平平整整。然而，岁月不饶人，外祖母的脸上已布满了皱纹和斑点。

舅妈的儿子、女婿全都上了前线。她的儿子、女婿之多，足可以挤满一节车厢。几个月过去，个个杳无音信，好像饿急了的大地，一口把他们全吞掉了。

如今，家里只剩下年老体弱的舅妈丘雷亚和女儿、儿媳，还有一群不大的孙子、孙女和外孙、外孙女。老人对女儿、儿媳们管得很严，绝不让她们干出那种丢人现眼、伤风败俗的事来。她要她们老老实实地等着她们的男人返回家园——如果还能回来的话。

克尔洛曼村的外祖母仍住在那间洁白的旧房里。和她住在一起的还有安尼卡舅妈和舅妈的几个孩子。安尼卡舅妈真能生孩子，生了五六个。外祖母同她合不来，经常吵架，吵了又和，和了又吵——婆媳间就是这样！

杜米特拉凯舅舅正在摩尔多瓦山区同敌人打仗——如果他还没葬身黄泉的话。他缺心眼，但心地善良。杜米特拉凯先是被抓去当兵，后来又上了战场。让他上前线打仗，纯粹是为了凑数。可是杜米特拉凯舅舅一到战场，便手握刀枪，冲锋陷阵，表现得勇敢非凡。这使人们大为吃惊。刚打了几次仗，舅舅的胸前就戴了一枚勋章。要是能幸免一死，舅舅准会戴着这枚勋章凯旋而归。

仁慈的外祖父已长眠在九泉之下，安息了多年。风吹，日晒，雨淋，冰冻，他全然不知。也许这样对那些入土的人倒是件好事，因为他们对人事沧桑一无所知。

过了克尔洛曼村，沿着大道抄小路往前走，只需抽几袋烟的功夫就到布蒂内伊村。这个村的神父叫伊昂，是个罗锅，一个十足的色鬼。他就是我们奥米达村的托米察·布尔布克神父的儿子。由于他的原因，不少人也像伊昂哥哥和他的塞尔维亚族的妻子一样，全家改变了信仰，变成了基督复临教教徒。

穿过犬吠声声的布蒂内伊村，绕过山岗，便是瑟卡拉村。

我本想在瑟卡拉村歇歇脚，停留一个小时，并且顺便去看一看我的姑姑乌楚珀尔，向她问好，看看她的日子过得是否称心如意。我还可借这个机会，让她给我讲讲她以前的经历，喝口水，吃点东西。我本想也去看看我的表姐迪察。如今，她已是一位正当年的女人，成了四个不离身的孩子的妈妈。

在反复考虑之后，我决定还是继续赶路。

迪察表姐的男人也上了前线。这样，在乌楚珀尔一家悲惨度日的人中，又多了迪察的一家人。

我不停地赶路，以免在野外过夜。

我是一清早离开家的。到哪儿去，为什么要离家出走，我对谁也没讲。

现在，快到晌午了。早晨，天气有些凉，太阳升起后

已逐渐暖和起来。

对这一带的村庄、道路，我了如指掌。战争爆发前，我同斯特尼库茨村的一个叫万库·韦内的小商贩来过这里。那时，我从多瑙河边的大鱼塘买了鱼，然后拿到这里来贩卖。我记得在德拉恰时，有一处地主家的深宅大院，院里瓦房成排，佣人成群。我要停下来，敲敲这家的大门，找点事干。我盼望着时来运转能找到活干。

地主吉内什蒂家族有悠久的历史。我姑姑乌楚珀尔还在孩提时，这个家族就有很多男人在朝里做官。我在一些书中曾读到过有关他们的记述，还见过他们的照片：他们都是些满脸胡子、颧骨突起、大鼻子、高个子的男人。他们当中，唯独一个人肤色稍黑，人们都叫他阿勒皮策。

在那难忘的血雨腥风的年代——一九〇七年，德拉恰村一带也发生过激烈的暴动。

我在瑟卡拉村北口休息片刻后，然后又拖着疲惫不堪的残腿慢慢地继续上路。这时，一座坟茔突然展现在我的面前。我的姑夫普雷库普·乌尔班·乌楚珀尔和其他被枪杀的男人、妇女和儿童一样，就在这里长眠。

这个坟茔上，仍然竖着那个孤单的木十字架，只是变得更加破旧。雨淋日晒，使十字架变成黑色，布满裂痕。但是，十字架还是那样挺拔地直立在路边的墓地上。饥寒交迫的穷苦赤脚人路过此地时，总是向死者脱帽致哀，嘴里还叨念着："愿上帝饶恕他们！"然后把帽子戴好，继续走路去干各自的营生。活着的人忍饥受苦。

他们没有忘记过去。

他们现在也没忘记。

他们不能忘记。

他们也不应该忘记。

我走累了，我也在这儿停下来。

我望着十字架，呆呆地站着。我默默地摘下帽子，这时，往日普雷库普·乌尔班·乌楚珀尔姑夫把我抱在腿上逗我玩儿的情景浮现在我的眼前，我仿佛听到他说："达里耶，你跟我过好吗？你看，我没有孩子了。我的儿子潘蒂利耶当兵被打死了。"

原野，一望无际的原野。瞧，这黑黝黝的一片地，马上就要种玉米；那边是一片碧绿的麦田，绿油油的小麦有一拃高了。

阳光普照大地。湛蓝的天空万里无云。然而，我一路走的都是湿路，就连现在我脚下踩着的这条路也是湿的。雨刚下过不久，那是春雨。

日久天长，十字架变成黑色，比黑土还要黑。

我仿佛又看到我的姑夫普雷库普·乌尔班·乌楚珀尔，他把犁铧插进地主管家菲利普·皮西库的肚子，然后洗掉手上的血污和泥土，还在裤子上擦了擦手。好像还听到姑夫朝皮耶纳鲁上校喊着："你杀死我们，还可以杀死其他人，但是全国人民是杀不绝的。"

如今在打仗。地主早就逃难躲藏起来。一些地主跑到

了摩尔多瓦。他们连行李都不打开，准备一旦听到那些由赤手空拳的士兵支撑的防线崩溃时，好随时逃走。另一些地主——那些曾经高喊要战争，并把全国人民推进了战争深渊的地主们——从一开始就东逃西窜，一心要往北逃到远方的中立国去。而我们这个南部的国家，千疮百孔，到处是饥饿和贫困，完全是与敌人浴血奋战的战场。

但是，也有一部分地主留了下来，他们并不害怕德国人。这些地主都是唯德国人之命是从，千方百计地要国家同德国站在一起，不要同德国打仗。退伍的老上校皮耶纳鲁就是其中的一个。一九〇七年，下令枪杀我姑夫普雷库普·乌尔班·乌楚珀尔和其他穷苦赤脚人的就是这个家伙。现在，他整天同从布加勒斯特搞来的那个小妖精寻欢作乐，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可是你能永远过地主生活而不死吗？有时，他还把乐师叫来给他和小妖精以及德军的大小头目表演节目。他同这些德国人狼狈为奸，关系密切。他和其他地主一样，把从农民那儿收来的粮食让德国人帮忙以高价卖出。

偶尔也有个别的穷小子壮着胆去向地主借玉米，他们脱下帽子，礼貌地对地主说：

"老爷，我给你干活。"

"你敢不干活！你要是不干活，我把你交给德国人！"

这个来借玉米的穷小子只好空手而归。

德国人很精明，他们不准荒废一寸土地，因为他们需要有面包吃。

要是我姑夫普雷库普·乌尔班·乌楚珀尔还活着的话，他现在就不会再问我："达里耶，你跟我过好吗？"因为我表姐迪察已生了两个男孩和两个女孩，乌楚珀尔姑夫会逗着他自己的外孙和外孙女们玩儿，消愁解闷，减少对他的儿子、我表哥的思念。我表哥潘蒂利耶是个聪明过人、能自编自唱造反歌和抒情歌的小伙子。

我姑夫普雷库普·乌尔班·乌楚珀尔虽已与世长辞，但他同其他被害烈士们播下的火种没有熄灭，也永远不会熄灭。皮耶纳鲁上校的地主家族，像赫赫有名的吉内斯库地主和其他地主家族一样，必将覆灭。

闻名的吉内斯库地主家族，如今只剩下一个老姑娘，她叫玛达列娜。以前，她去布加勒斯特上下车时，我曾见过她几次。从车站到德拉恰村，她总是乘四匹马拉的马车。车夫头戴镶有花边的大礼帽，腰里系一条彩带。马缰绳上还镶嵌着银珠子。

玛达列娜是个高个子干瘪的女人，肤色发黑。她像她的祖辈一样，脸上长着一个大鹰钩鼻子，嘴角上还长出几根黑胡须。她衣着古怪，令人发笑。可你怎么能笑得出来？她一身男人打扮，骑着高头大马，气势汹汹地在庄园里转来转去。她家的马厩里，骡马成群。她总是手不离马鞭，只有睡觉时她才肯放下。她对人惨酷无情，生性多疑，因而佣人们都称她玛达拉太太，而村里人却给她起了个绰号："毒蛇"。

她确实是条"毒蛇"。每当她在街上走过时，连狗也不敢

叫一声。这里的人们还说，这个吉内斯库家的老处女　到庄园地里，蟋蟀不再叫，云雀也不再歌唱。尽管人们奈何不得她，但是都对她恨之入骨，背地里骂她。

不知何故，我倒不怕这条“毒蛇”。我给莫察图老板当过徒工，挨过师兄戈古·索里克的毒打；还给米耶卢什·古舍老板和伯尼格·乌尔泰让老板当过佣人。现在，去给“毒蛇”当佣人又有何不可呢？我还活着，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她就不敢把我怎么样。扬眉吐气的出头之日总会到来。我要活下去，我要活到那一天。

路旁有一队小黑蚂蚁正在两个巢穴间奔忙。我小心翼翼地在蚂蚁旁边走过，生怕踩死它们。我加快脚步，恨不得马上赶到德拉恰村去碰碰运气。

我绕开石子大道，无心观瞻为长眠地下的那些无辜死难者竖起的那个十字架，便径直朝田间那条松软笔直的小路走去。烂泥不断地沾在我的裤腿上，腿和脚觉得越来越沉。

我勉强走到地主家的庄园前，牢牢的铁栏大门紧闭着。地主家的这座深宅大院像一座城堡，四周都是高墙。一个长工过来给我开门。他是一个胡子拉碴、喝得醉醺醺的匈牙利族人。

“喂，你到这儿来干什么？”

“找点事干。”

“我们这儿不需要人。”

“我想见见吉内斯库家的太太。”

"见谁?见玛达拉太太?"

"是的,就是见那条'毒蛇'。"

"算了,小伙子。她逃到摩尔多瓦去了。"

"那么,现在谁在料理这个庄园?"

"管家们。"

"我想和一位管家谈谈。"

"不行。"

"为什么?"

"因为不值得和你这号人浪费时间。快给我滚开,听见了吗?"

这个匈牙利族人手里拿着一根粗棍子朝我走来。他举起棍子,做出要打我的架势。棍子又粗又长,他的劲儿又那么大,我这个瘦弱的身躯那能禁得住他打。

我抄小路朝奥洛吉村走去。我认识这个村的一个叫热尼克·迪亚库的地主,其实说他是地主,倒不如说他是富农更恰当。他有些地,也有牲口。他家里有好几个没出嫁的大姑娘。因为他的家底并不厚,所以其他地主都不愿娶他的姑娘,就连那些二地主也不来向她们求婚。至于那些庄稼汉,他们根本就不敢同热尼克·迪亚库攀亲。一个衣衫褴褛、填不饱肚子、打惯了赤脚的穷庄稼汉,哪能养得起一个娇生惯养、不会干活的富家小姐?

不管三七二十一,我还是敲敲他家的大门试一试。一个佣人睡眼惺忪地走出来开门。

"我想见迪亚库老爷。"

"他到摩尔多瓦去了。"

"他也去了？"

"你还到过哪个地主家？"

"我去过德拉恰村的'毒蛇'家。"

"噢，她在德国人来奥尔特之前就逃走了。你到底要干啥？"

"找点活干。"

"我们这儿没有你干的活。你还是到克洛科奇奥夫村去吧，那儿也许能找到事干。克洛科奇奥夫村的地主没逃走，他们同今天的当权者关系搞得不错。"

我一会儿走大路，一会又抄田间小路，直奔克洛科奇奥夫村。幸好太阳下山时我赶到了这个村，因为我不喜欢夜间走路。

克洛科奇奥夫村地主家的院落格外宽敞，足有三公顷地那么大。院子的前面是一座塔式小楼。这样的小楼，无论在哪个庄院，在卢什德维德还是在图尔努，我从未见到过。小楼后面的院子里，是佣人住的一长排小矮房，再过去是高大的牲口棚。小楼一侧的几间小屋是办公室，旁边有个抽水泵。这个抽水泵和卢什德维德镇托奈舅舅家的一样。一个妇女正在泵水。我走过去，问：

"我可以和这儿的人谈点儿事吗？"

"你想找谁谈？"

"找个管事的人谈。"

"你去同拉斯克尔先生谈吧。他就在那儿。"

她指着办公室对我说。我走了过去。

“进来！”

“晚上好。”

“好。”

一个身材瘦小，头发已白，满脸皱纹，鼻子上架着一副眼镜，身穿蓝色旧衣服的人正趴在桌上写写划划。这是一张松木桌子，和我们奥米达村公所里吉克·斯特内斯库文书用的那张桌子一模一样。这个人连头都没抬一下，因为到他这儿来的人多了，他早就不把这当回事。他一声不吭，只听见他的笔在纸上刷刷的写字声。他用蓝墨水写的是醒目的方体字，他的手颤抖着，写起字来很费劲。最后他终于开了口：

“你有什么事？”

“拉斯克尔先生，我想在这儿找点活干。”

老人摘下眼镜，用手帕擦了擦，然后又架到鼻子上。他把我从头到脚，从脚到头打量了一番。他那双近视眼不停地眨巴着。

“你不是本地人？”

“不是。我是克尔默楚伊北边奥米达村的。”

“你识字吗？”

“识字。”

“上过几年级？”

“小学五年级。”

“字写得怎么样？”

“能写正楷。”

“来，坐下，让我考考你。”

我在椅子上坐下，把帽子放在膝盖上，拿了一张白纸和一支蘸水笔。我写了两行字，然后拿给他看。老人看了看，一本正经地说：

“好……写得很整齐。我去跟老爷说说。”

老头的桌子上放着一个小铃。他伸手拿起小铃摇了摇。一个长工走进来。

“拉斯克尔先生，您好。您有何吩咐？”

“把这个男孩子领到厨房去，传我的话，给他弄点吃的。他以后就留在我们办公室了。”

原来是这么回事！这个老头确实就是拉斯克尔先生。他一摇铃，你就得赶紧跑来说：“拉斯克尔先生，您有何吩咐？”

长工领我走出门口，然后带我朝院子后边的房子走去。他把我领进一间屋子。

“喂，萨弗达，给他弄点吃的，好让他明天有劲骂我们。他以后就在拉斯克尔先生身边工作了。他以后会当上管家的。”

“也许他不会骂我们。”萨弗达说。

萨弗达长得又粗又壮，壮得简直像头牛。她的两条腿粗得像木桩，胸前的两个大乳房活像两个小坟头。她光着脚。她的脚上净是烧伤的痕迹，脚掌宽大，脚后跟净是裂痕，凹凸不平的脚趾甲盖变成了黑色。只有两只手是白的。因为她的手整天要泡在水里洗东西。

“我的话没错，他肯定会骂我们的！”长工固执地说，“乔治乌刚来时还不也是这样，连哼都不敢哼一声。那时他差点饿死。可现在，他不仅骂我们，还用鞭子抽我们。他成了拉斯克尔先生的左右手。”

“好了，别跟这孩子过不去了！你走吧。”

长工出去了。

“你别怕。”萨弗达对我说，“根儒就是这么一个碎嘴子，你可别在意，他心眼儿不坏。他和我们这些佣人一样，就是没交上好运。”

她给我搬来一把椅子，把一个大碗放在我面前。大碗旁边摆着一摞洗过的盘子和碟子。她给我倒了满满一碗稠稠的菜豆汤。碗旁边放了一块餐纸，餐纸上放了一大块玉米糕。

“勺你自己去拿。”

我在勺堆里拿了一把，擦了擦，开始吃饭。

我狼吞虎咽地吃起来。萨弗达在一边看着，等我吃完了，又给我舀了一碗菜豆汤。

“你是远道来的？”

“不太远。从奥米达村来。今天早上离开家的。”

“到现在还没吃过一点东西？”

“什么也没吃。”

“那你来得正好。”

我和她攀谈起来。我这才知道，这个地主是这一带有名的大地主。他家里光佣人就有一百多。看管多瑙河边那

个大养鱼池的还有一百人。此外，还有几百户吉卜赛人住在下边的山沟里，他们住的土房又矮又小。这些吉卜赛人也给地主种地。这所深宅大院是庄园的心脏。但是，在北边地主的另一所庄园里也有许多活要做。

“要是派你去看守北边的那所庄园的话，那可就苦了。因为那所庄园的周围是荒凉的旷野，而且又没有人住。”

“拉斯克尔先生对我说了，让我留在办公室。”

“拉斯克尔先生说是那么说，但他定不了。”

“那谁说了算？”

“地主老爷。”

夜幕降临。塔式小楼里灯火通明。我吃饱饭后，在院子里走着，谁都不看我一眼。狗过来用鼻子闻了闻我，却没叫一声。我又去敲拉斯克尔先生的门。

“你吃完了？”

“吃完了。”

“我这就去找地主老爷谈谈。快，跟我来。”

我跟在拉斯克尔先生的后面。楼梯又高又宽，台阶是大理石的。到了楼梯口，我停下等在外面。拉斯克尔先生走进屋，不一会儿就出来了。

“快进来见老爷。把脚擦擦干净。”

我擦净脚上的泥土。

地主老爷会是什么样子呢？

我进了屋，战战兢兢地踩在松软的地毯上，两只脚深深地陷了进去。

拉斯克尔先生欠身向地主老爷解释说：

“他刚到府上一小时，他是克尔默楚伊北边奥米达村的。他到这儿来是找活干的。他的字写得很漂亮，我想把他留在办公室。”

我抬起头看着眼前的地主。他个子高高，体格健壮，肤色发红，两鬓苍苍。他不留长须，也不蓄八字胡，脖子上的肥肉成堆，红胖的脸鼓得几乎要裂开。他刚刮过脸，头梳得油光。他的右眼上戴着一个单片眼镜。他讲起话来，发不好那个颤舌音“R”，像是在讲外国话一样。

“明天早上你跟我到山上的庄园去。那个庄园还需要一个人。你要当个本分的工人。管吃管住，一个月给你十个列伊。工钱可不少！拉斯克尔，把他带下去吧！”

地主连我姓什么叫什么都没问。我也没主动告诉他。

拉斯克尔先生浑身颤抖着。他可能是累了。

我向戴单片眼镜的地主道了晚安，便紧跟在拉斯克尔先生后面走出来。我是转过身背向着地主走出来的，而拉斯克尔先生是退着走出去的。我们走下楼梯，拉斯克尔先生小声对我说：

“你是怎么搞的？你怎么不退着出来？”

“拉斯克尔先生，你别生气，我要是退着走的话，那不就成了大虾了吗？”

拉斯克尔先生听了一惊，勉强地笑着说：

“你好大的胆！”

“我没想那么多，不过，如果你这样说的话……”

"你今晚就睡在萨弗达那儿。

"谢谢。"

长工们在拉斯克尔先生面前那种点头哈腰的丑态比拉斯克尔先生在地主面前的表演更有过之而无不及。

"拉斯克尔先生,我问你一件事。"

"什么事?"

"地主老爷贵姓?"

"阿尔吉尔·阿里赞。他真让人生气。"他抱怨说。

"拉斯克尔先生,你干吗生气?"

"我本想让你留在办公室,我干不了了。以前也来过几个能写会算的人,每次我都想把他们留在办公室,可是地主老爷偏把他们都派到山上去了。山上没有几个人。"

"为什么?"

"我怎么知道?可能是因为人们不愿在荒山野岭上生活。"

"我想我在那儿不会腻烦的。"

"走着瞧吧,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我的眼睛就是给地主干事搞坏的,我早就干够了。"

"地主还不让你退休?"

"不让。阿里赞地主不让任何人退休。我在地主这个庄园里已经干了四十年。当你还能干活的时候,他就给你薪水。可是,一旦你干不动了,地主就一脚把你踢开,再雇别人。"

拉斯克尔先生在自言自语,我也不管他,便回到萨弗

达的厨房。

"拉斯克尔先生说，我今晚就睡在你这儿。明天天一亮，我就和地主老爷去山上的庄园。"

"愿你福星高照！"

"这是什么意思？你为什么这样讲？"

"我只不过随便说说罢了。"

一辆噪音很大的小轿车开进地主的庄园。轿车的门打开后，有四个德国军官钻出来。

司机把车停好，车身溅满了稀泥，车尾部冒着烟。看得出，他们跑了很长的坑洼路。

地主站在门口迎接客人，同他们拥抱、亲吻。

"德国人又来了。"萨弗达嘴里嘟哝着。

"以前德国人也来过这儿？"

"他们常来，他们和地主是好朋友。地主从德国人那儿要来了罗马尼亚俘虏兵，让他们给他下地干活。这些俘虏在庄园干活，不要看守，只有几个佣人照料，出了事由地主负责。他们累死累活地干。不说了，你到庄园后就知道了。德国人一来，今天夜里，这儿可热闹了。"

这时，一个人骑着一匹粟色马进了庄园。他就是乔治乌先生。马嘴里不停地吐着白沫，看得出，马是飞跑来的。

乔治乌先生刚跳下马，三个人便迎上去把马缰绳接过来。一个人牵着马慢慢地遛，另外两个人解下马鞍，给马背披上毯子，边走边用草编的小扫帚在马背上拍打。

乔治乌先生径直朝小楼走去。他进去不一会儿，就急

忙跑下楼梯。

"备马！快给我备马！"

佣人把马牵过来，放好马鞍。

乔治乌骑上马，在马屁股上狠抽了一鞭，马便扬蹄翘尾地冲出院子，一溜烟跑了。萨弗达嘟哝着说：

"他去找吉卜赛女人去了。"

萨弗达只管给佣人们做饭。

地主和他的客人们用餐的厨房是专用的。

地主的那个厨房里开始沸腾起来。萨弗达也被叫去帮忙。

从那边绝不会吹来菜豆汤的味儿，也不会刮来刚出锅的玉米糕的热气。给地主做饭用的是专门的炉灶，可以烤面包，做点心，炸肉排。在那个厨房做饭的佣人个个都很干净，像医院里的大夫一样，都穿着白大褂。

我在萨弗达的屋里就寝，就睡在她的床上。这是一张很宽的木板床，和我家的一样，上面铺的是草席。这张床足够睡下五六个人。

我在床的一边躺下，把一块皱皱巴巴的破羊皮盖在身上。这时，我才感到浑身疲倦得很。我走了整整一天的路，没歇一下脚，一直在赶路。

现在，只有现在我才感到脚掌像火烧火燎一样疼。我感到困倦、疲乏像潮水似的向我袭来。我很快就睡着了，睡得像头死猪。

天刚蒙蒙亮时，我醒了。一个又胖、又宽的热背紧贴在我的背后。这是萨弗达的身躯，她睡得很香，还打着鼾。这时，我就像拿着面包逗狗时一样，轻声地吹起口哨。萨弗达的鼾声停止了，她安静下来。

一个长工过来敲着窗子喊：

"喂，昨晚来的那个小子，快起来！老爷叫你。"

我摸着黑儿穿好衣服，走出院子，清晨的凉爽空气使我全然清醒。长工接着说：

"老爷在台阶那儿等你。"

透过灰濛濛的晨曦，我看出了地主肥胖的身影和他骑着晃来晃去的那匹马，旁边还有一匹备好的小马驹儿。

"你会骑马吗？"

"会。"

"那上马吧。"

一个佣人把缰绳递给我。我用那只病脚蹬上台阶，双手抓住马鞍，纵身一跳，骑上了马。马在我身下痉挛地抖了一下。

我感到独眼龙地主是在捉弄我。也许他巴不得让马尥个蹶子把我摔下来，可是他的如意算盘没有得逞。他笑着说了一声：

"抓好！"

这时，我的马屁股上挨了一鞭，马腾空一跃，嘶叫着冲出了大门。地主快马跟上来，他一下子就跑在我的前头。他大声地对我喊：

“别摔下来！”

我双手紧紧地抓住缰绳，两条腿使劲地夹着马肚子，马像一阵风似的奔跑起来。地主的马跑在前面。我们像两个幽灵一样冲破了黑夜。我的马认识路。它在我尚看不清路的晨曦中奔跑着。地主一个劲地策马前进。

我们奔上山岗。这时，眼前一堵堵的黑墙挡住了我的视野。地主和他骑的那匹马像座大雕像一样直立在依然朦胧的山岗上。

我的马喘着气奔上了山岗。马像训练过的一样停在地主的身旁、

地主又笑了。他说：

“你真不错。我以为你会摔下来。”

“也许马也这样想。我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抓住了缰绳。”

“你通过第一道关了。”

我鼓起勇气问：

“还要通过其它的关吗？”

“很可能！”

我看到他那在黑暗中闪闪发光的牙齿，还看到他那块闪光的单片眼镜。

他从腰里摸出一支手枪，递给我，说：

“会打枪吗？”

“不会。”

我接过手枪，在手里摆弄着。这是一支新式手枪，没有枪管。

“我已经打开保险。”地主对我说，“把枪口对着天上放！”

我把枪口转向天空，轻轻地扣下扳机。

这时，我感到像有人拽了我的胳膊一样。

“这是自动手枪。”地主说，“胳膊疼了吗？”

“有一点儿。”

“把枪给我。”

我把枪递给他。他检查了一遍，又还给我。

“现在，枪口冲下拿着。我们下马步行。”

地又软又湿。东方已经破晓。村那边的池塘开始泛白一棵参天大树直立在我们面前。我们走过去，在离树几步远的地方停下来。

“现在，你瞄准树身射击。对准树身的中部打。等天大亮了，我们再去看看你的枪法如何。”

我伸直手开始瞄准，再次扣动扳机，手由右向左微微移动，几颗子弹飞出了枪口。然后，我把枪递给他。

我们继续骑马前进。夜幕已完全消失。左面，在很远的地方展现出一条弯弯曲曲的灰色河流，那就是多瑙河。河的彼岸便是保加利亚。此刻，高高的河堤仍被晨雾笼罩着。

“我的庄园很大，”地主对我说，“有一万多公顷。”

“一万多公顷？”

“是的，有一万多公顷。在伯勒干和布勒伊拉那儿，我还有两个大庄园，差不多也有这么大。不过，我喜欢呆在这儿，其它两个庄园只是有事时才去看看。”

周围是一望无际的原野。春天到了，野草破土而出，小麦已有一拃多高。刚下过雨，地皮松软，马蹄踩在地上，陷进很深。

地主是想来看看农民是否已来耕田。

远方传来吱吱扭扭的车轮声，小小的火堆四处可见。

赤脚的农民在准备套牛犁田，他们在车旁点火堆是为了取暖。

我们来到他们的车队旁边。

人们早就知道夜间骑马放枪的人是谁——听马蹄声就知道是地主的马。瞧，他们脱帽向地主行礼了。

"您好！"

"早上好！你们怎么这么晚才来？"

"不晚，老爷。"

"你们早就应该到地头等着下地了。你们是哪个村的？"

"是皮亚特拉村的。"

我们让马放慢步子。地主补充说：

"使劲按着犁，耕深点儿，不然饶不了你们！我要进去检查！"

我们两个幽灵在无际的原野上疾驰。

我们离庄园越来越近。周围的房屋和树木的轮廓像雕刻在空中一样，一清二楚。地主策马飞奔。我也用脚后跟儿使劲地磕着马肚子，马不顾一切地伸直脖子紧跟在地主的那匹马的后面。也许我的马知道骑在他身上的是个佣人，

而佣人无权同地主老爷并驾齐驱，所以它还是和前边的地主的马保持了一定的距离。

庄园的屋子里灯火通明。庄园里的柱子上挂着灯，灯也亮着。我们一来到庄园，大门就立刻打开。马直奔打谷场，在那儿转了两圈才停下来。门旁站着个矮子，手里拿着帽子。

“阿莫斯，你起来了？”

“我一向起得很早，老爷。”

地主跳下马，我随后也跳下马。那个矮子接过马缰绳，把马牵进马棚。地主在前边走，我小心翼翼地尾随在他的后面。

地主打开门，上了楼梯。然后他又打开一道门，我们俩走进一间方形的大屋子。

“伊隆卡，咖啡煮好了吗？”

“煮好了，老爷。”

地主转身对我说：

“伊隆卡就是阿莫斯的老婆。”

伊隆卡一看见老爷，眉开眼笑。她端来一大壶滚开的咖啡，然后给地主老爷倒了一大杯。

“也给他倒一杯咖啡。”

伊隆卡给我倒了一小杯。

庄院的客厅里，一盏明亮的大吊灯悬在天花板上，再加上渐渐明亮的晨光，使我从近处更清楚的看到我的新主人阿尔吉尔·阿里赞的面孔。昨晚，我看到的他那张红光

焕发而丰满的脸，现在显得憔悴，并且布上了轻微的皱纹。他两眼无神，眼皮有些肿胀。他的一只眼睛布满了血丝，另一只戴单片眼镜的眼睛似乎显不出倦意。刚开始秃顶的脑袋上闪着光。头上剩下的头发一半是白的。头发涂了油，梳得整整齐齐，并且贴在头皮上。他脖子下的甲状腺肿瘤就象火鸡的光秃秃的嗉子一样。他说起话来，嗓音像破锣。他昨晚一夜未眠。他山珍海味吃了个饱，各种美酒喝了个足，同德国人和管家乔治乌从山沟里弄来的那些年轻的吉卜赛姑娘寻欢作乐了一个通宵。阿尔吉尔·阿里赞地主身上穿的都是高级衣服。他骑马下地都穿专门的服装：英国花格呢料短大衣；保护脖子不着凉的毛皮围巾；厚厚的紧身裤；超过膝盖的黄色高筒皮靴。皮靴擦得锃亮，亮得像一面镜子。他的手套放在那条用来策马和殴打佣人的鞭子旁边。这个看上去像五十开外的人——后来我才知道他已近六十岁——竭力摆出一副英国贵族、至少是位勋爵的架子。

伊隆卡身着拖地的大花连衣裙，脚上穿着土耳其式的松软平底拖鞋，走起路来发出瑟瑟的那种绸缎的磨擦声。她浑身散发着迷人的麝香气。她满头金发，皮肤白皙，梳着长长的辫子，两只大眼睛明亮而有神，手指上戴满了粗粗的金戒指。

“伊隆卡，再给我倒一杯咖啡。我昨晚一夜没睡觉。”

“看得出来，老爷。”

我站起身来。

“我在下面等您好吗？”我说。

“好吧。”

我走出院子，靠着墙站着。佣人们还在遛我们骑来的那两匹马，马身上仍然冒着热气。太阳已经升起，金色的阳光撒满了无边无际的原野。远处，在多瑙河上漂浮着一层薄薄的白雾。朝阳就要把它驱散。一阵阵像猪崽叫的短促的号子声不时地从多瑙河那边传来。多瑙河上，一艘艘轮船拖着长长的载满粮食的驳船逆流而上，开往德国。另一些载着士兵和军火的轮船顺流而下，驶向朱尔朱和布勒伊拉，去支援摩尔多瓦南部边境的前线。此刻，一望无际的原野上，到处耕犁可见：男孩子们在前面不时地用棍子抽打着骨瘦如柴的老牛和纤弱的小马驹，妇女们在后边使劲地往下按着犁耕地。他们的后面翻起了一道道冒着热气的犁沟。隐没在克尔默楚伊河谷里的村落炊烟袅袅。天空像大地一样潮湿，死气沉沉，没有一丝风，树叶纹丝不动。

我环视宽阔的庄园，在这些天长日久被风吹雨打的旧房子不远的地方，这个独眼龙地主又盖起了气势雄伟的新房。这是一处大庄园，一座地道的老式宫殿，拱形结构，设有教堂式的门廊。院子里马厩、仓库等一应俱全。但是，这些都尚未完工。院子里没有一棵树，只有院门口两旁有两棵老槐树。这时，院内只有两三个人在马厩那儿走动，其他人到哪儿去了呢？

一个比我稍大一点的小伙子骑马从地里回来。他下了马，上楼去找地主。不一会儿，地主便走下楼，那个小伙子跟在他的后面。

“就像我对你说过的那样，安德烈，你照顾他吧。”

地主骑上马走了，很快便消失在远方。

在这个庄园里，不仅住着阿莫斯和他的妻子伊隆卡，还住着不少佣人。这些佣人的头头看来就是安德烈。

安德烈身穿学生制服，战争打起来时，他正上初中。他上的那所中学就是我朝思暮想要去的图尔努城的那所“圣·哈拉兰比耶”中学。

他是多瑙河边的一个小业主的儿子，家里兄弟姐妹很多。于是，他父亲便让他到阿尔吉尔·阿里赞地主家来干活。他比我早来这里几个月，已经在这块原野上度过了第一个冬天。

“真可惜，”他对我说，“你现在才来，真可惜。冬天是那么诱人，你真难以想象。冬天，一望无垠的原野和那些在谷底的小村落统统不见了，茫茫的大雪像一块大白毯子把它们盖在下面。只有南方多瑙河彼岸的高高的石堤及岸上荒凉的石子地露在外面。”

安德烈带我在庄园里转了一遍。他把所有的大小房间都指给我看，告诉我每间房子的用场，由谁来照管。然后我们骑上马到地里去了。中午，我们回到庄园。吃过午饭，安德烈躺下睡了个小觉。这时，我又走出院子，背靠着墙凝视着无边的原野。我沉浸在梦幻和悲伤之中。我离家出走，没告诉任何人，连去什么地方都没说。事实上，在我出走的那当儿，我自已也不知道到哪儿去和去多久。现在

我总算知道，为了找个临时性的活干才来到这里。但是，在这儿，在山岗上的克洛科奇奥夫庄园究竟要呆多久，我一时难以揣测。我也不想考虑这些。眼下，我总算有了着落。晚上，有了自己睡觉的地方，还挣到面包吃，哪怕面包是苦的也罢。但是，那种令人发疯的压抑感仍不断地冲击着我的心灵。

一到晚上，保加利亚的土地上便燃起点点篝火。

"那是牧羊人点起的火堆。"安德烈说。

多瑙河彼岸的土地多半是沙石地，那里有大片大片的牧场。

为了消磨时间，安德烈便绘声绘色地给我吹起他冬天如何打野兔，又如何骑着马追赶大鸨的情景，他还学着冬天夜晚北风呼啸的呜呜声。

庄园里，还没有完全盖好的房子里住着一百个罗马尼亚俘虏兵。因为这个地主与德军相互勾结，而且又是被德国人抬上县长宝座的北边的一个大地主保尔·波利梅里代的好朋友，所以这个独眼龙地主阿尔吉尔·阿里赞便把图尔努集中营的俘虏弄到了庄园。这些俘虏兵有的是摩尔多瓦地区的农民，有的是多布罗加一带的土耳其族和保加利亚族农民。这个身穿英国式服装的独眼龙地主对他们毫不客气。因为他把这些人从布满铁丝网的能使人活活烂死在里面的集中营里弄出来，并不是让他们在阳光灿烂、空气新鲜的庄园里养膘，而是让他们来干活，因此，地主才管他们饭吃。尽管他们有时忍气吞声，有时也发发牢骚，但

他们还是不停地干着最繁重的体力劳动。

"开始时，"安德烈对我说，"有些俘虏 本来 想逃跑。但是，后来他们又一想：在这儿，起码有口饭吃。活是重，可是他们当中的哪个人不是干重活出身的！"

土耳其族俘虏兵也像罗马尼亚族俘虏兵一样穿一身制服，不同的是，他们的头上戴的不是军帽而是缠一块布。我和这些白面孔，眼睛炯炯有神的土耳其族俘虏兵成了朋友。他们是一些受苦的年轻农民。我开始向他们学习土耳其语。我一本正经地跟着他们学会话，力求把每个音发准确。安德烈看着我，心里有些纳闷儿。

"你学土耳其语有什么用？我看 你还是 学吉卜赛话吧，学会吉卜赛话对你很有用。"

我从小就听妈妈和乌楚珀尔姑母说过，几百年来，多瑙河一带的罗马尼亚人都害怕土耳其人。至今还流传着一些关于土耳其人入侵时烧杀抢掠、把罗马尼亚人押上船运到遥远的外国当奴隶的民歌。帕夏① 和土耳其人在这一带烧杀抢掠，无恶不作。那时，要是小孩子哭，妈妈总是吓唬说：

"别哭，再哭的话，要是让土耳其人听见了，他就来宰你！"于是小孩就不哭了。

长期以来，万恶的老牌土耳其帝国在荒凉的只有蚊子滋生的多布罗加只留下几个破落不堪的土耳其人居住的村

---

① 奥斯曼帝国的总督。

庄。这些村庄里的年轻的土耳其族农民也同罗马尼亚族年轻农民一起上了前线，也喝一样的大锅菜豆汤，同样挨军官们的打骂。

“不过，安德烈，我为什么要学吉卜赛话？”

“为了听懂地主雇的这些吉卜赛人说的话。”

在村子和原野之间有两条小山沟。几年前，地主雇来的这些吉卜赛人便在这里搭起了栖身的小棚子。

正是春耕大忙季节。地主家的佣人，来自河谷里的村庄以及多瑙河沿岸的大小村落的佃农扶着“野猪”牌犁铧，赶着肥壮的老牛给地主耕地，播种。老牛那长长的犄角上足可以吊起一个摇篮。现在种的是齐卡丁种玉米，它的玉米粒发红色，玉米棒子大，粒密，产量高，保种保收。而那种黄粒的玉米，粒大，但颗粒少。用这种玉米磨出的玉米面纯正，做出的玉米糕带甜味儿。这个独眼龙地主从来就不吃玉米糕。他把地里收来的玉米拿去卖高价，特别是目前处在粮食奇缺的战争年代，他尤其需要更多的玉米。此外，还种了小麦、黑麦、大麦和燕麦，在斜坡地带种了油菜和谷子。在通往多瑙河方向的坡地上，地主下令种上大面积的向日葵。现在不再像战前那样从南部生长橄榄的热带国家进口食用油。既然在庄园新造的房子里要安装几台榨油机，那么，用向日葵就有可能榨出好油来。地主已经订了货，到秋季收向日葵时，榨油机将安装就绪，开始榨油。这将是独眼龙地主的又一条生财之道。

“要不是打仗的话，地主根本不会想到种向日葵也能赚大钱。”

战争夺去了一些人的生命，给更多的人带来难以忍受的痛苦，而少数人却发了国难财。我想起了表哥扬库·布勒泰斯库，他是个年轻漂亮的铁匠，会画画。他能在布上和马粪纸上画出日出和黄昏的景色，还会画出河边的垂柳和他那个铁匠铺的炉火，以及伊万·岑楚的小儿子在炉旁的神态：这孩子满脸煤黑，在熊熊燃烧的炉火映照下闪闪发亮，他拉着风箱，把火吹得通红。铁件放在火上烧，先是烧红，然后差不多变成白色，最后在铁锤下软得像个面团。

表哥扬库·布勒泰斯库当兵之前在山区过着贫苦的生活。那时，他曾对我说过：“即将蔓延到我们这儿的这场战争对世界上的一些人来说，等于是日暮黄昏；对另一些人来说则是旭日东升。你们这一代和比你小的那些孩子将有幸看到这旭日东升的时代的光辉，也会感受到这个日暮黄昏的时代的没落。如果我还活着的话，我也许能赶上这个时刻。”

表哥确信自己的病能够治好。为此，他搬到空气新鲜的乡下，以便彻底恢复健康。但是，事与愿违，他咳嗽不停。当他像其他人一样背起背包，扛起长枪，穿上军装应征入伍时，他已经开始吐血丝。一年之前，扬库表哥在卢什德维德曾对我说，让我去找某种火种。在这满是皮匠和商人的城市里，在奥米达村，我都没有找到。我想，在这

广阔的地主庄园里更难以找到。关照我的安德烈，可谓是个好小伙子。他勤快、活泼，无忧无虑，从不发脾气，当然也没有什么使他不顺心的事。马厩的马，他随便骑，他吃得饱睡得足。心血来潮时，他就钻进那个漂亮的匈牙利族姑娘的小屋去鬼混，或者去追逐山沟里成群的吉卜赛小姑娘。他没有什么理想。他上过学，但是来到这偏僻的庄园时，他的箱子里却没装一本书。

在繁星密布难以入睡的夜晚，我们俩便一起到草地里躺下聊天。那时，我给安德烈讲述着天空的奥秘；告诉他哪个是土星和土星的光环，还有看不见的冥王星、海王星、火星以及银河的种种传说。我还告诉他，银河上也许有生物存在，凡是我们这个半球能看到的星座全讲给他听，也告诉他能够看到的热带地区夜空的星星。

“那个最大最亮的星星是南十字座。”

“你从哪儿知道的？”

“我从书里看来的。”

“知道这些有什么用？”

“怎么会没有用？我想增长见识，多学一些知识。”

“我不懂这些，可我照样生活得不错。我以后想当个会计。到那时，即使不知道银河系的来龙去脉，我也会生活得很好。”

“不过，难道你对这些一点也没有好奇心吗？”

“没有。”

有时，由于渴望同别人讨论问题，即使像安德烈这样

的人，我也乐意同他议论关于人类及人类社会问题。

“你太傻了，达里耶。你简直是白日做梦。世界就是如此，有地主，有佣人，有的富，有的穷，永远不会改变。谁去改变它？又怎样去改变它？”

“可能就是这些人，还有许多像他们一样的其他人。”

一队队疲惫不堪的俘虏从我们面前走过。

整日呼吸野外的新鲜空气，沐浴着灿烂的阳光，晚上还可以在马车里睡个好觉，这一切使我把一天的疲劳抛到九霄云外。我从此摆脱了莫察图老板那发霉的地下室里的鞣酸桶，脱离了米耶卢什·古舍老板的那个专卖寿衣、蜡烛、香和棺材的小店，也不再和伯尼格·乌尔泰让老板那个卖煤油、绳子和盐块的小店打交道。从此，我也远离了家里那种争吵不休、令人窒息的气氛以及那些像尖刀一样刺疼我心的道道目光。阿莫斯整天忙个不停，很难见到他，地主那双有毛病的眼睛又不能整天盯着我们，所以，伊隆卡晚上就把我和安德烈叫去，陪她闲聊，替她消愁解闷。伊隆卡度日如年，犹如坐牢；她烦闷忧愁，盼着战争早日结束，好摆脱掉她那个形式上的男人，逃出地主的手心，去敲人生的大门。这个大门将为她敞开，使她开始新的生活。

“你在这儿应有尽有，你还要到哪儿去胡闹？”

“你真傻，安德烈。你说我‘应有尽有’，我有什么？有住的，有吃的，有衣穿，有鞋穿……但是，人有一颗心，要是心里不满意的话……”

“你说这些，可别让地主听见。”

“听见又怎么样？大不了发一通火。如果他不爱听，也许会气炸了肺，说不定一气之下会完蛋。他的哮喘病常犯，他还有心脏病，尽管他从举止和行为上竭力向别人表明他还年轻。”

“伊隆卡，你也说地主老了！当然，你比谁都清楚。”

“你这蠢驴！这儿的事都瞒不过我。当地主是命里注定的，不是选出来的。我打算在这儿呆到战争结束，然后我就用拳头去敲生活的大门，也许生活的大门会向我敞开。”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又迎来了春天。白天变长了，黑夜变短了。黑夜变得如此之短，使你觉得好象头刚挨着枕头打了个盹儿，天就亮了。有时，天空乌云密布，像隆隆的炮声一样，雷鸣电闪，下起雨来。那时，我们便在庄园里跑来跑去，有时甚至顶着块毯子跑到地里去干活。因为，即使下着瓢泼大雨，我们也得把一天的活干完。对我们来说，雨再大，也算不了什么。不过，晴天还是居多。天空蔚蓝，没有一丝云彩。在那些日子里，野草、小麦和玉米眼看着向上长。瞧，昨天麦苗还只到脚腕那么高，可今天已经没过了脚腕。明天就会长到膝盖。土地又黑又肥沃，但是，要想在它身上有所收获，也需要用汗水浇灌。这些良田，随便撒下种子，就会开花结果。难怪这儿的人们常说：“地肥沃得像黄油，可惜都是地主的。”

“我们地主的地真多。”我对安德烈说。

“是啊，他有很多地。”

“一个人怎么能有这么多的地？”

安德烈是个小财主的儿子，这个小财主一生都梦想着当上个大地主，但始终没有实现。这时，安德烈惊奇地说：

“唉，他就是有！如果一个人能积攒钱，会发财致富，他还可以有更多的地。谁不愿意多从别人身上捞东西。说起来，我们的地主还有一段故事呢。”

我们俩睡觉的房间是庄园正房的耳房，屋里很宽敞，窗子也很大。地主打算战争结束时就把新的庄园全盖好。看这座新庄园的样式，地主好像是要在这里度过他的幸福晚年。

深夜，坐落在田野上的这座庄园寂静无声。不会有人在窗外偷听。阿莫斯和伊隆卡的房子在大门旁，房间也不小；俘虏们睡在马厩里；吉卜赛人睡在山沟里的小泥屋里。

“地主有一段什么故事？”

“大家都知道。你刚来，你要是在这儿呆久了，就知道了。

“地主家有两个老人：约尔达凯·阿里赞和约弗库，他俩都超过了八十岁。约尔达凯老爷是我们地主的父亲。约弗库老头儿是约尔达凯老爷的结拜兄弟。约尔达凯老爷是地主，脚上穿的是漆皮鞋，身上穿的是在布加勒斯特定做的黑衣服；他的衬衫总是浆得挺挺的；他从不围围巾，也不扎领带。他惯于穿地主式样的服装，不扎领带。他对人们说：

“‘我要是扎领带，那就好比是在自己的脖子上套了一

条绳索。’

“有时，地主想逗个乐儿，就讲起他如何在梦中梦见绳索和绞刑架的情景。年轻时，他经常从梦中惊醒，吓得浑身出盗汗。后来，他对这种梦已习以为常。现在，他不再害怕，也吓不醒，可以一直把梦做完。早晨起床后，他回想起梦中的情景，自己还开心地笑呢。

“由于害怕被绞死，约尔达凯便和约弗库老头一起渡过多瑙河，来到这里。这是五十多年前的事了。那时，他们俩在多瑙河的另一边拦路抢劫，得了很多金银财宝。他们拦劫官府的人，于是官府便四下搜捕他们，逼得他俩无处藏身。最后，他们好不容易钻进树林，渡过多瑙河，来到罗马尼亚境内。后来，约尔达凯老爷在伯勤干的中部租了一块地种。他还结了婚，生了三个孩子，两个孩子已经死去，只剩下我们的地主这一个。他的老婆是本地的一位农村姑娘，也死了。约弗库老头儿不愿意改变巴尔干的穿着。你知道约弗库老头儿是怎么个打扮？他脚上穿的是农民鞋，袜子上扎着带子，下身穿着宽腿的粗呢裤，上身穿粗布外套，头上戴顶毡帽。看上去倒像是地主的佣人——一个老佣人。一个时期以来，约尔达凯的体力日衰，他有时到院子里走走。他的拐杖把是金的。他手脚发颤，瘦得只剩下一身骨头架子。约弗库老头儿可就完全不同了，他看上去不过五十岁的样子。他一天到晚不闲着。他还骑马到鱼塘去，骂渔民们鱼捕的太少。然后——等他来这儿时，你也会看到他——就去找牧羊人，用棍子打他们，说他们挤奶

挤得不干净，奶头里给羊羔留的奶太多了。昨天，我在山下羊圈里遇见他。当时，牧羊人正在剪羊毛。约弗库老头儿一来，他们可倒霉了。这个老家伙觉得他们羊毛剪得不干净，便跳下马，拽过一只羊，把羊按倒在地，拿着剪刀说：

"'看，应该这样剪毛！'

"约弗库老头儿一下子剪完了一只羊的毛。这只羊又肥又大，身上剪得光光的，就像用刮胡子刀刮过的一样。他劲头一上来，一直干到中午，剪了一大群羊的毛。"

"这个老头儿干吗这样为地主卖命？"

"也许其中有什么奥妙。约弗库不和地主一起吃饭，而和佣人们一起吃。只是睡觉时，他独自睡一个房间。他睡的是木板床，上面铺着羊皮。他的这套铺盖就跟他以前当强盗时睡的一样。因为，那时官府到处追捕他，他的铺盖只能那样简单，以便随时背起逃去。约弗库老头儿总是和衣而睡，他身上的衣服两个星期才换一次。要是你在这庄园住长了，你也会认识米蒂策少爷。"安德烈补充说。

"他是谁？"

"是地主的儿子。"

"他也有儿子？"

"我们这个地主的老婆早已死去，不知何时何地死的。地主年轻时，走南闯北，四处游荡。有人说，他的老婆根本就没有死，是她背弃了地主。一天，佣人们在地主的屋子里发现了他的这个儿子。他是从远处被带到这儿的，他

的两腿软得变了形，是在轮椅里长大的。他出门时坐在轮椅里，用手推着车轮向前走。现在，米蒂策少爷已二十多岁了。他总是打扮得像去跳舞一样整齐。地主派了一个吉卜赛姑娘进城专门学了一段时间的手艺，比如修指甲，理发，刮脸。这个吉卜赛姑娘在米蒂策少爷身旁消磨着青春。少爷摇着小车出来，望着人们，可他从来没骂过人。要不是人们有时听见他和他父亲说话的话，还以为他是哑巴呢。他生就一张消瘦的小白脸，两只大眼睛向外突出，一脸贼相。”

安德烈已睡熟。透过窗户可看到空中的繁星闪闪发亮。安德烈说着梦话。我含含糊糊地只听清了他说的一个字：赞比拉。明天我要问问他赞比拉是谁。我在思索着我所听到的关于地主、地主的父亲、地主的儿子以及约弗库老头儿的事情。

这些老家伙以前在多瑙河那边的巴尔干地区拦路抢劫。凡是拦路抢劫、谋财害命所得的不义之财都埋在地底下，以至被遗忘。这些以前我听过很多。

整个童年我都在为藏在我家房底下或房子周围什么地方的财宝而苦恼。人们经常谈论着，在开春和积雪融化时，有时半夜三更便从我家院子的地下冒出一道蓝色火苗，这火苗能闪几分钟，把院子照亮。正是由于这些财宝的缘故，我家场院后边的那棵白杨树才枯死。那棵白杨树的树梢儿

高出整个村落，当我在回家的路上迷失方向时，从好远的地方就能看到我家院后的那棵白杨树的树梢儿。

曾祖父从奥尔特河畔娶来了曾祖母。当年，曾祖父是个身强力壮的男子汉。在通往贝利托里方向的村界处，有个十字路口，路口上至今还有一块又大又圆的界石。这块界石很重，要五六个人才能搬得动。曾祖父叫米特罗伊·格布内亚。在一个星期天，曾祖父约了一大帮人来到界石边。他弯下腰，摆出要扛口袋的架势，憋足了劲，一下子就把界石扛上肩，然后扔下。要是他出村前再喝上几壶葡萄酒的话，他肯定能一口气把石头连续扛起十二次。

从父亲开始记事时起，曾祖父就常出门，尤其在秋天，一去就是几个星期。他不告诉去哪儿，好像是入了地似的，无影无踪。曾祖母从来就不知道曾祖父一去是否还能回家。

曾祖父就是这样游荡，一直到两鬓苍苍，体力不支。他的胡子里长出白须，眉毛也白了几根。从此，他不再离家出走。曾祖母知道，曾祖父不会再出走了，因为他近八十岁了。

曾祖父死了很久以后人们才知道，以前曾祖父和奥尔特河畔的连襟们以及其他亲戚一起参加了一个组织。他们有时渡过多瑙河，到土耳其甚至到更远的巴尔干地区；或者向北，翻山越岭到特兰西瓦尼亚日耳曼族人居住的富饶地区杀富济贫，为民除害。

等他们到了一定年龄觉得干不了的时候，便平分他们自己辛苦得来的钱财。

在一天夜里，曾祖父骑马回到家中。他那匹白花腿的马被重重的行囊压得喘着气。他带回两罐金子：带有奇怪符号的土耳其金币，还有奥匈帝国的福林金币。曾祖父拿出金子装了满满一锅，然后把锅深深地埋在场院的地下藏起来。那时，我家的场院差不多有村子的四分之一大。

曾祖父有七个儿子，还有六个女婿，但是，他没给他们任何人一分钱。曾祖父在世时，儿子、女婿总是向他央求：

“我们知道你有钱，爸爸，给我们一两个金币吧。”

“以后这些都是你们的。你们不要急，等长犄角的小鬼儿把我召走后，再归你们。”

曾祖父活了八十八岁，要不是在一位孙女的婚礼上他不幸因枪走火被打死的话，他起码会活到一百岁。

给曾祖父送葬时，他的几个儿子都没哭，而是扯着嗓子骂他。曾祖父死了。他一死，埋藏财宝的地方便成了一个谜。

曾祖父的场院先是分成四块，后来又分成了八块。父亲小的时候——当时也就五六岁的样子——在现在迪莫泽尔叔叔那间不用的小泥屋的地方，爷爷想盖一个牲口棚。他和他的弟弟迪奥尼斯·格布内亚一起挖牲口棚的地基。

他们正要想再往深处挖时，铁锹尖儿碰上一块黄铜，硌得铁锹吱吱响。这时，我爷爷把锹一扔，一边呻吟一边骂着，躺在地上直打滚。

“我心疼！我心绞痛！”

他嘴里不停地骂着他弟弟，并赶他回家。

“你回家吧，明天早上再来。”

爷爷嘴里还不停地说着一些脏话。

迪奥尼斯走后，我爷爷便站起身，跳出坑，回家了。等到夜深人静时，他拿着铁锹，领着奶奶又去挖地。

爷爷的猜测是有道理的，正是这个偶然的机会，他发现了曾祖父藏在地下的财宝。

因为锅太重，他搬不动。于是，爷爷看着，奶奶用桶朝屋子里运金子，运了好几次才运完。

我的伯父沃伊库比父亲大几岁，他还清清楚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他说，当时奶奶在床边地上铺了块单子，把一桶桶的金子倒在上面。那时，沃伊库伯父也还小，便下床玩起金子来。我父亲和其他的人都在熟睡。屋子里点着小油灯。

最后，爷爷把空锅也拿回来。锅很大，是黄铜的，锅边上长了铜锈。

后来，我的伯父沃伊库睡着了。爷爷和奶奶忙了一整夜，天亮时，他们又把找到的财宝埋在另外一个地方藏好。

第二天，迪奥尼斯来挖牲口棚的地基时，爷爷早把那个坑填上了一半。

“你回家吧，我不盖牲口棚了，不需要了。”

动了财宝后一个星期，爷爷的最后一个老伴儿死了：因为她动了钱。爷爷认为，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他的老伴儿才死了。

爷爷有个年轻的弟弟，是个小伙子，叫格尔甘·格布内亚，他成亲时，爷爷给了他两个金币让他办婚事。就在要去教堂举行婚礼的那天，新郎突然跌了跤，摔死在地上。

"这些不义之财夺走了家里的第二条人命。"爷爷这样想。于是，他又把这些金银财宝朝深处埋了埋。

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一天，布蒂内伊村我爷爷的一个表兄来找爷爷。他家穷得揭不开锅，他求爷爷借给他一个金币。爷爷很想再试一试财宝是否真的灵验，便借给了他。我们这个亲戚家的小伙子回到家后，脖子便肿得老粗，村里的巫婆也无药可治。最后，他死了。

"这些财宝又夺去了我家的第三条人命。"爷爷又这样思索着。

从此，再也没人知道财宝藏在何处。爷爷发誓，只要他还活着，就不再去碰这些财宝。

儿子们长大了，并且都结了婚。女儿们也都出了嫁。在爷爷的屋子里，经常听到这样的话：

"爸爸，你什么时候才能告诉我们那些钱埋在什么地方？"

"快，我们干脆把那些钱刨出来分掉算了，管它三七二十一！"

可是，爷爷毫不动摇。

"我对你们说过，只要我还活着，你们就甭想知道财宝的秘密。那是鬼钱，是谋财害命抢来的不义之财。你们当

中要是谁走运找到这些财宝，那就让他独吞了。那些财宝就埋在场院的地下，以后，我们的后代里总会有人能找到的。”

儿子们一个个地衰老了，女儿们的脸上也布满皱纹，掉了牙。爷爷变得更老了。瞧，爷爷又给他最小的儿子——我爸爸——娶了媳妇，娶的是杜米特拉，她比爸爸年龄大。她给爸爸生了几个孩子。后来，爷爷病了，腿脚不能动了。

爷爷躺在门廊上，爸爸带着妻子和最小的孩子下地干活，留下格奥尔基哥哥给爷爷赶苍蝇。说是赶苍蝇，其实，他在爷爷身旁放上一碗水，再放上一块面包，便跑到邻居家玩去了。

一天早上，爷爷感到不舒服，于是把我哥哥喊来：

“喂，格奥尔基，你过来。”

我哥哥走到爷爷的身旁。

“你听着，我告诉你一件事，你千万不要跟别人讲。我现在就告诉你，过去的财宝埋藏在什么地方。等你长大后，就去挖出来，你也不要告诉你爸爸。格奥尔基，你听清了吗？”

爷爷年老多病，还抽旱烟。所以，他的嘴里喷着烟草味，哥哥不爱闻这种味。

我哥哥不理睬，又上街跟小朋友玩去了。

晚上，爸爸回家时，爷爷还活着，但是不能说话了。他又活了几天，可就是一个字也说不出来，而且手指也不能动。

爷爷哭了。儿子、孙子、孙女；女儿、外孙、外孙女在他身边围了一大堆。爷爷哼哼着，胸部起伏，眼泪不住地往下流。

大家都明白，此刻爷爷心里有一个念头，他想在临终前把财宝的秘密说出来，可是现在不行了。然而，他的儿子、孙子、曾孙子们又是多么需要藏在地下的这些钱。因为，爷爷的后代越过越穷，他们穷得一贫如洗。不管他们怎么拚死拚活地给地主干活，没有一个人能吃饱肚子。

爷爷却把他的秘密带到另一个世界，那些钱仍沉睡在地下。于是，这个家族的人都去让村里的铁匠打长矛。打出的长矛很长，头又尖又锋利，而且另一头还有弯弯的把柄，为的是好能拄能提。

一连几个星期，我们本家所有的人都用这些长矛在自己的场院里钻洞，一步一个洞，披星戴月地钻，把整个场院穿了个透。长矛像涂了油似的一直插到地底下，就是碰上装钱的锅，也能穿透。

他们没有找到财宝，于是骂个不停。但是，他们还是经常提起财宝的事。我们家里也常有人说到那些金币。每年春天，爸爸都在场院里盖牲口棚。可是，每次不等盖好，就又换个地方挖地基，不等上顶，便又填了坑，再换地方。即使爸爸一头牲口也没了，可他还在为牲口棚挖地基。

我家的后院有棵高高的大杨树，大有刺破苍穹之势。我进城后，他们就用戟砍它，爸爸和伊昂哥哥一起砍。杨树

死了，树被风刮倒的时候，树冠几乎把我家的房子压塌。于是，他们砍下树枝，刨出树根。他们原以为这棵杨树根下会藏着那些财宝，可到头来他们一无所获。

杨树被锯成小块，当劈柴烧掉。

现在，有时邻居们晚上还盯着我家的场院，期待着财宝上面闪出蓝火苗。我家的场院里也许会闪出蓝火苗，也许不会，谁知道呢。

以前，我们在阁楼上也翻找过。那儿净是一些碎瓦片破笸子，漏底的筛子，破衣服，没把的锹，钝斧头和多年不用的大破坛子。

当我还在孩提时，所有这些东西都使我想起了前人。他们曾用这些破锹掘地，用这些钝斧头砍树，也曾因痛饮这些坛子里的葡萄酒而酩酊大醉。

我也经常想起那些穿着已经褪了色的绣花坎肩的人。

我没有什么可玩的。尽管我以前念过书，而且总想读一些有关这个一去不复返的过去所遗留下来的遗物的资料，但片纸未得。对祖先的生活情景，我只能想像而已。如今，他们的躯体早已化为乌有。

一天，我在阁楼上不停地翻找，找到了一根又长又白的棍子。这根棍子又光又亮。我猜想，这一定是用一块大骨头做的。天长日久，骨头就变得越来越光滑。我拿着棍子下了阁楼，然后用衣服擦掉上面的灰尘，拿到太阳底下一看，太棒了。我拿着这根棍子一直玩了一天。

爸爸下地回来，他看到后问我：

“你在哪儿找到的这根棍子？”

他说话的语气十分严厉。

“在阁楼里找到的，爸爸。”

“拿过来。”

他从我手里把棍子夺过去，然后朝场院走去。我不知道他把棍子藏在什么地方，我很奇怪，好像这根棍子使爸爸想起了什么不幸的事。吃饭时，我问爸爸：

“爸爸，你干吗拿走我的棍子？”

“那根棍子呀……”

“你说，爸爸，这是为什么？那根棍子可好玩儿啦。”

“如果你想知道的话，我告诉你，我爷爷用过这根棍子。谁也不知道他用这根棍子敲碎过多少脑壳。”

我想，爸爸肯定把棍子埋了起来，这完全可能。但是，不管爸爸埋多深，那根棍子永远也不会烂掉。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也许是因为这根棍子像骨头，也就是说，不是死尸上的骨头，所以它永远不会腐烂。这根棍子轻得像一支笛子，不过拿在手里还是沉甸甸的。

安德烈醒了。他发现我辗转反侧，便问：

“达里耶，你睡得好吗？”

“我睡得……”

我们走出庄院。

小麦已长到膝盖那么高，再过十几天，还会高出两倍。

到那时，麦粒就会变得饱满，麦穗就会沉甸甸。去年冬天下了大雪，有利于庄稼的生长。大雪一直覆盖到战士同敌人浴血奋战的战场上。

俘虏们也醒了。他们排着队去吃饭。每天早晨下地干活之前，他们像在兵营里一样，吃的是黑乎乎的热粥。这就是早点，没有茶的早点。

麦田里的蓟草该拔了。这是吉卜赛人干的活。现在我才知道，山沟的小泥屋子里一共住着四百名吉卜赛人。在河谷里，这四百人光着脚，衣不蔽体地度过了无数个寒风呼啸的冬天，熬过了一个又一个的酷暑。他们几乎是赤身裸体地风里来雨里去，顶着烈日干活。他们的处境真不如有羽毛的鸟，有鳞皮的蛇。

在冰天雪地的严冬，他们袒胸露背，为生活而奔走；在骄阳似火的盛夏，他们光着身子在烈日下拚死拚活地干活。

每群吉卜赛人都有一个头人。这一群吉卜赛人的头人叫布拉克·布兰恰。他与地主年纪相仿，也是那么强壮、高大、有力。所不同的是，这个头人的所有手指上都戴着金戒指，而且比阿尔吉尔·阿里赞地主戴的戒指还粗、还重。

头人不光脚，他穿的靴子高过膝盖，靴面上镶满了银币，银币已显得陈旧，生了不少斑点，失去了光彩。头人的鞋掌上钉的钉子也是银的，鞋后跟也钉着银钉子。头人穿的裤子是毛料的，黄颜色，裤腿是红色的，而且很宽；腰

里扎着一条一拃宽的腰带，腰带上也镶着银币；头上歪戴一顶压到眉毛的毡帽，毡帽上挑着一翎羽毛；他身穿花衬衫，前面的扣子也是银的；他手里拿着鞭子，鞭梢上还拴着一些带尖儿的铅块。

头人就是这群吉卜赛人的主人。地主一点也不把这些吉卜赛人放在眼里。对于这些吉卜赛人，头人和地主之间有协议，就像地主同图尔努的德国司令部达成协议使用俘虏兵一样。地主付给头人钱，头人把钱分成十份，自己留下八份，另外二份给干活的吉卜赛人作报酬。

头人可真富！整个吉卜赛人的住地，只有他一个人穿得像样。头人的孩子也像其他吉卜赛人的孩子一样，都光着身子。头人的妻子也像其他吉卜赛人的妻子一样穿得破破烂烂，衣不遮体。不过，头人还给了他的妻子一些特殊待遇：不让她下地拔蓟草，不让她去割麦，不让她干重活——只让她到村里用贝壳去给女人们算命。当然，不能白算命，谁要找她算命，就得给她玉米面和白面。俗话说：有点儿总比没有强。头人总可以增加些收入。

我们在庄园里经常听到头人甩鞭子的声音。这说明，吉卜赛人要下地干活了。

吉卜赛人开始爬上山岗，他们两手抓着石棱，揪着干枯的野草根，跪着向上爬。这里本来有一条小路直通岗子，但是，这条小路只有头人才能走。下地干活之前，吉卜赛人必须先体会一下生活的艰难。

我和安德烈来到岗子边。吉卜赛人也爬了上来，头人

早已等在那里。这时，头人骑上一匹大黑马，扬起鞭子不停地抽打这群吉卜赛人。他们边搔痛边跑。头人的助手给每人分派好该干的活。他们踮起脚尖儿进了麦田，生怕踩坏了麦子。他们看见蓟草就拔掉。蓟草茎很高，茎上长满了密密麻麻的硬刺。他们捏着蓟草，慢慢地向上拔，生怕连麦子一起拔掉。他们把拔下的蓟草抱在怀里，拔多了就捆成捆。他们的一双黑手扎出了血，胳膊也被扎破。地主根本就不看吉卜赛男人一眼，而只盯着吉卜赛女人看，看得特别起劲！头人用鞭子抽人，抽打的都是吉卜赛男人。那些吉卜赛女人由头人的助手管。

割下的麦子要晒干、脱粒，然后把干净的麦子装进口袋。

日月消逝，似水流年。

鞭子像手枪声一样劈劈啪啪地响着，鞭子声在远近的山岗间回荡。但是，鞭子声传不到多瑙河彼岸的保加利亚那边。

在拔蓟草的吉卜赛人中不断听到鞭子声；地主的管家们耀武扬威，张牙舞爪，他们不停地挥动着手里的皮鞭，鞭子声响遍了整个田野。在地主的庄园里，拔蓟草的是来自河谷泥棚子里的吉卜赛人，也有其它村的农民，他们个个晒得黝黑。他们几乎光着身，满身是泥垢。

在俘虏兵除草的地里听不到鞭子声，那里只有军人在祈祷。

俘虏们头上缠着红布，每天日出时，他们就跪在地上

祈祷；日落时也跪在地上祈祷，罗马尼亚人都觉得他们可笑。

“弟兄们，你们祈祷也没用。不管毛拉还是真主，他们早就把你们忘了。你们的真主和我们的上帝现在都有别的事：他们透过天幕上的窗口在观赏成为战场的田野。你们的真主和我们的上帝在寻欢作乐，他们看到我们干的这些蠢事会哈哈大笑。我们在相互残杀。那个地主——你们看见他了吧？——在罗马尼亚人统治时，他过得很好。当保加利亚人渡过多瑙河来到这一边时，这个地主害怕抢走他的东西，便和保加利亚军官勾搭起来，他会讲保加利亚话，请保加利亚人到他家吃饭。而且，还常把乐师叫来，让保加利亚人寻欢作乐，好不热闹。这样，他的财产终于保住了。”

一天过后，来了德国兵。地主故伎重演，把他们请到家中，并派了一个管家到岗子下的帐篷里弄来了一些吉卜赛姑娘，供德国军官消遣取乐。每个星期这些德国人都要同吉卜赛姑娘在地主家鬼混一次。地主是个瘦高个儿，还戴了一个单片眼镜。他到过不少国家，会讲许多种外国话。他的一只眼睛是假眼，里面装的是玻璃球。那只眼睛是他当年到热带国家狩猎时打瞎的。如今，那些我们与之生死搏斗的外国入侵者，是我们的敌人，但不是地主的敌人。

瞧，德国人来了，地主也在，他正在用德语同他们交谈。这次，地主又免遭了德国兵的掠夺。而他却让我们受苦当奴隶。我们从早到晚给他干活，得到的又是什么？每

星期能抽上几片烟叶，晚饭是一碗菜汤和一块玉米糕。我们瘦得皮包骨。

"伊利耶，你那公正的上帝在哪儿？喂，说的就是你整天为它祈祷的那个上帝！……还有，穆罕默德，保佑你的真主在哪儿？谁在照顾你的妻子和孩子？你有几个孩子？"

"嘿，有四个。愿他们安然无恙。"穆罕默德回答。

"我只有三个。"摩尔多瓦的战士伯尔查图·伊·阿达姆说。

我成了俘虏们的好朋友，常在他们中间消磨时间。当管家不在跟前时，我们就聚在地头上闲谈。他们经常谈起他们摩尔多瓦老家的情况，我听得出了神。有些俘虏住在山区，也有的住在丘陵地带。多布罗加人说，在他们那个地区的村子里，人们会讲很多种语言，村子里住的有鞑靼人，土耳其人，格格乌茨人和罗马尼亚人，他们和睦相处，从不发生纠纷。

"我们乡里也有保加利亚人。"约尼查·格尔扎说。

"你们吵过架吗？"

"我们为什么吵架？各家有各家的地，也有房子，有牲口，有各自的欢乐和忧愁，互不相干。只是在一九一三年，我们相互动过肝火。那时，村子里的保加利亚族人听到我们同边界那边的保加利亚人打仗的消息后，他们很不高兴。可是，难道我们听了这个消息就高兴吗？你毫无所求，平白无故地去枪杀别人，或是白白地被人打死或打成残废，这

不是罪孽吗？这是天地不容的罪孽呀！但是，我们做不了主，别人决定一切。那时，宪兵们把我们从这样的破草屋里抓走了．如果那时我们有头脑，会判断，能讲理而且说话又顶用的话，我们就不会去同保加利亚人打仗。而且，后来我们还得了霍乱。”

我和男男女女的吉卜赛人以及吉卜赛孩子们一起拔蓟草。头人的助手不打我，地主的管家也不打我。在庄园，我是受优待的特殊长工。我管洗牲口槽，打扫牲口棚，帮助做饭的搅拌玉米糕，还帮他们打汤。这些活，我干得很顺手。我什么活都学着干。我想，我这样做对我以后可能遇到的任何不幸都会有好处。吉卜赛人不惧怕大棒、皮鞭和辱骂。他们的背上、胳膊上和腿上经常淌着鲜血。他们用自己的语言诅咒，一会儿又用自己的语言唱起歌来。有时晚上我同他们一起到岗子下，到他们住的地方去玩。起初，他们对我有戒心。后来，当他们发现我和他们一起吃饭，像他们一样蹲着，甚至躺在篝火旁毫不在意地搔痒时，他们便几乎把我当成了自己人。我和比我稍大一些的男孩子结成了好朋友。特纳塞·菲耶尔·勒乌的妹妹叫基拉。她至多不过十三岁，但是看上去却像个十八岁的大姑娘。她的面颊略黄，长着一双蓝眼睛；她的两个乳房鼓得很大，好像是生过孩子，并且喂过奶似的。她钻进帐篷，拿出她祖母的贝壳。这是一个又光又亮的大贝壳，贝壳周围是灰色的，呈起伏状。她拿着贝壳在我身旁的草地上躺下。

"你把贝壳放在耳朵上听听。"

我把贝壳放在耳边上。

"你听见什么了吗?"

"听见了,听见远处的河水冲击石堤的哗哗声。"

"这个贝壳是从红海弄来的。战前,我们赶着篷车到处游荡。我小的时候到过土耳其。现在,我们定居了。头人把我们卖给地主,让我们给地主干活。你愿意让我用贝壳给你算算命吗?"

"算吧。"

篝火烧得很旺,火上架着锅和罐子。锅里熬的是玉米粥,罐子里煮的是就要开锅的莴苣汤。太阳早已落山,无数颗繁星在空中眨着眼睛。基拉的腰很细,腿又长。她开始念咒语,并用手比划着。

"你今年十五岁,贝壳这样说。"

"对,我是十五岁。"

"你长着一双深蓝色的眼睛,贝壳这样说。"

"是的,我的眼睛是深蓝色的,可我从来还没看见过自己的眼睛。"

"任何人都不能看到自己的眼睛。"

"不能。"

"你独自一个人生活在野地里,贝壳这样说。"

"是的,地里就我一个人。"

"你和其他的男孩子不一样,贝壳这样说。"

"我和别的男孩子不一样,我知道,我走路时腿是瘸

的。”

“你想把一个姑娘搂在怀里。”

“我是想。”

“你想搂的是一个吉卜赛姑娘。”

“一个吉卜赛姑娘！”

“这个吉卜赛姑娘不叫基拉，基拉已经定婚了。”

“定婚了？”

“对！她定婚了。”

“同谁？”

“同一个漂亮的吉卜赛小伙子。”

该死的姑娘！她哈哈大笑，嘴里露出珍珠般的小白牙。篝火照亮了她的脸。为了摆脱这种尴尬的窘境，于是我也大笑起来。其实，我自己也不清楚我是怎么回事。我喜欢基拉，当我挨近她时，她使我神魂颠倒，我只想要她一个人。但是，当我见到赞比拉时，我又忘掉了基拉。我觉得我更喜欢赞比拉，如果我有权力自己做决定的话，那么赞比拉将是被我选定的意中人。

当我在卢什德维德那儿——到秋天我离开那儿正好满一年——给伯尼格老板当佣人时，我曾爱过一个姑娘。她的父亲在附近一条街上开客栈，我从城里回到老板的矮房子时，就路过这里。有时，我看见这个姑娘站在门口，她的脸又白又圆，长着一双绿眼睛，经常冲着我微笑。一天晚上，她给了我两个熟杏儿。

“拿着，”她对我说，“吃了吧。我走了，佐伊卡在叫我。”

这时，从柜台里传出火气冲天的女人的叫喊声。后来我才知道她是客栈老板的养女。老板整天让她擦地板。她差不多每天都要挨打挨骂，她的养父养母动不动就把她打得死去活来，还说什么，这是管教她。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见过这个白净脸的姑娘，然而我却从未忘记她。有时，我仿佛听到她挨打时的尖叫声。有时，在梦中我恍惚看到她在微笑，听见她说："拿着，吃了吧……"她给我的杏真甜，因为熟透了。

"她用贝壳给你算过命？"特纳塞问我。

"算过。"

我们三个人都笑了。

"你要是能在庄园里呆到秋天的话，我就请你来参加礼婚。"基拉说。

"也许我能呆下去。"

"我秋天就结婚。"

我没有问她究竟同谁结婚。这时，一个长得像埃万吉莉娜姐姐的婆婆那样又矮又胖的吉卜赛女人把搅好的玉米糕扣在桌子上，她催着我们大家去吃饭。

"喂，快过来吃饭。"

我们走过去，围坐在桌子旁。我们吃起来，野菜汤的味道还真不错。

"汤里放了青杏，所以有酸味。"胖女人说。

我在家时，妈妈也做野菜汤，汤里也放青杏。青杏是我上树摘的——摘的都是发青的酸杏。那时，我吃起青杏

来一直吃得倒了牙。春天，我还常在杏树和李子树的树皮上找干树脂吃呢。

“你再喝点汤吗?”

“好。”

我爬上岗子，回到地主庄园。因为我不想绕远去走那条上岗子的小路。岗子的坡上净是碎石子,为了避免滑倒,我便揪住稀稀拉拉的草丛，一步一步地往上爬。爬上岗子，我累得瘫倒在地上。黑暗中,突然看见一个人向我走来。平时，我的腰里总是别着一把双刃短刀，刀把是骨头的，刀放在皮套里。所以，我一下子便拔出了刀子。

“喂,你是谁?”

“我是好人。”

那人后退了几步，停住了。

“长工,我想跟你说点事。”

“说吧。”

“你不要总是缠着基拉。”

我让他再走近一些。那人来到我身旁，离我只有一步远。他是个瘦高的吉卜赛人，我认识他，他几乎是赤身裸体。

“过来,我们谈谈吧。”

“好。”

“你不是杜杜利克铁匠吗?”

“我是杜杜利克。”

“我告诉你，杜杜利克，我和基拉没有任何关系，我和谁也没有任何关系，是你多心了。”

“你到基拉的帐篷里去过，而且经常去，你这个长工……”

“我是去找特纳塞，不是找基拉。”

“但是，你也同基拉说过话。”

“是说过话。”

“她是我的未婚妻。”

“我很高兴，看得出你是个能干的小伙子。杜杜利克，你送我回庄园吧。”

杜杜利克的个子比我高，看上去有十七八岁的样子。

“基拉已经请我秋季去参加你们的婚礼，如果那时我不走的话。”

“你想离开这儿吗？”

“可能。”

“仗一停，我们也要走。眼下头人把我们拴在地主的庄园里。”

“你怕失去基拉吗？”

“管家安德烈已经缠上她了。”

“我去告诉他，让他放老实点儿。”

“他要是不听的话，总有一天夜里我要用刀子把他捅了。”

“你那么爱基拉，爱得能为她去杀人的地步？”

“我非常爱她。”

"基拉知道吗?"

"她知道,她是成心气我。结婚后,我就每天打她。"

"为什么?"

"不挨打的女人就像没凿齿的磨一样。"

"你不是说你爱她吗?"

"打是亲,骂是爱。"

"她会让你迷住她,那你就不会再打她了。"

"迷住!……只有你们罗马尼亚人才相信那一套,我们吉卜赛人不信这些。"

我们分手了。微风习习,田野的上空,一轮明月缓缓升起。

"假如管家安德烈再缠着基拉不放,我就杀死他!"

在岗子上的地主庄院里,从来没有信来,也收不到报刊杂志。但是,没有不透风的墙。来来往往的人或多或少地总能传来一些外界的消息。村里的男男女女和那些俘虏得知,在摩尔多瓦边界那边的俄国,受尽压迫、厌恶战争的士兵和农民都起来造反闹革命了。他们还说,在摩尔多瓦地区的俄国军队因为不愿意再打仗,也起来造了沙皇的反。

"一九〇七年,我们也闹过起义。"摩尔多瓦南部地区的一个士兵安东·迪努说,"那时,我们烧了地主的庄园,吓得地主、二地主个个胆战心惊。在那次起义中,我们付出了血的代价,忍受了巨大的痛苦,由于我们没有拧成一股

绳，没有统一的行动，我们还是没有成功。起义失败后，地主在村里进行了大屠杀。”

“在我们家乡，”摩尔多瓦北部地区的一个叫马诺列·兹梅乌的士兵接着说，“起义后，我们的生活更苦了，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暴动中几天之内毁掉的东西，需要我们用百倍的劳动才能恢复起来。我们那时毁掉了什么？我们放火烧了一些茅草房，这也算搞了暴动。当我们来到庄园时，等待我们的是荷枪实弹的军队。二地主原在村里开了个酒馆。有些人便下酒馆去喝酒，把挣来的钱喝个精光。还有些人虽不下酒馆，却打发孩子去买旱烟抽。地主早已把这些看在眼里，记在心上。现在，到了地主报复的时候了。他把带头闹暴动的人和劝告大家不要进酒馆的人，还有本村的教师，都列入了黑名单。对这些庄稼汉和那位教师根本就没审讯，便毒打起来。军官们把这些人打得浑身淌血，还把他们捆起来游街，然后枪毙了事。”

“起义那时，我还年轻力壮。”退伍军人德拉戈米尔·特罗芬说。听他说话的口气，似乎现在他已经老得不记事了似的。“从那时到现在有十年了。那时，我深思熟虑之后，便满怀信心地投入了战斗。我这样想，现在不干，更待何时！我们要好好地教训一下地主！我们教训了我们村的地主。在起义初期，我们村的那个地主还耍威风，根本就没有躲藏的念头。我们一帮人拥进他家的院子，他站在门廊上看着我们，说：

“‘乡亲们，你们要干什么？’

"'我们要土地，因为地是我们种的。你赶快滚到城里去吧！'

"'我？我为什么走？这是我的庄园！'

"'难道这个庄园是你从娘胎里带来的吗？'

"'混账！你们反了？国家有法律。

"'法律是张擦屁股纸，它不是为民的法律，是地主的法律！'"

"我们拥向屋门。这时，地主抄起门后的一杆猎枪向百姓开了火。两个女人被打死，其中一个就是我的妻子。我们没有被吓跑。相反，我们扑到地主身上，把他拉到院子里，用乱棒把他打死。后来，军队带着大炮来了，我们躲进森林。大炮整整打了一个星期，直到把全村夷平。军队又包围了森林，然后把我们捉住。我们在盐矿干了五年苦役。"

"如果俄国人能够把革命搞成功的话，我看革命也会传到我们这儿来，那我们这儿也会好起来。"

"他们会成功的。因为军队也站在革命一边，他们有武器。人民手里有武器，腐朽的统治阶级垮了台，沙皇完了！"

"有时战争也会使皇帝垮台。"

俘虏们蹲在篝火旁。正值初夏，天气开始热起来。但是，人们还是离不开火堆。呆在篝火旁，不会使你感到孤独，篝火如同一颗跳动的心，它不会熄灭。

"我多布罗加老家的玛兰达不知现在什么样了？我把她和四个孩子扔在家里。我离开家时，口袋里只剩下一碗玉

米面。那时，第五个孩子还没出世，也不知是男孩还是女孩，我想要个女孩，因为前四个都是男孩。祝他们长寿！”

没有人能回答伊斯特拉蒂耶·胡卢布提的问题，因为谁也不知道多布罗加老家的玛兰达现在的情况。她是活着，还是在这次兵荒马乱的年头和几个孩子一起死于非命，对此都杳无音信。其实，伊斯特拉蒂耶·胡卢布也并没期待别人回答。他是在大声地倾诉他内心的忧虑。这种忧虑在折磨着他，使他焦急，痛楚，忧心如焚。此刻，别人的心情也同他一样。

“我昨天做了个梦。梦里，我撑着木筏沿着比斯特里察河顺流而下，回我们家乡尼亚姆茨。在靠近托安切时，我听到了哗哗的流水声，我紧张得要命。我看到不少人因为没撑好木筏而被卷进旋涡，丧了命。可我总算过去了。只是往下冲时，碰上一个漩涡。我被吓醒了，喘着气，吓出一身冷汗。家里可能遇到了什么不幸的事。”

我从来没见过高山，也没见过大海。我只见过平原和池塘，还有多瑙河。于是，我问：

“尼奇塔大哥，你家在山区吗？”

“在山区，靠近森林。我家有好几间祖辈传下来的带门厅的老式房子。冬天，我到皮亚特拉的铁匠铺干活。夏天，我就去撑木筏。整个冬天我见不到妻子一面。由于大雪封山，再加上住的分散，所以在好几个月的时间内，就是两家之间串个门也办不到。

“野兽跑到家门口来是常有的事。饿坏了的野兽闻到人

味，急得团团转。家里只剩下老婆和孩子。有一年冬天，我的一个孩子死了，我老婆就把他装进一个口袋放到冰冷的阁楼上。等到来年开春过复活节时，冰雪消融之后，我才把孩子埋掉，因为那时我就可以回家了。我从城里给死去的孩子买回衣服和鞋，给他穿上，让他在地下长眠。我们那儿就是这样，冬天死了人，便放进阁楼，等到来年春天再做棺材，请神父送葬。要是你赶在冬季生了病，愿上帝可怜你吧，是不会有人给你送药的。”

尼奇塔大哥望着熊熊燃烧的篝火，沉默不语。大家都不说话，好像心里都压着一块大石头。过了一会儿，有个人开了腔：

“像我们这些撑木筏的人都是勇敢的人，每次顺流而下时，我们都是冒着生命危险。但是，这还算不错，因为，决定生死只在瞬间，少受罪。而那些生活在深山老林里的人就更苦了。他们连住的地方都没有，终日生活在森林中的地窖式的土房里。山区比平原上的冬季更长，在滴水成冰的漫长的严冬里，他们仍要出外伐木，不少人冻坏了手脚，从小冻成了残废。因为地窖里没有烟囱，有些人被烟熏瞎了眼。烟只能从地窖入口跑出去，外边的寒气也从入口钻进屋内。晚上，你睡在火旁，身子的一边被火烤得难忍，另一边却又被寒气吹得生疼。睡梦中，你总是下意识地蜷缩着身子，像穿在铁棍上的一只烤鸡。当他们年老不中用时，只能沿街去乞讨。你瞧，当你看到有些人比你还苦时，你会感到宽慰。可是，当你一想起那些过着花天酒地生活的

人们时，你恨不得举起大棒去砸烂他们的脑壳。在东部边界的那一边，平民百姓站起来了，这并不奇怪。那里的人也是受尽了压迫，再也不能忍受贫困和饥饿了。”

篝火在缓慢地燃烧，蓝色的烟在微风中飘散。

“如果这个世界上有真理的话，那么，肯定也会传到我们这儿来。”伊斯特拉蒂耶·胡卢布说。

“真理永远不会自动到来，人们要为真理而斗争。东边的人们为获得真理进行了斗争，他们不是等着真理从天上掉下来。我们也要想一想这件事。”尼奇塔说，“等时机一到，我们也要果断地采取行动。”

“我们想一想吧。”

晚上我经常和尼奇塔一起在庄院周围散步。他身材矮小，黑皮肤，浑身长满长长的黑汗毛。从当了德国人的俘虏时起，他蓄起了胡须。

我开玩笑地问他：

“尼奇塔大哥，你是不是想当神父？”

“哪儿的话！”

“那你为什么留胡子？”

“别人也留了胡子。”

我很喜欢尼奇塔。他经常给我讲高山、清澈的激流以及梅花鹿和黑山羊的故事。

“有时几个地主凑在一起上山打猎，他们望着我们，还给我们的房子、老婆、孩子照像。他们还说：‘这些人生活在山青水秀的地方，空气多新鲜。我们在城里……’他们

胖得走不动。小伙子，我们应该像捻死臭虫那样把这些家伙捻死。我看，既然我们的东边点燃了革命的烈火，那么，我们这儿的地主们的末日也快到了。这场可恶的战争要是结束的话，你也想想：上帝在创造大地的同时，也创造了高山。山上长的各种树木，同样是上帝撒下的种子。从皮亚特拉到雅西，整个山脉都被这个地区的少数几个人所霸占。山下的伐木场也是他们的。山上的树木靠雨露阳光自然生长，可是他们却任意霸占。伐木的人不是死于事故，也会死于饥饿。我们既要用木筏运输木材，又要砍伐树木，生活十分困苦。我们的孩子死了，可连做口小棺材的木条都没有。我常做梦，梦见家里的情况，这不是好兆头。可能我回不去了。你瞧，战前的一个隆冬，我的大孩子死了。那时，有我的老婆照管其他孩子。假如我老婆也死去，那么在大雪封门的屋子里，孩子们在几天之内就会活活地被饿死。这种事在我们那儿就发生过。”

“现在是夏天，尼奇塔大哥，也许等不到冬天你就回家了。”

“也可能，如果我能逃出去，能顺利地偷越过前线的话。”

“那你为什么不设法逃跑呢？”

“有时我真想逃跑。可是，我又怕越过前线之后再碰上咱们的队伍，他们还会把我送上前线。我打仗打腻了。说到死吆，谁也免不了一死，可我现在不想死。如果国外的起义会蔓延到我们这儿的话，那么，战后就需要很多身强

力壮的人。是的，是这样……会需要很多身强力壮的小伙子，需要他们干一番事业，这不是开玩笑。”

尼奇塔面色蜡黄，双手青筋突起。

“我们那儿的山很美，”他接着说，“溪水清澈见底。如果我们能再过上好日子……”

一种压抑、沉闷的气氛笼罩在田野和庄院的上空。

伊斯特拉蒂耶·胡卢布是多布罗加人，他也会讲鞑靼语，他的村子里有一半是鞑靼人。

多布罗加，多么吸引人的地方！我渴望离开这弹丸之地，到遥远的地方去旅行，开开眼界，结识新朋友，观赏美丽的风光。

在我上小学期间，只要有书，我就读，我读了不少关于国外风土人情的书籍。

我看过一本并不厚的书，书里有一张男孩子的照片。他和我年岁相仿，他不仅赤脚，还光着身子，只在臀部围了一块破布。他手里拿着一根又粗又长的拐杖，拐杖上还刻着花。他那乱麻一样的卷发上插着一些奇怪的羽毛。照片下面写着：乌拉拉的国王阿布。

我读过很多书，但读过的东西也忘了不少。不知为什么，乌拉拉国王阿布的形象却深深地刻在我的记忆里。

我从头至尾一口气看完了这本书。我从此得知，阿布是乌拉拉岛的国王——当时我想知道这个岛在什么地方。于是，我拿着这本书去找我的老师，向他请教了这个问题。

老师回答说：

"乌拉拉岛是南海中的一个岛国，靠近苏瓦岛。"

南海里有许多珊瑚岛，一年四季都是夏天，人们一年到头几乎是光着身子，只靠果树和植物就可以生活。

暑假期间，我偷偷地钻进学校的阁楼，找到一张南海的旧地图。我掸掉上面的灰尘，然后拿起地图去找老师。我请求老师把这张地图送给我。老师果然送给了我！我拿回家，把它挂在墙上。

这是童年时代最使我高兴的一件事。我整天睁大眼睛看地图，读着每个岛屿的名称，用手指测量着它们之间的距离，完全陷入了神妙的想象之中。

我在地图上找到了乌拉拉岛，还找到了一些具有时髦名称的其它岛屿。我想象中的旅游使我度过了无数个不眠之夜。后来，我感到在地图上旅游也很累人。于是，我便思考着能否按想象中的路线做一次实地旅游。我心想，也许能实现，也许实现不了，可能还是实现不了为好。朝思暮想得到的东西和梦幻中的事物，最好不要碰到它。

我在城里的皮革作坊、"天使商店"、斜眼伯尼格那儿干活时，尤其在夜里，有时因思念父母、兄弟姐妹而久久不能入睡。那时，我陷入甜蜜和深沉的回忆之中，怀念之情油然而生。我决定回家看一看。回到家中，妈妈只是问我饿不饿，却不去拿块玉米糕来先给我吃，总让我饿着肚子等家里其他人都回来了再一起吃饭。兄弟姐妹们一齐向我扑来，他们迫不急待地要把我从老板那儿挣来的几个钱夺

走。他们对我冷嘲热讽，叫我“瘸子”。

我本想坐在白杨树下，静听它的沙沙声。然而，白杨树早已被砍掉，变成了灰烬。即使我能看到一棵完整的白杨树在风中摇曳，它的瑟瑟声也会令我乏味，不会对我产生任何魅力。当我疲惫不堪，忧伤像阴暗的浓雾一样向我袭来并把我包围的时候，我总是思绪万千。我知道，如果我陷入这种思想境界，我的意志就会消沉，力量就会减弱，就会像条没眼睛的蚯蚓那样永无出头之日。于是，我振奋精神，丢掉悲伤，寻找光明、欢乐和歌声。我完全变成另一个样子。现在我觉得没有任何不可达到的目的。我想到一个大城市去工作，去学习，去见世面。只要我心里有这种打算，迟早总会实现的。我默默地重复着这几句话，浑身充满了信心和力量。带着这样一颗火热的心，我继续前进。以后，我要周游全世界，不只是想象，而是亲身做到。我要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爬上通往光明的梯子。

我一边指着地图，一边构思着自己的计划：在这个地方将停留六个月；这个地方只呆一个月；那个地方要呆上一年。这样，到二十岁的时候，就可以绕地球一周，见识各地的风土人情。

想到这里，我心潮澎湃，热血沸腾。我那理想的火焰一直冲向天空中的群星，并且穿过群星，以它那无比的光辉照亮整个宇宙。

“喂，你为什么老盯着这块布？你疯了？”

伊昂哥哥的问话使我如梦初醒，又回到了现实。

"可能我疯了，"我回答他，"你有什么事？"

"没什么事，只是见你发傻感到担心。"

"你少管！"

"我就是要管！"

"伊昂，你别管他的事！"妈妈说。于是，我哥哥伊昂便不再管我。可是，过了一个小时之后，他又来缠我。

"那个大肚子吉卜赛人是谁？"

"是个国王。"

他哈哈大笑起来。

"这个光屁股的是国王？"

"是的，一位黑肤色的国王！他的国家的国民，脸都是黑的。"

"你真疯了，达里耶，你可真疯了！"

"我疯了，管你什么事？"

"我当然要管！"

"你管个屁！"

话音刚落，我便挨了两巴掌。

"你再骂我，我就砸断你的腿，你这个瘸子！"

为了乌拉拉的国王阿布，我忍受着一切。

我没有忘记乌拉拉国王阿布，我不能忘掉他：他活泼机伶，耳朵上戴着两个大耳环，耳环足有女孩子们戴的手镯那么大。他头上插着我从没见过的五颜六色的羽毛，手里拿着那根象征权力和力量的棍子。乌拉拉国王的肚子大

得像个鼓，皮肤黑得像锅底，两条腿又细又长，而且还是弯的。这就是乌拉拉的国王！

我曾这样想，这个国王可能食人肉，或者，让他的士兵用长矛杀害他的良民。这个念头一出现，我便对我眼前这张照片上的男孩子失去了好感。他的脸是黑色的，可是书中说他的脸是橄榄色的。然而，就像不能把水从水桶里倒得一干二净一样，我对阿布的爱慕之情怎么也不能完全从心中抹掉。再说，水倒出去，水桶里还可以灌进新水。阿布也许只不过是一个老奸巨滑的强盗的奴隶而已。一个孩子不可能领导一个国家。

“你在嘟哝什么？”安德烈问我。

“没什么！”

“啊，原来你也说梦话？”

“不，我没说梦话。只是有时忘了旁边还有别人，便自言自语地说起来。”

“你说过，你读了不少书。”

“读过几本。”

“你喜欢吗？”

“有几本很喜欢。”

“你瞧，”安德烈说，“看书对我来说简直就是受罪。爸爸有地，可是我们兄弟姐妹太多。爸爸曾让我去上学，我也想过要当一名会计。但是，我一看书就头疼，人为什么要读那么多的书？”

安德烈比我大四岁，长着一双黑眼睛，是个漂亮的男孩子。他已经长出了胡子。夜里，我经常发现他从床上爬起来，踮着脚尖儿走出屋门，朝楼下走去。我知道，这时准是伊隆卡一个人在家，因为，头天晚上安德烈已把阿莫斯支走出外办事去了。

有时，我看见安德烈悄悄地溜走，骑上马飞快地朝向日葵地里奔去。那块向日葵地紧挨着麦田，吉卜赛人正在麦田里拔蓟草。安德烈来到麦田，拽着一个吉卜赛大姑娘或小媳妇就往向日葵地里钻。等他回来时，他不再快马加鞭，而是慢悠悠地走着，还得意地吹着口哨。

"你认识赞比拉吗？"

"认识。"

"她对我说，她今晚想到庄园来。"

"那么，今晚我就和俘虏们去睡在一起。"

"为什么？你用不着走开，我到别处去。"

拔蓟草的活儿已干完。吉卜赛人又被派到池塘去干活。他们成群结队地回到自己的帐篷里，个个又黑，又脏，精疲力尽。

村子坐落在山岗的下边，街道又窄又长，弯弯曲曲。村边是克尔默楚伊河，河对岸是河滩地，再过去便是庄稼地。要到池塘，还需走相当长的一段路。安德烈派我赶车到池塘去拉鱼。黄色的马和褐色的马都膘肥体壮。为了使庄园

经营得更好，能连年获得好收成，赚更多的钱，所以，尽管地主有牲口，可他还是向德国人要耕畜！德国人便把从各村征来的牲畜送给了地主。只要地主向德国人开口，德国人总是有求必应。

杜杜利克和菲耶尔·勒乌为了陪伴我并帮我干活，便和我一起乘车去池塘。

大马车慢腾腾地走着，我们并不着急赶路。晚上，我们将在渔民家住宿。天亮时装车，然后往回返。中午时分，可赶回庄园。

“驾……大黄马……驾……褐色马……”

“别急，杜杜利克。”

“我不是着急赶路，只是一不扬鞭子我就发睏。”

路边的平地上突然出现一片密集的十字架。

“去年秋天，德国人来时，就在这儿的河滩上打了一个大仗。我听到山谷里的枪声。仗打完之后，头人的帮手奉地主的命令，让我们来埋死人。我们把死人埋了。当时，我们只埋死去的罗马尼亚人。德国人埋他们自己的死人。埋完后，他们又继续前进。”

“特纳塞，那场战斗打得怎么样？”

“糟糕透了！我们的人——一个有大刀，有长矛的骑兵团——顺着多瑙河谷向大坝那边撤退，寻找去布加勒斯特的道路。本来要不了几天他们便可脱险，但是，他们还是没逃掉。一队德国兵从保加利亚那边过来，到了齐姆尼恰。后来，德国兵又插到我们这儿，切断了我们部队的去路。当

时，指挥这个骑兵团的上校不想绕远路走。德国人在这里挖了战壕，架起机关枪。上校命令偷袭德军阵地，我们的骑兵手持大刀、长矛向德国兵猛冲过去，德国人像割麦子一样把罗马尼亚骑兵扫倒在地。几个战士跳下马，手持卡宾枪在高地上抵抗，所以，德国兵也死了不少。上校和他的副官们站在远处观望战斗，最后，我们的骑兵团缴械投降了。德国兵把罗马尼亚士兵身上的东西抢个精光。我们把死去的战马剥下皮后埋掉，剥下的皮送回庄园。地主就用这些马皮给佣人们做鞋。"

这块墓地有三个普通的墓地那么大。风吹、雨打、日晒使十字架变黑而破裂。

"埋在地下的马和人早已腐烂发臭。"

一群鹅在十字架间的肥沃草丛中啄食。

"我们马上就到拉克里马了。"杜杜利克低声说，"瞧，那不是！"

拉克里马正是我们要去的那个池塘边上的一个渔民村。

弯着腰才能进去的小茅屋，屋顶上苫着芦苇，没有烟囱——烟从屋门口出去。令人奇怪的是，水面上吹来的强风怎么没把这些小茅屋吹倒，刮走。小茅屋的四周是荒凉的野地，各家门前有一两棵槐树。偶尔看见一只瘦母鸡或一头长满疥癣、只有稀稀拉拉几根长毛的猪。孩子们有的光着屁股，有的盖一块破布躺在门廊上晒太阳。他们的脑袋旁边放着一个水罐。一个孩子正抬起身，伸出两只黄瘦

的手去拿水罐，然后把水罐送到嘴边抿几口。

“摆子。”菲耶尔·勒乌嘟哝着，“拉克里马的孩子们都在打摆子。”

到了岔道口，我们停下来在井旁饮马。马甩着脖子上的鬃毛，嘴里喷出热气。这儿的水咸得发苦。井里的水上漂着垃圾。一个老太婆摇晃着走来，她求我们：

“好孩子，帮我打一桶水。我老了，摆不动水桶了。”

我们满足了她的要求。我问她：

“老妈妈，村里的人哪儿去了？”

“都去池塘了。管家把村里的人都赶去割芦苇了。”

这个池塘一眼望不到边，里面长满了杂草、芦苇、香蒲和灯心草。现在正值盛夏，必须把芦苇割下来，弄到岸上。芦苇生命力旺盛，可以再长出芦苇来，秋天还可以再收一次芦苇。

我们停下马车观看。远近一片片赤裸着身子的人们在割芦苇，水没过他们的腰。他们把割下的芦苇放到小船上，装满一船，便把船推向岸边。他们浑身是泥浆，爬上岸，卸下芦苇，垛成垛，随后又跳进水里，推走船，继续割芦苇。数百人、几十条船在池塘里川流不息。一群群的苍蝇，一窝窝的蜜蜂，飞舞成团的蚊子把他们赤裸的身子咬得净是血迹斑斑的伤痕。男人们的身上一丝未挂，女人们只是用香蒲编一块席子当遮羞布。

“我们卸下马吧。”杜杜利克说。

“卸吧！”

我们抱来一捆芦苇，铺在地上准备睡觉。我们点上一堆火，火冒着浓烟，为的是不让蚊子叮。

“撒下的渔网很大。”菲耶尔·勒乌对我解释说，“明天天亮时，渔民们就收网。”

“渔民们现在在哪儿？”

“瞧，在那儿。”

他指着那些割芦苇的人说。

“白天他们割芦苇，清早捕鱼。”

我们同拉克里马的人在岸上一起吃饭。我们喝的是牡蛎汤，只是汤，没有肉；吃的是玉米糕。

“你们不吃鱼？”

“不吃，鱼不是我们的。我们捕鱼，却不许我们沾鱼的边。”

“那么，什么东西许可你们动呢？”

“什么也不许我们动，因为都不是我们的东西。”

这一点也不奇怪！农民种小麦，收割，脱粒，可是打下的麦子不是他们的，家家户户从五月份起就没有面包吃；他们种玉米，收玉米，可是连玉米糕也吃不饱；他们给地主家放牛，却不知道牛奶的味道；他们养猪，可猪肉却在圣诞节时给地主送去。复活节时，他们给地主送鸡蛋，夏天送小鸡，秋天送肥鹅。他们给地主管理葡萄园，摘葡萄，可他们却没尝过一粒——他们不能吃，因为每个人的嘴上都戴上了金属兜嘴，一直到收完葡萄才能取下。

“达里耶，你也戴过兜嘴吗？”

“我爸，我妈，我的兄弟姐妹，还有我家的亲戚，我们都戴过。”

一个渔民说：

“但是，如果我们活够了，我们还可以自由地跳进池塘淹死，或者去上吊；跳蚤咬了，我们还可以随便搔痒；如果我们高兴的话，也可以抠抠后脚跟；家里有人死了，还可以哭。这些自由还不够吗？”

“够了。”杜杜利克说。“我们都够可怜的呀！”

“我们可以去逮青蛙吃。”这个渔民说，“不过，我们不爱吃青蛙。”

啊！我的铁匠表哥扬库对我说过的那种火种在这儿是可以生根发芽的！只要有人来播下火种就行了。

早上，我们套上装满鱼的马车回庄园。车上都是些小鱼，最大的不过有手指头那么长，小的不过手指盖那么大。美味的大鲫鱼和肥美的大鲤鱼装在另外的车上，运往图尔努和齐姆尼恰去卖钱了。

盛夏，小麦开始长熟。微风吹起麦浪，整片麦田像是波涛滚滚的海洋。夜幕姗姗来迟，天色由碧蓝变黄而逐渐晦暗。天亮得早了，天空先是靛蓝，尔后变得灰濛濛的，然后变得发紫，随后就天亮了。而庄院的夜晚就像小孩子的脚步那样显得那么短。我们很难入睡。下房里传出阿莫斯的嘟哝声和他老婆清脆的笑声。真是不可思议的一对！

阿莫斯来这儿已很久，他本是阿尔迪亚尔地方的人，后

来在地主家落了户。他喂过牲口，也做饭。当阿莫斯还在厨房干活时，地主从布加勒斯特带来了匈牙利族姑娘伊隆卡。开始，伊隆卡给地主做饭，后来，她不再和锅碗瓢盆打交道了，而同阿莫斯结了婚。这门亲事使人们笑掉了大牙。婚后，阿莫斯同他的妻子一起被派去当庄园的看门人。

每天早晨，地主都到伊隆卡这儿来喝咖啡。阿莫斯在庄园里干些杂事，嘴里唠叨些令人难懂的话。

你以前没在地里过过夜吗？谁说夜里大地也沉睡？夜里，原野生机勃勃，每根细草都在活动，昆虫在草丛中爬上跳下，还有那些白天藏在草叶中、避在草根下看不见的其它生物，它们也在夜晚忙碌起来。

谁说夜里大地沉睡？

夜里，原野充分显露出它的生命力。灰色的长蜥蜴穿梭在草丛中，每种生物都在伺机捕杀和吃掉别的生物。夜间，每根草，每株小麦，每棵向日葵，还有玉米，都在睁大眼睛注视着苍穹，整个原野张开大嘴在呼吸，伸开两臂在拥抱清凉湿润的空气，那是繁星流下的眼泪。

夜里，风活像是一个人，像一条蛇，像一只雄鹰。夜里，天空也是活的，你可以看到它也在转动。瞧！昨天晚上，大熊星座还在北面，现在，天亮时，它已经改变了位置。瞧，它现在到了南边保加利亚的那一片荒山野岭的上空了。

夜间，大地充满生机。

夜间，你在泉水边呆过吗？夜间，泉水流得更急，潺潺的水声充满欢乐。如果你喝上一口，你会感到有一种特殊的味道——泥土的芳香。

夜间，你在田野里睡过吗？

夜间，我在田野里睡觉，身上穿着坎肩或是裹着毯子。地真硬！确实如此。当你的脚踩在地上时，你会觉得地很硬。而在夜间，当你躺在草地上睡觉时，青草垫在你的身下，你会觉得大地十分柔软，像躺在飘浮的彩云做成的蓬松的鸭绒上一样。

夜间，你在地里露过宿吗？

我经常在地里过夜。我知道自己能够入睡，而且还做梦。在梦中，我也十分清楚自己是在做梦。是的，我在睡觉，而且知道自己在睡觉。那时，我的两眼一闭，脑海里便浮现出颗颗繁星，还觉得月光在温暖着我的躯体。

是的，我在睡觉，而且知道自己在睡觉。我为自己能很快进入梦乡而高兴。入睡后，我的两耳也失去了知觉。但是，我的手、脚和整个躯体却在聆听着田野里的声音。这些声音没有打断我的梦，也没有把我吵醒，相反，却像一支催眠曲使我睡得更香。我越是睡得香，就越发感到夜空广阔无边，就越发听到田野里种种奇妙的声响，这是几万种语言同时在夜间叙谈家常，而我的两耳竟不去聆听，当然，就是听也听不懂。

圣灵降灵节过去了。

过了降灵节又怎么样！吉卜赛人得到地主的许可，他

们请假分三路到各村去跳格鲁沙舞①。

请假离开此地去跳舞并不是无偿的。因为吉卜赛人属于地主所有，他们要去跳舞的大小村庄也是属于地主的。跳舞挣来的钱，三分之一交给地主——格鲁沙舞捐，三分之一交给头人，剩下的三分之一则由跳舞者均分。

"吉卜赛人还是有所得，他们没白去跳舞。"

吉卜赛人穿上他们仅有的破衣服，拿着支帐篷的长棍棒去跳舞。棍棒上缠满了艾蒿，顶端挂着一块红布条。

在降灵节那一周的星期六，吉卜赛人排着长队，吵吵嚷嚷地沿多瑙河走去，我们一帮人跟在他们后面。跳格鲁沙舞的人中间有一个人装哑巴。这个哑巴要和其他跳格鲁沙舞的人一起向神灵发誓：在跳格鲁沙舞的一周之内，不管发生什么事，这个哑巴不得说话。其他的吉卜赛人也要对神灵发誓：不管哑巴对他们做什么，他们都必须百依百顺；在跳格鲁沙舞的这一周内和跳舞结束后，不管哑巴怎样打他们，他们也不许吭一声。他们手摸着缠满艾蒿的棍棒上的红布条向天发誓。

跳格鲁沙舞的人腰里都缠着艾蒿，帽子上插着艾蒿。你别奇怪！在降灵节这个星期里，谁不戴艾蒿，就要被取消跳格鲁沙舞的资格，而成为局外人。

这个哑巴的脸上沾着用麻和毛做的假胡须，浓密的山

① 一种罗马尼亚民间舞。

羊胡子上又沾了一些短麻须，使胡子更加稠密。他手里拿着一把红漆木制大刀，腰里围着女人用的围裙。

跳格鲁沙舞时有乐队伴奏——一个吉卜赛人拉小提琴，另一个吉卜赛人弹科波查琴① 。

跳格鲁沙舞的人开始串村跳舞。他们去的第一站便是地主家。

地主坐在门廊上的软椅上，他的跛腿儿子坐在轮椅里，我们这些打杂的佣人站在院子里观看表演。

格鲁沙舞比赛开始了。三个格鲁沙舞队参加表演。优胜者可得到地主的奖赏：一个列伊的银币。

在演出中，哑巴向跳舞的人做了个手势，让他们搭一座人桥，于是他们便手脚触地，一个挨一个地搭起桥来。哑巴还指挥他们把桥架直。

哑巴像带兵开进敌国之前的大公一样，满意地举起大刀，准备过桥迎战敌手。

但是，此刻一个队员突然出来跟他捣乱。这个跳舞者从人桥里把头伸出，于是，哑巴就揍他，一直把他揍回原处。

哑巴再次准备过桥。这时，桥中间的一个队员突然平趴在地上。

原来是大水涌来把桥冲断，哑巴举起大刀东砍西劈，越打越厉害，直到把队员打得不动为止。现在人桥又修好了，

---

① 一种类似吉他的民间乐器。

哑巴跳上人桥准备通过。他接连踏过五个队员，正要跨上第六个人时，桥又断开，哑巴四脚朝天地摔在地上。这时，舞蹈队员们一跃而起，始终密切注视的乐师们趁势奏起欢快的旋律。队员上下舞动着棍子跳个不停，个个跳得汗流浃背。

跳格鲁沙舞的人鞋上和膝盖上都系着铃铛，跳起舞来叮当作响。哑巴跳得最起劲。一会儿，一个跳舞的人离开舞队，爬上一棵树。哑巴发现后，便下令停止跳舞，去捉拿他归队。哑巴也上了树，逼得那个人越爬越高，哑巴不放过他，举起大刀劈头盖脸地向他砍去。于是，那个人跳下树，哑巴也跟着跳下来。大家继续跳舞。这时，跳舞者显得格外温顺，哑巴放心了，乐师们奏着乐。

这时，哑巴走向人群，拿着大刀把人分开，好给跳舞的人让出一块更大的地方。遇上妇女，哑巴就用大刀朝裙子里捅。看热闹的人笑得前仰后合，地主们也笑了，就连约弗库老头儿也乐得合不上嘴。

就这样，跳舞的队伍在各村走街串巷跳了整整一个星期。

在连续七天的降灵节的最后一天，太阳下山后，跳格鲁沙舞的队伍像第一天开始跳舞时宣誓那样，又来到河边。现在，他们把红布条撕成碎片，扔进河里。随后，哑巴的那把大刀也被抛入水中。接着，哑巴揪下假胡须，把它扔进水里。原先的誓言实现了，跳格鲁沙舞的人群解散了。

阿莫斯不喜欢我们这个地方跳的格鲁沙舞，他说：

“你们跳的格鲁沙舞哪像是舞蹈，简直是瞎胡闹。我们那个地方，格鲁沙舞是最精彩的舞蹈。跳格鲁沙舞的都是最棒的小伙子，每当跳格鲁沙舞时，他们个个打扮得像新郎一样漂亮。”

“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跳法！”

“多瑙河这一带跳格鲁沙舞跳得最差劲，依我看，你们这儿是受了土耳其人的影响。跳舞时，浑身动得太厉害了。”

“也可能。”我回答他说。

在降灵节期间，村子里除了吉卜赛人跳格鲁沙舞外，那些留在敌占区不够应征入伍年龄的半大小伙子和那些大姑娘以及男人上了战场的小媳妇们，依照当地风俗习惯在酒馆门外跳起霍拉舞。乐师们——三个不起眼的可怜巴巴的人——自带乐器前来伴奏：一把老掉牙的褐色小提琴，一架鼓着肚子的破科波查琴，一根键磨得发白的单簧管。单簧管很长，管口的喇叭朝外翻着。要是你不了解情况，乍一看这几个乐师，再望望这几把乐器，你的心里准会这样想：他们也会蒙人。乐师开始奏乐。拉褐色小提琴的是个高个的吉卜赛人，有点驼背。如泣如诉的琴声牵动着众人的心弦；单簧管吹着雄壮的绿林好汉进行曲，声音犹如山林在呼啸，好似一尘不染的多瑙河在咆哮，又象是一望无际的原野在歌唱。琴师急促地弹拨着怀中的科波查，欢快的舞曲响彻天空，跳霍拉舞的人越跳越起劲。有的人跳起来象溪水，潺缓从容，舞姿幽雅动人；也有的人跳得十分

剧烈，脚使劲地跺着地，有如狂飙骤雨。

这些歌曲、霍拉舞、谚语、谜语和各种神话故事都是古人传下来的、他们以此表达自己的欢乐，倾诉内心的痛苦。他们曾经在这里生活，也像今天的父老兄弟一样受尽压迫，被迫拿起刀枪斧头起来造反，有的人为此而流血牺牲。他们失败了，不得不继续忍气吞声，任人宰割，蒙受耻辱和苦难。尽管统治者滥施淫威，对他们的肉体进行无情的摧残，但是，人民的心永远是自由的。因为，谁也无法奴役人民的灵魂。你可以殴打他们瘦弱的躯体，把他们打得遍体鳞伤，血流不止，在地上翻滚、吼叫。但是，他们的心却象飞向天空的小鸟一样，是自由的。人的心灵是无法得到的，无法征服的，哪怕用皮鞭抽，石头砸，子弹穿，都无济于事。严刑拷打，折磨肉体都容易做到，然而要阻止他自由地思考，那是办不到的。他会这样想，躯体获得自由的日子总会到来。于是，他充满信心，更加坚强。

"地主，你听着，你的刑具不灵了，明天是属于我们的。"

这些情感深沉的乐曲是那些受尽折磨，然而又充满希望的人们在漫长的岁月里谱写出来的。虽然过去了几个世纪，但直到现在，人们仍然伴随着这些乐曲的旋律，手拉着手，昂首阔步满怀豪情地跳起霍拉舞，似乎整个世界只属于他们，他们本来就是大地、森林、山河、宇宙的主人，他们是自由而幸福的人。

是的，自由和幸福终会到来！

这些乐曲就象青草出于土一样发自人民的内心，随着歌曲的旋律，人们跳着欢快而激烈的霍拉舞，它像为反抗压迫而进行的血雨腥风的战斗和漫长残酷的起义那样，激动着每个人的心。也正是从这些霍拉舞曲中看出人民对胜利和幸福充满信心和希望，从而表现出人民反抗压迫斗争的英雄气概。

乐师们演奏得并不十分精彩。然而，你瞧，他们是满腔热情地演奏着这些反映赤脚大众心声的乐曲。在忍受着艰苦劳动的父老兄弟面前，年轻人不顾两手插在裤兜里站在旁边监视他们的那些穷凶极恶的德国兵的目光，欣赏着在多瑙河沿岸、平原和山区生活过的祖先们流传下来的乐曲，也像当年他们的祖辈一样，尽情地跳起霍拉舞。此刻，阳光灿烂，大地生辉。

今年，这个村的乡亲们也像其它村的乡亲们一样，忧心忡忡。战争使人们一贫如洗。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要交，繁重的劳役也要服。官吏们横行霸道，无恶不作。独眼龙地主和他的狗腿子更是为非作歹，动不动就毒打百姓。地主的庄园必须多打粮食，因为要养活德国兵，也要向德国提供粮食。而独眼龙地主更是贪得无厌。然而，霍拉舞却给这苦难深重的多瑙河流域的居民带来一些欢乐和一线希望。生活不会终止，并将勇往直前。

“达里耶，要从周围的一切事物中寻找生活的真正而深刻的含义。”

刚刚战死在沙场的奥米达村的年轻漂亮的铁匠扬库·

布勒泰斯库表哥，在一天晚上曾对我这样说过。这些话已深深地铭刻在我的心里。他虽然死了，但铁匠铺并未因此而关门。现在乌杜杜伊家那个扁鼻子、矮胖子的小儿子又撑起铁匠铺的门面。不知道他父亲为什么给他起了这么个怪名叫安库。而表哥原来的徒弟、伊万·岑楚的小儿子也劲头十足地抡着小榔头，有时甚至抡起大锤打铁。同他爸爸一样，他也叫伊万，可是，人们来打犁铧或打大车轮圈时，都叫他小伊万。

“达里耶，会不会在某个地方撒下了火种？”

“是撒了，而且要开花结果。”

夜幕降临，赞比拉悄悄地溜进庄园。她不是独自一人，和她一起来的还有她的奶奶。

她奶奶睡在屋外房檐下的一堆麦秸里。

赞比拉赤着双脚，两条长辫子一直垂过臀部。她身穿白衬衫，腰里系着带子，下身穿着绣花裙子。她走进房门，上了楼梯。

安德烈走了，屋子里只剩下我一个人。我知道，不到天亮他不会回来。我早就听到赞比拉上楼的脚步声。我在黑暗的屋子里等着她。此刻，我的手心火热，脸发烧，嘴发干，一直干到嗓子眼儿。我事先喝了一罐水，可是我的嘴里烧得象吞了火炭一样，整个身子热得像个装满火炭的火炉。奇怪的是我身上的衣服为什么没有点燃，脚下的地板为什么也没起火？

我从门缝里看到她的身影。我伸开双臂，把她搂在怀里。赞比拉笑了。在黑暗的屋子里，我看见她那雪白的牙齿挨近我的嘴唇，她那丰满的双唇在等待着我的亲吻。

“先生，你害怕吗？”

听到有人叫我“先生”，这还是第一次。我怎么回答？我一个字也没回答。我没法回答，因为我才十五岁。

直到半夜时，我才同赞比拉说话。那时，我的舌头变得灵活起来，全身放松，打开了心灵的大门。

“赞比拉，你多大了？”

“十四岁。”

“你干吗要和你奶奶一起来？”

“我不想一个人来。”

“我没叫你来。”

“我愿意来。”

赞比拉的皮肤散发着泥土的味道，她的头发散发着草味，但不是青草的芳香，而是牲口踩过的那种草的味道，可我偏偏喜欢这种味。我喜欢泥土的气味，我也喜欢从多瑙河对岸保加利亚的平原上，或是从远处巴尔干的什么地方刮来的阵阵微风带来的满山遍野的青草的芳香。

赞比拉挣开我的身子，穿好衣服，系上围裙，扎上腰带，又整了整头发。

窗外已经发白，我知道，再过一小时，太阳就会升起，从而开始了难忍的白天。

“赞比拉，你以后还来不来？”

“能来就来。”

“你来这儿不感到后悔吗？”

在赞比拉的眼里，我不再是“先生”了。

“傻瓜，”她对我说，“我怎么会后悔！”

她说着弹了一下我的鼻子，我的鼻子一阵发酸。赞比拉踮着脚尖儿下楼走了。

我走到窗前，看着她远去的身影。她走起路来像一棵在半空中摇曳的向日葵，她的后面跟着老态龙钟的祖母。

太阳从东方升起，明天、后天还是这样，永远是这样。

第二天晚上，我照样等着她。赞比拉没来。安德烈照旧给我空出了屋子到别处去睡。可是赞比拉就是没来，半夜里，我干脆到地里去睡了。

“达里耶，起来。地主找你，他在庄园等着呢。”

以前，地主红光满面，如今，他的脸变得阴沉发紫。他总是急得浑身发抖，好象他的庄园、庄稼和池塘的芦苇起了火似的。渔民们每天清晨从这个渔塘里捕到几十车鱼，地主则把捕到的鱼运到城里去卖。当然也不是全拿去卖，那些小鱼小虾都留下给佣人、俘虏和吉卜赛人吃。从我和安德烈给独眼龙地主当佣人时起，我们吃的就是这些次鱼。

“你去过布加勒斯特吗？”

“没有。”

“我看你很机灵。你去一趟布加勒斯特吧。你按信上的地址把这封信送到。你要亲手交给一个太太，信封上写的就

是她的名字。太太会雇一辆小车来这儿，你跟着她一起回来。当心，在路上别把信丢了。”

“什么时候出发？”

“现在就走。”

“骑马去吗？”

“不。你先乘船到朱尔朱，然后再从朱尔朱坐火车去布加勒斯特。”

“和谁一起去？“

“有个船夫在多瑙河边等你，他是我的亲信。”

地主把信交给我，我把信揣进怀里。独眼龙地主转身对安德烈说：

“你把他送到多瑙河边，你认识路。回来时，再把他的马牵回来。”

地主盯着我，说：

“三天之内赶回来。”

“是的。”我回答说。同时我在想：要是办得到的话……我的脑海里突然闪出另一个念头：这要看我还愿不愿意回来。

地主给了我五个列伊的盘缠，他的大方使我感到吃惊。

“准备好了吗？”

“好了！”

我们骑上马，出发了。地主陪我们走了一段路，然后向右拐去，他要再看一看自己的财富——一片片就要开镰收割的麦穗沉甸甸的麦田，以及大麦、燕麦、玉米和一望

无际的向日葵。

要是地肥，小麦可以长到马屁股那么高。向日葵也长得老高。太阳升起时，葵花向着东方；中午时，葵花直直地冲上；下午时，葵花随着太阳向西偏转。每棵向日葵的顶端都挑着一个黄色的大圆盘，象是一只长着绿色睫毛的大眼睛。一望无际的向日葵睁着千万只眼睛，从早到晚盯着圆圆的太阳。葵花好似太阳，好似太阳。

微风阵阵，整个原野象大海一样翻着滚滚波浪。马在疾驰。安德烈对我很忌妒。

“为什么不派我去布加勒斯特？我真想到布加勒斯特去逛逛。”

“你去过布加勒斯特吗？”

“当然，我去过两次。父亲送姐姐上学时，我跟着去过。”

我们下了坡，眼看就到多瑙河边。多瑙河边是一片河滩地。窄窄的小路，两旁的柳树枝不时地打着我们的脸，扫着我们的肩。我们一步一步地向前走。

混浊的多瑙河缓缓地向东流去。曙光映在河面上闪闪发光，太阳把自己的光辉慷慨地撒在河流和原野上。

一个人站在小船旁等着，他抽着旱烟，鼻孔里喷着烟气。他的儿子站在他的身旁。这个男孩子身材纤细，比我还瘦弱一些。回程时，是逆水，需要他们两个人一起划桨。

“早上好，奥普里绍尔大叔。”

船夫讷讷地答了一句，看得出他是个不爱说话的人。

“你把他送到朱尔朱去。”

“让他上船吧。”

我把马缰绳递给安德烈，同他告别之后，便上了船。船底部已经进了一层水。我坐在船里的一个凳子上，尽量不把脚弄湿。船夫是个大胡子，嘴里总叼着烟斗。他走到船的另一头，用船桨使劲在岸边一撑，船离了岸。他矫健地把船划向河中，然后把船头拨直，船被卷进激流之中。我们顺流而下，小船平稳地驶向前方。

朝霞满天。从岸边潮湿的河滩地上传来清晨时树叶的沙沙声和清脆的鸟叫声。近看，多瑙河的水又黄又浑。我把手伸进水中，水很凉。小船驶向前方，一个个村庄、一片片河滩地从两岸掠过。多瑙河在奔腾，小船在前进。大胡子船夫狠劲地抽着烟，岿然不动。

“奥普里绍尔大叔，你看我们什么时候能到朱尔朱？”

“傍晚可以到。”

太阳已经升起有一竿子高。我们沐浴在阳光下，河水、树木、河滩、森林，凡是能看见的东西都沐浴在阳光下。

作于1947年6月—1948年11月。

译 后 记

扎哈里亚·斯坦库是罗马尼亚著名作家。他于一九〇二年十月五日出生在罗马尼亚特列奥尔曼县萨尔齐亚乡的一个农民家庭，兄弟姐妹十人，家境贫寒。他先在家乡上小学，后因家庭困难而中途辍学。年幼时，因患小儿麻痹症，左脚致残。斯坦库当过皮革作坊的学徒，地方法院的档案助理员，医院职员，记者，农业部和外交部新闻司职员，入过狱。他的丰富的生活经历为其尔后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解放后，斯坦库曾任罗马尼亚国家剧院院长。由于他对发展罗马尼亚文学所做的杰出贡献，四次当选罗马尼亚作家协会主席，曾荣获国家奖金并被授予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当选罗马尼亚大国民议会代表。一九七一年，斯坦库荣获赫尔德国际奖。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五日，斯坦库病逝。

斯坦库最初从事诗歌创作。一九一八至一九二〇年间，他先后在《文艺真理》、《新罗马尼亚》、《文学世界》等刊物上发表诗作，从而受到罗马尼亚文学界的注意。一九二七年出版诗集《朴素的诗》，其中除了自己的诗以外，还包括他翻

译的歌德等人的作品。诗集出版后，受到罗马尼亚评论界和读者的好评，并获罗马尼亚作家协会奖。

解放前，斯坦库作为诗人蜚声文坛，主要诗集有：《阿尔贝》(1937)、《金钟》(1939)、《红苹果》(1940)、《野草》(1941)。

解放后，斯坦库主要从事长篇小说的创作，其主要作品有：《集中营的日子》(1945)、《赤脚汉达里耶》(1948)、《苦根》(1958—1959)、《死亡的游戏》(1960)、《疯狂的森林》(1963)、《我多么爱你》(1968)、《风和雨》(1969)、《沙特拉》(1971)。

《赤脚汉达里耶》原名《赤脚》，它具有浓厚的自传成份，在罗马尼亚文学中是一部独具特色的佳作。作者通过主人公达里耶对自身经历的叙述，艺术地再现了本世纪初罗马尼亚南部多瑙河地区农村的现实生活。作者用粗犷的笔触成功地勾画出一幅广大穷苦农民为改变自己的悲惨命运而搏斗的广阔画卷。书中那些朴素、诚实、勤劳、勇敢的农民和奸诈、狡猾、凶残、狠毒的剥削阶级代表人物都栩栩如生，读后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使人产生强烈的爱憎。充满全书的抒情笔调，浓郁的乡土气息，生动的语言，形象而简洁的对话，使本书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罗马尼亚著名文艺评论家和小说家格林奈斯库曾把《赤脚汉达里耶》誉为“一部活的书”。

作者在本书中不仅描写了地主的残酷压迫与农民的英勇反抗，反映了震动全国的一九〇七年著名的农民大起义，

而且还用很大篇幅描写了农民的生活、劳动、爱情、追求、向往、邻里纠葛、家庭矛盾、婚丧嫁娶和宗教仪式等民俗习惯及各地的风土人情。因此，它也是一部了解罗马尼亚农村和农民生活的百科全书。

《赤脚汉达里耶》于一九四八年出版后，获得了很大成功，至今已印刷了十多版。它先后被译成二十四种文字，在各国广泛流传。

严宝治　姜晓华

一九八六年五月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赤脚汉达里耶
作者＝（罗马尼亚）扎·斯坦库著尹宝治　　姜晓华译
页数＝６５３
ＳＳ号＝１０３３８４３０
出版日期＝１９９１年０１月第１版